# 影响中国历史的六大巨人

----------
www.5iipad.com----引领潮流ipad电子阅读新时尚

----------

自　序

人是需要历史的。此种需要既是功利性的，又是生存意义上的。就前者而言，人类的行为，总是需要历史为其根据，或为其辩护；就后者而言，人类需要从历史中为自己找到安身立命的定点。人生在世，即生活在限定的时空之中。对于空间，他很难为自己安立坐标。周遭的一切，他既感到陌生，亦感到无所适从，大自然的威力迫使他只能俯首听命。而对于时间，他却有着另一种感受。在这一世界里，人是主宰。时间的世界即人化的世界，历史的世界。而历史是人的历史，时间的绵延也就是人的活动的线性积聚。从历史中，人类可得知自己从何处而来，现今又处于何种位置，而且这现今的位置乃又是由历史的线性积聚所决定的。或者说，历史将他们安置在某一个点上，而不是游荡无根。这根，也就是他们的生命和心灵所可依托的历史。因之，人类对历史的眷恋实则对根的眷恋；他们乐于记载或传诵历史，实质上是对自己生命意义的一份关心。（启良《中国文明史》）

西历2003年是我们中华始祖--黄帝--建国第6500年，中国国家文明史已经堂堂正正走过了65个世纪，并已进入第66世纪(西历2004-

2103)。

在一个世纪的开端，往往会勾起我们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向往。鲁迅先生曾说，历史上写着民族的灵魂，指示着未来的命运；我们的历史，是连接现在和未来最有力的线索。本书--《第66世纪》--就是我个人对中国的历史回忆和对中国未来的向往的结果。很自然，这个结果是建立在我学习中国史学原著、学习历代史学家特别是现代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以及学习当代学者在西历20世纪末21世纪初对中国改革和社会发展状况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为此，我首先要向那些对中国历史和改革现状做出了深入研究的学者和专家们表示敬意。同时，我也向所有本书引用到的文章、书著、网文的作者、出版者和网站表示感谢。如果我的认识有什么不同，那只能说明我选择了不同的认识角度。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对中国未来的认识仅仅是个人学习中国历史和总结现实而产生的历史感觉的延伸。书中提出的钺钟历史地理及其重要历史边界线是中国历史事实的总结，并止及于历史事实本身。

我对中国未来的希望是：另一位创造中国崭新历史的历史巨人的出现离我们不远；再一次修复中国传统钺钟历史地理的时刻离我们不远；又一个强大并能影响世界未来的大一统强国离我们不远。

历史应该是公正的，她既不断塑造无数创造历史的英雄，又记录下无数的凡人，同时还不会忘记刻下形形色色卑劣者的行迹。当历史走进书本时，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带上著书人个人思想的痕迹。有的续了历史的公正，有的则模糊了历史。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尽力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给未来的英雄一个思维和伸展的空间。

中国是一个具有举世最为丰富的史典文献资源的国家。"惟殷之先，有册有典"，"是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自虞夏商周秦汉以来至今五千多年，中国历史文献具有一贯的线索，年次分明，从来不曾中断。世界上历史比我国古远的国家，如苏美尔、古埃及、摩竭陀（古印度）等，都没有留下如此而数千年一脉相承的系统史籍。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悠久系统的成文史。没有任何民族具有中国古代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所具有的那样悠远、深刻、富于忧患感的历史意识。这是我国历史在世界史上极可骄傲之点。

盛世修史。在当代，我们有必要重新寻求一种理性的历史认知，首先必须寻求对于民族生存国家发展有利的历史认知。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历史哲学，以国家民族意识为本位而同时具有开阔宏大的世界主义视野。（何新《历史学与"国民"意识》）

人类的历史，果何自始？曰：不知自始。果何由终？曰：不知所由终。在此无始无终，奔弛前涌的历史长流中，乃有我，乃有我的生活。前途渺渺，后顾茫茫，苟不明察历史的性象，以知所趋向，则我之人生，将毫无意义，靡所适从，有如荒海穷洋，孤舟泛泊，而失所归依。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李大钊《史观》）

我有志于树立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寻求一种有利于民族生存国家发展的历史认知，创造一种以国家民族意识为本位的历史哲学，故录此为序。

徐　文

2003年1月11日于贵阳白云家中

2004年5曰23日改于北京会城门临时寓所

**********

上部 第1-65世纪

西历20世纪末至西历21世纪初，是一个各种理论思想丛生的时代，其影响遍及各个领域，历史学领域也不例外。中国历史悠久而浩繁，但很多在最基本的正确认识基础上的多角度系统总结和概括，仍然存在不少的分歧。这里提供的对中国历史（中历第1-65世纪）的历史概论、历史时代、历史时空、历史巨人以及历史循环的认识，仍然是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一孔之见。我们以为，对历史特别是对中国历史的科学总结，会有益于我们对现实和未来（第66世纪）的正确判断。

# 第一章 历史总论

在历史学问题当中，中国历史分期包括世界史分期仍然是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对于我这个业余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在参与讨论中国历史问题之前，自然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对中国历史，应该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构架来区别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对世界历史，应该注重世界各主体文明以及其所包含的所有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演进和相互影响关系。

## 第一节 中国历史简论

在展开讨论中国之历史及其未来之前，先看看普遍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大势及其主要特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历史是个什么样的历史？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开篇第一段话以及该卷对中国历史发展连续性和统一性这两个显著特点的总结很具有概括性：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含着曾经在这块广大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1）

中国文明产生于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经过夏、商、周三代的连续发展，到春秋时期进入铁器时代。与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爱琴文明不同，中国古文明没有为外力所中断。中国古代国家经过春秋、战国之后，继续向秦汉时期的更高阶段发展着。

公元四、五世纪，中原地区也发生过民族的移动，还建立过不少由少数民族为最高统治者的政权。但是这些变化在本质上都是朝代的分合或更替的问题。以后，在元代和清代，两度出现过以少数民族成为全国最高统治者的皇朝，但这些皇朝和以汉族为最高统治者的一

样，在本质上都是各族上层统治者的联合政权，只不过是具体结构有所不同而已。所以，中国作为政治实体在历史上从未被外力所中断。

中国文明在文化上的发展连续性，在整个世界史上尤其显得突出。（2）

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中国在发展中长期保持着统一的趋势。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最初也是有许许多多的部落，然后由部落合并为许多小邦，再逐渐统一为地区性的国家。相传，"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于国。"（3） 至周武王准备伐纣的时候，诸侯会于盟津（孟津）者有八百之多。（4） 相传，周初分封，"凡一千八百，布列于五千里内。""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国，迄获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七十国焉。"（5）……。

从春秋以至战国，诸侯之间相互并吞，大国争霸激烈。这看起来像是由于周室衰微而出现的一种分裂局面，其实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并小邦为大国，由封国而郡县，形成了地区性的统一王国。战国七雄进一步兼并的结果，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首次统一的秦、汉皇朝。两汉的统治持续了四百余年，为中国以后进一步的统一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东汉以后，出现了五十年三国鼎立局面。西晋以后，出现了二百多年的南北分裂时期。可是魏、蜀、吴三国都是在克服地方割据局面中建立起来的，它们都在为统一全国作准备。就是在西晋灭亡以后的一个较长的分裂时期中，也一直存在一种统一的趋势。前秦符坚曾经一度统一了北方。肥水之战以后，北方再度出现分裂局面，但是在四三九年，北魏又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经过南北朝以后，又出现了隋、唐时期三百年的统一。这一次的统一的规模，又超过了两汉时期。唐以后，虽然有过辽、宋和宋、金之间的南北对立，但统一仍是发展的总趋势。经过元、明两代，到清朝的时候，中国的统一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中国的统一之所以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民族关系的具体发展特点密切有关的。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进入了多民族统一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而达到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

也经历了多次的曲折而终于达到稳定的多民族的统一，并且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6）

这几段话，基本概括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以及其主要特点。我们以为，总结中国历史发展历程，有几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第一、中国历史的多民族性；

第二、中国历史的统一性；

第三、中国历史的连续性；

第四、中国历史的循环性。

多民族性是指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分化和融合的发展特性；统一性是指中国在历史上的大一统和在分裂时段的统一发展趋势的特性；连续性是指中华民族在传统历史地理范围内不间断延续而未受外族（非中华民族）干扰而中断的特性；循环性是指中国历史具有朝代更替、大一统和分裂反复出现的特性。

不过，以上所指出的中国历史发展特性是针对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而言的，那么我们又怎样来认识这个历史演进过程所反映的中国历史社会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总体特征呢？这是一个长期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争论不休的难题。王家范先生通过"归纳择取诸史学前贤的种种论析，掺合自己读史得来的杂感"，归纳出中国传统历史社会的总体特征有八点，（7） 我以为很有见地。

第一、中国文明的早熟特性。从农业起源、农业经营方式（多肥多耨、精耕细作）、工商业水平、城市集聚程度以及中央集权体制、意识形态化文化确立等等社会要素而论，都显示出较之世界其他民族早熟，而且善于借鉴历史而不断修缺补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世界传统农业社会这一历史时段比较，中国传统社会属最为先进、周密和成熟的少数类型。

**第二、农业产权的模糊和富有弹性（参见本书第8章第5节--引者）。**

第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主要有三种连结方式：血缘、地缘和业缘（业缘当作泛义解，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同业"关系）。细致考察，不难发现历史上的社会互动模式虽时有程度不同的变迁和演进（从上古的宗君合一、封邦建国，到中古的门第郡望、门生故吏，到近世的同乡会、商邦、会馆公所），但以家长制为核心的血缘关系在中国社会中始终是最具原生性的人际互动模版，属于社会深层结构性质的东西。

第四、个人崇拜的民族心理和习惯思维根深蒂固。

第五、社会三大系统：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又是居高临下，包容并支配着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所谓"政治一体化"的特殊结构类型。经济是大国政治的经济，即着眼于大国专制集权体制的经济，私人经济没有独立的地位；文化是高度政治伦理化的文化，着眼于大国专制一统为主旨的意识形态整合的功能，异端思想和形式化的思辨不是没有，而却总被遮蔽，了无光彩。一切都被政治化，一切都以政治为转移。

第六、知识精英（可以远溯至上古的巫、史、祝）始终是社会的主流力量。然而，古代知识精英与社会的关系，常常呈现出两种极端的走向：要么紧密地与政治实体粘连在一起，为其不断地提供人才资源和思想资源，转化为社会统治；要么消极遁世隐居，逃避政治，沉醉于孤芳自赏的艺术意境之中，脱离社会与民众。在古代中国，几乎看不到第三种政治势力，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异己"力量（众所周知，反叛的民众总以改朝换代、重建王朝为鹄的）。

第七、如果深入观察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整合体制，"大一统"的成功常常被看作历史的奇迹。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两种极端矛盾的景象，一方面是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习称君主专制），一切号令发自京城中的皇宫，执行刻板划一，个人（除皇帝）、地方均无独立意志，缺乏积极性；另一方面国家行政管理实际到县衙一级，加上幅员辽阔，鞭长莫及，发展参差不齐，情况千差万别，中央对地方的有效

监控程度，虽有强有弱（大致与离中央的距离远近成反比），总体水平却远逊于欧洲君主国。这种特有的大国统治格局，产生了一系列变局："天高皇帝远"，绵绵不绝的"土皇帝"，以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自由散漫，一盘散沙"等等现象。名曰"大一统"，其实"统一"也是有限度的，往往是一国多制（长期存在的羁縻州与"朝贡国"；西南地区的土司，要到清雍正时代才改土归流），政出多门（外戚、宦官、权臣、宠妃），更突出的是，国家的政府权力系统与社区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在乡村）系统之间，保持着一种说不出却可以意会的、若即若离的游离状态……。总之，统一的坚壳，内部却包容着许多松松垮垮、多元含混的版块，"捣浆糊"式的一体化既虚假又虚弱，气候适宜，也常常会弱化为名存实亡乃至分裂割据。

第八、变与不变，是构成历史生命的阴阳两极，负阴抱阳才是历史的真谛。从"变"的意义上，"历史是古老的，又永远是新陈代谢的"。……中国古代的变易观与近代由西方传入的进化论不可同日而语，两者显示出的正是古代社会与近代质的区别。"变易"的图式是"循环的（同心）圆圈"，呈封闭型，六道轮回，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故靠自身走不出中世纪。"进化"是"基因变易"，"新旧不断起承转合"，其图式是不断上升的螺旋，呈开放型。"变易"观的特点是使人容易趋向于乐天知命、返古保守，是发达的中国农业社会和统治周密的封建帝国自足心理的真实写照。

中国历史悠久而漫长，循环发展，更替不断，我们怎样简单而完整地记住其发展的总体过程呢？这里按照本书的历史观点提供一个反映中国历史发展演进过程及其本质意义的历史口诀，供大家参考。这个口诀是：

四皇创世纪，黄帝奠国基；
八帝联禅让，姒启传世袭；
三代夏商周，嬴政称皇帝；
六朝秦汉晋，杨坚统分裂；
煌煌隋唐宋，世祖通华夷；
赫赫元明清，孙文变政体。

对中国历史有初步了解的读者，基本可以理解本历史口诀的含义。如果需要详细了解这个历史口诀所反映的历史时代、事件、人物和演进过程，您需要详细阅读本书上部（前五章）。

---

（1）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2）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2页。

（3）《吕氏春秋.离俗览.用民》。禹时有万国说，亦见于《左传》哀公七年、《墨子.非攻下》、《荀子.富国》等——原注。

（4）见《史记.周本纪》——原注。

（5）《晋书.地理志上》。按见于《春秋》经传的百有七十国，不是春秋末年存在的数目——原注。

（6）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365页。

（7）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9-14页。

**********

## 第二节　通史分期理论

详细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之前，再先研究一下历史的分期是也很有帮助的。这里，为简便起见，就从通史的历史分期说起。

通史，简而言之，就是通贯古今的历史，同时它可理解为一种写作历史典籍的体裁。作为历史典籍体裁，通史没有固定的格式，并且通史的内容也是随时代的不同，其取舍也不同。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通史。中国是一个有近1万年文明史的古国，这么长的历史，通史固然不可能一气呵成。因此，断代分期就成为编著通史的第一要事。在20世纪中国史学家编著的中国通史，版本很多。我们按照简详顺序，选择其中较著名的三种：即分别由历史学家周谷城、范文澜和白寿彝编著或主编的《中国通史》来看看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分期有何不同。

表1-1 三种《中国通史》比较

主编[著]首版年份内容详简历史分期规模

1.周谷城1939简古代、中世纪、近代全书上、下册

2.范文澜1994较详原始、奴隶、封建全书10卷，共10册

3.白寿彝1989-1999很详远古、上古、中古、近代全书12卷，共22册

就编著通史的格式和方法而言，周谷城认为，编写《中国通史》，"没有定体，也没有成法"。三部通史虽然其编著手法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是按照分期分段的方式进行叙述的。他们编写形式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对中国历史的分期上。为了弄清楚他们的分期情况，便于区别，我们暂将周谷城、范文澜和白寿彝编著或主编的《中国通史》分别称为"周式通史"、"范式通史"和"白式通史"。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分期情况。

一、周式通史分期

"周式通史"把中国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前、中世纪后、近代四个历史时期。作者认为：

《汉书.食货志》里所讲的"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颜师古注云："下户贫人无田，而耕垦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输本田主也"）。倒颇可作为封建剥削之证；豪民剥削小民达百分之百。因此古史下限，最好放在西汉末或新莽初，也即公元九年。（1）

有了这个重要的分界点，中国历史可分为四个时段：

第一段：古代。时间从西历前2000年左右至西历9年。也就是从远古到西汉末年这段时间。这个时期是中国由诸侯并立走向统一的时期。

第二段：中世纪前期。时间从西历9年至西历959年，也就是从新莽到五代末年。这个时期是封建全盛时期。

第三段：中世纪后期。时间从西历960年至1840年，也就是从北宋初年到鸦片战争开始年。这个时期是封建社会持续时期。

第四段：近代。时间从1840年到1919年，也就是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个时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

二、范式通史分期

"范式通史"是严格按照苏联"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公式来分划中国历史的。他说：

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和世界各古国民族的历史一样，遵循着社会发展的规律，存在过原始公社制度。黄炎夷三族在"禅让"制度崩溃以前，正是实行着这个制度。（2）

因此，"范式通史"对西历1840年以前的中国历史分期如下：

第一段：原始公社时期。从黄帝建国至殷商末年的西历前1046年。

第二段：奴隶社会时期。从殷商末年的西历前1046年到西周末年的西历前771年。

第三段：封建社会。从东周初年的西历前770开始，一直到清朝末期的十九世纪中叶，即西历1840年。

三、白式通史分期

"白氏通史"将中国人类文明史分为四个历史时代，即远古时代、上古时代、中古时代和近代。其历史分期基本也是按照苏联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公式，并结合中国历史的发展特点来划分中国历史的。

第一阶段：远古时代，从距今180万年前最早的中国古人类到西历前21世纪帝禹时代以前，反映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历程。

第二阶段：上古时代，从西历前21世纪夏朝立国到战国末年，共计有1800多年的历史，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发展历程。

第三阶段：中古时代，从秦朝统一中国到清朝鸦片战争（西历1840年）前，共计有2061年的历史，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

第四阶段：近代，从清朝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计有110年的历史，反映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以及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史。

以上中国历史分期是比较典型的通史分期方法。事实上，除此以外，还有很多中国历史分期法。例如，著名的思想家梁启超在其著名的《中国史叙论》中就曾将中国历史分为这样的三个时期：

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

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频竞争最烈之时代也。

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又如，台湾史家陈致平先生的《中华通史》（1996年花城版，10卷本）依照一般的习惯，以朝代为单元，将中国历史分又为上古、中古、近古和近代四个阶段。史前时代（夏以前）以及先秦史（西历前2055年至西历前221年，共计1834年），即西历前221年以前的历史作为上古史；秦汉至隋唐五代末，即从西历前221年到西历960年共计1181年时间为中古史；宋、辽、金、元、明诸朝，即从西历960年至1644年共计684年时间为近古史；终清一代，即从西历1644年到1911年共计256年的时间为近代史。

再如，王家范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历史通论》一书中，又把中国历史分成四段：第一段是部族时代，按照其基本认可的由部族时代进入封建时代的标志是"联邦式"的"中央王国"的出现的观点，部族时代应当是夏朝以前的历史，即西历前2055年以前；第二段是封建时代，即从夏朝到秦建立统一帝国之前，时间从西历前2055年到西历前221年，共计历时1834年；第三段是大一统帝国时代，显然，这个时段从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帝国一直到清帝国的"帝制结束"，时间从西历前221年到西历1911年，历时2132年；第四段是"现代化进程"或者称为"走出中世纪"，其时段自然是1912年民国创立以后的中国历史。

可见，国史的分期与断代见解诸多，不为统一。

---

（1）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一版，第30页。

（2）范文澜、陈美彪等，《中国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第23-24页。

**********

## 第三节　　政治分期理论

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学问题，由于对历史分期标准或对分期标准的认识不同，历史分期也各不相同。如中国历史上的封建时期史学界就有六种说法：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

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东汉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历史学家斯维至对"封建"一词的解释就反映了这种状况：

"封建"一词本是先秦典籍中所习见，因为它是"封土建国"的约缩语或简称，所以少知其本义所在。近代学者由于坚持马克思的五种生产方式，认为氏族社会以后必定是奴隶社会，因此他们对于封建一词往往加以"所谓"，意即它不是欧洲中世纪国家那样的封建主义社会，或者干脆地认为"封建"是秦汉的儒者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一套"外衣"，这实在是莫大的错误。我们反复研究，我国自氏族社会以后即直接进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贵族民主专政的宗法封建社会，其国家也就是宗法封建国家。这样一来，封建实在是我国古代宗法封建制国家形成的标志。（1）

不过，历史学家何新先生对之却另有不同的意见。他说：

"封建"一词，……是指周代封土建国的国土分封制度；但这种制度在秦汉以下，在中国早已废除了。东汉以后，中国实际上不存在本来意义上的"封建制"（只存在广义上的封建制，即把"封建"理解为广义的土地私有制的话）。但是在现代史学中，却发生了一个名实相悖的荒谬情况，把早已不存在封建制（即分封制）的秦汉以后中国社会，仍然称作"封建社会"；而分明存在过封建制的商周社会，却称作所谓"奴隶社会"--不承认其为"封建社会"。所以会发生这种语词混乱，是由于历史学家把西方历史模式硬套于中国头上的结果。（2）

王家范先生对"封建"一词的解释更具体。他说：

所谓"封建"，实是"天下共主"名分下的"封（邦）建（国）"制，也决非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制"（即欧洲中世纪领主庄园制形态），所跨时段最多也只能延展到秦统一之前。（3）

可见，试图通过封建概念来划分中国历史的作法显然是行不通的，中国历史分期非得另辟途径不可。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楚国学者风胡子，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历史分期方案，他把中国春秋及其以前的历史分为石兵时代、玉兵时代、铜兵时代和铁兵时代。他说：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而为宫室，死而龙藏，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藏；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

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4）

即黄帝以前为石兵时代，黄帝至夏禹以前是玉兵时代，夏禹至春秋以前是铜兵时代，春秋及其以后为铁兵时代。

风胡子按照中国社会发展的物质技术文明的主要特征来分期古代历史，这是很有开创性的最早的中国历史分期方法，对我们今天认识远古中国历史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不过，社会历史的发展永远不仅仅是由物质技术层面所构成的，它是一个在时间之轴上各种事物的复杂演进体系。所以，我们不能以偏概全。

对中国历史分期，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也有一个独到的认识。他把中国历史从治乱角度，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万国时期（也如方国，西历前256年以前）。"商、周以上，有不可考者。而据三代而言之，其时万国各有其君，而天子特为之长，王畿之外，刑赏不听命，赋税不上供，天下虽合而固未合也。王者以义正名而合之。"

第二时期是"一合一离"时期（西历前256年至西历1271年）。"汤代之夏，武代之殷，未尝一日无共主焉。及乎春秋之世，齐、晋、秦、楚各据所属之众诸侯以分裂天下；至战国而强秦、六国交相为纵横，赧王朝秦，而天下并无共主之号，岂复有所谓统哉？此一合一离之始也。汉亡，而蜀汉、魏、吴三分；晋东渡，而十六国与拓拔、高氏、宇文裂土以自帝；唐亡，而汴、晋、江南、吴越、粤、楚、闽、荆南、河东各帝制以自崇。土其土，民其民，或迹示臣属而终不相维系也，无所统也。六国离，而秦苟合以及汉；三国离，而晋乍合之，非固合也。五胡起，南北离，而隋苟合之以及唐；五代离，而宋乃合之。"

第三时期是天下共主时期（自1271年至清朝）。"至于宋亡以迄于今，则当其治也，则中国有共主；当其乱也，中国并无一隅分据之主。"（5）

王夫之的历史分期反映了中国国家的治乱状况，但也不完全如其所说至宋亡以后就天下"共主"了。实际上，元朝西部有察合台汗国、明北部有瓦剌、鞑靼、瀚海，西部有亦力把里等部落或者方国，只有

前清（1644-1796）时期无"一隅分据"。但是，元明清时期及其以后，早已分裂出去的越南、朝鲜、不丹、锡金等地再也没有回归祖国。延及共和国时代，外蒙古独立、台湾地方政权偏居。所以，这种历史分期也不能全面、正确地反映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认为：

所谓"历史"，昔人曾称之为"相起斫书"，换一句话，便只是记载着战争大事，与乎政治变迁的。……然中国的史家，从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记载过去的"百科全书"，所以他们所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

事实上，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最主要的是其国家标志的形成及其政治大势的发展过程，而非其它。缘此，中国考古学家苏秉琦从中国国家起源角度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分期方案。苏先生认为，中国国家的起源有三个发展阶段：古国、方国和帝国（详见第二章）。他认为，古国是一个高级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所以是一种原始的国家形式。中国至少在八帝时代（过去传统的说法是五帝：即黄帝、颛顼、尧、舜和禹。本书认为原来的所谓"五帝"应为"八帝"：即黄帝、少昊、颛顼、喾、挚、尧、舜和禹。详见第二章论说）颛顼以前处于古国时期。在古国基础上，发展成为更高级、更成熟、更发达的国家就是方国，中国八帝时代和夏商周三代都是方国时代。统一各方国而成为帝国，中国从秦始皇开始进入帝国时代。

按照这个理论，我们发现，中国国家政治发展可分为古国、方国和帝国三个阶段。但是，这种历史分期法虽有见地，但不全面。它主要是为了探讨中国国家发展起源而提出的一种中国国家发展理论，对后来国家发展的不同政治形式无法进行区别。因此，这个理论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政治分期理论。不过，这个理论对认识中国八帝时代、夏商周时代和秦始皇前后不同的政治形式，以及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如匈奴、突厥、鲜卑、蒙古族、满族等，从"原始部落文化-古国建立-方国形成-最终入主中原而成帝国"这个经典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很有重要意义的。

事实上，整个人类历史，可以简单的分成两段：非国家政治时期和国家政治时期。但要弄清楚这个分期，得先弄清楚"国家"和"政治"为何物?

对于"国家"形成学说，按照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国家形成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是按照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存在，并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列宁进一步指出：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6）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7）

在这些国家起源"标志"当中，按照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李学勤等中国历史学家认为，对于古希腊、罗马来说也许是适用的，但对其它更为古老的许多民族则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主张：

将国家形成的标志修正为：一是阶级或阶层的存在；二是强制性权力系统的设立 。（8）阶级、阶层或等级之类的出现是国家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的公共权力系统的设立则是国家的社会职能，是国家机构的本质特征。尽管在国家形成途径的解释上有管理论、内部冲突论、外部冲突论、融合论等诸多理论观点的不同，但作为国家形成的结果，都有阶级或阶层、等级之类社会分化的存在。所以，各古文明国家中阶层、阶级和强制性权力系统形成途径和存在形式的差异，并不影响将国家饿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9） 。（10）

由此，我们不难认识到，在阶级和公共权力存在的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借助于国家机器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镇压他们的反抗，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巩固自己建立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是统治阶级行使国家权力的工具。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当一个人类集体，如一个部落或者一个氏族或者一个城邦等，只要其国家机器产生时，国家及其政治也就实际已经跟着产生了。

孟子曾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11） 这种国家政治观念比现代西方的国家三要素（领土、居民和主权）差去不远，但两者时间却相差了两千多年。一般地说，中国国家政治观念是"早熟"。可是，这种"早熟"必然有它的社会根源。孟子的"政事"实际是社会公共权力的体现。2000多年后，中国政党政治的首创者孙中山，对国家公共权力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将"政治"一词解释为：

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就可以说是政府权。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12）

孙中山把国家政治的统治权力明确地分为两个力量：即政权力量和治权力量。事实上，这两个力量可以作为我们判断中国远古人群社会国家形成的依据。即，在人类历上，当一个人类集体，如一个部落

或者一个氏族或者一个城邦等，只要其政治权力产生之时，政治也就跟着产生了。有了政治，自然也就有了国家。

由此我们可以推得：我们的所谓历史，就是事物的创生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国家历史就是国家的创生和发展变化的过程，政治历史就是政治的创生和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国历史就是中国国家的创生和发展变化的过程。所以，历史学家钱穆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史讲的是中国人的本原和来历。"并说："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

依此历史概念及其分期划分原则，中国历史同世界历史一样，在人类创生和发展过程中，首先存在非国家政治和国家政治两个时期。在远古国家初创时代，那时的人们，虽不能像我们一样，把他们的创造称为"国家"或者"政治"，但是这种事物确实已经存在了，并且在不断发生作用，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

那么，中国历史进入国家政治时代是什么时候呢？我们以为，举世公认的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黄帝--所处的时代应当是两个时期的分界点（按照苏秉琦国家起源理论，中国部分地区发展到政治实体的古国时，可能还在黄帝以前）。中国国家政治时期当以黄帝以武力建立统治地位，并建立管理机构以监视天下和建立"封堠"划界制度 、（13） "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 （14）以分区治民为始。黄帝以前为非国家政治时代--即真正意义的原始社会时代。

中国进入国家政治时代以后，政治形态是如何发展的呢？萧公权说："吾国政制自商周以来，凡经三变。商周之际，部落社会渐进而成封建天下，此为一变。始皇并吞六国，划天下为郡县，定君主专制之制，此为二变。晚清失败，民国开基，二千年之君制遂告终止，此为三变。段落分明，早为人所共喻。吾人若按此政治制度史之段落以划分政治思想史之时期，诚极自然之事。"（15） 其所谓部落社会以及由部落社会向封建天下之一变，虽不确切。但其后两变却是精妙至论。

事实上，按照国家政治形态的不同，中国历史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即禅让政治时期、世袭政治时期和政党政治时期。加上非国家政治的原始社会时代，整个中国历史，应当分为四个有着

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即原始社会时期、禅让政治时期、世袭政治时期和政党政治时期。这四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全部发展过程。前一个阶段，反映中国人的"本原"，后三个阶段反映中国人及其所创立的国家的演变情况，即"来历"。

一、　原始社会时期

该时期从距今200万年前中国最早的古人类到黄帝以前，反映了中国从远古人类经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走向中国人类文明时代的发展历程。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表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反映了一个从自组织形式发展到被组织形式的过程。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从无序社会进入了有序社会，其组织体系就是一个被组织系统。这个过程在人类历史上在不同地区或局部不断得到重演。

二、禅让政治时期

该时期是从黄帝至禹的八帝时代。即西历前4497年（具体年份推导见第2章）到西历前2056年，历时2442年。成书于西历前260年前后（战国时期）的《商君书.开塞》说："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1975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商君书评注》说："上世，即'上古'，大体指母系社会至父系社会的过渡，大约包括伏羲氏、神农氏至黄帝以前这一时期。""中世，即'中古'，大体指黄帝至尧、舜、禹。""下世，即'近古'，大体指夏、商、周三个朝代。"《荀子.大略》中说："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可见，古人对黄帝到帝禹这段时间的历史是有特别认识的，不是简单地认为是原始社会末期，而是作为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看待的。八帝时期历时长达2442年，在中国人文历史特别是国家政治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黄帝开创的国家应是中国许多方国之一，其活动地域范围包括："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16）"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舆，造器械，斯乃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也。"（17）与其同时，在中国东南、华北、西南等地同样有若干原始部族、古国或者方国。但由于黄帝所建立的国家在当时最具影响，其文化最发达，力量最强大，其占据的地理位置最为广大和优越，周边民族都出于华夏近族，所以黄帝开创的文化在与其它古国或者方国的交往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文化，黄帝所建立的轩辕国也成为最主要的代表性国家。

三、世袭政治时期

该时期从夏朝初年即西历前2055年至清末1911年，共计3966年。这个时期在中国国家政治历史上历时最长。由于这个时期是世袭政治，虽然其间不乏强盛的朝代，但其世袭利益始终与大众利益是有冲突的，因此，不管是谁取得统治地位终究逃不脱灭亡的命运。在循环往复的世袭统一与分裂之中，中国历史又可分为四个不同特点的发展阶段：即夏商周时代（西历前2055年-西历前221年）、秦汉晋时代（西历前221年-西历581年）、隋唐宋时代（西历581-1271年）和元明清时代（西历1271-西历1911年）。

注意，我们说"夏商周时代"不是仅仅指夏、商、周三个朝代，而是指以这三个大一统朝代为代表、最终结束于分裂的一个历史循环期。因此，"夏商周时代"时间从夏启建立夏朝开始一直到战国结束，其所反映的历史时间永远大于三个大一统朝代的时间。其他秦汉晋时代、隋唐宋时代和元明清时代同义。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通常认为夏、商、周三国是三个统一朝代，实际上，按照苏秉琦先生的理论，把他们看作是三个在"五服"制度下影响万国的大方国，更为合适。这一点，夏、商、周三朝代与后来的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九朝代稍有不同。不过，夏商周时代的政治构架--即宗藩政治体系--和后三个时代是一样的。就像汉学家费正清说的那样："中国很早就有强烈的历史感与政治大一统的理念。""中国建立并接受大一统国家的传统便可以上溯到极古的时代。" （18）夏启即位后，服有扈等国；后相征淮夷、风夷、黄夷等，"于夷来宾"；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后芒即位，"九夷来御" （19）；商灭桀夏，"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20），"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 （21）；周灭商纣，"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 （22），"浦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3）。从"服国"到"封国"，夏商周时代确实是形成中国特有的政治形态--宗藩政治体系--的重要时代。另外，前九个朝代，"称为秦为汉者，盖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所封之爵邑"（元世祖忽必烈建国大元诏），从元开始，以文义为国号：元，取《易经》中"大哉乾元"文义；明，承接"小明王"韩林儿建号"大明"；清，取满洲起于东方而东方为青（转音清）色之意（一说清为"金"之谐音）。这一点元明清三代又与前九代不同。

在中国世袭政治时期，最基本的政治制度就是宗藩政治体系，这种体系"既不是纯粹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不是平等的国家间关系，而是一种特殊的国家体系--宗主与藩属的关系" （24）。这种体系在八帝时代末期已开始形成，《左传》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至帛者万国。"夏启立国时，也曾大会诸侯于三峰山之钧台（今河南省禹州市）。到夏商周时代，这种体系逐步形成一种基本的贯穿于整个中国世袭政治时期的政治构架。

中国世袭政治以及宗藩政治体系，在夏商周时代是初创阶段，其政治构架以"国王+世卿政制+（分封国+臣属国）"的形式出现的（所谓世卿政制应是指起于夏崩于战国的由世族贵族协助国王统治国家的政治形式），"夏传子，家天下"制度的建立和利于世袭统治的周礼制度的产生，保证了这种世袭及宗藩政治体系的延续（尽管夏、商、周三国不是连续承接，而是方国迭代）；中国世袭政治以及宗藩政治体系，在秦汉晋时代是完善时期，从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朝廷体系开始，世袭政治体系已经实现了集权化和系统化，其政治构架演变成为"皇帝+三公政制+（郡县+藩属国）"宗藩政治体系（三公政制是指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三权政治形式）；中国世袭政治以及宗藩政治体系，在隋唐宋时代是全盛时期，隋文帝在前一时代的政治结构基础上，建立了著名的三省（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六部（吏、礼、兵、刑、民、工）政治制度，为后世所承袭，使世袭政治在中央政权统治结构上更趋完善，进入成熟、全盛时期，其政治构架演变成为"皇帝+三省六部政制+（郡县+藩属国）"宗藩政治体系；中国世袭政治以及宗藩政治体系，在元明清时代是极衰时期，其政治构架演变成为"皇帝+三省六部政制+（行省+藩属国）"宗藩政治体系，元、明、清三朝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具有巨大影响的朝代，它们在遵循中国世袭政治政权循环发展规律的同时，把中国世袭政治政权如同它的疆域一样，推向了极端，随后迅速衰亡。

这里的宗藩政治体系是古代中国 "中央王国""家天下"的政治制度体系，宗主国为中央王国，负责封敕和管理藩属国；藩属国为贡卫国，负责边疆安全和供奉中央王国。我们很多史家不能明了这个实质，写出来的中国历史往往都是继"宗"而略"藩"，这显然是不足的。无怪乎我们总叹，中国史学二千年以来，司马迁之史学也。就"宗藩并举"这个层面看，二千年来确实唯司马迁也。

宗藩政治体系在一些地方被称为"东亚封贡体系"。正如有人指出的，"东亚封贡体系是东亚社会的国际关系体系，这一体系中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封'，即宗主国给外藩赐以封号，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一政治封号，对周边小国极其重要，得不到宗主国的承认，就不可能成为正统；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贡'，即由小国给宗主国进贡，

由于宗主国往往数十倍地回赠进贡国，所以小国对进贡是乐此不疲的。这种纳贡虽有贸易的成分但不是主要。"（25）

为什么说世袭政治到了元明清时代是极衰时期呢？元朝把中国的疆域扩大到极大：东入太平洋、南尽南海跨中南半岛、西抵欧洲、北及北冰洋，尽管后面的明清（指前清）两朝地域仍然广大、尽管明朝的航海力量世界第一、尽管西方列强来到中国时的清朝的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一、……，但是，由于政治智慧的限制，元朝很快退缩到中国传统地理范围之内。从此，元、明、清局限在这个地域之内，国家开始在"夜郎自大"中更加封闭而保守，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次数最多、工程量最大、质量最高的朝代，从明朝开始取消了丞相制度，开始了特务政治（明朝设东厂、西厂、内厂和锦衣卫）和"廷杖"制度，清朝设立大权独揽的"军机处"和密折制度，国家在内部施行高压统治，对外则搞闭关自守。最终，中国从世界的顶极强国，仅仅经过半个世纪（1796-1840）的时间便迅速跌落成为西方的半殖民地。这就叫极衰变易。

中国世袭时代的四个历史期，不但反映了中国政治历史的递进发展模式--不同的宗藩政治体系结构，而且也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基础特征--不同宗藩政治体系下的农业模式（农业始终是中国历史经济的主体）。在夏商周时代，有影响的农业模式是公田私田制--井田制；在秦汉晋时代，主要的农业模式是国家土地制--领主土地制；在隋唐宋时代，重要的农业模式是均田制--地主庄园制；在元明清时代，农业模式是官田制--私田制--私有制。虽然各时代各种农业模式的时段，不尽完全吻合，但大抵如此。这里主要不是分析经济问题，所以，各个时代的农业模式的具体含义不待细说。需要提示的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每个时代的前期，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土地，越到后期，土地实际控制权越分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展规律。

在中国世袭政治时代的四个历史时期，除了有不同的宗藩政治体系结构和不同的经济基础特征外，还有不同的社会关系深层结构，即血缘亲族关系：在夏商周时代，这个结构是姓族宗法组织；在秦汉晋时代，则是宗族组织；到隋唐宋时代，这个结构演变成为姓氏亲族组织；到元明清时代以至于今，则是乡村家族组织。（26） 这恐怕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社会组织演化特征。

四、政党政治时期

该时期从西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西历2003年。作为中国历史的延续，中国政党政治紧接世袭政治清朝的末年，在初期（1912年-1928年），国家由于未能建立系统的、公正的、合理的、真正法制的现代政党政治体制，国家陷入了军阀统治；1928年后，蒋氏南京政权恢复了政党政治，但其实质是借政党之名，行专制之实，国家再次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内忧，由于专制而不能实现政治统一；外患，国弱而遭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最终，在1949年被中国共产党以武力这个极端政治方式所推翻。可见，虽然现在中国实行着世界通行的政党政治，比之世袭政治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是，它是很不成功的。直至今天，我们的国家虽然取得独立，但台湾仍然分裂于外、外蒙古等仍然分裂出中国而成为独立国家、日本还非法占据着琉球群岛、三北地区（东北、漠北和西北）俄罗斯侵占去的总计17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仍然未能回归祖国。所以，中国人包括全世界的中华民族，今后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任务还相当艰巨。

回顾历史，历史学家钱穆在西历20世纪50年代初曾对中国现代政党政治有极重要的论述。他说：

中国近代政治潮流，依然只侧重在革命与组党两条路。组党为的是要革命，革命后仍还只重在组党。党是一种力量，可以用来革命。党又是一种力量，可以用来把握革命后所取得的政权。所以有了这一党，便不许有那一党。那一党之争取出路，依然有待于再革命。而中国近代政党的组成，显然不是由社会下层的真正民众，而仍是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在活动、在主持。他们只想把民众投归党，没有想把党来回向民众，于是变成了由党来革民众的命。这样的组党革命，将永不会有成功之前途。

将来中国政治若有出路，我敢断言，决不仅就在活动上，决不仅是革命与组党上，也决不仅是在抄袭外国一套现成方式上，而必须触及政治的本质，必须有像孙中山式的为自己而创设的一套政治理想与政治意见出现。纵使这些意见与理想，并不必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也仍还有留待国人继续研求与实行实验之价值。这是我穷究了中国二千年传统政治所得的结论。（27）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政党政治已随世事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钱穆先生的话仍然值得我们去仔细回味和思索。作为中国民众一员，我们总是和重新站起来的整个中华民族一起，在呼唤着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一个比黄帝、夏启、秦始皇、隋文帝、忽必烈、孙中山等中国六大历史巨人（详见第4章）所开创的更加伟大的时代的到来，一个东方龙腾世纪的再次复兴。**

尽管中国现代政党政治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中国历史在每次社会政治形式的变迁中，反映出了中国文明的不断进步。中国原始人类在原始社会时代，完成了从单体生存到群居时代的演变；在禅让政治时代，中国人又完成了从自然群居向能进行自我控制的组织社会的过渡；在世袭政治时代，中国人又完成了多民族生存空间的构造，建立了一个稳定的钺钟历史地理生活单元和丰厚的"三位一体"文化体系（详见第2-3章）；到今天的政党政治时代，中国人又在告别旧时代，在改造自身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未来文明。

就国家政治而言，中国历史或者中华文明的主要部分在世袭政治时代，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观点，中国长期的世袭政治形式不能被视为是成功的政治形式。但是，作为世界四大独立文明发展区域中心的一个，中国文明依据东亚大陆的独特地理特点，在世界上首先创造了世界最先进的文明。所以，中国文明发展历史相对于世界历史而言，如果在夏商周时代及其以前，世界还处于独立发展时期的话，那么到秦汉晋时代至隋唐宋时代，中国文明则是影响世界的最先进文明。自中国文明在通过北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北：中国西域--中亚--欧洲；南：中国西南--中南半岛--印度；海上：中国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大规模传入西方后，西方才得到持续的发展。

虽然，西历19世纪以来的中国在优势文明的骄傲和自大中，逐步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虽然，到前清末年，中华文明开始从世界最先进文明的顶端跌落下来；虽然，中国在后清时代（1796-1911）和现代（1912-2003）被西方文明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但是，我们要有信心：中国必将在中国政治的伟大创新中获得成功；中华文明必将在中国政党政治时代的不断努力中获得复兴。

（1）白寿彝，《中国通史》，第3卷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第1549页。

（2）何新，《危机与反思》，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上册，1997年版，第85页。

（3）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1-2页。

（4）《越绝书.外传记宝剑》。

（5）以上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一》。

（6） 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七版，第7页。

（7） 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七版，第8页。

（8）王震中，《文明与国家——东夷民族的文明起源》，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原注。

（9）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原注。

（10）李学勤 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11）《孟子.尽心》。

（12）孙中山，《民权与国族-孙中山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页。

（13）参见王子今，《史记的文化发掘》，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

（14）《汉书.卷28.地理志上》。

（1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10页。

（16）《史记.五帝本纪》。

（17）班固，《东都赋》。

（18）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22、33页。

（19）参见古本《竹书纪年》。

（20）《诗.商颂.殷武》。

（21）《诗.商颂.玄鸟》。

（22）《诗.周颂.般》。

（23）《诗.小雅.北山》。

（24）何茂春，《中国外交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0页。

（25）朱宁等，《变乱中的文明——霸权终结与秩序重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129-130页。

（26）参见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103-104、150、219页。

（27）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一版，第118-119页。

**********

## 第四节　世界史分期理论

研究中国史不能不涉及世界史，研究世界史不能没有中国史。这已经成为史界共识。

在整个人类发展历史长河中，中国史和世界史是相通的，正如美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摩尔根所说："人类历史的起源相同，经验相同，进步相同。"但是，世界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研究，特别是世界史的分期往往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能相与同一。苏联世界史学家将人类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个阶段；摩尔根将世界史分为蒙昧社会、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三个阶段；英国世界史学家汤因比则认为世界上各大文明的发展都要经过四个连续阶段：经过混乱后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帝国阶段、间歇阶段、建立大一统的教会阶段和"蛮族"大迁移阶段；美国世界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则简单地以西历1500年为分界线，将世界史分为1500年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的世界；美国社会学家托夫勒将世界文明史分为第一浪潮（农业革命）、第二浪潮（工业革命）和第三浪潮（有多种称谓，如科技革命、信息时代、电子时代、超工业社会等等）等三个时期 (1)；在中国的世界史教科书中，通常又以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和现代史四个阶段来叙述世界史。显然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分期标准，因而也就存在不同的分期理论。

事实上，通过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就可以看到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这种发展趋势都具有其内在逻辑的连续性特点。通过我们的思考和对比分析，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类自身活动的直接反映，各个社会文明不但在起源、经验和进步方面相同，而且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上（指在具体的持续时间上）也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自人类社会进入相互影响的时代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有了共时性，不同的只是各个国家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如不同的国家形式、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的宗教信仰等等。

鉴于世界历史发展具有上列特点，我们可将世界历史分为六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原始社会阶段（200万年前-西历前46世纪）；

二、国家初创阶段（西历前46世纪-西历前21世纪中叶）；

三、独立发展阶段（西历前21世纪中叶-西历前3世纪）；

四、东方世界及其影响阶段（西历前3世纪-西历13世纪下半叶）；

五、东方强大西方发展阶段（西历13世纪下半叶-18世纪末）；

六、西方世界及其影响阶段（西历19世纪-21世纪中叶）。

这个分期方法，使处于每个阶段末期的四大文明区域所发生的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的时间基本趋于一致。与中国历史的分段点时间相比，除个别时间超过50年外，其余大部分分段点的时间差均在30年以内，有的仅差几年，有的甚至完全吻合。详见附表1-2"世界四大主体文明及其相互影响"。以东西方比较，其基本发展历程如图1-1所示，历史发展虽不是如图所示的直线模式，但她给我们一个明显不同的东西方历史发展形态。著名历史学家张光直先生在一篇名曰"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文章中说，"对中国、马雅和苏米文明的一个初步的比较研究显示出来，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一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我将中国的形态叫做'连续性'的形态，而将西方的叫做'破裂性'的形态。" (2)只有连续性的中国历史发展形态能够证明世界历史的真实进程。

凡历史都是立体发展的。人类世界史的平面是地球陆海表面，世界史的空间就是地球表面各大文明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延伸。历史的主体自然就是各区域文明及其所包含的各民族和国家。因此，这里提出的世界四大文明区域及其所包含的各民族和国家，在六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演化和相互影响关系，应被视为是人类全球历史的一个合理构架。

图1-1　东西方发展的基本轨迹

在人类的原始社会阶段，人类没有产生政治文明形态，处于自然的群居或者部落氏族时代，可以作为人类的（政治）史前社会时代。

在世界历史的国家初创阶段，人类完成了政治文明的开创建设。中国文明进入万世称颂的八帝时代（黄帝族、太昊族、颛顼族、帝喾

族、帝挚族、帝尧族、帝舜族和帝禹）。

在世界各文明的独立发展阶段，其社会发展是在没有外力作用下进行的。国家政治形式逐步走向成熟和繁荣。在这个阶段，只有一个例外：由于地域非常接近的原因，西亚的波斯帝国（前550-前330）与西方文明前身（环地中海）埃及、希腊、马其顿等古国发生了冲突。不过，尽管其冲突的时间较长，由于两种地域文化所具有的不相容性，使它们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影响到它们自身以及其它文明的独立发展特性。

在东方世界及其影响阶段，是中国文明占世界支配地位的时代。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经历了秦汉晋和隋唐宋两个著名时代。这个时代，秦、汉、晋、隋、唐、宋等均是世界最强大的帝国，它们对世界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而中国文明依靠这些强大帝国的辐射力量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而且影响到了世界发展的格局。这个时代，在东方形成的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圈，是世界文明史的当然中心。东方，通过朝鲜半岛，渐次催生了日本国家文明；南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促进了东南亚文化的发展和与印度文明的沟通和往来；西面，通过北方丝绸之路，连接了东方与西方的两大文明（西历前1世纪，中国的绫绮已经流行于埃及社会）。我们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明扩散的主动性和其巨大影响力。在科学技术上，以前四大发明"铜器、陶器、丝绸和木器"（历史学家钱穆认为）和后四大发明"纸、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为代表的中国技术文明，不断推动着世界向先进文明迈进。

不过，中国先进文明对世界的影响不是像19世纪真正强大起来的西方文明那样，直接依靠国家武力形式对他域文明进行直接殖民、占领和奴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是通过中国东北、西北和东南的民族迁移来实现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在北方先后有许多少数民族如匈奴、突厥、回族、蒙古等等，这些民族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很自然，他们的文化也永远先进于世界其他地域的文明。这些边族区域在遭到巨大自然灾害或者在干扰中原过程中遭到沉重打击的时候，这些边域少数民族往往通过迁移来取得更好的生活环境。有的内移，有的外迁。在西迁过程中，外移的少数民族不可避免地与他域陆地文明发生冲突，结果是，我们的少

数民族凭借先进的技术文明在新开辟的地区立国而治；在南迁过程中，中华民族先民，随太平洋西岸逐岛南移，逐渐遍及东南亚和今天大洋洲的各个岛屿；在东迁过程中，中华先民通过东北亚大陆和海岛，逐步东迁进入北美，最后遍及整个美洲（现在有考古学家已证实，云南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人类发展、演化的重要地区之一，"元谋"等古人类北上金沙江，抵今甘肃和青海地区而为古羌戎人，其往东过东北亚，越白令海峡进入今北美部分则成为印地安人的祖先）。

在民族西迁过程中，在南亚，中国敦煌祁连一带的大月氏建立了贵霜帝国（西历1-3世纪）、匈奴族与大月氏族裔建立了口厌 哒帝国（西历6-7世纪初）、突厥族建立了迦色尼王朝（1027-1206）、蒙古族裔建立了帖木儿帝国（1366-1500）、莫卧儿帝国（1526-1857）；在中西亚，猃狁西迁建立罽宾国（汉代时期）、源自中国西部的中亚民族建立了安息帝国（西历前247-西历226年）、花剌子模（1077-1231）、突厥族裔建立了塞尔柱帝国（1055-1299）、奥斯曼帝国（1282-1922）、蒙古族建立了伊尔汗国（1258-1500）、金帐汗国（1240-1480）等等。中国南面，中华先民及其后裔，先后在东南亚，建立岛国文明；在太平洋和澳洲建立土著文明。在中国的东面，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洲古代文明与中国文明的亲缘性。有学者通过对汉语与玛雅语的共同词汇研究得出结论，(3)中华先民在中国5000年前（时处于中国八帝时代）就已经通过琉球、日本、千岛群岛、阿留申群岛以及美洲西岸一线进入美洲。中华先民及其后裔便在美洲先后建立了辉煌的玛雅文明（西历前11世纪-15世纪）、阿兹特克文明（西历前1世纪-1521）和印加文明（西历前2世纪-1535）。

可见，伟大的中国文明，通过东、南、西三个方向影响着世界。其中，中国北方少数民族西移，影响西方世界从西历前2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16世纪。当然，在西面，中国通过通使和文化交流而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如西历前119年，西汉张骞首通西亚，与先期移居此地的大月氏、安息等中华族裔国家建立广泛的联系，沟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建立起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大陆桥"，为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提供了来自东方的动力源泉。不过，中国对西方发展的影响，主要还是以民族的大规模迁移并夹杂着先进文明因素的方式影响西方的。

然而，中华民族向南、向东迁移的民族，虽然也在当地（如大洋洲和美洲）落地生根，并建立了当时辉煌的文明，但由于后来与中华母体文明失去了必要的持续联系，若干个世纪后，当西方探险者"发现"他们时，他们不但落后于西方，也大大落后于东方的母体文明了。自然他们就成为西方猎取和掠夺的对象。在西方血腥殖民政策之下，美洲和大洋洲的土著居民，甚至没有了立锥之地，他们被西方作为劣等人种而屠杀殆尽。只有东南亚、西亚、中亚还活跃着中华先民的后人。

对中国先进文明的西迁、南移和东进所产生的世界性影响，是任何世界史所不可忽略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美洲文明被西方的屠刀割断而被忽略，东南亚及大洋洲文明也被西方占领而被忽视。所以，比较详尽的"白氏通史"只比较深入地注意到了中国先进文明西迁影响的重要历史意义：

在近代以前，游牧民族的迁徙对于农耕地区民族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广大地区的政治局面。中国北部的游牧民族和中原以南的农耕地区的关系就往往影响到民族的迁徙。从历史上看，规模大影响大的迁徙有三次。战国、秦、汉时期，中国北方最主要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经过两汉时期汉与匈奴的搏斗与和解，公元一世纪末，南匈奴内附于汉，北匈奴败逃。约公元二世纪中叶，北匈奴逾葱岭西去。至四世纪，他们到达欧洲，引起了日尔曼各族的大迁徙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这是第一次。南北朝后期、隋、唐时期，中国北方最主要的游牧民族是突厥人，经过隋、唐两朝与突厥的反复争战，公元八世纪中叶，突厥汗国最终灭亡，很多突厥人内附于唐，也有许多突厥人分布于葱岭以西、中亚一带。公元十一世纪，居于阿姆河流域的塞尔柱土耳其人向西移动，征服伊朗、两河流域、叙利亚直至小亚细亚。这是第二次。公元十三世纪初，金与南宋、西夏处于对峙局面，北面蒙古兴起。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蒙古人征服了欧亚广大地区，形成了空前庞大的帝国。这是第三次。匈奴人在西方建立的帝国、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和蒙古帝国，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是很大的。(4)

不管怎么说，中国在秦汉晋时代和隋唐宋时代对世界的影响是不可抹灭的。我们从20世纪西方人眼里，也可以感受到那时中国文明光

耀世界的明确影响。世界最有声望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说：

自中唐到宋末（8-13世纪）期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物质上的进步可自一系列惊人的发明知其端倪：印刷的书本、算盘、钞票和信用票据、火药、水泵、运河船闸、不漏水的船舱，以及航海罗盘，更不用说较早时期发明的陶瓷器、漆器、丝绵织物，以及像宋代绘画之类的艺术品了。这些都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社会在其历史兴盛时期的产品，远比欧洲先进。宋代的城市文化反映出农业、工艺、商业和技术方面的进步，并且在哲学和施政方法方面也有与之相应的进展。最重要的事实是兴起了国内外的私人贸易，这确实是一场"商业革命"，使南宋政府更加依赖于贸易税收。(5)

东方强大西方发展阶段（13-18世纪），是东西方文明强弱变换的时代，持续了5个世纪。在这个阶段，中国历史处于强大的元、明和前清（即1644-1796年间的清朝）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国仍然处于世界的最强国地位。这个时期，世界上有两大政治体系：一是中国宗藩政治体系，一是罗马基督教国家体系。这两种政治体系相互发生影响，相互传播文化。不过，中国传入欧洲的是成百上千的实用技术，而欧洲则试图利用其传教士来影响中国的政治体系。前者促进了欧洲的现代革命和社会的蓬勃发展，而后者，西方传教士则彻底失败了，它们被正处于强势文明之中的中国文化所融化。相反，通过他们大量介绍中国文化先进性和特殊性的信笺和专著，深深地影响了整个欧洲。也因为如此，在19世纪，这些在西方人看来是彻底失败的"高尚"的西方传教士的"后裔"，大多数像西方商人在中国的贸易失败以后变成掠夺财富的盗贼一样逐步变成了西方国家军事殖民者的可耻的间谍。

不过，现代西方人，对19世纪前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和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还是没有忘记。英国学者坦普尔在"中国的创造力量"一文中说：

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是中国和西方种种成分的独特综合而成的。"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本创造发明和发现可能有多一半来自中国。

为工业革命打下基础的欧洲农业革命，只是输入中国的思想和发明以后才开始的。作物行播，精心除草，"现代"播种机，铁犁，翻土

犁壁以及高效的马具都是从中国传入的。……确实，直到两个世纪以前，与中国比较，西方在农业上是如此落后，可以说与中国的发展世界相比，西方乃是未发展世界。(6)

美国学者卡特在其《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中同样指出：

欧洲文艺复兴初期四种伟大发明的传入流播，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曾起重大的作用。造纸和印刷术，替宗教改革开了先路，并使推广民众教育成为可能，火药的发明，消除了封建制度，创立了国民军制。指南针的发明，导致发现美洲，因而使全世界、而不再是欧洲成为历史的舞台。这四种以及其它的发明，中国人都居重要的地位。(7)

英国中英通商史专家格登堡也指出(8)：

自16世纪至19世纪，在将近300年的中西交往中，最显著的事实是西方人希求东方的货物，而又提不出多少商品来交换。在机器生产时代之前，在技术上的优势使西方能够把世界变成一个单一经济之前，在大多数工业技艺方面比较先进的还是东方。

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其《四海之内》一书中也认为 (9)：

现代科学在欧洲是从伽利略时代开始的，但是，对于科学本身，对于产生科学革命的科学基础，却是一切国家和一切人民都有贡献的，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中国。

充满霸权逻辑的《大棋局》作者、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布热津斯基也不得不承认：

**到约公元1600年以前，中国一直在农业生产率、工业发明和生活水平方面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美国发表独立宣言之时，它已经拥有两亿多人口，而且还是世界上主要的制造业大国。（《大棋局.第6章》）(10)**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也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文明影响着欧洲而非相反：首先是丝绸，接着是造纸术和印刷术，以及瓷器、弩机、铸铁、河闸、手推车、船舵、罗盘、火药等等都是从中国传入欧洲的。与物质技术相媲美的，是中国的官僚统治制度，包括稽查诠核制度。简言之，欧洲人的扩张做法，不仅反映了他们的贪婪、好奇、热情和爱国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他们的落后。(11)

中国著名学者文怀沙先生曾说：在世界古代史上，中国数千年一直处于世界文明的前列，对此，现代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曾赞叹不已："在古代缺乏近代科技手段和逻辑系统的条件下，中国竟将人类几乎所有的发明发现都令人惊奇地做出来了！"(12) 当代英国科技史家坦普尔亦始终认为，全球发明有半数源自中国(13) 。(14)

在18世纪，西方著名的重农学派（中国历来是农业立国）经济学家魁奈在写出他那当时被称为欧洲"崇尚中国运动的顶峰之作"--《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以后，西方另一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写出了伟大的《论法的精神》，他在书中对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从此，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渐次完成，中国这个昔日被欧洲人誉为"智慧大熔炉"的"乌托邦"开始漫漫破灭，楷模逐渐消失，欧洲的"中国风"也渐渐停息了，直到亚当.斯密写出鼎定现代政治经济学基础的《国富论》，并明确指出中国早已经处于停滞状态以后，在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欧洲中心论开始膨胀发展，东西方强弱转换时刻终于来临了。

的确，中国就是在这种优越的强势文明之中走向衰落的。

在东西方的强弱变换中，当帝国统治者还在为其虚弱的外强中干感到自豪时，西方世界在虚心学习了中国先进文明几个世纪以后，已经认识到东方庞大的帝国结构已经变成了一具内腐不堪的政治空壳。

1793年，乘着世界上最先进的舰船来到中国的英国使臣马嘎尔尼称这个停滞的帝国为"一艘破烂不堪的旧船。"这时的西方依靠在非洲、美洲以及中国放弃的亚洲地区的掠夺所积累起来的财富，以及在掠夺中创造出来的比中国更为先进的技术文明，完成了对逝去时代的世界中心--中华帝国--的包围，和逐步完成了对世界其它落后地区的征服（西历16-18世纪）。在中国北方，俄罗斯逐步占据了中国蒙古高原北缘--贝加尔湖--外兴安岭--太平洋一线以北的所有地区；在中国西部，俄罗斯和英国殖民者把其势力发展到了中国边境；在中国南面，葡、荷、法、英等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南海侵扰，并在南部大陆边缘的中国土地上建立殖民据点。西方在逐步完成对中国的"包围"之时，他们利用他们的血腥的种族灭绝政策，霸占了美洲大陆（16世纪上半叶，南美智利和秘鲁当地有居民150万人，50年后，只剩下30万人了。西班牙人自己统计，16世纪中叶他们每年杀害1200-1600万美洲印第安人。非洲人在17-18世纪占世界人口的1/5，到20世纪初只占1/13，在西方近400年的长期屠杀和毁灭中，非洲损失了6000万人）。他们消灭了土著，成了别人土地上的"主人"。总之，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停滞不前和退缩与西方的豪强霸道和进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世界历史发展到18世纪末的时候，对西方文明的进展虽有警觉但仍以闭关锁国处之的中国，已经注定了其未来深重灾难的命运--一个持续了200余年的任人宰割的命运。

诚如人们所反复总结的，在西历17-18世纪正是中国的"康乾盛世"，"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以致英国迟迟不能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然而，正是在同一个时间，在地球的另一端，尤其是在英国，一种新的文明--挑战全球的工业文明正在萌发；一场伟大的革命--最终改造了整个旧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一个新的运动--冲决中世纪封建神学桎梏束缚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在蓬勃发展。由此以后仅100多年的历史，就彻底地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中国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地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

我们从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著名的《大国的兴衰》中提供的1750-1900年间制造业产量在世界(100)的相对份额 (15)（见表1-

3）也能看出中国的由盛转衰的轨迹。

表1-3 1750-1900年间中国制造业产量在世界上的相对份额

| 西历 | 中国 | 欧洲 | 美国 | 日本 | 其它 | 世界 |
|---|---|---|---|---|---|---|
| 1750 | 32.8 | 23.2 | 0.1 | 3.8 | 40.1 | 100 |
| 1800 | 33.3 | 28.1 | 0.8 | 3.5 | 34.3 | 100 |
| 1830 | 29.8 | 34.2 | 2.4 | 2.8 | 30.8 | 100 |
| 1860 | 19.7 | 53.2 | 7.2 | 2.6 | 17.3 | 100 |
| 1880 | 12.5 | 61.5 | 14.7 | 2.4 | 8.9 | 100 |
| 1900 | 6.2 | 62.0 | 23.6 | 2.4 | 5.8 | 100 |

中国为什么从一个世界强国忽然之间，急剧地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呢？现代中国人终于找出了答案:"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康雍乾三代英明君主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当欧美国家纷纷走上实行民主政体的道路，消除专制制度的时候，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却在一步步收紧权力之网上的纲绳，把封建皇权推上空前集权的巅峰。这种体制避免了历代王朝经常发生的宰相、外戚、宦官擅权和武将跋扈、文官植党以及士人非政的现象，但更加缺少约束和监督机制。官吏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化，贿赂行私层出不穷，最终不仅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而且严重阻滞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之路。加以国际大势剧变，中华民族已濒于西方列强宰割的绝境。"(16)清朝著名理学家蔡新对强大的清帝国的败落也作了最好的注释。

他说：

天下之乱也，不于其乱尔生于极治之时。何也？开国之始，国势方兴，人心未固。君若臣早夜孜孜，无非为天下谋治安，为子孙措磐石。其精神之所周贯，天人实系赖之。履泰以后，上恬下熙，渐忘其旧。君以声色逸游为无害民生，臣以持禄养交为安享暇豫。进谏者，谓之沽直；远虑者，谓之狂愚。其上下之精神谋画，莫不狃目前之安而图一己之利。夫图一己之利者，未有不贻天下之害者也；狃目前之安者，未有不来日后之悔者也。(17)

对中国逝去的往日辉煌的回忆，很多人都引用到了马克思那一段著名的总结性语言：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18)

世界历史从18世纪末开始到21世纪初的200多年时间里，是世界历史的最近阶段，即离我们最近的阶段--西方世界及其影响阶段，这个阶段还将依据历史发展的惯性，延续一段时间，至少会持续到21世纪中叶。在这个阶段，西方依靠其绝对的武力、财力和技术优势，侵挠着整个世界。曾经是西方文明之源的埃及成为西方掠取的对象；西亚已不被西方看作是一个文明的存在，而是检测西方能力的实验场；南亚，被英国殖民者统治了150多年，其本土文明丧失殆尽；美洲特别是北美，以及澳洲，西方实施了血腥的种族灭绝政策，消灭土著，占据领土；非洲早已成为西方掠取奴隶和矿产资源的主要场所；在18世纪末还属于世界顶级强国的中国，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也沦为西方铁蹄下的半殖民地。在这个阶段，西方国家之间为了争取霸权而展开的斗争以及对亚非拉殖民地人民的残酷统治，给世界带来了无限深重的灾难。如果说，西方在13-18世纪的崛起阶段，先后依靠罪恶的奴隶制度和惨无人性的殖民地土著灭绝政策逐步取得优势地位，那么他们在19-20世纪，则依靠对第三世界的公开而广泛的掠夺仍然居于优势地位，这个过程还将在21世纪继续。英国一位思想家说：

19世纪全球范围的帝国主义体系中，欧洲人在举手投足之间，就是亚洲人、非洲人和大洋洲人的大灾大难。

如果我们把英国掌握的辅助力量计算在内，那么，在1803年和1901年之间就卷入了50次大的殖民战争。(19)

尽管在20世纪中叶，广泛兴起的世界反帝反殖民统治的斗争使广大的亚非拉国家摆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纷纷取得主权独立。但是，西方依靠先进技术文化、政治霸权和绝对武力影响世界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很多亚非拉国家仍处于西方国家的直接、间接统治和围困之中。在这种情形下，西方自然具有居于先进地位而傲视世界的豪气：

与人类历史的任何其他阶段相比，在现代西方诞生了一系列气势恢宏的变迁，但同时这些变迁也越来越波及全球。生活于现代世界的人们与生活于先前各种社会和各历史时代的人们之间的差异，同使他们与久远的过去得以联结起来的那些联系相比，意义更为深远。(20)

**而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引言和第一章中，把西方人的豪气提升成为一种目空一切的霸气。他说：**

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世界事务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一个非欧亚大陆国家破天荒第一次不仅是作为欧亚大陆大国关系的主要仲裁者，而且也是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出现了。苏联的失败和崩溃使一个西半球大国迅速上升为唯一的而且的确也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的进程中的最后一步。

美国在全球四个具有决定性作用方面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在军事方面，它有无可匹敌的在全球发挥作用的能力；在经济方面，它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即使它在有些方面已受到日本和德国德挑战（日本和德国都不具有全球性力量的其它属性）；在技术方面，美国在开创性的尖端领域保持着全面领先地位；在文化方面，美国文化虽然有些粗俗，却有无比的吸引力。这四个方面加在一起，使美国成为一个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级大国。

美国这个巨大复杂的全球体系与早先的那些帝国不同，它不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金字塔。相反，美国处于一个相互交织的宇宙的中心。在这个相互交织的宇宙中，力量是通过不断的讨价还价、对话、沟通和寻求正式的一致意见来行使的，尽管这种力量最终都来自同一个来源--华盛顿，而那里才是必须玩力量游戏的地方，而且是按照美国的国内规则来玩的。

美国人今天所谓的"全球性大国"就像中国当年称自己为天下"中央王国"一样，都是瞎子式的自大行为。不过，称"中央王国"者是真瞎--因为它确实对全世界无知，而称"全球性大国"者则是睁眼瞎--因为它了解这个世界，但它还是要依靠霸权意识来支撑其建立"世界帝国"的美梦：它看不到，美国的凸现地位不是自身"上升"的结果，而很大程度上是苏联崩溃的结果；它看不到，它的所谓"全球性大国"只是一相情愿的自我表白；它看不到，这个世界还有许多国家在反对它，还有许多国家被它完全忽略；最根本一点，它看不到，正是由于它的霸权主义政策，给这个文明世界带来了许多的灾难。

当然这仅是问题的一面，在这里，要指出的是，美国这种睁眼瞎式的自大认识仍然是西方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延续。

自西方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逐步"确立"了地中海或者是欧洲作为世界文明中心的绝对西方化的基本概念以后，这个错误的历史观念及其衍生文化，在西方炮舰的带领下，像瘟疫一样传遍了全世界。结果是：我们不得不跟着西方人使用"远东"、"中东"等体现欧洲中心论的种种概念，不得不使用西历为"公元"，不得不使用格林尼治世界时间，不得不使用以欧美加俄为中心的联合国旗帜，不得不屈从于西方强大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政治意志。总之，这个世界仍然必须像在西方取得绝对领先地位过程中的那样，任凭他们的摆布，如有不顺，指责、制裁、军事威胁和打击就会接踵而至。

通观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国历史文化与世界其它文化特别是从环地中海发起的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相比，有三个很大的不同特点。首先，在世界所有的历史文明当中，只有中国文明具有唯一的不间断的连续性。而西方以及南亚、西亚的文明发展，总是不断受外力影响而屡屡中断。正如黑格尔所说："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的一个帝国。"(21)据我们分析，这主要得益于中国一开始就具有比其他地区更为先进的文明因素以及得天独厚的东亚大陆基础。这两者构成了稳固的中国大陆文化形态，也正是因为这两个因素，使中国文化重视内部的完善，而通常忽视对外特别是对海洋的关注。在中国发达的并具有内聚特性的核心文化区域外围，主要由中国的自由移民和游牧民族构成。虽然他们通常被核心所轻视甚至蔑视，但他们却始终享受着中国先进的文化。如东亚、东南亚、西亚、西北亚地区。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形态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人类关系的和平特性和文化的共享特性。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中国文化具有不间断的连续性。

其次，西方文明首发于埃及，成型于环地中海地区，发达于欧洲，扩展于美洲和澳洲。在这个过程中，日尔曼诸族代替了环地中海民族，最终又抛弃了埃及非洲和阿拉伯民族。虽然西方历史文化，具有前后的承接关系，但日尔曼世界却是一个年轻的世界。而中国文明则有6500年的国家发展史。正如西方有见识的人所说的：欧洲"仅仅是亚洲的一个半岛"。"欧洲封建国家看来更像是居于世界主要文明的边

陲地带，而不像是个自成体系的文明。" (22)所以，即使由现代西方人确定的联合国旗帜图案，是从地球北极上空俯视地球，所看到的图像--一个将西方（欧洲-北美-俄罗斯）列在图案中心的图像；即使西方将用于划定世界时区的起始经线--0度经线确定在欧洲（英国）的格林尼治；但它们仍然改变不了西方世界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

今天的欧洲民族实际上是没有经历作为人类文明史的上古历史的。因此，他们没有人类上古文明历史的实证经验，更没有跨越东、西方不同的文明系统的诸多不同的概念。今天的欧洲人虽然是古代西方文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者，但是，他们却不是古代辉煌的西方文明创造者的后裔。他们的先祖是公元前后生活于中亚黑海和黑海之间处于蒙昧状态的日尔曼蛮族。……他们没有文字，也不识字，没有自己的历史记录。严格来讲，他们的历史只有1000多年。因此，他们所看到的、所理解的人类关系（或称民族关系）也只有1000多年。(23)

欧洲文化和科学遗产的相当一部分是从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借用"来的。拜占廷文明所保留的希腊--罗马文明的遗产，也使欧洲受益无穷。欧洲大陆被地中海、黑海、波罗的海等内海所纵深切割，以至整个西欧实际上是一个延伸出许多较小便道的庞大半岛，呈现出陆--海交错的格局。(24)

第三，西方文明从埃及发端，遍及环地中海而成气候，其特点是海洋性质的。这一点又与中国的大陆型文化和南亚、西亚的次大陆型文化有很大不同。并且，其发展的迭代过程很具有破坏性。他们总是把文明起源的基础因素给予毁灭，然后依靠其在破坏过程中所积累的本事奴役其统治的世界。日尔曼世界建立以后，他们的活动范围从地中海向外扩展，经过西（班牙）葡（萄牙）时代、荷（兰）法（国）英（国）时代的拓展，他们的活动海域已经遍及全世界的所有大洋。身为日尔曼直系后裔的黑格尔，对以地中海为发祥地的西方海洋文明的发展特点做了恰当的总结。他说：

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

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就算他们有更多壮丽的真正建筑，就算他们自己也是以海为界--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25)

黑格尔的话，说明了西方从事海洋征伐的原因和目的--不安分于故地、专事征伐和获取更大的利益。这一点，显然与中国是不同的。直至21世纪这种区别仍然没有多大改变。

西历21世纪的今天，我们满脑子的东方和西方的观念就是在中国与欧洲不同的发展特点中形成的。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国际政治环境中，中国仍处于劣势的不利地位。中国如能抓住机遇，努力学习和利用好西方的先进文明因素，发展自己，也许在本世纪，中国能够真正崛起，索回过去失去的所有东西，包括自尊、土地以及散布在世界各国的中国过去文明的各种见证物，重新建立起新的东方文明世界。

表1-2　世界四大主体文明及其相互影响

东亚大陆文明南亚次大陆文明西亚次大陆文明欧美海洋文明中亚—四大文明的交汇点

一、

原始社会时代

1、距今200-20万年早期猿人

2、距今10万年中期猿人

3、距今3-1万年晚期猿人

4、 燧人时代， 距今1.5万-前7709年

5、 伏羲时代， 西历前7709-前4993年

6、 神农时代，西历前4745-4479年

（缺） （缺） （缺） （缺）
二、
国家初创时代
1. 黄帝族时代，[前4497-前4039]
2、 少昊族时代，[前4038-前3776]
3、 颛顼族时代， [前3775-前3334]
4、 喾族时代，[前3333-前2785]
5、 挚族时代， [前2784-前2343]
6、 尧族时代， [前2342-前2114]
7、 舜族时代， [前2113-前2071]
8、帝禹时代， [前2070-前2056]
布尔扎霍姆文化 [前4000-前3000]
达罗毗荼时代 [前2500~前2050]
印度河流域文化 [前2350-前2003]
苏美尔文化 [前4300-前3500]
杰姆代特奈斯尔文化 [前3100-前2900]
苏美尔城邦 [前2900-前2700]
1. 乌尔1王朝 前27~26世纪
2. 乌尔2王朝 前26世纪~2371
3. 阿卡德王国 前2371~2191[库提人灭]
4. 乌尔3王朝 前2191~2006[埃兰人
1.远古埃及 前4500~-4000
2.上下埃及 前4000~-3100
3.前期埃及 1-2：-3100~-2686
3-6：-2686~-2270
4.中期埃及 7-10：-2270~-2070
（缺）
三、

独立发展时代
1. 夏[前2055~前1600]
2. 商[前1600~前1046]
3. 西周[前1046~前771]
4. 春秋[前770~前476]
5. 战国[前475~前221
吠陀时代：1.前期—雅利安王国: [前20中~10世纪]
2.后期—？ [前10~6世纪]
佛陀时代：1.摩揭陀时代 [前6~4世纪]
2.瓶沙王朝 [前544~-493]
3.阿 世王朝 [前493~-462]
4.伏陀王朝 [前462~-364]
5.难陀王朝 [前364~-324]
6.孔雀王朝 [前324~-187]
1. 列国时代[前2006~-1894] 埃兰[前20~7世纪中，亚述灭]
2.古巴比伦王国1 [前1894~-1595，赫梯人灭]
3.古巴比伦王国2 [前1595~-1518，加喜特灭]
4.古巴比伦王国3 [前1518~-1204，亚述灭] 古亚述[前1400-前1078]
5.古巴比伦王国4 [前1165~-689，亚述灭]
6.亚述帝国 [前935~-612，巴比伦灭] 米底[前7世纪~-550 .波斯灭]
7.新巴比伦王国 [前626~-538，波斯灭]
8.波斯帝国 [前550~-330，马其顿灭]
9.马其顿时代[前330~-247]
1. 中期埃及[-2070~-1786][11-12]
2. 中期埃及[-1786~-1567][13-17]
3. 中期埃及[-1567~-1085][18-20]
4. 后期埃及[-1085~-525][21-26][灭于波斯]
5. 波斯埃及[-525~-332，27-31] 马其顿王国[前5世纪~-276]

迦太基[前7世纪~-146]
1. 希腊米诺斯文化[-2003~-1400]
2. 迈锡尼文化[-1400~-1200]
3. 黑暗时代[-1200~-750]
4. 列国时代[-800~-500]
5. 希波战争[-500~-338]
6. 伯罗奔尼撒战争[-338~-217]
1. 罗马古国[-753~-510]
2.罗马前期共和国[-509~-265]
1.米底古国[雅利安在伊朗西北] 前20世纪中叶-前612
2.亚述下的米底 [前1400-前612]
1. 米底王国[前612-前550]
2. 波斯—阿契美尼王朝[前 550-前330]
3. 马其顿下的中亚[前330-前305]
4. 塞琉古王朝下的中亚[前305-前246]

四、
东方世界及其影响
1. 秦[前221~-206]
2. 汉[前206~220]
3. 三国[220~265]
4. 西晋[265~316]
5.东晋南北朝： [317~581]
1. 隋[581~618]
2. 唐[618~907]
3. 五代十国[907~960]
4. 北宋[960~1127]
5. 南宋辽金夏 [1127~1271]

1.列国时代 [前187~1世纪]
1. 贵霜帝国 [1~3世纪]
2. 分裂时代 [3~4世纪]
4.笈多王朝 [320~540]
5.口厌哒帝国 [6~7世纪中]
6.拉奇普特时代 [7~11世纪]
7.伽色尼王朝 [1027~1206]
8. 德里苏丹奴隶王朝[1206-1290]
塞琉古王朝
[前304~-64]
1.安息帝国
[前247~+226]
2.萨珊波斯
[226~642]
3.阿拉伯帝国
[642~1258]
花剌子模
[1077 ~1221]
塞尔柱帝国
[1055~1299]
1. 埃及托勒密王朝[-305~-30]
2. 埃及罗马 [4世末~642]
3. 埃及及北非阿拉伯 [642~969]
4. 埃及独立阿拉伯 [969~13世初]
5. 埃及马木克王朝 [13~14世纪]
马其顿安提柯王朝 [-276~-168]
1. 罗马后期共和国[前265~-30]
2. 西罗马帝国[-30~+395]

3. 东罗马帝国[395~476]
4. 拜占廷帝国[476~1204~1261
北非马格里布 [[1147~1269]
日尔曼诸国 [5~9世纪中叶]
法兰克王国 [486~800]
查理曼帝国 [800~843]
德法意三国 [843-962]
神圣罗马国 [962~13世纪末]
法兰西 [10中~1302]
意大利 [10中~13世纪末]
英吉利王国 [9~1295]
基辅罗斯 [862~1240]
1. 塞琉古王朝[希腊-巴克特里亚][前250-前135]
2. 安息王朝[前247-+226]
3. 贵霜王朝[前1世纪-5世纪]
4. 口厌哒帝国[5世纪初-6世纪中]
5. 西突厥汗国[583-657]
6. 倭马王朝[白衣大食660-750]
7. 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750-842]
8. 塔赫王朝[821-873]
9. 萨法尔王朝[873-903]
10.萨曼王朝874-999]
11.塞尔柱王朝[1040-1299]
11.迦色尼王朝[997-1186]
12.喀剌汗国[999-1212]
13.西辽[1124-1211]
14.古尔王朝[11世纪中-1215]
15.花剌子模[1077-1221]

16.察合台汗国前期[1225-1306]

五、
东方强大西方扩展时期
1. 元
[1271~1369]
2. 明
[1369~1644]
3. 前清
[1644~1796]
1.德里素丹国
[1206~1526]
2.莫卧儿帝国
[1526~1799]
1.伊尔汗国
[1258~1500]
1. 帖木儿帝国
[1370-1501]
3.萨菲波斯
[1500~1796]
4.奥斯曼帝国
[1282~1763]
1.埃及拜占廷时代
[13~15世纪]
2.埃及奥斯曼时代
[15~1763]
南部非洲古国时代
[13~18世纪末]

1.北非三国时代
[1269~1574 ]
2.北非独立时代
[1574~18世纪末]
拜占廷帝国[1261~1453]
金帐汗国[1240~1480]
1.莫斯科公国[1480~1547]
2.沙俄[1547~1721]
3.俄帝国[1721~1796]
西葡时代[16~1763]
1.神圣罗马[14~1806]
2.法兰西[1302~1799]
3.英国[1295~1689~1763]
4.意大利
[1460~18世纪末]
1.美洲古国时代
[13~16世纪初]
2.阿丝特克
[11世纪中-15世纪]
[14中-1521，西灭]
3.玛雅
[前4世纪-10世纪]
4.印加
[10世纪-1532，西灭]
5.美洲殖民时代：
[16~18世纪末]
1.墨西哥殖民时代
[1521-1810]

1.察合台汗国后期
[1306-1402]
2.帖木儿王朝[1370-1500]
3.哈萨克汗国[1361-1736]
4.哈萨克玉兹[1703-1816]
5.布哈拉汗国[乌兹别克]
昔班尼朝[1500-1600]
阿斯特拉罕[1600-1800]
6.希瓦汗国 前期[？-1512]
中期[1512-1804]
7.浩汗前期[1709-1799]
8.浩汗下的吉尔吉斯
[1709-18世纪末]

六、
西方世界及其影响
后清
[1796~1911]
民国
[1912~2003]
共和国
[1949~2003]
1.莫卧儿[英殖民]
[1799~1857]
2.英国统治时代
[1848~1947]
3.巴基斯坦
[1947~2003]

4.印度
[1947~2003]
5.孟加拉国[1971-2003]
1.奥斯曼帝国
[1763~1922]
2.土耳其
[1923~2003]
1.伊朗卡扎尔朝
[1796~？]
2.伊拉克
[1930~2003]
1.埃及奥斯曼时代
[1763~19世纪]
2.欧化的埃及
[1878~1936]
3.独立的埃及
[1936~2003]
1.希腊奥斯曼时代
[18世纪末-1830]
1.希腊独立[1830-2003]
1.俄帝国[1796~1917]
2.苏联[1922~1991]
2.俄罗斯联邦
[1991~2003]
1.荷法英时代
[1763~1904]
2.列强争霸
[[1904~2003]

美国[1776~2003]

加拿大

[1776~1867英属地]

[1867~2003独立]

墨西哥

[1810-1821-2003]

拉丁美洲独立时代：

[18末~19世纪初]

[19世纪~2003]

澳大利亚

[1787~1901殖民地]

[1901~2003英属地]

1.希瓦汗国—弘吉拉朝

[1804-1868-1920]

2.布哈拉汗国

曼格特朝[1800-1920]

3.浩汗后期[1799-1876]

[整个中亚被俄罗斯吞并]

4.1991年中亚脱离俄罗斯取得独立—2003年

其中有：哈、吉、塔、乌、土五国

5.阿富汗[？-2003

---

(1)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4年第一版，第56页。

(2)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108页。

(3）胡春洞，“玛雅人和中国人的亲缘关系”，《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4日。此见于[www.xys.org]。

(4)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8-379页。

(5)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理京 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6)转引自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第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1页。

(7)转引自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9页。

(8)转引自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4页。

(9)转引自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6页。

(10)本书所引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一书内容均采自“亦凡书库”的网络版，以后不再另注。

(11)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275页。

(12)《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原注。

(13)详见坦普尔《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该书认为，在许多发明发现中，诸如现代农业、航运、石油、气象、音乐、十进制数学、纸币、多级火箭、鱼雷、降落伞、载人飞行、白兰地、威士忌、蒸汽机等重大发现中，中国至少有100个世界第一。——原注。

(14)文怀沙、邵盈午，《中华根与本——宝学概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5页。

(15)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181页。

(16) 《学习时报》编辑部，“落日的辉煌——十七、十八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光明日报》，2000.6.19。

(17)《清经世文编.卷十》。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6页。

(19)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一版，第270页。

(20)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一版，第37页。

(21)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22)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6页。

(23)龙西江，“中国亟待建立自己的民族学理论”，《新华文摘》，1994年第10期。

(24)朱宁等，《变乱中的文明——霸权终结与秩序重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87页。

(25)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96-97页。

**********

# 第二章 历史时代

中国历史从国家创始到今天，已经历了65个世纪，可以分为三个时代：禅让政治时代、世袭政治时代和政党政治时代。其中世袭政治时代，可分为夏商周时代、秦汉晋时代、隋唐宋时代和元明清时代四个历史时期。禅让政治时代是中国国家创始及其原始民主政治时代，夏商周时代是中国世袭政治的创始和宗藩政治体系的形成时代，秦汉晋时代是中央集权政治的形成时代，隋唐宋时代是中央集权政治的辉煌时代，元明清时代是中央集权政治的极衰时代，政党政治时代则是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创立和逐步完善时代。

## 第一节　　原始社会时代：创世纪以前

西历20世纪末，大量的人类基因研究，基本弄清楚了远古人类与今天人类的种属关系。

有关中国人种的研究，基本证实了今天东亚乃至整个太平洋西岸国家，均来自东方人种，即均属于华裔大族一脉。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先生认为，中国古人类进化是连续进化的。

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人类基因中心"与中国的数个科研单位联合提出了"中国人种基因组差异研究项目"。研究人员利用先进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分析工具对中国人类族群中的28个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28个族群的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90%以上。.....科学家们动用了一套特别的基因标记。这套基因标记的名称叫做"卫星细胞"。.....科学家们把中国族群的30个"卫星细胞"标识与世界各地11个族群的细胞进行了对比。对比.....说明，中国人类的族群是在人类学会打造金属工具和使用书面的字母前就从非洲迁到了中国南部。研究人员声称："东亚的人种源于一脉，也就是东亚人最初是一家人。"

新西兰的一个科研小组得出了一个同样惊人的发现：新西兰毛利族和玻利尼西亚人的祖先来源于中国大陆。.....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生

物学家钱伯斯利用志愿者们的血液样本与全世界其他民族的人类基因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发现：毛利族和其他玻利尼西亚族人应该来自中国大陆。他们从台湾开始逐岛迁移。经过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来到西玻利尼西亚，然后登上了东玻利尼西亚，最后来到了新西兰。（1）

到西历20世纪末的2000年，中美科学家更是给世界一个惊喜。中美科学家于2000年3月在英国权威科学期刊《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通过对中国江苏溧阳和山西垣曲发现的中国曙猿和世纪曙猿脚踝骨和下颌骨化石的研究，发现了猴类、猿类及人类的共同祖先演化的早期状态，而这些动物生活在距今4500万年的中始新世。曙猿意思是"类人猿亚目黎明时的曙光"，即一种的最古老的猿。（2） 这一发现，向"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提出了挑战：人类远祖也可能起源于中国。虽然不能断定，但它基本否定了中华文明来自他域的结论，中华文明具有远久历史的独立起源，中华民族及其历史、文化是在世界的东方独立发展起来的，万族一脉，渊源流长。

中国境内古人类的考古发现，云南开远县禄丰有700-800万年前的古猿化石，距今200万年前存在安徽繁昌人字洞石器文化，距今180万年前存在山西内城县西北西侯度文化，这些文化已经清晰地反映出了中国古人类的早期足迹。距今约5万年前，世界三大人种基本形成，其中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东方人种（即蒙古人种），就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美国世界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人类祖先在距今约35000年时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整个进化过程，而转变为人类-'能进行思维的人类。'"（3）

在原始社会时期（距今200万年-西历前4497年），是中国人类文明历史的自然发展时期，也即自然选择时期或者非国家政治时期。国家和政治的产生和形成，需要人类群居集体的存在和一定的文明基础。《商君书.开塞》说："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但由"民众"至"立君"这个过程是相当缓慢的，这个过程是通过漫长的原始社会时代来完成的。考古成就表明，从距今200万年前中国古原始人类的形成到黄帝以前的整个自然发展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个阶段是距今200万年到距今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第二阶段是西历前8000年（即距今1万年）到西历前4500年的新石器时代，这是中国政治文明的肇始时期（详见表2-1）。

在旧石器时代末期，中华文明的远古祖先-有巢氏、燧人氏首先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到新石器时代初期，燧人氏之后，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伏羲氏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文明基础；到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历史则进入了完善的国家政治时代。

表2-1　中国原始时代图表

距今[年] 主要事件

旧石器时代

早期猿人

200-20万 200万年前，安徽繁昌人字洞石器文化，180万年前西侯度[今山西芮城县]文化是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人类足迹。170万年前元谋人[今云南元谋]、98万年前蓝田人[今陕西蓝田]、71-23万年前北京人[今北京周口点] 、50万年前南京猿人是这个时期的代表。北京人已学会使用和管理自然火。

中期古人

10万 10万年前马坝人[今广东曲江县]是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古人。许家窑人[今山西阳高县]、丁村人[山西襄汾县]、大荔人[今陕西大荔县]等属于这个时期。

晚期新人

3万-1万 3万年前柳江人[今广西柳江县]是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新人。2.8万年前峙峪人[今山西朔县]、2.6万年前安图人[今吉林安图

县]、1.9万年前山顶洞人[今北京周口店]、1.5万年前丽江人[今云南丽江县]、1.5万年前阳春人[今广东阳春县]、11460年前扎赉诺尔人[今内蒙满洲里市]等均属于这个时期。

新石器时代 1万-

9000年 仰韶文化[今河南渑池县]是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人类文化，是1万年中国文明史的起点。此时，农业生产发达，木制农具耜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世界最早的乐器-笛子。

8000年 北辛文化[今山东滕县]、老官台文化[今陕西华县]、李岗文化[今河南新郑县]、磁山文化[今河北武安县]是这个时期中国文明的代表。中国彩陶技术和纺织技术出现，稻谷已被广泛栽培。

7000年 河姆渡文化[今浙江余姚县]、姜寨村文化[今陕西临潼县]、马家浜文化[今浙江嘉兴县] 是这个时期中国文明的代表。农业以水稻为主，畜渔采集并重。

6000年 屈家岭文化[今湖北京山县]、大溪文化[今四川巫山县]、大汶口文化[今山东泰安县]、新乐下层文化[今辽宁辽阳市] 是这个时期中国文明的代表。

按照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古文化-古城-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发展理论（详见本章第二节），我们以为，中国历史在伏羲时代，已经进入了古国文明时代，处于完善的国家政治形式出现的前夜。总之，有巢氏以后，黄帝之前，是中华政治文明的启蒙时期。

这个启蒙时期，是中国的原始社会时期。

这个启蒙时期，是中国的"创世纪"时期。

这个启蒙时期，是中国神化、传说和历史交织在一起的时期。

这个启蒙时期，有许多人物出现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差不多全相信我国历史的初期有巢、火食、畜牧、农业等几个发展的阶段。他们把前两个叫作有巢氏、燧人氏；后两个靠着借来的庖牺、神农的两个名字，也就凝固起来。"（4） 历史学家翦伯赞的《先秦史》和台湾史家柏杨的《中国人史纲》等对中国黄帝之前的历史，都是按照有巢氏、燧人氏、伏牺氏和神农氏的顺序叙述的。在现代，"在对所有那些名字进行一番认真的核查以后，我们发现剩下的只有四个名字值得我们稍加注意。那就是（一）有巢氏，（二）燧人氏，（三）庖牺或伏羲氏，（四）神农氏。"（5） 这不是传说，也不是神话，应该是远古信史的恰当反映。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有巢氏。

民食果甘瓜瓜（上甘下瓜瓜）虫奉（左虫右奉）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6）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7）

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螺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谣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井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8）

庖牺氏没，神农氏作。 斫木为耜，揉木为耒。 耒耨之利，以教天下。（9）

现在，根据传说、历史记录和考古成就，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和神农氏是紧靠黄帝以前的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创世纪"人物，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原始社会末期，这个时期的时间范围约在西历前20000年至西历前4500年间。我们的祖先虽然分别记述了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和神农氏事迹，但是，中国多数历史学家却用"三皇"来代表这个时代，并且在"历史"上总共产生了七种不同的"三皇"组合（见表2-2）。通过我们的考察，仅说"三皇"，那么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似乎只有第七种组合。

表2-2　中国古史关于"三皇"的七种主要说法

序号 三皇 记述史籍

1 天皇、地皇、泰皇 《史记.秦始皇本纪》，西汉司马迁著。

2 天皇、地皇、人皇 《史记.补三皇本纪》。

3 伏羲、女娲、神农 《风俗通义.皇霸篇》，东汉应劭著。

4 伏羲、神农、祝融 《白虎通义.号篇》，西汉班固等整理。

5 伏羲、神农、共工 《通鉴外纪.引》，北宋刘恕撰。

6 伏羲、神农、黄帝 《帝王世纪》，西晋皇甫谧著。

7 燧人、伏羲、神农 《风俗通义.皇霸篇》、《白虎通义.德论》。

很明显，这些"三皇"组合都漏掉了著名的有巢氏。受其影响，王大有先生在其《三皇五帝时代》中根据中华远古历史演进的顺序，也称"三皇"即燧人、伏羲和神农三氏：燧人氏开创了熟食文明时代，持续了7200余年；伏羲氏历77世，历时2716年（西历前7710-4994）；神农氏族与炎帝族、黄帝先族、蚩尤族大约处于同一个时代，属于"四雄"之一。黄帝先族历14世，历时577年（西历前5076-4499）；炎帝族历14世，历时479年（西历前4980-4501）；神农族历8世，历时272年（西历前4752-4480）；蚩尤族历5世，历时136年（西历前4527-4391）。

在黑龙江哈尔滨阎家岗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两处距今22000年用二三百块动物骨骼垒叠排列的围圈遗迹，并在围圈中发现有炭屑，附近还有石制品，这是首例最为清楚的在旷野人工搭建窝棚式住所的遗迹。看来，有巢氏的出现应在燧人氏前面。我们暂先把有巢氏作为中华"创世纪"的第一位重要人物，加上燧人、伏羲和神农，中华"创世

纪"时期，是"四皇"而不是"三皇"。所以，我们先姑且称这个时代为"四皇时代"。

有巢氏，是中国原始人类中最早学会制造工具（石器和木材）开始创造性劳动的一群。他们还处于采集经济时代，为了回避猛兽的袭击，开始结巢而居。即如"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10） 结巢对古人类来说，的确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工程，正因为有了这种工程，人类的生活环境、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通过创立和维护巢房，他们逐步获得了驾御生活的能力。

燧人氏，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国远古人类人工取火的发明者。中国原始人类自发明人工取火以后，中国便进入了能进行控制的熟食文明时期。这些火的发明者，教人钻木取火，使我们的祖先逐步摆脱了原始的"茹毛饮血"状态。不论从进化角度，还是从其成就上讲，他们都应成为"四皇"之一。恩格斯曾说，"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分开。"《礼记.礼运》中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木曾 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人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

伏羲氏，是燧人氏之后，他们创造鱼网，教民渔猎；创制婚姻制度，定嫁娶之礼；创制乐"瑟"，作乐《驾辨》；察天文地理，而演八卦；他们首先在黄淮流域掀开了中国华夏文明的历史序幕，被后人尊为中国"人类的始祖"，并尊之为"太昊"（其功德无量，与日月同辉）。他们还为合众于一起的各氏族创制了一个传世于今的统一的中华民族图腾--龙，为中华多民族的统一建立了一个永久的精神基础。他们的功业光照华夏。他是伟大的，目前也有学者认为，中华文明史从伏羲氏开始。（11）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极严肃地记述了中华文明的源流以及伏羲氏族的功绩。他说："据称伏羲氏教人建筑居室；他又教人明了四季的顺序变迁，从事于物物的交换和贸易；他规定了婚姻；他教给人'道'是'天'所授的；又教人养蚕、造桥和役使牛马。"（12）比较起来，有巢氏和燧人氏，更反映了社会的技术层面，而伏牺时代及其以后中国原始社会发展，更具有可能进入了考古学家苏秉

奇所说的"古国"时代，即使不到"古国"阶段，也到了"古文化"或"古城"阶段。所以，也有学者把伏牺时代作为中华文明的肇始阶段 。（13）

神农氏，是"四皇"中的最后一个，是炎帝氏族的一支。炎帝氏族强盛时，神农氏世为其农官田正，他们在炎帝氏族中后期内乱中强盛起来，成为可与黄帝、炎帝以及稍后的蚩尤氏族争强的大族。在西历前4493年前后，中华社会处于强族纷争时期。神农氏族虽然比炎帝和黄帝氏族后起，但显然是伏羲氏族之后最显赫的一族，是那个时代的突出代表。有此，神农才会被后人列为"四皇"之一。由于神农氏出自炎帝族，所以人们常常把二者混为一：炎帝即神农。最早将炎帝和神农"合二为一"的是新莽时期的刘歆。刘歆为了为王莽篡政"受禅代汉"提供理论依据，依照五行相生之序，将"以木承火"的炎帝与神农"合二为一"。从此以后，"炎帝神农氏"不绝于史，直至今天的许多电视片和历史书仍然持刘歆之伪说。事实上，在新莽以前的史书中，炎帝和神农二者是"独立"的；炎帝和神农均是黄帝统一纷争状态之前的一大族；炎帝是伏羲族系中古昆仑一支；而神农氏族由于其主要历史功绩--最早发明并发展了多项农业技术，被公认为是中国的"农业之神"--而居于比较突出的富有重大历史影响的地位。

所以，按照王大有先生的研究，补上"有巢氏"，四皇时代的时序如表2-3所示。

由于神农氏的杰出贡献，中国原始时代很快从采集渔猎进步到农业生产时代。神农氏还以其遍尝百草、辩药材、教人治病的经历和成就，赢得了各部族的推崇。传说末代神农氏为民治病，因尝到有剧毒的断肠草而献出了生命，以后每年农历七月初七便成为神农氏尝百草献身的忌日。神农氏生活的时代，由于人工控火技术、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医药、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这个时期是中国原始社会急剧变化的转型时期，也即中国原始社会的末期。由于社会发展的原因，各部族集团之间展开了对领地的争夺，部族战争越来越频繁。随着决定性的战争的发生和各部族集团日趋庞大和统一，中国社会也逐渐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形式--国家政治形态。

表2-3　四皇时代时序表

四皇 氏族 世系 历时[年] 西历前

1．有巢 有巢氏？ 12290 20000-7710

2．燧人 燧人氏？

3．伏羲 伏羲氏 77 2716 7710-4994

4．神农 黄帝先族 14 578 5076-4499

炎帝 14 479 4980-4501

神农氏 8 272 4752-4480

蚩尤 5 136 4527-4391

四皇时代的末期，是同源于伏羲氏族的炎帝族、黄帝族、神农族和蚩尤族的共存时期。这个时期，群雄竟世，处于史前"战国"时期。随着中国原始社会文化的发展，中国历史迅速向崭新的政治文明时代迈进。在这种发展过程中，黄帝族最终取得了统治地位，完成"创世纪"的伟大历史任务。

从表2-3可以看出，所谓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和神农氏，不是单指一个人。远古人类因择地群居而产生氏族，因不同氏族而产生不同称号。所以，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和神农氏分别是不同氏族的名称。如神农共历8世，每一世均是神农氏。

四皇的更替，是中华同一氏族繁衍和兴衰的直接反映，有巢-燧人-伏羲-神农代表中华先族的延伸和发展历程。不同氏族的出现，代表着中华先驱文化的递进过程，其中潜藏着中国未来文明史的发展模式。最后，到神农族末期，群雄并起，神农氏族"世衰"，黄帝起而建立了新型的社会结构关系--即国家政治体系。

历史学家何新通过比较研究，说明中国的四皇创世纪过程符合人类史前文明的进程。他说：

摩尔根《古代社会》曾说，一夫一妻制形成于由蒙昧向渔猎野蛮时代过渡的初期。先秦人们关于伏牺创制嫁娶的传说，实际上到印证

了这一点。有趣的是，归纳先秦诸子对于文明起源的论述，恰可以形成如下一个文明进化序列：

太古蒙昧—— 燧人——有巢 —— 伏牺 ——　神农

(洪荒时代)　(用火)　(建屋)　　(渔猎、婚姻)　(农业)

更有趣的是，此一顺序大体上是正确地反映了人类史前文明演进的一般历程。（14）

这一历史演进过程也充分说明了，在中国史前时期，由有巢、燧人、伏牺和神农构成的"四皇"创世纪历程是存在的，是可信的。

总之，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四皇"时代，中国远古祖先熟练地掌握了四种至关重要的基本生存技术：房屋、火、农耕和医药，这些技术在迅速改变人类自身命运的同时，也为人类进入政治文明社会建立了技术基础。

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需要说明："四皇"的"皇"应该是一种后人的神化称呼。孔子曾说："功合神者称皇，德合天地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15）。自黄帝开始，国家元首的称谓已成为国家政治形式的标志之一，因而，由国家组织确定而非后人补称。夏商及其以下的人们认为，燧人、伏牺和神农氏，其功近乎神，故称为"皇"；黄帝以至帝禹，其德足配天地，故称为"帝"；夏商周时代统治者自认为功德都不如尧舜，故只逊称为"王"。只有秦始皇自认为既功合于神，又德合于天地，故合称"皇帝"，而"王"只能作为皇帝之下，封国或者属国的称号了。

———————

（1）“中国人祖先在非洲？太平洋居民是华裔？”，《贵阳晚报》，1998年10月10日，第5版。

（2）“曙猿化石研究表明——人类远祖源于中国”，《人民日报》，2000年4月11日，第5版。

（3） 斯塔夫里阿诺斯，《世界通史》，上册，吴象婴等译，上海社科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第66页。

（4）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1页。

（5）吴国桢著，陈博译，《中国的传统》，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62-63页。
（6）《韩非子.五蠹》。
（7）《易经.系辞》。
（8）《淮南子.修务训》。
（9）《易经.系辞》。
（10）《淮南子.盗跖》。
（11） 参见董立章，《三皇五帝史断代》，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12）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13）参见董立章，《三皇五帝史断代》，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14）何新，《诸神的起源》，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314页。
（15）《帝王世纪.第一》。

**********

## 第二节　禅让政治时代：第1-24世纪

禅让政治时代，按照西历记述，在前4497年-前2056年，合黄帝创世纪后的中历第1-24世纪，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

人类从自然选择时期进入政治时期的标志是国家政治的创始。但是，这个人类文明的伟大转折点，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具体在哪里？中国历史学家的认识也是不统一的。12卷本"白氏通史"的记述反映了这种不统一的状况：

关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就目前发表的文章来看，尚是众说纷纭。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国家起源于六千年前的黄帝、少昊时代；一种意见认为，公元前4500-前4000年期间的龙山文化时代，中国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一种意见认为，夏是原始社会正向奴隶制国家过度时期；一种意见认为，夏是中国文明史的开端；一种意见认为，商汤伐夏桀后形成了国家；一种意见认为，商代盘庚迁殷后，中国国家才产生。（1）

"白氏通史"认为，夏代确有其实，夏前时期属于神化、传说时期；夏以前的社会是军事民主制，以后是君主世袭制；部落联盟中的军事首长不是国家中的君主、国王，有了传子制度也并不等于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也不意味着国家的形成，并说：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夏代，这在周人较早的文献和商代后裔追述他们祖先事迹的篇章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礼记.礼运篇》说：禹以前为"大同"之世，禹以后为"小康"之世。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大同之世，正是共同生产、共同占有，并且实行着军事民主选举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所谓"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小康之世，正是变公有制为私有制，变军事民主选举制为君主世袭制的阶级社会。《孟子.万章上》引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所谓"唐虞禅"，也就是《礼运篇》所说的"大同"之世，"选贤与能"的部落联盟中的军事民主制；所谓，"夏后殷周继"，也就是"小康"之世，"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君主世袭制。

《尚书.尧典》、《尚书.舜典》所载：凡举国大事，尧舜都要咨询于"四岳"、"十二有牧"、"四岳群牧"，即召开酋长会议。

部落联盟会议中的军事首长，都是由酋长议事会经过全体酋长一致选举出来的，通常是两头制，正的出缺，便由副的继任，再由酋长议事会推举一人为副。据《尚书.尧典》载尧和舜是两个军事首长；尧

死后，舜和禹是两个军事首长。我国古代尧舜禅让的传说，实际就是部落联盟中的民主选举制。

在禹的时代，作为部落联盟中"选贤与能"的所谓"禅让"即民主选举制度，还没有为"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君主世袭制所代替，禹仍只是部落联盟中的军事首长，而不是国家中的君主、国王。

有了传子制度并不等于原始公社制度的解体，也不意味着国家的形成。（2）

显然，"白氏通史"的这些观点和意见，有的前后是相互矛盾的，带有一种不自觉的自否性。这种自否性还具普遍性。我们常常否认传说的存在，但传说在我们的历史著作中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章节；我们不太相信远古时代的"史记"，可我们对东汉明帝"夜梦金人"以致佛教东来的荒诞事件记忆犹新；我们对考古喋喋不休，却对宗教里的"上帝"、"神"啊、"主"啊众口一词并坚信不移。

由美国科普作家阿西莫夫和空间问题专家怀特合著的《诠释人类万年》这样说：

当一些有着相近语言与文化的城邦归顺于一个统治者的权威时，便形成国邦，或者说就是一个国家。埃及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在5000年后的今天它仍是一个国家，埃及在国家的长盛不衰方面保有无可争议的记录。……。中国北方也在黄河流域孕育了新城邦式的进步因素。和苏美尔和埃及一样，这里已形成将文明传播到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另一个独立的核心。（3）

作者认为"埃及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但同时他们又说："中国……和苏美尔和埃及一样"，作为一个有能力传播文明的"独立的中心"不可能是完全处于原始状态的部落。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政治文明比埃及以及苏美尔和印度都要早先出现许多。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连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印度的'四吠陀经'并非历史；阿拉伯的传说固然极古，但是没有关于一个国家和它的发展。这一种国家在中国才有，而且它曾经特殊地出现。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它的原则又具有那一种实体性，所以它既是最古的、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4） 这句话在任何时候评价中国的历史发展状

况都是合适的。中国是世界最古老的历史最悠久的国家。正如中国现代的史学成果所揭示的那样，中国历史（指进入完善的国家政治文明）确实是世界最早的。然而，我们的官方"正史"却把中国夏朝以前的历史停留在传说时代，有的史书甚至把中国排在四大文明古国之最后，即按照所谓年代排在古巴比伦、古埃及和古印度之后。中国史学界也在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上存在时间差极大的争论。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的每个朝代，都是一个国家的名称，既然承认有一个夏朝，为何又不承认其为一国呢？"创世纪"以后，既有"酋长会议"，又有"部落联盟中的军事首长"以及军队等等表征国家存在的种种"工具"，为何又竭力回避国家的存在呢?

日本不可能按照公式去套自己的历史。日本在西历1世纪以前，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原始部落林立，到西历1世纪末才建立具有方国性质的国家形式，到西历5世纪下半叶国家才逐步取得统一，到7世纪中叶日本才建立像样的国家，并且是全面仿造中国辉煌的汉唐文明而建立起来的。可就是这样一个日本，却将自己的历史一直前推到西历前6世纪，即我国东周春秋周僖王姬胡齐（前681-前677年在位）时代，还若有其事地列出诸天皇世系（既没有史述，也没有考古证明），这个世系进而成为日本引以为自豪的天皇"一姓相承，万世一系"的依据。19世纪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认为"日本自建国以来二千五百余年"。（5） 甚至，中国的很多历史学者，可以在毫不怀疑其真实性的情况下转述外国历史，而对中国历史却有这是神化、那是传说；这是谬传，那无实证的不断指责，似乎只有他们说的才是真正的历史。殊不知，日本在西历七世纪以前（即在中国唐以前）的历史，大都是出于传说；殊不知，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西历前484-425年）的《历史》（即《希波战争史》）每卷皆以女神缪司之名命名，既没按照年月顺序编年，也没以人物为中心纪传，只能是一个以故事为中心的叙事体。

我们不主张日本式的好自尊大的历史"冒进"主义，但在史述和考古的支持下，确认我们祖先的伟大成就，应该是我们后人的责任。我们不能说，现有的历史典籍对国家起源没有留下确切的记录，就永远让它作为历史之外的传说。

事实上，中华民族及其中华文明自始至终都是独立而系统地发展起来的。"根据河南陕县庙底沟二期墓葬遗骸中的一些具有人种鉴别意义的头骨形态和指数分析，庙底沟人的体质特征不仅与现代蒙古种族较为接近，而且同'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各组之间，在体质上显然存在着更密切的关系。……这一事实一方面反映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和仰韶文化人类的在体质上的连续性，同时也反映出我国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祖先在人种起源上的密切关系 。'（6）……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鉴定，宝鸡北首岭仰韶遗址的人骨与蒙古人种（7），与近代蒙古人各小人种关系相比，接近程度以南亚人种系较多，这就再次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在群体人类学上和种族特征上的相对单一性，提供了考古学上的依据。"（8） 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认为，从"考古学上看，中国古文化是土生土长的，又是在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中发展的。"这里的周边民族自然是中国原始人类的不同氏族或者部族以及后裔。

但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东西方从氏族到国家的转折大致都在距今六千年前；彩陶的产生，由红陶彩陶为主发展为以灰、黑陶为主的文化现象的出现也大体同步。世界三大古文明中心--西亚北非、中国为代表的东亚、中南美，经历过类似的从氏族到国家，而国家又经历过从古国到帝国的不同发展阶段。"（9） 这个思想既同美国社会科学家摩尔根"人类历史的起源相同，经验相同，进步相同"的观点一致，也和王大有先生推导的黄帝建国于距今6500年前的结论相吻合。

苏秉琦教授通过对天津蓟县距今5000年前后的古遗址、距今4500年前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7000-8000年前的阜新查海和赤峰地区兴隆洼遗址以及仰韶文化（从八百里秦川经华山周围到内蒙古中南部河曲地区的庙底沟类型）等的研究，认为从北方经太行山以西黄河以东，到八百里秦川（宝鸡到伊洛）形成一个"S"形文化连接通道（如图2-1）。这个结论和王大有先生提供的华北地区在西历前5400年（距今7400年）的地形图有相合之处 。（10）

图2-1　中国远古北方-中原文化连接示意图（11）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苏秉琦教授所提出的"古国-方国-帝国"三段式国家起源理论。按照这个理论，我们可以较清晰地勾画出中华"创世纪"到夏朝以前祖先们的活动背景以及从黄帝开始的中国国家文明史。这里，所谓古国，是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它的产生是由于古文化（原始文化）和古城（人类最初城乡分化出来的城镇）得到系统发展的结果。尽管如此，古国还是比较原始。比古国更成熟、更发达、更高级的国家是方国，它产生在古国之后。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至少从伏羲时代开始，中国历史应该是古国时代，方国应该从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秦始皇建立中央帝国为止。当然，在中国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从黄帝建国开始，一直到清朝，在"中央王国"的周边，始终存在着一些原始部落、古国或者方国。如即使在像汉、唐、明、清那样的大朝代，帝国边区始终存在一些原始部落、古国或者方国。最后，在外国侵略和中国反侵略的挤压中，这些社会形态才逐步消失。但是，就主体的"中央王国"而言，中国历史发展就是"古国-方国-帝国"的发展历程。

在国家起源问题上，摩尔根有个著名的"氏族-胞族-部落与部落联盟-国家"分段发展理论。他认为，一切政治形态都可以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

按时间顺序说，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在古代，构成民族（populus）的有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它们是顺序相承的几个阶段。……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12）

在西历20世纪60年代，西方人类学家按照社会进化的观点，提出了"游团--部落--酋邦--国家"的文明起源理论。认为人类在经过地域性的狩猎采集集团（游团）时期后，再经一个与农业经济相结合的部落时期和一个具有初步不平等的分层社会以后，才进入有阶级的国家阶段。这种认识似乎比摩尔根的理论又进了一步，但套用中国的历史似乎出现了偏差：很多人把中国的黄帝以后夏之前的时期套说是"酋

邦"时代。事实上，他们始终忽略了中国文明作为世界最早最先进文明的两个特点：政治"早熟"和技术领先。

在西历20世纪末，在中国有关国家起源研究方面又有了新的观点，其中王震中博士的"聚落-宗邑与中心聚落-都邑聚落-都邑国家"起源演进理论最具影响。"他将群体组织的发展演绎为三段渐进的模式，即从平等、内聚式的聚落形态，发展为初步发展与分化了的原始宗邑与村邑相结合的中心聚落，再转而变为都邑聚落，最后达到都邑国家文明的出现，并强调宗邑聚落形态的形成和发展，亦即氏族-宗族组织的演变和发展，是最具中国历史特点的关键。"（13）

图2-2　距今7400年（西历前5400年）华北地形图（14）

虽然，苏秉琦的"古城-古国-方国-帝国"理论、摩尔根的"氏族-胞族-部落与部落联盟-国家"理论、西方的"游团-部落-酋邦-国家"理论以及王震中的"聚落-宗邑与中心聚落-都邑聚落-都邑国家"理论相互之间的演进阶段名称和内容有很大区别，但是其试图论述的国家起源的本质意义是一致的，三者在理论意义上具有互补意义。

如果我们在众说纷纭面前，失去了判断，那么我们可以从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北方少数民族从一个原始部落成长成为一个大帝国的发展历程看出端倪。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曾建立起大帝国的有鲜卑族北魏、契丹族辽国、女真族金国、蒙古族蒙元帝国、满族清帝国等，她们的发展历程就是：从最初的原始部落开始，经过一段成长期后本民族形成，再经长期征伐统一邻近部落形成一个大民族，而后，臣服邻近民族而建国（方国）称号，最后征服北方乃至中原称帝而成就大帝国。比如，北魏发展史，其原始部落时期属于鲜卑族索头部，从拓拔毛到拓拔力微；拓拔力微以后，其部族逐步形成壮大；到拓拔猗卢时统一其三部，壮大成为一大民族；后来虽建代国，可不久被前秦所灭（338-376），到拓拔圭时，立官建制，称代王（386），脱离游牧生活，遂为方国；到太武帝拓拔焘时（423年即位），先后灭夏、北燕、北凉，统一北方，遂成一大帝国。又比如，

蒙古帝国发展史，宋金之际（12世纪），蒙古本部在黑龙江上游斡难河地区活动，处于原始部落时期；到西历1147年蒙古忽图剌可汗时，蒙古民族正是形成；到西历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落，形成一个大民族，称成吉思汗；虽然成吉思汗占据了幅员辽阔的北方地区，但还是一个游牧型大部落联盟，到西历1229年窝阔台可汗继位时，蒙古有文化有组织的地域国家正是形成，建都称制，正式进入方国时期；到西历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称帝建"元"时，蒙古进入大帝国时代。

可见，北方少数民族由部族发展成为大帝国，基本和历史上的所有古国发展历程一样。具体论到中国国家起源，以前述国家起源理论为基础，我们认为，中国在黄帝以前属于氏族社会或者原始社会阶段，而黄帝及其以后则为国家社会。黄帝以后，虽然一个主体国家已经形成，但由于力量和活动范围的局限，在其周边仍然存在着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氏族、胞族、部落或者部落联盟。尽管如此，中国国家社会形成了，黄帝所创建的轩辕国把中国社会带入了政治文明时代。由此以后，处在她边缘的落后的社会组织则在历史发展中逐步融入到更为先进的国家组织中，进而使黄帝轩辕国逐步演变成为泱泱大国。王大有先生明确指出：

中国的国家形态，不是城邦国家，而是以王城为中心的四域领土屏护统属的京兆都域国家，所以京都不必十分发达，城也不必十分大，而四域划分和宗属君臣关系却十分清晰严格。由此而有九州、四岳行政长官，有四方中央的观念和领属关系，自共工、黄帝而有九州和"黄帝四面，临制四方"，舜有十二牧，禹有九州牧。这就是中国的国家形态。（15）

这也是中国作为"中央王国"概念的由来，而非完全是天下地理中心的概念。这种特殊国家形态一创始就具有后来一贯而至清朝的宗藩政治体系的萌芽。

我们明确了中国国家起源的形态以及进入政治文明的明确时期，我们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弄清楚中国政治文明的早期演进过程。

在"创世纪"以后到夏朝之间，传统的说法叫"五帝"时代。"五帝"说最早源自战国时代，后人估计其为"五行学说"的对应产物。目前，普遍认为，所谓"五帝"说是不足信的。

从战国到南北朝时期，历史上共出现过6种"五帝"组合，详见表2-4。其中，属于"四皇"时代的庖牺（即伏羲）、神农、太昊、炎帝显然不能作为"五帝"之一，汤是商朝开国者，更应予以剔除。余者，如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舜、禹七帝，加上《史记.五帝本纪》中提到的帝挚，实为"八帝"。完整列出八帝的史书当数《汉书》，班固认为，黄帝、少昊、颛顼、帝喾之后，"帝挚继之"，然而"不知世数"（16），故在《汉书.古今人物表》中将"帝挚"列于"上中仁人"，而不与另外七帝作为"上上圣人"同列。

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很多学者已从传统的"五帝"说中走出来，研究"八帝"演化史。在这方面，从台湾移居美国的吴国桢就深入地研究了"四皇八帝"（17），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四皇八帝"概念，但是他对这个演进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们的很多历史书籍，虽然不能跳出"三皇五帝"传统观念的影响，但事实上"八帝"说已经形成了。比如，董立章先生在其《三皇五帝史断代》中，就明确黄帝至夏之前，有少昊、颛顼、帝喾、帝挚、帝尧和帝舜七帝，加上帝禹（作者将其列入夏朝）是为八帝。又如，王大有先生在其《三皇五帝时代》中，也完整地建立起了八帝世系。所以，我们传统所说的"三皇五帝"应该叫做"四皇八帝"。

表2-4　历史上的六种"五帝"组合

序 五帝组合 持论者

1 黄帝、颛顼、尧、舜、禹 《史记.五帝本纪》，此说影响最大

2 庖牺、神农、黄帝、尧、舜 《战国策.赵策》和《易.系辞下》

3 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 《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和《淮南子.天文训》等

4 少昊、颛顼、喾、尧、舜 西汉末《世经》，《帝王世纪》

5 喾、尧、舜、禹、汤 王莽据董仲舒“三统说”臆改

6 黄帝、少昊、颛顼、喾、尧 南朝梁武帝萧衍排列

西历2000年，国家发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断定，帝禹起于2070年，而禹执政12年，死后伯益摄政3年夏启方得位。故夏启起于西历前2055年。

现在很多书籍，都有"中华文明五千年"之说，从今（如止于2003年）而至夏启共计4058年，加上传统"五帝"之说380年 （18），共计4438年，依此算来远不足5000年。

事实上，夏启以前的"八帝"时期，历史上永远不止于三百余年之一说。《史记正义》说"太史公作《史记》，起黄帝、高阳、高辛、唐尧、虞舜、夏、殷、周、秦，讫于汉武帝天汉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据此推算，"八帝"当历时552年（汉武帝天汉四年即西历前97年）。

再者，《汉书.律历志》记，汉昭帝时，太史令张寿王和"待诏李信治黄帝《调历》，课皆疏阔，又言黄帝至元凤三年六千余馀岁。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杯育治'终始'，言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不与寿王合。" 元凤三年即西历前78年，如按后者推算，"八帝"时期历时1292年；如按前者推算，"八帝"时期历时4000余年。根据董立章的研究，黄帝建国于西历前3701年，按照夏启起于西历前2055年推算，整个八帝时代历时3701-2055=1646年，也在1600年以上。

我们以为，这些计算并不是空穴来风，必然有所依据。显而易见的是，在很多史书中少昊执政84年、颛顼执政78年、帝喾执政70年、尧执政长达98年之久，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一个300-550年的时代，绝不可能仅有五个帝王。但是，我也不相信八帝时期仅仅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按照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夏商周至秦帝国以前"天下共主"加诸侯国的松散宗藩政治形式延续了1834年，从秦帝国开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宗藩政治到清末共计延续了2132年，所以，原始民主下的禅让政治不可能只有几百年的历史进程。

西历1968年，英国学者丹尼尔就在其《最初的文明》一书中，明确提出：文字、城市和复杂的礼仪中心是文明产生的三个要素，且认为三者有其二即可认为文明产生。另有日本学者在1977年提出青铜器、宫殿基址和文字是判断一个文明产生的依据。中国历史学家夏鼐

也认为，文字是文明产生的最重要标志。（19） 对照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文明因素都产生在黄帝时代。

从我国文字的发展起源看，黄帝时代已经产生了文字。许慎《说文解字.序》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世本》曰："仓颉作书。"《韩非子.五蠹》、《淮南子.泰族训》等史书有相同记载。依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按照世界文字发展的历史对比，中国文字的出现应该在甲骨文前三四千年。殷墟甲骨文一般在西历前1300年前后的殷商时期，如果再向前推进3000-3500年，那么，中国文字的出现大约在西历前4300年至4800年之间。事实上，我国的陶文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距今9000-78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7800-7350年之间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距今已有8000年的磁山、裴李岗文化遗址、距今7000左右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距今6000年的宜昌杨家湾遗址等出土的陶文，都说明中国文字的起源相当早。考古学家在陕西西安西郊斗门乡花园村考古遗址发现了比殷墟甲骨文早1200多年的甲骨文，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并且，早在1972年，历史学兼考古学家郭沫若在研究我国陕西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的有刻画符号的陶器和陶片后认为，"彩陶上的那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半坡遗址的年代，距今有6000年左右。我认为，这也就是汉字发展的历史。"（20） 因此说，中国汉字最早出现在黄帝时期（距今6500年），与史书载黄帝史官仓颉创字是吻合的。

我国青铜器出现的时间也很早。《史记.封禅书》载："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管子.地数》也记述了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兼并诸侯的事件。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房址里发现了一块半圆形残铜片和一件铜管。房址的碳14测定年代是在西历前4700年。1975年，在甘肃东乡林家遗址里发现了一柄含锡的青铜刀。遗址属于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该房址的碳14年代为西历前3200年。这铜刀成为我国到目前为止最早的一件青铜器。（21） 马家窑遗址出土的青铜刀在西历前3000年，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

至于城郭的出现，中国历史也有明确的记录。《帝王世纪》曰："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

宇"。《淮南子.原道训》载："黄帝始出，诚邑而居。"并说："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吕氏春秋.君守篇》载："夏鲧作城。"《吴越春秋》也载："鲧作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其它历史文献也有类似记载。据考证，今河北逐鹿县保存下来的黄帝城、蚩尤城和蚩尤三寨便是在仰韶文化早期（距今6500年）用黄土夯筑而成的垒筑（或称板筑）城遗址。另外，湖南澧县古城墙的发掘证实，我国6500多年前已经有了城墙的建造和"城市"的出现。王大有先生说，中国的王城帝都在距今6500年的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时代就已存在，龙山时代已遍布全国各地。

《礼记·礼器》篇载："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举贤而置之，聚众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飨帝于郊。升中于天，而凤皇降，龟龙假；飨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是故圣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意思是说，"圣人"只有能够联合团结各方面的人进行各种礼仪活动，天下才能大治。考古发现，中国在很早的时候，"礼"就是当时社会活动中的十分重要的内容。如山东龙山文化发现的大型蛋壳陶杯，一般壁厚不到5毫米，重不到50克，器型上大下小，重心不稳，这种制作精美的黑陶杯，专家认为并非当时的实用器，而是礼器。再如良渚文化的精美玉器，应当也是礼器。礼器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上"礼"已经为人所重视而普遍实行，上古时代的"礼"已经包含了许多方面的社会政治内容。龙山文化后期的礼器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物化表现，也可谓是早期国家形态的文化表征。

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而我们发现，中国文字、铜器以及城市宫室等代表文明社会产生的主要因素都产生于黄帝时期，所以江林昌博士说："中国文明史，必须追溯到五帝时代。就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所提供的碳14测年数据看，称中华文明史有5000年，实际上是相当谨慎甚至是保守的判断。如果大胆一点，我们可以说，中华文明从公元前4000-前3500年就开始了，离我们现在已有5500年甚至是6000年了。"（22） 江博士的结论是一个伟大的具有实质性的进步，因为他实际上根本否定了传统的"五帝"时代是完全的神化时代以及只有300-500年时间的错误判断。但是，江博士的结论仍然是保守了，因为他的结论比王大有先生的结论少了整整500年。王大有先生明

确提出："黄帝族于距今6500年左右，打败了炎夷联军，建立了以黄帝王族为中心的、庞大的非血亲集团的、早期国族松散联盟的宗法制国家，开始了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玉兵时代。"（23）

根据王大有先生的研究成果，从黄帝到帝禹，包括了太昊、颛顼、帝喾、帝挚、帝尧和帝舜在内的八个帝族（详情参阅见王大有著《三皇五帝时代》，王大有先生推断夏启即位在2070年，这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结论相差15年。这里从后者）。表2-5便是按照王大有先生的结论推算的"八帝时代"纪年时序表（已扣减15年）。根据这些推断，黄帝创世纪建国应该在西历前4497年，整个八帝时代共计历时2442年。

表2-5　中国禅让政治时代-八帝时代（王大有断代）（24）

帝族 起迄年[西历前] 持续世代 持续时间[年] 董立章断代[1]

1.黄帝 4497-4038 15世 460 3701-3302

2.少昊 4037-3775 7世 263 3301-2902

3.颛顼 3774-3353 12世 442 2901-2556

4.帝喾 3352-2785 21世 549 2555-2256

5.帝挚 2784-2343 17世 442 2255-2247

6.帝尧 2342-2114 6世 229 2246-2174

7.帝舜 2113-2071 2世 43 2173-2146

8.帝禹 2070-2056 1世 15 2145-2130

有的读者肯定会对王大有先生提供的时间序列表示怀疑，我也有同感。但比起那些把尧舜在位时间定为80-100年间来，我更相信王大有先生的研究成果。王大有先生的结论来自大量的考古资料以及对史

籍（包括神化）的剖析，特别是对文字以及图画的独特研究，他断定夏启始于西历前2070年，而国家夏商周工程确认夏禹始于西历前2070年，两者仅相差15年，这是第一。第二，王大有先生提供的"八帝"年代世系，确立了中华国家文明史具有6500年历史，这与中国史学界以考古、天文、史学、地理等科学为基础的逐步推进所产生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这个差距仅在几百年之内。第三，现在很多史学家都相信历史所记载的，我国在黄帝时期已经开始用甲子纪年了。我们用六十甲子循环从西历前841年（我国有准确纪年的开始年）开始往前推，到黄帝建国的次年正好是六十甲子首甲第一年--"甲子"年，即西历前4497年。黄帝建国年，由帝师大桡创制甲子纪年历法，于次年开始"甲子"纪年，于情于理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们惊奇的是，这种推导与王大有先生结论的巧合。第四，从对国家起源问题的论证，也已证实黄帝是中国国家文明的创世纪人物。很多考古证据和天文推断都在逐步证明，中国传统的所谓"五帝"时代是神化时代的判断是错误的。第五，西方天体物理学家，通过对《尧典》的研究，明确断定："《尧典》记叙的时代确实是公元前2200前后的时代。""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以前，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既相信作为一个上古的文件《尧典》的真实性，又相信它意图叙述的人和事两方面的史实性。"（25） 这个结果与中国考古和历史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并与王大有先生帝尧时代在西历前2342-2114年之间是完全吻合的。事实表明，中国的所谓神化传说很多都是中国信史的重要线索。所以，王大有先生把黄帝作为中国"创世纪"人物的定位以及"八帝"时代的演进世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信的。

故此，本书从其说，如有后来者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王大有先生结论的偏差，自然有责任予以纠正。

这么一来，从黄帝创世纪建国到西历2003年，我中华历史已经堂堂经历了整整65个世纪，即中国历史已经经历了6个千年又500年，而我们今天正处在中历第7个千年的中间，刚刚结束上半叶、走进下半叶，踏入中历第66世纪。

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国历史有"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26） 其中"两千

年"应起自秦始皇时代，"五千年"起自黄帝时代（实际是6500年），"上万年"起自伏羲时代，"超百万年"起自中国早期猿人时代。

在我们完全确立"中国国家政治从黄帝建立轩辕国开始"并已经经历了整整6500年的历史观念以后，我们必须依据现存的历史记载和考古成就，对黄帝建国及其所开创的整个"八帝时代"做出更为仔细的探究。

《史记.五帝本纪》说：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

此记载明确记录了中国从黄帝战胜蚩尤，升为"天子"开始，建立国家政治统治的史实。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国家政治统治所应具备的各种"工具"，如国号、军队、管理机构等等。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国家是以一种与全体固定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对于公民，这种公共权力起初只不过当作警察来使用，警察是和国家一样古老的。"（27） 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是一种典型的国家行为。再说，没有臣民，哪来首领？没有大众，哪来军队？可见，从黄帝开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治统治时代开始了。我们以为，《史记》的作者把黄帝作为中国文明史的开端，不但具有不平凡的史识，而且有其明确的用意，他绝不会刻意造假，以误后人。至于司马迁笔下只有"五帝"，从其所列相互矛盾而不能自圆其说的五帝世系可以看出，恐怕真是资料不足而引起的讹传。

苏秉琦教授在"白氏通史"第二卷的序言中也有明确的说明：

《尧典》中谈到那时除帝尧、帝舜外，还有由四岳、十二牧（或曰群牧）组成的贵族议事会；有以司空为首的包括司徒、后稷、士（类似后之司寇）、工（百工）、虞、秩宗、典乐、纳言等部门官员的行政组织；有刑法（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有军队并有显赫的战功。这已经

是一种雏形的国家了。当然，《尧典》系后人追述，难免有记不准确而把作者当时的某些情况附丽增饰进去的地方，但也不会是向壁虚构。只要看看龙山时代已有很大的城（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城内面积就达20多万平方米），就知当时一定有了城乡的分化，有了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28）

自西历20世纪初以来，有关国家、政治或者战争的理论，也能说明：黄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战争方式取得统治地位，并创立了中国国家政治体系。

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说："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在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29） 德国（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30） 原苏维埃联盟的缔造者列宁也说："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某个国家即该国某个阶级在战时所推行的政治，必然是而且一定是它战前长时期在国内所推行的政治的继续，只不过在行动方式上有所不同罢了。"（31）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这是体现战争与政治二者相互关系的最好说明。

同时，"政治"与"国家"似乎是一对孪生的两个词。我国古代"政治"是"治国之道。"在西方，"政治"源自古希腊语Polis，即城邦和城市国家的意思。列宁又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32） "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33） "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物，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34）

这些说法，是后人对战争及相关概念的总结。虽然，它们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和不足（第一，对于统治阶级而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战争则仅仅是政治的开始。黄帝的战争是中国所有战争和政治的开始，以后改朝换代的战争同样是另一种政治的开始。第二，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民族和民族、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的战争则不是必然的，而且这两种战争往往也是最愚蠢的。因为这两种战争往往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其对国家带来的损害是无穷的。第三，战争往往是一种政治制度或者政治形态的开始，而不完全是以往政治制度的继续。中国

历史上，黄帝、夏启、秦始皇、杨坚、忽必烈和孙中山在中国都是开创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这些主要人物进行的战争开创了一个新的政治时代），但是，有关战争、阶级、民族、国家、政治等一系列国家政治的概念，说明在由战争取得统治地位的黄帝时代中国政治形态就已经正式产生了。

《商君书.画策》说：

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

其中所谓"义"，如《韩非子.解老》所说："义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谓其宜也。"就是说，义是调剂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以及人与人的等级差别和名分。其中所谓"礼"，亦如《韩非子.解老》所说："礼者，所以貌情也，群义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也。"就是说，礼是各种人际关系的制度，君臣父子关系的准则，是用以反映贵与贱、贤与不肖的一种手段。可见，黄帝不但建立了国家，而且还为中华文明奠定了直接的文化基础。

从黄帝开始的八帝时期，是中华文明的大发展时期，种植、文字、医药、造船、历法……等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多发明创造，这些发明创造都很有代表意义。但从国家政治意义上，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历史贡献在于，创立了禅让制度。《尚书.尧典》记述帝尧的话说：

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明明扬侧陋。

这是禅让制度的最早记录。但是，实行禅让制度而有帝位至少应从少昊、颛顼时代开始。

所谓禅让制就是先由各方推举，经过考核，然后摄政，待先帝逝去三年后，再接帝位的制度。其中禅，就是先定的接位者直接即位；让，就是先定的接位者让贤，由他人接位。《史记.五帝本纪》和《尚书》提供的史实表明，到帝舜时，国家的各种机构都系统而完备地建立起来了。舜举用22人治理国家，分掌教育、农事、工程、司法、典礼、天文等，还建立了三年一次的考核制度，军队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就更不用说了。也就是说，由黄帝草创的国家，到尧舜禹时代已经至臻完备了。

在八帝时期，中国国家文明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实行禅让制度

根据《史记.五帝本纪》提供的禅让政治世系图，禅让制度具有前后一贯的连续性（其世系代数矛盾另当别论）。虽然《尚书》记载，在尧舜时期才有禅让制度，但并没有说明禅让制度是创始于尧舜时期。据王大有先生的论证，禅让制度最早开始于少昊、颛顼之间。不过，不管禅让制度产生于少昊、颛顼、帝喾或是尧帝，这个制度本身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历史意义。因此，我们把从黄帝开始到帝禹这段时间，作为禅让政治时期，并无大谬。再则，"如果承认在人类历史上，领袖人物的产生按是否有法定继承人来划分，存在过两种模式，那么就可以推断'禅让'是普遍见于初民社会以至整个五帝时代的一种制度。尧舜禅让的故事和'夏传子、家天下'之说所以在历史上广泛流传，是因为他们正处于两种继承制的交替时代，分别作为两种继承制的标志而传诸后代的。"（35）

第二、天下太平和睦

大历史学家司马迁记述说：黄帝时，"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有土德之瑞。"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治气以教化，.....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高辛，"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伪，惠而信，修身以天下服；取地之材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帝尧，"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帝舜，"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36）帝禹，"闻善言则拜。"（37）

第三、征服和利用自然

黄帝建国以后，虽然已进入具有国家形式的政治统治中，但他的国家刚刚脱胎于古国，技术、文化等必要的知识还需在劳动中继续创造。因此，他们的主要政治生活就是对自然界的不断斗争。在中国早期的历史典籍之中，有大量关于中华先民与自然和灾害作斗争的情形，其中《孟子.滕文公》生动简述了尧、舜、禹治山治水过程：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与天下；草木田易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与中国。尧独忧

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

第四、基础文明迅速发展

在黄帝以前，各种创造发明已经有很多了，如很早的火的获取以及五谷、耜、陶、医术、音乐、日市、婚姻等等，所有这些都已经成为中华原始社会末期及至八帝时代前夜的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黄帝时代，来源于生活与实践的发明创造，更是层出不穷。传说养蚕、舟车、文字、音律、医学、算数、历法等发明都出自黄帝时期，有些还是黄帝本人所创。这个开启中国文明的大创造时期一直持续到夏朝。如"奚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大桡作甲子，黔如作虏首，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虞锶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38）"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黄帝之史，沮诵、仓颉，睎彼鸟迹，始作书契。"（39）"伶伦作律"（40）。黄帝妻子嫘祖还发明养蚕治丝方法等等。台湾著名学者陈致平先生在其10卷本《中国通史》中说："黄帝那个时代，我们的祖先可能已经有了干支纪时，已经有了房屋与衣裳，已经有了交通工具，已经有了木器与陶器，已经有了弓矢干戈，已经有了货币与交易。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时候已经有了蚕丝与文字。……在那个时代是我们一切生活文明的一个开端时代，在那个时代我们祖先已经有了一个民族国家的意识了。"

中国的历法产生也很早。"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叟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41）"《月令章句》：'大桡探五行之情，占斗纲所建，于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谓之干，作子丑以名月，谓之枝，枝干相配，以成六旬。'"（42）到帝尧时期，《尚书.尧典》就明确记载了远古"期，三百有六旬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中国历法。可见，黄帝时代，算术、文字、历法等知识都有相当的水平。

第五、在斗争中成长

我们知道，黄帝是通过战争创建国家的。以后，黄帝兼并和统一中原地区部族集团而成为最大的方国。很显然，在八帝时代，华夏方国的周边地区，仍然存在着许多原始部落、古国或者小方国。有的在交往中并入华夏族；有的在交往中吸收先进文化，也在向更先进的文明迈进，如东夷部族、南苗等等；同时也还有一些落后的部族，如有扈、屈骜等等。到八帝时代后期，一些长期落后的部族，便遭到华夏方国的攻伐。《吕氏春秋.恃君览》记载："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这样，八帝时代通过攻伐和"流宥"政策，使周边部族和古国逐步减少，其控制地域也逐步扩大，遍及江河中下游大部分地区，逐步形成了一个巨大而统一的并且一开始就是由多部族（以后发展成为民族）构成的大国。

---

（1）白寿彝，《中国通史》，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第158页。

（2）白寿彝，《中国通史》，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第199、200-202、202、204、205页。

（3）阿西莫夫、怀特，梁鸿鹰等译，《诠释人类万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33页。

（4）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123页。

（5）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8页。

（6）潘其风、朝康信，《我国新时期时代居民种系分布研究》。——原注。

（7）蒙古人种亦称“黄种人”、“亚美人种”。世界三大人种（蒙古人种、尼格罗人种、欧罗巴人种）之一。主要分布于中国、朝鲜、日本、西伯利亚、中南半岛、美洲和北极地区。在三大人种中，蒙古种人口最多，分布最广。——原注。

（8）文怀沙、邵盈午，《中华根与本——宝学概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0页。

（9）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一版，第170-171页。

（10）王大有，《三皇五帝时代》，上册，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129页。

（1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一版，第160页。

（12）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一版，第6页。

（13）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28页。

（14）王大有，《三皇五帝时代》，上册，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129页。

（15）王大有，《上古中华文明》，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257页。

（16）《汉书.律历志》。

**（17）参见吴国桢著，陈博译，《中国的传统》，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二章“从黄帝到尧舜”。**

（18）王大渭主编，《图说中华通史》，第10卷，九洲图书出版社，1999年版。

（19）江林昌，《夏商周文明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2越第一版，第14页。

（20）郭沫若，《中国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转引自江林昌《夏商周文明新探》2001年浙江版。

（21）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转引自江林昌《夏商周文明新探》2001年浙江版。

（22）江林昌，《夏商周文明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47页。

（23）王大有，《上古中华文明》，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36页。

（24）董立章，《三皇五帝史断代》，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401页。

（25） 吴国桢著，陈博译，《中国的传统》，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81页。

（26）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一版，第176页。

（2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91、114页。

（28）白寿彝，《中国通史》，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序言第19-20页。

（2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二版，第171页。

（30）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上卷，解放军出版社，1964年第一版，第30页。

（31）《列宁选集》，第3卷，第71-72页。

（32）《列宁选集》，第4卷，第370页。
（33）《列宁选集》，第2卷，第454页。
（34）《列宁文稿》，第2卷，第407页。
（35）李学勤 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214页。
（36）《史记.五帝本纪》。
（37）《孟子.公孙丑章句》。
（38）《吕氏春秋.审分览》。
（39）《晋书.列传第六》。
（40）《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
（41）《史记.历书》《索隐》。
（42）《后汉书.律历志》注释。

**********

## 第三节　世袭政治时代：第24-65世纪

中国世袭政治时代，按照西历记述，在前2055-西历1911年之间，合黄帝创世纪后的第24-65世纪。

帝王世袭政治时期从夏启建立夏朝直到西历1911年孙中山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共计3966年的历史。

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把国家政体分为共和、君主和专制三种。并认为："共和政体的性质是：人民全体或者某些家族，在

那里握有最高的权力；君主政体的性质是：君主在那里握有最高权力，但是他依据既成的法律行使这一权力；专制政体的性质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依据他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在那里治国。"（1）中国历史学中，大都把从夏朝到1911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专制政体的历史。实际上，在中国世袭政治时期，当国君依照法律行使权力时，政体趋向于君主政体，国家趋于昌盛，国力强大；当国君抛开法律，视法律为无用，以他的个人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行使权力时，政体趋向于专制政体，君权趋于泛滥，国势衰弱。因此，中国从夏朝到1911年的历史，不能概而言之为"专制政体"，当然也不能以"君主政体"总视之。之所以中国古代政治有这么个独特特点，是因为中国有一个"世袭君权+仕人政府+民本政治思想"的特殊政治构架。一方面，由世袭君权决定的家族排它性使这种政治形式具有政治行为的隐蔽性，从而使中国传统政治背上了两个"美名"：一曰专制主义，一曰神秘主义；另一方面，在尚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仕人政府和源自八帝时代的民本政治思想又使中国传统政治不能归之为孟德斯鸠三种政治形态的其中之一。

所以，中国传统的政治形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的政治构架：实体上是"宗藩政治体系"，意识形态上是"世袭君权+仕人政府+民本政治思想"。本书为了避免各种认识的混乱，作者把中国从夏朝到西历1911年的历史通称为"世袭政治时代"。又因为，中国世袭政治体制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体系，所以，中国的世袭政治又可以称为宗法政治。

前面讲过，中国历史在帝王世袭政治时期，包括四个时代，即夏商周时代、秦汉晋时代、隋唐宋时代和元明清时代。这四个时代的主要事件及其历史发展变化特点见表2-6。

这四个循环时代是根据中国历史循环发展特点和对"统一"概念的重新认识所提出来的。所谓中国"统一"，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天下共主"即宗藩政治体系下多民族的统一。

首先，"统一"是一个政权概念，"统一是国家主权和最高行政权力的集中"（2），没有一个能集中全国主要政权力量的政府，不能算作统一。当然，历史上中国与藩属部落或者附属邦国的政治体系，也是中国历史政治统一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政治体系，在八帝时代宽松

的政治环境中逐步发展，随着"天下共主"的夏朝的建立，这种政治体系也就随之形成，一贯而至清朝结束而结束。

表2-6　中国世袭（含政党）政治四个循环时期的统一与分裂

循环 历史朝代 起迄时间[西历] 续年 占当期% 统一 备 注

第一循环代[共1834年] 夏 前2055-前1600 455 25% 259 夏启创始世袭传子制度

商 前1600-前1046 554 30% 551

周 前1046-前771 276 15% 269 指西周

动乱与分裂 [共547年] [1]前770-前476 295 16% 春秋时期

[2]前475-前222 254 14% 战国时期

第二循环代[共802年] 秦 前221-前206 15 2% 12 秦始皇建立统一中央集权体系

汉 前205-220 426 53% 274

晋 265-316 51 6% 21 指西晋

动乱与分裂 [共205年] [1]221-265 44 6% 三国时期

[2]317-581 264 33% 东晋16国、南北朝时期

第三循环代[共690年] 隋 581-816 37 6% 27 隋文帝创立“三省六部”制度

唐 618-907 289 42% 227

宋 960-1127 167 24% 152 指北宋

动乱与分裂 [共193年] [1]908-959 51 7% 五代十国时期

[2]1128-1270 142 21% 南宋、夏、辽、金、蒙等纷争

第四循环代[共732年] 元 1271-1368 97 13% 73 元世祖建立全国统一行省制度

明 1368-1644 276 38% 253

清 1644-1796 152 21% 113 指前清

动乱与分裂 [共207年] [1]1796-1911 115 16% 后清，内忧外患时期
[2]1912-2003 88 12% 政党纷争、陆台分治时期

其次，"统一"是一个地理概念，它必须囊括一定的地理范围，在中国，这个地理范围就是古代所谓的"天下"，即中国传统地理范围。在中华传统地理范围内，完全的地理统一或者在宗藩政治体系下的地理范围同样具有统一特性。需要说明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地理范围（不包括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方国或者部落所据地域）应是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的最核心部分，是中国国家历史地理的根源和基础。因此，秦始皇版图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本部"（此称谓欠妥）。历史发展表明，中国历史上，凡能全面占据或者超过秦始皇版图者，大都具有统一特性，否则就是一个分裂政权。不过，面积超过而未占据秦始皇版图者，不能算为一中央王国政权，如历史上的匈奴、鲜卑、北魏、回纥、突厥、吐蕃、辽、金、蒙古帝国（非元朝）等，它们虽然面积接近甚至超过了秦始皇版图，但它们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央王国政权，而只能是藩属国或者分裂政权。

第三，"统一"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概念。直至西历21世纪的今天，任何国家都有一个主体民族团体，这个国家往往以这个民族的文化作为背景。中国的主体民族是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所以，中国的统一不仅仅是汉民族的统一，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统一。但是，由于中国历史上宗藩政治体系的特殊性，一个中央王国与多民族藩属或者分裂政权的组合体系，往往是中国统一的主要模式。

第四，"统一"还是一个稳定性概念。一个战乱不止、内战和边战不断、发生全局性动乱的政权无所谓统一。

由此，所谓"统一"是一个包含政权、地理、民族共同体和稳定性在内的综合性概念。认识中国的统一特性，就必须从四个方面去把握。

时至今天，由于认识"统一"概念的差异以及中国历史朝代循环发展特点和分裂状态下的多政权、多民族的存在，往往使人们混淆对中

国历史本质的认识。黄仁宇、许倬云先生和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不约而同地提出的中国历史由第一帝国（秦汉）、第二帝国（隋唐）和第三帝国（明清）构成的理论，虽有独到之处，但不全面系统。历史学家葛剑雄先生说得好："中国的历史不应该只是朝代的历史，更不应该只是中原王朝或汉族王朝的历史。我们应该站在今天的、中华民族的、客观的立场上看待历史上的一切政权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囿于封建的、正统的、汉族的观念。" （3）因此，站在历史角度，在中华民族内部，民族没有内外之别，政权没有正僭之分。不论是多数的汉族政权还是少数的少数民族政权，不论是统一的全国政权还是孤立的、地方的或者局部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状态及其独特特点的历史观，才是正确的中国历史观。由此，本书提出了中国世袭政治时期四个循环阶段理论。

**关于中国世袭政治时期四个循环阶段的划分本书第一章已经讲过。如果我们进一步对中国世袭政治的四个循环时期进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中国历史独特的发展规律。表2-6是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和合分过程以及各朝代的大一统特性设计的，如果我们用百分比（%）来表示四个循环时代所反映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时间结构，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中国世袭政治时期的分阶段循环发展历程如图2-7。通过对这两个图表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以下几个中国历史的循环发展规律。**

图2-3 中国世袭政治时期分段结构

第一，开创朝代名声显赫

代表每个时代开始的朝代：夏、秦、隋、元都有一个名声显赫的"身世"。夏朝源自万世称颂的尧舜禹时代，秦朝源自战国七雄中最大的一"雄"--秦王国，隋朝源自迅速强大的北周帝国，元朝源自具有"世界帝国"之称的蒙古帝国。尧舜禹时代、秦王国和蒙古帝国在中国历史上都是赫赫有名的，唯独北周不为大众所注意。其实，北周也是一个在明主治下迅速崛起的强大帝国。

北周立国于西历557年，西历560年具有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家周武帝（宇文邕,560-578在位）即位。572年他计杀控权乱政的大臣宇文护，实现亲政，开始励精图治，实行多方面的改革。首先，他放免战俘和奴隶，解放生产力；其次，精心策划，坚决地消灭了大行于南北朝的佛教，"民役稍稀"，"兵师日盛"；第三，强化中央集权，果断打击世族和豪族，广辟农田，兴修水利，国家经济迅速恢复；第四，改革府兵制，加强军队建设，于577年消灭北齐，统一北方。可惜的是，就在周武帝准备"平突厥，定江南"，实现全国统一的战略目标时，不

幸病逝，年仅35岁。周武帝死后1年，重臣杨坚篡夺了北周军政大权，并继续推行改革。随后，杨氏在短短10年内，平定北周旧臣尉迟迥、司马消难等人的拥兵反抗、灭后梁、灭陈朝，实现了全国统一，可见北周的殷实和强大。

当然，杨坚本人也是一个更胜于周武帝的英明的政治家，可以说他依靠强大的北周，成功地完成了周武帝的未竟事业。

作为一个大历史循环时代的启始朝代，夏、秦、隋、元他们之间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就是说它们在中国每个循环时代的开始时期所处的地位是极其相似的。其中，特别是秦和隋的历史，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在中国历史上，秦汉和隋唐极其相似。秦与隋都是完成统一的王朝，但又都是短命的。更巧的是，两个朝代都只有两代帝王。完成统一的国君（秦始皇和隋文帝）都是有才干的，政绩亦佳，然而继位的（秦二世和隋炀帝）都是昏庸之辈，短短的几年便激起人民的造反，从而断送江山。还有，这两个短命的王朝虽然昙花一现，但在典章制度方面都有过重大贡献。汉承秦制已是史家的共识，唐承隋制亦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这两个短命王朝之后，都是极其强盛的帝国，且分别出现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历史景观。更为奇特的是，这两个帝国都是四百余年的天下。（4）

根据台湾史家柏杨的发现，"任何王朝政权，当它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或当它传位到第二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5） 秦、隋两朝和其它没有形成大一统帝国的朝代一样，就是没有通过起瓶颈时期而夭折。这又是它们的一个共同点。

第二，一循环三大朝代

在中国四个大历史循环期中，每个循环时代均有三个大的统一朝代，并且三个大一统朝代由一个创始朝代和两个强盛朝代组成。三个大一统朝代中，创始朝代虽有统一天下的名声，但却历时短暂(夏朝虽然延续455年，但比起550多年的商朝短得多了)；接着，第二个朝代最强、疆土最大、时间最长、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明最发达；第三个朝代次之。

第二个大一统朝代比创始朝代延续的时间要长得多，有人认为是因为农民起义后所建立起来的朝代寿命比分裂割据状态下统一起来的

朝代要长 。（6）商、周；汉、唐；明、清等长寿命皇朝都是农民起义后建立起来的，而秦、隋、元都是在分裂割据状态下统一起来的。似乎很有道理。成吉思汗时期，虽然有一个世界性的蒙古大帝国，但在中国传统铖钟历史地理区域内，南宋及大理政权依然存在。并且其后期，已经开始分化和收缩。到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期，由于连年征战，国力衰弱，其国家势力范围已完全退缩在铖钟历史地理区域内。因此，比之后起的明、清两朝，元朝实在太短暂了，仅存续了97年。

有历史巧合趣味的是，每个循环中最强大的朝代，即商、汉、唐、明四代，在中期都有过波折，使每个朝代的发展历史自然形成两个阶段。并且，很奇特的是，每朝前半段都政治称治，国家强盛，后半段又都不约而同地在不断的政变或者内乱中衰弱了。商朝的盘庚迁殷、汉朝的王莽篡政、唐朝的安史之乱以及明朝的瓦剌围京，是造成大一统朝代波折的直接原因。这些事件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起因于内乱。盘庚迁殷，主要是迫于"（诸）弟子或争相代立"已有"九世乱"的王室内部斗争压力，王莽则以宠臣篡位，安史之乱起于内政腐败，瓦剌是中国北方蒙古族一部，冲明朝宦官擅权乱政而起兵为乱。二是政变结果没有打破大一统格局。盘庚迁殷"结束了九世之乱"，巩固了商朝政权。安史之乱虽遍及北方，逼走唐明皇，但最终被唐朝军队于七年后彻底消灭。瓦剌虽然一度俘虏了明英宗朱祁镇，围攻北京，但最终还是败北，英宗复国。就是更改国号的新莽，她最初虽以改革者的身份出现，但最后也都只存在了15年而复归于汉。

表2-7　商汉唐明四朝中期政变

朝代 起讫年份 前半截 中期政变事件 后半截

商 前1600-前1046

[554年] 前商

[前1600-前1300] 盘庚迁殷

[前1300] 殷商

[前1300-前1046]

汉 前206-前220
[426年] 西汉
[前206-9] 王莽篡政
[9-25] 东汉
[25-220]
唐 618-907
[289年] 前唐
[618-755] 安史之乱
[755] 后唐
[755-907]
明 1368-1644
[276年] 前明
[1368-1449] 瓦剌围京
[1449] 后明
[1450-1644]

第三，大一统占中国历史的主流

处于每个循环期第二阶段的最强盛朝代：商、汉、唐和明四个朝代共计历时1545年，占世袭政治时期全部时间的39%；处于每个循环时代第二个统一的强盛朝代：西周、西晋、北宋和前清四朝代次之，共计历时646年，占16%；在四个大循环期中12个大一统朝代，共计历时2795年，占全部世袭政治时代历史时间（3966年）的70.47%，动乱和分裂时间仅占29.53%。分裂与统一是三七开。

这是按照一般历史朝代更替时间进行统计计算的。如果按照前面提出的"统一"概念去严格区别，虽然中国历史的"统一"时间缩短，但统一仍然是主流。下面对12个大一统朝代的统一时间作分别说明。

夏朝：是中国"天下共主"（中央王国）加诸侯国政治形式的开始。夏朝第一任君主夏王姒启建国以后，曾大会诸侯于均台（今河南

禹县至许昌之间）。夏朝历史上，有扈氏不服，平之；有穷氏为乱，定之。可见，那时的中国式的宗藩政治体系已经形成。不过，夏启以后，太康失国，寒浞篡夏，至少康复国混乱了82年。夏朝中期以后，从孔甲无道开始政衰，诸侯纷纷叛夏，又混乱了114年而最终灭国。故此，终夏一朝，真正统一时间只有259年。

商朝：商汤（天乙）是中国第一个政治革命者，他于夏后期先后征服葛伯、洛、荆伯、韦、顾、昆吾等诸侯国，凡"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于西历前1600年灭夏建国。商经31世至帝辛（姬纣），中间虽不平稳，但未尝失国。西历前1049年周武王（姬发）大会诸侯于孟津，三年后灭商。故商朝统一时间为551年。

西周：西历前1040年摄政周公姬旦平武庚和管叔、蔡叔之叛，西周实现完全统一。西周后期，边族犬戎、严狁、姜戎、徐戎、淮夷、荆蛮等内扰，国家负担加重。后周幽王（姬宫涅）无道，宠褒姒废申后，申后便联犬戎杀幽王，西周灭亡，时年西历前771年。西周共计统一269年。

秦：秦始皇（嬴政）26年（前221年），秦灭六国中的最后一国--齐国，实现全国统一。后来，秦征南越，服岭南，开疆拓土，为中国奠定了核心版图。秦二世元年（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同年刘邦、项梁、项羽起兵，过3年而秦灭。故秦统一了12年。

汉：汉武帝（刘彻）元封元年（前110年）灭南越和东越藩国，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新莽天凤4年（西历17年），吕母、王匡、王凤、马武、王常纷纷起义，国家大乱，失却统一局面。到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13年（西历37年），渐次扫灭群雄，复归统一。到汉灵帝（刘宏）光和6年（183年），黄巾起义爆发，第二年引发全局动乱而致分裂。总汉一代，共计统一274年。

西晋：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280年）灭东吴，国家实现一统，至晋惠帝（司马衷）永宁元年（301）年由"八王之乱"而引发天下大混战，西晋只实现全国统一21年。

隋：隋文帝（杨坚）开皇9年（589年）灭陈，标志着动乱与分裂288年的中国又重新实现统一。至大业12年（616年），隋炀帝（杨广）游幸江都，翟让、李密起兵叛隋，天下大乱，隋朝实现统一27年。

唐：唐高祖（李渊）建德7年（624年），唐军平定江南，突厥入寇为盟而去，中国再度实现统一。唐中期经8年"安史之乱"（755-763），唐朝由盛转衰，虽然藩镇割据，但仍奉唐为帝，并未裂居而王。吐蕃西来，进占川西、甘南部分地区，南诏西南一角，也未彻底动摇唐朝的中央王国地位。不过，自唐宣宗（李忱）大中13年（859），南诏王世龙称帝，并进占播州（今贵州遵义）、南陷安南后，西南大片独立，第二年浙东裘甫起事，内地纷乱聚起，唐朝就此崩乱而亡了。据此计算，终唐一朝，其统一计有227年。

北宋：北宋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朝代，她于西历960年立国，宋太祖（赵匡胤）开宝8年（975）灭南唐李氏，实现全国统一。终北宋一代，东北先后有辽、金，西南有大理，西北后有西夏。但北宋仍不失为一个大一统朝代的特性。这个时代是大发明时代，中国四大发明中有三项：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都产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人才辈出的大时代，中国历史上许多鼎鼎大名的人物都出现在这个朝代，如王安石、范仲淹、赵普、寇准、包拯、欧阳修、三苏、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沈扩、苏颂、李械、柳永、周邦彦、毕升等等；这个时代是经济文化大繁荣的时代，历史学家吕振羽在其《中国历史讲稿》曾明确指出：宋代"处于世界最先进的地位，对世界人类的进步贡献最大。"（7）英国学者、《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也曾说过："每当人们研究中国文献中科学技术或技术史的任何特定问题时，总会发现宋代是主要的关键所在。"日本学者據薮内清在其所著《中国.科学.文明》一书中也说：

北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儒学方面兴起了后来被称作宋学或朱子学的新儒学；文化方面，在古文复兴的同时，口语文学也兴盛起来；印刷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且发行的书籍不仅仅是儒教经典，还有历史书、诗文集等。在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科学书籍的出版发行。可以说，自古以来没有像北宋皇帝那样重视医学的。……总之，在这个文化发达的历史潮流中，有许多惊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认为，北宋时代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以至近代相比。（8）

北宋还被20世纪末的美国人誉为人类第二个千年的"领头羊"。

同时，从地域角度看，北宋仍拥有黄河流域及其以南至海的广大地区（与秦始皇版图略同），她仍拥有中国中央王国的核心地域，大理偏居为一藩国。宋钦宗（赵桓）靖康2年（1127）金攻入都城灭北宋以后，南宋的地域就退缩到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地域大大缩小，成偏安格局。由此计算，北宋统一了152年。

我们从署名赵无眼的"中国历代王朝大排名"的网文中，也可以发现宋朝在后九大统一朝代当中排名并不在靠后位置（详见表2-8），九大朝排在第四。

表2-8　中国历代王朝排名

指标 主要内容 秦 汉 晋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计

1.疆域 范围大小 8 4 6 7 3 9 2 5 1 45

2.国祚 延续时间长短 9 1 7 8 3 5 6 4 2 45

3.军事 征讨、防御、平乱能力 7 4 9 6 3 8 1 5 2 45

4.皇帝 好坏能力,坏者后之 8 2 9 5 3 4 7 6 1 45

5.摄政 摄政者好坏能力 9 3 8 6 2 4 7 5 1 45

6.治世 安定与富足情况 8 2 9 6 3 4 7 5 1 45

7.变乱 变乱情况,乱者后之 8 3 9 7 5 2 6 4 1 45

8.纲纪 法纪秩序 8 4 9 6 5 2 7 3 1 45

9.宫廷 规模与用度,大者后之 7 4 8 6 5 1 3 9 2 45

10.效能 政府效率与能力 2 6 8 4 5 7 3 9 1 45

11.人口 总量与净增长 8 7 9 6 5 2 4 3 1 45

12.民生 农民承平与离乱状况 9 4 8 6 3 5 7 2 1 45

13.民族 国家内部民族关系 8 2 7 4 3 6 9 5 1 45

14.文化 科技文化教育制度等 6 5 9 7 4 2 8 3 1 45

15.结局 王朝下场及结局状况 9 3 5 7 8 4 2 6 1 45

排名总分 114 54 120 91 60 65 79 74 18 675

合计 最终排名 8 2 9 7 3 4 6 5 1 45

三大历史时期排名 288 216 171 675

元：元世祖（忽必烈）至元16年（1279）灭南宋，完成统一。元惠宗（孛儿只斤.妥欢帖睦尔）至正11年（1351），刘福通、徐寿辉起义，第二年全国大乱而纷纷格局，元代统一结束。有元一代共计统一73年。

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15年（1382），灭梁王巴匝剌瓦尔密，平定云南，完成全国统一。明思宗（朱由检）崇祯8年（1635），农民起义军13家72营几十万人会师荥阳，加之东北后金皇太极寇关要紧，全国统一局面破裂。有明一代完整统一253年。

清：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康熙20年平定三藩，22年（1683）清兵攻入澎湖，进入台湾，郑克爽政权投降，清朝实现全国统一。清朝完整的统治，一般认为可延续到鸦片战争前夕，而实际上，自清仁宗嘉庆皇帝即位（1796）起，全国民变四起，各种起义不断，环中国东西南北四周，西方列强陈兵国门，内乱和外患迭起。因此，可以把嘉庆帝即位年作为清朝大统局面的结束（这也是前清与后清的分界点）。由此，有清一代共计统一113年。

综前所计，12大统朝代的实际完整统一共计2231年，占全部世袭政治时期（截止1911年）的56.25%。即使不含夏商周三代数据，后9个大统朝代的完整统一共计1152年，占秦始皇以来止于1911年的世袭政治时期54.06%，占秦始皇以来止于2003年共计2224年间的51.8%。可是我们不要忘了，按照中国宗藩政治体系的传统统一观念，那些动乱时期的大一统朝代以及东周、后清等在当时中国的"中央王国"地位是毋庸质疑的，而这些我们都未计算在严格的统一时间之内。

可见，中国历史的大一统时间比分裂动乱的时间要长，大一统为中国历史主流。历史学家启良说："中国文明模式的内在特质亦决定了历史必是波浪式的发展，分与合必是一种周期性的运动。但是我还必须强调的是，虽然'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暗含着中国文明之路的必然性，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分与合可以平分秋色，可以等量视之。我的基本看法是，'合'是中国文明的主流，或曰正题；'分'只是其歧出，或曰

反题。'分'虽是中国文明的题中之义，亦为它的存在方式之一，但却同中国文明精神是相悖离的。"（9）

我的这个结论与葛剑雄先生的结论有所不同，据其"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余论"一文结论，他认为从西历前221年至1998年这2219年间，952年的统一阶段占43%。如果算迄清朝结束的1911年，统一阶段占45%。"无论如何，统一的时间都比分裂的时间短"。（10） 我和他的主要区别是，北宋和755年"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他全部作为分裂时期，清朝的统一他计算到1850年，其余统一与分裂的起迄时间部分完全相同，部分略有出入。这里，仅存此一说，供有兴趣者一阅。

第四，一循环两动乱

仔细分析中国四大历史时期，我们发现，每个循环时代的第二个统一的强盛朝代：周、晋、宋和清四朝代无一例外地分为两节，周分为西周和东周，晋分为西晋和东晋，宋分为北宋和南宋，清分为前清和后清（详见后面分析），并且具有大一统特性的都是前半节：西周、西晋、北宋和前清，后半节东周、东晋、南宋和后清都无一例外地陷入了全局性动乱和分裂局面。

我们还注意到，在四个世袭政治大循环期中，每个循环期均有两段具有显著不同特点的动乱和分裂时期。在第一循环代，前771年，西戎灭周后，东周名存实亡。春秋和战国前后纷纷扰扰500余年。在第二循环代，汉末出现一个三国鼎立；西晋过后，又出现连续的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分裂时期。在第三循环代，唐末有一个五代十国时期；北宋过后，又出现南宋、西夏、辽、金、蒙等国分裂时期。

在第四循环代，按照西历20世纪流行的中国历史分期法，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一个重要分界点，1840年以前的清朝被视为封建社会，1840年以后至1911年被视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事实上，由于上层斗争剧烈，政治腐败，贪腐成风，"康乾盛世"末期国家衰败明显，1795爆发了湘黔苗民起义，清政府调动了云贵等七省军队围攻，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接着，1796年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这一年恰恰是清高宗乾隆皇帝退位和清仁宗嘉庆皇帝即位年份。白莲教起义从开始到最终失败，历时9年，波及大半个中国，"这次大起义充分暴露了清统治阶级的弱点，沉重打击了他们的反动统

治，成为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11） 清朝在嘉庆即位以后，内外交困，各地起义不断，外强侵略与日剧增。

1798年江西宁州农民起义；

1802年广东博罗、永安农民起义；

1805年英国护货兵船非法驶入广州海口；

1809年英兵船擅自闯入虎门，并非法将带有炮械火药的兵船开至香山县洋面，300英兵公然登陆澳门，占据澳门东西炮台；

1813年京畿和直鲁豫天理教起义，同年陕西伐木工起义；

1816年英阿美士德使团第二次来中国，提出割让浙江沿海岛屿等无理要求；

1832年英商船非法驶入闽、浙、苏、鲁滨海洋面；

1840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年；

1842年英国逼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

1854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1884-1885年法国入侵；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

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同年美英俄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1911年辛亥革命。

中国清朝就是在这样不断的内部动乱情况下，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主权被侵，领土消割，国家陷入无休止的动乱和外强侵凌之中。因此，1796年以前的清朝应视为"前清"，1796年至1911年清宣统皇帝颁布退位诏书，应视为"后清"。事实上，在西方史家心中，1793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来中国这件事往往是东亚现代史的起点。"白氏通史"亦说：

乾隆末期以后，"康乾盛世"之谓已徒有虚名。封建统治的腐败没落，预示着清皇朝日渐衰落的命运。封建统治的腐败没落，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乾隆朝末期以后，农民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白莲教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从嘉庆元年开始，历时9年，使清廷耗银2万万两，严重打击了封建统治。（12）

台湾历史学家萧一山也从政治角度仔细分析了康乾时期极盛而衰的原因，很有见地。他说：

（雍正帝）对于清朝的政治，关系很大，若没有他，康熙六十年培养国力的政绩，显示不出来，乾隆六十年好大喜功的威权，发挥不出来。他有一段话说：

自古为政者皆言宽严相济，所谓相济者，非方欲宽而杂之以严，方欲严而杂之以宽也。惟观乎其时，审乎其势，当宽则宽，当严则严而已。……总之宽严适协其宜，乃为相济，非参杂于宽严之间，而为子莫之执中也。

这真是超人一等的见解，不仅是他的政治哲学，也可以解释孔子的中庸之道。他儿子乾隆帝就不大懂得了。乾隆帝即位时的"大政方针"说：

治道贵乎得中，矫枉不可过正。……圣祖久道化成，与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宽纵之弊；世宗整顿积习，仁育而兼义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严刻之弊。……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矫必有所偏，是以中道最难。

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昔我皇考临御之初，见人心玩十曷 诸宁废弛，官吏不知公事，宵小不知畏法，势不得不加意整顿，以除积弊。乃诸臣误以圣心在于严历，诸凡奉行不善，以致政令繁苛，每事刻窍，大为闾阎之扰累。朕即位以来，深知从前奉行之不善，留心经理，不过欲减去繁苛，与民休息，而诸臣又误以为朕意在宽，遂相率而趋于纵弛。……势必至禁令废弛，奸宄复作，良善受其扰害，风俗渐就浇漓，将我皇考十三年教养整理之苦心，功亏一篑。

他标榜一个"中"字，说是宽严并济，实际有些模棱，绝不如雍正帝标榜一个"宜"字，说宽严不参杂来得更深切。他微说雍正帝过于严厉，而自己要用中道，然吕留良案雍正并未杀曾静、张熙，他一上台就把三人杀了，谁宽乎？谁严乎？我们看乾隆六十年政治，总想模仿康熙，召试博学鸿词，及山林隐逸之士，举行千叟宴，蠲免租赋，编纂群书，尤以《四库全书》为洋洋大观，"六次南巡"为巍巍盛典。然而康熙纂书，颇有学术上之价值，如数理之提倡发挥，因他自己是内行。乾隆帝虚心好学，都不如乃祖，更无创见，只是随意改削实录，伪造历史，替祖宗朽尸上涂粉，借征书来禁书，有人比之于秦火，可

以想见其谬妄了。康熙南巡为治河和镇抚，乾隆时既不治河，也无须乎镇抚，只是一味玩耍，锺事繁华，铺张扬厉，选歌征色，供亿无度，江南的老百姓苦极了。他晚年忏悔着说："劳民伤财，实为作无益害有益。"他一身并无可取之处，学术德行不如康熙，政治能力不如雍正，但在外表上看，乾隆一朝，是清运的鼎盛时代，为什么呢？因为清朝经康、雍两朝的培植芟理，到这时才开花结果，花之盛，果之实，是园丁的功绩，而不是看花食果人的功绩。乾隆帝好像一个纨绔子弟，得了先人的丰富遗产，穷极奢侈，富丽堂皇，实际不是他手上得来的东西。我们若检视他所用的宰辅，就知道他的政治何如了。最初鄂尔泰、张廷玉都是雍正时的旧人，后来嵇氏父子（曾筠及璜）、刘氏父子（统勋及墉）虽际遇少有，而嵇氏功在河防，刘氏信任不专，尹继善也是雍正帝简用的，和舒赫德阿桂都是阃外之勋。于敏中宅心不醇，死后撤享，陈宏谋、陈世倌皆无殊绩，只有傅恒、和坤二人当国最久，宠眷最甚。傅恒因姻戚关系，乾隆帝故意捧场，大致还过得去，也没有什么成就。和坤就不同了，招权纳贿，无恶不作，吏治民风，均败坏在他一人之手，而乾隆始终信任不移，要和康熙、雍正两朝比较一下，就可知隆替升降之故：他既没有雍正杀隆科多、年羹尧的辣手，又没有康熙办鳌拜、明珠、索额图的英明，所以康、雍是政治最清明的时候，乾隆则为盛衰转变的枢纽了。（13）

清史专家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也说：

内乱之原，无不出于内虐。康熙间崇奖清廉，雍正时亦勤于察吏。至乾隆则风气大坏。时方自谓极盛，殊不知乱机已遍伏环中矣。高宗（乾隆）于定新疆后，志得意满，晚更髦荒。和坤以容悦得宠，务极其玩好之娱，不恤边远疾苦，此皆盛极而衰之所由也。（14）

因此，清仁宗（爱新觉罗.颙 琰，1796-1820在位）即位的嘉庆元年，即处于十九世纪前夜的1796年应当作为清朝发展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转折点。

然而，现在中国史家，编清朝历史，一般写到1840年就突然而止，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为古代史，以后则为近代史，不但割断了后清历史，还没有正确区别西方侵略中国的时间界限。事实上，在16-18世纪西方国家一直在侵略中国边境，如葡萄牙、荷兰、俄罗斯等，那时因为中国正处于极盛时期，西方在世界其它地区的侵略和殖

民在中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不过，在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和瓜分完毕世界其它地区以后，西方从18世纪末开始大规模侵略中国了，其中，带领西方国家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是以英国和俄罗斯为首的两个罪恶国家集团。所以，1840年鸦片战争只不过是西方国家一系列罪恶侵略中的一个重大侵略事件而已。再说，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各方面，也是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开始彻底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因此，清朝应以1796年为界，分为前清和后清，后清的历史一直延续到1911年。这才是完整的中国世袭政治历史。

后清是"元明清时代"的第一个动乱和分裂时期。

从1912年开始，虽然孙中山革命推翻了帝制，随后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国进入了新的政党政治时期，但随后遭袁世凯窃国、北洋军阀霸政。后来，南京国民党政府独裁统治，未能使国家实现完全统一，即中国仍然未能摆脱第四循环期"动乱和分裂"阶段的延续，政党分治成为这个时代分裂的主要特点，也构成了第四循环期的第二个分裂时代。

从积极的意义上讲，民国和共和国应该是中国历史发展从世袭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一个过渡时期。现在中国的历史发展正处在十字路口，共和国是旧循环的结束还是新循环的开始？或者不再遵循中国世袭政治的循环发展规律，而另劈道路？只有未来的历史才能做出解答。而当前，由于民国和共和国都是过去历史的继续，因此，将其列于"元明清时代"之末作为一个分裂与动乱时段，希望不致引起读者的误解。

第五，边区民族的循环更替与发展

前面说过，中国自夏至清都采取一种宗藩政治体系。这种政治模式，体现了一种众星共卫一个中央王国的思想。它的运作依靠两个政策给予支撑，一个是"岁币"政策，另一个是"以夷制夷"政策。

中国中央政权对宗藩地区从汉朝开始就使用了"岁币"政策。在历史上，一些人把"岁币"政策称为是"曲意怀柔"。"曲意怀柔"四字很是得体，它准确地反映了中央政权对宗藩地区（包括分裂政权或者边族地区）的政治关系，从汉之于匈奴，到晋之于林邑、唐之于吐蕃、宋之于辽金、明之于瓦剌、清之于朝鲜越南等等，无不如此。"曲意怀柔"的直接表现就是中央政府对宗藩政治体系内的边族、分裂政权或者

国家，使用"轻贡重赐"政策。如历史上中国对周边的西域诸国、朝鲜半岛国家、中南半岛国家、印度尼西亚、日本（唐以前）等国之间均是采用这种政策。"曲意怀柔"的另一个表现是使用"和亲"政策，这种政策多使用在北方和西域（包括青藏地区）边族方面，中央帝王以其"公主"下嫁边族君长头目以建立和睦关系（一般能取得短暂的和平，不过用不了多久，有时甚至公主仍健在，中央王国与边族两者之间就开事端，可见此策不是治边的根本之道）。和亲政策把"公主"和其嫁妆作为和平的交换物。因此，"和亲"也是一种"岁币"政策。

"以夷制夷"政策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宗藩区域，中央封其君长（传统酋长、部长或者世袭领导人），法理上宗藩区域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而实际实行自治，中央不干涉其内政。由于其长期自治，文化落后，当其军事增强时，往往骚扰边界。为此，中央政府有时支持其一部或者其它部族，削弱其统治，必要时直接进行军事打击，减少其对中央王国的侵扰；二是，在中央王国直接统治区域的边界地区，包括内附和一些叛服不定区域，中央不派官员进行统治，而直接任命其传统酋长、部长或者世袭领导人作为地方行政长官，实现地方高度自治。这样的结果是，边界地区长期独立发展，中央不统其政，在其内乱或遭外敌入侵时内附紧密，在其强大时便试图脱离宗藩体系，谋求独立。

一句话，边界和宗藩地区政权，在其衰弱内附时，中央政府用"岁币"政策扶其弱，使其继其祀，盛其业；当其强大时，便内掠不绝，引起兵祸，中央政府又用"以夷制夷"政策，实施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打击抑制政策，使其衰弱下去。这种循环发展，随中央王朝的起伏而波动。这种历史循环过程我们可以在朝鲜半岛、中南半岛、西域以及北方地区均可以看到。

以北方为例，在夏商周时代，北方边区民族被称为粥荤（薰育）、北羌、鬼方、猃狁、东胡、肃慎等；到秦汉晋时代，她们先后统一于匈奴、东胡、肃慎（挹娄、勿吉）、鲜卑、柔然；到隋唐宋时代，她们又先后统一于突厥、 回纥、靺鞨、室韦、辽、金、蒙古；到元明清时代，她们又先后统一于瓦剌、鞑靼、瀚海、女真、蒙古。真可谓民族更替与兴衰此起彼伏，循环往复。历史已经证明，北方民族最初都源自中国内地，而后徙迁北方，长期裂居而生不同民族称谓。

她们大都发迹于今天内外蒙中东部及东北地区，成功于今天的内外蒙古广大区域，最后衰弱而被后起北方民族追击，其一部被消灭，一部南下内附，一部被迫西迁西域和中亚地区。她们就像一朵朵自东而西在中国北方漂浮而过的白云，有时繁星点点，有时如大幕片片，西去的云彩消失了，新的朝雾又自东而来，她们在中国北方历史上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色彩纷呈的壮丽画卷。她们的循环发展历史是中国中央王国循环发展史的一种印证，她们的发展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是中国历史在世袭政治时期循环发展的几个主要特点。但是，这并不相合于邹衍的五物循环理论。

在我国战国时期，齐国阴阳五行家邹衍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政治历史五物循环理论，即五德终始论。他将五行相生相克的阴阳家理论引申到政治历史发展领域，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依照土、木、金、火、水顺序"始终"循环"转移"，从而产生王朝兴衰和更替。杂家集大成著作《吕氏春秋》依此认为，从黄帝以来至周，已随五行从"土"经"木"、"金"，演变到"火"，崇尚颜色也从黄色，经青色、白色，演变到赤色。（15）秦、汉统治者，也推崇这个理论，分别崇物水、土，尚色黑、黄。看过电影《秦颂》和电视连续剧《汉刘邦》的读者，就会对秦始皇铺天盖地的黑色旌旗和饰物以及汉刘邦的"黄色天地"的印象极为深刻，其来源就是如此。

表2-9　邹衍和《吕氏春秋》的五行循环发展理论

| 时代 | 八帝 | 夏 | 商 | 周 | 秦 | 汉 |
|---|---|---|---|---|---|---|
| 创始人 | 黄帝 | 夏启 | 商汤 | 周文王 | 秦始皇 | 汉高祖 |
| 崇 | 物 | 土 | 木 | 金 | 火 | 水 | 土 |
| 尚 | 色 | 黄 | 青 | 白 | 赤 | 黑 | 黄 |

虽然邹衍的五物循环理论是天命的、唯心的，但是它反映了历史是变化的、世袭不是万世的，而且也说明从黄帝开始的八帝时期（《吕氏春秋》认为夏朝从帝禹开始，也是不正确的，夏朝创始人应为"夏启"） 是一个可以和夏、商、周相比较的时代，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

对于中国历史上帝王世袭政治时期的循环发展规律的成因及其演变过程，深研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总结说：

商、周之德，万世之所怀，百王之所师也。祚已讫而明示西土不可废，子孙不可替，大公之道也。秦起西戎，以诈力兼天下，蔑先王之道法，海内争起，不相统一，杀掠相寻，人民无主，汉祖灭秦夷项，解法纲，薄征徭，以与天下更始，略德而论功，不在汤、武下矣。汉祚既终，曹魏以下二百余年，南有司马、刘、萧、陈氏，皆窃也；北有五胡、拓拔、宇文，皆夷也；隋氏始以中原族姓一天下，而天伦绝，民害滋；唐扫群盗为中国主，涤积重之暴政，予兆民以安，嗣汉而兴，功亦与汉埒等矣。

天下之生，一治一乱，帝王之兴，以治相继，奚必手相授受哉！道相承也。若其乱也，则天下无君，而治者原不继乱。故夏之末造，有韦、顾、昆吾，乘暴君而霸；殷之将殄，崇、密攘臂而争；周之以衰，六国、强秦、陈涉、项籍，挟兵以逞；汉之已亡，曹、吴、司马、刘、萧、陈、杨、五胡、索虏、宇文，割裂僭号；皆彗孛之光，前不继西没之日，后不启东升之月者也。（16）

同时，西方人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美国汉学家亨.史密斯和美国世界史学家斯塔夫阿诺斯等对中国历史的循环发展规律也有较为深刻、独到的见解。

孟德斯鸠说：

中国在历史上有过二十二个相连续的朝代，也就是说，经历了二十二次一般性的革命--不算无数次特别的革命。最初的三个朝代历时最久，因为施政明智，而且版图也不像后代那么大。但是大体上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朝代开始时都是相当好的。品德、谨慎、警惕，在中国是必要的；这些东西在朝代之初还能保持，到朝代之末便都没有了。实际上，开国的皇帝是在战争的艰苦中成长起来的，它们推翻了沉于逸乐的皇室，当然是尊崇品德，害怕淫佚；因为他们曾体会到品

德的有益，也看到淫佚的有害。但是在开国初的三、四个君主之后，后继的君主便成为腐化、奢侈、懒惰、逸乐的俘虏；他们把自己关在深宫里，他们的精神衰弱了，寿命短促了，皇室衰微下去；权贵兴起，宦官获得宠信，登上宝座的都是一些小孩子；皇宫成为国家的仇敌；住在宫里的懒汉使劳动的人们遭到破产，篡位的人杀死或者驱逐了皇帝，又另外建立一个皇室，这皇室到了第三、四代的君主又再把自己关闭在同样的深宫里了。（18）

亨.史密斯把不断变化的朝代后面，不变的政体说成是一个立方体的一个面，他说：

中国的政体根本不可能被推翻，因为他是一个立方体，它翻倒时，只是换了一个面；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本质，都与原来的一个样。这种过程的反复出现，使中国人懂得了其结果肯定是像猫用脚走路那样不会改变；于是，人们便开始相信当初设计建造者的天才。任何要求改良的建议都成了十足的异端邪说。结果是，古人毫无疑问地优于后人，后人自愧不如地劣于古人。（18）

斯塔夫阿诺斯比亨.史密斯的认识更为具体，他说：

19世纪，有位观察力敏锐、名叫托马斯.梅多斯的西方人评论到："在所有已达到某种程度的文明的民族中，中国人是最缺乏革命性，却又最富有反叛倾向的。"他这话系指，皇朝的兴亡递嬗已成为中国历史的特点；它引起的不是革命，而仅仅是统治家族的更换。这种周期性改朝换代的模式，可以用致使皇朝衰落的、一再发生的某些趋向来解释。

每个新皇朝开始时，通常都能有效地统治国家，开创一个比较和平、繁荣的时期。新皇朝促进了思想和文化生活，并通过派遣远征军对付游牧民和扩展帝国疆域，保护了国家。但渐渐地，皇朝由于个别统治者本人的腐化堕落和贵族集团与宫廷宦官之间的宫廷斗争而遭到削弱。这种腐化堕落和派别活动，暗暗破坏了中央权力，助长了官僚机构的腐败。腐败加之宫廷生活愈来愈奢侈，意味着终究靠生产劳动供养整个帝国组织的农民所负担的赋税更繁重了。赋税趋于增长，还因为对外战争耗资巨大，而皇帝又采取了准许多数贵族、佛寺和庙宇免税的做法。于是，随着政治不清明，农业所必须的灌溉系统和其他公共工程往往被忽视。

因此，愈来愈陷入穷困的农民不得不承担起日益加重的税收负担。当农作物歉收和饥荒也不可避免地到来时，爆发点降临：反抗政府税吏和地主收租代理人的起义爆发了。这些局部的起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大为普遍的暴动。普遍的暴动、尤其是帝国军队本身到这一阶段已沦于勉强维持的境地，转而又招致游牧民入侵。内部造反和外来侵略相结合，通常预示着新循环的开始--旧皇朝濒临灭亡，新皇朝日渐来临。（19）

汉学家费正清对中国王朝的循环也有比较系统的认识：

各主要朝代开国初期往往出现盛世局面，这是因为创业者形成一个短小精悍的统治集团，而他们又在战争中消灭了其余势力，因此国家财富大多流进国库。国家在新获得的和平中得到了发展，于是人口迅速增加，国库钱粮充足。

但是万物盛极则衰。朝廷钱粮既丰就开始大兴宫室、驿道、水渠和城墙。为了维护军事上的胜利成果，往往将防御体系铺得太广而难以为继。皇亲国戚、高官大员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无不沉湎于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之中。他们对供养者的需求越来越大，但交纳钱粮的人数则越来越少。支出不断增大而收入却相对减少，这样各朝各代大凡开国100年内就会遇上棘手的财政困难。

这时就会出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革，有时暂时起些作用。百官贪污腐化的现象日益严重，这就导致行政效率下降，而党争亦越发激烈起来。对朝廷心怀二志者在政治、经济上更趋独立并且日益恣行无忌。政府为了弥合财政逆差，只好增收税赋，结果往往使百姓们不堪重负。由于国库空虚，导致水渠、河堤年久失修，粮食歉收时节政府无力赈济灾民，结果饥馑横行，于是各地盗匪蜂起并最终爆发农民起义。由于无力发放军饷，边境防守亦开始崩溃。各地军政大员纷纷拥兵自立，于是朝廷垮台完事。之后各方混战一场，吐故纳新，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朝代循环。（20）

我们之所以罗列这些外国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循环性论述，目的是想说明一点：在中国历史上，朝代、政治形式、统一与分裂的阶段性造就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循环性。这已经成为世界史家的一个基本认识。

然而，我们现代人在研究中国历史的循环发展轨迹时，往往侧重于分析循环发生的原因，即仅从一个循环或者一个朝代的末端来总结循环发生的历史原因和教训。很少有人从一个朝代或者一个循环的开端去审视历史未来发展的轨迹。更奇怪的是，在这种不断的循环之中，那些已经明白地昭示属于一个朝代的致命因素往往又完整地被复制或者被遗传到下一个朝代之中而没有人特别注意。如商推翻了夏，又承继了一个夏；汉推翻了秦，却继承了一切的秦；唐推翻了隋，又继承了一切的隋；明推翻了元，而明又复制了一个元；……。我们感叹总结这种简单承继性的困难，更感叹在这种简单的复制循环过程中，夏王姒启、秦始皇嬴政、隋文帝杨坚、元世祖忽必烈以及民国开国总统孙中山的创新的伟大。

金观涛在其《在历史的表象背后》一书中，把这种复制过程称为"修复"。认为中国改朝换代过程中，新朝代之所以能够迅速建立起来，是因为它通过宗法家庭和儒家国家学说两个修复模块使国家得到迅速建立和成长。（21） 事实上，中国社会中，"家"和"国"是同构的，家即国，国即家，是为国家。如孟子所言："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22）《大学》也说：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晋代葛洪在其《抱朴子》一书中更是把人体比喻成为一个国家的结构形态：

一人之身，一国家也。胸腹之位，犹官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也。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养其气所以全其身。民散则国亡，气竭即身死。

宋朝周敦颐之《周子通书.家人睽复无妄》也称：

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

治天下观于家，治家观于身而已矣。

历史学家何新也说："在中国，国家实际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组织。""中国传统政治乃是家族式管理的延伸和扩大。治国之道被认为是治家之道的扩大。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政治家的立身格言；而'天下一家'则是传统政治的理想目标。"（23）清华大学葛兆光教授也说："要了解古代中国的伦理和政治，要理解古代儒家学说，首先就要了解一下'古代中国的家族和仪式'。因为古代中国的伦理和政治中，有很多关于国家的观念和原则，是从家庭、家族这里发展和引申出来的，古代中国的很多国家与政治观念，也与仪式和象征中引申出来的东西有关，而儒家学说呢，其实它的基本原理也是从这种家族观念与仪式中衍生出来的。""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古代中国是由松散的部族联邦构成共同体，由共同体构成大联盟的。从根子上讲，古代人们生活的基础和认同的单位，最初还是家庭和家族，所以很多伦理价值上的观念和维护秩序的制度，都是从家庭、家族、宗族这里引申出来的，其合理性来自人们对于身边的家庭、家族和宗族的认同，并由此渐渐放大，而成为普遍伦理和国家制度的。"（24）历史学家启良更直接："中国古代对父权的崇拜，用意并不在各个家庭的长幼尊卑的伦理，而在于强调对君权的绝对服从。""讲君权同父权结合在一起，将'国'与'家'同构，是中国文明的一大特色，也是数千年来的专制主义政治最为成功的地方。""国'与'家'的同构之所以是成功的，就在于此种政治模式所借助的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即血缘亲情。"（25）

总之，儒家思想自辟派以来，讲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这种循环发展学说，在中国不断的改朝换代过程中，得到了验证。

一个新朝代总是从一个突出的个人开始，然后完成一个从"家"到"国"复制过程。其复制程序是：修身（从一人开始）--齐家（首先能够成就和管理好一个家庭）--治国（服众，能够作一氏族族长或者方国酋长或者地方诸侯）--平天下（实现宇内混一，统一众生）。其扩大化复制所含带的重要组织"基因"就是：家庭伦理、道德礼仪、家长模式，即血缘伦理关系。于是，一个新生的国家，就像一个家庭一样，被"家长"统领着，有好的家长，这个家就兴旺发达，多子多孙，财富增长；否则，倒霉无助，凋敝败没。因此，我们的历史

朝代，总是从最低级的家庭模式中产生，然后在高级的国家形态上破灭。历史上，碰上几个伟大的人物，国家强盛，文明发达；碰上几个昏君及其周围的乱臣贼子，国家就在无助中凋敝而破败。历史又从原始的家庭开始，完成另一个诞生、成长和破灭过程。这才是中国历史循环发展的实质。

当然，这是看问题的一方面，中国几千年的"修齐治平"发展模式隐含着人类历史的循环发展规律，但是，另一方面，它所提倡的"天下国家"观念和中国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思想是中国文明特别于西方的核心的东西。自"普天之下"提出以来，"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26） "天下""一统"一直是中国文明的主题。在最近，中国"天下""一统"最强烈的声音来自电影《英雄》。一般人，只是看到了电影里的唯美画面，欣赏到了明星们的精湛演技，感受到了动人的刺秦故事，但是很少有人悟出影片所揭示的"天下""一统"观，听到影片中"天下一统"的呐喊。战略家、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不可不看。

"天下"等于"一统"。

---

（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页。

（2）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三联书店，1994年第一版，第160页。

（3）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三联书店，1994年第一版，第84页。

（4）启良，《中国文明史》，下册，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194页。

（5）柏杨，《中国人史纲》，上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帝94页。

（6） 金观涛、刘青峰等，《问题与方法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

（7）转引自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92页。

（8）转引自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96-797页。

（9）启良，《中国文明史》，下册，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119页。

（10） 见自“新语丝文库（www.xys.org）”网文，原载《学说中国》，1999年第5期，江西教育出版社。

（11）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十卷（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267-268页。

（12）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十卷（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228页。

（13）萧一山，《清代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54-56页。

（14）转引自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20页。

（15）《吕氏春秋.有始览》。

（16）《读通鉴论.卷22》。

（17）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3页。

（18）亨.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等译，学苑出版社，1998年北京第一版，第103页。

（19）斯塔夫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等译，下册，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第71-72页。

（20）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83-84页。

**（21）参见金观涛，《在历史的表象后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二版，第4章。**

（22）《孟子.离娄上》。

（23）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101、212页。

（24）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28、51页。

（25） 启良，《中国文明史》，上册，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81页。

（26）《汉书.董仲舒传》。

**********

第四节　政党政治时代

中国政党政治时代，按照西历记述，在西历1912年-西历2003年期间，在黄帝创世纪后的中历第65世纪时期。可以预见，中国政党政治还将在中历第66世纪甚至更多的世纪里影响中国历史的发展。

一、朋党政治

党，在西周古代，最初是指乡里的基层组织，有五族为党或者五百家为党的说法。后来，"党"在此基础上逐步演变成为亲族姻戚或意

气相同的朋辈。至战国时期，"朋党"逐步形成。故此，在政党政治产生之前，秦汉以后，中国政治在皇权之下，往往含有一种朋党政治。

所谓朋党，就是为争权夺利，排斥异己而结合在一起的政治或者利益集团。但它没有统一的共同的政治纲领，朋党之间靠一种义气、师徒关系、亲属关系、利益关系或者相同的政治观念集合在一起。在世袭政治时代，朋党只有与皇权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有所作为的政治或者利益集团。不言而喻，皇帝的亲属集团是帝王世袭政治时期最大的朋党。其他外姓或者外族或者中层士官构成一个个小朋党。对于统治者来说，朋党是非法的。正如韩非所说："朋党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于重人也。""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1) 朋党比周成为一种罪恶，朋党简直就是一种奸邪。尽管如此，朋党在世袭社会中不能不存在。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上层政治即国家最大的朋党--皇族集团或者皇帝相互利用若干小朋党以渔其利、并控制国家大势的局面。

在历史上，朋党政治自古有之。但在士大夫政治比较浓厚的北宋时代最盛，因而也在这个时期产生了朋党之间的激烈竞争。新旧朋党之间，随皇帝或太后的更替而轮流执政：宋神宗（熙宁、元丰，1068-1085）时，新党王安石、吕惠卿、章惇、蔡确执政；高太后（元佑，1086-1094）时，旧党司马光、范纯仁、吕大防执政；宋哲宗亲政以后（绍圣、元符，1095-1100）， 新党章惇、曾布、蔡卞执政；向太后时期（建中靖国，1101-1102），旧党韩忠彦执政；宋徽宗亲政以后（崇宁以后，1102-1125），新党曾布、蔡京执政。在朋党竞争执政的同时，关于朋党的观念争辩也异常激烈，最终引出了欧阳修著名的《朋党论》。

西历1036年（宋仁宗景佑三年），北宋吏部侍郎范仲淹认为皇帝近臣均决于宰相，不利进贤退邪，说："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迟速升降之序，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这触怒了宰相吕夷简。吕夷简于是攻击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 (2)范仲淹被贬饶州知州，时任镇南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的欧阳修，因作《与商司谏书》为范仲淹辩护，也贬为夷陵令。

西历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吕夷简罢相，欧阳修进为太常丞、并知谏院，韩琦、范仲淹同进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于是，范仲淹实施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思信、重命令等十项新政，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于是，欧阳修作《朋党论》，以洗吕夷简强加的"荐引朋党"的罪名，昭明朋党之新义。全文如下：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也。

尧之时，小人共工、欢兜等4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16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22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22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3000，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也，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3000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也。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咸投之黄河，曰："此背清流，可透浊流。"而唐遂亡也。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22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22臣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3000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也。(3)

欧阳修这篇著名的政论文章，为"朋党"作了革命性的创意，提出了朋党有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人君要善于分辨；君主要黜退小人之朋，进用君子之朋，才能国家兴盛，天下才能大治。显然，那时的士大夫朋党，仅仅是皇权之下志趣或利益相同的松散集团，仅仅在于皇权之下的志趣或者利益层面，不能超越皇权建立自己的政治主张，建立真正的政治组织。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政党政治只有在推翻皇权之后才能出现。

二、外国政党政治

政党，通常是指代表某一阶级、阶层或者集团的利益，并为之斗争的政治组织。列宁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4) "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 (5) 毛泽东也曾说："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6)

现代政党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由成员、组织和政纲组成，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外国最早的政党当是英国17世纪70年代在议会中产生的辉格党和托利党。最初英国政府内阁由英王在两党中选若干人组成。到英王乔治一世时期，专门指定辉格党组成政府，这就是一党组阁的最早先例。后来演变成为只有法西斯国家和极端民族主义国家实行一党制。前者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国；后者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取得独立的非洲多数、亚洲少数和拉丁美洲少数国家。

英国政党政治演变到后来，转变为由议会下院选举产生的具有多数席位的政党领袖组阁，这就是两党制的雏形。西历1832年，英国议会通过《选举改革法》，扩大选举范围，政党也迅速从议会内的组织扩展成为全国性的组织。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局面。1800年，共和党在与民主党的总统竞选中获得成功，标志着美国也走上两党制政治的道路。到今天，已形成一个典型的三权分立制度下的两党制。后来，两党制逐渐被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采用。

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多党制度，是政党政治的第三种形式。采用的国家主要有西欧、北欧、墨西哥、印度、日本等国。在党派林

立国家中，有的采取几个政党联合执政形式，如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士等国；有的采取占绝对优势的政党单独执政或主要执政的形式，如日本、印度、墨西哥等国。

三、中国政党政治

中国政党的产生，起源于西历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组织的兴中会，比英国政党的出现晚了200多年。1905年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和光复会组成了中国第一个政治党派--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同盟会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提出了民族、民权和民生三民主义学说。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了著名的武昌起义取得成功，依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2曰29日孙中山在南京被17个省的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结束了中国3966年的帝王世袭政治制度，中国从此进入了政党政治时期。此后，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8月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任理事长，12月28日组成临时参议院。

袁世凯窃国以后，中国政党政治遭到沉重打击。1912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国家陷入了军阀控政局面。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将部分国民党员改组为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又正式改组成为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成为中国政府的执政党，尽管初期受到袁世凯的破坏，但是，这种政治形式毕竟在中国生存下来了，这就是一个不小的成功。1912年清朝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诞生，"标志着按照传统方式改朝换代的终结，是摆脱君主制的永久性变革。"可惜而且非常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幼稚，以及其创始人和继承人深受中国传统朋党政治的影响，始终摆脱不了中国传统人治思想的桎梏，政党统治仍然依靠领导者个人的威望，而法律地位始终树立不起来。于是，中国政党政治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必要的法律支持，法律成为摆设，需用时就搬出来，不用时就束之高阁。所以，中国的政党政治的创始是很不成功的。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总结所说：

蒋介石的一党制的独裁政府阻止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反对党党派不可能通过法律手段坚持自己的权利；革命才是唯一的选择。最后，国民党未能发展起能赢得人民支持的思想。(7)

中国国民党给中国政党政治留下了什么？有四点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第一、政治统治思想不是来源于最高法律，而是来自个人的政治学说或者理论。国民党的统治思想主要来源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然而一种理论任何人都可以依据自己的出发点来解释一通，结果是思想难于统一，而用来"固定"国家政治思想的法律则成了一纸空文。

第二、革命取得成功后，国家初期没有统一的军队。1928年蒋氏军事集团取得胜利，削弱军阀势力后，实行军队党化政策，后来又没有及时还军于政府。

第三、国家最高领导人就是党首。而党首是由政党内部有限选举（有时甚至是上任指定，下任继承）产生的。所以，中国政党政治，实际就是一种权威政治，不同于民选政治。

第四、政党权力超越一切。党首集政党控制权、国家政治权、军权、法权于一身，甚至掌握着一切监督权力，极端地说党首有时就是中国古代皇帝的现代身份。

由于国民党政党政治有此弊病，共产党1921年成立以后，就致力于改组国民党。很显然，这种努力没有取得成功，而是遭到屠杀而失败。于是，共产党走上了反对政党独裁的武装斗争的道路。

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国民革命取得了北伐的胜利，国民党政府从北洋军阀手中夺回了政权，结束了军阀霸政的状态。这个时刻，是中国政党政治，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基础上，走向多党政治的绝好时机，但蒋介石选择了独裁。中国又一次陷入了混乱和危机：军阀残余势力依然存在，外国势力干涉逐步加强，国民党政府无力控制局面，结果给残暴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提供大举入侵的机会。

1927年8月共产党也正式成立了自己的军队。在毛泽东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指引下，与国民党的军队，展开了国家内部党际军队之间的空前的持久的战争，这在世界政党政治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迎来了第二次走向多党政治的绝好时机，

然而在美国等国的"鼓励"下，蒋介石又一次选择了独裁，致使中国走进了大规模的内战时期，结果是民国立国37年后，中国又出现了一次朝代更替--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外国人在编写世界历史时，往往认为"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8)说1949年10月1日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是西方人从其一贯的反共角度得出的结论。事实上，在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只不过是政党政治时代，执政党的更替而已（由于没有政党合作，这种更替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中国历史要在世界历史上形成一个真正意义的转折点，要等到未来某个时刻、某个事件的诞生，这个时刻、这个事件将彻底证明，一个代表东方文明的真正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大国的出现。

共产党建立自己的政权以后，统治思想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经过毛泽东思想，发展到邓小平理论。中国政党政治发展到今天，由于中国大陆和台湾所选择的国家政治制度、统治学说各不相同，因此各自拥军自立，国家仍然处于分裂状态。但是，诚如江泽民主席所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革命精神，与一切忠于他的事业的人共同努力，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打败了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始终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 (9)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属于同一个时代的延续，可统称为"中国政党政治时代"。

中国现在正处在人治与法治之间的权威政治阶段。就像政论家何新所指出的，所谓权威政治制度，就是"围绕一位或数位权威领袖做出最高、最终决策"的政治制度。中国政党政治的未来，将怎么样发展呢？他说：

法制和政治民主制度的形成，需要历史、经济、文化的相关条件，需要一个长期发育的过程。因此，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仍需要政治权威，需要决策权力的相对集中。否则难以保持国家统一。

中央必须有一个承担责任的权威中心，必须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权力结构和支持权威核心的政治基础。权威制度仍所需要，由人治向治制的过渡需要稳步进行。(10)

邓小平也曾说：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11)

但是，同时他又明确指出了"邦之杌陧，曰由一人"的坏处：

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12)

这是具有深刻意味的。从过去的发展过程看，我们的权威总是在一连串的政策失误，导致失败，引起动乱以后，才能找到。真有点乱世出英雄的味道。这个事实，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一个权威形成以后，不能永远是权威，应当有一个新陈代谢过程；新的权威的产生，应当在权威本身的自觉更新中产生，不应该"乱世找英雄"。否则，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动乱中爬行，未来的过程既是缓慢的，也容易成为国家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在中国出现一个权威政治时代，那是现代政党政治和中国古代朋党政治相结合的特殊产物。萧一山先生曾说，在1912年以前，欧美各国有政党无朋党，中国则有朋党无政党。依此，我们可以说，1912年以后，中国是既有朋党又有政党。这就引出一个特别的权威政治时代来。不过，尽管中国的权威政治形态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让中国亿众欣慰的是，世袭政治没了，国家独立了，通过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改革开放政策，人民对建立和平、自由、民主、富裕的美好国家又升起了希望。

---

(1)《韩非子.孤愤》。

(2)《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

(3)《欧阳修全集》。

(4)《列宁全集》，第4卷，第370页。

(5)《列宁全集》，第1卷，第660页。

(6)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5页。

(7)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世界通史(下)》，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647-648页。

(8) 斯塔夫里阿诺斯，《世界通史》，下册，吴象婴等译，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803页。

(9) 江泽民，《在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10月9日。

(10) 何新，《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上册，第180、181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310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311页。

**********

# 第三章 历史时空

王家范先生说："历史有三大要素：时、地、人"；我说：历史是由历史主体、主体的活动及其活动空间所构成的。历史的主体是人，而历史的空间由历史地理和历史时间构成。历史地理是表征国家主权范围的地表，它由面积单位"丈量"；历史时间是事物过去客观存在的连绵不断的系统，它用一定的纪年方法如历法来表示或者"刻度"。因此，历史就是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在连续不断的时间上活动主体活动的累积和演变。即

历史=主体+地理+时间

中国历史的主体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整个中华民族，并共同活动在同一个历史地理区域--钺钟历史地理之中，他们具有6500年文明史。

## 第一节　历史主体：中华民族

许多世界史学家认为，世界在约三万年前，几乎同时出现了三种"真人类"：即蒙古利亚种（Mongolian Race,黄种，即东方人种）、高加索种（Caucasian Race,白种，即西方人种）和尼各罗种（Negroid Race,黑种，即非洲人种）。事实上，这里所说的蒙古利亚种，实际是亚洲东部民族，即东方人种。其所以被称为蒙古利亚种，主要原因是西方开始认识世界时，正是蒙古族崛起并征服世界的时候。

实际上，多数人认为，东方人种最初产生于中国镜内，但究竟是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平原，或是起源于青藏高原地区，或是起源于中国其它地区，至今无定论。可以肯定的是，东方人种最终主居于东亚大陆而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今天整个东亚国家的共同祖先。

位于河北省阳原、蔚县一带，有"东亚人种起源地"之称的泥河湾遗址群，因其具有国际地质考古界公认的第四纪标准地层，以及丰富

的哺乳动物化石和人类旧石器遗迹而闻名于世。根据国内外著名专家考证结果，泥河湾遗址的历史年代把亚洲文化的起源推进了至距今200万年前。

正如汉学家费正清所说："蒙古人种并不仅见于东亚地区。有些北上西迁，有些进入北美（如较晚的爱斯基摩人）。……考古发现推测，东亚北部与中部的蒙古人种先民不断南迁并向外扩展入海，像大约700年前泰人从中国西南迁至今天的泰国，就是上述大迁移的一部分。"（1）所以，现今的中国各民族和朝鲜半岛、日本、中南半岛以及环南海国家民族均是东方人种的后裔，甚至，越来越多的证据表面，东方人种的扩散区域可以推及整个环太平洋地区。这些地区的先民，在肤色、种植、文化等诸方面，都有很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如"饕餮纹饰亦见于东亚和南太平洋其他一些国家及太平洋西北部的印第安人生活区。这表面存在着一种环太平洋纹饰类型，而商即为其中最古老的代表。"（2）所以，东亚民族同种，中华民族同于一种，源于一脉，就如同古人所说的"民吾同胞"。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指出，我中华民族有三个特别的生理印记，即铲形门齿、青斑和内眦褶。这三个印记，是其它种族所没有的。可以肯定，凡带有这三个生理印记的黄种人均属我中华民族一员。

但是，随着原始人类的增加，不断迁移，选择适宜的栖居之地，于是在中国境内逐步形成了若干中国原始人类区域。到有准确的历史记录时，东方人种在东亚大陆上，已经有若干原始部落和氏族存在了，到八帝时期逐渐演变产生了几个较大的部族和若干原始部落。这些较大的部族有：中原华夏部族、东部东夷部族、北方肃慎部族、西部氐羌部族和南方蛮苗部族等。由于占据地理位置的优势，其中又以处于黄河中下游的华夏部族最为强大。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居住地逐步向外延伸，五大主要部族，除华夏部族名称变为汉族而稳步壮大外，在中国历史上，华夏部族和其它部族又先后相互融合和分化出若干旺族，如匈奴、乌桓、鲜卑、羌、氐、羯、丁零、突厥、高丽、回纥、吐蕃、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维吾尔、回、苗、越等，有的在融合中消失了，有的则在分化中保存了下来，但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支。现在，很多人面对如此众多的民族称谓，怀疑她们的同种事实。事实上，从北方民族的更替和兴衰历史中，我们也能看

出其民族种源的一致性。她们的氏族或者部落或者民族名称，就像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名称一样，不论其民族称谓如何，始终都是中华人种，万变不离其"宗"。如"魏晋南北朝时代，胡族建国的国名有采取夏与周的，而北魏的拓拔氏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字文氏则自认为是神农氏的后裔 。（3）今日的汉族，则大都自认为是'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四川北部的羌族，则坚定的认为自己是大禹的后代。"（4） 这不是一个中国各民族的"历史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而是一个中国各民族除了极少数的外族加入外的"同宗同祖和起源同一"问题。

中国早在八帝时期就有一个著名的处置犯人的政策：即"流宥"政策。从那时起，在中原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犯罪的人，多被流放到边鄙之地，即中原政权统治地界之边。这些人，实际成了中国历史地理的开路先锋、拓荒者。这些人，大多与那些自由拓荒边区的民众一起，开辟天地，共同生活，逐步与中原的民众在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相异，最后发展的结果就是形成不同的群体。这些不同的群体，有的最终归还中原，有的则长期居边而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

缘于此，中国民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民族融合和分化中，民族数量呈逐步增加趋势。到今天，中国包括汉族在内多达56个民族（实际比此数多）。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中国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华民族的分化和融合发展的历史。实际上，中国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合众国家。所谓合众，"合"就是统一，"众"就是指多民族。这个多民族就包括了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壮族、回族等几十个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质就是"中华民族合众国"。如果不以阶级来划分中国民众，而以民族构成作为依据，那么，国旗上就不是五颗星，而应该是56颗星。相信未来的中国必将更加现实地反映中国多民族的特性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法理思想，而不是用各种各样的特殊政策来代替民族平等或者分割民族区域。

民族的分化是与居住地域的区别紧密相关的。其分化和扩展过程存在以下特点：

一、分化出来的民族，居于中原主族的边缘地区；

二、分化出来的民族，主要成分包括因生活所迫自愿拓荒者和因犯罪流放边疆者；

三、分化出来的民族，发展到一定程度，为了求得更好得生活条件，往往臣服中原而内迁，内迁的结果往往是，与中原矛盾激化，而发生战争。最后，中原政权进而占据边族地区，又一批人被赶到更远的地区。

四、处于边区的民族，并非永久为一种民族，随各民族的兴衰而有所不同。在东北、蒙北、西域、西南等地区尤其明显。

五、处于边区的民族，文化总是较低，生活水平也远不如中原。因此，受中原主流文化的轻视，中原人蔑称边族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种轻视既是民族矛盾的根源，也是民族矛盾的结果。

在内部民族分化、融合、纷争和迁徙过程中，中国的疆土也就随之变化。从最初的黄河中下游平原逐步发展到东北平原、朝鲜半岛、华北平原、蒙古高原、河西走廊、西域、青藏高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中南半岛、长江流域以及东南海岛。中国远古以来的统治者，实行的"流宥"政策，可以说对民族分化和融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尧帝时，"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5）后来，夏桀子淳维北遁，变为"荤粥"，后演变为匈奴。《史记.匈奴列传》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中华边族就是这样慢慢演变而来，匈奴如此，朝鲜、南越、藏、蒙、维、壮等族也是如此。

因此，可以肯定，中华各民族是不断分化和融合的结果，即主要是出自中华民族自身政策引导的结果，并非出自不同的异族。

中华民族不但在东亚大陆不断生息演化，而且我们的祖先还不断向大陆以外迁移。图3-1就反映了这个民族演化和迁移过程。

从东方人种及其演变看到，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就是远古的东亚大陆民族，即东方民族（也即蒙古人种）。这个民族除主居欧亚大陆东部大陆外，还逐步向大陆深处、边缘以及半岛、边岛和海岛迁移，经过长期的封闭分居以后，他们逐步形成了大陆民族、半岛民族、边岛民族和海岛民族。在八帝时期帝舜时代，有个叫石户地方的一个农民，因不满舜帝恃力逞强而"夫负妻负子以入于海，去之终生不反。"（6） 今天的半岛民族就是分别居住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上的朝、韩、越、缅、泰、柬等族，今天的边岛民族就是紧靠中国大陆和半岛周围的岛国民族，包括日本、菲律宾、马来、印尼等民族，今天

的海岛民族是指远离中国大陆居于太平洋西部的大洋洲等地土族。在中国大陆发展起来的诸民族，统一于中国旗下就成为"华夏民族"或者"中华民族"。而深入大陆深处的中、西亚华裔民族以及通过水、陆两路迁移到美洲的华裔印第安民族，则逐步成为当地的土著民族。除此以外，正如民族史家林惠祥所说，也有白种和黑种民族融合于其中。远的不说，近者如香港、澳门回归后，港澳"土著居民"，主体是华人，但也有英格兰人、葡萄牙人，还有从日本、马来西亚、印度等地迁移来的人，以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通婚形成的后代。不过，由于近几个世纪加入中华民族的外族逐渐增多，很多中西结合所产生的土著和纯粹的西方民族还无法归于某族。我们相信，中华民族具有"厚德载物"的巨大包容性，对于极少数的外来民族或者不能归并到已有民族中去的土著居民，一定会在中华民族文化影响下，逐步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一部分。

中华大族最初为"华夏"，"汉族""因汉代年祚之久，兵力之强，与他族接触之繁，故汉之朝代名遂兼用为种族名，于是华夏之名遂再变。自此以后汉虽灭亡，然汉族之名称历代不改沿用至今。"（7）

关于民族发展变化，近代民族史家林惠祥提出的九条"公例"（8）很有见地，虽不完全如其说，然中国民族发展大势，也大抵如此。兹列于后。

1、中国民族之成分甚复杂，黄种中之各族大半有之，白种黑种也有一小部分。

2、中国之民族虽多，然有日趋混合而成一族之势。

3、中国诸民族系以一系为主干而其他诸系依次加入之，加入后其名称即消灭而只用主干系之名。

4、中国民族之同化次序如波澜状，一起一落。初两个民族以上相接触时，战征会盟，扰攘一时，终于混合同化而归于平静。迨旧民族同化方毕，新民族又来临，于是又扰攘一时，复归同化。如此一波一波继续而已。

图3-1　东方人种及其演变

5、中国之主干系即华夏系，其初亦非大族，由屡次加入异族之成分而逐次扩大其内容。

6、华夏每扩大一次即改变其原质一次，故后代与前代名同而实异，今日之华夏系非复明代之华夏系，明代之华夏系亦非复唐代之华夏系，唐代之华夏系亦非复汉代之华夏系，汉代之华夏系亦非复太古之华夏系。为求名称正确至少应用二种名称，以华夏系指古之华夏系，以汉族指今之华夏系。

7、今日之汉族所含成分尽有匈奴、肃慎、东胡、突厥等本书所举诸系 （9），唯各系成分有多有少，如东胡、肃慎多而羌、藏少。故今日之汉族实为各族所共同构成，不能自诩为古华夏系之纯种，而排斥其它各系。

8、其他各族亦皆含有别系之成分，然大抵不如华夏系所含之复杂，如蒙古或含有匈奴、东胡、突厥之血统。

9、中国诸民族除特别情形者外，今后之大势，似日趋于汉化一途。

林惠祥说，中国诸民族"日趋于汉化一途"，是从汉族融合了很多少数民族和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之缘故，这当然是主流。但是，从民族称谓和个数上论，今天比之古代民族尤多更是事实。举西南民族发展为例 （10），今天的西南民族共计有20多个，主要分布在藏、蜀、渝、贵、滇、桂、粤、琼等八省、市、区镜内。这些民族之来源和发展，自然复杂且曲折。据《史记.西南夷传》记载，在先秦时期的西南部落"皆氐类也"，即大多数属于氐羌系统的部落。

氐羌本为一个群体。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族原先居住在西北方，过着"迁徙往来无常"的游牧生活。故黄帝族原来和羌族是同一个族群，后来黄帝族进入中原地区，而同族的羌人的一部分仍留在西北和西南。据《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竹书纪年》："帝颛顼高阳氏，母曰女枢，.....生颛顼与若水（今雅砻江），.....颛顼之子鲧，生

禹于石纽。"说明夏族为黄帝族之后裔不断繁衍而形成的，且为羌族中的一部分。

黄帝族、夏族、周族的大多数人在中原融合为华夏族系之时，另一些羌族人仍居住在今甘青高原，过着游牧生活，并向陕、豫移动，在春秋诸侯的排挤中，有的被融合，有的到处流散。其中一部分就向西南流徙。《后汉书.西羌传》载：

寝献公初立（前384年），欲复穆公（前659-621年，　曾霸西戎）之迹，兵临渭首，灭狄豲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西（今川西昌）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今甘文县）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今甘武都）羌是也。

西南民族之祖先，还有一来源：即越族。《史记》记载，初居于长江下游地区的越族，是夏朝第四个帝王少康之后，后分化融合为两支：一支迁江浙为越国，后于战国时期为楚国所灭；一支迁荆楚之地，是为扬越，后再南迁两广地区，是为百越。百越主族被秦始皇的军队消灭，据其地置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百越边族，迁今越南北部者为骆越，秦末南海龙川令赵佗曾自称"南越王"；迁今云贵桂三省区交界地区者为夜郎；迁今云南者为滇越。

西南民族的第三个来源是蚩尤之后。《尚书.吕刑》记载："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足见蚩尤为苗之先祖。《史记.五帝本纪》说：帝尧之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史记.吴起传》记载："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今鄱阳湖）。"可见，扬越之民族必杂苗裔。

西南民族的第四个来源是古"濮"族。濮族和百越一起，始居楚之西南，后逐步向南迁移。最后，氐羌、越、苗、濮四大古族，在迁移过程中，逐步融合和分化，演化出若干民族称谓来。到汉晋时代，出自氐羌系统的有昆明族、叟族、摩沙族等，出自百越系统的有僚、夜郎等，出自百濮系统的有苞满（布朗）、闽濮、濮等。经过隋唐宋、元明清的迁徙和演化，终至今日，西南逐步形成了苗族、傣族、崩龙

族、佤族、土家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阿昌族、壮族、回族、独龙族、怒族等20多种民族。

事实上，很多民族的出现，除了主要的地区化影响外，中原政权两个极端政策也是造成民族分化的重要原因。这两个极端政策，一个是暴力高压政策和鄙视边民政策，一个是宽待边民的"岁币"政策（详见本书第8章第2节）。当然，除此以外，部分野心家的分裂倾向也是民族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不管怎样，在国家管理或者民族认识问题上，我们始终没有把中原政权（不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摆在一个合理的位置之上，始终抛不去狭隘的民族观念，自找混乱，民族问题矛盾丛丛。认识不到这一点，建立在狭隘民族论基础上的中国历史学说自然也是不科学的。

由此，我们国家今天存在的多民族结构形式，不是汉族对外族的兼并的结果，而是同一人种的地区化以及"中央王国"不正确的民族政策所导致的结果。我们今天之所以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存在不同的民族问题，是因为很多人忽视了中华民族属于同一人种和人种地区化区别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关于民族来源及其构成的观点，多半是错误的。如果台湾在若干年后，像朝鲜、外蒙古、越南等地那样独立，难道我们就称台湾人不属于中华民族了？又如若干年后，台湾和大陆实现了统一，汉族的台湾人又变成了台湾族了？现在，"中国民族非出于一元，中国亦并非向来一统"的观点又流行起来了。我们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刚进入政治文明的时候，在中国传统地理范围内，确实是多部族的"满天星斗"，是多中心的起源。但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是，在更遥远的以前，中国民族的祖先是由一组或者一脉繁衍出来的。例如，历史上，姜戎就自称是四岳之后，并与中原齐、许、吕、申同姓；晋惠公也称，诸戎乃"四狱之裔胄"（11）；孔子提出"虽之夷狄，不可弃"，子夏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中华各民族的分化别居（自求生存之地），就像周初分封诸侯以致后来演变成独立一国那样，造成氏族和部族林立，风俗各异。后来，它们在中原政治文明（自然是这个民族的主干创立的）的影响下又重新回到了同一个种族旗下，建立起了统一国家。

和对中国边缘民族和少数民族的错误认识相承，我们大多数的历史书籍，包括古代的和现代的，都把边族称为外族，什么"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什么"五胡乱华"，等等，不可尽数。就连孙中山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也承袭明朝开国文臣宋濂"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

狭隘民族观点，在其最初的奋斗纲领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样落后的民族口号。腐败的世袭政治应当推翻，但鞑虏（满族）不能驱除，他们是我们民族的一部分。如果一个汉族政权腐朽了，你能叫"驱除汉族，重建中华"吗？事实上，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突厥、东胡、高丽、吐蕃、羌氐等等以及现今的满、藏、回、维、越、蒙、朝鲜等民族都是我们民族构成中的重要一支，是中国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分裂和独立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能把她们闹分裂和独立以及对其周边地区的扰乱视作为外族侵略，而应当作为中国的内乱和分裂。只有历史上的日本、俄罗斯、欧美国家以及阿拉伯、印度等国对中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侵入才能叫做外族侵略。

有了对中国民族构成及其发展历史的正确理解，才能有正确的民族史观和中国历史观。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统一与分裂，内乱和外患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明确地说，从夏朝开始至清代，中国政治结构体系始终是"中央王国+藩属国"的宗藩体系。在中央王国周围，最初依附着很多原始部落，后来发展成诸侯，发展成一个方国，还有的发展成为帝国。很自然，她们都与中央王国同源同宗。多数情况下，处于中央王国周围的这些部落、诸侯、方国或者帝国都是中央王国的藩属国（不管其与中央统一王朝的政治关系如何），只有少数在历史上成为中国的中央王国。而这些历史上的藩属国，多数是周边少数民族国家，当然也有从中央王国分裂出去的现在被称为汉族的华夏主族分裂政权。这些历史上的藩属部落、诸侯、方国以及帝国与中国中央王国分分合合，构成了中国历史纷繁复杂的重要内容。在复杂的发展历程中，边区民族的外迁和与中央王国对中国传统核心地域的争夺构成了历史发展的重要一面。民族外迁是中央王国错误的边族政策和其国家膨胀力（国家强大时的对外扩张）所造成的，而边族对中央王国的斗争，多数情况下是对中央王国不平等民族政策的报复。在我们的历史书中，和平的历史自然容易书写。但凡战争与分裂，我们往往把这些中华民族视为异类、敌人，这是极端错误的。当然，具有分裂倾向的少数民族分子也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在我们中国历史中，纷争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政变，发生在王国、藩国（分裂国）的上层；第二类是内战，发生在王国、藩国（分裂国）内部中央与地方或者军阀派别之间；第三类是边战，发生

在中央王国与藩国（分裂国）之间、藩国（分裂国）相互之间，是内战的一种延伸；第四类是外战，发生在中央王国或藩国（分裂国）与外族（国）之间的战争，即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中国历史上，很多人把第三类战争说成是侵略与反侵略战争，这也是极端错误的。有的甚至把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称为"国际关系"，这些都是没有真正把握中国历史实质的结果。

---

（1）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7页。

（2）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30页。

（3） 《魏书卷一.序纪》以鲜卑族为黄帝少子昌意之后，“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又云：“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拔，故以为氏。”《周书.文帝纪》称：“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原注。

（4）王仲孚，“历史认同与民族认同”，引自WWW.PEP.COM.CN网文。

（5） 《史记.五帝本纪》。

（6） 《吕氏春秋.离俗览》。

（7）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一版，第27页。

（8）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一版，第39-40页。

（9）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一版，第9页。所举诸系包括：华夏系、东夷系、荆吴系、百越系、东胡系、肃慎系、匈奴系、突厥系、蒙古系、氐羌系、藏系、苗瑶系、罗缅系、僰掸系等16大系以及白种和黑种。——引者注。

（10）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

（11）《左传.襄公十四年》。

**********

## 第二节　历史地理：中华钺钟地理

中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黄河、长江中下游平原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民族外迁和疆域外扩的历史。根据现代基因研究的成果，整个亚洲东部或太平洋西岸的所有民族几乎都是中华民族的后裔。这肯定了我们中华各民族源于一种的结论。

中国从四皇时代的"古国"文明开始，到今天，各民族的居住地域是在不断变化的。而这种变化完全是中国民族向无人区域拓展的结果。这个过程不存在侵略和占领。历史发展表明，不管入主中原的是汉族，还是来自少数民族，对处于中原以外地区的少数民族，总是采取鄙视或者干脆忽略的态度。直到今天，一些人仍然受这种狭隘和片面思想的影响，使他们在编撰历史时，往往只以中原为主，而以边族为辅。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书籍，多是这种狭隘和片面认识的产物。

## "白氏通史"第一卷第一章正文第一句话就是：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这无疑是正确的，中国多民族的特性是历史发展事实，但它后面忽略了中华民族来源一脉的史实。

**"白氏通史" 第一卷第二章接着讨论了"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不同的地理条件确实在影响着历史上中国各民族的发展历史，但它同样忽略了中国历史发展固有的钺钟地理结构。书中说：**

中国地理条件之整体的统一性影响于历史上政治形势的发展，它有维系国家统一的一面。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分裂割据状态，但统一毕竟是主要的趋势，这与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有极大的关系。（1）

现代考古成果说明，在黄帝以前，中国原始的古文化集中在以燕山南北、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关中地区、四川盆地、两湖（鄱阳湖、洞庭湖）流域、太湖流域、山东泰山南北为中心的七大地区，各地区发展虽不完全平衡，但具有相同的过程。

以上七大文明的中心地区，活跃着关中及渭水流域的炎黄部族、东部（从黄淮到华北）全境滨海的东夷部族、位于两湖流域的苗蛮部族、位于太湖流域及其以东以南沿海地区的百越部族等四大部族集团。四川盆地原始文化，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发展相对滞后或者与前四大部族集团之间的相互影响较小。按照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理论，中国是从各原始部族的古文化、古城文明起步，经古国、方国林立，最终发展成为统一帝国。我们以为，中国社会发展在约距今1万年前已经形成了中国古文化和古城文明，到"四皇"时代已经开始形成了古国文化，从黄帝时代开始，中国进入方国时代，到秦始皇时期，中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帝国体制。

从地理发展角度看，从中国原始古文化的形成到四皇时代，经历了几千年的部族发展，但他们基本都生活在以前述七大文明中心围成的两河流域（长江和黄河）地区。但是，其中最为发达的应当首推东部（从黄淮到华北）全境滨海的东夷部族，因为四皇中的伏羲氏就是这个部族的首领。到黄帝时代，其方国范围"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到颛顼时代，"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到帝禹治九州，"东则岛夷，西则因桓，南既于交，北尽碣

石。"中国第一部地理著作《尚书.禹贡》详细记载了帝禹规划的九州版图：

一、雍州：约今陕西、宁夏及甘肃部分地区；

二、冀州：约今山西及冀北部分地区；

三、豫州：约今河南；

四、兖州：约今冀南；

五、青州：约今山东；

六、徐州：约今苏北及皖北；

七、扬州：约今皖南、苏南及浙江、江西部分地区；

八、荆州：约今湖南及湖北；

九、梁州：约今重庆、四川及贵州部分地区。

详见图3-2 《禹贡》九州示意图。

图3-2 《禹贡》九州示意图

可见，在帝禹时代，中国已经具备了典型历史地理结构的基本雏形。后经夏、商、周三代的发展（夏商周三代本身并不及九州全镜，但夏商周三代是大方国时代，这个国家体系由大方国和它周围的附属部落、小方、小邦以及边族构成，即中国宗藩政治体系），统一于一国的地域不断扩大，到秦始皇时代，国家地理终于形成一个稳定的结构。这个结构，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个结构形式，最初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称为"箕"形。他说：

中国之形如箕，西极之山，箕之膺也；南北交佳，连山以趋于海，箕之两胁也；其中为污于平衍，达于淮、泗之浦，箕之腹与舌也。

中国之形如箕，坤维其膺也，山两分而两迤，北自贺兰，东垂于碣石，南至岷山，东垂于五令，而中为奥区、为神皋焉。（2）

然而，我们以为，中国历史地理结构恰是中国文化的具体体现。它形如古钺，又如钟之外形。钺是中国远古特有的青铜或铁制兵器，用以喻之中国地理，有中国由先祖们开辟出来的之意。钟是集中体现中国古文化特征的物件。在尧舜时代，钟是一种容器，后来演变成为一种乐器，随着巨钟的出现，钟和鼎一样成为中国主权、统一、祥和和繁荣强盛的象征。钟的文化含义的发展和转变正好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倾向：中国自从将同一种种族（黄皮肤、黑眼睛种族）统一以后，便卷钺为钟，不再对外征伐，最终形成一个稳定的地理结构--"钺钟地理"。中国是当今世界领土最大的几个国家中，唯一拥有悠久历史和稳定地理结构的国家。

从已经出土的文物情况看，历史最早的中国古代大钺有商朝的亚丑大钺、妇好大钺和方国大钺等。它们就像大钟的中心剖面图，或者说，足够大的钺面卷起来就是一座大钟。中华民族自古就是崇尚钟的民族，从远古的编钟到大明朝的永乐大钟，各种形式的钟层出不穷。1999年中国为了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又铸一铜质世纪钟王--中华世纪钟。大钟高6.8米，下口直径3.8米，各项技术指标均超过永乐大钟。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大钺、巨钟，很神奇地成为中国历史地理的边界结构的形象代表物。

中国钺钟历史地理结构，在秦以前，其发展过程是这样的：

1、八帝时期：黄河中下游平原（华夏诸部）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三苗部、东夷部）；

2、夏朝时期：扩展到黄土高原（荤粥），"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3），夏朝活动地域之广，强盛时纵横千余里，可称当时世界最大之国；

3、商朝时期：扩展到东北平原（肃慎部）、华北平原（鬼方部）、河西走廊地区（羌族）、四川平原（氐族）；

4、西周时期：扩展到蒙古高原（鬼方族）、长江中下游以南及岭南地区（扬越族），西历前976-922年间，周穆王对边族（犬戎）的战争，使中华边族迁徙西域、青藏和西南起了直接作用；

5、战国时期：扩展到西域地区（西戎、月氏、乌孙、莎车等族）、云贵高原（氐、粤、濮等族）、朝鲜半岛（高夷族）；

6、秦帝国时期：扩展到最后两个板块：青藏高原（羌族）、中南半岛（滇越族）。至此，秦始皇帝国和它周围的华夏边族共同构成了中国钺钟历史地理的典型结构。

中国钺钟历史地理结构是中华各族的祖居地，她的重要边界在东南及东边为海所隔，在西南及西边为高山所阻，在北边被中国和俄罗斯最初的和平边界条约所固定，这个地理结构一直存续到今天。当然，这个结构并不包括历史上外族归附以及当时中国政权对外侵略所达到的历史地理范围，如大唐对中亚、今外蒙以北的扩张以及蒙元帝国对中西亚、欧洲以及岭北行省地区的扩张等。不过，在西面和北面，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今外蒙古（包括苏联侵占的唐努乌梁海地区）以及东北黑龙江以东和乌苏里江以东以南包括库叶岛在内的三大片地区，尽管现在或者被俄罗斯占据或者独立于中国之外，但这些地区是中国钺钟历史地理无可争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由于这些地区长期被外族长期占据或者独立，我们的一些历史学家漫漫地以现实为标准来看待中国的主权地理范围，这显然是不对的，这对我们恢复主权很不利。我们的主权地理范围应该是钺钟历史地理范围。历史学家葛剑雄教授在其《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引言》中说：

我们所说的中国，既不应该等同于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这些中原王朝，也不应该等同于汉族或中原地区，而必须包括我们所明确规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一切政权和民族。

那么，能不能就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为范围呢？显然也不妥当。因为由于100多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中国已有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攫取，外蒙古（今蒙古国）的独立也使中国的领土减少了156万平方公里。今天的中国领土已经不能包括18、19世纪清朝的最大疆域，无法反映当时的实际。所以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应该以中国历史演变成一个统一的、也是最后的封建帝国--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为范围，具体地说，就是今天的中国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这一范围的地区，大多在历代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下；有的曾先后归属中原王朝

管辖；有的曾由当地民族或非汉族建立过政权，而这些民族已经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葛先生所"规定"的历史地理范围和我们所提出的钺钟历史地理范围是基本一致的。

中国钺钟历史地理的典型结构特点是：东面，全境抵海；南面，尽南海、过中南、抵南亚次大陆；西面，跨帕米尔高原，抵巴尔克什湖；北面：西起斋桑湖，经阿尔泰山北头、乌布苏诺尔湖、贝加尔湖以南、外兴安岭、乌第河，直至太平洋北部的鄂霍次克海。这个结构框架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元帝国，这个帝国几乎占据了整个欧亚大陆的三分之二。不过，这个帝国由于政治构架的不成功，很快分裂，从元朝中期开始，中国钺钟地理结构又恢复了其传统的历史面目。这个结构也就是历史学家葛剑雄先生所一再指出的中国地理范围："就是今天中国领土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并指出，"这样一个范围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广大，而是由于它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中国疆域发展变化的结果，便于从整体上说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并能前后采用同一个标准。"（4）

中国钺钟历史地理的形成过程表明，独立的地理单位有产生一个民族集体或者试图独立的政权单位的趋势。但在广大的黄河中下游平原，就不可能形成不同的民族，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地理单位。但是在黄河中下游平原的周围，随着地理单位的不同，在历史上形成了不同的民族群体，在特定时期还建立了独立的国家政权。这种内在的历史地理规律，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国的历史，并且仍将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倾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相对独立的地理单位的影响结果，如今台湾分治、外蒙古、越南、朝鲜（包括韩国）、锡金、不丹独立等。

但是，中国历史的主流怎么又会大一统居久呢？我们以为，在同一文化体系下，依靠特殊的地理单位而试图分裂是不可能持久的。从文化源流看，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其发展只能是统一而不是分裂；从历史地理角度看，中国具有一个稳定的完全的包含不同地理单位的巨型地理单位，这个地理结构，包含了平原、高原、盆地、丘陵等不同的地理单位，又包括了海域、滨海水乡、草原、沙漠、雪山等不同的地理特征。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特征就是其多样性（地理的多单元、民族的多构成）所决定的包容性和统一性。任何试图长期分裂的图谋，在统一的文化体系中不可能长期独处孤存，因而其分裂就不可能长久，最终必将走向统一。所以，中国历史的统一会久于分裂（详见本书第2章第3节）。

清朝思想家王夫之曾说：

中国之形，北阻沙漠，西北界河、湟，西隔大山，南穷炎海，自合浦而北至于碣石，皆海之所环也。形势合，则风气相为嘘吸；风气相为嘘吸，则人之生质相为俦类；生质相为俦类，则性情相属而感以必通。南越固海内之壤也。（5）

中国钺钟历史地理边界中有8个主要地理转折区（见图3-3所示），具体说明如下：

a区：巴尔克什湖

b区：吉尔吉斯斯坦

c区：阿尔泰山北头

d区：喜马拉雅山西头

e区：黑龙江上游至其支流斡难河以北地区

f区：云南西部及缅北地区

g区：乌第河出海口至库页岛以北海区

h区：南海曾母暗沙海域

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实际地理特征以及钺钟历史地理结构，从北到南，相对不同的地理单位，陆地可以分成14个板块，它们是：朝鲜半岛、东北平原、蒙古高原、西域地区、河西走廊地区、黄土高原、华北平原、青藏高原、四川平原、黄河中下游平原、云贵高

原、长江中下游平原、长江中下游以南及岭南地区、中南半岛。从地理特征看，包括2个半岛、3个特别地区、4个高原和5个平原。中国钺钟历史地理东线，从北到南还包括八个海域，其中有3个海峡（宗谷、朝鲜、巴士）和5个海域（鄂霍茨克海、日本海、东海、太平洋和南海）。在历史地理中，除14个大陆地理单位外，从北到南还包括3个内海（渤海、黄海、北海）和3个大岛（库页岛、台湾岛和海南岛）。可见，中国的地域特征是由若干相对独立的地理单位所构成的巨型钺钟结构。

图3-3　中国钺钟地理历史结构

中国的历史地理条件，从秦朝以来一直没有变化。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多数时间内，中国的北部和西部，由于未接触到其它非华裔民族，其边界是不确定的。北方从汉朝开始一直到明朝，其控制的辐射范围都超过了钺钟历史地理北部边界线，西部从a区到b区一线，自南北朝陈齐周时期开始，一直到元朝，西延至咸海地区，至明朝初年又恢复到钺钟历史地理边界。东部及东南部阻于海域，南部及西南部阻于高山，因而没有多大变化。

关于中国历史地理边界，我们应当认识到，在中国周边其它民族（非华裔民族）国家的发展与中国的发展相接触时，国界才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周边其它民族（非华裔民族）国家的发展与中国的发展还未相接触时，中国的国界是不定的，是向四周辐射的。这有两个重要的理由：各个朝代的边族与中原统治者，同出于一种，衍于一族；其它民族（非华裔民族）国家的发展与中国未相接触时，不存在国际间的领土主权问题。因此，将历史和历史地域局限于中原统治者（所谓"中央王国"）的直接统治范围，是一个历史错误。如秦代，忽视肃慎、东胡、匈奴、氐羌等民族的发展历史，就不是中国秦朝历史的全景历史观；如隋朝，忽视东、北、西、南各民族的历史，就不是中国隋朝历史的全景历史观；如北宋时期，仅记述宋、辽、西夏三国

历史，而忽视回纥、黑汗、吐蕃、大理、北越等边族政权的历史，就不是中国历史的全景历史观。等等。

既然中国历史地理边界在未接触到其它非华裔民族之前，是不确定的，那么，中国"民族地理范围"应该是，在首次碰到外族时中华各民族实际占据并祖居的地区和与外族签订平等条约确定的边界以内的地区。但是，在历史发展中，在未碰到外族之前，不管中华各民族的活动范围是否在"民族地理范围"之内，都应该是中国历史的地理范围。而中国的"民族地理范围"恰恰就是前面所说的"钺钟历史地理"。

当然，由于中国历史地理发展的民族居住特点，中国历史地理始终有其内核和外层之别，秦始皇所统一的地域是一个核心内层，而北方蒙、回、藏区域以及历史上的朝鲜、琉球、中南半岛各族等宗藩关系区域无疑是中国外层地域。鉴于此故，很多历史学家始终视内层核心的政治状态作为中国统一的主旨。但是，中国的历史是不能剥去外层区域的，因为这些地区是中国在人种、地理、文化等方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它们是"钺钟历史地理"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钺钟历史地理北方边界线，有三个变化时期：辐射发展时期、自动收缩时期和俄罗斯侵食时期。从秦到元（前221-1368），中国的北方边界线一直是一条向北辐射的边界，蒙元帝国统治者把这条线一直推到了北冰洋，这是辐射发展时期（但主要活动范围仍在钺钟地理之内）。后经过明、清（1368-1796）的自动收缩，复原到钺钟地理边界内，这是自动收缩时期。从19世纪初开始，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受到俄罗斯的野蛮侵略，通过若干不平等条约，侵蚀和鲸吞了中国"民族地理范围"，毁坏了中国传统的钺钟地理边界线，在西起巴尔克什湖，经贝加尔湖、外兴安岭，直至鄂霍茨克海的一万多公里的边界线上，俄罗斯共计侵占了中国17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是全中华民族永远不会承认的。这个时期是北部边界线的俄罗斯侵食时期（1796-1949）。在这个时期，中国外蒙古还在苏俄的操纵下实现独立。

到目前为止，在原宗藩政治体系下的紧密区域--中国钺钟地理范围内，仍然有八大区域处于独立、被别国侵占或者分治地区。这些地区包括：

1、朝鲜半岛，包括朝、韩两国。

2、外蒙古。

3、东北外兴安岭至乌第河以南黑龙江以东以北和松花江以东以南（包括库页岛）地区，由俄罗斯侵占。

4、西部巴尔喀什湖至斋桑湖一线以南地区，原由俄罗斯侵占，现主要处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境内；1944年俄罗斯侵占的今外蒙古西部以北的唐努乌梁海地区，至今仍由俄罗斯占据着。

5、　　南部不丹、锡金两国独立。

6、中南半岛包括缅、越南、老挝等国独立。

7、台湾，1895年由日本侵占，1945年归国，1949年起至今分治。

8、日本1875年侵占琉球群岛至今。

总之，中国从八帝时期开始，华夏各族从最初的黄河中下游平原，逐步发展、壮大，向外迁移，到秦代已经基本形成中国钺钟历史地理版图。从此以后，中国各族就在这个版图内生息、繁衍，分分合合。中国在南宋末期，北方蒙古族帝国对外进行了扩张，但是元朝很快自动放弃了，中国又回到了钺钟历史地理版图中。因此，编写中国历史，就应当以中国钺钟历史地理为基础全面地记述中国各民族的发展，而不应该仅仅记述中原统治者及其相关的各种活动。

从秦朝开始，以后的中国历史该怎样展开呢？由于中国历史的最大特点就是在这个钺钟历史地理版图上分分合合，因此，从秦朝开始，当有多个华夏民族区域时，就应当全景叙述，而不能仅限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平原、华北平原的主要国家。翻开整个民族分布图，就会发现，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西北、西南等周边地区，中国历史上的周边地区主要是指除黄河、长江中下游平原、长江中下游以南及岭南地区、四川平原四个区域以外的其它九个区域。现在通行的中国历史主体，主要就是放在前述四个地区，而处于分裂时期的周边九个地区存在的民族政权往往被忽略或者简略而过。这实际是中国历史编撰的致命缺陷。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中国越钟地理周边地区在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上究竟有那些民族政权或者民族部落呢？下面按照中国历史发展顺序分四个不同时代，按照主体和东、北、西、南四个方向的周边地

区，粗略列出中国全景历史中，各主要民族政权或者部落与中原主体政权的大致情况，以供参考。

一、　夏商周时代

1.大一统夏王朝（前2055-前1600）：东有莱夷（今山东半岛）；北有荤粥（今河套地区）、有易氏（今华北地区）；西有有扈氏（今陕西高原地区）；南有三苗（今长江中游地区）、防风氏（今江浙地区）、九夷（今淮河中下游地区）。

2.大一统商王朝（前1600-前1046）：东北有肃慎部；北有鬼方、危方、土方、孤竹、北羌（今内蒙中部及华北地区）、犬戎、熏育；西有周（今陕武功一带）、羌氐（今甘肃中部及甘陕南部）；南有巴、蜀（今川渝地区）、楚、濮（今鄂西）、越族（今浙江一带）、淮夷。

3.大一统西周王朝（前1046-前771）分封71国：东北有肃慎；北有鬼方；西有羌氐、南有巴蜀、濮、扬越（今湖南大部）、荆楚、吴越（今江浙一带）、淮夷、徐夷。

4.分裂的春秋时代（前770-前476）：东北有肃慎；北有山戎（今辽西）、东胡（今内蒙东部地区）、林胡（今河套地区）；西有羌氐；南有巴蜀、百濮（今湘西）、扬越（扩至今广东一带）、吴越。

5.分裂的战国时代（前476-前221）：东北有肃慎；北有山戎、东胡、匈奴（今内外蒙大部）；西有月氏（今甘肃中部）、乌孙（今甘肃以西）、羌（今青藏地区）；南有寿靡（今云南）、夜郎（今贵州大部）、扬越、骆越（今广西以西）、东越（今浙闽一带）。

二、　秦汉晋时代

1.大一统秦帝国（前221-前206）：东有沃沮、朝鲜、肃慎、高丽、夫余、东胡（今华北地区）；北有匈奴（今内外蒙古）；西有月氏（今甘肃）、乌孙（今甘肃西）、楼兰（今新疆西南）、城郭诸国（今新疆大部）、羌（今青藏）；南有滇越（今云南西）。

2.大一统汉帝国（前206-220）：东有三韩（马韩、牟韩和辰韩，今朝鲜半岛）、肃慎（东汉起称挹娄）、夫余、乌桓、鲜卑；北先后有匈奴、鲜卑、大幕；西有羌、乌孙（今巴尔克什湖东南）；南有哀牢（今云南西及缅北，东汉时入汉）。

3.分裂的三国时代（220-265）：东有三韩、挹娄、沃沮、夫余、高丽；北有鲜卑（今外蒙）、大幕（今内蒙大部）、羌胡（今河套地区）；西有羌、乌孙。

4.大一统西晋帝国（265-317）：东有三韩、挹娄、沃沮、夫余、高丽、寇慢汗；北有鲜卑（今外蒙）、大幕（今内蒙大部）、羌胡（今河套地区）；西有羌、乌孙。

5.分裂的东晋南北朝（317-581）：东有高丽、百济、新罗三国、挹娄（从南北朝始称勿吉）、夫余、寇慢汗、室韦、契丹、地豆干、库莫奚；北先后有高车（今外蒙古）、柔然（今外蒙古464-552，后扩至内蒙）、突厥（552-582）；西先后有龟兹等国（今新疆大部）、悦般等国（今新疆大部）、高昌（442-640）、吐谷浑（今青海东部地区）、党项（今藏东地区）；南在南朝陈朝时有濮部（今云南南部）。

三、隋唐宋时代

1.大一统隋帝国（581-618）：东有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靺鞨（今黑龙江中游地区）、室韦、契丹、奚、髻；北有东突厥（今内外蒙582-630）、铁勒（今外蒙北）；西有西突厥（今新疆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582-659）、党项等（今西藏）；南有爨三部（今云南中部）、林邑、扶南、真腊（今中南半岛东部地区）。

2.大一统唐帝国（618-907）：东有新罗（今朝鲜半岛南部）、靺鞨（今东北大部）、黑水靺鞨（今黑龙江下游地区）、渤海（今东北南部698-926）；北有突厥、回纥（今外蒙古以北605-840）；西有葛逻禄（巴尔克什湖东南）、吐蕃（今青藏，后扩至今新疆）；南有濮部（今云南南部）、南诏（今云南大部649-937）、林邑、扶南、真腊。

3.分裂的五代十国（907-960）：东面和北面有高丽（今朝鲜半岛）、辽（今东北、华北、内外蒙地区907-1125）；西有葛逻禄、西州回纥（今新大部）、吐蕃（扩至外蒙西部）；南有大理（937-1253）、越南、占城、真腊。

4.大一统北宋帝国（960-1127）：东有高丽、辽（扩至外蒙西部）、西夏（今内蒙、宁夏和甘肃北部1038-1227）；西有回纥、黑汗

（今新疆西部及巴尔克什湖东南）、吐蕃；南有大理、越南、占城、真腊。

5.分裂的南宋辽金夏时期（1127-1271）：东有高丽；北有西夏、蒙古诸部；西有西辽（1124-1218）；南有大理、越南、占城、真腊。

四、元明清时代

1.大一统元帝国（1271-1368）：东有高丽（今朝鲜半岛南部）；西有钦察汗国（今中亚北部）、窝阔台汗国（今新疆中部及其以西，后为察合台汗国，并扩至今青藏西部）、伊利汗国（今中亚南部）；南有越南、占城、真腊。

2.大一统明帝国（1368-1644）：东有朝鲜；北有瓦剌（今外蒙西北）、鞑靼（今外蒙大部及其以北和内蒙北部）、瀚海（今外蒙大部，后扩至华北）；西有亦力巴里（今新疆大部及巴尔克什湖东南）、叶尔羌（今新疆西南）、吐鲁番、鞑靼土默特部（今青海北部）；南有葡占澳门（1553-1999）、越南、占城、老挝、真腊。

3.大一统前清帝国（1644-1796）：东有朝鲜；南有葡占澳门、越南、占城、南掌、真腊。

4.动荡的后清时代（1796-1911）：东有朝鲜、俄占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日占琉球群岛；北俄占唐努乌梁海地区17万平方公里；西，俄占50余万平方公里、哲孟雄（今锡金）和布鲁克巴（今不丹）独立；南有葡占澳门、英占香港（1842-1997）、越南、老挝、真腊。

5.分裂的国共时代（1912-2003）：东有朝鲜和韩国、俄占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日占琉球群岛；北，俄占唐努乌梁海17万平方公里、外蒙古独立；西，俄占50余万平方公里（现主要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南有锡金、不丹、越南、老挝等独立，台湾分治。

---

（1）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第145页。

（2）《读通鉴论》，卷三，卷十三。

（3）《史记.吴起列传》。

（4）葛剑雄，《统一与分类——中国历史的启示》，三联书店，1994年第一版，第40页。
（5）《读通鉴论.卷三》。

**********

## 第三节　历史时间：中华纪年历法

前面我们讨论了中国历史的主体--中华民族、中国历史的地理--钺钟地理，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中国历史的时间及其"刻度"问题。

中国历算始于伏羲，《周髀算经》曰："伏羲作历度。"历日则起于神农，黄帝之前有《上元》、《太初》历法，黄帝时期则有《调历》。从后往前，中国最早的纪日历法应当是夏历之前的干支纪日历法。据《吕氏春秋》、《后汉书》等文献记载，六十甲子由黄帝的老师大桡创制。《后汉书.律历志》引《月令章句》曰：

大桡探五行之情，占斗纲所建，于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谓之干；作子丑以名日，谓之枝；干枝相配，以成六旬。

据史学家考证，中国远古有以大火昏见之时为岁首的较为疏阔的历法，他们称之为"火历"或"大火历"，有过以太极八卦定四时八节的太阳历。伏羲八方（极）八月（卦）太阳历一年四时八月360天，每月45日。岁余5日。太阳历总结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年岁历法基础，而真正体现中国太阳（年）-太阴（月[亮]）-地球（农事）三维系统历法精神的是中国的最迟始于尧帝时期的阴阳历，或称夏历、阴历或太阴历，实际是阴阳合历。它以太阴（月亮）运行规律为基准，定年月时辰；

以太阳运行规律为基准定24节气。因24节气是专为农时服务的，所以这个历法又称"农历"。农历大月30日，小月29日，每月以月相为起迄；平年12个月，全年354.355天，比回归年平均少10日21时，过了3年后就相差30多日，这样通过加一个闰月来消除误差。故每三年置一闰月，5年再闰，19年7闰，闰年13个月，全年384.385天。这种"19年7闰法"在春秋时代已被发现，比古希腊人早160多年。但是，这个历法的缺点是平年与闰年的日数相差较大。中国在采用西历以前，这个历法一直用到辛亥革命前夕，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开始使用西历，但是仍然通行中国农历。

从历史的角度看，西历纪年即基督纪年，其前身是儒略历，由古罗马皇帝儒略.恺撒（G.J.Caesar,前100-前44）颁布。到西历532年（中国南朝梁武帝中大通4年），僧侣狄奥尼西（Dionysius）宣称，基督的纪年，要从基督的诞生那年即于532年前（中国西汉平帝元始元年）算起。这个提议，在教会的支持下，首先在基督教盛行的国家和地区传播，后为世界多数国家采用，故名曰"公元"。《儒略历》年平均长365.25日，比回归年长11分14秒。西历1582年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在《儒略历》基础上改成新历，叫格列历，于西历1582年10月15日施行，以置闰之法避免误差：能被4除尽的年为闰年，但逢百年时，只有能被400除尽的年才算闰年，闰年在2月增加一天。西历纪年并非十全十美，对我们中国人以及中国历史来说，西历元年，即中国西汉平帝元始元年，不是什么值得纪念的年份。同时，西历元年无故地将中国历史分割成两段：一个西历前，一个西历后。在西历前，中国历史已经堂堂正正地经历了八帝时期、夏商周时期和秦汉时期等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可见，西历纪年对于记述中国历史实在没有特别的好处。比如，1999年10月，国际儒学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国内著名高校和学术团体联合举办了"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大会"。然而，我们的儒学祖师爷孔子生于西历前551年（确认其生年为西历前552年又是另一回事），其2550周年诞辰应该是西历2000年（2550-551+1），而不是西历1999年。西历纪年跟大家开了一个国际玩笑。

在西历未普及以前，世界各地区的历法纪年是各不相同的。从表3-1可见，世界上比现行西历历史悠久的很多，并且也不见得就没有存

续的道理。中国六十甲子纪年已经有6500年历史而至今犹存，说明它自有用处。

表3-1 远古人类的历法纪年

古历法 起历事件 元年[西历] 备注

1.六十甲子 黄帝建国纪元 前4497年 黄帝老师大桡 创制

2.古犹太历 《旧约.创世纪》 前3761年

3.古希腊历 和灵之大祭纪元 前767年 初以执政官或大祭司纪年

4.古罗马历 罗马府初建纪元 前753年

5.古巴比伦历 拿玻纳莎王纪元 前747年

6.古回教历 穆罕默德避难纪元 前622年

7.年号纪年 汉武帝建元纪元 前140年 此前中国无帝王年号

8.西历 耶稣诞生纪元 西历元年 中国从民国起用西历

我们以为，历史知识是作为教育和研究之目的，我们为何不建立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历史纪年方法，以便于我们的后人更易于记住我们的历史呢？在科学技术和考古都取得重大进展的今天，结合已经存在的农历和传统的干支纪年，以法律形式建立便于中国历史纪年的新型中国历法，既成为可能，亦成为必要。这个历法的纪年完全可以从中国国家政治的发端--黄帝取得统治地位那年开始，结合干支纪年，完善农历，依照现代科技成果，创造一个新历。这个历法就叫"中国历法"，可简称"中历"，以别于西历。

把新修历法的起点建在黄帝建国之时，具有多重重要意义。

第一，黄帝时期是中国国家政治的开端，也就是中国文明的开端，其纪念意义最为伟大，教育意义更为深远。

第二，黄帝被中华民族公认为自己的共同人文始祖，以他创立国家那年作为"中历"纪元元年，以纪念他的伟大历史贡献，也是合乎情理的，也是中华民族应该做的。

第三，从黄帝到今天，中国历史已经历了6500年，如能顺序纪年，可见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对爱国主义的直观教育，具有很现实的作用。

第四，利用这个"中历"记述中国历史，更为直接明了，具有连贯性突出的特点，不会像西历和干支纪年那样，无端使中国的文明历史分成毫无意义的若干时段。

第五，黄帝开创的时代，具有原始的民主气氛，其时代成就被后代的中国政治家和思想家所无限共仰。直到现代，中国仁人志士还在为追求一个美好的"大同"盛世而不懈努力。我们今天正在为追求一个高度法制、高度民主、高度富裕的社会而奋斗。将中历元年定在黄帝时期，更能反映我们的积极向上的精神。

第六，华夏民族崇尚土德，土色呈黄，恰好本民族一脸黄色，黄帝也具有表率地或者恰巧继承了"黄色"特征。"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1） 我们将"黄历"赋予新的含义，更具有知识性和历史意义。当然这个"黄历"不是古代的充满迷信色彩和具有欺骗性的"皇历"，而是科学的适用的并能反映中国历史文化特点的本土化历法。

1905年，具有创新精神的孙中山先生建立了同盟会，并在日本东京创办了《民报》。该报便根据专家的研究结果，把清光绪31年（西历1905年）定义为"中国开国纪元4603年"，并在首页刊出了"中华民族开国之始祖，世界第一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画像。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世袭帝制，迎来了政党政治。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的孙中山，做出了一个伟大而影响深远的决定：正式决定改用按《民报》推算的黄帝纪年，并通令全国执行。遗憾的是，尽管全国群起响应，各地报纸纷纷改用新纪年，但由于袁世凯窃国、接着军阀混乱以及各地历史学家对黄帝纪元年（按照《民报》推算，黄帝纪元年为西历前2698年，依此中华民国元年为黄帝4609年）意见不一，最终没能沿用下来。

现在，中国历史学、考古学、历法学以及其他科学的发展，已经完全具备了建立中国黄帝纪年的历史条件。我们完全可以像开展"夏商周断代工程"那样，开展一个"修历工程"，制订出一个适宜的中国历法出来，正式颁行于天下。

依据2000年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和王大有先生的推导，黄帝建国次年即西历前4497年，正好是甲子年，这恐怕不是一个"巧合"。所以，中国历法完全可以把西历前4497年作为中历元年，到西历2003年正好是中历6500年。如果这样记载中国延续6500年的国家政治文明史，那么，中历纪年就会有一个很直观的顺序和连续而不间断的历史记录（见表3-2所示）。

总之，"中历"应是一个与西历并行不悖的历法，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日趋全球化的今天，修订和并行中国历法，是最好的保护本土文化和延续中国文明的重要措施之一。盛世修历法，也符合中华文明的文化传统。

我们说，现在通行的西历（公元纪年）不是很完善的历法，是指它和我国传统的和最早的纪年方法--六十甲子一样，并未像在时、分、秒之间存在统一的60进位制关系那样（较大的时间单位总是若干较小时间单位之倍数），在年、月、周（星期）之间建立一个有规律的倍数关系--因为不同日数的月和七天一周制使年、月、周之间不可能存在有规律的倍数关系。

表3-2 中历与西历的比较

中历纪年 60甲子 主要事件 西历纪年

中历元年 甲子 黄帝元年 西历前4497年

中历1000年 癸卯 颛顼族9世帝仆习34年 西历前3498年

中历2000年 癸未 挚族10世帝沟次14年 西历前2498年

中历2443年 丙午 夏启元年 西历前2055年

中历3000年 癸亥 商王雍己9年 西历前1498年

中历4000年 癸卯 东周敬王姬贵22年 西历前498年

中历4277年 庚辰 秦始皇元年 西历前221年

中历4498年 辛酉 汉平帝[刘衍]元始元年 西历元年

中历5000年 癸未 南朝梁武帝萧衍天监2年 西历503年

中历5078年 辛丑 隋文帝开皇元年 西历581年

中历5768年 辛未 忽必烈至元17年 西历1271年

中历6000年 癸亥 明孝宗朱佑樘弘治16年 西历1503年

中历6409年 壬子 中华民国元年 西历1912年
中历6446年 已丑 中华共和国建国元年，民国37年， 西历1949年
中历6497年 庚辰 共和国51年 西历2000年
中历6500年 癸未 共和国54年 西历2003年

事实上，在年、月、周之间也是有客观规律的，只要对传统历法（包括西历纪年）进行必要的修改，这种关系就能体现出来。比如，60是12的倍数，故12个月不用更改。为使月份与周（星期）有倍数关系，首先每月的日数必须固定，即每月30天。这样，很容易用周对之进行分解，如每月5周每周6天或者每月6周每周5天。这样，一年就达到360天，剩下来的5天（平年）或者6天（闰年），可作为单独的一周，可放在岁末（或岁首）作为一年中的特别公假周。这一特别周是由地球一年绕太阳公转365.25天造成的。这个特别周，应该作为地球人类的公假周，以利于全人类共同休息或者娱乐。特别周（星期）制度在统计上的影响并不很大。即使是那些少数必须连续不间断地组织生产的企业或者服务业，在统计上，也可以用"特别周"作单独统计，不会造成更多的不方便。事实上，现在许多商人或者商家，特别是服务业，对时间较长的假期的经营都是单独统计的。

由此看来，要在年、月、周之间建立倍数关系，关键是要改变七天一周制度。事实上，七天一周制的来源也没有科学依据。在国外它最早来自古巴比伦七个主神的名字。西历321年3月，君士坦丁大帝正式公布七天一周制，相沿至今。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很早的时候，使用过七天一周制度，比西方早很多年，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放弃了。民国初年，中国始用西历纪年后，也同时恢复了七天一周制。仔细分析七天一周制，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科学之处，我们完全可以对之进行修改。比如实行六天一周制，正好使每年360天、每月30天都是周日数6的倍数，大大有利于日期分割和相同日期单位的业务统计计量分析；同时，双休制也不会受到影响（每周四天工作）。七天一周制，一年按52周计，有双休假日104天，加元旦3天共计107天；六天一周制，一年60周有双休假日120天，再加公假周5天共计125天。六天一周制比七

天一周制实际增加公假仅18天，显然这是利于大众而无损于生产和工作的。我们的生活为什么不是"一个六日接着另一个六日"呢?

克服年月周失序，利用一年360日，岁余5日或者6日作为公假周，并不是我的创造发明。相传，我们的先祖伏羲氏族在西历前78世纪时观测天象后，曾颁布岁末5日补天历即太阳历，以年月日合序。古代埃及人，也曾把一年分为12个月，每个月有30天。到年终，以添闰5日的方式补足全年365天。西历1793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颁布的历法，规定全年365日，依次按季节时令分12个月，每月30天，余5日放在年底作为节日--"无套裤汉日"。甚至，美洲玛雅人的历法也规定，一年365天，分18个月，每月20天，最后剩5天作为岁末祭忌日。可见，中外在很早以前，就有人正式考虑年月合序的问题。

如果说，七天一周制具有沿袭陋习之嫌，那么，1884年西方在华盛顿开会将零度经线（本初子午线）确定为格林尼治所在的经线则完全是西方自我中心主义的最直接表现。它和七天一周制一样没有科学依据。如果说，公元纪年无端地将世界历史分割为"公元前"和"公元后"两个时段，那么格林尼治本初子午线（零度经线）则将世界地理无理地分为"东半球"和"西半球"。这种划分毫无实际意义。事实上，经线一个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划定世界时区，以便区域时间的确定。如果本着全自然、全科学的观点，零度经线即本初子午线应如时间0时与24时重合一样，同地球360度经线重合；即本初子午线应和现在的国际日期变更线重合。这样，世界可以由东向西划出零度至360度经线和1-24个顺序时区（每个时区15度经线）。既可以避免本初子午线和国际日期变更线通过任何国家，又可以使时区和经线的排序和标度具有连续性，而且会使世界授时、日期变更等业务更加方便。

总之，现行的西历之所以被称作为"公元"，它实际是西方文化向世界广泛传播的结果。它和七天一周制度同样存在许多不足。我们通过修订中国历法，建立六天一周制，实行岁末公假周制度，既能客观反映中国历史文化，又能充分体现自然运动规律，反映人类社会活动包括工作和生活的需要。所以，改历工作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

（1）《白虎通.号.卷二》。

**********

# 第四章 历史巨人

有关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人物的排行榜有很多，但是，在中历第1-65世纪之间，真正影响中国国家政治发展历史的巨人，只有六人，他们是：中华文明的开山祖：黄帝姬轩辕；世袭政治的创始者：夏王姒启；中央集权政治的始皇帝：秦始皇嬴政；三省政制的建立者：隋文帝杨坚；行省制度的普及者：元世祖忽必烈；政党政治的首创者：民国临时总统孙中山。

## 第一节　黄帝：姬轩辕（前31-31）

在我们的许多历史书中，黄帝是一个很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人们确信他利用战争手段取得了黄河中下游主要地区的统治地位，但又认为这是传说；一方面，我们共同认同他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但在历史上又没有相应的显赫地位；一方面，大家都相信他所处的时代，是原始社会末期，并居于具有确切记录的尧舜禹"禅让"政治时期之前，但他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却远不及尧舜禹。我们认为，这一切不是历史的过错，而是后人的认识问题。幸好有古人的传说和历史文献记录，保留了对他的记忆；幸好有考古学，使我们中华民族的真实文明的历史记录正一步步逼近黄帝时代，使他的身世逐步变得清晰起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黄帝则是这个重要转折时期的开拓者。根据历史记录、种种传说和考古成就，他的身世并不模糊。

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马王堆三号汉墓发现了《黄帝内经》一书，经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台湾轩辕教会会长王寒生和大陆学者余明光两先生的研究，这本成书于战国时期，并于西历前168年随墓主入土的名著，不是伪书，乃是实实在在的"治国之本"。她的存在，使我

们可以肯定，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华夏近族并建立政权的国家首领。

黄帝是伏羲女娲族裔少典氏之后，号轩辕氏，有15世。历史意义上的黄帝，通常就是指轩辕氏族；而具体指某一个人物时，一般指黄帝时代具有开创性的那个黄帝，即曾与炎帝族、蚩尤族进行过战争的那位黄帝。正如王大有先生所说："黄帝之称，是取得中央政权之后的称谓，即是说轩辕氏中的一位领袖轩辕，在打败炎帝和蚩尤及许多争霸中原的诸侯--上古族团联盟的地方国族领袖--之后，才成为众国族联盟集团的宗主领袖，才始称'帝'，在这以前，这个轩辕，不过是一个地方国族领袖而已。"（1）

黄帝，姬芒（西历前4527-前4466，合中历前31-31），生约61岁，西历前4497年建立轩辕国，帝号黄帝，在位31年。出生地在今内蒙兴和，活动范围在黄河中游地区，今陕西黄陵县西北的桥山上有黄帝陵。这里已经成为海内外全中华民族所公认的华夏创始纪念地。现在，每年清明节，早上9时50分(含九五至尊之意)，中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都要隆重公祭轩辕黄帝。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重大节日。2004年清明节公祭活动，中央电视台还首次`向全世界进行了现场直播。《轩辕黄帝颂》唱曰：

桥山巍巍，沮水长长，五千年文明开启曙光。纬地经天拓洪荒，华夏一统日月朗。啊！龙吟凤歌，国运永昌，黄帝功德，万代颂扬。

赫赫始祖，德惠永长；祚我中华，弥强弥刚；载宁九州，民富小康；钟铸盛世，用祀用享。

孙中山曾祭曰：

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惟有我先。

毛泽东曾祭曰：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西历前4515年前后，中原部落首领神农氏衰落后，在中原地区成长起来了分别以炎帝、黄帝和蚩尤为首的三大部族，黄帝居西，炎帝居东靠南，蚩尤居东靠北。三大部族谁能取得适于放牧和浅耕的中原

地区的统治权？于是，三者之间展开了中国历史上，最早且规模巨大的两次战争，也就是这两次战争奠定了中国国家政治以及中华文明的基础。第一场战争发生在黄帝与炎帝之间（一说首战在黄帝与蚩尤之间，此从《史记》），战于阪泉；第二场战争发生在第一场战争的胜利者--黄帝与蚩尤之间，战于涿鹿。结果还是黄帝取得了胜利，建立了黄帝统治时代。

黄帝通过武力取得统治地位以后，中国的国家政治时代也就开始了，应该说，是黄帝开创了中国国家政治的先河。首先，由于军事的成功，取得军事领导地位，而后他被逐步脱离血缘关系的具有原始民主社会特点的联合体--部落联盟推举为大众"天子"，实现政治统一。

黄帝取得统治地位以后，依《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为创建一个政治统治体系，他在政治管理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

第一，接尊号。"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第二，征世乱。"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

第三，开疆土，定都邑。"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厂宁居"，"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洞，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即建立都城于涿鹿之缘。

第四，置官吏。"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

第五，"顺天地之化，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

第六，画野分州。"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2）

有此六者，黄帝把中国真正带入了国家政治时代。

可以认为，以黄帝为始的八帝时期，是一个原始的民主政治时期，最大的政治特点就是选贤接替"天子"以及任用贤能。但是，这个制度，明确的历史记载是从尧帝开始的，一直运行到帝禹时期。但作为一种公选制度，禅让制度不太可能是尧帝的发明，因为历史表明，一种大的政治制度，往往产生于历史发展的剧烈变革以后。因此，禅

让制度应是形成于黄帝之后，定型于太昊世、颛顼世之间，沿用于帝喾、挚、尧、舜四世，终于帝禹。黄帝时代，是社会经过大规模战争洗礼后的稳定时期，任何社会变革都可能发生，各种新生事物都可能形成。

八帝时代的"禅让"政治制度，同现代政治制度的原始本质--选贤任能--是一致的，不同的是，现代政治制度有法律的保障，而八帝禅让政治制度是原始的公选制度，靠的是人类自然本性之默契，当然很脆弱。所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私有制度的逐步形成，"禅让"制度也就不适合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在运行2442年以后，禅让制度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西历前2055年夏王姒启创立了世袭制度，正式宣布了"禅让"时代的结束。

但是，作为一种原始的民主政治制度，"禅让"制度在中国国家政治历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是巨大的，是不可磨灭的。后人不断提出的所谓"小康"、"大同"的理想，就是对这种政治制度的某种追求。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几千年前，这种原始民主政治制度的某种投影。按照共产主义的观点，可以肯定,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终将逐步追求到一种更为高级的民主政治形式，以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

---

（1）王大有，《三皇五帝时代》，上册，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页。

（2）《汉书.卷28.地理志上》。

**********

## 第二节　夏王：姒启（？-2451）

夏启，姒姓，名启。夏王朝以及世袭政治的创立者，帝禹之子。

我们说，夏朝起于启，而非始于禹。而今天绝大多数的历史典籍却说夏起于禹，这是袭用了古代的说法。我们以为，始创世袭政治制度的夏朝应当从夏启开始。实际上，夏朝的建立与夏启的即位有直接关系。

关于夏启是如何即位的，历史书中有两种说法：益让位于启或者启夺取益位。我倒以为，后一种说法更为可能。西历前2058年，帝禹死后，选定东夷族益为继承人。三年守丧以后，在益即将即位时，启利用帝禹儿子的优势地位，举兵反对益，继而杀之自立，于前2055年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世袭政治朝代--夏朝。为了使其依靠武力夺取的王位永远传下去，启利用王权确立了影响中国3966年的王位世袭制度。由于他的行为，引起了不服其以武力自立者--有扈氏--的不满，他便率兵压服了有扈氏，确保了其从黄帝以来不是通过选举而是通过垄断权力和战争所取得的统治地位。《史记.夏本纪》有一段记载了夏启即位和镇压有扈氏的过程：

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恰，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

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帑戮汝。"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

由于启的做法是反传统的，所以他需要作很多变革来适应他的需要。一方面，继承其父的国号，曰"夏"；另一方面，改称为"王"而不称"帝"；更为重要的是，他重新制定了适合其需要的政治制度，即王

位世袭制度。从此，中国历史走进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延续3966年的世袭政治时代。

屈原《天问》中的第72问："启代益作后，何启惟忧，率然离孽，而能拘是达？"是说启欲代益而遭拘禁之祸，可为何又能逃脱呢？说明启取得统治地位绝不是以和平方式取得的。《韩非子.外储右下》、《战国策.燕策》等史籍都认为夏启是通过非和平手段取得统治地位的。

实际上，我们从帝禹没有直接传位于其子启，而是传位于益这个历史事实可以看出，禅让政治制度终于益，世袭政治制度始于启。

夏启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袭取王位，并建立王位的世袭制度，对中国的影响极其深远。说其深，他使中国政治有了一条著名的现实规则：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说其远，从夏启起至西历1911年，世袭政治制度在中国共计延用了3966年。在世界历史上恐怕没有一项政治制度能与中国的帝王世袭制度能经历怎么长久。这是中国政治的一绝。

然而，夏启的历史地位在我们的历史书籍中并不那么显耀。历史学家们或许跟了部分古人之说，或许是为了将夏朝的历史向前推，认为夏起于禹，从而忽略了启的历史地位；或许是因为憎恨夏启的行为，故意不记其历史"功绩"；或者启的父亲帝禹的名气由于远比他大，具有很大的历史影响，夏启的事迹被附会到其父之身上，而夏启的事迹也就鲜为人知了。事实上，世袭政治制度恰恰迎合了人类私有制的发展潮流，夏启只不过顺应历史潮流，以一"家"国天下，以一"私"公天下而已。

由于夏启开创的世袭政治制度是以家族为基础的，很自然，他得到了已积累了不少资财的贵族和亲属集团的支持。以后，夏启开创的王位世袭制度，在整个"夏商周"时代，逐步得到巩固、发展和完善。为了保证这种制度的长久生存，"父死子继"、"立嫡立长"、"兄终弟及"等储君制度先后建立起来，这种一姓天下的政治制度，在商周时期已至臻成熟，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稳固的宗法制度。

历史学家周谷城说：

权力之纵的传播，属于继承法；权力之横的扩张，属于宗法制。宗法制于天然的血统关系中，利用"尊祖"的情结，培植"敬宗"的习

惯。倘继祖之宗，被诸支庶所敬，则是无形之中，收了统治的效用；这于建立社会次序，何等重要！这样重要的制度，这于实行继统法之后便很自然的随着实行了，并从此把君统变成了宗统。（1）

因此，夏启，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了一个新型的世袭制宗法国家。他彻底推翻了创始于黄帝时代，系统于太昊、颛顼、喾、挚时代，成熟于尧、舜，终于帝禹的原始民主政治体系，实现了国家体系的家族化和国家政权的集权化。

历史证明，夏启开创的家族式的集权政治制度，是一种集集权腐败、自我监督、劳民自安、愚民而治、保守现状和残忍压迫于一体的宗法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是中国独特的循环发展历史的主要原因之一。

夏启以后，中国的国就是家，家也是国。整个中国世袭政治时期，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这就是夏启开创的时代的最大特征。

夏启执政9年而崩，享年不明。

_____

（1）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一版，第72-73页。

（2）《诗经.小雅.北山》。

**********

第三节　秦始皇：嬴政（4239-4288）

秦始皇，嬴政（西历前259-前210，合中历4239-4288），战国时期秦国国王、秦帝国的建立者、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战略家和政治改革家。西历前246年至210年在位，为王25年，为帝11年，生仅49岁。

秦惠文王时，前316年兼并巴蜀。秦昭襄王时，前256年灭东周。西历前246年，秦庄襄王崩，年仅13岁的嬴政即位任国王，吕不韦为相，宦官嫪毐专权用事。前238年亲政，镇压嫪毐叛乱。前237年免吕不韦相职，任用李斯、王翦等大将，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统一战争。前230-前221年，十年间先后消灭了韩、赵、魏、楚、燕、齐等六国（见表4-1），建立了中央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琅牙刻石铭文）。随后，秦始皇设置郡县、统一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分天下为36郡。

表4-1 战国七雄及其兼并

七雄 定都 今地名 所辖地区

[以今名论] 灭小国[西历前] 互攻情况 亡国

1.秦 雍

咸阳 陕凤翔东

陕咸阳东 陕、甘、晋等地 巴蜀[316]

东周[256] 六国 前206

2.韩 阳翟 豫禹县 晋、豫等地 分晋[453]、郑[375] 秦 前230

3.赵 邯郸 冀邯郸县 冀、晋全部及内蒙一部 分晋[453]、中山[296] 韩、秦 前228

4.魏 安邑

大梁 晋夏县

豫开封 陕、晋、豫等地 分晋[453] 赵、韩、秦 前225

5.楚 郢 鄂江陵县 鄂、湘、赣、皖、苏、浙全部，豫、川、云、贵一部分 陈[479]、蔡[447]、越[306]、鲁[256] 秦 前223

6.燕 孟川 冀大兴县 冀、辽等地 [山戎] 齐、秦 前222

7.齐 临淄 鲁临淄县 鲁大部及冀小部 宋[286] 魏、赵、韩、秦 前221

西历前220年秦始皇西巡陇西、北地。前219年东巡郡县，封泰山，立石刻文，南至琅牙再刻石。前218年，再次东巡，刻石之罘。前217年，派兵北击匈奴贵族，筑长城。前216年南定百越，置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前213年，焚书。前212年，坑卢生等460余人于咸阳。前210年，南巡会稽，四刻石。返都途中病逝。

秦始皇开创的是一个中央集权政治的时代，以其为始，中国历史进入了"秦汉晋时代"。他开创的变革时代，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很多，如置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单位、焚书坑儒、颁布通行法律、筑长城等等。

郡县制度不是秦发明的。早在春秋末年，晋国就首先在边地置设郡，面积较县大。战国时晋又在郡下设县，逐步形成以郡统县的两级地方行政机构。秦国在商鞅变法时期，就开始普遍推行郡县制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力排众议，唯采廷尉李斯之议，废除分封制，分天下为36郡。后随着边远地区的开拓和郡辖范围的调整，陆续增置了12郡，共计48郡。秦始皇之所以采用这种政治体制，一是因为封建诸侯国的君位和贵族职位是世袭的，而郡守和县令则可以随时由朝廷任免；二是郡县直接接受朝廷的命令和监督，而封建诸侯国则不一定。这样，郡县制有利于结束长期形成的诸侯割据的局面，维护国家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讲，秦始皇划天下为郡县，统一地方政权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西历前221年，秦始皇开始了"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1） 以及统一货币的伟大改革。这既是秦始皇加强中央集权政治、维护统一的又一重要措施，也是中国文明的一个伟大进步。在文字方面，他以秦字为基础，废除与"秦文"不同的其他异体字，简化字形，以小篆为全国规范化的文字，命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撰《仓颉》、《爰历》和《博学》三篇为范本推广。后又流行隶书。文字的统一，隶书的通用，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对推动中国历

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度量衡方面，改战国时期那种计量单位不一致的混乱局面，在秦制基础上，下诏统一了标准。诏书曰：

廿六年，皇帝尽并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2）

在统一货币方面，秦始皇摈弃流行于魏、赵、韩国的布币，流行于齐、燕、赵国的刀币，流行于秦、周、赵、魏国的圆钱，流行于楚国的郢爰和铜币，改铸秦以前的"重一两十四珠"、"重十二朱"、"两錙"等旧币，以黄金上币和圆形方孔铜钱为全国法定货币，并统一由国家铸钱，严禁地方和私人铸钱。这项改革，对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维护国家的统一，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秦始皇为了巩固国家政权，还将自商鞅以来的秦国律令加以补充、修订后，颁布全国，统一全国的法律。他北击匈奴而筑长城，南通西南夷而修栈道；他积聚兵力而平反秦势力，遍督地方而修驰道和直道；他加强思想控制而焚书坑儒，维持空前耗费而苛捐杂税；他自喜于"平一海内"而巡游南北，希望于长生不老而求仙东海；最后，猝死沙丘。

在秦始皇的所有作为中，实行郡县制，统一法律、文字、度量衡、货币，统一南越，沟通西南夷是有伟大的历史功绩的；修筑长城、驰道则有它正反两方面的意义；好大喜功，求仙长生是他的知识局限，但他焚书坑儒、垒阿房宫，则是他的历史罪过。特别是焚书坑儒，不但具有其残酷和血腥的一面，还同时毁灭了大量珍贵的文献典籍，造成中华历史文化的一次大浩劫。

西历前213年，秦始皇34年，博士淳于越反对加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要求据古制分封子弟（淳于越复古自然无理）。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建议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李斯驳杀显然太过）。秦始皇于是下令：焚烧除《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私藏《诗》、《书》，限期烧毁；谈论《诗》、《书》，则处死；以古非今，则灭族。进而禁止私学。卢生等初说秦始皇，不听。前212年，卢生等以为秦始皇暴掠为政、刑杀为威，必为乱，故逃亡以求避之。秦始皇派御史查究，将460多名方士和儒生坑死于咸阳。

在帝王世袭政治时期，加强中央集权是帝王一贯的最大政治手段，虽然这些方士和儒生为过去的封建国王辩护，但更能集权的形式

就更能使帝王使出高度集权所烂用的暴力手段。

《史记》记载："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3）这样，连自己的儿子之谏都听不进去了，秦始皇一步步走向了极端暴政。

秦始皇，焚书坑儒失信于民，逐公子扶苏，信用专臣，一步步走向灭亡。最后，猝死沙丘。专臣赵高篡改玺书，立胡亥而废扶苏，这使秦始皇"传至万世"的思想成为逝去的梦想。秦始皇创立的秦帝国，仅延续15年，传及二世就灭亡了。

秦始皇死后，被埋葬在陕西临潼骊山。

秦始皇的一生，确实是奇迹不断的一生：他横扫六合，统一列国，成为始皇帝；他创立的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被后人效法了两千多年，我们今天仍感觉到他的影响；他修筑的长城，成为地球上最宏大的人工工程；他统一文字、法律、货币、度量衡，具有超凡的远见卓识；他焚书坑儒，也留下了千古骂名。他的死，也是一个奇迹，在他坟墓周围先后发现的秦始皇兵马俑和士兵铠甲石片，前者被认为是世界人类史上的第八大奇迹，后者至今无法解释其光滑均匀表面及圆孔的制作技术。

秦始皇是一个伟大的中国历史巨人，他是奇迹的化身。他的一生恢弘磅礴，气盖寰宇。

---

（1）《史记.秦始皇本纪》。

（2）容庚，《秦金文录释义》，转引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四卷，第211页。

（3）《史记.秦始皇本纪》。

**********

## 第四节　隋文帝：杨坚（5038-5101）

隋文帝，杨坚（西历541-604，合中历5038-5101），隋朝创立者，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谋略家和政治改革家。

西历567年，杨坚袭其父隋痪公杨忠爵位，为北周隋国公。573年，北周太子宇文赟纳杨坚之女为妃，坚为大将军。576年，坚将舟师伐北齐。577年，为右三军。578年，为上柱国、大司马。579年，为大前凝。580年，北周静帝宇文阐即位，坚任左丞相。581年，封相国，总揽朝政，接着封"隋王"。也就在当年，杨坚废帝自立，建立隋朝，北周灭。587年，灭后梁。589年，灭南朝陈国，结束了中国从东晋16国到南北朝长达260多年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全国。604年，被次子杨广（隋炀帝）所杀，享年63岁。

唐初政治家魏征说，高祖（隋文帝）--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参踪盛烈。但素无术学，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又邪好符瑞，暗于大道，建彼维城，权侔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适从。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总其寻斧，剪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槚才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之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者，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诸，未为不幸也。（1）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也评价说：高祖性严重，令行禁止，勤于政事。每旦听朝，日昃忘倦。虽啬于财，至于赏赐有功，即无所爱；将士战没，必加优赏，仍遣使者劳问其家。爱养百姓，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令补用；自非享

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天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丈夫率衣绢布，不服绫绮,装带不过铜铁骨角，无金玉之饰。故衣食滋殖，仓库盈溢。受禅之初，民户不满四百万，年末，逾八百九十万，独冀州已一百万户。然猜忌苛察，信受谗言，功臣故旧，无始终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敌，此其所短也。（2）

隋文帝开创的是一个全新的政治经济时代，以其为始，中国历史进入了"隋唐宋时代"。他确立三省六部制政府机构系统、进行一系列社会经济成功改革、变革官吏选举以致隋炀帝最终诏命开设进士科创立科举制度、开创新的选举形式等方面的成就，连同他统一长期分裂的东晋南北朝局面，是他对中国历史的伟大贡献。同时，从隋文帝开始，中国又重新回到了影响世界发展的重要轨道。对此，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在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大运河（这为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伟的宫殿，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3）

建国以后，隋文帝总结秦汉以来的统治经验，在曹魏、晋制的基础上，创建了三省六部制中央政府机构，尚书、门下和内史三省长官都称宰相，下设吏、民、礼、兵、刑、工六部分管政事。对地方行政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将原来的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二级。县下设保、闾、族等基层组织。三省六部制从体系、结构和职责方面都比以前的三公九卿制要完整、合理和分明，在中国古代行政体制构建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将宰相之权以分为三，从草拟政令、审议封驳和执行实施三个方面实行三权分立体制。

但是，隋文帝的三省政治体制，虽具有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萌芽，不过，它与现代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有两个本质的区别：一是，现代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是法律至高无上，而三省政治体制则是皇权至高无上，所有机构都被置于皇帝之下。二是，现代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的立法机构，负责法律的起草和审核，不包办政令的起草，但政令必须得到立法机构的通过，实行司法独立；而三省政治体制将政令的起草和审核分立为二，且将司法部门置于政务部门之下。

显然，我们不能用现代的眼光去看待1400多年前隋文帝的成就。事实上，在皇权之下，讲什么法律至上，本身就是空谈。但是，隋文帝的三省政治体制，就政治体制本身而言仍是一个飞跃，并且这项制度也是为适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创造出来的。在国家控制以及行政等诸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

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隋文帝废除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九品中正制"，采用荐举和考试相结合的选官办法，为其继任者隋炀帝于587年（开皇七年）建立起影响中国1318年、以"分科举人"而选官吏的科举制度奠定了基础。

隋文帝建国后，所采取的一系列稳定和发展社会的改革措施，也是他的伟大历史功绩的重要部分。实行均田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减轻剥削和检括户口的办法，更对经济发展和加强国力具有重要作用。唐贞观11年（西历637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隋朝已灭亡了20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可见隋文帝时的社会富庶程度。

在军事上，在北周府兵制基础上，隋文帝建立十二府，统领全部内外禁卫部队，十二府的大将军直接隶属皇帝；禁止民间收藏和制造武器；规定军人既有军籍又有州县户籍，与百姓一样"垦田籍帐"，既扩兵源，又减少国家负担。这些对巩固新生政权，保持统一，促进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

（1）《隋书.卷三》。

（2）《资治通鉴.第180卷.隋纪四》。

（3）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112页。

**********

## 第五节　元世祖：忽必烈（5712-5791）

元世祖，忽必烈（西历1215-1294，合中历5712-5791），蒙古族，元朝首任皇帝、成吉思汗之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建树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西历1260年至1294年在位。

南宋末年，中国北部的蒙古族于西历1189年统一蒙古各部落，1206年建立政权后，1218年收复蒙古西北诸部，1220年攻破中亚阿母河下游古国花剌子模，1227年大攻西夏，1231年灭之，1234年灭金，1235-1243年西征中亚和欧洲东部，1247年征服吐蕃。

西历1251年，忽必烈任迅速崛起的蒙古帝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开府于金蓬川（今河北沽源），创官府，任用儒生，整饬吏治，实行屯田。1253年，建立交钞提举司，印发纸钞，率军攻云南，次年灭大理。1259年，围攻南宋鄂州（今湖北武昌），未果北还。1260年，称大汗于开平（今内蒙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建立十路宣抚司，作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1260年至1264年率军漠北与与其争位的幼弟阿里不哥大战而胜。1264年，迁都大都（今北京），1271年，改国号大元，建立元朝。1279年，兵入临安，灭南宋，统一中国，结束了唐后期以来军阀割据和辽、宋、金、西夏等多个政权同时并立的分裂局面。忽必烈即位后，注意任用贤能，惩治贪污，"顺民心之所欲者行之，所不欲者罢之。"将行省制度推行于全国。1294年病逝，享年79岁。

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是一个漂浮在蒙古草原上的庞然大物，根底浅薄，随时都有崩溃的危险。在他死后的32年中，帝国内部斗争日趋激烈，这个庞然大物，越来越明显地在分裂成四大块（即大

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尔汗国和钦察汗国）。忽必烈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由分裂而导致灭亡的可能，只有依靠中国多数民族，才能建立稳固的根基。于是，他果断地征服了仍居于中国南部的没落的大理政权和南宋政权，统一了中国。随后，认真保护各民族的生命，发展农牧业生产，不断调整政区和吏治，对四邻民族实行宽大的安抚政策，顺应社会发展需要，实行了"农桑为急务"的政策，并设立劝农司、司农司和营田司等机构，颁行《农桑辑要》和推行屯田及其他鼓励农桑生产的措施，使人民得到及时的休养生息。经过忽必烈的苦心经营，最终建立起一个"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1) 的庞大帝国。

帝度量恢廓，知人善任使，故能混一区宇，扩前古所未有。惟以亟于财用，中间为阿哈玛特、卢世荣、僧格所弊，卒能知其罪而正之。立纲陈纪，殷然欲被以文德，规模亦已弘远矣。(2)

在忽必烈的一系列政治变革中，最具历史影响的是他广泛建立的行省政治体制。元世祖开创的是一个行省时代，以其为始，中国历史进入了"元明清时代"。起源于金朝后期的行省制度，在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便作为一种政府行政制度在全国大规模推行，并从原来的临时的中央派出机构演变成为常设的最高地方政府。这种制度在中央设"中书省"，其分设的"行中书省"管理地方事务。"中书省"又称都省，"行中书省"全称为"XX等处行中书省"，简称"XX行省"或称"XX省"。省以下的行政机构为路、府、州、县四级，西南又有宣抚司、安抚司和军。唐宋时期较大的州升为路。府或隶属省，或隶属路。州或隶属于府，或隶属于路、省。府州或不领县。这就是行省制度的最初来源。元朝初期，1280年（元至元十七年），直隶中书省和行中书省的分布如下：

直隶中书省：辖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漠南、漠北、辽东、西夏故地等；

六行中书省：

一、陕西四川行省：辖金陕西五路、南宋四川路故地、治安西路（今西安市）；

二、云南行省：辖大理政权故地，治中庆路（今昆明市）；

三、江淮行省：辖南宋两淮、两浙路故地，治扬州路（今扬州市）；

四、江西行省：辖南宋江西、广东路故地，治隆兴路（今南昌市）；

五、福建行省：辖南宋福建路故地，治泉州路（今泉州市）；

六、湖广行省：辖南宋湖南、湖北、京西南、广西四路故地，治潭州路（今长沙市）。

同时，作为特殊设置，还有几种特别地方行政机构。在黑龙江上游地区，有成吉思汗诸弟的封地；在黑龙江下游及松花江中下游地区，有若干女真部族的万户府；在极北（今蒙古国及其以北）地区，有断事官辖地；在吐蕃（今青藏高原）地区，有直隶中央的总制院辖地。

到西历1330年（元文宗至顺元年），行省设置及其辖地均有所变化，"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分镇藩服，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军四，安抚司十五，县一千一百二十七。"(3) 最大的变化是在朝鲜半岛置征东行省，辖半岛全境；在东北置辽阳行省，辖东北全境（包括骨嵬,即今库页岛）；在中国北境置岭北行省，辖今蒙古国及其以北至北冰洋的广大地区；吐蕃地区改为宣政院辖地（1288年），下辖三道宣慰司，每个宣慰司下再设置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元帅府、万户府等。

朱元璋于1368年推翻元朝，建立明朝以后，仿元制以中书省和行中书省分统郡县；1376年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1380年罢中书省，以所领郡县直隶六部。这时，中国全境有一个中央直辖区（直隶），12个布政使司。后来增置云南布政使司，交址布政使司（1407年设，1427年罢），直隶一分为二。但十三布政使司流俗仍然称作十三省，加上二直隶（又称京师、南京）共计十五省。

行省制度，自元朝推行于全国以后，经过明、清、民国，直到共和国，一直沿用。

---

(1) 《元史.地理志》。

(2) 《续资治通鉴.第191卷.元纪九》。

(3) 《元史.地理志》。

**********

## 第六节　民国临时总统：孙中山（6364-6423）

孙中山（西历1866-1925，合中历6364-6423），名文，字逸仙。中华民国临时总统，中国现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政治家、思想家，中国政党政治的创始人。

西历1892年，孙文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获医科硕士学位，开始行医。以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救死扶伤而闻名于世。但他不满于做一个医治人体疾病的良医，而更关心国家民族的"痼疾"，认为"医国"比"医人"更重要，于是开始了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政治活动。1894年，赴京上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1823-1901），主张革新政治，被拒绝后到檀香山组织中国第一个政党组织--兴中会。1895-1900年，曾联合广东会党相继举行起义，均遭失败。1905年，在日本领导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联合组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第一个政治党派--中国同盟会，任总理。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理论和政治纲领。创办《民报》宣传革命。

1911年10月10日，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影响下，同盟会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3966年的世袭政治制度。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在南京就任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被迫去职。但是，他在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元旦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所做的演说誓词和所发表的总统宣言书，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孙中山在誓词中说：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说：临时政府的历史使命就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实现民族、领土、军政、内治和财政之五统一。并"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

然而，由于外部势力的干涉以及革命的不彻底，孙中山于三月后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开始了新的革命事业的征途。

西历1914年，孙中山重新改组中国同盟会为中国革命党，任理事长，重举革命旗帜。次年发表《讨袁宣言》，1918年被迫去职。1919年，创办《建设》杂志，发表《实业计划》。同年，将革命党改组为国民党。1921年，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后退居上海，发表《三民主义》学说。1923年，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1924年，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军阀，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议会。

西历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享年59岁。民国元老于右任挽之曰：

总四十年胼手胝足之工，直是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历程中揖让征诛，举同尘土；

流九万里志士劳民之泪，始知其来也有因，其生也有自，瞑目后精神肝胆，犹照人寰。

的确，孙中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辉煌的一生。他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结束一朝，开创一代"的重要历史作用。

首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3966年的世袭政治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迫使清朝皇帝退位。皇权不存在了，国家首脑通过"选举"产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是一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事件。1912年，既是中国旧历史的结束，又是中国新历史的开始。

其次，孙中山建立政党政治制度以取代腐朽的世袭政治制度，并在中国政治原有的行政、考试和监察制度基础上，融合世界通行的三权分立原则，创建"五权宪法"，创立民国政府，这同样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虽然，这些积其毕生精力所取得的成果在他本人身上，由于其过早去世而没有得到一一体现，但至少政党政治制度保留下来了，世袭政治体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第三，孙中山提出了著名的三民主义政治理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族主义要求推翻腐败的满清统治，民权主义要求建立民国，民生主义要求平均地权。前两者它都做到了，唯有"平均地权"未能如愿。1924年他重新解释了他的理论：民族主义要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要建立一般平民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民生主义还是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他的三民主义，实能采纳世界政治新潮流之各趋势，而使其会归一致。民族主义里，有德意纳粹与法西斯精神之优点，而无其缺失。民生主义里，有苏俄共产政权向往之长处，而无其偏病。民权主义有把英美政党代议制度之理论，释回增美。"（1）他的理论水平提高了，愿望也大了。然而，他一样都没能实现。但这并不能影响和动摇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孙中山草创的中国政党政治，由于种种原因，经历了三次大的转折。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刚刚成立，由于外族的干涉以及自身革命的不彻底性，很快对袁世凯妥协，使中华民国政府转眼演变成为北京军阀政府，这是第一次转折。

1917年，由于北京军阀政府镇压革命，于是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算是彻底与北京决裂，开始重新在南方组织革命政府。护法革命失败后，1920年孙中山又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被举为非常大总统，准备北伐，后因广东军阀陈炯明的叛变而再度失败。

尽管孙中山本人因积劳成疾而于1925年逝世，但其成立的广州政府在国共合作中得到延续和发展。广州政府于1926年誓师北伐，1928年占领津京，基本完成全国统一。但是，蒋介石排斥共产党，拥兵自重，分化自广州迁都武汉的民国政府，使中华民国政府演变成为蒋氏专制的南京政府，使孙中山的政治革命出现了第二次转折。

蒋介石本人不乏军事才能，但缺乏战略眼光；工于权略术数，但不得民众支持。这成为蒋介石本人及其南京政府在大陆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蒋氏南京政府成立前后，蒋介石就大排异己，专制独裁，镇压农工运动，把自己的政权建立在新旧军阀、大地主、大资本财团和帮会之上，完全忽视孙中山的"民权"和"民生"。他为了取得国际社会对其政府的承认，对西方国家在中国制造的"万县惨案"、"南京惨案"等姑息不闻，对西方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大搞妥协。蒋氏不顺世界潮流建立多党合作的民主政府而大搞专制独裁，对外不重点废除不平等条约，抵御侵略，对内则利用其主要军事力量打击和消灭异己。终致内外交困，走向灭亡。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8月13日，美国"总命令第1号"规定中国（包括台湾）和北纬16度以北的印度支那地区为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受降区，蒋介石本可以籍此可以收回北越地区、香港、琉球群岛（包括钓鱼列岛。根据1943年中、英、美《开罗宣言》规定，1914年以后日本侵占的所有中国领土应于全部归还。苏联为了实现其支持外蒙独立和取得在我东北沙俄时期的侵略权利，在美英苏雅尔塔会议上将时间推到1904年，斯大林要为1905年日俄战争雪耻。中国作为战胜国，完全可以遣兵占领琉球群岛，收回日本在1895年非法侵占的中国属地）的主权。然而，蒋介石却在妥协和所谓"以德报怨"的错误立场中，集中军事力量于内陆地区准备内战，以期一举消灭在抗日战争中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并且，蒋介石为了取得美援，以赢得在内战中的优势地位，先后与美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关于处理在华军事人员刑事换文》（1943）、《美国在华空中摄影密约》（1945）、《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946）、《三十年船坞蜜约》（1947）等。如果我们还向前延伸的话，还有中日1932年中日《淞沪停战协定》、1933年《塘沽协定》、1935年《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我们不能不说，蒋介石完全背离了孙中山的

政治理想，成了一个与后清政府、北京军阀政府一样的以卖国权求自存的独裁者。由此，我们又可以看到，蒋氏的失败又是必然的。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留在了大陆，先后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的败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孙中山的政治理想获得了新生，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第三次转折。正如江泽民主席所说的："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革命精神，与一切忠于他的事业的人共同努力，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打败了国内外一切反动派，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始终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2）

1925年孙中山逝世到2003年，虽然过去了78年，但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和影响至今仍在。孙中山是中国历史上当然的巨人，"孙中山先生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历史伟人，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为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贡献了毕生精力。"（3） "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4）

孙中山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巨人，在于他一生所竭力追求的"创新求强"思想及其所取得的历史成就。"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他留给后人的至理名言。今天，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顺"世界潮流"而"昌"的结果。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永远记住孙中山伟大的民族精神和伟大的历史功绩。

---

（1）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一版，第116页。

（2）江泽民，《在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10月9日。

（3）江泽民，《在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10月9日。

（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一版，第312页。

**********

# 第五章 历史循环

中国历史一再揭示一个规律：“循环兴衰”，即尚贤兴邦，贪腐败国。大凡一个朝代的开创者，往往都能吸取历史教训，实现尚贤兴邦。大凡有建树的中兴之主，都能德礼并重、法监同举，造就一代煌煌盛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统治集团贤能不进、德礼不兴、法监不用、贪腐不禁之时，国家也就不能长久了。终其过程，中国历史不过“尚贤使能兴邦——德礼法监致强——贪污腐败亡国——农民革命改朝换代”四步循环而已，这是中国每个朝代从产生到灭亡的通用模式，这也是中国世袭政治固有的历史发展规律。

## 第一节　尚贤使能：兴邦

尚贤思想，可追溯到八帝时期。那时的"禅让"政治制度就是一种有效的尚贤制度。"禅让"政治制度下的尚贤，其精髓是公众推举贤君，任人唯贤。"黄帝立四面，尧、舜得伯阳、续耳然后成"。尧帝时，"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1） 舜帝"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2）"禹周于天下，以求贤者，事利黔首。"（3）　整个尧、舜、禹三帝时代，贤能并举，国家昌明。"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4）

尧舜禹三代（西历前2342-前2056）时期可作为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个开明盛世。

但是，到了夏代及其以后，由于世袭政治制度的确立，尚贤制度发生了变化。所谓"尚贤"，演变成了君主选贤了。由于国君来源于一姓，因此国家的帝王贤与不贤就成了一个次要的问题，帝王的继承人即使昏庸无能、或老耄乳婴，同样是中国的最高领导者。在这个时期的尚贤，实际就是选贤而已，不涉及最高统治者。但尚贤思想是得到

肯定的，即使是"夏商周时代"的末期--战国时代，也主张"选练举贤，任官使能"，那时有很多著名的尚贤思想凸现。如："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5） "昔伊尹去夏如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入齐，鲁弱而齐强。夫贤者之所在，其君未尝不尊，国未尝不荣也。"（6） "治国之难在于知贤，而不在自贤。"（7） "凡治国有三常：一曰君以举贤为常，二曰官以任贤为常，三曰士以敬贤为常。"（8） 等等。

在12个大一统朝代中，夏朝，因史籍不足，无法究其详。但自古无贤者则无以立国。

从商、周代开始，尚贤兴邦的过程，在历史典籍当中，都有了明确而详细的记载。

夏桀败没以后，商汤"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贤良，顺民所喜；远近归之，故王天下。" （9）殷高宗武丁命傅说为相，明言"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10） 遂中兴殷商。

周朝初年，周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与天下之贤者为徒"，贤者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等归之，用八虞（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马 吳 ）、二虢（虢仲、虢叔），乃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周武王姬发败殷擒纣以后，"显贤者之位，进殷之遗老，而问民之所欲，行赏及禽兽，行罚不辟天子，亲殷如周，视人如己，天下美其德，万民说其义。" （11）周武王拜吕望为太师，尊尚父，吕望成兵书《六韬》大略；纳商臣辛甲（即辛尹）为太史，辛甲兴劝戒箴辞；任周公（姬旦）摄政，姬旦制礼作乐，立典章制度，为儒礼之始。周成王姬诵、周康王姬钊承而行之，"选建明德"，"天下安宁，刑错四十年不用"，开创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开明盛世--"成康之治"（西历前1042-前996）。后来，吕望封国于齐，周公封国于鲁。周公问吕太公曰：何以治国？太公曰："尊贤上功"。即尊重贤能，崇尚功绩。结果齐国"日以大，至于霸"。相反，采取不同治国政策的鲁国则"日以削，至与觐存，三十四世而亡。" （12）正如西汉哲学家董仲舒所说：

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馀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

（13）

在尚贤事件上，最激动人心的一幕发生在纷纷攘攘而又人人求治的战国时代。　　西历前361年（秦孝公元年），时年21岁的秦孝公下了一道著名的"求贤令"。司马迁是这样记述的：

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会盟，夷翟遇之。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曰：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14）

求贤令一出，商鞅、张仪、范雎、白起等，先后相继西入秦，并如约得以重用，秦由是得以开疆劈地，由一个边僻小国，变成一个横扫六合的鼎鼎强国。后来，成为秦帝国丞相的李斯在其著名的《谏逐客书》中说：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 杜私门，蚕食诸侯， 使秦成帝业。（15）

可见，秦王国的强大和完成全国统一，直接得益于尚贤使能，真可谓立竿见影。自此以后，历朝历代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和聪明的政治家，都把尚贤作为第一要事。各种"求贤令"和尚贤制度层出不穷，其中除了秦孝公的"求贤令"外，著名的还有：汉高祖刘邦的"求贤

诏"、唐太宗李世民的"惟才是与"、明太祖朱元璋的"开科举诏"、清康熙爱新觉罗.玄烨的"举博学鸿儒诏"等等。

汉高祖的"求贤诏"如是：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我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16）

刘邦因全力举用贤能，文有萧何、张良、陈平等，武有曹参、韩信、彭越、英布等，与项羽争天下，统一了国家。到文景、武帝时期，"举贤良，明教化"，"封贤禄能"，尚法尊儒，兴察举制度，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三个盛世--"文景之治"（西历前179-前87）。中国历史上大批杰出的人物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如汉武帝、贾谊、董仲舒、卫青、霍去病、张骞、桑弘羊、司马相如、司马迁等等。

汉初统治者成功地继承了秦始皇的各项改革成果，并创立了不同凡响的皇权下的基于选贤进能的文官制度，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它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汉朝从一开始就开放贤路，使有才能者不分等级获得了晋升之途；公元前196年，即在恢复秩序后的六年，皇帝曾亲自下令各省行政长官应根据才能选拔公职候选人，并派送他们到京，听候中央官员来决定取舍。

古代中国的这一新文官制，后来获得了确定的形式；汉刘邦的继承者汉武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40-87年）决定：对候选人所要求的才能应是擅长于模拟儒家典籍的古文体和解释儒家哲学时要达到当时的儒家认为满意的程度。公元前二世纪的儒家学派，如此巧妙地被诱入了帝国政体的合伙关系中，这会使孔子本人也觉得奇怪；但甚至这种纯粹的政治哲学，对一个团体的专业生活方式所发生的感召力，比戴克里先时代希腊世界的单纯古文学所发生的，也许要有效得多。这种政治哲学尽管看起来是玄学的，但提供了一种传统的伦理，而这在罗马世界的文官制中却是付之阙如的。

奥古斯都在应付他所负责的残破、紊乱而又疲惫的世界而创立的文官制上所取得的成绩，可比诸一百五十年前古代中国汉刘邦所做的

工作。的确，就持续性来说，这一位中国农民的工作远胜于罗马平民出身的屋大维。奥古斯都的制度在创立后的七百年已变为粉碎，而刘邦的制度可以说一脉相传，一直持续到公元1911年。

就成果的持久性来说，汉朝的创建者可以算是所有统一国家缔造者中最伟大的政治家。西方世界对于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类似而稍差的成果是熟悉的；但在西方世界，除了中国史专家以外，几乎不知道刘邦的历史事实。凡是研究未来的世界社会的历史学家，如果能懂得过去一切文明的历史根源，当然会有更好的比例观念。

我们可以把公元前196年作为古代中国统一国家全体人民获得政治权利的开始日期。几乎无须指出，这项政治上的成绩并不能一下子改变古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该社会依然是由纳税的农民群众以及由他们所维持的少数特权统治阶级所组成；但在这以后，进入中国政界之路，却已真正开放给不分社会等级的有才之士了。（17）

唐朝初年，是尚贤的典范时代。唐高祖李渊曾说：

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置，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以新为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噱怨，岂为政之体乎！（18）

唐太宗李世民更有用贤致言：

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虽雠不弃，魏征等是也。（19）

因是"博访英贤，搜扬侧陋"，使天下贤能得资国用。正是两代皇帝的"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俭以息人"，开创了大唐200余年基业，在中国历史上树立了第四个太平盛世--"贞观之治"（西历624-649）和"开元之治"（西历713-741）。

西历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发布"开科举诏"，明令"设科举起怀才报道之士务在经明修行，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像称……设科取士，期必得于全材；任官惟贤，庶可成于治道。"明成祖朱棣于1403年即位以后，发挥其智勇大略，"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20） 西历1420年明成祖顺利迁都北京。接后的明仁宗朱高火只，"在位一年，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

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21） 明宣宗朱瞻基承仁宗之政，"惩吏道贪墨，登进公廉刚正之士" （22）；平汉王（朱高煦）之乱，息兵养民，安民求治。铸就中国历史上第五个著名盛世--"仁宣致治"（西历1403-1435）。

清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也是著名的贤君。他于1678年发布的"举博学鸿儒诏"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举博学鸿儒诏"和他于1673年发布的"撤藩令"为清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基础。"举博学鸿儒诏"全文如下：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廷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材，四海之广，岂无硕彦奇才，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纵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至意。（23）

康熙可谓是"一诏怀柔天下定"，平"三藩"（指镇守云南、贵州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之信和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三个藩王）、统一台湾；平定准噶尔、统一回疆；安定西藏、一统蒙区；鼎奠了前清150余年鸿业，经清世宗（胤祯，雍正）图治，延至清高宗（弘历，乾隆），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六个煌煌盛世--"康乾盛世"（西历1662-1795）。

当然，中国历史上求贤创业者还有很多，此仅择其要而说之。历史上还有许多著名的人物。如三国前期曹操，曾三令求贤，直接提出了"唯才是举"的著名口号。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是世袭政治时期帝王政府通过考试选拔贤能官吏的一种独特的选才制度。自然，从人类进入政治时代以来，都存在怎样选择政府首脑及其下属官吏问题，中国首脑的选择，到目前有三种：一是公众推举，一种是世袭产生，还有一种就是政党内部选举产生。在世袭政治时期，政府首脑就没得选举了，只有选举皇帝以下的各种各级官吏。在夏、商和西周周时期，中国官吏的选用，是严格按照由贵到贱、由亲到疏的若干等级，像皇帝的职位那样

也是世袭的。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的重要性以及在战争中立功者的增多，官吏源于军队也就多了起来。于是，论军功选拔官吏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制度。所以韩非说："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功相称也。"《商君书.镜内》也称："能德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24）

秦国把军功爵位制度，定为二十级，一至八级为士兵的爵位，称为低爵。八级以上的是统治者的爵位，称为高位。因军功封得爵位，高者名君曰侯，食邑居县；低者食一田宅，或免刑免役。刘邦建国以后，也承此制。

到西历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令郡国举孝廉一人"，并要求每年由地方官把"吏、民中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遣送京师，以备录用。送进京师的人，再由丞相、列侯、刺史等考核、推举，最后任官职。此法在历史上称为"察举制"，也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官制度。

经过330年后，到西历220年，三国魏文帝曹丕为了争取豪强大族对曹魏政权的支持，建立了九品中正制。他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选举各郡有声望的人，出任"中正"，州置大正中，郡置小正中。负责向朝廷提供各地各种人的考察资料，从一个人的身世、道德和才能各个方面"品"出九级，及时上报，以备政府按等选用。这也就是所谓的"九品官人法"。由于中正出身豪门，自然寒贫之士得不到论品上荐，施行不久，"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到隋统一中国后，为了抑制门阀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者对此进行了全面改革，彻底废弃了九品正中制，于587年（开皇七年）建立起了影响中国1318年的科举制度。它以"分科举人"而选官吏。经唐宋、明清的逐步改进而得到沿用。不过，这个制度发展到清朝，逐步演变成为使下民思想僵化、故步自封、统治者愚民的有力工具，具有极端的片面性和反动性。到清末，科举试题不出《四书》、《五经》，形式固定为八股文，解释标准也无出朱熹的《四书集注》等。直到1905年（清光绪31年），中国第二次推行学校教育，才彻底废除科举制度。

现代中国政治，是政党政治，其各项政治制度，远比古代帝王世袭政治制度高明得多，但求贤不在一朝一夕，而在于万世之中。只有能永远地保证举贤（大部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而用，才不致像古代历朝历代那样陷入循环兴衰的历史旋涡。因此，2300多年前秦孝公的"求贤令"的回音，应当为后世中国所有战略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以及十多亿中国人铭记于心：

昔我华夏民族，拥欧亚大陆东土，修德行武，东拒倭寇，以海为界；西霸巴尔克什湖和帕米尔高原，广地万里。国家强盛，人民富足，边国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后清政府不思革新奋进，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寇东倭、北熊、西狐掠占我东海、北疆、南陲之地，边国卑华，丑莫大焉。共和国革新大陆，镇抚边境，定都北京，且欲清雪国耻，光复本土之故地，修民主之政令。政府思开国贤君之意，常痛于心。世界华裔民众，有能出奇计强国者，政府当列贤名实位与之共图统一大国之伟业。（25）

---

（1）《尚书.尧典》。
（2）《史记.五帝本纪》。
（3）《吕氏春秋.孝行览》。
（4）《尚书.益稷》。
（5）《战国策.秦策》。
（6）《战国策.楚策》。
（7）《列子》。
（8）《周书阴符》。
（9）《吕氏春秋.仲秋纪.简选》。
（10）《尚书.说命》。
（11）《吕氏春秋.仲秋纪.简选》。
（12）《吕氏春秋.仲冬纪.长见》。
（13）《资治通鉴.第17卷.汉纪九》。
（14）《史记.秦本纪》。

（15） 《史记.李斯列传》。

（16）《古文观止》。

（17） 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3、82、42、88页。

（18）《资治通鉴.第192卷.唐纪八》。

（19）《资治通鉴.第194卷.唐纪十》。

（20） 《明史.卷七.成祖纪》。

（21） 《明史.卷八.仁宗纪》。

（22） 《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赞曰”。

（23）《东华录》。

（24） 《韩非子.定法》。

（25） 仿秦孝公“求贤令”而作。

**********

## 第二节　德礼法监：致强

德礼法监四者，德为道家信用，礼为儒家仁礼，法为法家法治，监即监察举措。

春秋以后，到战国时期，统治阶级加强对人们思想和行为控制的工具分为四个部分：一部分是由不完全的周礼演变成系统的儒礼，一部分是由隐秘的刑令变成公开的成文法，一部分就是提倡"无为"、主张自我约束的道德信用，还有一部分是皇权控制下的监察体系。在中

国历史上，伴随统治阶级思想的主要就是此四者。历朝历代统治者，忽而重礼，忽而重法，忽而又重德，或者力举监察，在四者之间构成了统治者加强其统治的政治精髓。

《吕氏春秋》说："德也者，万民之宰也"，"圣人形德乎己，而四方咸饬乎仁"。（1）后来布信、施仁便成为中国道德政治传统的主要内容。但最终，因为"德"主要强调个人的操守和修养，而面对社会大众的信用、仁德便逐步融合到了其它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之中去了，因而"德"往往是一个不见于形的空泛概念。但是，在中国文化的底蕴之中，"德"始终是第一位的。"德"是礼、法、监三者的总纲，又根置于三者之中。

由于中国在八帝时期，实行的是原始的民主政治，而民主是与法分不开的。因此，法比礼，在中国要早出现，法在八帝时期已经存在了，而礼在商周之际才系统产生，周代才形成制度体系，至战国时期才至臻完善。而德则自古有之，它融于远古圣人的思想和行为之中。将其升华为一种理论，则要归功于孔子和老子。不过，孔子的德是要人们遵从严格的人际秩序，而老子的德则主张无争而无为，以信用为上。

礼，笼统地说，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2） 认为礼是人的行为规范。孔子提出"齐之以礼"，要求人的言行符合周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3）荀子也认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4） 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把礼进行了系统阐述，直接提出了"礼治"的思想主张。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5）认为，用政令和刑法治国不如用德和礼治国，要求统治者以"礼"节制人的情欲，约束人的行为，使人安于名位，维护贵族等级秩序。这种德礼治国和齐家一致的理论，及孔子儒礼理论的确立，成了中国"家天下"的政治形式得以"长治久安"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把治国和齐家融合一起，提出了"仁"和"礼"学说，教人们"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尊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秩序。

隋朝初年，太子少保兼纳言苏威对隋文帝杨坚说："臣先人每诫臣云：'唯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何用多为！'"（6） 集儒礼思

想于一身的《论语》，被北宋初年的宰相赵普视为政治天书，他曾对宋太宗赵光义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治天下。"可见儒礼对立身治国，在世袭政治时代是何等重要！

任何事物都有其正反面，儒礼道德也不例外。关于这一点，许倬云先生分析得比较清楚："礼仪的系统化与制度化，一方面意味着一个统治阶层的权力已由使用武力作强制性的统治，逐步演变到以合法的地位的象征。另一方面，规整的礼仪也代表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固定，使成员间的权利与义务有明白可知的规律可以遵循，减少了内部的竞争与冲突，增加了统治阶层本身的稳定性。相对的，统治阶层也为了安定而牺牲其灵活适应的能力。"（7） 一方面，长期的分裂征战，礼仪道德丧失，社会需要更为残酷的战争整肃，然后依靠道德礼仪和法律重整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规范、烦琐、无有法律支撑的礼仪道德，在新生社会秩序中，由于利益的作用，又漫漫地被侵蚀掉，社会又重现危机。这是中国历史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道德礼仪与法制之间的关系，因而中国总是反复出现相同的社会危机。

在中国世袭政治制度下，皇权高于一切。因此，法也不能例外地被置于皇权之下。但说起其历史来，又可谓历史悠久。帝禹时就有"禹刑"；夏有"政典"、"常刑"、"常宪"；商有"汤刑"、"殷彝"、"先王成宪"；周有"九刑"、"吕刑"、"文王文彝训"等。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诰"、"誓"、"令"等。但在春秋以前，中国的刑律是不公布的，对当时的平民，什么时候用什么刑，完全由贵族临时决定，这种"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8）的历史局面，到了春秋末年，随着周王室衰微、公室卑弱、大夫专政以及大夫之间的兼并而有所打破。

法，真正从贵族手中走向公众，是郑国政治家子产的功绩。西历前536年（郑简公30年），子产"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将贵族阶级的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加以公布。这个改革，使贵族阶级的习惯法，因铸刑书而成为成文法，使公众了解具体法律内容。这在中国法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此变革，列国称法变革者，不断出现。仅在战国时期，继子产之后，李悝、邹忌、申不害、商鞅、韩非等理论与实践并举，法治成就斐然，强国迭起。

魏国李悝"撰次诸国法"，编成一部《法经》。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和"具法"六篇。开中国法典之先河。

齐国邹忌推行法家的"谨修法律而督奸吏"的政策，惩办"田野不辟，民贫苦"，却贿赂国王左右的阿大夫和欺骗国君的官吏，使齐国"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9）

韩国在西历前354年任申不害为相，他认为"法者，因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10） 主张"明法正义"，"任法而不任智。"（11） 并努力实践他的法治思想，虽国家强大不如魏、齐、秦等国，但使狭小的韩国，居战国七雄而有其一。

秦国在西历前356年和西历前350年任用商鞅两次变法而得大治，集中反映商鞅一系列新的法治观念和治国思想的《商君书》，其生产的影响是震古烁今的。《商君书》和另一部法学著作《韩非子》，成为横贯古今的中国法治思想的两座丰碑。《商君书》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主要在于推行法治。明确提出，"任法而国治也。"（《商君书.慎法》）而法治之要，在于"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时。"（《商君书.更法》）阐述了其变法论的基本实质。略出于后，以法治为其主要内容的《韩非子》，则在立法、执法两方面，则具有更大的进步。

特别是，《商君书》和《韩非子》二书明确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更是难能可贵的。《商君书.修权》说：

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

韩非也说：

以法治国，举措而已也。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12）

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疏贱必赏，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13）

但是，韩非在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同时，又主张君权至上，并且法治限于赏罚，这样，他的理论缺陷，又限制了其先进的法治理论的推行。所以，尽管其影响致深，但在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为正统思想，这既是韩非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政治悲哀。

除了《商君书》和《韩非子》，《管子》的法治思想也是具有相当重要地位的。《管子》上说：

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于上。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其馀不强而治也。（14）

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15）

自夏至清，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就是"家天下"的帝王，帝王集国家权力和民众的生杀大权于一身。但是，不管帝王权力是如何的大，终究不能操守一切，明了一切。于是，置监举错就被统治者重视起来。但首创监察制度的恐怕应该是黄帝，据《史记》记载，他曾"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管子也曾说：

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于朝，而备诉讼也；汤有总街之庭，以观民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囿，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16）

《吕氏春秋.不苟论》也有类似记载：

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革召 。

可见，设置监察制度在中国也是一个很早的事情，它在黄帝始建国家体系时就有了。这与当时的帝位"禅让"制度是相对应的，这也进一步印证了黄帝建立国家体系时期相关制度的建立情况。到了西周时期，有专门掌管纠察的官职"司寇"。到秦朝时期，主掌监察事务的"御史大夫"成为仅次于丞相的中央最高长官。在其下的"侍御史"或者给事殿中，或者举劾非法，或者督察郡县，或者奉使外出执行指定任务。到西汉时期，改为"大司空"，置机构御史府，东汉时称为御史台，成为正式的监察机关，长官称为"御史中丞"。后来，历代沿袭，直至明初，才改为都察院，其长官为左右都御史，其下还设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地方分十三道，每道又置监察御史，巡察州县，考察官吏。至

清雍正元年（1723年）将"六科给事中"并一，称为"科道"，把它建成为最高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

其中，"给事中"是始置于秦的备顾问应对、讨论政事的官职，到明初的洪武六年（1408年），政府机构分为吏、户、礼、兵、刑、工等六科，各科分置给事中官职，因此称为"六科给事中"，以辅助皇帝处理奏章，稽察驳正六部之违误。1723年才并入都察院。

监察御史的工作，在唐代分察很细。《新唐书.百官志》记载，监察御史共计分察六事：

其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其三，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其四，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才异等，藏器晦迹，应时用者；其六，察黜吏豪宗，兼并纵暴，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

后来，监察御史兼察尚书省六部，宋朝沿袭。

在地方，唐朝仿汉制"刺史"之职设立"按察使"，以巡各道，考核吏治。711年（景云二年）分置十道按察使，成为常设官员。732年改为采访使，758年又改为观察处置使。宋变为提刑使，稍有质变。1199年金改回按察使，元代改为肃政廉访使，明又改为按察使，直至清末为"提法使"，即臬司或臬台。

总之，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监察机构及其监察官员的存在，确实对加强帝王的专制统治起到了"防蠹"作用。但是，各级监察机构的设置都是在皇权控制之下，其本质不是为民众服务的，而是统治者的耳目而已，因而，其所谓作用是向下的，对其统治者就无所谓"防"，更无所谓"监"了。所以，各级监察机构和监察制度往往都流于形式，这就是世袭政治的固有缺陷。不过，大凡重视监察及其实效的统治者，往往都能兴国家之力，振弱而强。

败亡之国，大都无监察也。

---

（1）《吕氏春秋.季秋季.精通》。

（2）《左传.昭公25年》。

（3《论语.颜渊》。

（4） 《荀子.修身》。

（5）《论语.为政》。

（6） 《资治通鉴卷.第175卷.陈纪九》。

（7） 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2001年第一版，第172页。

（8）《礼记.曲礼上》。

（9）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10）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11） 《太平御览.卷638》引《申子》。

（12） 《韩非子.有度》。

（13） 《韩非子.主道》。

（14） 《管子.法禁第十四》。

（15） 《管子.任法第四十五》。

（16） 《管子.桓公问》。

**********

## 第三节　贪污腐败：亡国

"无偏无私，王道荡荡"。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中的《洪范》篇所说的。然而，中国自有世袭以来，"贪人败类"者屡出不绝。故古人屡劝："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1），"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

身"（2），"百官好利而无耻，国亡"（3），然每朝每代并未能吸取这些教训，英明之主都只能救世一时一世，不能利及万代。遍观中国历史，为政亡身者，多以贪欲为念；治国害民者，多以贪腐为欲；坐王败国者，也多以害贤为始，以失德、废礼、烂法、失察拒谏为继，以贪污腐败致乱，以农民起义为标志，最终亡国。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说：

治理人类不要用极端的方法；我们对于自然所给予我们的领导人类的手段，应该谨慎地使用。如果我们研究人类所以腐败的一切原因的话，我们便会看到，这是因为对罪犯不加处罚，而不是因为刑罚的宽和。……如果一个国家，刑罚并不能使人产生羞耻之心的话，那就是由于暴政的结果，暴政对恶棍和正直的人使用相同的刑罚。……如果有一个国家，那里的人所以不敢犯法纯粹是因为惧怕残酷的刑罚的话，我们也可以肯定，这主要是由于政府的暴厌，对轻微的过错使用了残酷的刑罚。

有两种腐化，一种是由于人民不遵守纪律，另一种是人民被法律腐化了。被法律腐化是一种无可救药的弊端，因为这个弊端就存在于矫正方法本身中。……在一个共和国里，如果奢侈之风已经树立了，人心也就随着转向私人利益。……一个被奢华腐蚀了的灵魂，它的欲望是很多的，它很快就成为拘束它的法律的敌人。（4）

孟德斯鸠的话，从法理角度说明了一个国家因暴政、腐化而衰亡的原因。中国历朝历代的衰亡过程完全可以作为孟氏理论的有力佐证材料。

中国第一个世袭政治朝代--夏朝的灭亡，就像它的开国那样很具有代表性。《史记.夏本纪》记载：

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

此记录说明，夏朝末年，夏桀囚贤败法，失德而伤百姓，以致诸侯纷纷背叛，最后在商汤革命中战败而亡，国家工具已经不堪一用。可见，夏朝灭亡非夏桀"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乃是因为夏朝自腐太深。对此,《吕氏春秋》也有明确的记述：

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5）。

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守法之臣，自归于商。（6）

如此夏国，如何不灭？

商朝的灭亡与夏朝如出一般。到商朝末年，纣王害贤能而囚西伯、商容；废礼德而男女裸逐；烂法刑而兴炮烙、醢脯；拒谏监而剖比干去微子；信谗言而重费中、恶来；图享乐而厚赋税、嬖妇人，"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周武王发现，殷商"谗慝胜良"、"贤者出走"和"百姓不敢诽怨"以后，遂檄商王曰："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痛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7）于是，武王与太公选车三百、虎贲三千伐纣，结果商纣兵败赴火而死，商朝灭亡。取而代之的周武王总结说："商王大乱，沉于酒德，辟远箕子，爰近姑与息，妲己为政，赏罚无方，不用法式，杀三不辜，民不大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国。"（8）

周朝又如何呢？她实际上在西周末年周平王迁都以前就灭亡了，历史上的东周，实际仅是一春秋、战国时期的一诸侯而已。西周一统300余年，"成康盛世"之后，"昭王之时，王道微缺。"到西周第五代国王周穆王时，"王道衰微"。到第七代国王周懿王时，"王道遂衰"。此时西周已走过200多年。周穆王时，制《甫刑》，开始大置惨法，"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第十代国王周厉王拒谏，"好专利，芮良夫谏而不入，退赋桑柔之诗以讽，言是大风也，必将有隧；是贪民也，必将败其类。"（9）其诗曰：

大风有隧，贪人败类。

听言则对，诵言如醉。

匪用其良，覆俾我悖。（10）

周厉王不听芮良夫、邵公之言，最后"流死于彘"。

西周最后一个国王周幽王更是腐不堪言。他失信于人而戏烽火，贪图享乐而嬖褒姒，任佞邪而用石父。他的太史史伯曾说他"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11） 政治腐败加上西周末年长期的干旱和地震灾害，人民离心，苦不堪言。著名的《诗经.魏风.硕鼠》深刻地描写了西周末年流民的逃亡景象：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莫肯我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最后，申侯（周幽王太子宜臼之母家）联合犬戎，杀周幽王于骊山下，西周遂亡。

秦帝国，由于秦始皇的巨大历史功绩，秦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帝国朝代之一。同时，她也是中国历史上12个大一统朝代中历时最短的朝代，历时仅15年。秦始皇成功的一面，成为后人的榜样，但秦朝悲剧性的结局也成为后世之样板。

秦始皇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但其暴掠性的"牧民"政策也是惨无人道的，是值得批判的。他一生，一次西游三次东游，耗财无数；他赋役繁重，修阿房、筑长城，统一列国之后，人民得不到休养生息，更加灾难深重；他刑罚严酷，急法不赦，人民疲于奔命；他坟书坑儒，大失人心。秦始皇猝死沙丘之后，秦二世篡权，害贤良，杀公子扶苏、大将蒙恬、蒙毅；失礼节，惨戮宗室；酷律法，大肆诛杀；绝进劝，信赵高指鹿为马；役骊山、阿房，使"男子疾耕不足于糟糠，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12）

西汉政论家贾谊总结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二世"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循；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13） 最终引来陈胜、吴广起义，衰竭而亡。

春秋、战国混乱了500余年，无严刑酷法无以律己，无强力征伐不能统一，然秦统一以后，不能还人道于民，轻赋减刑，优恤众生，故有崩败。岂不悲乎？然后来一统朝代，如晋、隋、元者，不能以史为鉴，重蹈覆辙，诚则更为可悲矣！

汉朝包括西汉和东汉，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大一统朝代，前后延续了426年。但是，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有"西汉"和"东汉"的划分以及中间还夹一个短暂的"新莽"政权就可以看出。

汉朝从汉武帝开始，虽然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其及后人都并不仅此无它。汉宣帝时，就明确提出了"霸王道杂之"（14）的治国政策。然而，从汉元帝开始，片面推崇儒家，以致政权落于外族之手，导致了王莽篡权。商鞅有句名言：

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15）

这一句话，几乎反映了商鞅的全部治国思想。法是第一位的，并且君臣人人平等。法、信、权三者，不能失其一，失守则危。权独由君出。汉元帝就是偏于"信"，宽于儒礼，懈于法，松于权，故致后世政治演变，大臣篡权。虽然从西汉经"新莽"以至东汉，不失国家的大一统局面，但朝代更替以致引起全国混乱的惨痛教训是深刻的：中国历史证明，仅靠儒礼哲学是行不通的，宽驰必然致乱。必须法、信、权三者并重，并坚持法治第一的思想，国家方才得治。在现代社会，皇权专制取消以后，更应该树立法治的决定性地位。《商君书》就明确提出仁义不足治天下，主张法治。它指出：

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圣人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也。（16）

然而，汉高祖的后代从"新莽"手中夺回政权、延续西汉、建立东汉以后，他们没有深刻反省前汉败国的原因，反而使儒礼理论进一步神化，甚至把儒学与谶纬（17） 并列。而且，法治不得地位，"虽列三公，事归台阁"，逐步走上了宦官专权的邪路。到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18）；继窦后、梁后专政后，桓帝、灵帝时的宦官盛焰预政；

废察举，"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19）；败司法，私置监狱，逼制或者自拟诏书；贪腐公行，外戚梁冀秉政20余年，累积家财达30余万万，抵得东汉一年租税的四分之三。到桓帝延熹年间，国家已是"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三空"景象。加上西历166年和169年经历两次源自宦官集团的"党锢"事件，汉朝政府机构中的正直官吏和太学生几乎被罗致殆尽，汉朝政权完全落入了少数最贪婪、最残暴、最腐朽的宦官之手，刘氏汉朝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了。西历184年爆发黄巾大起义，国家陷入内乱，西历220年曹丕称帝，汉朝灭亡。

西晋建国后，开国皇帝司马炎，于西历280年（太康元年），颁布占田法和课田法，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20）农民粮食除缴田租外，都归他们自己所有，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晋朝在短短十年内就迎来了被誉未"天下无穷人"的小康局面。但是，这仅仅是在社会的中下层。在政权的上层，首先，由于司马炎本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酒囊饭袋，"老爹和老祖父的恐怖政策把士大夫或杀掉或驱入清谈，没有留下一个政治家或一个稍有才能的干部帮助他治理国家。在任何一个新政权中，开国元勋往往是一代精华，靠才干取得尊荣。只有晋王朝的开国元勋，却是那个时代中最腐败的一群无耻之徒。"（21）接下来，随着世族特权的迅速扩大、宗室诸侯权力的迅速集中、继任皇帝的继续昏庸无能以及皇后预政，最终使西晋政权仅存45年就灭亡了。它是12大一统王朝中，除秦、隋以外的第三个短命的王朝。

晋惠帝（司马衷，291-306年在位）时，贾后专政，外戚谋权，八王谋乱，擅杀大臣，国家法度不存，官吏趁机贪暴，民众又迅速遭殃，社会流民迅速猛增。西历301年张轨任凉州刺史就开始实行割据政策，同年，李特在益州领导流民暴动，于303年便建立起"十六国"中的第一个分裂政权--大成国，后改号"汉"，史称成汉。304年匈奴族刘渊建立汉政权，后改为前赵，汉族刘聪于313年率兵攻陷晋都洛阳，晋怀帝司马炽被虏，晋人立愍帝司马邺与汉苦战5年而降，316年西晋灭亡。

隋朝的产生和灭亡与秦朝很相似，灭亡之兆都源自开国之君。正如唐初政治家魏征所说："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于远也，非一朝一夕。"（22） 西历593年（开皇十三年）隋文帝修仁寿宫，耗资巨大，劳死万人，仅赏钱就愈百万，绵绢三千缎。他为了维护其新政权，严刑滥杀。他图享乐，求奇材异石，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建东都洛阳。好高骛远，不惜民间劳力，大修巨万工程：605年（大业元年）发河南、淮北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发淮南民10余万开邗沟；游江都，揽船工使役8万余人；607年，发丁男百余万修长城；608年征河北百余万人开永济渠等。612-614年，不顾劳役繁重，三征高丽，直接和间接参战者达300至400万人。结果，"百姓穷困，财力具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23） 611年，王薄首先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起义，613年隋文帝亲信杨素之子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隋，同年杜伏威、辅公祏领导江淮起义，617年窦建德起义军，在乐寿建立政权，自称元乐王，第二年改国号为夏。同年，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李渊从镇压农民起义转而起兵反隋，率兵攻入隋都长安，拥代王杨侑为皇帝，辟游身江南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以尚书令、大丞相执掌大权，第二年即618年，隋炀帝被宇文化及等缢杀，杨侑被迫让位于李渊，隋朝灭亡。

唐朝的没落，一般认为是起自唐宪宗（李纯，806-820在位）时期的朋党之争。实际上，朋党之争是从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开始的，其争执内容也是重在取士之道上，虽然被争执两派互为利用，但对唐朝的影响是很难定论的。真正危害唐朝政权的是，稍后以宰相为首的朝廷机关与宦官集团的公开对垒。他们互执大权，操纵国事，皇帝昏庸而不能控制，朝臣无心于政，腐败滋生，社会危机凸现。唐文宗（李昂，807-840年在位）后，皇帝信用宦官而玩物丧志，各级官吏贪贿成风，卖官鬻爵，"自咸通（860年）之后，上自宰辅以及方镇，下至牧伯县令，皆以贿取。"（24） 同时，土地兼并也日趋严重，至唐末期，"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堆之地"，贫富极端分化，社会流民猛增，未逃亡的农民赋税日益沉重，社会基础摇摇欲坠。西历859年（大中十三年）浙东农民裘甫首先发动起义，862年桂州戍兵杀死都将，公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起兵反唐。857年王仙芝于濮阳聚众起义，875年黄巢率众响应王仙芝起义。黄巢采用流动作战

方式，避实击虚，走遍大半个中国，虽然起义于884年失败，但它彻底动摇了唐朝的统治，使之逐步走向了藩镇割据的局面。黄巢起义军将领朱温降唐后，任宣武节度使，盘踞汴州（今河南开封），扩展势力，成为唐末最大的藩镇，受封为梁王。907年，朱温篡夺了皇位，建立梁国，史称后梁。唐朝灭亡。

北宋的灭亡，起因应直接源自王安石变法的中断。1085年，宋神宗去世，年仅10岁的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宋英宗（赵曙，1064-1067在位）皇后高氏以太皇太后垂帘执政，她全面废除了新法。8年后（即1093年），高后病故，哲宗亲政，又恢复推行新法。然而，守旧派都是一些鼎鼎大名的人物，如司马光、范仲淹次子范纯仁、苏轼、苏澈、吕公著等等，于是哲宗的主要政事就是在于打击守旧派，而不是集中进行改革。7年以后，年25岁的哲宗也死了，北宋最后的希望破灭了。国家落入了有名的昏君宋徽宗（赵佶，1101-1125年在位）名下，奸臣蔡京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排斥和打击异己，残害贤良，上千人被诬为奸党而遭查处和贬逐。被时人称为"六贼"的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等人，无恶不作，贿赂公行，卖官鬻爵；巧立名目，增税加赋，搜刮民财；大兴土木，另筑宫城和豪华宅第；乱法阻规，宦官代笔诏书。最后，民众无以为生，导致宋江、方腊聚众起义。虽然起义投降失败，但取得"胜利"的奸臣们更加疯狂地盘剥百姓、侵蚀国家了，最终金国于1127年兵入开封，北宋灭亡。

元朝政治腐败起于元文宗图帖穆尔（1328-1333年在位），他与权臣燕铁木儿勾结，毒杀亲兄以后，元朝政治就每况愈下了。到元惠宗妥欢帖睦尔（1333-1368在位）即位后，中书右丞相伯颜代燕铁木儿而起，"独秉国均，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渐有奸谋。"（25） 他对内排斥、打击异己，对外排斥汉人和南人，废除科举，滥发纸币，大肆敛财，使元朝朝政腐败不堪，社会动荡，各省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不断。到1340年，元惠宗利用伯颜侄儿脱脱发动政变，清除了伯颜。又以脱脱为中书右丞相，推行新政：恢复科举，进儒臣，倡礼仪，减税赋，政有起色。但是，脱脱终究没有遏止住豪族地主的土地兼并以及财政危机等问题的进一步恶化。1344年黄河暴溢，泛滥严重，1348年黄河再次决口，河水又给肌体腐败的元朝以再一次的沉重打击，全国灾异迭见、饥民遍地，盗贼蜂起，农民和少数

民族起义此起彼伏。由于国库空虚，伪钞横行，1351年又更新钞，大行新钞和通宝，结果引来了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1351年韩山童、刘福通聚众于颍州颍上县宣布起义，号红巾军。同年，在蕲州（今湖北浠水），建立"天完"政权。1355年刘福通在亳州建立宋政权，第二年分三路北伐。虽然起义到1363年失败，但元朝政权在起义军的打击下，彻底崩溃了。最后，起于淮西的朱元璋经过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于1368年占领大都，元朝灭亡。

明朝末期，社会矛盾的激化是从宦官争权夺利和皇族、勋族与官僚地主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开始的，1589年和1601年，皇帝两次赐田藩王就达6万公顷，明神宗（朱翊钧）更是"好货成癖"，广敛钱财；矿使税监横征暴敛，致使1599-1606年间连续发生了武汉、临清、云南、苏州民变，1608年辽东发生兵变。在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异常激烈，东林党与三党（齐党、楚党和浙党）可谓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不识字的宦官魏宗贤，利用控制内朝和监督官僚系统的东厂和锦衣卫，使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斗争更加天昏地黑、腥风血雨。党派斗争严重破坏了明朝的统治机构及其职能。在万历期间进行的三大战役（1592年宁夏之役、1593年播州之役、1593-1599年抗倭援朝），耗费白银超过1000万两，致使国家财政空虚。于是，明朝政权分别于1618年、1637年和1639年为筹军饷，对付清军和农民起义军，三次增税加赋，民众苦不堪言。与此同时，贪腐蠹害仍然在不断地腐蚀着明朝的政治肌体。

西历1385年，开国皇帝朱元璋，在考核全国前来朝觐的4117名布、按、府、州、县各级官吏后，得出"不称职者十之一，而门茸者亦共得十之一"（26） 的结论，虽有20%无用，可还是有80%好官。过了80年后，到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年间（1485-1487），皇帝再次考核前来朝觐的各级官吏时，发现真正廉洁为政的只有浙江嘉兴知府杨继宗一人了 （27）。此时，明朝朝廷已经是贪污和贿赂成风，"大吏恣肆，小吏贪残，小民怨咎，四方赂遗。"到嘉靖帝(朱厚火思，1522-1566年在位)时，天下已是"以官而得富，还以富而市官" （28）。嘉靖年间长期把持朝政的奸相严嵩，仅贪污边防军饷每年就达180万至300万两，占到国家拨付军饷的六成。他掌权20余年，公开卖官鬻爵，共计搜刮"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服玩所值又数百

万。"（29） 官场的勾心斗角和各级官吏的贪污腐败，加上政府赋税的不断增加，弄得民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终于在1628年广泛而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陕北农民起义爆发了，起义军不断扩大，经过16年的斗争，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于1644年率兵攻入明都北京，明朝灭亡。正如李自成在其即位诏和檄文中所说：

粤稽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鉴往识今，每知治忽之故。兹尔明朝，久席太宁，侵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赂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殆尽。肆昊天聿穷乎人爱，致逃民爰苦于祲灾。

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痛。

世袭政权的灭亡是一个客观历史规律，终观整个中国历史，每个世袭朝代的灭亡都遵循一个固定的程式：

贤士和能人不进--德礼和法监不存--贪污和腐败成风--农民革命改朝换代。

这个循环模式恰如荀子"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30）在循环之后半截，首先，皇帝昏庸无能、宦官专权、愚污塞政，以至贤良不进；其后，仁礼不存、酷法滥刑、政以贿成，以致德礼湮灭；其后，视听阻塞、亏公肥私，以致法监失用；其后，豪族兼并土地、官吏横征暴敛，以致贪腐成风，而民不聊生、流民四起；最后，农民大起义严重打击其腐朽统治、新势力建立新皇朝。韩非曾很形象地描述过国家衰危的演变过程。他说：

治辩之功制于近习，精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智之吏废，则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决智行，不以叁伍审罪过，而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31）

再者，在中国传统人治思想和宗法政治体制下，为官贪欲和伪诈的阴柔功夫也足以腐化任何一个兴旺发达的时代。生在三国时代的著名思想家阮籍曾有深刻的揭露。他说：大凡为官者，多"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坐制礼法，束缚下民，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罪至不悔过，幸遇则自矜。"（32） 对中国官场险恶的深刻刻画真是入木九分。

我们说所有的大一统朝代的衰亡都起因于贪污腐败。但这只是直接的表面原因，最根本的深层原因在于世袭专制体制本身。"中国专制政体下的帝王，是世界上危险感最大的人（事实上，是每级官员都在防着他的下级有一天会谋取他的位置--引者），对野心家的恐惧心理，助长一种对中国伤害最大的贪污行为。贪污在中国数千年不能绝迹，而在大黑暗时代尤其无孔不入，原因之一就是帝王有意培养它，当愤怒的人群纷纷控告某一有权人物贪污暴虐时，帝王往往的暗自高兴，认为手握大权的人一旦把注意力用在贪污上，他就再不会有坐金銮殿那种野心。英明的玄烨大帝，就公开承认，绝对不贪污的官员根本没有。以贪污为中心的官员们的结合，形成一个只有中国才有，而其他各国所无的'官场'和官场特有的意识形态，在官场中，以善颂善祷和不负责任为第一要务，这些跟西洋近代文化，尤其跟自然科学工业以及军备业务，不能并存。日本却在一开始就肃清了贪污，建立起来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文官制度，这是重要的分野。"（33）

所以，在世袭专制体制下，"一旦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强大起来，同时也就意味着盛极而衰不可避免。其内在的原因大致是：一，君权的强大，同时意味着其否定性的因素减少。但是，君主必在歌舞升平中沉面于酒色淫乐而疏于朝政。二，权力过分集中于皇帝手里，但皇帝又不可能事必躬亲，他只有将大小政务委托给亲近之人，或宦官或外戚。三，大一统的国家只有靠武力维持整个社会秩序，特别是对于距京城遥远的地区，必须派武将把守，同时委之以军政大权。然而这些人由于距京城远，皇帝鞭长莫及，所以又最容易坐大，甚或反叛朝廷。四，大一统的王朝建立之初，功臣对于治国安邦作用甚大，皇帝对他们也较器重。而且，这些人大多是有真才实学的。他们的社会地位之获得，或靠自己的功绩，或靠自己的才能，而勿需出卖人格，亦不必仅靠勾心斗角而获利。而一旦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之后，老臣们或死或退，而新的官僚队伍因其前途全靠皇恩，故而也就形成了整个官场的伪善之风，得势的也大多只能是小人。他们欺上瞒下，循私舞弊，结党营私，陷害忠良，甚或不把皇帝放在眼里。"（34） 从此以后，国家也就不可避免地转向，走向衰亡了。

清朝灭亡的过程除了同样遵循以上规律外，有一点不同。以前，我们说过，西历1796年既是清朝从强盛走向衰亡的转折点，也是中国

对外关系史的重要转折点。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后，清朝不但要对付因反对其腐朽统治而起的各地农民起义，而且还要对付西方列强不断升级的侵略。后清政权在1796年后，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中走向灭亡的。

表5-1 后清政权的内外交困

内部危机 外部侵略

1、1795年湘黔苗民起义

2、1796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苗民再起义

3、1796-1811年，东南海盗之乱

4、1801年湘黔苗民三起义

5、1802年广东博罗、永安农民起义

6、1806-1807年陕西地方两次兵变

7、1813年京畿及直豫鲁天理教起义、

陕西伐木工起义

8、1814年河南捻军起义，江西天地会起义

9、1817-1818年云南临安民变

10、1831年湘西瑶族起义

11、1835年山西先天教起义

12、1851-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

13、1885年洋务运动

14、1898年戊戌变法

15、1900年义和团运动

16、1911年辛亥革命 1、1805年英国兵船非法驶入广州海口

2、1809年英兵擅闯虎门，公然登陆澳门，并占据澳门东西炮台

3、1816年英国使团向清政府提出割地等无理要求

4、1832年英国商船非法驶入闽、浙、苏、鲁洋面

5、1838-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

6、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7、1884-1885年中法战争

8、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

9、1900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等八国联军侵略天津、北京等。

后清政权，统治集团腐败，思想极端封闭落后而又夜郎自大，其在内乱不断情况下，遭西方列强的残酷侵略、烧杀抢掠、霸土索银，其惨状旷古未有。据不完全统计，1902年（光绪28年）至1911年（宣统3年）全国各地此伏彼起的民变多达1300余起，平均每两年半发生一次。（35）"从1842年英国强迫中国签订第一个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起，西方列强在1842-1919年间，共迫使中国签订了709个不平等条约。其中英国占163个，日本占153个，沙俄占104个，法国占73个，德国占47个，美国占41个，比利时占26个，葡萄牙占13个，意大利占7个，荷兰占5个，奥地利占5个，西班牙占4个，其它国家占68个。"（36） 世界上只有中国曾同时遭受到几十个国家的非人性的残暴的侵略、蚕食和凌辱。

后清政权与西方列强的斗争，与其说是两种不同技术（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的斗争，不如说是两种不同政治制度（世袭制度和议会制度）的斗争。世袭制度是没落的，是注定要失败的；议会制度是新兴的，是必然会成功的。历史结局就是如此。在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下，东南亚国家很快成为其殖民地，处于边缘地区的日本也被迫放弃了源自中国的世袭集权制度，本身就难逃农民起义打击的后清政权，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也更是无能为力了。于是，在1912年，清政府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后清皇朝在中华民国成立两个月后，不得不于1912年2月12日向全国颁布"逊位诏书"：

旨朕钦奉

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整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人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义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这份按古制，从右到左竖排的诏书，是不同寻常的。诏书末有11位当朝政府大臣的名字，他们是：

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

外务大臣 胡帷德

民政大臣 赵秉钧

度支大臣 绍英

学务大臣 唐景崇

陆军大臣 王士珍

海军大臣 谭学衡

司法大臣 沈家本

农工商大臣 熙彦

邮传大臣 梁士贻

理藩大臣 达寿

他们真真成了清朝败亡的直接见证人。当时，即1912年宣统皇帝年仅6岁，所以诏书由垂帘听政的隆裕皇太后（慈禧太后侄女，1868-1913）代为颁布，故为"懿旨"。但是，文本是清末及民国初年著名的教育家、实业家张謇（1853-1926）和洋务派首领张之洞（1837-1909）之幕僚赵凤昌所作。这份仅300余字的诏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后

一份"诏书"，它不但终断了清朝共计267年的国祚，而且还成为中国3966年世袭政治制度的绝妙的"结束语"。

中国世袭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以后，代之而起的，自然是具有西方气息的政党政治制度。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列强利用炮舰，扮着海盗，来推销其民主制度，在世界历史上，特别是在亚洲和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因此，中华民族至今仍然鄙视西方民主旗帜下的海盗精神，并必将为反对这种野蛮的、非民主的霸权主义作不懈斗争。

纵观清朝败没的整个历史，最初的直接根源仍然是贪腐。清朝从盛世滑向衰弱，开始于乾隆中后期。首先，"乾隆六巡江南，游山玩水，沿途接驾送驾、进贡上奉、大兴土木，豪华与排场空前，糜费特甚。"有此先例，上行下效，引出清朝100余年的不治之症--糜费贪腐。满人阿克当阿任淮关监督10余年，搜刮的民脂民膏不计其数，豪富无敌，人称"阿财神"；1757年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在操办进贡金炉过程中，低买高卖，掺杂使假，中饱私囊，案发恒文赐令自尽，郭一裕充军；同年，山东巡抚蒋洲在山西巡抚任上贪污库款，案发蒋洲被诛；随后，连续3任两淮盐政高恒、普福和卢见曾，贪污总额达100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1/4，案发3人被诛；1781年浙江巡抚王檀望在甘肃任内贪污赈灾粮，牵连官吏60余人，王檀望等22人被诛，涉案陕甘总督靳尔谨和闽浙总督陈祖辉自尽；1782年，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污国库，案发二人自尽；1786年，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索贿被诛；1792年浙江巡抚福崧索贿、侵吞公款，案发自尽；在乾隆庇护下的大贪官和坤，当政20余年搜刮的私财--赤金580万两，生沙金200万两，金元宝1000个（每个重100两），元宝银940万两，各地房地产之契约五大箱，当铺75座，银号42座，古玩铺13座，金银器物和古玩字画无数--价值总计约合20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政府20年的财政收入，就连其两个仆人抄没的财产也达700多万两。"（37）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是对清朝"当官发财"的生动写照。清人梁章钜在其《归田琐记》中记载了讥讽贪官丑行的"贪官十字令"，形象生动，可见当时贪腐风气的盛状。"贪官十字令"者：

一曰：红；

二曰：圆通；

三曰：路路通；

四曰：认识古董；

五曰：不怕大亏空；

六曰：围棋马钓中中；

七曰：梨园子弟殷勤奉；

八曰：衣冠整齐，言语从容；

九曰：主恩宠德，满口好称颂；

十曰：坐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

糜费贪腐已成为后清社会的政治毒瘤，以至于割之不绝，反而在全国蔓延并越演越甚。最终，清朝国势衰弱，礼崩乐坏，奴性和卑贱者成群，汉奸和贪腐者成堆，国家苟延到1911年，彻底灭亡。

成书于18世纪60年代初（正是乾隆盛世时期）的《红楼梦》（庚辰本）第74回贾家三小姐贾探春（叹春，惋惜盛世）有言：我们"这样的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果不其然，乾隆以后，后清在内腐外凌之下，"忽喇喇似大厦倾"，不但把先祖的产业败得四分五裂，最终还丢了天下，一发不可收拾而亡。

历史沉痛的证实，贪污对中国的伤害实在太大了，无数民变兵变，辱国失地，政权覆灭，以及大屠杀大流血，几乎全都是起因于官员贪污，和由贪污而引发的暴虐。（38）

回顾历史，以鉴今世。处身现代的中国人，应该从思想上展开广泛的反思。在全面提升民族素质的基础上，狠批固身已久的民族劣根性，树立法律至上的现代观念，杜绝像历史上地方官贿租澳门、在外族面前汉奸成群、国政奸佞不绝的丑恶一面。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可能有长远的希望。然而，现代中国的现实，在振兴教育、礼乐以及肃贪挖腐等方面，给大众的印象是很不乐观的。刘知几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39） 何新先生在1988年也曾指出："礼崩乐坏"是民族衰亡的先兆。"从历史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必然'郁郁乎文哉'，重视礼仪的建设。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面临衰落，必然礼崩乐坏。""现代社会学的理论，通过对各

民族社会的比较研究指出：礼仪、规范、风俗、伦理，并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表面文章，而是权威、价值观念与社会制度的符号，是对其成员进行训练，使之学会应当如何进入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教育方式，也是一个社会内部凝聚力的根本所在。"

然而现在，"我们在政治、商业、体育及其他一切活动中，只要能犯规就尽量犯规；只要不被惩罚，我们能偷就偷，能骗就骗，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是被崇奉的最高人生之要义。制定法律，是为了逃避；制定规范，是为了骗人；执行政策，是一种战术；请君入瓮，是根本的战略。廉诚致道的君子，我们称作为傻子；本分老实的好人，我们称其为白痴；骗子我们称作圣人，盗贼我们称之为好汉。"（40） 这种境况到21世纪初滥之尤甚，贪污腐化已经成为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不断披露出来的大量贪污腐化案件特别是那些政府高官集团贪腐案件，让那些勤奋工作、正直为人的人寒心多多。明嘉靖（1522-1567）年间右副都御史朱纨有句名言："去外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群盗易，去中国衣冠盗难！"这句话很警人心。

中国循环兴衰的历史，对执政者有一个明确的忠告：即贪腐和暴政必然引来民众的反抗。反抗者要么推翻政府，要么据一隅之地而谋独立，要么避之他国。中国在海外有那么多的华侨，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在历史上避暴政而远走他乡的。一个贪污腐败成群的政府，一个暴虐的国家，要强迫百姓安定、爱国，老百姓显然是不服气的，最终其前途也是短暂的。因为，一个贪腐、暴虐的政府，他们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非为大众的利益而工作。他们不能"以百姓心为心"，不能坚持"为人民服务"，不能牢记我们老祖宗所一贯倡导的民本思想：最终忘记"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的民本古训。最后的结果就是，统治集团逐渐演变成为一群自私自利的代表。

人民没有了清明的政府，人心就要思变；人民没有了生活依靠，民众就要为"乱"（政府乱极而民反）。贪腐的政府，人民便会起而翻之；百姓生活无靠，人民更会揭竿而起。"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如果一国政府不能为本国人民生活提供生存和生活依靠这两个最基本的前提，原始的基本生存需要会激起人民的反抗行动。这是历史一再昭示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曾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们相信，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绝对没有贪欲财物之念。然而，伟大的他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统治者一样，没有能从制度上解决中国惊人的"贪污和浪费"问题。相反，传统中国一贯要求民众讲求个人道德修养和自身奉献精神的政治措施，往往成为各级官吏贪污和浪费的"理由"，甚至在"当官发财"的传统体制内，以权谋财，成了中国不成文的惯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这么来的。这里边，官吏贪污腐败不仅仅是官吏自身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制度和体制问题。王家范先生在分析世袭历史时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时曾指出：

俸禄的有限以鼓励创"法外收入"来互补，高度集权以允许有限度的"土地买卖"来补足各级权利不能满足的缺憾，作为实际"人人无权"的专制制度又给每一统治成员使用所掌握权力转换成财富的"个人积极性"。这就是刘邦藏在"背公立私"后面没有说出的奥秘：公私兼顾是可以的，但必须有"度"。所以，以权某财，这是帝国最高统治者富有弹性的一种技术，虽充满风险，历朝仍不得不恪守这个"旁门左道"，说明它确是集权统治整合凝聚力的"粘合剂"和不二法门。（41）

这段话对说明在中国传统体制下官吏贪污腐败现象的根源很有意义。下级官吏"以权谋财"如此，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又是如何呢?

中国历代统治者实际上大多重商，搞官商结合；与其说是抑商，倒不如说是重商 。（42）即如武帝所谓的"盐铁官营"，也是"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史记.平准书》），实际是私商官营化，铁器质量下降，价格反比民营时高出许多；均输平准更是官营商业，政府直接充当行商（均输）坐贾（平准）的角色 。（43）从此，商人之中的狡黠者，踏上了官商勾结的不归路。

在传统中国，凡在商业上能抛头露面，称富商巨贾的，靠经营有方远远不够，只有通过权财交易歪打正着，争得"政策性优惠"方能操持胜券，其中获取某些重要资源的"专利权"则是最具有优势的主项。自然成功者也毕竟少数。因此，从整体上说，帝国时代真正的富商大贾很少；即或上述少数成功者，也因其政治背景的不稳定，没有"持续性发展"的保证。陡兴而陡衰，则为难免的结局。盛极一时的徽商、晋商，终究没有能随清末时局的变动而步入"近代"，就是一个很值得深究的课题。

权力与经济的结合，最大的危害即在于吏治腐败，国之大蠹侵蚀根基，以致国衰政亡。权力可伸手市场，贪利之人必不顾"公利"，恣意弄权"谋一己私利"。权力介入愈深，任何蝇头小权无一不可"生财先富"。故明代人即言之不讳："其势要贪利之人，必籍此致富；而无耻官员，多假此夤缘进身。"（44）（45）

有一个本来很小但非常典型的案件很发人深省：西历1999年，山西省稷山县检察院到某公司查处一桩涉嫌贪污11000元的案件，办案35天，花掉公司2万多元，释放嫌疑人时又向公司收费7万元，另外还向涉案人员收取68000元现金。"查处已11个月，移送起诉也已4个多月，却仍无结论"（后在媒体和上层的压力下，才改邪归正）（46）。作为县一级司法机构就能"以权谋财"到这个程度，超出了一般民众的想象。小的县级官吏如此，大的显爵又如何呢？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到21世纪初，全国有近50个省部级及其以上的高级党政干部因贪污腐败而纷纷被拉下马。据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中国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腐败等四种最主要形式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就达到中国GDP的13.3%-16.9%之间。（47） 中国成为世界上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这种状况至今没有大的改变。2003年一年全国就有17名省部级官员被革职。然而，可以肯定，在政治经济体制、干部人事制度、法制保障体系以及司法执法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这些落马的"大亨"绝不会成为长期受"升官发财"思想影响的大小官吏的前车之鉴。相反，仍会有大量的贪腐事件出现。到21世纪初，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经潜逃国外。（48）

西历1895年，我们那位伟大的改良思想家康有为说过："中国在道理、制度和文化上是世界最高尚的……只因风气不开，人才缺乏，不得不备受侵略与凌辱……中国危在旦夕…..人心惶惶……我们自己如不团结一致…..则呜呼！我们的神圣种族将不可言，全然不可言矣！"

这句话应该成为中国社会的长期警示语。

---

（1） 《尚书.五子之歌》。

（2） 《贞观政要.贪鄙》。

（3）《潜书.任相》。

（4）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85-86、98页。

（5） 《吕氏春秋.慎大览》。

（6）《吕氏春秋.先识览》。

（7） 《尚书.泰誓》。

（8）《吕氏春秋.先识览》。

（9） 《潜夫论.遇利》。

（10）《诗经.小雅.桑柔》一节。

（11） 《国语.郑语》。

（12） 《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

（13） 《新书.过秦》。

（14） 《汉书.元帝纪》。

（15） 《商君书.修权》。

（16）《商君书.画策》。

（17） 谶纬，谶是秦汉时期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神学迷信附会儒家经义的一类书。

（18） 《昌言.法诫》。

（19）《抱朴子》外篇《审举》。

（20）《晋书.食货志》。

（21） 柏杨，《中国人史纲》，上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357页。

（22） 《隋书.高祖纪》。

（23）《资治通鉴.第181卷. 炀皇帝上之上》。

（24）《全唐文.第846卷.崔烈论》。

（25）《元史.伯颜传》。

（26）《明史.卷71》。

（27）《明史.卷159》。

（28）《明史.卷226》。

（29）《明史.严嵩传》。

（30）《荀子.王制》。

（31）《韩非子.孤愤》。

（32）《大人先生传》。

（33） 柏杨，《中国人史纲》，下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949-950页。

（34）启良，《中国文明史》，下册，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250-251页。

（35）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11卷（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280页。

（36）转引自叶自成，《地源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265页。

（37）王国华，“腐败导致清朝从盛世滑向衰落”，《光明日报》，2000.8.4，第C3版。

（38）柏杨，《中国人史纲》，下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723页。

（39） 《史通.卷五.载文》。

（40） 何新，《危机与反思》，上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80-181页。

（41）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135页。

（42） 陈长华，《抑商质疑——兼论中国古代的赋税政策》，载《史林》1995年第2期——原注。

（43） 马元材，《桑弘羊传》，中州书画社，1981年版，第84页——原注。

（44） 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3，《禁止势要卖盐钞例》——原注。

（45）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247、260页。

（46）《贵阳晚报》，1999.7.5，第7版。
（47） 叶自成，《中国大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373页。
（48） 《贵阳晚报》，2001.1.19，第3版。

**********

## 第四节　　农民革命：改朝换代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是最波澜壮阔的篇章，从最早的秦末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西历前209年）到民国时期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西历1927年），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数不清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所以，用简短的篇幅就想阐述清楚中国农民革命问题是肯定不可能的。但是，农民革命作为中国历史上每个循环时代末期的必然事件，使得每个关注中国历史的人不能避而不谈，视而不见。

中国历史发展表明：每个朝代的结束，几乎都是农民革命的结果。农民革命本质上讲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在现代，最初是指工人阶级，即不占有生产资料、完全或者主要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那一部分人，多指城镇工人。事实上，在任何历史时期，中国农村的无产阶级更多。以现代中国为例，没有解决温饱的人，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寅吃卯粮的人，他们都属于无产阶级。即使他们有住房和有土地，但他们的住房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土地是集体的。他们对其所"拥有"的土地没有处决权，只有使用权而不能作为私

有资产。在城镇，那些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工人和一些自由职业者也近于无产阶级。但是，占有全部无产阶级队伍的绝大多数仍然在中国农村。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为反暴政而揭竿而起者，往往是农村衣食不保的无产阶级。

我们说"无产阶级"，"无产"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不是说他们真正地一无所有，只是说在社会中，这部分人的私有资产很少，很少得被称为"贫穷的人"，甚至成为无有温饱的人、流民或者乞丐。但他们不是绝对的"无产者"，乞丐至少还有一身衣服，有自由去行乞谋生。

无产阶级革命，一般都出现在暴政和腐败不可逆转的时候。由于城镇的无产阶级面临着巨大的统治阶层的暴力压力，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在城市很难取得成功。他们往往像毛泽东那样，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在更广阔的农村发动农村无产阶级加入革命，使其演变成为更广大的农民革命，最终取得胜利。

无产阶级没有多少私有资产需要保卫，他们的亲人如果不能从革命中取得生活的保障，那么也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他们也必须革命，必须彻底革命，以推翻旧朝而换新代。所以，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如果激起了最广泛的无产阶级革命，那么他们的地位多半不会长久。

无产阶级革命反对的是拥有军队等系统化暴力工具以及拥有和控制国家资产的统治集团。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往往具有艰巨性、残酷性。由于无产阶级几乎一无所有，所以无产阶级革命最具彻底性。所以，也往往只有他们才能够推翻腐朽的统治者。

在一国之中，大凡反对政府的斗争，发展到战争地步，除非生死攸关，否则，民众不会用自己的生命去和拥有军队的统治阶层冒险。因此，造反者多是衣食不保的无产阶级，而那些中产阶级和富有阶级，往往不会轻易革命，除非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严重侵蚀，有可能变成无产阶级的一员。他们或者为失去的资产或者害怕变成无产阶级而参加革命。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往往是长期斗争的结果，很多情况下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先期革命失败。此王夫之之所谓"犯天下之险以首事，未有不先自败者也"。第二阶段，旧朝"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土崩"　（1）之势已成，后起力

量必然继起而推翻旧政权。第三阶段，新朝代产生，代替旧朝代。比如：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失败，刘邦推翻秦朝，建立汉朝；

东汉末，黄巾起义失败，曹魏推翻汉朝，与蜀汉、东吴形成三足鼎立；

……

元末，红巾起义失败，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

明末，李自成起义失败，满清推翻明朝，建立清朝；

清末，太平天国失败，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

民国，南昌等起义失败，毛泽东起义推翻民国，建立共和国。

一个社会总是由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富有阶级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要推翻的往往是富有的控制着国家资产的统治阶级，在长期的斗争中，两者都会有巨大的损失，两败俱伤。这时，长期忽左忽右的中产阶级往往漫漫凸现为最有势力的阶级。于是，他们加入哪一方，哪一方就具有最后取胜的能力。但保持既得利益和降低风险成本的驱使，他们往往会站在统治阶级的那一边，通过控制统治阶级达到走上统治阶级的目的。结果，必然是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失败。有时，中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一开始，就加入统治阶级，使无产阶级革命很快归于失败。

无产阶级革命在腐朽的政权还未消亡以前往往不会放弃斗争，这是他们的革命彻底性所决定的。所以他们会重新组织，开展继续革命。这时，继续革命的阵营只有甲乙两方：甲方是重新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力量，乙方或者是统治阶级，或者是加入统治阶级的其它力量。显然，革命的结果只有三种：甲方胜过乙方，乙方胜过甲方，谁也胜不了谁。如有胜者，那么胜者就会重新组建新的皇朝；如没有胜者，那么国家就会出现割据和分裂。

例如，秦末无产阶级革命，在革命第一阶段，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二次革命项楚推翻了秦朝，同时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刘氏集团，最后战胜项楚，建立汉朝。又如东汉末年，在革命的第一阶段，黄巾起义失败，同时，代表中产阶级的曹氏集团控制了统治阶级，由于消

灭汉朝的无产阶级力量未能重新进行组合，起来反对曹氏集团，反曹一方没有形成统一力量，最终双方谁也胜不了谁，国家出现分裂。

综观中国历史的全过程，任何一个大一统政权的覆灭都受到农民革命的打击，但并非所有的农民革命都取得最后成功。他们的革命，或者被另一股农民革命力量继续，或者被其它代表一定阶层利益的集团所窃取。不过，农民革命促进了腐朽政权的败亡。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革命既具有破坏性和保守性，有具有正义性和进步性。历次农民革命都有力地动摇了腐朽政权的基础，打击了衰腐的统治阶级，直接促成了新朝代的诞生。农民革命同时也对新生朝代在修养生息、完善政令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所以，农民革命是中国历史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因素。但是，农民革命的保守性也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比如，"从历代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某些意识形态的共同特征看，例如几乎都以某种超自然的人格神（即'天意'）作为主宰、命令来支撑和证明起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来组织队伍，统一意志，严格纪律。农民起义也常常是反贪官而拥戴'好官家'、'好皇帝'，以及一面讲求博爱、平等、共患难，另方面又承认甚至强调等级、上下得差别。"（2）

在农民革命与中国历史发展的"纠缠"中，历史学家启良总结出了其历史本质："农民起义表面看来是破坏性和革命性的，但究其实质则是对既有社会秩序的维护。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农民只反贪官反昏君，却不反对专制主义的统治秩序。……第二，农民斗争的目的在于抑制兼并，在于维护小地主经济，而小地主经济又正是专制主义政治得以延续的经济基础。""从道义上看，农民起义无疑是正义的。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此中道理非常简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历史常常不是靠道义原则而推动的。而且情况还恰恰是：有情的道义原则换来的却是无情的历史事实，善之花所结的却是恶之果。"他总结说：

第一，中国的农民起义虽然首见于陈胜、吴广，但思想源头却在周代初年"汤武革命"的提法，后来的孟子和荀子都作过理论阐发。"汤武革命"虽是宣传造反有理，但其实质则是对传统的统治秩序的维系。也就是说，"汤武革命"虽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但其旨趣则在求得社会的安定。但另一方面是，这一以求得社会安定为旨趣的理论同时又

是社会不安定的思想之源。因为在这一理论里，权力是开放的，谁都可以起来革命，推翻在朝的统治者。"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某家某姓的天下，谁都有可能在"替天行道"的口号下，充当改朝换代的旗手，而且不惜以全国民众的鲜血为代价。

第二，"汤武革命"、"替天行道"云云，都是德治主义的主张，而德治主义只会导致中国社会的周期动荡，只会导致政治领域的伪善之风盛行。

第三，李自成等农民领袖的"均田免粮"口号，体现的是人类古老的平等思想。孔子所憧憬的大同之世，所说的"不患贫只患不均"便是其理论源头。这一绝对平均主义的追求正是小农意识的极端体现，也是专制主义统治得以延续的思想基础。原因是，要使平均主义成为可能，就必须对全社会进行极权统治，必须有一种超经济功能的上层建筑对经济领域实行超经济的控制，同时必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是全国财产的惟一所有者。只有这位最高的所有者，才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平均分配，或保障平均主义的经济秩序不被破坏。但是，一旦有了这么一位最高的所有者，实际上也就等于对平均主义原则的否定。而且，这位最高的所有者统治全国，仅靠他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借助于官僚机构，必须依靠他的文武大臣。而一旦有了这些，同时也就意味着统治阶级的形成，意味着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不可避免。可是历来的中国人民不明白这其中的关系，总以为推翻一个旧的王朝，他们便能进入新天新地，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平等问题。可事实上，由于他们根本找不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途径，所以每次大起义之后，又原模样地建立起新的王朝，甚至使自己由原来的受压迫者而变为压迫者。或可说，中国的农民起义所改变的只是极少数头领的命运（如果成功的话），根本不可能改变整个专制主义的统治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农民起义从表面上看是对王朝的打击，但实际上却是专制主义政治得以延续的动力机制。它推翻旧的王朝，建立新的王朝，从而使专制主义的统治秩序呈治乱兴衰的周期性模式发展。

第四，农民起义之平均主义和德治主义的价值追求，对某一个具体的王朝政治具有批判性，但对整个专制主义思想传统则缺乏批判功能，而且还是对社会批判精神的消解。道理是，它的替天行道的思维

模式是对新兴的王朝的道德肯定，也是对其合理性的肯定。也就是说，一方面，新兴的王朝同被它推翻的王朝本质上是一样的；另一方面，人们又极端仇视旧王朝而狂热地拥护新王朝，不可能对新王朝的合理性有半点怀疑。如是，极大地便利了专制主义的恶性发展。中国的历史愈往后发展，专制主义统治愈是残暴，这无疑是原因之一。

第五，中国的农民起义不论是否借助宗教外衣，但都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这就是"替天行道"的天命历史观。此种历史观一方面认定历史由天决定，另一方面又认为天命又是通过某一位历史人物而得以体现的。这样，这位历史人物（即农民起义的领袖，如李自成、洪秀全等）也就有了超凡的品格，具有通神的本事。人民把他作神看待，他自己也以神的品格自居。其所建立的统治，也就只能是专制集权的统治。我们过去总认为农民起义领袖搞个人崇拜乃是其思想变质，脱离人民群众，殊不知在中国传统的观念和社会变革模式里，农民起义的领袖演变为独裁的君主，乃是必然的事情。

第六，农民起义领袖以"均田免粮"相号召，以之激发人民群众的造反热情。实际上，"均田免粮"既缺乏人性基础，亦不符合社会的运行法则。一，通过政权的力量，均田可在短时期内实行，但却没法保障"均田"制度下人人都会勤勉于农耕，亦无法保障土地兼并不会再次发生；二，免粮纯系空头许诺，根本不可能实施。社会必有分工，有分工就必定会有非生产性的人员，他们的生活资料必须靠国家税收提供。如果对农民不征粮，他们吃什么穿什么。再者，农民起义一旦成功，都是按照旧式的王朝模式而建立新的政权，同样有统治阶级，有不劳而活者。如果农民不纳粮，这些农民起义的头领们在胜利之后，靠什么维持他们的腐化生活？由于均田免粮只是空头许诺，不可能真正的实施，故新的王朝建立之后，人民群众感到农民起义的领袖失信于民，他们又会再度起来，重新为"均田免粮"的理想而铤而走险。

第七，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农民起义虽有道义上的正当性，但"均田免粮"之口号，"吃他粮，着他娘"的企想，又深刻地反映了造反者的某种不道德的思想动机，即人性之私。凭着这样的人性基础，农民起义军不可能建立起公正平等的社会，特别是头领们不可能在成功之后允许"均田免粮"的事情发生。此种动机还反映在，革命成功之后，领袖人物往往要求全社会的回报，既是物质上的，又是精神上的。物质

上的回报，便是将他们奉为特权等级；精神上的回报，便是将他们看作救世主，看作大恩人。他们自己也时时提醒民众"吃水不忘挖井人"。李自成开科取士，以"天下归仁"、"天与之人归之"、"若大汗之望云霓"为题，就是极好的例证。他们打天下，本来是想为百姓求太平，可成功或暂时成功之后，便要求百姓回报，强迫百姓歌功颂德，究其实质，乃是不道德的，是人性之私的体现，其政治统治也就不可能是清明廉洁的。（3）

这是中国史家对中国农民革命最有革命性的总结。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改朝换代方式，叫王莽学禅。

所谓王莽学禅，是指西汉末年，大司马王莽，托据"五德终始"说，仿照八帝时期禅让制度，获取皇位的方式。在夏启之后至汉之前，杀父自立者有之，用战争推翻皇帝自立者有之，挟天子以令诸侯者有之，唯独没有学八帝以禅代帝位者。王莽首次托古改制，按功德、符命、禅代程序，篡取皇位，为后来的政治阴谋家们树立了"榜样"。"中国历史有一个现象，每一次政权转移，都要发生一次改朝换代型的大混战，野心家或英雄们各自握有武力，互相争夺吞噬，最后剩下的那一个，即成为儒家学派所称颂为'得国最正'的圣君，在血海中建立他的政权。王莽打破这种惯例，他跟战国时代齐国的田和一样，用和平的方式接收政权，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权臣夺取宝座的程式，以后很多王朝建立，都照本宣科。"（4）

在中国世袭政治历史上，一般的禅代程序是：首先，在前朝时期以功劳（多以摄政、镇压农民革命或者进行统一征战获功）取得宰衡（合后世之丞相）地位；其次，谋取公禄；第三，求进封为王；第四，前朝末帝"禅位"，以王称建国。这种朝代更替形式，由王莽代西汉创始，曹操父子代东汉"规范"了禅代程序，此后跟王莽学禅者别无变更。

王莽代西汉帝位的程序是这样的：

西历1年，汉平帝元始元年，大司马王莽拜安汉公；

西历3年，汉平帝元始3年，拜安汉公为宰衡（商伊尹曾为阿衡，周公曾为太宰）；

西历5年，汉平帝元始5年，加王莽九锡之典；

西历6年，王莽假托命符"居摄"，自称"摄皇帝"；

西历8年，"假皇帝"王莽，召集百官，由汉孺子刘婴举行"禅代之礼"，做了真皇帝，改国号为"新"。

曹操父子篡取东汉帝位的程序是这样的：

西历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曹操"假节钺，金录 尚书事"，"封大将军，封武平侯"；西历208年，建安13年，"为丞相"；西历213年，建安18年，"封君魏公"；西历216年，建安21年，"进公爵为魏王"；西历217年，建安22年，"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西历220年，建安25年，"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5）"丕.....嗣位为丞相、魏王"；西历220年，建安25年10月，"绶禅位"，"王升坛即阼，百官陪位。"（6）

后来，曹操父子学禅的过程和步骤，一再被效法采用。历史上跟王莽学禅者，计有12人（不包括历史上被迫内禅即父禅子，如唐高祖李渊禅位唐太宗李世民、宋徽宗赵佶禅位宋钦宗赵桓等情形），现列于下，供读者一阅。

表5-2 跟王莽学禅12朝列表

序 前朝 禅位

西历年份 后代

朝代 末帝 朝代 开国皇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东汉
三国魏
东晋
南朝宋
南朝齐
南朝梁
北朝东魏
北朝西魏
北朝周
隋
唐
五代后周 汉献帝刘协
魏元帝曹奂
晋恭帝司马德文
宋顺帝刘准
齐和帝萧宝融
梁敬帝萧方智
魏孝静帝元善见
魏恭帝元廓
周静帝宇文阐
隋恭帝杨侑
唐哀帝李柷
周恭帝郭宗训 220年
265年
420年
479年

502年
557年
550年
557年
581年
618年
907年
960年 三国魏
西晋
南朝宋
南朝齐
南朝梁
南朝陈
北朝齐
北朝周
隋
唐
五代后梁
北宋 魏文帝曹丕
晋武帝司马炎
宋武帝刘裕
齐高萧道成
梁武帝萧衍
陈武帝陈霸先
齐文宣帝高洋
周孝闵帝宇文觉
隋文帝杨坚
唐高祖李渊

梁太祖朱温
宋太祖赵匡胤

以王莽学禅方式实现改朝换代的12个朝代中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农民革命的直接结果，如曹魏代汉、李唐代隋、后梁代唐，他们是在农民革命中产生的新生力量控制了统治者以后，实现禅位的；另一种情形是在分裂状态下武臣在企图统一全国所进行的战争中，以功高盖主而实现改朝换代。12朝禅位中，除前述曹魏、李唐和后梁三朝外，其余均属于这种情形。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实际也是农民革命在未取得全国统一的延续。因为，从大历史角度看，分裂状态下的统一战争实际是农民革命战争的延续。所以，以"王莽学禅"方式实现的改朝换代，本质上也是农民革命所产生的结果。

总之，中国历史的"尚贤使能兴邦--德礼法监致强--贪污腐败亡国--农民革命改朝换代"四步循环模式，既是中国每个朝代从产生到灭亡的通用模式，也是中国世袭政治固有的历史发展规律。同时，这种循环发展模式与中国儒、道、法三位一体文化体系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关联关系我们用如图5-1来表示。

图5-1　中国王朝循环兴衰和儒道法体系

在图5-1中，我们用一个圆圈来表中国王朝循环兴衰的过程，每个王朝都要经历发展期、守成期、贪腐期和战争期等四个时期，但并不表示每个王朝在发展期、守成期、贪腐期和战争期的时间是相等的。在这个循环中，在战争或王朝的初创时期，基本只有法家理论在起作用。在发展期，如果王朝不能通过其瓶颈期，那么，它将迅速进入战

争时期；如果进入正常发展轨道，那么，儒道法都将共同作用于社会，直到守成期的开始阶段。在守成期，在儒道法的斗争中，最终会形成儒家独出的局面，直到贪腐期。在贪腐期，在享乐、清谈风气中，贪腐横行，不可逆转，几乎什么思想都不起作用，一片空白。这样，一个王朝就完成了它的一个生命周期。在这个循环中，有一个正方形，它的每条边，表示如图所示的不同含义，而它所代表的含义往往是径跨两个时期的，所以，它表示了相邻两个时期之间的必然联系关系。在这个循环中，王朝生命中的精华部分在通过瓶颈期的发展期和儒家独出前的守成期，在这个时期，是儒道法都同时作用于社会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发展，国家繁荣强大；在这个时期，是中国文明中的黄金时期。

西历18世纪，那不勒斯思想家维科说过："历史是人类通过衰落与复兴永远前进的过程。"我们研究兴衰是为了正确地把握民族思想的脉搏，找到国家正确的前进方向和发展模式，勇敢地面对未来。

---

（1）《汉书.徐乐传》。

（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60页。

（3）启良，《中国文明史》，下册，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378-381页。

（4）柏杨，《中国人史纲》，上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298页。

（5）以上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6）以上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

## 下部 第66世纪

回顾历史，以看未来。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历史，我们必须从其浩瀚中剥识本质；未来，特别是中国的未来，我们必须从其艰难中洞见希望。在上部，我们讨论了中国历史在中历第1-65世纪的基本特点和规律，下部我们将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上，从中国人、中国文化、改革开放、国家统一以及迎接世界挑战等诸方面，分别讨论现实存在的矛盾和困惑——我们的未来确实是艰难的。第66世纪既是一个充满希望而错综复杂的世纪，也可能是一个在繁荣中消沉的世纪。

# 第六章 中国人的个体与群体

经过许多人（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对中国人这个个体或群体的脾性和性格的研究发现，我们中国人有两个致命的弱点：即不善于团结和思想保守落后。前者容易被别人诱破而分解中国人这个群体，后者容易墨守成规而不思变革。对此，先辈和后人、国人与外国人都有精彩的评说。如果我们要从过去的失败中找到成功的因素，我们就必须认真研究并重视这些人对“中国人”的精彩立像。

## 第一节　中国人自画像

中国人受几千年世袭（宗法）政治统治影响，人们在长期思想封闭的环境下，变得过于保守。从19世纪初开始，我们中国人又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国家分治，领土分裂，人民贫穷。虽然，中国人在20世纪，举行了三次革命：为了推翻帝制，1911年举行了辛亥革命，建立了"民国"；为了推翻外国侵略，取得国家和民族独立，进行民主革命，1949年建立了"共和国"；为了人民富裕，国家强盛，进行了邓小平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到西历21世纪（合中历第66世纪）初，中国仍然是第三世界国家，是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不但在经济上是发展中国家，而且在科学技术、军事等各方面也属于发展中国家，而这些与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优良文明传统和深刻思想内核的中国文明是极不相称的，是与十多亿的人口大国不相称的，是与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理大国不相称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在新世纪、在不远的未来就能看得见的"东方世界"，一个像中国古代大一统朝代那样，巍然屹立在欧亚大陆东部的泱泱大国。

要做到这一步，中国人首先必须从认识和改造自我做起，从认识自己的性格、脾性和形象做起。

中国人的形象是一个被广泛关注的话题。显然，从这方面对中国人的研究和讨论有助于中国人本身的认识和改进。为国人自画像的人中，恐怕鲁迅、柏杨、辜鸿铭、林语堂、何新等人的分析，比较透彻，比较入木三分。

鲁迅给中国人自身树立的阿Q形象，在中国人心中，是很深刻的。他揭示了中国人那种软弱、自我陶醉、自我欺骗、自我麻木的形象。他在其杂文中，对中国人的不成功面的揭露是不留情面的，至今读来，仍然活像在漫画当今不少的中国人：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论睁了眼看》）

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之道却在于挖。／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是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这个与那个》）

中国人的对付鬼神，凶恶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类，老实一点的就要欺侮，例如对于土地或灶君。（《谈皇帝》）

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无声的中国》）

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老调子已经唱完》）

台湾作家柏杨在其极富影响的《丑陋的中国人》中，对中国人的缺点，也作了毫不留情的剖析。他说：

中国人的不团结，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一下子就会出现使人惊奇的成绩。但是要保持这个奇迹，中国人确缺少这种能力。

中国人似乎永远自尊，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概念。

中国人是聪明的，但这聪明却有一个严重的前提，那就是必须"一对一"。

台湾另一位作家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将中国人的性格分为外在行为德性和内在心灵特征两部分。中国人外在表露的行为德性包括：

圆熟：处于任何环境，能保持一颗镇定的心，清楚地了解自己，亦清楚地了解别人。

忍耐：中国人把忍耐看作崇高的德行，吾们有句俗语说："小不忍而乱大谋"。

无可无不可：淡淡之品性，实有助于圆熟和教育。

老滑俏皮：中国人最富刺激性的品性是什么？．．．"老滑俏皮"。

和平：中国人的和平性情大部分亦为脾气关系，兼有人类谅解的意义。

知足：中国籍知足哲学消极的企求快乐。

幽默：中国人幽默见之于行为上者比之文字为多，不过在文字上有种种不同型式的幽默，其中最普通的一种，叫做"滑稽"。

保守性：每一个中国人，即从其外表上看，未有全然不带保守之色彩者。

中国人内在心灵的特征包括：

智慧：中国商人在马来，在东印度与在菲律宾，事业都极为发达，其主要原因即中国人智巧高于土人，并出智慧所生之美德，似俭约、勤恳、坚忍、目光远大，亦常高于土人。

女性型：中国人的心灵的确有许多方面近乎女性的。

缺乏科学精神：中国人思考特性之详细讨论，已使吾人了解于中国自然科学之所以不发达。

逻辑：中国人之判断一个问题的是与非，不纯粹以理论为绳度，而却同时权度之以理论与人类的天性两种原素，这两种原素的混合，中国人称之为"情理"，情即为人类的天性，理为永久的道理。

直觉：中国人这种思考方法是残存有原始民族之特性的，直觉的思考既无科学方法之校正。

拟想：拟想的正当用途，乃以"美"装饰这个世界。从平凡生活中寻求美，是中国人的拟想之价值。

林语堂将中国人的德性和特征结合起来，揭示了趋向中庸之道和缺乏公共精神的典型的中国人形象。当代文化学者何新对中国人具有更深刻的立像。他在《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一书的几篇文章中说：

近代中国人的生活中紧张、单调、缺少乐趣、缺少幸福感，人际关系常常笼罩在互虐的状态下。由此而发生嫉妒、偏执、虐待和受虐心理。

现代中国人似乎显现出某种整体人格退化（在历史上的中国人并非如此）。我们如今是那样地喜欢钻牛角尖，绝不乐于与人方便，是那样地不愿意成人之美，却总是乐于以折辱他人来满足自我的权力感和成就感。

一百年前，中国的一代好儿女们（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秋谨、鲁迅、周恩来），浮槎东渡以寻求富国强兵之术。而今天新一代的中华儿女们呢？只有在用同一种办法'逃'。我们今天出走，是为了再也不做中国人。至少是为了挣一笔坚挺而浸透血泪的外币，以求他年回来做一个令邻居艳羡的富家翁。

中国人的特征是善于创造词句。善于玩弄语言魔术。构成中国人的生活所特有的幽默性和喜剧性。

中国人在文化心理上有一个很大的弱点，这就是我们民族自古比较缺乏一种自省意识。

中国人在语言上喜欢把一些数字神秘化，变成一些神秘的宗教性或政治性符号。这种习俗本来源于远古的神秘数字崇拜，却一直遗传到今天。如"三纲五常"、"三老四严"、"三三制"、"五、四、三"、"一分为二"，．．．等等，形成中国人特别喜爱的一种数字语言表达模式。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领袖不仅是政治领导人，而且是社会大家庭的父亲。对领导人的不敬，就是乱伦。

前面各人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甚至互相矛盾，这主要是各人所处的时代不同，其侧重点和个人的思想意识不尽相同所致。但是，他们为中国人这个特殊的个体，勾划出了其基本框架。如果我们把他们

提供的有关中国人的主要象素，立体地塑成人像，我想那一定是一个复杂的、奇怪的结构。所以，如果我们中国人要从容地走向世界，赢得世人的尊敬，还需进行自我的全面剖析。为适应各方面的现代化，首先必需实现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又需要现代思想和文明环境以及国民个体素质的提高。而这些工作，又需要政府和民众个体的双重不懈努力。

**********

## 第二节　中国人群体结构

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时，其内部人与人之间以及群体相互之间的种种"关系"。

在中国，从古代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开始，到东汉史学家班固的《白虎通义》提出"三纲六纪"（君臣、父子、夫妇；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在中国家庭中就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忠孝礼让伦理关系，幼必须敬长，小必须听大，下不能犯上。后来，这种家庭伦理关系，被无限地扩展到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这样的长期结果，自然就形成了全社会的"轻小"心理。小的、少的、地位低的长期受到压制，他们要取得大的、长的、地位高的地位就要像"媳妇熬成婆"那样，接受时间的无情"考验"。在西历21世纪初，这种被扭曲的社会现象仍然遗留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整个社会被复杂的关系网和成群的溜须拍马之徒笼罩着。个别人依靠实干突出上进，往往不是因为头破血流而败下阵来，就是成天府首贴耳而规规矩矩，完全没有独立性格和创造精神。结果大家自然清

楚：单位维持现状，没有进取心，没有创造力，更没有发展活力。一些业务拔尖，日思变革旧习之才，往往变成不安定因素，屡遭毁言，屡受打击。狠者借权术势削其职位，使其不得进取；毒者加"莫须有"投之监狱，使其失去前途。所以，邓小平领导的中国"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首先提出的就是"解放生产力"。事实说明，这个"解放生产力"的改革所取得的生产力发展和进步以及其成就是非常惊人的。因此，中国要求得发展，就应克服这种根置于社会深处的源远流长的"轻小"心理，大量启用有才能的人，真正全方位地解放生产力，保持发展活力，才有希望赶上先进国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些现象似乎被迫地在逐渐发生变化。但是，中国人的群体心理以及社会制度环境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与传统"轻小"心理和等级制度密切相关的是中国典型的身份社会。我们经常看到和听到诸如"农民企业家"、"工人技师"、"知识分子"等等称谓和叫法。不仅称谓混乱，而且只重视人的背景和出身，不重视人的能力。你是企业家，但还是农民。你是知识分子，但仍然是工人阶级。这个大学出来的看不起另一所大学出来的，成了一个单位和集体中普遍存在的派别现象。这种以出身看人的作法，严重挫伤了人的积极性，很容易形成不同派别，闹不团结。这也是中国人群体关系复杂的一个重要根源。

中国要取得持续发展，就必须像当年割长辫子那样割掉这个"身份"的长辫子。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不难在一个单位中找到这种现象：来自不同学校，来自不同地区，来自不同阶层的人，形成一个个派别，宗派林立，内耗战永无止期。因此有人总结说：中国人治的基本规律就是"实君制集权规律、宗派倾轧规律、山头兼并规律、阶级斗争规律和官本位规律的有机结合，简言之即权制约法的规律"，是以个人独裁的人治为重心。（1）

身份社会另一个恶果就是对绝对地位的"神圣"崇拜。自从儒家等级身份思想确立以后，这个社会恶瘤就不断反复地吞噬着我们这个社会有机体，一次又一次地毁坏掉由中国民众创造的辉煌文明。离我们最近的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文革中，人们的视野里是毛的肖像（包括像章、雕像）的海洋。1966年10月，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吼声中，主席像章和'为人民服务'像章开始向

三军指战员颁发。金光闪闪的毛的形象成了人们胸前唯一的饰物。1968年7月1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了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称其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出的灿烂的艺术之花。'……毛不但创下了肖像发行量的记录，同时还创下了诗词和语录被谱成歌曲最多的纪录。这一点就连有500首诗歌被谱曲的德国大诗人海涅也难以望其项背。"（2） 结果，"神圣"崇拜到最后必然毁灭一切。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早在1943年的时候，对中国社会存在的症结有过非常精辟的阐述：

有两个因素很少引人注意，但我认为它们会阻碍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第一是缺乏人才，在有能力跻身于上层社会的人们中间，只有少数在思想或品德上具有真正的活力。能力并不等于诚实和勇气。勤勤恳恳和老老实实并没有带来像美国人那样的成功，在这儿比任何其它地方都更需要花言巧语、阴谋诡计，品德若不和狡黠同时使用，仍将一事无成。美国的伟人们只要照着教科书上的至理名言去做，就可以达到人生的顶峰，出人头地，在这里却会尚未成长，就被扼杀了。……

另一重障碍是宗派主义。要大家从全局考虑，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任何一件事，几乎是不可能的。民众对国家的政策问题漠不关心，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是生存；而在政治上想要维持生存靠的是各种有用的人际关系，至于西方人观念中的政治问题所涉及到的政治制度、团体、国家利益等等，都是次要的，或者是奢侈品。

中国的民主前途如何？就个人主义盛行这一点来说，似乎这个社会是民主的。社会有一定的流动性，出身微贱的人有机会凭自身的本领从默默无闻中冒出来。这可以认为是一种民主程序。

人们判断君子的标准是根据这个人的道德品质，这种凭一个人的功绩或品德衡量一个人的程序，也算得上是一种民主。

但是，一旦涉及到行政机关时，民主程序就谈不上了。行政官员继承着"满大人"的传统，除非环境所迫，"满大人"的权力漫无边际。他可以为所欲为。为了推卸责任，可以昧着良心，伤天害理。能制约他们的只有两种力量：一是他的上司，二是百姓造反。介于两者之间，他可以肆无忌惮。除非为恶已甚，泄露天机，或有可能受到追究。

当今的许多官员均属专横霸道的独裁者，造成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在于传统的伦理，人们习惯地认为这理所当然。（3）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朝代变了，统治集团变了，可是在中国群体社会生活中，费正清所指出的阻碍中国进步和发展的现象又如何呢？宗派现象成为中国人的老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在中国社会的很多角落里，几乎都处于像电视剧《康熙王朝》、《雍正王朝》等向世人所展示的层出不穷的、手段精巧的、惊心动魄的勾心斗角之中。至于人才嘛，我们这个有尚贤传统的国家，其所拥有的无数人才仍然是"尚未成长，就被扼杀了"，这种现象，被何新先生称为"精英淘汰机制"。他说：

在我们的社会中，各行各业那些最富有独立思考精神，最富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精英分子，往往极易受到摧残和打击。大部分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少部分刚刚出头及被摧残毁灭。只有极少数特殊的精英，也往往必须在改变、泯灭自己个性的前提下，才被社会所接纳。古人所谓"木秀于林，风必催之，堆高于岩，流必湍之"，正是对这一精英淘汰规律的形象比喻。与此互补的，是我们社会用人制度的一种择劣机制，一个早已人所共知的实际情况，在各行各业中，例如干部选拔、知识分子晋升，以至升级、升学、招聘等许多选拔社会精英的活动中，往往是那种比较没有见解，比较平庸而没有棱角的老好人，或者是那种暗藏个人抱负而善于隐藏，善于讲假话，办假事，善于吹牛拍马、偷奸耍滑、搞两面派的人，最有机会被选拔上去。（4）

人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人的解放问题……。在中国一切浪费中，最大和最令人痛心的浪费是人的浪费。无数英才或者由于得不到适宜的教育、培养，或者是崭露头角后就得不到发展的充分机会，就被困锁、扼制在襁褓和摇篮之中。（5）

也许中国人口历来太多，所以多如牛毛，贱如猪狗。于是，历来的统治者就养成了看贱人的"牧民"观念。现代不在少数的中国人也一样，所谓人特别是下人和他所控制的组织都是实现其个人抱负和中饱私囊的工具。看看人家是怎么当官和怎么做下人的：

中国文明是一个自上而下金字塔式的，由私人关系建立起来的网状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地位和权力是同一的，而且也是所有人获得进取的惟一途径。老百姓要想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得到物质和精神

方面的满足，就只有读孔孟的书，按上级的要求去做，然后你可以当个小官，一步步地进入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要想从底层爬到顶层，不断"进取"，除了机遇之外，那就必须按这个网络组织的规则行事。其中最重要的规则就是博得性情各异的上司的欢心。上司喜欢性情耿直的人，就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不能不说。上司喜欢精明的人，那么你办事时要处处想在他前头。上司喜欢女色，贪小便宜，你就要学会拉皮条，行贿。上司喜欢有学问的人，你就要博览群书。总之一句话，在中国古代文明这个金字塔中，从底层爬到顶峰，那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你必须"十八般武艺"样样全行，"能屈能伸"，"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当官需要特殊才能。"奴才"实质上也是"人才"的一种。（6）

国内有很多企业都在宣传和推销"以人为本"这四个字。然而，有些叫得很响的企业往往也是"以人治为本"最严重的企业。国有企业改革的很多好政策在西历2000年召开的15届4中全会以前都提出了，然而，大多数企业领导者怕触及自己的个人利益，推而不动。但是，当中央允许搞竞争上岗以后，企业一下子迅速地"活"了起来。下岗在西历20世纪末成为中国普遍而影响广泛的社会问题。国家不得已，一边要企业"减人增效"，另一边又要拿出特殊政策和巨额资金来解决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这也体现了企业对"有所为有所不为"思想的理解。为什么企业在"竞争上岗"问题上"有所为"呢？因为搞"竞争上岗"可以成为我们很多企业领导者大行"以人治为本"的重要手段。

谈到人的问题，又不能不说说中国独特的知识分子问题。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很多人包括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政治家和非政治家、中国人和非中国人，都对其历史贡献和社会地位做出过杰出的研究。就其关注面我们就可知道"知识分子问题"在中国，的确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其实，简单地说，"知识分子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现在，中国人是通过学习，再参加国家统考，取得中专、大专、大学、研究生和博士学位，同过去通过科举考试，中举人、进士、探花、榜眼和状元一样，走进知识分子的行列。谁都知道，古代的科举考试，是为了选举政府各级官员，但因最高统治者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所以存在"知识分子问题"，存在皇朝的不断更迭。现

在的考试与此不同，考试升级，取得学历，国家目的主要是为了增长民众知识，提高全面民族的素质；个人目的则是在求知基础上，争取求得一个称心的好职业，或为自我独立发展打下基础。由于现代教育远较古代普及，因此到西历21世纪初，中国的各行各业，各级行政长官基本上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应该说，中国不再存在"知识分子问题"了。但是不然，当了官的知识分子，由于身份的改变，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与带学术头衔的如研究员、教授、工程师、科学家等一类知识分子就截然不同了。这也难怪，因为他们是当官的，再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而他们是国家干部，的确存在不同。知识分子身份的复杂化以及职业的分化，在知识分子内部形成了种种不和谐因素，就成了说不清道不白的"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这个问题一直缠绕在人们心中，说不清也就不说了，但积郁难解。

事实上，知识就是知识，人就是人，我们不应把有知识的人硬套上一个具有阶级身份的名称--"知识分子"。我们尽可以说，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是中国人群体中的重要部分，但从事学术和从事政治是他们的自由。不能因为，从事工作的不同而产生不同阶级身份，进而走向对立。这绝不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的作法。

鉴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目前所处的复杂地位，其在两方面处于与其身份"不相称"的尴尬境地：

一方面，"由于他们没能获得近代社会因职业分化和经济自由所带来的人格独立性，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只能拥挤在'学而优则仕'这条中国式政教合一的社会出路上，必须依附皇权--官僚系统的政权结构，争权夺势，尔虞我诈。以理想化了原始氏族社会的巫师为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是'应帝王'，'作宰辅'，'为帝王师'。伊尹、周公、诸葛亮……，而并不是皇帝本身才经常是他们梦寐中的最高位置。除了退隐山林以庄禅自娱或极少数人怀抱野心投入农民起义外，一般很少能在意识和行动上冲破这个伦理--政治的政教结构，而总是心甘情愿地屈从于皇家权力和纲常秩序中，以谋得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荣誉，政治上的人身依附和人情世故关系学极为严重，始终缺乏独立的近代人格观念。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个人命运和自我意识的历史性的悲剧所在，也是知识分子尚未能脱出传统社会的一种表现。"（7）

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在君与民、道与势、中心与边缘之关系上始终处在极其尴尬的地位。他们秉着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的处世原则，以各种形式各种语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但是由于他们对皇权的依赖，又决定着他们势必充当着悲剧性的角色。然而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像希腊神话的西西弗斯那样，一次又一次地把滚下来的石头推上山。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做着这样的工作。虽然这种工作表面看来是徒劳的，但实际上却是中国传统的文明模式所不可少的。而且它本身还融汇于此种模式之中，成为其题中之一。这样一种关系，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不可避免。他们不仅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还要用他们那带血的头颅不时地撞击黑色的铁门。"（8）

---

（1） 王大有，《上古中华文明》，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358-359页。

（2）《南方周末》，1999.10.1，第8版。

（3）黎鸣等译，《费正清自传》，天津人们出版社，1993年版，第315-316页。

（4）何新，《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693页。

（5）何新，《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678-679页。

（6）北野，《中国文明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176页。

（7）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270页。

（8）启良，《中国文明史》，下册，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32页。

**********

## 第三节　中国人与外国人

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认识，最早要从古代中国人对环绕中原政权的中国各民族的认识说起。中国之国号，古时称过齐州、九州、冀州、华夏、中华等等。正如何新所说：

无论叫齐州、冀州、中国、中华，从名称上来讲，它们都是来源于中国人的一种地理中心的观念。而这种地理观念实际上又不仅仅是一种地理观念，也是一种文化观念，就是说，认为我们中国所处的这块土地，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是处在天下大地的正中位置，也是处在世界一切民族文化的中心位置。而环绕着我们的其它民族，其它文化，古人认为他们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夷蛮戎狄，都是一种轻蔑性的贱称。（1）

古代中国人，由于长期存在的优越感，造成了对边族、外族和世界其它地区文化的轻视和不屑。在最初与外国人交往中，我们仍然蔑称外国人为"红毛番"或"长鼻子蛮族"。正如同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那样，享受着先进文明所带来的荣耀，忘记了昔日的落后，并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劣等的民族，西欧是世界昨天和未来发展的中心一样。即使到了清朝末年，仍留着长辫子的清末思想家辜鸿铭对外国人的评价，也不无睥睨。他在认定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具有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的同时，认为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但不博大；德国人深沉、博大，却又不纯朴；法国人虽没有美国人那样的博大、没有英国人那样的纯朴、没有德国人那样的深沉，但却有中国人同样的也是极其重要的灵敏。

几千年的中国文明，造就了中国人的固有品性。随着其它文明的浸入，古老的文明的落后部分就应当作适应性调整，否则就会出现文明之间的剧烈碰闯。中国在西历18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200多年中，不断的内外战乱、不断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就是东西方两种文明的冲突之表现。外国非人道的侵辱固然可恨，但自身的顽固不化也是造成我们至西历21世纪初仍然落后的另一面。这一点，我们应当好好地学习日本。

我极其憎恨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但我们仍然应当学习日本人的求知和求变精神。西历646年开始，落后的日本，经过"大化改革"继承了中国辉煌的汉唐文明，国家脱离了野蛮时代。1853年以前日本和中国一样仍在闭关锁国，自1854年被迫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以后，西方列强敲开了日本国门。经过15年痛苦反思，日本自西历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公开承认自己落后。日本天皇颁布誓文，强调广兴会议，主张万决于公论（等于是放弃皇权），并求知于世界，开始改革开放，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技术文明、政治文明。仅仅经过31年，到1899年，日本就全部获得了在本土上对外国人的法定裁判权，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从十九世纪初开始，日本反过来加入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列。

日本和中国都是在世袭政治制度下，遭受西方侵略的，都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可是结果却两样：日本有效禁止了鸦片贸易，避免了战争；中国则鸦片禁而不止，战争每打必败，赔款割地，丧权辱国。日本成功了，中国失败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注意到了中国和日本在应对西方挑战上的巨大区别：

俄罗斯人和日本人的应战至少是同土耳其人、印度人、中国人、阿茨蒂克人和印加人在应对同样挑战的无能为力的处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俄罗斯人和日本人不是在他们的西方邻人--波兰人、瑞典人、德国人或者美国人--手中被迫走上西方化的道路，而是由他们自己进行了这一次社会变革，因此它们就有可能以平等的身份走进西方列强的行列，而不是一个殖民属地或"穷亲戚"。（2）

1945年，日本战败后，国家破败，但日本同样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又把国家建成为世界科技、经济及军事强国。

中国从十九世纪初开始遭受西方侵略，到1943年，中国才取得关税控制权和对外国人的法定裁判权，到1979年邓小平才真正开始并成功进行了改革开放，时间已经过去了180多年。1871年日本实现司法独立，1889年产生第一部宪法，中国在1912年才有司法机构和《临时约法》，分别落后了41年和23年。1912年中国按照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建立政党政治，彻底消灭了在中国延续3966年的世袭政治制度，这次变革比日本还彻底，可是90年过去了，中国的现代化呢？总之，"我们中国人追求的现代化过程，从1840年以后魏源、林则徐那一代人算起，到今天已经一百五六十年了，我们民族为现代化所付出的代价，可以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大；在近一百多年来中国所发生的社会震荡，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民族都频繁和剧烈；但是我们民族的现代化运动，迄今仍未成功。"（3）

表6-1 世界各国第二次现代化实现指数

18个发达国家 27个中等发达国家 36个初等发达国家

第一次现代化 20世纪60年代完成 20世纪末完成 20世纪末未完成

第二次现代化 20世纪80-90年代完成 部分进入 同上

第二次现代化指数 前五名 瑞典、美国、日本、丹麦、芬兰 新西兰、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斯洛文尼亚 格鲁吉亚、巴拉圭、哈萨克斯坦、多米尼加、阿塞拜疆

末五名 土库曼斯坦、蒙古、玻利维亚、中国、伊朗、泰国

目前，流行一种"第二次现代化理论"，该理论认为，第一次现代化是以发展工业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经典现代化，具有工业化趋同的倾向；第二次现代化是以发展知识经济为基本特征的新现代化，具有物质生活质量趋同、精神和文化生活方式多样化的倾向。根据这个理论，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所对2001年世界131个国家的第二次现代化指数进行了研究，结论指出，中国第二次现代化指数在其中36个初等发达国家中处于最后五位之列（见表6-1）（4）。综合现代化指数为

32，排世界第79位。其中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为77%（最高100%），第二次现代化实现程度为31（最高111）。

这仅仅是看中国现代化的一种方式，换一种方式看，中国现代化离我们似乎仍很遥远。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提出了一个现代化的十个量化指标，到2002年我们仍有六项主要指标差距甚远，详见表6-2。

表6-2　2002年中国英格尔斯现代化标准实现情况

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 单位 标准值 2002年* 完成 备 注

1.人均GDP $ ＞3000 964 × 约7972元

2.农业产值占GDP% % ＜12-15 14.53 √ 人口多，产值低

3.非农人口占总人口% % ＞70 36.9 ×

4.服务业产值占GDP% % ＞45 33.72 ×

5.城市人口占总人口% % ＞50 34 ×

6.人口识字率 % ＞80 (87.6) × 成人识字率

7.大学入学率 % ＞10-15 5.7 ×

8.平均寿命 岁 ＞70 71 √

9.每名医生服务人数 人 ＜1000 609 √ 不含护师、护士

10.人口自然增长率 % ＜1 0.645 √

* 主要来自中国《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我们的现代化在哪里？江泽民主席在1997年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

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２０００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200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江泽民主席又说：

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学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城镇人口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扩大的逐步扭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国家统计局在2002年曾有一高级统计师说，200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同年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2.3%。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年有望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2050年才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即使如此，到那时，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较大，人均GDP仍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

日本现在是绝对的科技、经济大国，其军事力量在军国主义者的推动下也在不断膨胀，到西历20世纪末它已经是世界第二军事强国。中国呢？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政治上，仍然不断受到西方霸权国家的欺侮，经济落后，科学技术落后，文化深厚却缺乏开发，军事力量远不能保护印度尼西亚的华人，近不能阻止南海边国为争夺我领海而发生的争端。

中国与日本有什么不同？又是国情不同？是的，日本是岛国，中国是大陆国家；日本人口密度比中国高一点（人口密度日本是中国的2.5倍），日本的资源比中国少一点（陆地面积中国是日本的25倍）；1796年以前日本微弱，中国强大；中国文化深厚，日本则是学习中国文化；中国早几十年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1542年葡萄牙人的船只才飘抵日本……。还有什么？中国至今落后，仍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根

本原因是什么？显然，既不是什么技术落后，也不是人笨，更不是什么"屋基"不好，归根结底，思想落后。思想落后往往表现为麻木和盲目：既不重视自己的好东西，也看不到别人的好东西。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之时，思想家魏源在中国放眼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的影响下，于1842年完成了著名的世界史地巨著《海国图志》，然而，这部中国最早的世界政治地理和具有现代海洋战略思想的著作（作者被后世学者誉为"中国的马汉"），国内却不被重视，1844年传入朝鲜，朝鲜士大夫争相阅读，认为"盖有志于御外者，不可少此文字矣！"《海国图志》对日本的影响可谓引起了一场革命，1854-1856年间，本书被日本翻刻、训点和翻译的选本就达21种，它被誉为"天下武夫必读之书"。很多日本文人学者，思想开化变革，多因读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它对后来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发展影响至为深远。由于《海国图志》未能在当时的中国引起广泛的注意，同被西方欺辱的中国和日本，走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到20世纪初，日本成为东方强国，中国仍然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到20世纪末，日本从二战的废墟中重新建立起了一个世界经济强国和军事大国，中国仍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种结果的区别是太明显了。

表6-3 中国综合国力在世界上的地位

名次 1978年

克莱因方程 1989年

黄硕风动态方程 1996年

王诵芬世界综合国力 2000年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国家 国力 国家 国力值 国家 国力 国家 国力值

1 苏联 458 美国 593.22 美国 79 美国 100

2 美国 304 苏联 386.72 日本 52 日本 60

3 巴西 137 日本 368.04 德国 50 法国 50

4 西德 116 西德 308.10 法国 43 英国 50

5 日本 108 法国 276.35 俄罗斯 43 德国 50

6 澳大利亚 88 中国 222.33 英国 42 俄罗斯 40

7 中国 83 英国 214.08 加拿大 38 中国 25

8 中国 32

比较比较就可清楚，同样是20世纪下半叶50年，日本、德国再次强大，美国更加强大，英、法、加、意等国地位稳固，苏联却瓦解了，俄罗斯继续衰弱。"历史已显示一个定律，处在巨变的时代，有能力彻底改变的国家强，改变而不彻底的国家乱，拒绝改变的国家则继续没落，直到灭亡。"（5）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处于没落的边缘。但是，改革开放20多以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又如何呢？请看表6-3。

表6-4 2002年全球综合国力 15强排行表

排名 国名 经济力 科技力 军事力 资源力 社会发展 政府调控 外交力 年增长率 综合国力

1 美国 3194 2218 2197 295 529 159 97 2.6% 8530

2 日本 2122 1390 778 37 390 151 79 1.1% 4947

3 法国 1560 1263 786 14 397 166 94 2.6% 4280

4 英国 1575 1076 805 19 378 153 90 2.3% 4096

5 德国 1736 1077 600 11 398 168 91 2.0% 4081

6 俄罗斯 578 623 829 312 318 144 97 4.9% 2901

7 中国 1301 349 488 274 233 119 99 7.7% 2863

8 加拿大 819 230 159 317 408 155 87 3.0% 2175

9 意大利 725 269 209 30 384 150 84 2.5% 1851

10 澳大利亚 538 129 114 177 398 138 77 2.4% 1571

11 巴西 537 231 155 184 243 101 75 0.4% 1526

12 印度 578 209 160 157 183 98 81 5.2% 1466

13 西班牙 611 173 104 11 357 118 78 2.5% 1462

14 韩国 524 128 89 9 354 110 83 5.7% 1297

15 墨西哥 438 108 94 101 178 96 86 0.8% 1101

虽然我们在世界上占老七位置，但与前五个国家的差距都在倍数以上。1978年，按照克莱因方程计算，中国综合国力排世界第七，可只有苏联的1/5，美国的1/3；1989年，按照黄硕风动态方程计算，中国综合国力排世界第六，可只有美国的1/2.6，苏联的1/1.7；2000年，根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结论，中国综合国力排世界第七，可只有美国的1/4，日本的1/2.4。

截止2002年底，按照最新公布的综合国力，见表6-4"全球综合国力15强排行表"，中国在世界上仍排第七，但中国只有美国的33.5%，日本的57.9%，法国的66.9%，英国69.9%，德国的70.1%。

数字比较更清楚，我们比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多多，实在让中国人汗颜。这一切原因何在？国际军事问题专家张召忠也说："中国最缺的不是技术，我们缺的是思想，是创新。"著名经济学者何新指出："根据欧美国家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和中国自身的失败经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恰恰不是经济首先走在前面，而是思想、文化和社会环境的转变，应当走在经济发展的前面。前者是后者的条件，后者是前者的果实。"（6） 可我们总是不能平衡发展，有了其一，就忽略或者干脆践踏其它，容易走极端道路。

中药一直被视为中国的国粹。然而，让我们痛心的是，我国在1998年以后居然每年进口中药10亿多美元，进口远远大于出口。到20世纪末，在国际中药市场上，日本占到80%，韩国占到10%，中国仅占2%。日本厂商宣称要把"中药学"变成"东亚医学"，他们从中国医学名著《伤寒论》等书中拿出300多个古方，再"土洋"结合，创造出许多中药品牌和惊人的经济效益。日本的"汉方药"年生产总值已经超过

1000亿日圆，其在我国中药六神丸基础上研制出什么救心丸，年出口额达1亿美元。韩国仅高丽参一项年均创汇1.75亿美元，比我国的圆参高出十多倍。现在包括日本、韩国、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对中药方子投入了大量的开发研究，并不断形成新的专利。到21世纪初，已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种天然药物在我国注册，有人提出警告：在经济全球化体系下，我们使用祖传中药方子，可能会向外国人付专利费。这并非危言耸听。（7）

你说我们思想落后不落后。

我们对外国人的长处不甚了了，可外国人在与中国人几个世纪的交往中，对中国人的个体和群体，却有比较深入的认识。欧、美、日等国的很多汉学家，都对"中国人"作出过深入细致的研究。现略举三例介绍。

一百多年前，美国汉学家阿瑟.史密斯曾写过一本颇具影响的《中国人的性格》的书，他在书中，提出了中国人"保全面子"、"漠视时间"、"漠视精确"、"易于误解"、"拐弯抹角"、"顺而不从"、"思绪含混"、"不紧不慢"、"轻视外族"、"缺乏公心"、"因循守旧"、"随遇而安"、"能忍且韧"、"缺乏同情"、"社会风波"、"株连守法"、"互相猜疑"、"缺乏诚信"等等二十多条不怎么光彩的性格。当然其中也有"节俭持家"、"勤劳刻苦"、"讲究礼貌"、"知足常乐"、"顽强生存"、"孝悌为先"、"仁爱之心"、"多元信仰"等中性或较好的评价。我们注意到的是，负面批评显然较多。作者在书中有很多精彩的结论，这里摘录几句以供参阅：

如果中国人真的不愿意讲出事情的缘由，只能靠猜测去知晓他所说的意思，那末最好的事例可以从中国官员的生活中去找，在那里，拘泥于形式和矫揉造作已发展到极点。（第八章）

**把中国人比做竹子，这种比拟一矢中的，最为精确。竹子高雅，到处都用得着，它柔顺，中间是空的。东风吹来，它朝西弯；西风吹来，它朝东弯；没有风的时候，它一点也不弯。（第九章）**

作为政府，尽管是家长，但更多的是在照顾家长自己，而不是照顾他的家庭。一般说来，若不是百姓有难，政府是不会为百姓着想的；而由于事先没有做什么，事情发生后，就必须做得更多。百姓明白，政府努力减轻诸如洪水泛滥造成的灾难，目的是为了保证税收不受损失。而百姓自己努力防止这类灾害，则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因为若是让政府来办理这类事，反而要增加百姓大量的苛捐杂税。（第十三章）

**1860年英国军队进攻北京，用的就是从中国山东买来的骡子，天津和通州为了各自的利益签订了投降条约，提出只要英法联军不侵犯这两座城市，他们同意提供所需的一切。为外国军队干苦力活的决大多数是从香港雇来的中国人。（第十三章）**

中国人的普遍社会生活中充满猜疑，官场也不例外。它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实际上乃中国人的本性使然。上级害怕下级竞争，时刻提防下级；下级的宦海浮沉又随时会受上级影响，他们也在猜疑上级。而整个官僚阶层又对强大的文人阶层和普通百姓存在戒备之意。中国有许多宗教团体是半政治性的，这就是后一种情况的显著表现。……强烈的猜疑使中国人变得十分保守。（第二十四章）

**中国人把不信任别人看成很自然的事，其理由他们心理都明白。这种状况使得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个民族不是由精英分子来统治，相反，掌握全部权力的是帝国中最卑鄙、无耻的家伙。一位聪明的道台，对外国人说："皇帝以下的所有官员都是坏蛋，全该杀掉，但是杀了我们没有用，下一任仍会和我们一样坏。（第二十五章）**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其《中国人的性格》一文中，很谨慎地对中国人的性格作了独到的分析。他说：

中国人相当有教养，聪慧而明智。

中国人最博得人们赞赏的品质之一，是他们把握外国人感情的能力。

中国人保持着文明享乐的能力，他们经常自娱、逗笑，在阳光下取乐和讨论哲学。

中国人，上至高官显要，下到平民百姓，都有一种冷静而内向的尊严，即使是一个受过欧洲文化教化的人，也不会损失这种特性。中国人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民族都是很谦恭的。

中国人的"死要面子"经常使在中国的外国人感到荒唐可笑。然而，中国人仅仅是要求实现与他们社会生活方式相一致的个人尊严。

中国人的缺乏同情心，使每个西方人感到震惊。

懦弱，是中国人的令人一看便知的一个缺点。

贪心，我以为是中国人的最大缺点。

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有点懒散和缺乏激情外，大凡聪明能干而又多神多疑。但是，这只是他们性格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很会狂热激动，而且常常是一种集体的狂热激动。

罗素在将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比较中，发现西方人生性好战，喜欢竞争，中国人则气质平和，安于现状；西方人爱权，中国人爱钱；西方人重视人际交往的直率，中国人则讲究人际交往的客套；西方人办事倾向彻底，中国人办事则喜欢妥协；西方人崇尚变革，中国人则易

于保守。这些认识与国人的自画像相去不远。正是基于这些认识，西方人才在与中国人长期交往中学会了在中国社会取胜的策略。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认识，就如同一本书的书名那样，他们总是"三只眼睛看中国"。日本人的"左眼"，友好中不无献媚；日本人的"右眼"，充满着日本式的强盗逻辑；日本人还有一只"中眼"，对中国人的认识似乎中肯些。成书于西历20世纪三十年代、出于一个日本学者之手的《中国人的国民性》，可作为"中眼"之代表。该书是这样评价中国人的：

中国人是一贯的文弱，所以太平时期就更疏于武备。

中国人的通病，不仅毫无丈夫气，而且嫉妒人家的功绩。

中国人表达思想从来是非系统的，缺乏逻辑基础；而墨子可说是中国第一个逻辑学家。

世人都说中国人中心思想或信仰是儒教，这实是皮相之见。儒教只是形式方面（日常仪礼）的规范；中国人内心的思想实际是老佛的处世观。

中国人的特点是中庸的，善于将感情的冷热调和，偏重实用实利，孜孜努力。他们的步伐很慢就像大象的步伐一样；但他们的生命力，就源于不懈的努力不已这一点。

一般认为中国人很懦弱，实际上只要事关自己的利益问题，那定是很强顽地抵抗的。一般认为中国人很保守，实则有利之时，猛然突进，不一定墨守旧习的。一般认为中国人没有团结心，是个人的利己，实则有利之时，是一致团结，雷同附和的。

中国人专求实利自私，所以商业发达。具有商业上所必要的宽大和忍耐的品质。中国人在别的事情上很迟钝，唯经商机敏。中国人在别的事情上说假话，不守约，但在商业上却常有信用。他们只要能得钱，什么体面、主义、意见等等那些麻里麻烦的事一概不讲。只要能得利益，可以低头忍辱。

文化卓绝的中国人，自尊心很强，自负本国的文化、自己的文明，天下第一，从而极力维持保存之。

中国人富于实行，严守仪式典礼，是很有意志力的国民。

中国人以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为君子，认为直率历行是小人所为，他们努力隐忍以理性指导活动。

中国人自称华夏，称四周民族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把他们视为动物，也或有全然不当他们是人的记录。

团体的中国人文弱而缺乏凝聚力，个人则相反是较为强健的。

中国人的贫富关系，则表现了他们从极端走到极端的矛盾性。

凡是富豪贵族，大概都是低智的，他们的趣味不是下劣无聊，便是深逸而徒装门面，这在哪一国都是一样的；不过中国人在这一点上则尤为突出。（8）

现代的中国人可以比较看看，中国人的性格有多大改变。深刻反省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人在国际交往和竞争中有很多劣势或者失败，往往都是我们中国自己内部不善于合作、团结，不能存小异从大善造成的。往古"天朝"没有那么多的奸佞之臣把皇帝搞得晕头转向，国家会迅速破败吗？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前，没有那么多自私自利的鸦片贩子，英国的鸦片会大举入侵吗？日本侵华时期，没有那么多的汉奸，日本强盗会迅速向内陆推进吗？现在，没有台湾一些人，甘愿充当别人的棋子，外国人能有效制约中国吗？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有国才有家，没有国只能是奴。西方国家在与中国200多年的交往中，逐步学会了对付中国的很有效的办法：即用中国人去对付中国人。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就明白地告诉美国人："你在中国做生意，又不会说中国话，不懂它的货币，怎么办？当然只有像所有进入中国生活边缘的外国人一样，去找当地帮忙的人。"现在，外国许多公司在中国开办的分公司、办事处，其执行董事或总经理什么的，大多数是西装革履的中国人。中国人在这些公司、办事处得到的薪水不少，其成就也不赖。我想，像美国英特尔公司的"奔腾"芯片、可口可乐公司的"可口可乐"等中文著名商标，恐怕不是一个纯外国佬的"研究"成果，我敢肯定这里面一定有中国人的"杰出"贡献。

---

（1）何新，《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7页。

（2）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

（3） 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179页。

（4）胡鞍钢等，《大国兴衰与人力资源开发》，《中国经济时报》，2003.2.28，第8版。

（5）柏杨，《中国人史纲》，上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197页。

（6）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112页。

（7）《贵阳晚报》，2000.10.31，第11版（原载《新闻晨报》）。

（8）摘引自《三只眼睛看中国－日本人的评说》，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

**********

# 第七章 中国文化的基础与发展

一个国家的文化体系是多方面的。民族风俗、语言文字、人文哲学、科学技术、民主与法治、政治体制等等。中国的民族独立基本完成了，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科学技术、教育、民主和法治的开发、发展和建设等还很落后。所以，我们在中历66世纪（西历21世纪）面临全面的文化开发、发展和建设问题。

## 第一节　中国文化的内核：汉字与儒道法

谈到中国文化，许多人想到的一定是儒家文化。事实上，中国文化包括主体汉文化以及蒙、藏、回等少数民族文化，它们共同构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可见，儒家文化仅仅是中华文化的一种，主要因为其影响比较其它文化要大，所以儒家文化又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代表。但是，正如后面将要说明的，儒家文化绝不是中国文化的唯一，它仅仅是构成中华民族文明的众文化之一。

在人类世界，目前主要流行两种世界划分法：一种是源于毛泽东在1974年提出来的"三个世界"的划分法，现在一般称为超级发达国家（第一世界）、发达国家（第二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另外一种划分法叫做东西方两个世界划分法。西方世界一般指欧美加日澳。虽然这种划分法并不完整，但"西方"一词是相当普遍的。我们从图书馆里的书目中就可发现，前冠"西方"一词的书籍多得惊人。相应地，文化也就有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分。在西方人眼里，东方是泛指整个亚洲地区。但是，处于东亚（真正的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中亚、南亚和西亚，由于其历史上主要地是充当东亚与西方之间的桥梁作用，并且，现在的中西亚和南亚地区与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地区是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所以，这里所说的东方是指地处东亚，包括东

北亚、中国和东南亚，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广大地区。因此，东方文化也就是指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核心基础是其独特的汉字体系。所以，研究中国文化，我们必须从汉字说起。

中国汉字，以形为主、形音义兼俱，单音独体，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真正的文字体系，也是世界上唯一使用至今的最古老的表意文字。从黄帝史官仓颉创造"书契"开始，到夏朝初具规模，再经商、周、春秋、战国时代的演变，到秦始皇统一文字，最终使汉字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延续至今6500年。如果从远古时代的图画或者刻画原始文字算起，中国文字发展史至少已有8000年左右。（1）

汉字是一种世界独特的文字体系。它以笔画构成，字生意（这是汉语具有丰富内涵的根源）并构词组句，它包含了原始的文明信息。著名文化学者何新说："汉字是独特的形音义综合文字，而以音义为主，综合为一种表达能力极强，信息容量极其丰富的符号系统。所以我认为，汉字既不是拼音文字，亦不是象形文字，而是综合象形、拼音文字的优点，而扬弃其缺点所发明的一种信息量最丰富，应用上亦最方便属于第三类的文字体系。"（2）

可见，汉字与西方简单的拼音文字有很大不同。西方文字如俄语使用斯拉夫字母，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都是使用拉丁字母构词组句的字母型拼音语言，字母本身无义。现在，汉语成为国际六大通用语言之一，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均是字母语言，阿拉伯语可以说是一种近似图形的文字。

中国汉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化主要存载于浩瀚的汉字历史典籍之中。《吕氏春秋·先识》中说："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骄无德义，以其图法归周。"明确表明我国在夏代早已有图书典籍，自然到商代也应当有典籍图书。据《商书.多士》所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中国至今已有4000余年的典籍史。清初名士彭士望有言：

书，言之府也。是故蕴古今之宏深，发天地之秘奥，溯圣贤之渊微，以逮万事万物之治乱、是非、得失、倚伏、消长、新故、损益、绝续、散殊、会通、出入、从违之故，皆取之于书。书之为物，极而推之，山海不足以喻其富，鬼神不足以擅其奇，日星河岳不足以方其

高明而广大，视龙堰蜒，视虱车轮，不足以方其神化而凝一，此吾儒之所以斯须不能去，与宇宙相为开辟、消闭、先后天而弗违者也。（3）

一切的一切，都在书中了，包括深厚、无穷、光耀世界的中国文化。毛泽东早在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这些至要典籍，成为传承中国文明的宝典。如春秋战国时期，老聃解述"未来大同世界"的《老子》、孔子"仁德天下"的《论语》、商鞅的法治理论宣言《商君书》、孙子的"兵学圣典"《孙子兵法》、西汉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北魏贾思勰的"农科巨著"《齐民要术》、北宋司马光的"治国教科书"《资治通鉴》、沈括建立中国"科学坐标"的《梦溪笔谈》、明朝黄宗羲昭示"民主启蒙"的《明夷访谈录》、罗贯中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李时诊的"药学巨著"《本草纲目》、清代康有为"揭示人类公理"的《大同书》、曹雪芹"魂断清末"的巨著《红楼梦》等等。

在人类历史上，中国文化始终是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之一，这是任何时候都不容忽视的。世界没有中国，世界肯定不完整；世界文化没有中国文化，世界文化就一定残缺不全。现在，有人（包括部分东方人和西方人）从表面的肤浅的认识出发，不重视中国文化及其载体——汉字著作的世界性意义，这是极端错误的。毛泽东曾说过：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4）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5）

虽然中国历史上很多有极高价值的著作不如西方某些书籍那样影响范围广泛，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另一方面是由于古代交通、传播手段的落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受到一

定的限制；再一方面是由于汉语著作经翻译成外文后，其汉语所蕴涵的丰富含义，往往失掉了一大半。但是，这并不能抹杀中国历代哲学、政治、军事、科学、医疗、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著作的世界级地位。只有那些肤浅甚至无知的西方人才把中国的学术文化知识看着是历史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西方文明能主宰一切吗？显然不能。因此，我极不赞成那些编印冠有"世界名著"丛书的编辑们只印西方著作，而对国学则视而不见，不纳入"世界名著"这一体系的作法。他们这样做，使人们一想到世界名著就是西方的，一想到中国书籍就是古典的。这不是一种高尚的自谦，而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因为"古典"一词现在常被认为是"古董的"或者过时的，而不是"最初的、至高的典范"之意。

反映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经典－－春秋末年哲学家、道家创始人老子的《道德经》在世界上受到广泛重视，有些有见识的西方人将其列作全世界古今十大名著之首。中国医学正被日本、美国等西方国家广泛用于临床和制药工业。因此，中国的学术文化经典无愧于"世界名著"之名。

由于汉字文化在思想内涵和文化载赋方面是西方那些字母文化所无与伦比的，所以有些精彩的汉字著作一旦翻译过去，就变得黯然失色。我敢肯定，在英文译著中是绝对欣赏不到我国著名文学家钱钟书的著名小说《围城》的汉字原著中的精彩意境的。该书不但文字优美，故事动人，而且所揭示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生活规律--"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也是西方同类著作所望尘莫及的。我们不能说，钱钟书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否认《围城》的世界名著地位。捍卫汉字名著的公正地位，既是中国文化的发展所需，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责任。所有使用汉字的炎黄子孙无须对字母文化五体投地，我们拥有代表东方文化的汉字，就拥有无限的自豪感。我们有责任继承和发扬汉字文化，有责任向世界介绍和继续丰富具有世界影响的汉字文化。

的确，东西方文化存在着很大差异。除了地理、人种等方面的自然区别外，东西方文化的区别主要有四点：首先，汉字语言严格区别于西方的字母语言；其次，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体系不同于西方；第

三，中式佛教不同于西方的圣经宗教；第四，中国医学成就区别于西方医学。

在东西方文化的四大差异中，语言文字、政治哲学以及医学成就的区别显而易见，勿多赘言。惟独广泛影响民众社会生活的宗教信仰需要说一说。

我们知道，中国在秦汉以前主要信仰本土宗教，自印度佛教从汉朝开始传入我国以后，佛教在中国僧徒众多，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发展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但是，结合着中国特有的文化结构，佛教很快被完全中国化了。历史学家钱穆对此有独到的论述：

佛教来中国，并不是直接向中国下层民众散播，中间却先经一转手，经过中国知识分子一番沙滤作用。如是则佛教东来，自始即在中国传统文化之理性的淘炼中，移步换形，而使其走上中国化。（6）

印度佛教，本与其他宗教不同，他虽然亦有偶像崇拜和神话粉饰，但到底是更倾向于人生哲学之研寻，并注重在人类内心智慧之自启自悟的。尤其在当时中国的佛教，更可说是哲理的探求远超出于宗教的信仰。因此，在印度，佛教以小乘为正统，大乘为闰位，但在中国，则小乘推行时期甚短，两晋以后即大乘盛行，在印度，大乘初起，与小乘对抗强烈，在中国则开始即二乘错杂输入，兼听并信。此后，大乘风靡，亦不以傍小乘为病。至于持小乘讥毁大乘者，在中国几绝无仅有。中国佛教显然是更偏重在学理而偏轻于宗教的，这又是中国文化一种特殊精神之表现。（7）

佛教来中国，乃于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近似处，但亦有一大不同处。佛教与耶回二教同对人生抱悲观，而中国人对人生则抱乐观。佛教在中国已极盛行，宋代理学家起，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而生老病死不为苦，此即对佛教一反证。苟使反之吾心，信孔颜儒道，亦在救世救苦救难，而吾心则乐，则何必效释迦之逃避出世。中国人之由释返儒，则仍在其一心。即理学兴起前之中国高僧，亦知反之己心，则即身可以成佛，立地可以成佛，而无前世作业之为障。南北朝时，竺道生已阐其义。唐代禅宗，更唱其说，而天台华严相与助成之。此为中国化之佛教。

佛教来中国，教人先出家。中国人生重家，其道大异。但后世中国社会，父母死必邀僧侣来家诵经念佛，超度亡魂，僧侣亦乐为之。

实则僧侣心中亦各有其父母之存在。此即佛法中国化之一证。又佛教主人身地、水、风、火，四大皆空，既不主有人世界，自不主有鬼世界。但以此心悟此法，佛心佛法，则可常存宇宙间。中国佛教乃专从此方面来加发挥，来加宣扬。此心此法即此道，此道弥满天地间，则为佛教中国化之更大表现。（8）

可见，经过2000余年的发展变化，自从佛教融入了中国文化因素如宗孝观念以后，在中国的印度佛教早已成为中式佛教了。发展至今，中式佛教与印度佛教有很大区别：中式佛教修法大乘，印度佛教修法小乘；中式佛教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重学理轻宗教，印度佛教始终具有印度文化的烙印；中式佛教依据印度佛经，开宗判教，循大乘普度众生、重顿悟、入世舍身之教义，用中国之智慧，创禅宗、华严宗、天台宗等中国教派，自成体系；还有，中式佛教落地生根以后，昌盛兴隆，以致高僧、佛经和教义走向世界并回流印度，使佛教成为世界性宗教。有人甚至注意到，印度佛教主静，而中式佛教主觉（觉悟）。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儒道相比较，佛教修来世，道教修今世；佛教修出世，儒教修入世，三者各有所别。

佛教未入中国以前，中国民众崇拜"天"的各种对象是"神化"的"圣人"，即"神"。如中国许多民族（包括汉族）都把中国文明的奠基者盘古氏、伏羲氏和女娲氏尊为开天辟地的伟大祖先。自伏羲氏创立中国远古文明演"乾坤"八卦以后，中国随着文明的演进，逐步形成了以儒为主，以道、阴阳等为辅的民族宗教体系。但由于儒教直接开创于远古的先贤，而且其它宗教基本上是在儒教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所以，儒教在中国占绝对优势地位或者统治地位，推崇者众。不过，中国的儒或儒家，先是一种仁礼伦理体系，后又发展到一种知识哲学体系，所以她寄国家政治体系而生；道或道家，既是道教又是道学，属于一种半宗教性质的知识哲学体系；佛教则是一种纯粹的宗教体系，所以，她依靠民间广泛存在的佛教寺院和僧人而存在。

与中国不同，在西方，除日本信奉源自中国而视同己出的神道教、禅宗和日莲教外，其它国家大都信奉圣经宗教。西方历史的浅短，使西方人一直被其起源问题所困扰着，为了寻求一种解脱，他们杜撰了一个"创世纪"，《旧约》和《新约》既是他们的"历史"，也是他们唯一的聊以自慰的全部过去的精神世界。于是，他们为自己构造

了一个虚幻的上帝，把她塑造成为一个在人类之外协调个人与周边关系的万能形象。由于上帝无所不在，西方人就有了依赖，也就获得了解脱，获得了再生。就像英国广义相对论家、宇宙学家霍金在研究宇宙时，生怕孤独地掉进可怕的"黑洞"中去被撕个粉碎，在写作其极具影响的名著《时间简史》时，也时时都在呼唤着上帝，与其同在，与其同行。

任何宗教都是一种文化的反映，但真正的宗教始终是一种民间活动，而不是一种国家政治文化。所以我们说，佛教不能成为中国文化的本体，中国文化实际上是儒、道、法三位一体的综合文化体系。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一种单一文化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从春秋开始的，诸子百家诞生以后，中国就进入一个各种思想学说纷呈的时代。其中，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等十家最为著名。后来，汉初史学家司马谈从"九流"（除去小说家）中，化纵横家和杂家，略农家，把阴阳、儒、墨、名、法、道合称为六家。后来，阴阳沦落为"方士"，六家又失一家。后来，秦汉以后，名、墨后继无人逐渐消失，最后，剩下的即最有影响的便是儒、道、法三家了。

儒家，是以孔子为创始人的重要学派。《说文》说："儒，柔也。术士之称。"即儒者，古代有知识技艺者的通称，后成为信奉孔子学说的人的专谓。自孔子之"仁"、孟子之"义"以及荀子之"礼"立，儒家传承不衰，以后，董仲舒、韩愈、朱熹等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儒家思想主要在政治伦理方面。在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在伦理上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道家，是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重要学派。所谓"道"者，即宇宙之本原。其思想主要在政治哲学上。道家思想经庄子的发挥，发展到全盛。由于统治者的封压，历史上无大继者。但自老子"知常"论、庄子"齐物"论提出以后，其思想始终在国家政治和哲学领域的文人之间具有广泛影响。其在政治上主张"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即以民心为本位--中国民本政治思想的本源。在哲学上重视事物矛盾及其转化，"反者道之动"，但又强调"柔弱胜刚强"的无条件循环思想。台湾学者南怀瑾甚至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实际就是中国上古传统文化中道家一贯的分脉，司马迁

著《史记》，自称祖述太史公的思想，以道家为主，应是指传统文化中儒、道不分家的道家，但取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而已。"（9）

法家，是主张以法治国的重要学派。其思想源于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实际创始于战国时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至战国末期的韩非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之大成，建立完整的法治思想理论。法家思想主要在政治和法治方面。在政治上，认为没有"自善之民"，主张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在法治思想上，主张以法治国、以法为教。

对应儒、道、法三者，中国有三位文化巨匠：孔子、老子和韩非子。他们实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真正的精神领袖，他们和儒家后继者孟子、道家后继者庄子、法家商鞅，以及中国主体文化的集大成者荀子和吕不韦分别著述的八部经典：《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韩非子》、《商君书》、《荀子》和《吕览》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大全。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八子八书"。

对"八书"中的前六部书，也许大家没有什么异议。对后二者，需要作点说明，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此二书的重要性。春秋时期的著名思想家荀子既是一个大儒，又是一个"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近代思想家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学，荀子也"。梁启超也说："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所以，《荀子》堪为经典。《吕氏春秋》系秦嬴政初年相国吕不韦集门客之力编成，东汉高诱序之曰：《吕览》"以道德为准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大出诸子之右。"然而，后人鄙吕不韦之行迹，故多不推崇。可《吕览》确实是集中国文化的集大成之巨作，加上"此书经二千年无残缺，无窜乱，且有高诱之佳注，实古书中之最完好而易读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故此书列八书之一，而不为过。现代兴"吕学"专门研究，足见《吕览》地位。但梁启超把《吕览》仅作为国学入门的"游览"书籍是欠妥的，实际上它应被精读、深研。

尽管《荀子》和《吕览》是集诸子百家之学，然儒、道、法三家仍然是其主要内容。所以，八书的重点自然也是集中反映儒、道、法三位一体文化的主要典籍。

表7-1 儒道法三家和“八子八书”

儒家 道家 法家

创始人 或集大成者 孔子[前551-前479]

姓孔名丘

春秋鲁国人

思想家、教育家 老子[战国时期]

姓李名耳，字聃

战国楚国人

思想家、哲学家 韩非子[前280-前233]

姓韩名非

战国韩国人

法学家、政治学家

2、第二个人物 孟子[前372-前289]

姓孟名轲

战国邹国人

教育家、思想家 庄子[前369-前286]

姓庄名周

战国宋国人

哲学家、思想家 商鞅[？-前338]

姓姬或公孙，名鞅

战国卫国人

改革家、法学家、政治家

3、主要著作 《论语》、《孟子》 《道德经》、《庄子》 《韩非子》、《商君书》

4、主要思想 “仁礼”政治论、

“损益”历史论、

先德后智教育论等 “无为”政治论、

唯物“道”论、

辨证分析论等 “法本”政治论、

辨证“矛盾”论、
唯物“道理”论等

5、集大成者 荀子[约前340-前245]，姓荀名况，号卿。

战国时期赵国人，著名思想家。传《荀子》32篇。

荀学包括了儒道法三家的基本理论而又自成体系：性恶论、“明分使群”论、“古今一致”论、“以近知远”论、隆礼尊贤论、平政爱民论、君权集中统一论等等。

6、集大成者 吕不韦[？-前235年]。

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人，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著《吕氏春秋》，即《吕览》。

吕学兼合“诸子百家”，融儒、道、法三家及墨、名、阴阳等思想，“假人之长，以补其短”。然而，后世对之缺乏研究，是为憾事。

儒、道、法的共同点都是一种社会政治理论，同时又有区别：儒重"仁、礼"，道重"无为"，法重"法、术、势"。"道"偏重于个人的清净生活和哲学修养，但不乏种种社会主张；"法"则努力建立整个社会的公正和公平体系，但不乏规范个人行为；而"儒"则在"道"和"法"之间，建立了一种和谐和中庸的桥梁。因此，中国的儒道法三元社会就是一种平稳的和平化社会，儒道法三元共同构成了我们历史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决定性因素。只要我们翻开任何一本史籍，均可发现：历朝历代的成功统治者无一不是三者并用，历朝历代的政治思想无一不是三者之综合。反之，失败的统治者往往或偏其一二或三者俱失所致。

西汉汉武帝时，表面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采用的是"外儒内法"，"尚法善儒，"儒法兼治的方法。"西汉所尊的儒家已经不同孔子时的儒家。当儒家竟能排斥百家而居于一尊的时候，它自身实际上已经包摄了多家的思想成分。"（10） 汉朝大儒董仲舒也曾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11） 魏晋时期何晏、王弼创

立了一种用道家观点解释儒家学说的"玄学"，向秀、郭象的《庄子注》更是双壁合一的杰作。至于玄学重于空谈，合流佛学，最终被佛学代替则不足多提。

创有"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尽管鄙《韩非》，重儒术，但仍认为"治国守法，事须画一"（12），仍用《老子》的"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作为一个重要标准。佛教盛行的时候，他曾下诏称："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吸引之迹殊途。论其宗也，弘益之风各致。然大道之兴，肇于邃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况国家先宗，宜居释氏之右。"

树有"康乾盛世"的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说："国家设立法制，原以禁暴止奸，安全良善。故律例繁简，因时制宜，总期合于古帝王钦恤民命之意。"（13）"有治人无治法，但真能任事者，亦难得。"（14）是儒乎抑或法乎？又说："为君之道，要在安静，不必衿奇立异，亦不可徒为夸大之言。程子曰：'人不学为圣人，皆自弃也。'此语亦属太过。尧舜之后，岂复有尧舜乎？昔人有言，孟子不足学，须学颜子，此皆务大言不务实践者。"（15） 此是儒乎抑或道乎？他曾在其著名的"举博学鸿儒诏"中，公开提出"崇儒重道，培养人材"的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曾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他的话虽然有极端之嫌，但反映出他认识到了法家与有建树的政治家之间的关系。

儒，成为历代统治者立国治国公开推崇的理论体系。道，则为统治者提供了自身修炼，刚柔并举，以便达到"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为无为，则无不治"（16） 的目的。法，则为统治者提供了治国制民的"方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世袭统治者的独裁，为了维持其统治地位，需要尊崇儒术，这就造成了不理道法的假象。事实上，世袭统治者，宣传道学，怕有阴险之嫌；提倡法学，怕有犯法之过。为此，世袭统治者总是不着力宣扬道学和法学，一概实行"仁政"。这也就造成了中国世袭时代唯心而不唯物、唯人治而不唯法治的传统。事实上，安邦定国需要尊儒，修养生息需要循道，护国保家需要守法，儒、道、法实为一体。这三者就好比一个人

的双眼和口，口中念叨的是"儒"，而其右眼为"道"，左眼为"法"（见图7-1）。

对中国历史文化深有研究的黄仁宇先生，通过对"仁"的研究，"打通"了儒道之间的联系：他说，"温和有礼，慷慨大方是仁的初级阶段。在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又必须把自己的思想与言行统统纳入它的规范之内，经过不断的积累而可以到达去私，最终到达无我。这样，仁就是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行动的最高准则、超越人世间的品质，也是生活唯一的意义之所在，简直和道家的'道'殊途同归"。（17） 同样，在儒法之间，"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看似势不两立，但前者为后者创造了一个适合发展的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后者为亦使法家的帝国稳如磐石。"（18） 法与儒之间"仁"的行为准则的两端：一端是纲领和条文，一端是礼仪理念，两者可互通不悖。在道与法之间，似乎两者是消极和积极的两个极端，但是，正是这种"阴阳"两极组合隐含着中庸哲学的互补性。

儒、道、法三者有此互动，既形成了一个稳固的"三位一体"文化结构体系，又把"儒"圈定为整个体系的中心（这正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兴儒尊儒的实证因素之一）。西方有一本介绍中国文化的名著，书名叫《中国古代的三种思想》（作者威利Arthur Waley）,它所说的三种思想就是儒家、道家和法家。英国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甚至认为，"如将中国古代诸子学说，以政治立场为基点加以排列，则应将法家置于儒家之前，盖法家代表当时政治趋势中之极右派，而道家则为极左之代表。"（19） 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先生也认为，"先秦学派最有力的四家，一儒家，二道家，三墨家，四法家。先秦政治思想，有四大潮流，一无治主义，二人治主义，三礼治主义，四法治主义"。（20） 可是，他又认为，墨家人治主义的平正思想合于儒家，而墨家的"末流"又趋于法家。结果，终归还是儒、道、法三家。再说，墨家名义在西历前3世纪就消失了，而法家经荀子学生韩非和李斯的亲身实践，使法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萧公权也说：人

治派，儒墨属之；法治派，法家为其代表；取消极态度而并与二派对立者则为道家所代表之无治派。"就其大体言之，儒墨二家同属第一类，法家诸子属第二类，道家之老庄及一切'为我'之思想家，独善之隐君子，即属于第三类。" 并比观列表如下：（21）

表7-2 萧公权儒道法三派比观表

治体 原理 治术理想

人治 儒 君子 仁 博施济众

立人达人 教养 (正名)天下归仁

墨 贤人 兼爱 交利 尚贤尚同

非攻节用 (政平民安)

法治——法 法 术 势 明法饬令

严刑重罚 国强君尊

无治——道 无为 除烦扰

任自然 小国寡民

至德之世

故此，中国传统文化就主要是儒、道、法三家的综合结构。

从积极意义上讲，这个结构是独特而稳固的文化结构。这个"三位一体"的文化结构体系，使中国文化具有超越现实的和平特性、无比的内聚性和巨大的包容性。但是，之所以需要这三位一体的结构，就是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背面"，在我们的社会中，往往注重发挥了它的"背面"，忽视了它的"正面"，更忽略了它的组合功能。这样的结果，就是社会生活出现畸形发展。比如，"中国人的精神力量一方面受到虚伪的儒家文人说教的腐蚀，另一方面又受到法家官僚赤裸裸刑法的打击，再一方面，道家劝导人们顺从，退避，与世无争，苟且偷安，中国人的精神力量受到这种种思想观念的蚕食，使得中国人只能

在传统的习惯势力淫威下始终亦步亦趋地作历史的爬行，永远无力量靠自身的思想和精神跳出自己历史的阴影。"（22）

现代中国社会的责任就完善"三位一体"文化结构体系，纠正其畸形发展模式。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中华少数民族文化，如蒙、回、藏、朝等民族文化，也多是中华儒道法三元主体文化的地方化延伸和衍变。虽然，我们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多民族文化，但中华文化实质仍然是儒道法三位一体的综合文化体系。

中国文化综合特性，也可以从她的沉积物--"龙"的产生和演化中得到证实。

远古东方人类发展在不同区域形成不同的原始部落以后，多以动物作为其部落的象征物或者图腾。在古国或者方国产生时，它们逐步兼并了很多推崇不同动物的原始部族，所以中国古国和方国乃至帝国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在同一族种分化成若干原始部族后的融合过程，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多样化特性，而"龙"就是这种多样化特性的集中体现。

中国的"龙"，最早产生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发展至今，她有了一个完美的形象：鹿角、牛耳、兔目、虎眼、狮鼻、驴嘴、马齿、蛇躯、鱼尾、鹫趾、鹰爪……。很显然，这种不同动物的组合，是具有不同动物崇拜的许多原始部族的折中结果，这种折中既体现了一种多样结构特性，又体现了多部族的共同认同。所以，我们中国文化又称为"龙文化"，中华各民族又称为"龙"的传人。

现在，"龙"既是中国十二生肖中唯一虚幻之物，又是中华多民族文化的综合化身。著名学者张岱年说：

中华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就是永远努力向上、决不停止，这句话表现了中华民族奋斗拼搏的精神，在政治生活方面，对外来侵略决不屈服，对不良势力决不妥协；在个人生活方面强调人格独立，志不可夺。"厚德载物"就是要有博大的胸怀，兼容并包。儒、道、佛三家彼此相容，这种现象只有中国才有。"自强不息"是奋斗精神，"厚德载物"是兼容精神。（23）

这种认识是很有见地的。当然，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儒、道、佛三家兼容并包，用"佛"替出了"法"，这是值得商榷的。

总之，儒道法"三位一体"的文化结构构成了中国文化最基本的本质特征。在中国"三位一体"的文化结构中，有未来世界文明的思想内核--和平、包容和稳定等重要因素。我们应当进行挖掘、开发和宣传，并对社会进行必要的改革，把中国的灿烂文化的思想精髓推向世界。我们尊儒不是去做古代儒生，崇道不是去炼长寿丹，重法不是去搞残刑酷法。我们应该按照毛泽东"去其糟粕，用其精华"的思想，以宋代大学者张横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实现儒家仁礼天下、道家道德光华和法家法教为上的崇高理想，迈向中国历代政治思想家们所矢志追求的大同盛世。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文化始终是普照东方世界的先进文化。朝鲜、东瀛、南越、南海环岛、西域、北疆无不受惠于中华文明之光。

处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乃至各个华裔国家和地区，尽管他们长期偏居中原边缘地区，但他们的母体文化仍然是中国"三位一体"文化。因此，身居汉字文明之中的中国人，应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感到无比自豪。我们除了要捍卫和发展我们的先进的文化传统外，应当积极地向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输出中国文化，让世界更多的人了解、认识并跟进中国文化的先进性。

在人类发展史上，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东方文明是独立发展并繁荣起来的，并且对整个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些成就至今仍在发挥其积极作用，如汉字、儒道法综合文化、纸的发明、中国医学等等。

西历17-19世纪，西方早先东方受惠于实验科学的成果而变得强大，东方则因闭关自守和受西方掠夺而出现衰退。在西历21世纪，随着中国的逐步崛起，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以中国汉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也正在日益扩大其世界影响力。

为此，作为中国人应当充满信心和希望。中国可以给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西方那些穷兵黩武的霸道国家讲授中国文明课程：

第一、富有独特文化的中国汉语体系；

第二、富有和平思想的儒道法三元文化体系；

第三、富有自然理性的中国医学体系。

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沟口雄三说得好：

在十九、二十世纪，世界遵从着欧洲的规则来自我实现，因此，欧洲以外的世界不得不歪曲自己的历史甚至不得不捏造它。其结果，我们的世界失掉了它的丰富性，而欧洲自身也因此而受到了歪曲。

在今天的世界上，在欧洲以外的地域，拥有最多历史文献宝藏的文明古国是中国。我们必须尽快把这些历史文献亦即拼图的断片按照中国的规则重新组合起来，以复原中国的原有样态，当中国的这一图像被呈现出来的时候，世界也许会更加接近它的原貌，欧洲也会恢复它本来的形象。这一世界文明史的重新书写是历史赋予中国研究者的艰巨任务。（24）

我们在国际交往中，注重诚挚的友谊和崇高的道德风范是必须的。但是，"在确保对外的国防武力之上，应该更先注意的是，社会上文化传统之养育与保护"（历史学家钱穆语），特别是中国完整的文化体系，包括整个文明的优良部分，应当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立国之源。

西历20世纪末21世纪初，美国大肆鼓吹着美国的价值观、民主制度，实际是竭力推行其文化帝国主义政策，对世界实行文化侵略。毛泽东早在1949年就曾深刻指出：

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时间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25），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26）（27）

美国帝国主义，到现在仍然坚持这样的政策，不但没有改变，而且手段更加高明，更加先进也更加残酷。就像美国海权论者马汉所说的：

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决定着整个地球并支配其未来？当前，摆在文明的基督教世界面前的重任就是将包围着自己的众多古老的异域文明－－首先是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

融进自身的理念之中。这是它的一项伟大使命，它必须履行之，否则就只有毁灭。（28）

虽然，我们中国人没有马汉吞并其他文明的野心，但应该有马汉式的危机感。在发扬光大中华文明的同时，应注意吸收西方文明的先进部分。正如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方克立教授所说：

在今天世界，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都居于领先和主导地位，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当然首先要向西方学习。我们明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并非尽真、尽善、尽美，其中包含假、丑、恶的东西，明知在全球化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资本主义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的问题，明知美国等西方国家一天也没有放弃"西化"、"分化"社会主义中国的图谋，但是为了知己知彼，我们必须学习；为了得到人有我无的东西，我们必须学习；为了吸取异质文化的营养，来提高本民族文化的自我反省和更新能力，我们也必须学习。西方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问题是看你有没有鉴别和选择的能力，有没有"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主题意识。科学技术是全人类智慧的共同财富，先进的管理经验反映了生产和经济运行中的客观规律，它们即使是"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学习和利用。我们要像马克思教导的那样，善于"以人道的方式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利用旧世界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在这"一切肯定的成果"、"一切强大的手段"中，除了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之外，还包括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所蕴含的符合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普遍价值，如理性、科学、民主、法治、人权等，以及一些新的文化观念，如主体性观念、可持续发展观念、知识经济观念、社会均衡观念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中可以批判地吸取的资源。（29）

---

（1） 王大有，《上古中华文明》，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2） 何新，《大易新解》，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10页。

（3） 转引自蔡尚思，《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8页。

（5）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707-708页。

（6）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版，第150页。

（7） 引自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卷，第430-431页。

（8）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一版，第6、14页。

（9）南怀瑾，《中国道教发展史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12页。

（10）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4卷[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第453页。

（11）《汉书.董仲舒传》。

（12） 《贞观政要.论俭约》。

（13）《康熙政要.论刑法》。

（14） 《康熙政要.论君道》。

（15）《康熙政要.论君道》。

**（16）《道德经.第三章》。**

（17）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6页。

（18）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81页。

（19） 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246页。

（20） 梁启超，《梁启超学术论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197-198页。

（21）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24页。

（22） 黎鸣，《中国人性分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88页。

（23） 《人民日报》，1999.5.22，第6版。

（24）“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登，《光明日报》，2000.11.14，第B3版。

**（25）材料引自美国雷麦著《外人在华投资》一书第十五章——原注。**

（26） 指北平的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北平和南京的汇文中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长沙的湘雅医学院，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和广州的岭南大学。——原注。

（27） 《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第二版，第1506页。

（28） 马汉，《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425页。

（29）“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登，《光明日报》，2000.11.14，第B3版。

**********

第二节　中国文化的标尺：科学和技术水平

科学技术是一国文化的直观表现。科技落后，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化不能有效吸引和发挥先进思想的结果；相反，科技先进，则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化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结果。所谓文化失去吸引力，是指整个国家和民族由于其思想落后，使其政策和体制不能适应时代需求，科学技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步伐。

自198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后，中国从理论上把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提到了极其显耀的位置上。这说明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谁都知道，日本因为把科学技术作为立国之本，才有今天飞黄腾达的日本经济；美国网络世界一流人材，依靠技术垄断，才有美国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韩国、台湾依靠科学技术，才有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扶摇直上的经济增长。应该看到，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邓小平"解放生产力"的结果，主要是中国雄厚劳动力和经济资源的开发利用的结果，而非主要靠自己所拥有的科学技术带来经济的增长，并且这种状况至今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的《国际竞争力报告》说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国际竞争力位次最高的时间是在1998年，为第24位。但此后几年就逐年下降，2001年降为33位，2002年为第31位，2003年排名继续下滑。中国的成长竞争力指数在102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44位，商业竞争力指数在9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46位。据称，世界经济论坛是根据宏观经济指数、技术指数和公共机构质量这三项标准对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作出评判的。中国在宏观经济指数中的排名位列第25，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但其他两项的名次分别为第65位和第52位，这使得中国的最终排名落到后面。

在科技竞争方面，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比差距很大，落后地位未得到根本改变：

第一，技投入在GDP中的比重仍然较低。2002年，中国科技在研发投入虽已突破1000亿元，占GDP的比率达到1.1%的历史最高水平，但以2001年看，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占GDP已达2%以上，其中瑞典超过3.5%，韩国达2.5%，捷克也接近1.5%，欧盟国家平均也在2%以上。

第二，中国科技人力资源相对规模较小。据有关资料显示，每万劳动力人口中从事研发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中国仅有7人，而瑞典和日本分别是86人和85人，美国为74人，澳大利亚为66人，法国为61人。2001年中国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虽已达到93万人／年，但仍与7亿多劳动人口规模不成比例。在研发投入的相对规模上，中国与发达国家相差还远。

第三，从已经发表的科技论文情况看，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据有关部门检索，1999年我国科技论文的总量世界排名第8位，但是，论文质量和数量与居前几位的先进国家相比，差距多多。1999年我国被《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论文仅是日本的1/3，英国1997年的1/4，美国的1/13。这是其一。其二，论文质量不高，影响力低。在1993-1997年间，我国平均论文被引用次数为1.86，而国际平均被引用次数为2.24。其三，我国科技期刊的影响力较小。1999年我国被《科学引文索引》收入的期刊仅有56种。

第四，我国生产技术水平也不容乐观。"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1993-1997年基本保持在1.5%左右，1998年1.7%，1999年1.94%。高技术产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比重，1997年中国为7.7%，而美国为14.7%，日本为15.7%，韩国为15.8%。据估计，中国现有生产技术水平仍大大落后于国际水平。如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水平比国际水平落后5-10年，机械行业生产技术水平比国际水平落后15-20年，石化行业总体技术和装备水平比国际落后20年，钢铁工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企业只有两家，占全国钢产量的比重不到10%。"（1）

第五，专利授予量很低。目前，中国国内居民每百万人中获得专利数仅有1项，不仅远远低于日本(994项)、韩国(779项)、瑞典(271项)、美国(289项)，而且低于巴西(22项)，几乎与印度处于同一水平。

总之，"从整体水平看，中国科技落后于美国、英国等世界先进水平15-20年左右。"（2） 这说明我们的科技政策和科技水平，还远没有进入世界前列。

诚如一些科学家所说，科技竞争力不等于科技实力。但是，我们的科技实力在世界上又排"老几"呢？有专家研究，在1999年，用定量的语言描述，以美国的科技实力为100，日本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三强，德国约为美国的57.8%，俄罗斯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强，中国约为美国的五分之一强。到1997年底，按照国际惯例，折合为全时工作当量，我国研究和发展（R&D）人员为83.44万人，列在美国（1993年为96.27万）、俄罗斯（近90万）之后，居世界第三；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R&D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大致相当于经合组织国家的1/5，相当于最发达国家的1/10；我国R&D支出仅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

的1/13；人均R&D经费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0；我国发明专利数量排在世界的第20位以后。

科学技术在中国企业中的地位又如何?

当世界企业把R&D经费/销售额的比率低于1%就视为无法生存，并拼命加大R&D投入时，我国企业所拥有的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却在逐年下降。全国大中型企业中设有技术开发机构的比例，1990年为54.1%，1995年39.8%，1998年已经降到了30.6% 。（3）

从报刊披露出来的信息看，现实就是：我国很多企业在技术开发上没有后劲，相反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上市公司在自吹自擂、玩弄数字游戏方面的才能则比外国企业技高一筹。

R&D投入不足、企业作为一个创新主体不能建立，这自然是导致中国科技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但是，最令人心痛的是，中国人才的浪费。在中国，不管哪个单位，国家机关、企业以及其它团体，没有一个不喊中国人才缺乏，要以人为本的。实际情况又如何呢？在中国，恐怕除了只有几个人的小公司外，没有哪个单位敢于声称自己的单位是人尽其用的。我们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大学生在打字室打字、医科大学生在非医业车间去做工人、研究生去做街道办事处主任、更多的大学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相反，在我们的社会中，很多学识和精力不足以胜任工作的人却比比皆是。在此情形之下，我们的许多企业还不断发出"天下无马"的喊叫声。造成这种怪现象，不客气地说，在我们的教育、用人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风气等一系列环节上，都存在问题。

一个反映政府在技术创新的口号和行动之间具有相当大的差距的典型例子是，中国标准化的滞后现象。2000年9月 29日《中国经济时报》头版登载了一篇题为"我国标准化过于滞后"的文章，文章说："目前我国标准化工作与入世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民经济战略调整的需要。"其主要表现是：标准总体水平低，时效性差。在19118项国家标准中，只有43.1%采用了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其中，落后于技术发展、不能满足当前要求的就有3500项，占去总数的18.31%。到2000年初，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已经有16000多项，而我国的国家标准仅采用了其中的5988项，仅占37%。在国家标准制定问题

上，我国每年申请新制定国家标准的项目都在2500项以上，但由于经费、人员等原因，每年只能安排1000项左右。一位湖南读者，看了此则报道，忧虑地说：

这样的数字是触目惊心的。标准化工作是一个国家技术创新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素质，研发能力息息相关。文中反映的我国标准化工作过于滞后的状况与我国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是背道而驰的。在加入WTO的紧锣密鼓中，实际工作中却存在这样严重的不相协调的状况，使人颇费思量。（4）

由此可见，在我国科学技术的地位并没有像理论或者口号中所强调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荣耀。

科学技术，在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相当矛盾的地位：一方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又没有得到全民特别是政府部门的足够重视。原因只有一个：科学技术的主体：发明人或创造人的地位未彻底解决，国家有关科学技术的保护和产业化政策没有得到认真的落实。

这种结果恐怕与错误理解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有关。我们以为，邓小平这句话主要是在强调除人以外的科学技术的相对重要性。1985年他说："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1988年在谈到科学技术时，他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我们万万不能机械地认为科学技术就是纯粹的第一生产力，而将人或"创造'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真正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5） 排到第二位。中国要提高科学技术的地位，必须首先解决掌握科学技术的"人"这个真正的"第一生产力"的地位问题，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对新发明、新创造、新技术、新产品的"快速反应能力"，否则，"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只能是一句响亮的口号。

科学技术地位、科学技术与人的关系未摆正，科学技术要取得突破性发展显然是不可能的。科学技术研究如此，科学技术转化也如此。

科学技术转化，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已有技术的实用化，二是外国技术的国内化。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邓小平所一贯倡导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这方面是做了不少工作，863计划就是典型代表。但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仍然是中国的老大难问题。据统计，在20世纪末，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10-15%。

在科学技术转化和应用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实现技术创新。外国的先进技术不但要转变成自己的技术，还要在外国技术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如何？有专家说：

我国从1985年引入专利制度，到1998年以来，申请受理量是持续增长的。但是，发明专利在累计总量中只占16.08%，又主要集中在轻工、医药行业，而信息、机电、新材料等高新技术领域的专利活动并不活跃。另外，有单位经济、技术支持的职务发明所占比重1998年为33.32%，竟然比非职务发明所占比重少。这一方面说明重大的创新成果少，因为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是通过调查发现，职务发明存在流失现象，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

就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来说，就是产生了"市场失效"和"系统失效"两方面原因。市场失效是指我国的基础研究投资不足；战略高技术的研究开发不足；产业共性技术和竞争前技术的开发不足，比如CAD技术，对许多产业都有促进作用，但没有短期商业利益；还有就是交通、通讯等物质基础设施与人才、创新网络等创新基础设施差，严重阻碍知识的流动和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我们称为创新的环境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足。

而"系统失效"主要指两方面：一是激励失效。比如在我国一个专利从申请到授权需要5至6年甚至更长，而在美国仅需要2年，这就减弱了企业的创新动力。……第二个方面是不同部门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进行决策，导致系统的失效。比如政府的财政税收政策会鼓励短期的、常规的项目投资，而不是长期的创新投资。（6）

我们现在正为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而沾沾自喜，殊不知我们的"世界工厂"的技术地位与西方国家控制的世界最先进的制造技术水平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有专家指出，"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只是产业和技术下行性的产业和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输入的只是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和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业。实行这种战略造成两方面的消极后果：一是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产业的依赖，不能自主地开发技术产品，在技术上受制于西方国家；另一方面，发展

中国家实行赶超战略的结果，是帮助西方发达国家解决了技术升级的困难，它们一方面把本国已经不需要的技术和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另一方面却可以腾出手来发展更先进的技术，使得发展中国家在最重要的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越来越落后，加强了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优势，使发达国家可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的源头，最终加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在国际发展的潮流中失去自己的地位。"（7）

奇怪的是，我们对科学技术研究和转化存在的问题不是那么刨根究底，但对为什么中国人至今没有取得诺贝尔奖却异乎寻常地在意。并且，这个问题一直是我们一些政府官员、媒体记者、科学家以及关心诺贝尔奖的人的重点话题。有的人甚至为我国至今未能获得诺贝尔奖而愤愤不平。

有人分析说，一般立国30多年便会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前苏联39年，捷克40年，波兰46年，巴基斯坦29年，印度39年，……，而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立国已经50年了，……，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只能让我们中国人产生无数的遐想。

著名科学学专家赵红洲认为，中国人之所以至今与诺贝尔奖无缘，原因有四：一是科学知识积累不够，二是科学研究时间不够，三是缺乏科学家群落，四是缺乏科学人材的识别和遴选机制。另一种观点更为"高深"：中国人和诺贝尔奖无缘与东西方的传统文化有关，西方科学有着良好的"求异"传统，他们总是刻意求新，而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思想是"守一"和"齐一"这种大一统的思想，这种思想严重地控制了人们的创造性（8）。在一个叫《诺贝尔百年沧桑》的电视专题片中，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又认为，中国人之所以与诺贝尔奖无缘，首先是经济投入太少，但不是主要的；更为重要的是体制不合适和评价体系太形式主义。然而，一直强调中国人已经获得过诺贝尔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他和李政道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他们当时是中国籍）则认为，中国大陆科学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主要因为：一是经费不足，二是科学研究没有形成传统，三是科技界的信息沟通不畅。其中他认为"学术要有传统"这一点是最主要的。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中国科协2000年年会上说，从1901年至1999年，诺贝尔自然科学三大奖（物理、化学、生物学或者医学）中，成

就最主要的是重大科学发现，占58.7%；重大理论突破占22.8%；重大技术和方法发明仅占18.5%。从获奖者的年龄分析，路甬祥指出，科学家创新的高峰期是在30-40岁之间，许多是在做博士学位论文期间。因此，在重视发挥中老年杰出科学家指导作用的同时，必须建立起正常的人才新老交替和合理流动制度，破除论资排辈、因循守旧的陋习，特别需要鼓励和支持20多岁的科学家在前沿领域和重大方向上开始独立创新研究。创新意识、原始性创新思想与创新战略比经费与设备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9）

这些分析虽不完全，但不能说没有一点意义。可是，接下来的有关"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获得诺贝尔奖"的讨论就让人莫名其妙了。

对于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获得诺贝尔奖，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杨振宁比较肯定大众所推测的20-50年的时间。然而，中国科学界却等不及了。1999年众多科学家联合呼吁："中国科学家冲击诺贝尔奖是时候了。"认为中国科学家应该有志气、有责任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这种进取精神是可嘉的，但是我们进取的不应是什么奖，而首先应该是成就）。中国经济学界更是急不可待，认为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问题，所以，应以"中国经济学"、"中国发展经济学"之名重点展开研究，向诺贝尔奖冲击。（10） 也许这是急不择方，你想想，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哪有白开的筵席？社会主义经济学，不管你叫发展经济学还是中国经济学，它还是中国的经济学，这能适合他们"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普适原则吗？"超导"专家赵忠贤院士曾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迄今为止其评奖特点始终是：不是授予成功地应用经济理论并制定出某种政策成功地解决了某些现实经济问题的'应用经济学家'，而是授予了在经济科学基础理论或方法上做出重要贡献，并因此而促进了经济学在各领域内成功应用的'理论经济学家。'（11）" 2000年5月，CCTV-1《新闻调查》栏目专门制作了主题为"诺贝尔离我们有多远"的电视片，片中主持人采访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以及中科院院士陈佳洱、母国光、陈竺等人，主持人反复追问这些科学家一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得诺贝尔奖？"

事实上，从诺贝尔奖发展历史上看，我们应该看到诺贝尔奖的两面性：其一，正如明眼人为试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经济学家

所指出的："诺贝尔奖青睐那些开拓'疆土'的勇士，而不是学富五车的智者。"而"现代经济学的危机不在于其技术细节，而在于其哲学层次，即它的方向性；谁能认清方向，为现代经济学找到出路，谁就有可能引领世界潮流。"（12） 也就是说，要取得世界成就，必须在认清方向的基础上，脚踏实地地干才会出成果，它不可能像在政治、商业等领域可能靠投机侥幸取胜。当今中国，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是那个一贯看淡诺贝尔奖的人，这个人就是当代中国神农氏、世界粮农组织首席顾问、世界级著名科学家袁隆平，他在1982年就被国际水稻所称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1982年以来他获得多项国际科技大奖，他在20多个国家引种杂交稻，他的科学成就为"人类带来了福音"，他的《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是举世公认的划时代科学著作，他和吴文俊是中国科技大奖的首位获得者，他为全人类的突出贡献完全有理由成为新中国在科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人。然而，诺贝尔奖的评奖者为什么没有用他们的行动来证明他们对科学成就评奖的公正性和及时性呢？我们不能不现实地看到诺贝尔奖的另一面。其二，诺贝尔奖在评奖后面还有除科学以外的其它因素。杨振宁曾说过，"对于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评选的方法和成绩，我不认为是正确的。"其它奖项又如何呢？至少我们可以肯定，连纯科学领域的世界性突出成就，都不能得到他们的承认，就更不用说意识形态很浓的经济学领域了。所以，何新先生深刻地指出：诺贝尔奖"是西方主导国家以表面客观的方式，树立某种经济意识形态权威，以此主导和操控世界舆论，实施对世界的意识形态领导的一种工具。也许老诺贝尔本人当初设立此奖时未必有此意。但近十年来，这个奖的人文部分（文学、经济、人权）正在由于这种不客观和不公正而声誉扫地。"（《思考.下卷.第三节》）这不是"得不到葡萄吃就说葡萄酸"，我们从诺贝尔颁奖者急急忙忙在1989年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分裂主义分子达赖喇嘛，2000年瑞典文学院把当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刚从中国去法国不久的作家高行健就可见一斑。前者，诺贝尔颁奖者充当了一个在中国支持分裂主义的卑劣角色，后者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其权威性。"（中国作协负责人语）。

科学成就的确需要得到认可和推广，但更重要的是中国需要更多更杰出的科学家及其科学成就。而这两者的平衡，政府可以发挥其重要的引导作用。我们希望中国科学家和中国政府能够为中国科学技术

事业做出更多更杰出的贡献。在可见的未来尽快提升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这才是当务之急。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科学技术不仅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实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标度着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

---

（1） 王元、胥和平，“‘十五’促进产业升级的技术政策研究”，《中国经济时报》，2001.11.23，第5版。

（2） 《中国经济时报》，2002.3.1，第1版。

（3） 郭励弘，“实验开发比较研究”，《经济日报》，2000.12.13，第5版。

（4） 见《中国经济时报》，2000.10.21，第3版“百姓广场——批注栏”。

（5） 杨东平主编，《教育：我们有话要说》，1999年第一版，第235页。

（6） 黄丽陆、余珂，“技术创新动力从何而来”，《经济日报》，2000.9.14，第5版。

（7） 叶自成，《中国大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32页。

（8） 《中国市场经济报》，1999.10。

（9）《中国经济时报》，2000.9.19，第8版。

（10）《中国经济时报》，1999.11.10，第5版。

（11）“中国离诺贝尔科学奖有多远”，《贵州都市报》，2000.10.16，第9版（原载《北京晚报》）。

（12）祁晓冬，“中国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缘？”《光明日报》，2000.1.18，B2版。

**********

## 第三节　中国文化的完善：法治与民主政治

在中国历史上，自夏启以后，以人治为上的政治思想始终占据统治地位，而没有形成开明和完善的法制体系以及公正和平等的执法传统，这是世袭政治所产生的一个社会毒瘤，几千年来，割之不绝，遗害无穷。没有良好的法治传统，就不可能有开明的民主政治。所以，健全法治和创建民主政治对我们中国文化来说是一种自我完善。

韩非子说过："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1） 战国赵国思想大家荀况早就说过，"法者，治之端矣"（2） 。 东汉思想家、史学家荀悦说："凡政之大经，法教而已矣。"（3）　东汉王符也说："夫国无常治，又无常乱，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法无常行，亦无常弛，君敬法则法行，君慢法则法弛。"又说："法令赏罚者，诚治乱之枢机也，不可不严也。"（4） 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进一步说："有法治而后治人。"（5） 法制是治理国家的根本。然而，古代世袭政治王朝是一人之天下，也是一人治天下。而人治思想就适用这种世袭政治统治者。1949年中国建立人民共和国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乃人民之天下。毛泽东早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1941年就指出：

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志。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6）

所以，主张改变几千年人治传统，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早在1956年9月15-27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明确提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

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改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 （7）可惜，这种试图走向国家法治化的设想，被毛泽东的反右运动给淹没了，它使中国实现国家法治化政策的来临推迟了整整30年。事实说明，一个直接脱胎于延续了3966年世袭政治的国家，从人治到法治，绝非一日之功。

但是，随着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不断发展，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向前推进，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保护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有力支撑政治制度的深化改革，都离不开法制现代化的建设。因此，法治作为一个国家政治和民主权利的基础保障体系，必须首先尽快得到强化、完善和深入人心。

1912年，后清政府在"何忍以一姓之荣辱，拂兆民之好恶"的叹息中，退出了中国政治历史舞台。历史永远是一面镜子。我们尽可为香港、澳门回归而欢呼，但是别忘了香港、澳门是一个特别行政区，别忘了台湾还不在一国之治下，别忘了还有太多不平等条约等待我们去清算。我们要成为东方世纪的中坚，首先必须自强。要自强，就必须励志。乐而忘忧只能导致败落，励精图志才能走向强盛。我们求得发展，不是关起门来卧薪尝胆，而是打开国门迎接挑战。我们面临的是整个世界，适者生存是残酷的现实。开明的政治、完善的法治、健全的文化可赖以固国，雄厚的经济、强大的军事、先进的科技可赖以抗衡。因此，法治是一个强盛国家最基本的保障之一，不可小视。与其谋求某种形式的改变，倒不如脚踏实地地搞好法治思想教育、法制体系建设和法律条文实施。这对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进程、稳定内外人心都具有事半功倍的作用。现在小学一年级学生一进校，就有一本"思想品德"课程，这未免过于深奥了一些，还不如在儿童本来就纯正的心田里，播下法律所要求和提倡的公正、正义、平等的种子。法治教育从小抓起，不至于九年义务教育完后，无机会继续得到教育而走向社会的全是法盲。更为重要的是，法治教育从小开始，法制精神就会漫漫深入人心。然而，现实情况是，我们学校小学二三年级的学生，都成了"社会油子"，滑头滑脑，老好人，中庸之道，活灵灵一大

人的消极处世行为，大多没有公正、平等、正义之概念，实在令人堪忧。但愿邓小平的理想能够在我们今后的教改过程中变为现实：

党要管党内的纪律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8）

在西历21世纪初，中国基本建成了一个较完整、系统的法律体系。但是，由于传统的人治轻法思想在各个领域依然存在，国家立法的权威性就受到了严重的考验。地方根据地方的特殊性，如少数民族地区、特区、落后地区等，都有理由对中央立法体系作变相的修正，使中央立法的普遍性受到严重影响。执法机关，特别是地方行政机关，越权立法相当严重。各种"通知"、"办法"、"规定"等等满天飞，使中央立法的方向性受到严重干扰。到2000年，全国人大不得不用《立法法》来制约立法者。问题严重的另一面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制定的法律文件不少，可法律的执行不得法、不得力，公众法律信心依然没有建立，而今尤如2400多年前老子所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9） 的状况。韩非要求，立法要做到"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10） 东汉王符也说："夫立法之大要，必令善人劝其德而乐其政，邪人痛其祸而悔其行。"（11） 不仅如此，全国性立法必须具有权威性，地方性立法必须具有规范性。否则，乱法将从立法开始。

古人说过："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即国家最令人担忧的不是没有法律，而是有法律不能付诸实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有法不依"。21世纪的今天，古人的忧虑至今仍然严重存在。还是何新说得好：

由于中国社会是身分社会，在法律上的表现就是身分不同，适用法律不同。在法律面前人不平等。秦代法律中就有以爵抵罪的规定。这和现代社会中以撤职、开除党籍代替追究法律责任的作法相似。

这种现象太多了，不说当官的本身，就说当官的亲戚朋友犯法与庶民犯法都是不一样的。前者往往轻刑或者不刑而出，后者往往是轻罪重刑或者无罪先刑。这是一种严重破坏法律公正性的犯罪行为。现在还流行"保出"法，即当某干部，因贪腐等原因被请进检察院，其上级领导怕其牵出更多的人，累及自己，就出面说情"保出"。这一"保"，就真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12）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13）我们希望偏袒枉法的事情少有或者绝有。

我们经常看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标语。这句"情理法""情"字居先的标语，沿用了几十年。它有两层意思：第一，坦白就是兄弟，兄弟就可以讲情而不讲法。抗拒就是敌人，敌人就是敌对阶级，就要实行人民专政。第二，老实交代犯罪事实，可以不执行法律。如有人杀了人，按照法律应处以死刑。但他老实交代了怎么样杀了人，免于警察收集证据，就可免死而服牢狱。等于是说，我故意打了您一耳光，然后向您赔礼道歉了事。这就是中国，情大于法，失却法律公正和不依据证据断案的典型事例。犯罪就是犯罪，犯了罪就应当适法量刑，不能因情而减刑或者免刑，即使应当减免刑，也应当先刑而后减免。

另外，中国司法和执法过程的隐蔽性，使司法和执法的公正性得不到应有的监督。一方面助长了司法和执法的随意性；另一方面，降低了人们对司法和执法公正性的信任感。我们对一些重大民事或刑事案件，只知结果不知过程，或者反过来，只知案件不知结果。因此，司法和执法走向公开化是法制建设的又一个难题。

在20世纪末有一个十分典型的案件，可作为现代中国法治状况的经典注脚。山西省运城地区绛县法院副院长、人称"活阎王"的姚晓红，是一个地道的"三盲（文盲、法盲和流氓）院长"。但他利用手中权力和关系网，制造了多起震惊全国的冤案，由无辜受害者状告"三盲院长"引发的姚案，从县级地方一直打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面前，才发生转折。此案主角在2000年初，最终被运城地区中级法院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虽然本案恶者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那些不敢告或者告不翻的冤假错案，又有多少呢？从姚案，我们看到了，中国那种权力"玩弄"法律的典型事例，真让人不寒而栗。

作为一项法令，从生效之日起至废止之日前，应有其不可间断的连续性。即使一项废止的法律，也有延续其基本要义和精神的替代法律。这是法治工作的一项最基本要求。遗憾的是，我们在执法上，往往存在阶段性的特点。执法就像搞政治运动那样，一浪过了，休整一断时间又再来一浪。并且，我们的执法是以斗争形式展开的。我们经常从报纸、电视等媒体上看到，"某项斗争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的总结。犯罪分子活动多了，就开展"严打"斗争，犯罪活动得到了暂时性遏止，执法队伍就"休息"了，在"休息"期间，即使有犯罪行为发生，也往往视而不见，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一段时间，犯罪案件又多了起来，逐步危及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又来一次"严打"斗争。

社会生活中，某种现象与国家政策发生了偏差，不是从法律根源上加以纠正，而是利用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介加以披露和道德式的谴责。这样的结果显而易见：第一，法律的执行具有随意性。上级喊打就打，不打就停。上级命令代替了法律。所以，我们的领导讲话，总是习惯于无休止的"要怎么怎么……要怎么怎么……要怎么怎么……"。第二，执法无法按照法律办事，执法部门按照上级命令行事。因此，法律对于他们，在"打"时有用，不"打"时就成了一纸空文。第三，犯罪分子总找得到犯罪时机。如犯罪分子不碰上"严打"，其犯罪就容易得逞。如碰上"严打"，就自认倒霉。即使"倒霉"了，也可老实交代，"坦白从宽"，过几天又出来了。犯罪分子摸透了犯罪"行情"，也就总存在侥幸心理。因而，相同的犯罪屡禁不绝。第四，打击犯罪对教育民众起了相反作用。打击罪犯有两个直接目的：一是使犯罪人伏法，二是教育没有犯罪的人不要犯罪。但是，我们常常听到民众对罪犯具有同情意味的理解："他（她）是闯到枪口上啦！"潜台词是"要是不闯到枪口上，他（她）就不会被抓的"。被抓的罪犯在民众心中，不是罪有应得，而是运气不好。这就是执法不连续产生的副作用。这种现象不加以坚决纠正，必将成为国家法治建设的严重障碍。

金观涛在《展望第三个千年》一文中指出，"现代社会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文化多元，二是市场经济。这两个特征形成的前提都不是它们本身所能提供的。为了使多元的追求不破坏社会秩序，就必须先确立法律高于多元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的精神。而市场经济对法治的依赖则更为强烈。"（14） 还有一篇文章说得更好：

支撑法治完美运行的三个要素是：有符合正义的法律；有秉公绝私的执法者；有深厚的全民法治意识、法治清感。归结到根本，即法治的真精神能为人们全面体悟并自觉接纳。这对深受"畏法厌讼"传统法律文化浸淫的中国人来说，远较制定一批法律、建设司法队伍困难，这需要耐心、韧性，需要和风化雨、潜移默化和诱导。

在西方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格言：天国的事归上帝管，人间的事归法律管。西方这种视法律为尘世最高权威的信念由来已久，与之相比，中国的社会调控模式由人治向法治迈进的几十年实在是太短了，能取得今天的法治成就已属难能可贵。但是，我们毕竟处在一个生活全球化的时代，对法治，我们更应强调与西方的共时性而非历时性。这样，我们的任务则极为艰巨。担负这一任务的主体，我们的执法人员更是任重道远。（15）

这些观点，对我们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推进国家改革、以改革开放为手段力求健全现代市场经济模式、通过建立市场经济模式希望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来说，是相当深刻的。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有了法治才会有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中国只有先建立了完善的法治基础，才可能向民主的殿堂迈进。然而在中国，虽然法制起源很早，但国家法治体系却始终未能形成，更不用说民主政治体系了。

在中国，法治是已产生很久的文化词语，民主则是比较现代的文化概念。对于中国来说，民主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法治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民主是中国社会最缺少的那部分。毛泽东曾说过："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在长期的世袭政治体系下，传统法治以维护皇权为目的，而不是以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民主权利为目的；而且，法治行为在皇权控制之下，没有其应有的独立性。因此，古代中国没有能够产生系统健全的民主思想。所以，现代中国仍然需要进行法治思想、法治体系和法治过程的重新设计和建设。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在此基础上构筑中国现代政治文明。

关于民主概念，梁漱溟先生认为"民主是一种精神"，它包括承认旁人、平等、讲理、取决多数、尊重个人自由等五大因素。他说：

一、我承认我，同时也承认旁人。我有我的感情要求、思想意见，种种；旁人亦有他的感情要求、思想意见，种种。所有这些，我都要顾及，不能抹杀，不能排斥之，灭绝之。--这是第一根本点。若"有己无人"，便是反民主。

二、从承认旁人，就发展有"彼此平等"之一精神出现。在团体内，则"大家平等"，若"唯我独尊"，便是反民主。

三、从彼此平等，就发展有讲理之一精神出现，人们彼此间遇有问题，要依理性解决。什么事大家说通，你亦点头，我亦点头，就行了。不能硬来，不能以强力来行己意。凡不讲理，而以力服人者，都是反民主。

四、从平等讲理，就自然有"多数人大过少数人"之一承认。凡事关涉众人，就要开会商议，取决多数；其中涵义，实综合以上四点而来。民主之"民"，正指多数人说；民主之"主"，则有多数人作主体，作主张，作主动等意思。

五、尊重个人自由。--这仍是根本于第一点而来。大家的事，固应大家共同作主；若一个人的事，于他人无涉者，就应让他自己作主，不得干涉。此中自有分际，必须认识。任何一个人意志不容被抹杀，虽公众也不能抹杀之。（16）

并且认为，中国人在前三点即承认旁人、平等、讲理方面颇有建树，而缺少的就是第四和第五点，即"遇事召开会议取决多数之习惯制度未立；划清群己权界人己权界之习惯制度未立。"故，中国不是没有民主，而是民主不健全。

鉴于以上原因，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形式不能忽略我们的原始文化基础，构筑中国现代民主政治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而应当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完善。

有一篇"民主自由的美国"文章（网文，作者岳东晓）对西方民主的来源和基础作了很有意思的分析。文章认为：

凡论西方民主，首推当今的民主典范--美国，往前，是罗马共和国，再往前，则是西方民主的摇篮--雅典共和国。但美国、罗马共和国和雅典这三个截然不同的国家有何共同的社会条件，使它们选择了民主呢？

文章认为，这三个国家社会制度的最大共同点就是奴隶制的实行--种族奴役是它们最大的共性。正是种族奴役的存在是民主制成为一种最合理、最稳定、最有效的制度。换句话说，西方民主的产生源于种族奴役的需要。

美国、罗马共和国和古希腊都是在奴隶制下实行民主的，它们都是一种双重系统，可称为民主奴隶制。在这种制度下，一个种族奴役其它种族，在居统治地位的种族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奴隶主种族的人民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力，有充分的人权和自由，奴隶族则被剥夺了人生自由，称为奴隶主任意处置的财产。……

美国民主过去的主要奴役对象是黑人，今天黑人已经很不好惹了，奴役对象就转为第三世界的弱小民族。

……

中国为什么几千年没有产生民主？因为中国从来未实行过种族奴役的制度。从周代以来的历史看，中国一开始就是封建制，庶民们种地交租，自给自足，地主农民基本上相安无事，大家基本上是平等的。没有种族奴役制就没有了民主的必要。假想中国人没有天下大一统的概念，假想当年华夏族征服别的种族之后废其为奴，而不是把后者容纳入华夏之列，则很可能在华夏族内产生民主制，以便齐心协力地奴役他族。是不是中国人太笨心太软？文章认为不是，而是因为我们祖先深知奴役他人必无好报。罗马帝国雄视殴亚数百年，一朝疲顿，连罗马也被屠城，庞大霸业土崩瓦解、灰飞烟灭。西方文化者，弱肉强食尔！与西人相争，唯强者能存。中国在未来的世纪内，倘若不能以崭新的中国文明扬弃西方文化中的原始性，建立天下大同的世界新秩序，就必将被西方强势文明淘汰，退出历史舞台。（17）

1944年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在他著名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就明确指出："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我们选择的自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某一个人拒绝满足我们的希望，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但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者，我们就只能对他惟命是从了。"这是对西方新奴役制度的最好注释。

所以，如果我们要免受奴役，就必须在经济、文化、科技上反垄断，在政治、军事上反霸权。如果我们要取得反垄断、反霸权的成功，就必须以更先进的中国民主政治经济制度和先进的军事科技技术

和丰富的文化体系与垄断者和霸权者抗衡，也许舍此无它。"一个国家成为世界大国必须拥有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但同时，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外交制度以及国家制度也越来越构成世界大国的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一个自己的国民都很不满意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很难对其他国家产生心理和道德上的说服力，让其他国家尊重和模仿。"（18） 而要建立更先进的中国民主政治，则必须在中国本土文明及其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做出极大的创造性建设。在这种努力过程中，伟大的爱因斯坦的意见很值得注意：

最重要的宽容就是国家与社会对个人的宽容。为了确保个人自身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安全，国家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国家变成主体，个人却沦为惟命是从的工具，那么所有好的价值就全部丧失了。必须先砸碎磐石然后才能长出树木，必须先松土然后植物才能茁壮成长。同样，只有在人类社会达到足够的开放水平、个人能够自由发展自己能力的时候，人类社会才能取得有价值的成就。（19）

中国在西历前2055年抛弃了原始民主制度--禅让制度以后，就开始了漫长（共计3966年）的世袭政治制度。在这个时期，真真成为"天惟时求民主"（20） （为民众求君主、主人或者救世主）的时代，正如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历史学家黄宗羲（1610-1695）所说的：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21） "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挞以为非。"（22） 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具有现代政治觉悟的先进人物推翻了世袭政治，选择了政党政治的发展道路，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但是，孙中山的继承者蒋介石采用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毛泽东等人则接受了同样源自西方的另一种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较量，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攻势面前低下了头--苏联解体、东欧变制、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也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中落后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方式方法。到21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制度体系方面，已经是惟恐不能尽早与国际（也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接轨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渐次融入世界体系，对中国老百姓来说，这是很幸运的，因为中国的改革的确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保障；对民族

国家来说，也是很幸运的，因为这种现实的选择，既挽救了国家，又挽救了民族。但是，现代中国是6500年古老中国的延续，我们有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等极端错误的"牧民"思想、有非权利法治传统、有善于从一个人一家族一团体一党群之私利出发制定国家政策的老毛病、有内部不善团结便天天叫着要稳定的习惯，于是我们翘首企盼的一个完善的民主政治社会就很难预见了。

陈维连先生在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一书的后记中有两段话很有见地，这里不妨转录，以供"各位仁人志士共勉之"：

直到二十世纪前邓小平执政使中国真正走上了一条富民强国之路为止，历代仁人志士先后提出过无数治国方略，其中只有少数被当政者采纳，更多的则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被采纳的少数中的多数并没有产生好的效果。

统治者总是把家族或集团利益甚至个人利益放在民族或国家利益之上。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宣称天下为公器，但骨子里却以天下为私产。开国者创的是私业，守成者守的是私产，苟延者图的是延缓革命以谋中兴。以抗战为例，半壁江山沦丧，剿共反成了蒋介石的第一要务。显示中国人抗战信心和决心的百团大战，因过早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倒成了彭德怀的罪状。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搞得民心背离。每当国难当头时汉奸蜂拥，就是明证。

清皇朝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有许多根本性冲突。清室统治者深知，"保中华"要以"不保大清"为代价，于是乎异常理智地选择了割地赔款，以图苟延。朝廷再小也比一无所有强无穷倍。北洋军阀、蒋氏家族甚至国民党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也不一致。袁世凯为了当皇帝，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蒋介石要先安内而后攘外，乃是置党于国之上的典型。五十年代与苏联结盟，六十年代与苏联交恶，七十年代联美反苏，考虑的全都不是民族国家之根本利益。

未来看不清，我们只能又回去看历史。

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在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创者坚持终身任职制度，没有给后人树立一个选贤让能的榜样，都倾向于像古代帝王那样"我没有死，你休想上来"的做法。事实上，领导人终身任职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一个人无限制地长期任职，年迈之际，由于精力和智力的下降，必然故步自封，逐步走向保守。这些领导人在临终之际所选定的是"接班人"，而不是有独立正确主张的国家领导人。按照黄仁宇的观点，"要是站在上端的人物不能摆脱人的弱点时，当朝中换班或政策改变之际，各项阴谋与诡计可能泛滥到无可收拾，及于宫廷内外。"（23） 许倬云先生更是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四大体系的相互代谢角度，阐述了政治和经济运作者的关键性作用。他说：

经济与政治两大体系中，由于运作者掌握了资源与权力。资源与权力都令人恋恋不舍其陪随的利益。因此，这两大体系中的运作者，每为长期盘踞，不甘放手的既得利益集团。人生不满百，长期掌权的运作者，无论当年如何圣文神武，在体力衰弱的晚年，必难避免偷懒糊涂，甚至假公济私。于是政治与经济两大体系的运作效率，经常与掌权者在位长短，呈反比例的变化。这是政治、经济两大体系内在的缺陷。以中国历史为例，政治体系的衰败往往领先表现为朝政的败坏，由此而牵动其他三个体系的萎缩，甚至崩解。

归结一句话，这些体系的衰败，固然往往有外在的原因，而"时间"（亦即运作者，无论个人或集体，都因人类自然生命历程而起的质变），则是最常见的原因。体系内有超越个人的制度，可以相对的减少"时间"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约束个人或集体的长期把持利益，人类自然生命反映的时间因素，终于会产生严重的负性影响。（24）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往往都是一个"长期利益的把持者"，很少有主动让贤的。于是，随着一个统治者"把持利益"的时间的延长，国家政治与经济体系内的内部斗争就日趋激烈，国家自然就漫漫失去发展的活力，进而积弊成疾，引起社会动荡。苏联解体、东欧变制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出现，这些都是要因之一。试想一下，毛泽东如果其在建国后的任期不能超过两届10年，那么中国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出现"文化大革命"。

在依靠战争夺取政权的时代，一个军事权威的存在是必须的。但是，全国解放以后，战争作为一种极端的政治手段，在国内政治中就

应当居于次要地位。恰如许倬云先生所说："大凡一个国家，在危急时，可以倚靠天纵英明的领袖，以其个人的威望维系国命。若真要长治久安，表面上看来最没有效率的民主讲理，反而是最能生效的力量。"（25） 历史表明，1949以后的毛泽东时代，仍然在继续使用战争--双方对垒的斗争--方式来建设和改造中国。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它只能给人民带来灾难。所以，就个人而言，毛泽东"进京赶考"是不成功的。作为一个国家的开国领导人，不是能够写出几本鸿篇巨著就能交卷的，他需要广阔的个人胸襟和远大的政治气魄。毛泽东在建国初期以后，忘记了《易传》"厚德载物"之言、忘记了《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之语（华盛顿的伟大不仅在于取得独立，创立美利坚，而更在于率先垂范地坚持了总统任期制度）。他在1949年以后，唯一可以大书特书的成就是他一贯优点的发挥--他利用他独特的军事战略眼光，力排众议，同周恩来、彭德怀等一道，赢得了震惊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尽管他没有把侵略者彻底赶出朝鲜半岛，但这种"胜利"意义非凡。遗憾的是，朝鲜战争以后，毛泽东没有集中他的智慧分析集权和长期居位所带来的危害，也没有利用他在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建立一个良好的领导人的任期和选举制度，而是利用他娴熟的斗争手段来处理一切国家事务，结果是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努力都没有取得成功。

毛泽东在现实斗争的巨大胜利面前，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这种绝对的权力和地位也给中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仔细研究过毛泽东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用西方式的语言和观点表述了对他的总结性看法：

1935年毛担任领导的30年间所获得的成就之大，足以使哪怕是头脑最清醒的人也产生偏见。中国政界的任期是没有限制的，因此中国政界首脑的地位就常常使掌权者以他就是"中国"这种形象自居，而这种形象事实上也正是铁板一块般的权力结构所要求的。我们可以想象，毛的背后有上百个过去的"天子"在跟他耳语，由于他那好战的斗争作风使他一再取得胜利，听取那种耳语就成了他的习惯。总之，他那不容质疑的地位是合乎他所领导的运动本身的种种需要而逐步形成的。他也带头提出并权衡党的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例如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重工业和轻工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

国防建设、中央和地方等的关系。然而在选择政策的范围内，他一再成为彻底实行左倾路线的主角，反对党内管理人员和经济开发人员的慎重意见，他是他们中间的一个空想社会主义巨人。（26）

他的失败说明，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他的前期优点变成了他后期的缺点。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监督体系的虚弱。所谓虚弱，虚就是监督体系具有表面性，弱就是监督力量微弱。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组织体系包括党和政府的监督体系都建立在党的控制之下。这实际上是中国古代世袭政治体系中，帝王权力下的监察体系的翻版。这种监察结构，在帝王或者上一级领导者贤能并能孜孜为公时，监察体系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这种监察体系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不能监督上一级权力者，最高权力者则处于独尊地位。因此，监督体系的表面化、形式化很浓厚，监督结果很容易受长官意志的影响。在最严重情况下，监督机构在内部斗争时期被作为一种工具，在内部和平时期被闲作摆设。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吏治腐败的根源。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国家是以公共权力的存在作为基础的。然而，"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英国思想家阿克顿语），所以，在政党政治社会中，如果国家监督体系不能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那么，通常的结果就是，人民不自觉地放弃权力，返回到"只要有饭吃，就万事休问"的原始人权状态。其结果是，放弃权力的阶级从统治阶级逐步变成被统治阶级。当放弃权力的阶级变成最大多数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趋向于由少数人阶级进行的更趋集中的统治。结果不难得知，历史将再版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改朝换代规律：农民起义（即无产阶级革命）促使新朝代产生，随后新朝代放弃最大多数的农民，最终又被农民起义所推翻。

所以，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需要做出明智变革，以保证国家常有适应时代的正确的政策；社会主义国家监督体系需要做出认真改革，以保证监督机构具有相对独立的监督权力，并且保证最大多数的民众具有口头和书面的监督权利和自由。也许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才有希望。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有言："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所可革也。"我们不希望国家积弊深重才抱佛

脚，与其让人期待翘望（增加不稳定性），不如不断创新，与时俱进，顺时代潮流。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在民主、人权等政治层面不断受来自那个号称"自由、民主典范"国家--美国的指责。它口口声声要中国改善在民主、人权方面存在的问题，以促进两国关系。事实上，国内民主与人权事业的进步，与本国的历史和文化是息息相关的，与它国没有直接关系。美国之所以热衷于"关心"中国的人权事业，热衷于"关注"台湾和西藏，热衷于"保护"中国的叛国者和分裂者以至邪教分子，目的在于利用这些制造冲突、遏止中国，达到分裂中国和搞跨中国的目的。印度为了民主，尼赫鲁接受了印巴分裂；苏联为了民主，叶利钦接受了苏联解体。所以，我们不能报有建立美式民主和人权模式来取得美国对中国认可的幻想，即使中国比美国政治更加民主、人权更有保障，美国也绝不会放弃对中国的抑制政策。

如果有人不认同这个意见，看看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就可见一斑。苏联解体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西方及时捕捉"战机"，利用了苏联的民主化进程，反而促成了苏联的解体。解体后的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又如何呢？先是欲建立亲西方的民主联盟，以期同美国平起平坐；次是寻求原苏联体系的一体化，以期建成世界的重要一极；后是欲与中国、伊朗结成三角关系，以期构成反霸联盟。这渐次退缩的探索终究没有得到西方的支持，反而接踵遭受西方落井下石的打击而先后归于失败，最后布热津斯基代表西方（更主要的是代表美国）为俄罗斯策划了一条"请君入瓮"式的唯一道路（见《大棋局.第4章》）：

只有一个愿意从经济和地缘政治上接受欧洲新现实的俄国，才能从横跨大陆的商业、通讯、投资、教育等广大领域的欧洲合作中获益。因此，俄国加入欧洲委员会是方向十分正确的步骤。这是新俄国与正在扩大的欧洲间进一步建立机制性联系的尝试。这也意味着俄国若要走这条路，除了最后仿效奥斯曼帝国以后的土耳其，决定放弃其帝国的野心，决意走现代化、欧洲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外，别无其它选择。

西方打击异己的手段是非民主的、非人道的，甚至是极其残酷的。

因此，诚如人们所指出的，中国必须走民主政治道路，但不是执行美国人的意愿。在经济充分发展、人民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国家完整统一、国家法治体系健全以后，中国的民主政治就应当稳步推进。我们应当承认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有这个过程，同时更应当关注这个过程，促进这个过程，并防止西方国家特别是霸权主义者利用这个过程。

展望未来，我们应该有像美国那样的"立国以来百年如一，贯彻始终的一套国家发展战略"，应该有像美国的"始创者们那种俯瞰历史面向未来的远大抱负和眼光"，应该有像近代美国卓越的思想家们"对于美国帝国命运和世界使命那种明哲而富于实用主义的洞察力"，应该有像美国政治家们"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忠诚、信念以及贯彻其国家战略和目标的坚定决心。"（27） 我们应该深刻检讨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贪

腐营生、卖国苟存的政治局面，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连续稳定性问题。有一副古长联很值得有"夫子志"的"圣人徒"们细细品味：

国正在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数千年以来，看世界渐进大同，庶几得行夫子志?

道本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四百兆而外，虽夷狄亦知起敬，况乎自号圣人徒！（28）

---

（1）《韩非子.有度》。

（2）《荀子》。

（3）《申鉴.政体》。

（4）《潜夫论.述赦》、《潜夫论.三式》。

（5）《原法》。

（6）《毛泽东选集》，第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7）《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53页。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163页。

（9）《老子.五十七章》。

（10）《韩非子.守道》。

（11）《潜夫论.断讼》。

（12）《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13）《史记.商君列传》。

（14）转引自新语丝文库[WWW.XYS.ORG]。

（15）《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9月2日。

（16）《中国人.社会与人生.梁漱溟文选》，上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第一版，第150-151页。

（17）引自房宁、王小东等著，《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5页。

（18） 叶自成，《中国大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16、117页。

（19）H.杜卡斯、B.霍夫曼编，高志凯译，《爱因斯坦谈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

（20） 《尚书》。

（21）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22）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

（2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第一版，第53页。

（24）许倬云，《历史分光镜》，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146页。

（25）许倬云，《历史分光镜》，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324页。

（26）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415页。

（27） 参见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23页。

（28） 录自建于明初的贵州省安顺文庙佚名长联。

**********

## 第四节　东方文化的基石：中国文化

前面说过，东方，是指整个亚洲东部地区，即泛中国文化影射区，主体国家包括中国、蒙古、朝鲜、韩国、日本、越南、老挝、泰国、缅甸、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尼泊尔、不丹、锡金等18个国家。这些国家就是世界地理上的东方国家。这一陆海地区，东濒于太平洋，南接于太平洋和印度洋，西阻于高山，北阻于荒漠。陆地面积1650多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面积(14900万平方公里)的11.1%；人口19.86亿万人，占世界总人口（60亿人）的33.1%，近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在东方世界的发展历史中，中国文化一直是其基础和核心。历史仍将证明，中国文化在未来东方世界的发展历史中仍具有不可动摇的关键性地位。

现代中国，在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几代伟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下，克服内忧外患，终于建立了一个独立和正在蓬勃发展的新中国。但是，21世纪初的中国，国家未得统一，主权未能完整，周边个别国家不断在其它别有用心的国家的暗中支持和指使下，伺机侵占或侵犯边界领土和领海，甚至领空。21世纪初的中国，国际政治地位还不高、经济和军事力量微弱、科技水平较低、文化欠开发。在此基础上，外国金融资本，依其雄厚实力，不断侵扰国内市场，冲击民族经济；周边军事压力不断加大，主权仍不断受到侵犯。总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各方面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能否担当起"东方世界"复兴大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自身的适应性修炼和明智的内外政策。为此，21世纪的中国，应当更加自律自强。

中国的未来，面临着诸多现实的困难和种种弊端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尽管如此，中国应把自身发展放在世界未来的战略高度，确立中国在未来东方世界中的核心地位和相应的责任。有个曾在香港当过总督，名叫葛亮洪（Geant Hlam）的英国人说过：19世纪是海洋的，那是属于英国人的；20世纪是科学的，那是属于美国人的；21世纪是人文的，那是属于中国人的。国内很多人也相信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同时也有21世纪是什么"亚洲世纪"和"太评洋世纪"的观点。事实上，这些提法其根本点是不确切的。准确地说，我们只是希望21世纪是以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方文化为基础而逐步崛起的"东方世纪"。

所谓一种文明的产生，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其基础文化。日本学者汤浅光朝认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在过去400年中，从意大利（文艺复兴作为促进因素）开始，经英国（工业革命）、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德国（科学与经济的结合），到美国（科学家流入）实现了5次大的转移。但是，他仅注意到了西方国家之间的强弱起伏，而没有从世界文化的基点出发，来审视世界文明（包括科学文明）的转移。

表7-4 东方国家基本情况

国 家 陆地面积

[万平方公里] 人口

[万人] 与中国边界

（公里）

1、中国 960 129533 -

2、蒙古 156.65 228 陆4670

3、朝鲜 12.3 2230 陆1334

4、韩国 9.9 4470 海?

5、锡金 0.71 40 陆?

6、不丹 4.6 137 陆550

7.尼泊尔 14.72 1610.7 陆?

8、缅甸 67.67 4600 陆2000

9、老挝 23.68 470 陆710

10、越南 32.96 7400 陆2000

11、柬埔寨 18.1 970 间陆[老、越]

12、泰国 51.3 6020 间陆[缅、老]

13、马来西亚 32.97 1950 海?

14、新加坡 0.06 310 海?

15、文莱 0.56 30 海?

16、印度尼西亚 190.46 19390 海?

17、菲律宾 29.9 6650 海?

18、日本 37.78 12530 海?

合 计 1654.32 198568.7

事实上，人类文明的发展最初有三大相对独立的发展中心地区：大陆（中国）文明中心地区、次大陆（南亚印度-西亚阿拉伯）文明中心地区和地中海（埃及-希腊-罗马）文明中心地区。大陆文明是完全自给自足的，所以，中国文化始终没有征战其它地域和海洋的动机。同时，这种完全自给自足的独特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种没有被外力所中断过的文明。次大陆也是自给自足的，但受到地域环境的影响（处于中国大陆文明区域与地中海文明区域之间，并且西亚文明与环地中海文明地域很近），在世界历史上，没有更大的作为。地中海文明是可与中国古文明媲美的埃及文明向北发展的结果，在西历13世纪前，这个文明在未得到中国文明的催生时，它一直在地中海"地盆"中戏水打转转。但它标定了这个文明的海洋性质。

在西历1世纪以前，从远古的埃及文明，经希腊、罗马时代的发展，奠定了西方地中海文明的区域中心。这个过程，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西方历史从埃及的"少年时代"，经希腊的"青年时代"、罗马的"壮年时代"，到日尔曼人的"老年时代"，完成了一个循环的发展过程。这个时期是世界各大文明的独立发展时期。此后，西方从西历前3世纪的罗马帝国、到西历6世纪中叶的查士丁尼帝国、到11世纪初的拜占廷帝国，它们均维持在环地中海周边地区。在长期的"打转转"式的发展中，这个文明由于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动力，其活动范围仅限于地中海周边地区。拜占廷帝国到13世纪初开始崩溃，到15世纪中叶彻底灭亡。西方历史又完成了另一个历史循环。这个时期正是中国文明在世界上光芒四射的时期。但是，在这个循环的末期，地中海作为西方文明中心的地位开始受到怀疑，处于欧洲腹地的日尔曼民族成长起来了，他们纷纷南下，占据和继承了地中海文明，进而占领整个欧洲，并开始吸收来自东方的先进文明，积蓄力量。

混乱和分化，往往产生力量的重新组合。从13世纪末开始，西方国家（即日尔曼国家）在广泛吸收中国文明以后，开始了它独特的第三阶段的发展道路。西方在第三阶段的历史发展道路是由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两股力量所决定的。一方面，俄罗斯向东向南，霸有欧亚大陆的北部、中部、东部广大地区，成为世界的一个巨大力量存在，一直持续到21世纪；另一方面，西欧国家（葡、比、荷、法、英、德等）向西向南，控制了欧洲、非洲全境，兼并了美洲，侵蚀了亚洲。在18世纪下半叶，还产生了具有世界影响的美国。西方海盗式的掠夺和强大一直持续到21世纪。中国则在这个时期，从强盛走向了衰弱。

总之，中国文明从西历前3世纪前后（秦帝国）直到西历13世纪期间就一直是世界的文明中心，并且把科技先进一直保持到13世纪末，把强大一直保持到18世纪末。当中国从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元帝国时候起，逐步把中国的科技文化经次大陆（北抵大秦的内陆丝绸之路；南达巴格达的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地中海文明圈后，中国文明给这个找不着东西南北的、死气沉沉的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一个英国学者很有见识地说，是中国人给西方人提供了起死回生的动力。在20世纪末回眸千年沧桑时，一贯傲气十足的美国《华尔街日报》也不得不承认，处于西历第二个千年之首的中国宋朝（指北宋960-1127）仍然是这个世界的"千年前的领头国"。

西历13世纪以后，中国文明的发展速度已经开始不及最初以地中海文明为中心并扩展开来的西方文明了，到18世纪末就彻底落后了。如果说，13-18世纪，以中国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还处于强势和优势地位，那么18世纪后，东方文明则反过来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由于两种文明的文化基础有本质不同，所以，这种冲击演变成了巨大的战争冲突。当然，这种结果，自然是具有海盗精神的西方强加给东方的。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说，在中国秦朝以前，次大陆文明还是独立发展的话，那么从西历前3世纪开始它们则一直受到中国文明的巨大影响。从13世纪至今，它则在东、西方两种文明冲突中艰难地生存和发展着，努力地跟上世界发展的脚步。

在今天西方文明仍处于强势地位的时候，我们不能否认西方国家仍将是"新千年的领头国"，以中国文明为基础的东方文明，能否在21

世纪重新崛起影响并主导世界发展，最主要的还是要看华夏诸民族（包括所有中国民族即所有中国人）的造化。

按照协同学原理，在一段时间内，一个序参数占主导地位，支配另外其它的序参数，规定它们的运动。但是，用不了多久，这个序参数就会失去其主导地位，从而被另一个序参数取而代之，并按照这个过程重演。然而，这个主导地位的改变是完全无规律的，并且是混沌的（1）。我们能否从混沌中，逮到能够通过培育取得主导地位的序参数？这需要我们的聪明才智。

按照法律意义上讲，中国人是指具有中国国籍（含港澳台）的华夏民族。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人还包括广泛分布于东方诸国如蒙古、朝鲜、韩国、越南等以及世界其它国家之中的华裔。这个"龙"的民族，有6500年文明史，有崇高的道德传统，有独特的汉字文化，有深厚的思想体系，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6500年的历史变迁中，这个民族为世界创造并贡献了伟大的文明，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民族。

在历史上，外蒙古在1946年独立以前，是中国的一部分；朝鲜、韩国和越南与中国版图分分合合；中南半岛地区，包括缅甸、老挝和泰国等，1883年在法国的武力逼迫下，中国才被迫放弃该地区的宗主权；不丹和锡金是从中国独立出去的藏裔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大部或部分在历史上长期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文莱、菲律宾同样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重要地区。中国周边地区也是中国人或华侨的聚居地。因此，该地区以独特的中国文化为基石，树立了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东方文化，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东方世界。

从18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200多年的时间里，西方国家凭借其先进的工业和技术优势，在殖民世界和侵略东方的同时，创造了给他们带来富裕和荣耀的"西方世纪"。东方，则因后清政府对中国的破坏性统治以及西方列强的血腥掠夺，中国以及整个东方都伦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曾经强大过，但他没有给东方带来福音，而是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就没有带来能与西方相比的东方世纪的繁荣与富强。二战以后，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再一次强大起来，可亚洲人民看到的是军国主义的复活和日本政府不断干涉别国内政的扩张主义政策。由于日本一贯背向亚洲人民的表现，被东西方世界广泛称

为地处亚洲东部的西方国家。因此，东方世纪的未来，寄希望于日本显然是过于奢望了。"老虎"国家虽然在经济上已有所作为，但毕竟受种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地缘政治的局限，无法成为支撑整个东方世界的强大力量。故此，只有中国的强盛，才是东方世界的福音，才能给东方世纪的再度崛起，提供坚强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的核心力量。

我们提出并希望建立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东方世界，就是希望在东亚及东南亚创建一个以和平文化为基础的富裕生活环境，而不是西方军事压力下的现代奴役生活环境。历史一再表明，中国是一个和平国家，一贯主张"以和为贵"，万事强调一个和谐。中国不是一个扩张性的侵略国家，是一支维护和平的中坚力量，不是一个世界霸权主义者，更不是以军事威胁与打击为基础的恐怖政治国家。即使在一贯敌视或蔑视中国的日本也有人认识到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渡边秀方就明确指出：

世界各民族中大概再没有像汉人那样渴望和平的了。他们的四千年的历史是渴望和平的历史。他们很少对别的民族进行侵略。他们的战争，目的是保护自己的文明。他们的革命，是饱尝国家苦难后的革命。其战争常是防御性的。他们的历史是对塞外诸民族侵略进行防卫的历史。

汉人有先天发达的利害观念。所以对不为害的异民族，总是用自己的文化渐渐同化他、利用他。

中国的"武"这个字，是由"止戈"两字构成的会意文字，《易》上说"神武不杀"，是说真正的武力是不杀人的。换言之，妄用武器杀人不叫武。

同化力和包容性，就是中国人的最崇高的特性。试与欧美人印度人比较比较看，口头平等，以自由做招牌的耶酥教国民，劫掠，惨杀，视人如牛马，残酷地奴役被征服地的人民，两者绝非同日而语的。他们的嘴历来叫得是最好听不过的。但看以自由平等正义人道做招牌的美国，他们是如何阴险而不平等啊！（2）

中国文化中的和平特性是悠远流长和根深蒂固的。18年世纪以前，中国强大的时候，始终没有侵略其它国家；18-20世纪，在中国衰弱的时候，反而遭受了西方世界强国的屡屡侵略；20世纪慢慢从外国

侵略者屠刀下站起来并取得独立的中国，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反霸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并未成为派兵侵略或者颠覆其它国家的破坏力量。

相反，只有中国联结苏联，敢于在20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支持世界各地殖民地革命，使亚非许多国家在二战后，摆脱西方殖民帝国的统治，纷纷取得独立（亚洲和非洲在1944年至1970年间，共有的63个国家在原殖民地国家赢得独立）；只有中国团结法国，敢于反对已掌握核武器就立即禁止其它国家进行核试验的美、英、苏三国，发展了自己的防御性的武器装备，迎来了核平衡，粉碎了西方大国的核讹诈；只有中国，敢于同以操纵联合国的美国为首的侵朝联军挑战，并迫使其走到和平的谈判桌前，使人类再一次迎来了和平；在所有大国中，只有中国，没有对其它国家进行过血腥侵略，犯下滔滔血债。相反，凡是世界人类的正义事业，中国都给予支持，凡是有悖常理的、自私的侵略行径，中国都给予充分的揭露和批判。因此，中国是亚洲乃至世界永远值得信赖的强有力的和平力量。

现在，中国正逐步成为影响东方乃至世界发展的重要国家，是世界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重要力量之一。亚洲应依靠这支力量，抵制干涉和阻挠，创造一个繁荣富强的东方世纪。世界应依靠这支力量，反对强权和霸权，建立一个和平美好的富裕世界。

在亚洲，中国由于地理位置、人口、文化等多方面的关系，必然成为这个世界的脊梁。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早就警告过：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发达的技术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营垒之中，这个时候人类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如果中国不能取代西方而成为人类未来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谁将取代西方的主导地位》）。同时，他在和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时更是明确地指出：

按照我的设想，全人类发展到形成为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世界实现统一之日。在原子能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靠武力征服--过去把地球上的广大部分统一起来的传统方法--已经难以做到。同时，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

这个东亚国家不可能是日本，更不可能是韩国、朝鲜、外蒙古以及那个至今占据我国18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俄罗斯，这个国家只能是中国。汤因比在比较西方和中国的不同以后，对中国文明寄予极大的希望。他说：

超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与中国就代表着对照鲜明的两极。超工业化的西方生活方式和中国的生活方式都潜藏着自我毁灭的因素。西方方式是爆炸型的，中国的方式是僵化型的。但是，这两种方式也都提供了让人民安居乐业所必不可少的东西。爆炸型的西方方式是充满活力的，僵化型的中国方式是稳定的。根据历史上类似的发展情况来看，西方目前的优势很有可能被一种混合而统一的文化所代替，那么西方的活力就很有可能与中国的稳定恰当地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不仅使人类得以继续生存，而且还能保证人类的幸福安宁。（3）

可以推断，人类的政治和精神统一将不会通过西方力量来完成，但是，很显然，世界将来会通过某种力量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因为西方技术已经制造出核武器，并且造成不可替代性资源的消耗、人类自然环境的污染以及人口爆炸，所以这是人类避免自我毁灭的惟一选择。

西方的活力使得非西方的大多数人不可能继续不变地维持前工业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如果西方的爆炸性不受某种坚决的遏制，现代西方生活方式也不可能维持下去，……如果要使被西方所搅乱的人类生活重新稳定下来，如果要使西方的活力变得柔和一些，成为人类生活中依然活跃但不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我们就必须在西方以外寻找这种新运动的发起者。如果将来在中国产生这些发起者，并不出乎意料之外。（4）

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向世界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

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世界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5）

历史学家钱穆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曾说：

未来世界人类前途究该永远分裂抑宜融和相通？如果答案肯定在，则未来的大同世界，应非采用中国理想走上中国人的历史道路不可。正因世界上惟有中国人无地域偏见，无民族偏见，而能高揭一文化大理想来融通各地域，调和各人群。

的确，恰如《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唯天下至诚，为能经伦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虽然，我们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和统一世界的力量，但是，让中华文明，借助先进的手段发扬光大，反对一切不利于亚洲乃至世界团结、和平和发展的破坏力量，这应该成为中国的未来亚洲乃至世界的国际战略政策的基础。因为似乎只有这样，我们的东亚及东南亚才会迎来一个富强和文明的东方世纪。

---

（1）赫.哈肯，凌复华译，《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上海译文出版社等，2001年第一版，第109页。

（2）转引自《三只眼睛看中国》，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

（3）汤因比，刘北成等译，《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394页。

（4）汤因比，刘北成等译，《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393-395页。

（5）转引自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

**********

# 第八章 改革开放的现实与未来

改革开放，改革就是改变自己陈旧的东西，继承好的东西，即去其糟粕，用其精华；开放，就是学习别国先进的东西，阻止坏的东西，即洋为中用，洋有不用。之所以要改革，是因为我们积累了不少陈旧的东西；之所以要开放，是因为我们缺少了不少先进的东西。对于改革开放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同样不能抛开历史。鲁迅先生曾说，历史上写着民族的灵魂，指示着未来的命运；我们的历史，是连接现在和未来最有力的线索。

## 第一节　　改革史鉴：始皇改革九方面

西历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其强大的中央力量果断地推行了全方位改革，为中华文明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史发展到20世纪末，当我们再次进行全方位改革时，我们发现相隔2200年的两次改革，在中央和地方政治体制、民族统一、法制建设、军事统一、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诸方面在改革内容上均具有相似性（表8-1）。

表8-1 相隔2200年的两次改革比较

改革内容 秦始皇的改革 21世纪初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

1.政治体制 建世袭集权政治 拟建现代政党民主政治

2.地方行政体制 郡县制 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地方行政体制

3.多民族统一 完全的多民族统一 民族区域自治下的多民族统一

4.法律制度 皇权下的法律统一 拟建立现代法治国家

5.军事制度 国家军事完全统一 国家分裂，台湾拥军自立

6.民族文字 文字实现统一 汉语文字有简、繁之别，大陆、港澳台文字及少数民族文字不统一

7.本位币 货币实现统一 中国有人民币、港币、澳币、台币分行

8.度量衡 度量衡实现统一 逐步与国际接轨

9.基础交通网 建立交通网 拟建立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空中、海河运输网

[1]筑直道 [1]直道相当于现代高速公路，21世纪初已大大超过1万公里

[2]修弛道 [2]弛道相当于现代国道，21世纪初干线公路网初具规模

[3]通栈道 [3]栈道相当于现代乡村公路，正延伸到各个乡村

在表8-1所列改革内容中，除第8项"度量衡"我们差不多与国际接轨，第9项"基础交通网"我们已取得一定水平外，其它七个方面的改革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定难度。

一、政治体制

秦始皇帝国建立后，迅即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中央专制政治体系。现代中国，则是要抛弃中央集权，建立现代政党民主政治体制，但道路将漫漫而艰巨。我们目前仍然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权威政治，要走向民主政治还有一段路程。这段路程就是完成全体民众物质生活的稳定保障、文化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国家统一以及法治体系的完成。我们应当承认，西方民主政治和现代西方技术文明一样，是西方对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之一。虽然西方民主制度不是一个绝对标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现在实现民主政治的条件不具备就加以拒绝，而应当在历史文化基础上，创造条件走向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

二、地方行政机构

秦始皇在地方成功实现了统一的郡县制度。而我们今天基本是沿袭前代的行省制度，但同时又存在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等四种不同的地方行政机构，很不统一。未来能否统一呢?

三、多民族的统一

我们知道，中国地方地域的奇形怪状、存在多种地方行政体制以及地方地域面积的巨大差异的形成，主要有两大因素：历史和民族，或者还有第三因素：地理。事实上，自治区、特别行政区，体现了不同的地方政策，从国家角度理解，就是政令不能统一。这不但加强了民族割据思想，也增加了自治区、特别行政区与省市行政区的差别。这绝对不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我们主张民族大团结，而不是民族区域之间的长期分治。在我国历史上，民族聚居、割据、独立建区，往往造成当国家对其疏于管理时或者内部出现混乱时，就闹独立和分裂。越南分裂于五代十国时期、朝鲜最近分裂出去是在南宋分裂时期、外蒙古逐步分裂于20世纪40年代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但没人认真吸取。

四、法令统一

一个国家的统一，其直接表现就是法令的完整和统一。所以，秦始皇立国一开始就要求实现法令的统一。但是，20世纪末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和"一国两制"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法治体系，尽管两者为解决特殊问题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同时，这个问题给建立一个完整的法治国家的任务又提出了严重挑战。

五、军事统一

秦始皇完成国家统一后，尽收天下兵器，实现全国军事统一。这一点在实现国家统一问题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21世纪的中国，国家分裂，自然也就形成了军事的分治。

六、文字统一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即简化字形，行秦小篆，实现"书同文字"。可是今天，中国的汉字和汉语却出现了异常的分化现象。语言除了标准国语（即北京话，称普通话）外，粤语（广东话）、闽语（福建话）、上海话、四川话等诸"话"纷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简化了汉字和建立了标准的汉语拼音方案，这对实现汉语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港澳台及其它汉语国家和地区并行的繁体字和大量的自造字，使大陆与繁体字地区不但产生了诸多交流的不便，还产生了大量的异体汉字，使汉字数量突飞猛进。中国汉字从商代时期的4500余个甲骨文字开始，经3000多年的演化，到21世纪初，最新的

汉字库，已收集到出现过的汉字达到9万多个（见表8-2）。西方文字26个字母以及一些简单的符号，已经固化在计算机系统之内，总数不超过256个，而我们的汉字却在不断地膨胀和分化。可笑的是，我们经常在INTERNET网上看到诸如"中国总理朱[金容]基"（镕）、"宇文╳[上斌下贝]"（赟）、"李存╳、钱╳[两个╳无法打出]"（勗、镠）、"宋的年号景祐[祐的古实为右，无法打出]"（祐）等等，难道汉字真的遇到困难了吗?

与此同时，中国还存在若干少数民族文字和语言。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文件除了汉语本外，还要按照藏、回、维、蒙、满、朝鲜等民族文字印刷，其形式俨然像开一次"国际"会议。各民族保留和拥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和语言，这对丰富中国文化有一定帮助，但是，我们面临的是字母文化无孔不入的影响：据统计，联合国原始文件的80%为英文，15%为法文，4%为西班牙文，俄文、阿拉伯文和中文合起来仅为1%；在世界信息网络上，英文占90%，法文占5%，中文只占1%。(1) 在"全球化"日益普及的今天，如果我们在国际上不能建立起标准的世界通用的汉字体系（指全面完整的、繁简和宋、黑、楷、行、篆、魏、隶七体并存的、供所有软件商及用户外挂或者内置的、只能由国家指定部门改版解释的汉字体系），在国内不能建立国语（汉语）第一的教育思想，何谓统一？何以迎接全球化的挑战?

表8-2 中国汉字发展史

时代 汉字 汉字个数

商朝 甲骨文字 4500

西汉 杨雄《仓颉训纂编》 5340

东汉 许慎《说文解字》 9353

魏 李登《声类》 11520

魏 张辑《广雅》 18151

南朝梁代 顾野王《玉篇》 16917

宋 陈彭年等《广韵》 26194

宋 张麟文《韵海镜源》 26911

宋 司马光等《类篇》 31319

明 梅膺祚《字汇》 33179

明 张自烈《正字通》 33440

清朝 张玉书等《康熙字典》 48990

1986-1990 徐中舒等《汉语大字典》 54700

1994 《中华字海》 86699

七、货币统一

货币是一个国家经济形象和实力的直观物征，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生存状态。秦始皇深知此理而统一全国货币。20世纪末的中国，香港、澳门已经回归祖国，21世纪台湾终将统一。按照"一国两制"的思想，在中国将出现四种货币：人民币、港币、澳币和台币。自"太公为周立九府圆法：黄金方寸，而重千金；钱圆函方，轻重以铢"(2) 以来，中华币制可谓历史悠久。然而，在当今世界货币重于万物之时，我中华却列币四种；当美元、欧元和日元正在为保持和争取成为国际主要货币地位而奋力拼搏之时，当日元和美元为争夺亚洲主导地位而展开竞争，日本积极调整日元货币政策，研究改变日圆货币单位之时，我中华国迎来的却是一个分散的各自为政的货币体系。岂不忧哉？！

如果一国的经济实力被分散的体制所分割，终将形不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也许在20世纪末，多种货币的选择是现实的，也是符合多方面利益的。但是，一国多货币在世界上是没有的，中国历史上有过，但那是在分裂时期。很明显，长期多币共存的结果，就会导致国家资本的分散，经济力量的分散，只会给美元及其它货币更多侵入的机会。

---

(1)陈荣滨，“汉字的春天”，《汉字文化》，2001年第4期。

(2)《汉书.食货志》。

**********

## 第二节　改革基础：民族分布与地方地理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国自身历史的发展结果所决定的。但是，今天，凡是从中国钺钟历史地理结构中分立出去的"国家"和地区，都与中国内地民族具有割不断的民族牵连关系。如朝鲜族与朝鲜（包括韩国）、俄罗斯族与俄罗斯（主要指其侵占的我东北领土）、蒙古族与外蒙古、哈萨克族与哈萨克斯坦、藏族与不丹和锡金、云南广西少数民族与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等国。单一种族的统一和多民族的合众，将是中国未来更加艰巨的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长期的少数民族全方位深度自治，可能影响统一的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长期的民族内外分离，势必影响稳定的中国钺钟历史地理结构的完整。

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每天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不是说，今后中国发达了，就不要民族意识了。恰恰相反，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更应该强调中国各民族的共同开发、共同发展和共同致富，而不是强调民族内部全方位深度自治。全世界不同颜色的种族都在"全球化"、"一体化"，我们同一种族却在为了不同的民族称谓而大搞民族自治。事实上，只有整个种族和全体民族发达富裕了，国家强盛了，才不怕外族的侵入。要参与国际一体化，至少国内应当首先实现一体化。

在中国内地，多数民族自治地区，各方面多不发达，一地县如此，一省区亦然。国内凡一自治区、自治州或自治县，多是相对欠发达地区，因而也就坚守民族自治，甚至有的以汉族为主的穷州穷县也"沾亲带故"地走向民族自治。与此相反，在中国沿海，较发达的部分地区也标有其特别记号：先期开发并发展起来的沿海城市叫经济特区，港澳地区演变成为"╳人治╳、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萧一山先生曾说，"清制：官吏回避本籍，颇有全国统一的精神，民国以后反被破坏无余。但某人治某之说，又不是真正的人民自治，这对于中国前进的社会，阻碍殊大，真是'匪夷所思'了。"（1） 如果所有少数民族均实行自治，那么其结果就是汉族的自治。显然，这是值得研究的政策。我们以为，少数民族自治政策，在建国初期，比起"民族自决"来，要进步得多。但时代不同了，在中历第66世纪，中华各民族完全平等和统一才是对付全球化最恰当的政策。

在中国内地，为什么有那么多地区要坚持民族自治的道路呢？因为国家对民族自治地区有优惠政策，最直接的是国家补贴（或者叫岁币补贴）。

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认为，"岁币"政策实际是一种"骄夷狄之始祸"（王夫之所说的夷狄是指对那时分裂出去处于中国边缘的少数民族政权）的败国政策。他说：

中国输岁币于夷，自宇文适始。突厥挟两端以与宇文、高氏市，宇文畏其为高氏用也，岁给缯絮锦彩十万以縻之，高氏亦畏其为宇文氏用而厚赂焉。夫宇文与高于突厥，何中外高卑之有哉？弱役于强，屈者其常也，而突厥固曰：宇文、高氏，中国之君也，中国之奉我，常也。此骄夷狄之始祸也。宇文、高氏朘 削中国以奉于其类，非其土，非其民，无不可也。而后世驽窳之君臣，且曰：宇文、高氏，中国之君也，不惜悉索之于民以奉突厥而国以安，吾亦奚不可邪？ 此启惰君陋臣之祸始也。（2）

可以说，"岁币"政策是中国几千年的陈规陋习；这个陋习，已成为中国政权不稳定、不断出现边患和反复出现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遗憾的是，这个陈规陋习，至今仍然变相地存在。在边疆地区，特别是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政策的一种反映。

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唇齿相依的、同源同脉的国家（如朝鲜、越南等），在不能取得统一，屡遭侵略的时候，中国屡屡出兵相救（实际上是不得不出兵）。结果是，边国遭祸，中国也跟着遭害。于是，鼓励中国的分裂分子和与朝鲜半岛、中南半岛等中国周边国家建立亲密关系，便成为外国影响和抑制中国发展的一个政策。事实上，这些地区从地缘政治和经济生活等各方面考虑，根本不可能自治或者独立为国，强而为之，或者自遭涂炭或者累及内地。这是中国历史一再出现的事实和规律。

在中国内地边疆民族落后地区（多数是自治地区），长期依靠中央政府补贴，以维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然而补贴不能解决一切，所以，少数民族地区一些人仍然有不满情绪。比如西藏，1951年和平解放，1959年废除农奴制度。解放以来，西藏几乎年年需要国家补贴。中央为了取悦西藏佛教徒，"文革"以后，先后修复了1400多座寺庙，1989-1994年间投入5500万元巨款和大量黄金、白银等贵重物资维修布达拉宫。（3） 尽管如此，一些西藏分裂主义分子仍然存在。比如香港，回归前，在内地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向香港供应新鲜蔬菜、鸡蛋、猪肉等，可那时的一些香港人耻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改革开放后，在主要源自大陆货物的转口贸易中大赚内地人民便宜的香港，仍然有人瞧不起内地；香港回归后，中央在香港不取一文，却要承担该地区在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开支。再如台湾，在20世纪中美斗争中取得主权独立（美军撤出台湾），在大陆贸易中得到优先保护从而取得了丰厚的利润回报，但台湾当局仍然挟两端而闹独立，拒不承认"一个中国"政策。所有这些都是古代"岁币"政策的延续，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而已。然而结果还是一样，国家政局不稳。所以，未来中国的统一以及稳定的国内政治，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民族政策的认真变革以及内地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如果内地经济改革出现波折，经济文化水平跟不上港澳台，就会如台湾有的人所说的，大陆和他们不在一个级别上，统一和融合是困难的；同时，经济落后（这也与中央政策的长期不平衡发展政策有关）、长期依靠中央补贴的边缘省区特别是自治地区就会出问题。

我们在总结前苏联崩溃瓦解的原因时，有多种多样，但是，认识到苏联各共和国的自治特性影响其国家结构的人恐怕并不多。美国学

者唐.普查拉对苏联自治结构特性的认识，可以供我们引以为鉴（转引自布热津斯基《大棋局》）：

帝国在政治上生来就是不稳定的，因为下属单位几乎总是喜欢有更大程度的自治。而且这些单位的那些反对派精英几乎总是抓住机会采取行动以取得更大程度的自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不会被攻克，而只会分崩离析。这种分崩离析通常是非常缓慢的，但有时也会非常迅速。

郭飞熊先生在一篇名曰"中国国家安全正面临一场思想风暴"的网文中写道：

苏联解体的核心原因，在于把完整的地理空间，分割为一个个民族国家的版图，长期的国界意识，暗示和培养了民族主权和半独立的情绪。

地理的依存被打破，领土的完整必然被动摇。

过去，人们比较重视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其实，地理--军事和经济意义上的地理--依存关系，要更为重要。它其实就是国内地缘政治。

可见，分民族的地方自治，特别是高度自治政策对国家的稳定存在多么可怕的危险。鉴于苏联提供的建立在民族自治（自决）理论基础上的国家结构分崩离析的例证，郭飞熊先生呼吁：

一个民族，尤其是多民族国家内的非主体民族，最主要的是赢得完全的人权和完全的民族平等权以及适度的加权，而不是赢得民族自决、独立和分离权。

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乃是多民族利益妥协和意志妥协的产物。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某一个民族实施自决，乃是以牺牲其它民族包括主体民族的正当权利为代价，本质上是利己主义。而地区龟裂和国家龟裂，本质上是利己主义大规模的泛滥成灾。

中国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应建立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普世文明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在人权和主权同构的基础上。

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一幅"某某自治区如何如何"的标语，有两人路过，甲问："自治区？自治区究竟是什么意思？"乙答："自治区就是像那些小国家的地方。"但愿，这是个别无知者的错误认识。

与民族政策问题同样突出的是地方地理结构即行政区划问题。

中国最早自黄帝"画野分州"，经《山经》"五州"和《禹贡》"九州"，至今天的30余行省，中国行政区划史和中国国家文明史具有相同的悠久历史。但是，中国的行政区划始终不能有一个科学的结构形式。从州制与郡县制的反复，经道府路制的兴衰，到行省制的确立，地方地理的历史变化万千。即使是今天，行省制下的地方也没有统一的结构，省、市、区（1954-1958年先后将其中五个本属省制的地区改为民族自治区，1997年和1999年香港、澳门回归而有两个特别行政区）政制结构成为一个突出的特点，并且，各地方地域大的特大、小的特小，甚至有的奇形怪状，很不规则。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和民族问题的直观反映。新疆160万平方公里、西藏120万平方公里、青海72万平方公里，三省区占全国陆地面积约37%，人口只有2500万人，不足全国人口的2%。翻开中国地图，我们就可发现，东北和西南均有一个长脖子"恐龙"：黑龙江省和云南省地域图，东北－西南走向有斜长的内蒙古自治区，西北－东南走向有扁担式的甘肃省，还有地域狭小的宁夏自治区面积只有6.6万平方公里，其面积只有重庆市（三角架形状）的80%。澳门仅有17.42平方公里，是真正的"弹丸"之地。这些奇形怪状的省市区地域的形成，都有各自的历史渊源。但是，窃以为，在地域形成过程中，民族和政治意义大于科学和经济意义，这显然是不利于国家对地方以及地方行政的科学管理的。我们很难想象，东西跨度达40经度的内蒙古自治区，其坐镇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的地方政府官员，是怎样管理其斜长的地域的?!

中国的政区划分，明显地突出了民族利益，在行政、经济管理上有极大的不便，无情地损害了国家利益。现在，很多地方把本民族的利益喊得很响，而对中华民族却难于上口了。这不但在政治领域有所反映，在经济领域的地方保护主义反应更为明显。长此以往，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地方民族主义不是没有可能。我想，这也是中国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的原因之一。

美国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国家地理版图大、且具有各种地理特征的移民国家，他们的阿拉斯加洲和夏威夷洲，还离其本土那么远，可他们为什么没有民族自治，为什么没有闹民族分裂呢？这种区别是意味深长的。

这里面，美国在国家社会管理中，有很多成功经验。我想其中美国对地方地理结构的划分就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美国在西历1783年前，只有密西西比河以东的13个洲，从19世纪开始美国通过征服、屠杀、强买等手段，大块大块地向西扩展，最终形成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详见图8-1）。美国为了国家管理的需要，将本土除首都华盛顿所在地称为一个特区即哥伦比亚特区外，其余各大块在照顾地理特征基础上，实行均化处理，即将新到手的路易斯安那、俄勒冈、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东西佛罗里达细分为36个州，加上远离本土的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二州，全国分为５１个州。我们从其本土的州界图可以看出，其每个州的面积相差不大（除与本土遥远的夏威夷和阿拉斯加两州外），形状多为接近正方形或者圆形。这样的结果是，地方政府便于集中管理和控制。对比之下，中国的行政区划图就让人感到是一幅民族区划图，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合理政区图。

图8-1 美国的扩张和版块构成（4）

我常常久久凝视国家正式出版的政区图和国家地形图，每每为我们把民族区划图作为行政区划图用而感到不畅。为此，思得一省区"均圆化"方案，现贡献于此，仅供参考。

中国省市行政区划"均圆化"建议方案

1.新疆：宜以新疆汗腾格里峰--哈尔克山中、东段--开都河--博斯腾湖--库鲁克塔格--罗布泊北沿--现甘肃疏勒河下游一线为界，分为南北二省。

北部准葛尔省（简称"准"）：治乌鲁木齐。其地域约合清初新疆北部，即漠西厄鲁特部。

南部塔里木省（简称"塔"）：治喀什。其地域约合清初新疆南部：即回部。

2.西藏：宜以东经90度线为界（约合清初前后藏分界线89度线），分为东西二省。

东藏省（简称"雅"）：治拉萨。东藏省或称前藏省与青海省宜以金沙江--通天河--楚玛尔河--多尔改错--西金乌兰湖一线为界。

西藏省（简称"喜"）：治萨嘎。西藏省或称后藏省。

3.甘肃：宜以武威市以南、大约北纬38度线为界分为南北二省。

甘北省（简称"肃"）：治嘉峪关。

甘南省（简称"甘"）：治兰州。甘南省东部平凉--西峰地区并入陕西省；宁夏省中卫--宣和堡--中宁--惠安堡一线以南并入甘南省；甘南省西南玛曲及其以南黄河地区并入四川省；陕西省勉县及其以西地区并入甘南省。

4.内蒙：宜以东经115度线为界，分为东、南二省。

东部海拉尔省（简称"海"）：治海拉尔。黑龙江省北纬51度线以北地区并入海拉尔省；现内蒙赤峰--通辽一带地区并入辽宁省。

南部漠南省（简称"漠"）：治呼和浩特。漠南省东经102度线以西地区并入甘北省；漠南省东经102度线以东、北纬40o线至黄河一线以南及河套地区、陕西省榆林地区并入宁夏省。

5.河北：京津之间的河北省三河地区和天津市蓟县地区并入北京市。

6.河南：范县及其以东地区并入山东省。

7.安徽：江苏省徐州地区、河南省商丘及其以东地区并入安徽省，安徽省天长地区并入江苏省。

8.湖北：河南省淮河以南地区并入湖北省；湖北省丹江口--汉水上游一线以北地区并入陕西省；湖北省五峰--鱼峡口--绿葱坡一线以西地区并入三峡省（简称"峡"。因重庆市地域较大，故宜建三峡省，治重庆）。

9.广东：江西省信丰--古陂--安运一线以南地区、广西省梧州--贺州地区和湖南省临武--蓝山--江华地区并入广东省；广东省茂名--高州--信宣一线（合东经111度线）以西地区（包括雷州半岛）并入广西省；澳门宜与西江出海口东西半岛（包括珠海、斗门等）及邻近海岛合并，成立新的珠澳市（简称"澳"）。澳门地域实在太小，其狭窄空

间弊端多多，宜把她建设成为地位与香港市（简称"港"）相称的、又有独特发展特点的珠江口西岸大都市。

10.广西：广西省北部兴安、灌阳、绍水和资源地区并入湖南省；广西省与云南省以东经105度线为界。

11.贵州：云南省镇雄和威信地区、四川省宜宾--泸州长江一线以南地区并入贵州省；贵州省道真、沿河地区并入三峡省；湖南省新晃地区并入贵州省。

12.四川：四川省与云南省边界，攀枝花地区以西，宜以金沙江为界；攀枝花地区以东云南会泽以北的昭通地区（不含镇雄、威信地区）并入四川省。四川省嘉陵江一线以东地区并入三峡省；青海省东南黄河以南地区并入四川省。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方案（以上所讲到的是大块地域的变动，一些小地方的变化详见附图8-2）主要考虑了国家经济地理、地方政府行政、陆地交通、地缘发展和各省传统地域等主要因素。目的是促进全国各省市的平衡发展，均圆化省市版图，以利于中央和地方行政。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建议方案，除了这个目的外，无任何其它意义。

有关中国省市地方行政机构的变革，并非是我的首议。早在1989年12月，在国家民政部召开的行政区划学术会议上，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就提出过旨在简化事实上的省--市（地）--县三级行政机构和划小省市辖地范围的分省方案，他主张将全国重新划分为50个左右的省（自治区也应改变为省制），每省管辖四五十个县，并撤销市（地）和计划单列市。这确实是改变中国目前部分地方地辖范围过大、多级行政困难的一种重要措施。

图8-2 中国政区均圆化建议方案

所谓行政区划，主要应该便于"行政"，突出"政"字。所以，政治因素应该是第一位的，比起其它如经济、民族、历史、自然、军事等原则来，政治原则应该是重中之重。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曾提出

一个旨在优化地域行政管理的"中心地学说"。他认为，最便于行政管理的中心地体系应当是由各基层单位距上级行政单位中心距离相等及各基层单位的面积又相等的一级级行政区组成。这样，各级行政区都由位于等边六边形中心点的行政管理中心，基层行政中心接近六边形的各角，最小行政管理单位为7的基层单位组成。其层次自上而下以7的倍数递增，如只有一级，则其基层单位为7，如为两级，则其基层单位为49，以此往下类推。（5） 这个理论和管理学中的组织结构理论具有相同点。我曾提出，一个标准的金字塔型组织机构，若每个机构下属人员均为n，层次数为m，系统只有一个最高领导人，那么整个机构的总人数z为：（6）

$$Z = \sum_{i=1}^{m} n_i + 1$$

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学说"和标准组织机构结构同属纯理论性的，但它们对国家级和企业级组织在系统层次和幅度之间构筑了一个参考标准。如果在国家级组织机构体系中应用这个理论模型，并按照克里斯塔勒意见下属机构n=7, 那么，一个国家的组织体系如下表：

表8-3 国家机构的层次和管理幅度

| 层次m | 下属n=7 最低级数量 | 总数z | 国家级机构 |
|---|---|---|---|
| 1 | 7 | 7 | 8 大区 |
| 2 | 7 | 49 | 57 行省 |
| 3 | 7 | 343 | 400 专区 |
| 4 | 7 | 2401 | 2801 县 |
| 5 | 7 | 16807 | 19608 乡或镇 |

表中n在管理学中被称为管理幅度，根据很多管理理论和系统分析技术，n为7应该是保证组织系统最优化的最佳选择（这恐怕是克里斯

塔勒将最小行政管理单位定为7的原因），并且是最大值，即n在7以内变化。所以，上表所列的是一个极限（最大）值。

就中国而言，新中国之初，全国分五六个大区，现在这一级仅是一个虚拟的存在：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和西北。至于行省，我们主张，在适当划小那些特大省区面积（如内蒙、新、藏等）、增大那些又特小市区面积（如重庆、澳门、宁夏等）、统一地方政制（如统一改变为省或市）的同时，均圆化每个省市的辖地范围，便于地方行政。这才是最主要的。就全国目前的版图，限制在40个省市之内是比较合理的（完全统一时，最高不能超过49省）。对于专区，我国现在还保留有这一级机构，虽不是一级政权组织，但属于省区政府的派出机构，据统计全国共计有专区151个（地区113个、地级自治州30个、盟8个），其数量是否合理，应当研究。对于县数，我国目前有2204个（完全统一时，最多不能超过2401个）。至于县辖乡或镇，据统计其数量远比理论数量要多得多，是否属于科学合理的规划，也当认真做专题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国家级组织结构和企业级管理结构在地域上有巨大区别，因此，在国家组织结构体系中的大区和专区都应该成为虚拟的层次，它们应该仅仅是人事级别或者统计上的区别，而不应该成为真实的行政机构，即国家应该形成"中央--行省--县--乡（或镇）"这样的四级行政机构。

---

（1）萧一山，《清代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88页。

（2）《读通鉴论.卷18》。

（3）国务院新闻办，《西藏文化的发展》白皮书，2000年6月，北京。

（4）取自中国地图出版社编，《世界近代现代史地图册》，上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

（5）参阅王恩涌主编，《政治地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中教育星多媒体教育资源库&平台网

（6）徐文，《组织机构系统分析》，《全国青年管理科学与系统科学论文集》，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

## 第三节　　改革理论：经济学理论及其规律

战国政治家管仲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1） 孔子也主张先"富之"而后"教之"。可见，经济问题始终是关系到人民贫穷与富裕，关系到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邓小平改革之初就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大概也源于此。事实证明，这个政策在改革初期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她解放了生产力，给经济体制注入了活力，带动了经济的全面发展。由此而引发了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经济成就也不断取得新的进步。不但富了部分国民，国家整体实力逐步加强，而且还刺激了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复苏和蓬勃发展。但是，很多富者是国家"让"他们富起来的，只有少数是勤劳致富。越往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负面影响也越来越深。加上我们在思想、文化和社会环境方面的努力滞后，使我们创造的成果的累积效益很不理想。我们只要看看我们不断的重复建设、不断地覆挖街道就可知道，我们每年的增长百分比中有很大一块是在毁坏和掩埋上年或前几年成果基础上取得的。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把经济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但由于累积效益不佳等原因，直至今天，我们的经济能力仍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人民平均生活水平还很低，各方面基础建设

还很落后，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由此，经济建设问题又不能不作为当今中国的头等大问题。

回顾改革20余年，改革的成功首先应该是邓小平生产力理论的成功。"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确实是中国改革初期最为重要的事情。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及中国经济体系与国际接轨、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就不能不讨论国家经济政策、经济学理论及其规律问题。

人类在原始的自然经济时代，无所谓经济理论与政策的问题，因为一切都是自给自足。在农业经济时代，人类的主要经济活动仍局限在一国、一邦或一区域范围内，因此单纯的农业经济实践，不能向理论升华。仅仅是"仓廉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2） 而已。

在工商业经济时代，由于工业、农业、商业相互支持和协同发展，加上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经济活动开始跨越国门，原始的国际关系从文化交往向经济贸易发展。经济理论从无到有，从后台走向前台，成为指导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从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在《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中，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开始，政治和经济就被捆在一起了，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同其提出的初衷一样，逐步成为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要指导理论依据。

但是，政治经济学说的基本形成，是从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孟的《贸易论》和《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两部重商主义著作的出版开始的。而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创始人是英国经济学家西蒙.配第，随后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的出版，标志着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

在资本经济时代，"资本"这个特殊而抽象的概念，从政治经济理论中脱颖而出，成为经济理论领域极其重要的概念。由于它的突出地位，世界从此建立了一整套以"资本"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并揭示了一系列经济活动若干重要的规律，成为左右世界各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德国政治经济理论大师马克思的《资本论》发表以来的世界经济理论发展就充分说明了这一发展过程。

在现代世界经济中，资本、市场和信息(或者知识)已成为这个经济时代的主要概念。全世界正在注视着政治经济学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尽管如此，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依然是那些揭示"资本"基本经济发展规律的主流政治经济理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一个要竭力建立一套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国家，中国应当学习和借鉴西方政治经济学，在实践中创造经济成就的同时，创造自己独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21世纪，我们仍然需要认真研究西方四大政治经济学基础著作，它们是：

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英国，亚当.斯密）；

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德国，李斯特）；

1867-1895年间陆续出版的《资本论》（德国，马克思）；

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英国，凯恩斯）。

这四本著作基本构成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总体框架，为各个国家提供了基本的经济学理论依据。毫无疑问，这些著作都是西方式的。四部著作中，英国和德国两国各二部，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学习他们，并为我们所用。

《国富论》和它竭力在世界上推行使英国致富的经济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政策一样，都具有世界性意义。从英国前首相威廉.皮特把本书作为"宝书"开始，《国富论》帮助英国成为17-19世纪的世界强国。直到今天，《国富论》仍然是世界发达国家进行世界经济争夺的有力武器。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就是"国富论"的延续。因此，《国富论》是一部富有国际影响的基础性经济理论经典著作。

在上列四本经济学著作中，最不具影响力的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提出的"国家经济学"理论是西方国家的秘密。李斯特用后进国家争取经济发展的秘密揭露了亚当.斯密在国际自由贸易中"致富"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发达国家用其谋而不昭其义。他们在国内崇尚李斯特，对外则宣传亚当.斯密。这本标题可改为《〈国富论〉批判》的书，提供的独立的"国家经济学"理论和生产力体系理论，对所有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都具有积极指导意义。

李斯特说：

一个单独的城市或一个小邦与大国进行竞争时，决不能成功地建立或保持保护政策。

国家的统一是国家长期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们也已说明了只有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只有世世代代地向一个目标努力，国家生产力才能获得均衡发展。

德国过去每一个世纪总要受到痢疾、饥荒或内讧、外战的摧残，但是它总能保持住大部分的生产力，因此每次受到打击以后，总是能很快地恢复到一定程度的繁荣。（3）

必须把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与世界主义经济区分开来。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所考察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特殊的国际关系，怎样来维持并改建它的经济状况。

限制政策并不是出于凭空的理想，而是由于利益的分歧，由于各国在追求独立与优势方面的争夺，也就是由于国际竞争与战争的结果；因此在国家利益上的这种冲突还没有停止以前，换个说法，就是一切国家还没有在同一个法律体系下合成一体以前，这个政策是不能舍弃的。（4）

这些出于国家利益的理论，不但发达国家需要，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因此，我们应认真学习、理解和借鉴李斯特的国家经济理论。

《资本论》这部以资本和剩余价值为中心的庞大的经济学理论著作，是一部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划时代的巨著，它对资本经济运动的层层剖析，不但揭示了资本经济运动的若干规律，而且从更高的角度揭示了社会政治经济运动的一些普遍规律。其所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商品与货币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与工资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等等成为后来的政治经济理论的常识和基础。她不但影响了世界经济发展，而且影响了世界政治格局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在东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史乃至在人类哲学、文化发展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同《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样，批判了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又发展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提供的"国家经济学"理论，并使之现代化、系统化。建立了独立的宏观政治经济学理论体

系，使政治经济学发展走向了一个新的水平。《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供的适合现代国家垄断资本经济的理论，包括三大主要内容：有效需求原理、充分就业原理以及储蓄与投资均衡理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就是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提高有效需求，不能依靠市场自动调节，只能靠国家政策，人为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所谓充分就业者，即在一特定真实工资率之下，所能有的最大就业量"（5）。要达到充分就业，只能依靠提高有效需求，而不能借助工资率的自动调节。储蓄和投资是恒等的，但不是取决于利率的自动调节，而是依赖于对国民经济收入的人为调整。该理论否定了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和自由放任政策，扩大了李斯特的政府干预和限制行为能力，主张政府采取通货管理政策，通过价格控制来调整国家经济。这些都具有现代现实意义。事实上，这些理论，至今仍是世界各国政府首脑操纵政治经济的"金手杖"。

中国在建国后，长时期执行的是计划经济政策。虽然"计划经济"在战后恢复时期起过重要作用，但它绝不是和平建设时期的经济理论。不幸的中国经济，一切都要为"计划"让路，于是，"计划"被愚蠢地扩展到了国家经济的各个领域，终于将国家经济导向了"死胡同"。最后，邓小平说，只有实行经济改革，中国才有出路。

在中国，指导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论，似乎还有另一面--来自于政治家的理论体系。建国以后，毛泽东思想占据中国政治经济理论的最高位，在几十年实践中，毛泽东思想使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但经济仍然贫穷落后。所以何新说："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他不能被认为也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了中国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使中国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段时间，自然以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所称的"邓小平理论"作为国家最高的政治经济理论体系。经济理论的宏观部分在最高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中，而微观部分则在主要体现在党和国家的政策文件之中。如1984年10月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评价它"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被认为是

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发展。（6） 如此情形，恰如何新早在1988年就指出的那样："在政治现代化的国家，政策总是先由学者科学地设计和周密地论证，而后由政治家（许多也是学者）决策和实施之，中国则总是先由政治家决策和实施，而后委派学者论证。学者只能作既定方针政策的传声筒、解释者。"（7）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是无法造就出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的，就更不用说中国经济学家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

那么，我们的经济学家在干什么呢！大部分"经济学家"主要忙于两件事：一是解释党和国家每项经济政策提出的种种理由以及落实这些政策所需要的具体措施；一是介绍西方各种经济思想。这两件事，从本质上讲，是相互矛盾和相互对立的。在"邓小平理论"还未正式确立以前，而老的思想体系被实践证明行不通的情况下，政治也受经济的影响，中国于八十年代下半叶，在政治、经济两方面同时出现剧烈震荡，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这段时间，中国在政治、经济理论上，至少在名义上出现了"理论空缺"。"中国经济学家一直被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缺位而困扰。……一方面，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理论研究相对于实践总是处于被动求解的局面，对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系统的经济学解释；另一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和借鉴总体上还处于引进和介绍阶段。"（8） 按照经济学家董辅礽的观点，就是：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文革前自我封闭、步入歧途，文革后空前繁荣，但急功近利、生吞活剥。现在还缺乏一个宽松的环境和资金支持，自然中国经济学理论的50年发展是不容乐观的。（9） 在20世纪末尾几年，思想开放以后，有的经济学家开始发表具有自己独立思想的经济学观点，中国经济学算是开始起步。

我们知道，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一样，是一种含盖国家政治与经济、军事与国防、科学与技术、文化与教育、外交与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的宏观理论。经济理论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自然宏观的理论占多数。为此，微观经济理论就留下很大余地。这块余地被两部分分享：一是西方微观经济理论，一是国家具体经济政策。但是，西方经济理论，从宏观到微观，多数都是直接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而我们

的经济政策又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因此两者就不会完全吻合。于是，在经济活动中，就难免出现理论与政策、理论与制度的冲突。

我国需要的是系统的、适用于自己国家的宏观政治经济学理论、微观经济理论和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但愿，我们在不断的实践中，在资本经济时代，能够孕育出中国独立的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理论来。

宏观经济学理论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其所揭示的具有广泛意义的市场经济规律。操纵国家经济运作的微观经济理论和具体经济政策就是以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客观规律为前提。而微观经济理论与宏观经济理论一样，亦具有一系列的市场经济准则原理，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在供求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完全竞争理论、垄断竞争理论、分配理论、均衡理论等各种理论中，阐述了若干经济原理、原则和规律。如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相对成本递增规律等等。在中国市场经济逐步完善情况下，这些原理、原则和规律，同样会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但是，在我国，西方一些长期作用于市场经济的原理、规律，并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和揭示。这里专门讨论一下很少有人注意的、对我们这个正在资本主义市场化的发展中国家特别重要的三个市场经济规律：市场有限性规律、国际贸易不平等规律和资源有限性规律。

一、市场有限性规律

在市场理论中有一个很著名的反市场的"萨伊定理"。它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的。他认为："市场不是有限的。一种产品一经产出，就能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它产品开辟销路。"换句话说就是，供给自然创造需求，需求与供给在市场经济中是自然均衡的。然而，这个所谓的"定理"实质是市场竞争中的一颗烟幕弹。实际上，市场是有限的。

市场有限性规律，据我所知，在中国是由著名经济学家何新首先于1993年明确提出来。他说："市场经济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无论在国内或在国际间，市场总是有限的。"何先生明确提出"市场有限性规律"可谓是一个创举。

为什么说市场是有限的呢？很简单，因为世界只有一个地球。国际空间有限，自然国内空间更有限。在一个国家，你可以按照全国家庭的总量来生产电视机，但总不能由于你多生产了电视机，就会使每

个家庭配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视机。所以电视机市场是有限的。即电视机市场容量有限。最终消费品市场容量有限，这就是市场有限性规律。

在各行业和许多企业中，有相当部分的人仍然受西方经济理论宣传的影响，对市场的认识不足。他们仍然认为，不断增加企业生产规模，就可以降低成本，打开销路，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生产规模的扩大，在一定范围内，无疑将降低成本。这正说明生产规模，对成本水平的影响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当产品供应量超过市场的需求量时，问题就反过来了。

因为，任何产品的市场需要量总是有限的－－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普遍规律。某种产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导致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当企业向社会大量提供某种产品时，随着市场容量的缩小，价格随着下跌，利润下降，效益不但不能大幅度上升，反而导致降低。这就是经济学上的效益递减规律。另一方面，生产规模的扩大，其所必需的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由于需求量增大，供应呈显不足，导致价格呈上升趋势，进而使产品极限成本增加。这就是经济学上的相对成本递增规律。

既然市场是有限的，那么，市场就可以占有。所以，所有希望成功的企业都在绞尽脑汁、挖空心思、群策群力地提高其产品在有限市场中的占有率。怎么样取得成功呢？日本人提供了一种模式。"日本人的秘密在于，他们会利用人们中间普遍存在的一种想建设、想属于一个帝国、想征服相邻的帝国、想变成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的经济强国的愿望。他们的目标是实现最大限度的市场占有率（战略征服）和最大限度的增值（一个包括利润和工资在内的尺度），而不单纯是最大利润。只有当一种产品处于其生命周期的下降阶段时，才谋求最大利润，以便为扩大新的奋斗领域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10）

这，才真正抓住了市场有限性规律的实质。

二、国际贸易不平等规律

在经济活动中，有一个浅显的道理：当一个人，将左手中的钱或物转移到右手时，这个人的总财富没有变，还是那么多。他要增加财富，有三个办法：一是在自己的土地中投入劳动，增加农业或矿业收入；二是为别人提供劳务，赚取工资收入；三是依靠一定的技术、资

本和人力生产商品，销售出去，赚回利润。这个道理，对于一人、一家、一城市、一地区乃至一国家都是如此。所以，国家要增加财富，也有三个途径：一是依靠自身的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增加本国的物质财富；二是为外国打工，直接提供人工劳务，取得工资；三是通过国际商品贸易赚回利润。前两种方法人类在原始的自然经济时代就学会了，后一种方法是人类进入工商业经济时代后才学会并广泛流行起来的。在现代资本经济时代，更是一种国际贸易必不可少的谋财手段。

在国际贸易中，双方都为利益而来。表面上，都是自由贸易，一笔交易做成，双方都有利可图，这就是报纸上经常提到的所谓"双赢"结果。其实在同一个贸易方向上（如同一个产品贸易或者同一种技术贸易等）"双赢"是不可能的，这实质上是一个表面现象。对同一种产品，甲卖给乙赚了一笔，乙再卖给丙赚了一笔，如此下去，最终消费者必然吃亏，甲乙赚钱是以后者的蚀本为基础的。就像炒作牛市股票那样，最后"接力者"总是牺牲者。如果没有人做出牺牲而硬性继续抬高价格"牛"下去，最终结局就是产品或者股票的价格严重背离其价值，经济泡沫和通货膨胀出现，市场受到破坏。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有一名言："只有另一个国家输了，一个国家才能赢。"所以，如果有人在同一产品或者股票方向上一味鼓动"双赢"或者"均赢"，不是没有足够的市场知识，就是别有用心。我国在房地产炒作方面是有深刻教训的。恩格斯关于现代文明国家资产者与劳动者的劳动契约关系的论点，就说明了在所谓自愿、平等背后实际存在的不平等。他说："劳动契约仿佛是由双方自愿缔结的。但是，这种契约的缔结之所以被认为出于自愿，只是因为法律在纸面上规定双方处于平等地位而已，至于不同的阶级地位给予一方的权力，以及这一权力加于另一方的压迫，即双方实际的经济地位，--这是与法律毫不相干的。"（11） 这个观点，我们以为，可适用于国内或国际贸易。公开的不平等不用说了，各种"共赢"方案、协议、贸易单据等背后隐藏的不平等因素才值得重点关注。所以，不论是国内贸易或者国际贸易，国家或者政府不是重点参与贸易双方的具体贸易过程，而应当洞悉贸易背后所隐含的不平等因素、预见最后"接力者"（消费者）的实际利益、以及这些不平等因素所导致的可能影响贸易继续下去的结果。

据披露的信息称，美国里根政府当年对付苏联用了三个主要政策：一是遏制苏联每年石油出口，使其减少巨额硬通货约500亿美元；二是遏制苏联50%依靠国际贸易的技术来源；三是制订星球大战计划，搞军事竞争，拖垮苏联财力和物力。"美国政府在这个谋求世界霸权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当今世界不平衡的贸易经济秩序，轻易地就从技术、经济方面而不是通过真正的军事较量就扼制了外表庞大的前苏联，教训是十分深刻的。"（12）

总之，国际贸易之间所谓的"双赢"是从不同贸易角度或者不同贸易方向认识的结果，如农产品对工业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对高技术产品等等，一方面的亏蚀，必须在另一方面得到补偿，否则，贸易一方面必将难以为继。特别是，在存在着不平等的国家经济背景下，国际贸易就演变成为不平等国家贸易，这就是国际贸易最基本的规律－－国际贸易不平等规律。正是这个规律，造就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正是这个规律，造就了少数占总数20%的富有者和大多数占总数80%的贫困者。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曾揭露说："撇开美丽的辞藻和李嘉图的高论，贸易扩张的利益，并不是公平的共同分享，而主要是从第一次浪潮世界倾注到第二浪潮国家中去了。"（13）

在19世纪以前，西欧各国在经济上还相当落后，东南亚的香料和中国的丝织品，对那些从事海上冒险的人来说，是一种可带来巨额利润的物品。于是，他们整船整船地从东方运到西方，牟取暴利。但是，在这种个人获利的贸易中，当时中国富有，丝织品在国内并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但在国际上却是紧缺商品，对西欧来说更是奢侈品。所以，他们需要用相对价值多得多的钱到中国购买。由于中国物产丰富，拒收货物，只收白银，结果在这种贸易中中国获得了极高的利润，聚集了相当的财富。这种不平等贸易的长期结果是，西欧无法继续参与贸易了。于是，从清朝嘉庆皇帝时期开始，他们使用了阴毒的鸦片贸易计划来对付中国。一段时间，鸦片几乎成为西欧与中国进行国际贸易的唯一货物，白银又开始倒流。鸦片不但掠走了银子，还毒害了整个民族。自然引起了政府和人民的抵制和反抗，终于在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

当英国在殖民地财富和鸦片利润的堆积中，走上全球霸业时，就在国际贸易中强力推行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自由贸易理论。进口的是低廉的农产品，出口的就是具有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这种不平等的贸易，使农产品生产国付出成倍的劳动，也阻止了农业国的工业化进程，同时使富有的工业国更富，贫穷的农业国更穷。在现代，高技术产品对一般消费品的贸易同样是一种不平等的贸易。有一个很形象的例子，美国一架波音747飞机就相当于中国100多万套上好的西装。这种不平等现象是相当惊人的。因此，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规律是普遍存在的。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是如此，发达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也是如此。在发达国家相互之间，为了减少不平等现象，他们往往很少进行农产品或者低廉消费品的贸易，主要集中在具有高技术含量的工业产品，这方面的产品相互进口又相互出口，竞争相当激烈，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处于贸易的赢利方。不错，发达国家也有农产品出口，但是其农产品的工业化含量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产品也没法比的。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农产品是非常现代化产品。所以，其农产品本身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是不可等量的，出口当然有利。正因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看清了国际贸易只能有利于技术、工业处于优势的发达国家，才纷纷将国际贸易作为立国之本，并且借助国际合作口号、自由贸易理论和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西方国家操纵的国际金融机构，推进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自由化，进行国际财富的掠夺。发达国家相互之间高比例的贸易，永远是一个假相，相互之间的平衡才是真实的。西方"七国经济首脑会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调整相互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的。他们之间摆平了，存在不平衡的自然就是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所以，每次西方七国经济首脑会议都是算计发展中国家的会议。

让我们来看看国际贸易不平等规律所带来的结果。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97年贸易与发展年度报告》称，19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贫富差距均在不断拉大。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1965年处于贫富两端，各占世界人口20%的富人与穷人相比，前者是后者的30倍，到1990年早已扩大到了60倍。同时，世界各国的富人还在不断地增加自己的财富，中产阶级正在被"剥削"，"无产者"的队伍正在扩大。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称，到1998年，世界最富有的200人的资产从

1994年4400亿美元增加到10000亿美元，其中最富有的3个人的财富超过48个最不发达国家6亿人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最富有国家与最贫穷国家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继续拉大， 1960年为30：1，1990年为60：1，1997年为74：1。最不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继续下降，1975年为287美元，1985年为276美元，1997年为245美元。全世界营养不良者达到8.4亿人，日均生活费不足1美元者达13亿人，无法满足基本消费需求者达到10亿人。据世界银行统计，1983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高收入发达工业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2.4%，即后者是前者的43倍。到1994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6%，即后者为前者的62倍。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从1976年的27个增加到1999年的48个。这48个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3%，而它们的出口仅站世界出口总额的0.4%，进口仅占0.6%，比20世纪80年代减少了40%。说得更远一点，在19世纪初，世界上最富和最穷的国家之间，人均所得比率是3比1，到1900年这个比率变为10比1，到2000年这个比率则上升到60比1。面对如此不容乐观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的形势，联合国贸发组织的《1999年贸易和发展报告》不得不指出，贸易体系不平衡妨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工业化国家的保护主义阻碍了全球一体化，并提醒发展中国家，必须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贸易和金融的过分自由存在着危险等等。世界银行于2000年4月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称，1998年北美、西殴和日本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6，但它们却获得了全球收入的80%，平均每人每天的生活费达70美元。而占世界人口57%的63个最贫穷国家，却只获得全球6%的收入，平均每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

1974年5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其目的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控制和剥削；改变旧的以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实现生产协作国际化；改变以不平等交换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改变以垄断资本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实现金融国际化。明确指出：

这种秩序将建立在所有国家的公正、主权平等、互相依靠、共同利益和合作的基础上，而不问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如何，这种秩序将纠正不平等和现在的非正义并且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

扩大的鸿沟有可能消除，并保证目前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在和平和正义中稳步地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

所有遭受外国占领、外国和殖民统治和种族隔离的国家、领地和民族、对于其自然资源和所有其他资源受到的剥削、消耗和损害有权要求偿还和充分赔偿。

当时看到这些文字的人们，幻想一下他们的未来是多么的美好啊！

然而，三十年过去了，国际经济秩序依然如旧，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和剥削比三十年前较之尤甚。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处于最发达国家的美国人布热津斯基不得不指出，"全球不平等现象势必成为21世纪政治中的重大问题。"世界体系论者也不得不把两极化作为一个基本发展趋向：随着世界经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在社会福利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差距越来越达。就社会福利而言，由于技术先进，使得世界资本越来越多地向核心地区流动，也由于不平等交换使得边缘地区的剩余资本流向核心地区。这样，在核心地区，劳动力完全被商品化，工人的工资就变得很高；而在边缘地区，劳动力受到超度的剥削，因而，他们的生活水平逐渐下降。就社会结构而言，核心地区的劳动组织方式比较自由，政治上采取自由的民主的方式，这就使得工人对高工资的要求容易成功；而在边缘地区，劳动采取的是强制劳动方式，政治上采取的是更为专制的方式，这样就导致国家对社会资源垄断程度加强。（14）

1999年6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任华民教授在武汉"十五"计划编制工作会议上指出，目前国际分工呈金字塔型，共5层。顶端的国家是美国，它是信息产业的垄断供给者，需求来自全世界。处在第二层的是英国，它为全世界提供金融服务，伦敦金融交易中心整个金融交易量超过英国GDP的几倍，也就是说英国通过收取各种与金融交易有关的税，就能达到人均收入2万美元以上。20世纪末，英国占全球通货交易总额的32%，美国占18%，这2个国家就占全球通货交易额的50%，其他处于前10位的8个地区仅占37%。"英国国际收支的平衡建立在出口石油产品、出售某些类型的金融服务，特别是向企业出售的服务。这种平衡尤其依靠对外直接投资收入和金融投资，目前，金融投资收入已经超过国内生产总值三分之一以上，再次使英国成为'食利

国'（当然与19世纪末的条件明显不同）。"（15） 德国是典型的第三层次国家，它只生产资本品，全世界50%的机械装备来自德国。不管你生产什么，总得有装备，所以德国经济地位是比较稳固的。处在第四层的国家很多，但典型的是日本，一个生产高技术含量、高品质的最终消费品的国家。其余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处于国际分工的第五层次，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的最终消费品。（16） 所以，中国如果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作经济发展的后盾，在国际贸易中，不以牺牲超额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作为基础，目前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直到现在，中国由于基础薄弱，产品技术含量低，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2003年初，中国有2864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各种资料说明，这并非是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有利地位而得，而是中国超额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体现。对此，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总之，参与国际贸易，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信条：国际贸易间不平等规律永远存在；先有国家，后才有国际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只有贸易战略和国家利益。真正遵循"世界主义"原则，实行纯粹意义上的自由贸易的国家是没有的，只有国家贸易战略下的贸易自由。国际贸易中不平等交换规律，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

第一，国际分工的影响：发达国家高附加值产品与欠发达国家低附加值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

第二，国际资本的影响：一方面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于第三世界国家，利用其廉价劳动力资源，赚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第三世界国家实现工业化资金短缺的困难，对其实施重利贷款，造成发展中国家广泛的债务危机，实现债务盘剥。

第三，技术知识的影响：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信息垄断和"头脑流失"等手段，从发展中国家转移财富。

三、资源有限性规律

资源有限性规律是市场有限性规律的前提之一，也是国际贸易不平等规律的根源之一。

在我们反思和探索近200年（1796-1979）后，终于明白必须改革开放，参与国际贸易竞争时，在我们拼命以原始资源去换取外汇时，

人类却正面临着资源日趋短缺的严重威胁。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1999年度全球环境指标报告中，严肃指出：从1970年到1999年，全球环境指数约下降了30%，也就是说在短短的25年内，人类拥有的自然资源骤减了3成，消耗数量相当于过去一个世纪的总和。为了维持人类的需求，世界各国每年要从地球中开采1500亿吨的矿产资源，平均每人约25吨。全球已探明的主要金属与非金属矿物储量为1450亿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主要矿产资源储量占80%以上。非金属矿产资源品种、数量增长很快，有人预言，人类即将进入"新石器"时代。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2002年"生命地球"报告中又明确警告：资源破坏加速，地球开始透支。报告指出，"到2030年，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将出现衰退，除非人类从现在开始就减少使用地球所能提供的自然资源。"人类目前对地球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已经以20%的比例超过了地球的承受能力，而且这个数字每年还在不断地增加。据称，到2050年，人类将消耗掉地球上的180％到220%的生物生长能力。这就意味着，除非各国政府立刻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到2030年，以人类平均寿命、教育程度和世界经济为代表的指数会显示，人类的社会福利将会下降。

然而，到20世纪末，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化国家--欧洲、北美和日本--都已经基本上耗尽了最基本的工业原料：如铜、铝、镁、石棉、石墨等等。今后，这些国家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基本矿物原料只能从第三世界进口，而世界矿物的总储量和可开采年限，已经逼近极限（见表8-4）。（17） 而世界自然基金会和联合国环境计划组织联合公布的《2000年地球生态报告》更明确地指出，人类依照目前的速度继续消耗地球资源，那么地球所有的自然资源将在2075年前耗尽。

石油，被称为是世界经济的"血液"，它是世界争夺的最重要资源之一。人类自1973年至1997年间向地球索取了大约5000亿-8000亿桶石油，占当时探明储量的85%。到20世纪末，中国自身石油可开采资源量为135亿吨，而年消费已近2亿吨，如果不计需求增加因素，全部自采自用则只能够用65年。就全世界而言，以最乐观的估计，石油已探明可开采的资源量在2万亿桶左右，按照20世纪末全世界每天消耗7500万桶计，全世界将在80年后，没有石油可用。由于石油资源相对集

中，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就拥有全世界已知石油储量的77%，而西方发达国家又消耗着世界石油的绝大部分，美国人口占世界的6%，能源消费却占全球的1/3，其进口石油的20%、西欧进口石油的35%、日本进口石油的70%就来自海湾欧佩克国家。这就意味着，在21世纪，全球性的矿物资源和石油资源的争夺，特别是第一、二世界向第三世界的矿物资源和石油资源的争夺，将异常激烈（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就是资源争夺的最激烈的表现形式）。在这种情形下，西方国家不强力推行全球化，怎么能够在第三世界获取资源呢?

表8-4 1990年世界矿物和石油总储量及可开采年限

矿物品种 已知储量

[亿吨] 可开采

年限 储量扩大5倍可开采年限

铁 3500 93 173

铜 4.08 21 48

铅 1.5 21 64

铝 206.9 31 55

锡 0.1014 15 61

镍 1.1 53 96

锰 19.27 46 94

钨 0.0557 28 72

钼 0.0826 34 65

锌 1.35 18 50

水银 43

天燃气 52

煤 209

石油* [1983]

[1999]世界

[1999]中国 891

1.64-2.2万亿桶

135 34

60-80

70

* 水银栏以下数据（石油1983年数不包括中国）是根据其它资料添加。

处于第三世界的智利有两位作家在其于1971年出版的《如何解读唐老鸭》一书中，对西方在世界的资源掠夺有过深刻的剖析：

我们的国家出口原料物质，但却进口上层建筑及文化产品。

为了让我们"单一产品"的经济尚能立足，供给都市生活的需求，我们也就往外送出铜矿，他们则送入机器，抽走铜矿，当然，还有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可不是简单的事，在它背后顶着整个的上层建筑，充满各色的期望与行为模式，随之而来的是现状与未来的社会观，以及对于过去的诠释。（18）

这就是当今世界的现实。等于是说，我们用资源去养活他们，他们却用虚幻的东西（不能解决温饱，但能取悦耳目）来教训我们，必须跟他们走。他们说怎么样，我们就得怎么样。

在世界资源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我们中国的资源情况又如何呢？有关报告指出，到2010年，我国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能够保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仅有一半，即煤、菱镁矿、钼、稀土、芒硝、钠盐、水泥原料、玻璃原料、石材、硅灰石、硅藻土等23种矿藏属于能够得到保证的；而石油、天然气、铀、铁、铜、铝、金、银、锰、硼、硫铁等17种矿藏不能得到保证或品种上存在不足，需要不同程度的进口以弥补国内的供应不足，其中石油、天然气、铜、铝在中历66世纪（西历21世纪）头20年的总需求量至少是20世纪末储量的2-5倍,2002年我国进口6500万吨石油(占消费量的30%),到2020年,中国需要进口5亿吨原油和1000亿立方米天然气,分别占中国消费量的70%和

50%,在20年中,我国将短缺30亿吨铁,5-6亿吨铜和1亿吨铝,铬、钴、铂族、钾盐、金刚石等5种矿藏则严重不足，完全依赖进口。

在人类资源日趋短缺的情况下，人类未来将取决于两方面的实质性进展：一是在科学技术取得伟大进步情况下的足够的各类资源或者替代品的获得；一是在人类道德普遍提高情况下的全球共生体系的形成。目前，这两个方面都是极其渺茫的。现在而今眼目下包围着整个地球的资本主义体系是建立在局部国家利益、局部种族利益和局部阶层利益基础上的。故此，面对资源日趋短缺的现实，这些维持少数人利益的统治者会不择手段地实行其资源掠夺政策，甚至不惜利用战争手段。这种资源掠夺政策在我们的地球上早已经发生，今后会更加激烈。这种状况不但会在国家集团之间或者国家之间发生，而且还会在国家内部发生。

因此我们参与国际贸易，如不能清醒地认识到世界资源争夺的总背景，不能清醒地认识资源有限性规律，而盲目地继续主要直接用原始资源去换取外汇，把这种外汇作为自己国家的最重要的生存基础，没有自己的人才、知识、技术和产业的合理结构，其代价必将是十分昂贵的。

---

（1） 《管子.治国》。

（2）《管子.牧民》。

（3）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一版，第16、143、118页。

（4）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一版，第145页。

（5）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版，第15页。

（6） 《经济日报》，1999.11.15，第6版。

（7） 何新，《危机与反思》，上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第一版，第153-154页。

（8） 《中国经济时报》，1999.11.10，第5版。

（9）《中国经济时报》，1999.10.27，第5版。

（10） 莱斯特.瑟罗，周晓钟等译，《二十一世纪的角逐——行将到来的日欧美经济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118页。

（1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68-69页。

（12） 邱明科、徐观华，“如何看待农产品国际贸易秩序”，《中国经济时报》，2001.12.14，第五版。

（13） 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4年第一版，第149-150页。

（14）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一版，第81-82页。

（15） [法]弗朗索瓦.沙奈，齐建华译，《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111页。

（16）《信息参考报》，1999年6月。

（17）《信息时报》，1999.11.19。

（18）转引自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86-87页。

**********

## 第四节　改革重点：金融产业及其政策

在现代经济领域中，恐怕只有金融信息最能快速反馈经济运行状况，最能反映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了，恐怕也只有金融理论与政策，最能反映一国经济调控水平和能力了。国家经济运行的过程和结果，都以货币形式表示出来，这种过程和结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高低。而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高低又反过来影响到社会行为，这种社会行为又影响到政府的行为。因此，金融政策是关系国家政治经济活动的致关重要的一环。

在最初，金融只不过发行和管理货币而已。到了今天，当我们被一系列的金融概念，如货币、资本、汇率、利率、借贷、投资、国债、股票等等所包围时，我们已毫不怀疑金融在经济生活中的龙头地位。西历2003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全球有60家商业银行入围，总销售收入13613.13亿美元。中国入围世界500强的11家企业中，有3家是商业银行。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金融业的地位已开始从传统的辅助地位，逐步转变到主要地位，发挥其龙头作用。

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金融市场也必将随之扩大开放。中国金融体系，在一些国际金融政策和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思想影响下，能否承受外国金融资本的强大压力，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现在，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霸权主义国家美国，从前是用坦克、大炮占领和控制一个国家，牟取种种特权和利益。现在，他除了用美国式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文明"的方式颠覆和瓦解一个国家，并趁火打劫，从中获取暴利外，还利用"美元"这个国际货币作为武器，以他们雄厚的金融资本为后盾，不断干扰、操纵和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

美国大投机家索罗斯认为，所有汇率机制都是有缺陷的，要维持一个共同市场，唯一的途径就是实行单一共同货币。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拿大经济学家芒德尔又认为，只有当一个区域内所有经济体的经济模式和水平相似到一定程度后，该区实施单一货币和统一的货币政策，才会对该区域内的所有经济体有利。正是基于此，西方发达国家才极力推行"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自由化"。因为这样的结果只对美元及其它强势货币有利，所以，美国及其代表自然就要竭尽全力了。

当亚洲"小龙"国家和地区经济蓬勃发展，并对未来的所谓"太平洋世纪"或"亚洲世纪"充满希望时，西方除了不断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外，就是在经济上从各方面进行阻挠和控制。泰国没有看穿美国及西方国家"金融自由化"的险恶用意，几乎在一夜之间被西方金融投资者，毁掉了经过几十年艰苦努力得来的经济成果。泰国在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吃了大亏。当年7月开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引起了整个东南亚及东亚地区的货币剧烈动荡，三个月时间内各国货币兑美元的汇率，泰国珠、印尼盾、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元下降了25%以上，港元、台币、韩元、印度比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泰珠的大幅度贬值，又需要付出多少努力，才能得以恢复啊！虽然泰国金融危机，与本国的管理体系薄弱、法治不力不无关系，但是从事后各方面的分析表明，与美国的金融干预是分不开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兹在其于2002年出版的《全球化及其不满》的书中，分析说：大量的证据表明，资本市场的完全开放不一定能够促进增长。尤其是对于高储蓄东亚国家而言，只会徒增不必要的风险。但是在美国财政部的支持下，一直到1997年十月东亚危机的前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在该地区不遗余力地推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这是东亚危机的最根本原因。（1）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并没有收敛他们的金融干预政策。在他们的主导下，另一场金融危机在2002年又席卷了整个南美地区。

这是中国必须吸取的相去不远的非常深刻的教训。在如此险恶的国际金融环境中，面对中国内地统一于人民币下的不同经济模式（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其他经济模式）的企业怎么改革？面对即将形成的一国四种货币形势，中国又怎么建立起统一的货币和金融战略？我们的理想建议是，中国政府包括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台湾地方政府都应当在"一国"前提下，首先把货币统一写进金融改革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中，一切改革都要为此而努力。有什么比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统一更能体现"一国"之思想呢？一个经济衰败或被各种力量分割的国家，只能剩下一个贫穷和混乱的政治空壳。所谓中国统一，所谋求的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上强大的独立自主的中国。我们要认真地思考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一个单独的城市或一个小邦与大国进行竞争时，决不能成功地建立或保持保护政策"，"国家的统一是国家长期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们也已说明了只有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只有世世代代地向一个目标努力，国

家生产力才能获得均衡发展"的著名观点。我们应该意识到，"四小龙"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与中国意识形态斗争总背景下的一种"意外"收获（西方让"四小龙"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想让中国明白：只有资本主义的西方好。我们从西方对香港在回归前后的明显变化就可知西方为什么这么做），但单独的"小龙"能跟西方任何一发达国家展开竞争吗？显然不能。它们不能脱离中国这个大背景。

所以，中国金融改革的目标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

很多人对20世纪末90年代美国国家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它那庞大的对外债务大惑不解，美国人自己却给它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新经济"。这实际是美国玩的真正的"欺名盗世"的把戏。这一切，又不过是美国充分利用它的"美元"世界货币而已。1990年美国还不是一个净债务国，到1997年底其累计国际净债务占了其GDP的13%，到1998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18%。而同期经济增长率稳步在2.5%以上。为什么？宿景祥先生指出了原由："美国向世界'透支'"。（2） 1982年，美国开始从国际资本净输出国转为净输入国。到"1990年，美国对外资本输出净额为816亿美元，外资流入净额为1420亿美元。到1998年，这两个数字分别2928亿美元和5026亿美元，意味着美国净接受了2000多亿美元的国际资本。"其国内投资（相当于GDP的15.8%）与国内净储蓄额（相当于GDP的7.4%）的巨大差额就是靠这种国际资本来弥补的。通俗地说，就是用你的钱发展我的技术和产品，再卖给你（因为，你的钱交给了我，而无钱发展，自然生产不出什么好产品）。为了长期占用你的钱，我就大规模地制造一种叫"券"（包括国库券、公司债券和股票等）的东西，卖给你。你也可以随着我的经济增长增值受益。相当于用廉价的"券"换来巨大的国际资本。我用这些资本生产高附加值的先进技术和暴利产品，再推销给全世界，我则稳赚大钱。这样一来，我不得不对国际资本举债（1998年，外国人购买的美国国库券、公式债券和股票等长期证券净额达2220亿美元）。虽然我举了债，但我利用了全世界净储蓄额的72%。不错，从目前看，我的债务总额和财政赤字是世界最高的，可是你们不要忘了，我的债务总额（包括国家和地方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993年的75.80%，降到了2002年的58.9%，比起日本的143.30%，意大利的106.3%,加拿大的99.70%，法国的65.60%要低多了；我的财政赤字

也从1993年的5.7%降到了2002年的2.5%,比日本的8.4%，德国的2.8%也要低。所以，我这里是最安全的。

我向全世界"透支"？笑话，没有"透支"何来资本？但是，债权人不用怕：第一，万不得已，我可以印钞票应急，印假美元者不成气候，只有我可以大规模地印制美元；第二，我的经济下滑，完全市场化的"券"也会随着缩水，我的负担自然会随着减低。所以，有美元、世界资本家以及全世界的消费者作后盾，我要作的就是不惜一切手段推销我们的先进技术和产品，何不简单？当然，要世界资本家相信我，我的目的就是保持发展速度就行了。只要我的高附加值先进技术和暴利产品能够推销得出去，又何愁不增长?

对"我"--美国的做法欧洲人和日本人是清楚的，无奈它们没有世界货币，难有更大的作为。但它们开始反抗了：欧洲发行了殴元，日本蠢蠢欲动，总想把日圆玩成世界第三货币（事实上，到21世纪初，由于日本GDP高达4.5万亿美元，日圆自然成了世界第三大货币）。

这个局面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进行了很有预见性的总结：美国、欧洲和日本已经首先从经济体系开始构筑了"三极鼎立地带"和"三极地区"（法国学者K.奥迈OHMAE首先提出），这些地带或者地区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及其更广泛的紧密的协作国家。（3） 随着美元霸主的巩固、欧元的成功以及日圆实际的世界第三大货币地位，以三大货币体系为基础的世界三大经济圈，已经形成。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最新"版图"。这种局面，引申出了一种叫"新战国时代"的三大板块思想 。（4）

"从欧洲统一货币的背景看，在冷战时代欧洲人需要美国人的保护来对付华约组织，不得不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奉美国人为'老大'，在经济方面也不得不对美国的利益要求不断做出让步，但是从前苏联解体和转向后，欧洲人没有了过去的敌人，朋友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欧盟国家要统一货币，建立经济货币联盟，实质就是为了对抗美国的经济势力，在国际经济中提高竞争力。在统一货币后还要统一政治和建立欧洲统一的防务，如此离一个统一的国家形态也就是咫尺之遥。"（5）欧洲人不愧为李斯特的后代，其思想意识既超前深远又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在美国羽翼下的欧洲尚且如此，处于西方"对面"的东方国家--中国，在金融地位日益突出的今天，就更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货

币。这个统一的货币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在对付外国金融资本的强大攻势方面也将起到核心力量的作用，在世界金融体系日益全球化情况下，也更将起到支柱性的作用。我们急切需要一个统一的货币，来保卫我们用实物产品换来的国际利益，同时需要一个国际性货币来支撑国家经济向世界经济的拓展。这个统一货币是我们通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车轮。为此，我们要为建立一个在东亚、东南亚都具有相当地位的统一货币－－中元－－而不懈努力，并且随着经济力量的增强，在和世界其它主要货币处于一个"等量地位级"的时候，再考虑把"中元"建成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世界级货币。美元自然以美国为基础，欧元以德国为核心，未来的东亚货币"中元"必须以中国为历史背景，只有这样才能适合大中华经济圈广大的华人市场。金融改革应以此为最终目的。

--顺便再进一步说一句：如果有一天"中元"能成为现实流通货币，那么，这个真正的"龙票"的正面应该有龙和黄帝等中华巨人的画像，背面应该有长江、黄河、珠峰、天山、蒙古大草原以及从北到南的标志性海景等图像。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一再表明，长期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中国的金融政策也必须面对这个未来的现实。然而，现阶段，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以致资本积累的收入永远超过了劳动力的收入，这样既导致劳动力的贫化和弱化，又导致整个世界经济的持续低速增长。因为，现行经济秩序、制度，严重削弱了劳动力，使经济发展失去了真正的动力因素。唯一动力因素只有西方占绝对优势的技术因素。因而，金融业迅速超过一般工业。结果，收租息者胜过投资者。这样，使西方大国可以轻易地利用其雄厚的金融资本，以投资名义操纵和剥削别国的经济财富。他们的所谓投资主要不是进行什么产业投资，而是在以金融体系为基础的所谓"信息经济"中投资，或者提供其利息永远大于其经济增长速度的贷款，坐收盈利，大发横财。如果要投资企业，那就是建立以便于推销西方产品的分支机构。如波音可以跟我们的企业合作生产它的机翼，摩托罗拉可以在中国建厂生产手机机壳，可口可乐可以在中国建灌装厂生产瓶子并帮助装瓶，价值200多美元的巴比娃娃可以让你赚4元人民币的加工

费，微软可以在中国设立研究院开发中文化产品，等等。总之，核心是西方的，中国只能"帖牌生产"。

2001年在中国正式加入WTO前夕及其以后，在中国的许多中外合资企业特别是西方合资企业纷纷"退掉"中资而走向独资。如果说，以前外国企业在中国伸了一支"软腿"（中外合资），那么，2001年以后很多外国企业则在中国有了一支"硬腿"（独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如果我们没有警觉并建立起相应的发展战略策略，我们就永远只能为西方干活，变相地变成被"奴役者"。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每年偿还债务的利息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以上。这些劣势国家已经逐步变成一个徒有外表的政治空壳。可见，西方的所谓"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实际是西方国家继"经济世界主义"、"贸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后，又一个剥削发展中国家的有效政策。

然而，经济全球化是当今西方主导下的世界国际贸易的一个现实，只要你参加国际贸易就不可回避。经济全球化里面包藏着美国以及西方"霸权"野心，这里边不但有经济因素，更有政治因素。在这里，西方说的全球化，是让他们横行世界；而第三世界则只能在你自己的地区活动，不能到西方市场中去参与竞争。中国在未加入WTO前，西方天天嚷着叫你开放市场，到你加入WTO以后，我们在西方碰到的是一堵堵贸易高墙。

西方是要全球化的，因为他们有控制全球的强大企业。我们只要简单统计一下就会发现，当今世界控制世界经济命脉的核心企业都逐步通过兼并、强行"购买"等手段集中在美国或者西方旗下。世界的计算机核心垄断企业在美国：微软、英特尔、ＩＢＭ等；世界的飞机核心垄断企业在美国和欧洲：波音（麦道）、休斯、空中客车等；世界的汽车核心垄断企业在美国、日本、德国：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克莱斯特、丰田等；世界的通信核心垄断企业在美国：摩托罗拉、电话和电报等；……。正如西方人自己列出的单子，西方

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

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

是世界上主要的消费品主顾

提供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制成品

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

对许多社会发挥着相当大的道义领导作用

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预

控制着海上航线

进行着最先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控制着尖端技术教育

控制着宇航技术

控制着航天工业

控制着国际通讯系统

控制着高科技武器工业（6）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出版于1841年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早就指出：

世界上有那么一个国家，它的工业已经继续发展了一个世纪，累积了庞大的资本，商业势力扩展到了全世界，它的大规模信用机构发挥力量时能够压低工业品价格，从而鼓励商人扩大输出，靠了这样的机构，它控制了金融市场；工业生产既可以作无限度的发展，这就使这个国家可以向其他一切国家的工业家宣战，从事于工业的毁灭性战争。（7）

后来的世界发展史无不验证了李斯特理论的正确性。19世纪的英国是如此，20世纪的德国和日本也是如此，20至21世纪的美国又何尝不是如此?

西方发达国家就是这样通过不断建立高度垄断的庞大跨国企业，控制和影响更多的小企业，籍以实现他们的"世界经济全球化"。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公布了以海外资产计算的1998年世界跨国公司百强排名，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名列第一，海外资产1286亿美元。排名第二至第十位的依次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英荷皇家壳牌公司、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美国埃克森公司、日本丰田公司、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英国石油-阿莫科公司、德国奔驰公司和瑞士雀巢公司。报告说，这100家全球最大的非金融性跨国公司拥有的海外资产超过2万亿美元，海外员工600万人，已经成为全球生产的的重要动力。很自然，这些跨国公司的绝大多数都来自

具有"国籍优势"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其中当然包括日本。90%的公司总部设在欧盟、美国和日本等三地。经营活动主要分布在汽车、石油、电器等领域，不过公用事业和电信领域的大型跨国公司数目也在逐渐增加。据贸发会议统计，全球目前有近63000家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70万家（20世纪初，全球只有近37000家跨国公司，控制子公司20万家），它们的经营活动已经扩展到世界所有国家所有经济领域，是世界经济中一支强大力量。

"1997年，全世界大、小跨国公司总数达到了53000家，其中母公司设在发达国家的有43442家，在发展中国家有9323家。……这些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总数达到了448917家，其中51%的子公司分布在发展中国家。"（8） 这一切充分说明："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强势国家以实力为基础，已经表现出积极抢占国家市场垄断地位的许多明显迹象。"这是经济全球化问题的一个面，问题还在于"全球化进程又是由两种不同机制推进的。一方面，现代国际经贸关系的扩展，确有李嘉图所阐述的关于比较利益机制的推动，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在越来越宽广的领域里以商人的平等身份进入世界市场。但是另一方面，这里又并不存在一个市场自由竞争的浪漫主义景色。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在更大程度上又是由经济强势国家的少数大公司、大集团通过急剧的国家扩张强制性地加以实现的。"

面对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和被西方简化的"经济全球化"问题，中国怎么办?

长期处于贫弱境遇之中的中国人，在迅速发展和初步富裕之后，很容易把已有的成果进行心理放大，把重树自己形象的过程看得过分容易。""然而不能忘记的是，中国要从根本上改变历史遗留的贫困落后面貌，进入世界强国之列，形成同经济强势国家相互制衡的格局，绝不是多增长几个百分点和多搞几个大型项目就能奏效的，而是非要痛下决心扎扎实实经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苦斗才行。此外，我们还应该有经历艰难曲折甚至在必要时经受苦难的心理准备。"（9）

美国等西方经济强势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于其优势地位已经获得了不少好处。如由于美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因而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获得了巨大利益。据美国官方

公布的数字，1995年美国对外国的直接投资获得的收益达855.4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外国在美国获得的318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利润。（10）

房宁对西方现实的国际交换中的垄断有更深刻的认识。他说：

在资本的国际循环中"中心"与"外围"交换的高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售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时，实行卖方垄断，并造成发展中国家无法实施技术上"进口替代"，进而形成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附。

在资本的国际循环中"中心"与"外围"交换的另一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购买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时，又形成了另一种垄断--买方垄断，即垄断低价。这种买方垄断的形成主要是西方国家在战后实施"粮食战略"和"石油战略"的结果。西方国家在战后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条件，采取新殖民主义的手段以继续维持其对世界的统治。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了发展战略农业等重要步骤，使少数几个西方国家控制了世界粮食市场，同时西方国家通过政治、经济的多种手段控制了世界石油市场。在此基础上，西方国家通过压低粮食和石油--两种战略性资源在世界市场上价格的手段，达到控制世界初级产品市场价格总水平的目的，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受损与恶化。

上述的双向垄断，构成了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垄断机制，这是维系当代西方国家全球化的利润、经济剩余转移的基本条件。西方富裕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11）

所以，西方发达国家在取得全面的高度垄断地位以后，最热切的希望就是建立适合于他们贸易需要的广泛的世界市场。所谓"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不过是其拓展世界市场并籍此攫取私利的战略步骤而已。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过："我们只是在成为公民之后才真正成其为人。我们对那些冒充是世界主义的人--他们认为热爱人类高于热爱自己国家--应当这样看，他们所谓热爱全世界的空话只不过是为了窃取自己的特权。"也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旋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和发展。"（12）"资本主义作为世界体系，它在扩张以及在体系运转中的每一稳定阶段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实际上都可以在国际上居高临下地强行推行它们的规则、制度和政治

经济准则，而'接受'国只有在统治国的政治作用因一些情况暂时被削弱时，才能摆脱这些规则、制度和准则。"（13） 一位英国学者和一位荷兰学者更是明确指出，"美国是资本主义在这个世界的代言人，它以武力和理论无怨无悔地捍卫着资本主义。美国人一直运用它的政治力量，大肆鼓吹并推动资本主义，企图使之成为世界竞争体系的唯一标准。"（14）

一位法国经济学家说："英美政府正是通过金融自由化和放宽管制，并利用华尔街和伦敦金融中心在国际上无可匹敌的地位，才得以将'保守主义革命'带来的后果传播到全世界，并且建立起以金融占主导地位的积累制度的基础。通过自由化和解除各国金融体系的分割状态，通过改变资助公共债务的循环体系、通过让市场确定长期利率水平，英美政府最终建立起J.P.费图西称之为'债权人专政'的基础。……并且开创了以食利为特征的金融资本统治的新时代。"（15）

总之，不管怎么说，在"食利时代"我们面临的是，正在日益"全球化"的既混乱而又有序的局面：一方面，有人要开辟新的市场和战场，另一方面他们的口号是"公平竞争"。而我们一方面要认清形势和背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参与竞争。这对劣势方来说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智力运算题。于是人们构造了一个新的词汇："双赢"。而事实上，正如西方学者指出的，"现代的经济战争是价值链之间的战争，也就是包括企业、供应商、银行、顾客和合伙人所构成的组织集团之间的竞争。""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内部合作、外部竞争的演进史。譬如，资本主义初期，个人与个人相互争夺顾客；二十世纪初期，竞争层次提高到公司与公司之间，内部成员则相互合作。同理，到了本世纪（20世纪）末期，财富的创造，将不再以单一公司为主，而是由一组企业集团或增值链网络所创造。"（16）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说，到了21世纪初期的今天，很多国际间的交易如投资开发、大单贸易等项目的达成，早已是在以国家领导人作为签约背景的场合下完成的，国家早已成为经济交易成功与否的力量而存在。在西方内部，我们眼见的事实是，美国不能容忍一个强大竞争者（能够与它进行公平竞争的角色）的观念和政策，对紧跟它的国家要么控其国，如日本、德国；要么彻底同化，如加拿大、英国；要么弱其势，如法国、意大利。最后，不管哪一种情况，他们的生存只能够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人的

思维是：我是"一"，老大，有了二至七，它们已经在我的控制之下，至于七以后的名次，你们去公平竞争吧，我自然是仲裁者。这就是美国及其所竭力倡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向世界展示的哲学背景。

清醒的人是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每年的年会，不管在哪里召开，哪里就有愤怒的人群所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以抗议这两个组织所极力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77国集团第一次首脑会议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时，古巴卡斯特罗在会上建议"毁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让这个可恶的机构和它所代表的哲学消失，对于第三世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在21世纪初加入WTO参与世界竞争的中国，其内部市场背景又如何呢？现实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仅45%，资金市场化程度仅45%，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仅60%，价格市场化程度仅65%，总体经济市场化程度不会超过50%，大致在45-50%之间。离发达国家的80-90%，有相当大的差距。（17） 如果我们连"国内经济一体化"就做不到，而去过分依赖"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所谓"机遇"或者"双赢"，恐怕结果也不是我们所设想的。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了WTO（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不可避免，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不可避免。我们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加入了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体系，然而西方富国俱乐部恐怕不会放弃他们"让他们进来，我们将被毁灭；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将被毁灭"（18） 的现实逻辑。还是何新先生说得好：

英美全球化的本意，就是要搞全球的殖民主义化，通过全球国际分工，让英美成为资本和技术的供给国，然后把其它国家有的变成外国的工业化国家，有的变成农业国家，有的把它作为只保存原始资源的国家弃置掉，就像美国对待印第安人的保留地那样，把他们隔绝起来，扔在蛮荒地带，让他们同化在原始的生存环境里，永远不要发展和进步，变成大自然的一部分。中心地区达到最高的发展，那些落后边缘区域则作为打打猎、散散心的游玩场所。（19）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意识肯定西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真实用意，那么听听来自西方的另一中声音也许是有帮助的。《参考消息》2000年8月10日头版选载了英国种族关系研究所所长安.西瓦南丹发表

在8月8日英国《卫报》上的一篇文章："全球化的受害者"。文章很现实地分析了西方经济全球化的欺骗性。文章说：

西方非常乐意接纳经济移民，如果这些移民是企业家（必须有23万英镑）、专业人员或是技术熟练工。这些人就是他们称之为的经济移民--带有骗人钱财的含义。

现在，要求自由化市场和放松贸易条件的全球化也在全世界消除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界限。通过提供援助以及通过世界银行、IMF及像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西方让较穷的国家负债累累。

然后，西方坚持要求它们接受紧缩财政措施，通过所谓的结构调整计划，命令它们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将它们重新拉回破产之中。其结果是贫困化，教育、社会和福利开支减少，没有了培训和企业。

由于西方的新殖民主义开始取代本土经济的发展，通过独立运动使得国家团结一致的民族主义开始让位于种族和社团的分离。政府转而利用民主（尤其是选举制度）的掩饰作用建立起多数主义的独裁国家。

还有一件事需要提醒一下，作为中国人我们更不应该忘记，当19世纪初西方殖民者初到中国开展国际贸易时，他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前景：

中国在18世纪，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已经有了一个真正的国内市场，任何一个地区的供应品可以用来满足其他任何地区的需要，……。中国国内市场的兴起可以从各种专业化的商人群体的成长来衡量，诸如批发商、零售商、走南闯北的行商，上面都还有层层的掮客和代理人，他们为不同地区间的贸易服务。

除了帝国海关征收些微不足道的税款外，广袤的、人口多于整个欧洲的中华帝国是一个自由贸易区。农业生产从效益上讲是很先进的：长江下游各省专事稻米生产，稍北各省则生产为市场商品用的棉花。许多地方的手工艺人的土特产品为全国所称道，诸如景德镇的瓷器，广州的铁炊具，苏杭的绸缎等。庞大的中国航运船队来往于长江及其支流，而千百条大小船只航行于中国沿海，把南方的水果、糖和手工艺品运到满洲，而将那里的大豆和毛皮运到南方。早年一位英国观察家曾经计算过，19世纪40年代长江口上海港的货物吨位数超过了伦敦，而当时伦敦已是西方贸易的中心，因此他感到吃惊。（20）

东亚决不是一块未经开发的大陆，它早已有它自身组成的庞大而复杂的商务中心。早期西方的贸易事业，不过是在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商业渠道中，增添了一些小小的数额而已。

连亚当.斯密也能觉察到中国的"国内市场"和"欧洲各国合在一起"的市场一样大，各省之间广泛的贸易说明中国已经是高度商业化的国家，并且一向是自给自足的。（21）

面对这样一个交通发达、低关税的自由贸易区，一贯主张贸易自由的西方该是满意了吧？然而，非也。他们把羡慕、妒忌、自由贸易上的失败和技术优势立即转化为仇恨和报复，他们用罪恶的鸦片和暴力毁灭了中国的自由贸易，而要在毁灭之后建立起他们的贸易体系。于是，他们由一群商人变成了强盗、一伙毁灭他们自己所追求的东西的可耻的侵略者。西方利用他们的武力毁灭和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为了仅仅的自私自利而强加给我们国家无数的灾难。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为了掩盖西方的侵略罪恶，用符合西方逻辑的话总结说："西方意义的中国商业生活现代化之所以姗姗来迟，至少部分地是因为它已经在商业生活中有着相当大的适应性，……。中国之所以如此'落后'，是因为她太先进了。"他说明，他们要的是"西方意义的商业生活"。这就是西方推行他们的自由贸易--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但愿，我们的国家不会再次陷入西方的全球化陷阱。

---

（1） 转引自何新《斯蒂格里兹的不满》一文。

（2） “美国向世界‘透支’”，《人民日报》，2000.4.20，第7版。

（3） [法]弗朗索瓦.沙奈，齐建华译，《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65页。

（4） 参见王建等，《新战国时代》，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5） 王建，“美国的真实战略意图”，《中国经济时报》，1999.5.27，第8版。

（6）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75-76页。

（7）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4页。

（8） 王慧炯，“迎接全球化—21世纪面临的大趋势”，《中国经济时报》，1999.4.30，第8版。

（9） 韩康，“关于中国经济的弱势”，《中国经济时报》，1999.6.30，第5版。

（10）李连仲、田吉龙，“美国经济缘何增势强劲？”，《中国经济时报》，1999.4.21，第5版。

（11） 房宁等，《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280页。

（12） 《列宁全集》，第3卷，第545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13） [法]弗朗索瓦.沙奈，齐建华译，《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16页。

（14） 查.汉普登-特纳、阿.特龙佩纳斯，《国家竞争力》，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15）[法]弗朗索瓦.沙奈，齐建华译，《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15页。

（16） 查.汉普登-特纳、阿.特龙佩纳斯，《国家竞争力》，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69、191页。

（17） 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中国经济时报》，1999.8.13，第5版。

（18） 取自法国作家拉斯佩尔政治幻想小说《圣徒的营地》中的一句著名的话。

（19） 引自《贵阳晚报》，2000.7.17文章：“中国经济遭遇了什么？”（原载《新闻周刊》）。

（20）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68、59页。

（21）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里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157页。

**********

## 第五节　改革难点：农村

古语说：土广不足以为安，人众不足以为强。我们很久以来一直把"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作为一种优势。我们且不管以前的认识如何，现在的事实是，地大逐渐不博，人口日益众多。这种矛盾在中国特别是农村，更为突出。中国农村现在有9亿左右的人口，按照美国未来学家、《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文.托夫勒的意思，他们现在还生活在"第一浪潮"的世界里，停留在农业社会。不要说他们在什么时候能够像发达城市那样赶上以"知识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浪潮"，就是巨大的生存和发展困难就会令政府难于有实质性、突破性的进展。

国情专家胡鞍钢在对20世纪末的中国农村的处境进行分析时所披露的信息证明，托夫勒的说法并无有意贬低中国农村发展水平的意思。胡鞍钢分析说，虽然中国是世界上农产品生产第一大国，例如1999年中国谷种产量占世界总量的22%，油菜籽占23.8%，花生占38.2%，肉类占26.3%，烟草占34.9%，水产品占29.5%，但是农产品出口额（2000年为122亿美元）仅占国内农业附加值的7%，占全国出口额的5%，占世界农产品出口额（5580亿美元）的2%。中国农业劳动力是美国劳动力的100倍，而美国农产品出口额（约520-600亿美元）是中国农产品出口额的4-5倍，中美两国不仅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差极大，而且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人均农产品出口额差距极为悬殊，约为400-500倍之间。从农村居民家计调查看，1997年人均农民出售农产品

收入为1092元，到2000年下降为600元，约下降了45%。其中，据农业部估计，2000年全国农民因粮食一项减少收入约1100亿元，人均减少约125元。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是世界上"壕沟"最大的国家之一，同时既缺乏国家和社会对农民的经济补偿机制，也缺乏9亿农民影响国家决策和利益表达的政治民主参与机制。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2/3，但是政府财政用于农村发展的各类支出仅占总支出的10%-15%，占GDP总量比重的1%。因此，胡鞍钢呼吁，"加入WTO之后，中国政府将承诺遵守WTO规制和相关协议。但是中国政府更应对中国人民特别是8亿农民作出承诺，当农民利益受到农业贸易自由化的损害时，能够给以利益补偿，使他们避免成为最大的输家。"（1） 就是说，要使中国9亿农民不致成为"双赢"背景下的受害者。

西历21世纪初，中国农村面临的问题是严重的和多方面的，"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的一个焦点。但我认为，农村问题归集起来主要表现为：农村收入低且负担沉重、教育水平跟不上、环境日趋恶化以及国民待遇如身份、招工、高考取分等等问题。如果这种境况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和改善，其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将逐渐下降，并将威胁城镇工业乃至全国总体经济的发展，严重则影响社会稳定。古人常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我以为，在当世，这个民心首先应该是农民之心。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2） 还是让我们先从农村土地、水资源和人口等三个方面，详细考察一下当今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吧！

## 一、土地问题

土地，是国家的原始基础，是民生的直接依靠。所谓"箕子陈谋，以食为首"；"洪范八政，以食为先"，强调的就是只有土地特别是耕地才能给予生民以生存。后来，荀悦说得更明白："土地者，天下之本也。"用散文家的语言说就是："土地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她养育了我们，为我们提供了居所，令我们感受了快乐，使我们的人生丰富多

彩；从我们第一声啼哭到最后在她怀中安息的所有时刻，她都用她那神圣的、母亲的背膀包容了我们所有的人！"（3）

然而，中国从古至今的地理自然条件和土地制度并非如散文家笔下的叙述那么浪漫和温馨。

从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看，灾变论者任不寐援引1999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灾荒史记》的综述说：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历史上发生的自然灾害实已无计其数。数千年来，中国的自然灾害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普遍性。……战争也是造成灾荒的人为条件之一。…中国历史上，掠夺战争相当频繁。……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自然灾害对于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中国幅员辽阔，环境条件复杂，致灾因素和灾种较多，如：中国大陆地处中纬度，东濒太平洋，西为世界地势最高的青藏高原，海陆大气系统形成复杂的反馈关系，大气中极地高压与热带高压的消长，季风的影响，太平洋环流海温的巨变及厄尔尼诺现象对大气环流和风暴源的作用都严重影响着我国的大气形势，加之大陆区多变而剧烈的地势起伏，植被覆盖率低，地下放热放气的影响等，都是造成我国气象与海洋灾害众多的因素。中国强烈宏大的环太平洋构造带与地中海--喜玛拉雅构造带交汇部位，地壳活动剧烈，地形变化复杂，因而成为世界上地震与地质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国生态环境多样，具有多种病、虫、鼠、草害滋生和繁衍的条件。"

最后的结论是："有史以来中国人就是在抗御和战胜自然灾害斗争中发展建设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整个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同自然灾害的斗争史。"

在这种情形下，灾变论便成为在继"官场社会"之后，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特征并形成"灾民社会"观念的一种新理论。该理论分析说：

中国是一个多灾之国，这是中国地理的一个基本特征。自西周至清末约3000年间，共发生大灾荒5168次，平均每年发生1.723次。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本世纪以来全球发生的54起特大自然灾害中，中国就有8起，占15%；因灾死亡人数约占同期全球自然灾害死亡人数的44%。中国社会是一个灾难气氛笼罩下的灾民社会，这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近40年来，中国平均每年都因自然灾害造成数万人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500-700亿元人民币，近年已达到1000亿元以上，并继续呈不断扩大的趋势。1950年到1992年43年的时间里，中国灾害损失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5.09％，美国1991年的同类数字是0.27％，日本是0.5％。

中国至少有13个省会城市和京津两市分布在地质灾害集中的区域。其中32.5％的国土和45％的大中城市均位于地震高烈度区（大于7度）。

在中国历史上，仅有记载的地震就有8137次，其中1004次为6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从1303年至今，发生8级以上强震17次。其中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县的大地震造成83万余人的死亡，居世界震灾史上死亡人数之首。1976年唐山大地震让人类至今谈虎色变。从1501年到1900年的499年中，发生有害地震419次。在全球历史上死亡人数大于5万人的17次大地震，有7次发生在中国，其中死亡人数大于20万人的4次大地震全在中国；全球7级以上的陆源地震，有30％发生在中国。有人统计中国平均每年因地震死亡2000－3000人。

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1949年的2155年间，共发生较大水灾1029次，较大旱灾1056次，几乎平均每年都有一次较大的水灾和旱灾。1949年以来，重大的天气和气候灾害平均每年达25次之多，干旱和洪涝面积平均每年达2733万公顷，登陆台风平均每年7次，均居世界各国之首。根据《洪荒启示录》一书提供的统计字，1950年至1980年仅水灾平均每年经济损失150－200亿元。"我国是一个多山多暴雨的国家……各大江河中下游平原共约7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是我国最精华的地区，集中全国半数以上人口和70％工农业产值，这些地区地面高程有不少都处于江河洪水位以下……洪水问题就更为严重。" （以上引自任不寐《灾变论--寻找另一个中国》）

中国恶劣地理自然条件自然使中国农村和农民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但是，另一方面，土地制度的形式和反复变化也使中国特别是农村处于不断的动荡之中。

在世袭政治时期，中国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 土地是全国最大的地主--皇帝--的"私有"财产,土地所有权归皇权所有 ，全国所有的土地都是皇帝的。虽然直接使用和经营土地的包括皇族、地主和自耕农,但皇族、贵族和地主不但直接控制着绝

大部分的全国土地，而且这些人还有绝大部分土地的占有权和所有权。因而世袭政治时期的土地制度是皇帝（代表"国家"或者"家长"）所有制。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所以，自夏朝开始，中国的绝大部分农民，从没有直接拥有过土地。他们要么为佣，为主劳作；要么租地而耕，为地主创造财富。

几千年过去了，到孙中山推翻皇帝世袭制度时，仍希望"耕者有其田"，不过始终没有做到。但政党政治制度的变革，使中国的土地制度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民国以后，皇权土地从此没有了，随着"土地私有化"的发展，直接拥有土地的地主成为土地的真正主宰。因此，中国土地制度形式从皇帝所有制，转向了"地主私有制"。只不过，这种土地私有制度，不是现代意义的土地产权制度，其私有程度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是，这种土地制度的变化，至少说明土地拥有者对土地有了更多的自由权利。当然，这种转变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形成的。中国"土地私有化"发展是从元明清时代开始的。在明朝万历年间（16世纪末），除所谓的官公田外，地主私有耕地占了全国的50%。到清朝光绪年间（1887年）这个比例达到81.2%，到民国时期（1929-1933），这个比例上升到93.3%。（5）这种"土地私有化"的倾向，是有别于其它历史时代的。伴随清末"土地私有化"的是工商业私有化的发展，也正是这些因素，促进了中国资本商品市场的发展。然而，这种发展遭到了西方殖民者毁灭性的打击。当人们再次在中国看到商品市场经济的时候，已经是20世纪末期了。

民国初期，随着"土地私有化"的发展，全国土地迅速向地主集中。"地主所有的土地占首位，富农仅次于地主，富农中有不少是出租土地，具有半地主性质。地主、半地主或富农占全国农户不到10%，而占全国耕地的60%上下，而且多数是上中等的好地和水田。"也就是说，全国90%的农户只有占全国40%左右的耕地。（6）自耕农、半自耕农无地化日趋严重。南京国民政府于1930年6月颁布的《土地法》和国民党中央于1941年12月颁布的《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一定程度上肯定和助长了这种"土地私有化"的进程。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希望成为广大农民的泡影。国民党没能实现孙中山的志向。

与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政府于1928年12月，颁布了一个井岗山《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是中国第一个废除土地"皇权所有制"和土地"地主私有制"的土地法。此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1931年11月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因其受"左倾"教条影响，土地改革没有取得成功。1936年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指出："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又经过若干年实践摸索后，中国共产党于1947年10月正式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十六条）》。这个和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具有同等政治影响的《土地法》使民众迎来了一个新中国。之后，1950年新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彻底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最根本的变革，使亿万农民分到了土地，真正实现了孙中山"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愿望。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地权"，仅仅是指土地的使用权或者经营权，并不包括土地的占有权和所有权。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民国及其以前的各个历史朝代一样，未能彻底解决中国土地产权制度问题，全国土地笼统而又模糊地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加上农村产业政策的反复和变化以及城镇、乡村土地管理的不到位，使中国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土地问题面仍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总结起来有五个方面：

第一，城镇化的影响。20世纪末我国城镇化水平只有36%左右，21世纪中国城镇化水平将加速发展，耕地势必越来越少。同时，我国东部国土面积占全国国土的14.2%，却集中了全国城镇人口及城镇数目的一半；中部国土面积占全国的29.2%，城镇人口及城镇数目占全国的1/3；西部国土面积占全国的56.5%，而城镇人口及城镇数目只占全国的1/6左右。东西部人口、城镇与土地差距很大。

第二，人口增加和环境恶化的影响。据统计，1991-1995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68.28万公顷；到20世纪末，全国被污染的农田面积达到1.5亿亩；每年因干旱受灾的耕地约有4亿亩。随着工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环境政策要求大批不适宜耕作的土地退耕还林，同时农村不断增长的人口又需要更多的土地作为生存依靠，农村土地争夺异常激烈。

在西历20世纪末的最后一年--2000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出台，二是北方连续遭到沙尘暴的大规模

袭击。沙尘暴主要产生于北方西部地区对土地的不合理开发，而西部地区（包括西南和西北）的大开发政策的出台，直接起因是西部已落后了东部地区许多年。然而，要开发，就会出现环境问题；要治理环境，又没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开发。这是难解的一对矛盾体。

美国国土面积937万平方公里，比中国陆地仅少23万平方公里，基本相当。不可否认，美国可耕地占国土面积的40%，而我国仅占10%；整体气候条件比我国要好。可是，美国开发利用国土和统一国内市场的政策的确值得我们研究。美国1776年独立，80年以后，到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进行第一次西部开发。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进行了第二次西部开发。每次持续30余年。而且，每次开发，均是以法律作为先导支撑，有专门机构负责，军事工业倾斜，科技产业入驻，所以美国西部开发取得了成功。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西部开发的法律基础。1862年《宅地法》、1873年《鼓励西部草原植树法》、1877年《沙漠土地法》、1878年《木材石料法》等等，这些法律对推进西部开发，保护环境，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同样，1961年《地区再开发法》、1962年《加速公共工程法》和《人力训练与发展法》、1964年《经济机会均等法》、1965年《公共工程与经济开发法》和《阿巴拉契亚地区开发法》、1972年《农村发展法》等等，对西部地区的再开发，促进西部经济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美国西部开发给我们一个可能是最重要的启示是：美国国内市场的统一。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第二次西部开发完成以后，美国国内贸易大约等于对外贸易的20倍，甚至超过了当时世界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我们有什么呢？从目前来看，西部开发主要是国家行为，通过国家兴办各种大型工程如西气东送、南水北调、兴建机场和铁路等等来促使西部各省跟着开发和发展，国家主要依靠对大型项目的投入来带动西部开发，如果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开发行动，只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措施，国家没有统一的具体法律来鼓励最广大民众的"历史首创精神"积极参与，恐怕大开发的效果是很难估计的。搞得不好，三个结果：环境破坏、资源浪费和开发回报不理想，更不用说目前版块市场、城乡市场和民族地域市场各自为政局面的充分融合和统一。

中国现有耕地约9572万公顷，为世界耕地总面积的7.7%，占世界第4位；仅中国北部和西部的牧区与半农半牧区的天然草地约3.17亿公

顷（另一数字为3.53亿公顷），为世界草地总面积的10%，居世界第3位；中国有林地面积约1.25亿公顷，占世界森林总面积的4.1%。居世界第8位。但中国人均耕地按统计约0.1公顷，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3；森林覆盖率仅13%（世界平均覆盖率为22%），列世界第121位，中国每人占有林地约0.12公顷，仅为世界平均数的1/5强；天然草地稍多，中国每人占有约0·35公顷，也不及世界平均数的1/2。农、林、牧用地总和，中国平均每人占有0.54公顷，最多也不超过0.67公顷，仅为世界的1/4强至1/3。

到20世纪末，我国耕地面积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3.7%。在世界五大土地资源国家中，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最低，仅有1.59亩/人。俄罗斯人均耕地面积13.1亩/人，加拿大25.9亩/人，美国10.9亩/人，印度2.85亩/人。人口和土地特别是耕地资源矛盾异常尖锐。可是，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我们在20世纪的最后4年（1997-2000），因建设占用、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和灾害损失等共减少耕地5161万亩，同期通过开垦荒地、土地复垦整理补充耕地2467万亩，增减相抵，全国耕地净减少2694万亩。在这种情形下，在21世纪头10年，在我国西部陕、甘、宁、川、青、新等省区还要退耕8700余万亩。本身我国在21世纪初人均占有粮食仅在400公斤上下，接近世界粮食危机线人均占有量370公斤水平。（7） 如果我们的西部大开发，对土地制度不像美国当年那样，采取特殊政策，充分依靠广大民众的力量，保护环境及土地，其中特别是保护耕地资源，并在基础之上再求发展，恐怕开发结果是很难令人满意的。

第三，土地沙漠化、荒漠化和石漠化的影响。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土地面积较大、危害严重的国家之一。到20世纪末，全国有荒漠化土地267.4万平方公里（其中新疆荒漠化104.4万平方公里，内蒙65.9万平方公里，西藏43.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9%。其中全国沙漠和沙地（沙化土地）已达到174.3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8.2%，西北、东北、华北13个省市区每年有3436平方公里的土地沙化。。全国森林覆盖率只有16.55%，人均水平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五分之一，比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巴西、澳大利亚等地理大国差距多多，甚至比日本64%的森林覆盖率低47.45个百分点，人均水平只有日本的60%。因沙化和干旱缺水持续影响我国华北、东北和西北地

区，沙尘暴袭击我国已越来越严重，其中特大沙尘暴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5次，60年代发生8次，70年代发生13次，80年代发生14次，90年代多达23次。2002年3月，我国遭受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强烈的沙尘天气，强沙尘暴席卷北方140万平方公里（其中包括428万亩耕地和3540万亩草地），遍及8个省市自治区的120多个县，影响人口达1.3亿。尽管我国从1978年开始，开展了作为"十大生态工程"之一的"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防护林工程，但沙尘暴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减弱。1998年4月，西北地区沙尘暴，使156万人和46.1万亩农作物受灾，11.09万头（只）牲畜死亡或者丢失，直接经济损失达8亿多元。卫星图片显示，中国中北部的两个大沙漠正在不断扩大，现已基本合并成为一个横跨内蒙古和甘肃两省的大沙漠，被视为华北沙尘暴之源的内蒙古最西部阿拉善地区，是我国著名的由巴丹吉林沙漠（4.43万平方公里）、腾格里沙漠（4.27万平方公里）和乌兰布和沙漠（1.15万平方公里）构成的第二大沙漠区，仅次于位于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33.76万平方公里）。该地区由于降水减少、过度放牧以及植被破坏，沙漠化和沙尘暴日益严重。20世纪"50年代该地区有梭梭林1700万亩，到90年代只剩下300万亩残林。覆盖度由原来的30-50%下降到10-15%。"相应地，该地区"70年代沙尘暴每年不足0.5天，强度弱，危害轻；90年代以后，每年均有数次沙尘暴天气，而且强度大，危害严重，每次都对当地工业、交通、通讯、农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8） 由于土地沙漠化、荒漠化以及干旱的影响，在黄土高原土地总面积约60万平方公里中，水土流失面积就达43万平方公里，占去了72%。

素有"绿色净土，北国碧玉"美誉的内蒙呼伦贝尔草原，由于毁林开荒、垦草种粮、过度放牧和污染等原因的影响，大片大片昔日的绿草地，现已严重退化和沙化。其中，轻度退化1717.8万亩，占退化草场面积的54.6%；中度退化1169.7万亩，占35.5%；重度退化310.8万亩，占6.9%。专家不得不呼吁："拯救呼伦贝尔草原"。（9）

与北部地区沙漠化形成对比，西南多山地区的石漠化，也越来越突出地成为一个环境问题。到20世纪末，我国石漠化土地平均每年以2500平方公里的面积扩大，比北方沙漠化速度尤快。其中，贵州石漠化面积5万平方公里，广西4.7万平方公里，云南也呈加速趋势。石漠

化的显著特征就是土层流失，荒石外露。在云、贵、桂三省约28万平方公里的喀斯特地区，有3000多万少数民族和贫困人口受到石漠化的影响。受石漠化影响最严重的贵州省，岩溶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73%，有94.6%的人居住在喀斯特地区。全省严重石漠化土地达2415万亩，此外，短期内潜在此趋势的耕地约有967万亩。由于泥沙流失，耕地减少，2000年12月23日，CCTV-1《新闻联播》指出，"以目前的速度，若干年后，贵州省的农村将无地可种，一方水土难以养活一方人。"（10） 其中，贵州黔中地区三岔河流域，包括毕节、六盘水、安顺、贵阳等地市的11个区县（市）水土流失117.6万多公顷，占总土地面积的的55.78%。该区域内已有石漠化面积86494公顷，占总土地面积的4%，流域内的威宁、纳雍县每年分别增加石漠化面积2142公顷和533公顷，增速十分惊人。（11）

第四，水土流失面积扩大，土地酸化、盐渍化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在建国初期为150万平方公里，到20世纪90年代已经发展到179.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8.6%。全国每年流失土壤50多亿吨，占世界陆地剥离泥沙总量的8.3%，长江已经成为第二条黄河。水土流失造成侵蚀表土，养分流失，每年平均减少耕地6万公顷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约100亿元。20世纪80年我国的酸雨仅限于局部地区，以华南和西南为重。到90年代已扩大到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地区，形成了华南、西南、华中、华东沿海、北方等几个酸雨集中区。其中，重度酸雨区面积约为200万公顷。另外，我国现代盐渍土约有3690万公顷，残余盐渍土约有4487万公顷，合计面积占国土面积的8.5%，此数字还不包括潜在的盐渍土约1733万公顷。（12）

第五，农村土地制度的影响。共和国建立以后，手无寸土的农民，都分到了土地。可是50年过去了，今天农民手中的土地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具有一定期限的契约。很多村官，更使受传统"铺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影响，还往往无视契约的法律地位，强而征之。加上农村生育率远大于城镇，农村人口剧增，无土之民渐多，流民渐众。同时，农民手中的土地只有使用权，所有权是国家的。也就是说，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是"均田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但不是把土地所有权给农民。城镇土地所有权归国有，这个"国"就是代表全国人民的集体；广大农村土地所有权属村集体所有，这个"村"就是由民众组成的

集体。这在最新的《土地法》中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集体所有制。""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集体所有。"从所有权上讲，个体的农民没有一寸土地。分到的土地包括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只有使用权。由于农村土地的使用比城市国有企业的营运效率还要低下，因此，深入关注这个问题的人就不能不提出"中国农地集体所有制向何处去？"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13） 以及呼吁"尊重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14）

然而，有谁来为农民说话呢？在中国农村，自从20世纪土地革命时期世界上最有组织性的中国农会在几经变革而解体以后，21世纪初的中国成了世界上农民组织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有农业专家明确指出："现在中国的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全世界的农民都有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中国的工人、妇女、青年也都有自己的协会，农民却没有。"（15）

从现实我们也已看到，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和权利又没有为自己利益代言的中国农民成了中国社会中最无助的最大群体。

有一篇网文 （16），介绍了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由张春根先生著作的《县域论》一书中关于土地制度和土地改革的主要观点,很值得注意：

现行的土地制度是土地改革，也就是重新均田后，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进行集体化、人民公社化失败后的一种过渡性模式。国家对现在土地承包使用权一次宣布十五年不变，再次宣布三十年不变，说明这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暂时性办法。一个国家在土地问题上，不能仅仅宣布一个几十年的政策，在准备依法治国的今天，更应建立一种稳定的制度。目前的这种土地政策说明国家决策层在这方面的两难困境，一方面知道农民不长期拥有土地，农民不愿在土地上投入，另一方面如果将土地产权再次还原给农民又担心，一两代后，随着土地向有效使用者手中的集中，城市无力吸纳剩余的农业劳动人口，造成新的社会矛盾，同时还害怕土地撂荒造成耕地浪费，因此在相当程度上陷入害怕农民离开土地后不能成功转移到城市经济中去，又想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效益的二难境地，与之配套的现行的粮食流通政策也是两

难处境的产物。这种两难境地也透露出了国家决策层对近几十年内几亿农业剩余劳动力能否成功转移到现代城市的二、三产业持有怀疑。

张先生的观点是一针见血的。在传统的土地制度观念上，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农民手中有没有和有多少可供耕种的土地及其应尽的义务，而很少注意到农民对土地所应拥有的权利。事实上，恰恰是国家土地产权制度在决定和影响着国家的发展方向。历史上，一个朝代的开国之初，鼓励农耕，农民无偿获得土地，政策优惠，农业发展，国家殷富。接着，财富集中，农民土地产权得不到法制保障而受到无情兼并。接着，自耕农减少，收入降低，国家税赋增加。结果，土地富有者，荒芜不耕；土地贫瘠者，耕不足饱。结果，引来农民革命，朝代更替。王家范先生对中国传统农业产权制度对国家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有更深层次的研究，这里我们不妨转录其观点，以供比较参考。

农业产权的模糊和富有弹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特点。我们通常所说的"所有制形态"，实际应正确地界定为"产权形态"，而产权形态应包括三个层次：（1）使用权（或可称"经营权"）；（2）占有权（罗马法称"收益权"）；（3）所有权（罗马法称"处置权"）。从世界历史上看，土地私有产权的产生和发展正是沿着这个秩序由浅入深地演进的，但在大多数历史场合，三权集中统乎一身的情景在传统时代并不常见。就中国传统社会总体状况而言，产权的"国有"性质，植根于政治制度化与产权非制度化的体制环境，通过政治的、经济的一系列政策，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表现得无处不在，根深蒂固。长期被看作为"私有"形态的土地产权，细细考察就不难发现：它在收益权和处置权两方面都不独立、不完全，不论是自耕农还是地主私有土地，始终受到政治权力系统"主权就是最高产权"观念或强或弱、或显或隐的控制，处于"国有"的笼罩下，朝不虑夕，私有制极不充分、极不纯粹。直至明清，三种权力仍处在被分割的状态，没有纯粹的、能不受任何意志干预、由所有者自由处置、转让与买卖的土地私有制。总之，在传统中国，私有制的发展不是太早、太多，而是太少、太不充分，缺乏健全发育的法制保障。如此，中国进入现代的艰难才可以被理解。（17）

历史学家启良对中国土地的"国有"性质也有独到的认识，他说：

公有制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但是此种公有制只是国有制、王有制。具体说就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土地一直是国有的，而且这"国有"也还只是一种假象，实质上是王有。谁登上了最高权力的宝座，谁也就拥有了江山社稷。所谓"江山社稷"，所指的主要就是土地；所谓的"家天下"，指的也是对全国财富的垄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最真实最恰当地概括了中国古代社会土地的所有制状况。（18）

以上是对中国土地制度历史状况的经典总结。

二、水资源问题

我们居住的地球表面，有29%是陆地，有71%是水面；可是，在全球水资源总量中，有97.5%是咸水，只有2.5%是淡水；在全球淡水资源总量中，有70%冻结在南极和格陵兰的冰盖下，29%在土地中和在深层地下，只有不到1%的淡水资源可供人类直接利用，详见图8-3。中国是世界上的缺水国家之一，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近4亿人处于绝对缺水状态，年人均水资源量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量的四分之一（全世界年人均淡水资源量约为7300立方米）。

图8-3 世界水资源结构

中国土地是东西矛盾突出，而水则是南北矛盾突出。全国水资源总量约为27000多亿立方米，长江及长江以南的水资源占全国的82%，但耕地面积却只有全国的38%；其中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则用6.5%的水资源灌溉着全国40%的耕地。所以，近期矛盾突出的在华北黄河流域地区。（19）

到21世纪初，全国灌区每年缺水300亿立方米，城市缺水60亿立方米。全国600多个建制市中，有近400个城市缺水，其中缺水严重的城

市有130多个。在中国水资源严重短缺情况下，我国供水资源利用率却很低，城市管网漏水率超过20%，浪费供水资源1/5。同时，我国大部分河流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到21世纪初，全国主要河流（水系）60%以上的河段水质因污染严重而丧失饮用水功能，长江岸边污染带已长达560余公里，长江下游河网地区污染河长已达73%，其中江苏境内污染河道为80%，上海则为90%，而江南运河已被全程污染。长江、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两区（二氧化硫污染区、酸雨污染区）、一市（北京市）和一海（渤海）成为全国污染突出地区。全国年排放废污水总量近600亿吨，其中80%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域，有50%的河段、90%以上的城市沿河水域遭到污染。（20）（21）（22）（23）

江河湖泊污染严重，受其影响，我国沿海海域出现了严重的赤潮污染。20世纪60年代，我国很少见到赤潮。到21世纪初，赤潮则成了我国海洋污染之大患。1998年发生赤潮22次，2000年5月浙江舟山海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赤潮，绵延80公里，污染面积达7000平方公里。给海洋生态带来了严重破坏。

黄河，有200万多年的历史。

黄河，从西历前1766年至1945年的3711年中，有大旱成灾记载的达1070多次，其中清朝就有201次。

黄河，从西历前602年（周定王5年）至1938年的2540年中，黄河洪水横流，决口泛滥的年份有543年，共计决溢次数达1590次，其中一些年份决溢多次，其间大决溢造成的黄河大改道至少26次。西历755年（唐玄宗开元14年），黄河决于河北沧县河涧一带，淹死人数达100多万人，相当于4个唐山地震。

黄河，截止1990年，黄河流域内建成的大小水库3147座，总库容量574亿立方米，而黄河年径流量才580亿立方米。

黄河流域，年用水量30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占90%。但是，农业灌溉水利用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均在40%左右。每年有黄河总用水量一半以上的水资源被浪费掉。

黄河流域的干旱和决溢泛滥，是华北历史上水资源问题的两大课题。到20世纪末，黄河的决溢威胁减少了，但干旱威胁越来越大。对北方具有重要生存意义的母亲河--黄河，自1972年开始出现断流以

来，七八十年代断流长度为250公里，九十年代达到400多公里，到20世纪末达到700多公里。1997年黄河河口附近断流时间创历史纪录达到282天。除黄河以外其他河流的断流以及河流、湖泊水位降低也日趋严重。1949年全国河道通航里程为15.77万公里，1985年减少为10.9万公里，到1990年就只剩下7万公里。1977年全国大于1平方公里的湖泊有2848个，总面积80645平方公里；到1985年就只剩下2305个，总面积只有71787平方公里了。（24） 面对日益严重的水资源问题，在20世纪末，政府不得不提出异常艰巨的南水北调工程：东线从扬州引长江水，经淮河、黄河入天津；中线从长江支流汉江上游引丹江口水库的水，经华北入北京；西线从长江上游的大渡河、雅砻江和金沙江引水入黄河上游。之所以要南水北调，就是因为黄河严重缺水。这个将耗资5000亿元巨资的人类第一水资源调配项目，已于2002年年底正式开工。

水资源问题就应用而言，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民生活饮用水问题，二是工农业生产用水问题，三是水能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人民生活用水和工农业生产用水，都因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污染等因素的影响日趋紧张，生活和生产用水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相反，中国水能资源蕴藏丰富，却缺乏开发，利用率低。

全国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6.76亿千瓦，年发电量5.92万亿千瓦时，其可开发装机容量以及年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位。然而，到1999年，全国实际装机容量以及年发电量开发利用率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比世界发达国家更是差之甚远（见表8-5和表8-6）。而占全国水能资源可开发利用70%以上的西部，由于种种原因，开发利用率更低。更为严峻的是，中国每创造1美元的GNP，其能耗却相当于德国的4.97倍，日本的4.43倍，美国的2.1倍，印度的1.65倍。开发利用率低和能耗高成了中国水能利用的两个关键性问题。

所以，在21世纪，中国所面对的水资源问题将有三大课题：南方与北方的生产与生活用水的大调整、东部与西部水能资源的大调整以及大量江、河、湖、海的大面积污染治理。这些都是摆在政府面前的具有重大决策意义的问题，历史任务繁重。

表8-5 中国水能资源及利用情况

水能指标 单位 数值 比值 与世界比较

水能可利用量 装机容量

年发电量 亿KW

万KWH 3.78

1.92 占理论量55.92%

占理论量32.43% 水能蕴藏量6.76亿KW，居世界首位,占世界1/6

1999年水能利用 实际水电装机容量

万KW

7000

占可开发量18.52%

占全国总装机容量23% 水能利用率发达国家在70%以上，中国低于世界平均19%的水平。

实际水电年发电量 亿KWH 2000 占可开发量10.42%

占全国年总发电量17%

西部水能资源 水能蕴藏量

可开发利用 亿KW

亿KW 5.57

2.74 占全国82.3%

占全国72.3% 水电资源主要集中在长江、黄河的中上游，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珠江、澜沧江、怒江和黑龙江上游，这七条江河可开发的大、中型水电资源都在1000万kW以上，总量约占全国大、中型水电资源量的90%。

表8-6 中国与世界电力指标比较（1997年）（25）

电力指标 人均装机容量
（千瓦/人） 人均发电量
（千瓦时/人） 人均用电量
（千瓦时/人）
1.美国 3.1 13198 13434
2.俄罗斯 1.46 5671 4963
3.中国 0.21 917 893
4.英国 1.22 5832 5380
5.西班牙 1.23 4800 4104

三、人口问题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到2000年末超过处于世界人口第二位的印度近3个亿，达到12.9533亿人（其中大陆12.6583亿人，港澳台及福建金、马诸岛人口2950万人）。

从历史发展角度说，中国人口的变化在清朝以前有一个明显的规律：即战乱和灾荒决定了全国人口数量。每个皇朝末年，土地兼并严重，流民溢多，农民起义蜂起，战乱频繁之时，人口必然锐减。新兴皇朝安定繁荣之时，全国人口又急剧增加。中国从西历前21世纪，大禹"平水土，分九州，数万民"，首次统计中国人口（当时约1355万）以来，一直至明朝末年，其人口发展变化都遵循这个规律。在这个时期，中国人口始终在1400-8700万人之间变化。这个循环规律，有史家总结说：

我们的祖先，对于"富""庶"之道，没有十分讲求，不知发挥经世的学术，来维持均衡，只有受自然淘汰率的支配了。大乱之后，人口减少，有荒可垦，田产敷用，人民安居乐业，生活程度也略为提高，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似一天，荒地一天减

少一天，土壤不知改良，水利不知兴修，生产力减弱，消耗力增强，生活程度就得降低。老百姓莫名其妙，只有烧香拜佛，嗟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士大夫阶级和政府当局很少明白其中的道理。纵有少数人"负经世之志"，亦无"经世"之力，只好听天灾人祸自然演化。所以我国有"三十年一小乱，一百年一大乱"的俗语。一遇荒年，土匪蜂起，民不聊生，于是小乱变为大乱。等到相争相斫以后，人口自然减少就"乱极思治"了。（26）

但是，从前清以来，中国人口发展就失去了其原来所遵循的规律，接连发生了三次突破性变化，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人口头号大国。第一次是1753年中国人口突破1亿；第二次是1949年中国人口突破5亿；第三次是1981年中国人口突破10亿。我们以为，这三次变化都是与土地政策有直接关系的。

清朝建国以后，全国土地制度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土地制度仍然是皇权所有制。但是，清朝政府在康乾时期，实行的土地政策使全国广大农民间接拥有了大量可供耕作的土地，民众得到休养生息，人口繁衍自然加快。这些政策，主要包括鼓励垦荒、停止圈地和大蠲赋税三项政策。

鼓励垦荒政策起于前清顺治年间（1644-1661），政府为增加耕地面积，安置流民，以荒地拨给无地之民，并以延时起科为鼓励，全国耕地和有地之民同时急剧增加。1661年（顺治18年）全国耕地仅549万余顷，到1685年（康熙24年）增加到607万余顷，到1724年（雍正2年）增加到723万余顷，63年间全国耕地净增加174万顷，增长近32%。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清政府在鼓励垦荒的同时，主动停止了圈地政策。1669年（康熙8年）清政府正式下达停止圈地令，宣布将所圈占的土地退回给原主。这不但使广大农村增加了自耕土地，而且还逐步改变了几千年来土地占有关系。随着垦荒地、圈占地和官公田逐步流向私有地主和自耕农民，清朝土地私有开始得到快速发展。到清光绪年间（1887年）全国耕地私有率达到了81.2%。

清朝在耕地扩张、税收增收和社会逐步稳定的同时，开明君主为了巩固其取得的成就，进一步安定民心，持续采取了蠲免政策，即对按照规定应交纳的赋税实行免征。从1686年（康熙25年）开始，一直

到乾隆末期，这项政策得到长期施行。开始是"一年蠲及数省"或"一省连蠲数年"，后"普免天下钱粮，三年而遍。"为使蠲免惠及百姓，康熙还下令"嗣后凡遇蠲免钱粮，合计分数，业主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后来，雍正、乾隆均继承了康熙的这个安定之策，一直持续到嘉庆初年。

在整个前清时期[1644-1796]，由于清政府的鼓励垦荒、停止圈地和蠲免政策的持续施行，使广大农民得到了实惠，生活安定，全国人口在康熙"盛世兹生人丁，永不加税"的鼓励下，得到飞速增长。清朝初年全国人口降到了以往人口变化的下限1400万人，到1753年[乾隆18年]全国人口突破1亿，增长了7倍多，仅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这种人口升势一直持续到咸丰初年。

中国人口从后清到1948年（民国37年）的150多年的时间内，一直在5亿人以内变化（1930年曾微过5亿）。到1949年，中国人口出现了第二次突破性发展，大规模地破5亿关口，达到5.48亿人。毋庸质疑，这个结果是与中国共产党1947年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并在整个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北等解放区进行广泛深入的土地改革分不开的。"到1949年上半年，使1.5亿人口的地区迅速完成和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如果一个国家有土地均分法，并实行均田的话，那么虽然没有什么工艺，人口也是会很多的，因为每个公民从所耕种的土地就能获得所需要的一切食物……。"（27）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使中国农民实现了几千年前农民起义所提出的"均田地"的愿望，享受到了"耕者有其田"的喜悦，5亿人口也并未超过中国宽阔国土的承受能力（有人曾论证，中国最佳人口规模在6亿人）。一定程度上说，是土地改革赢得了中国革命的最后彻底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基数庞大，中国人口同其他物质财富一样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1954年超过6亿人。第2年，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敏锐地注意到了中国人口这样发展下去的严重性。1957年马寅初正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新人口论》，明确提出，要解决中国人口增长同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唯一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不幸的是，他的理论遭到了无理的批判。于是，国家人口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意见不统一，60年代人口失去控

制，到70年代开始注意到"人口非控制不行"（毛泽东语）时，中国人口已经超过了8亿，改革开放后，真正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中国人口已经离10亿不远了（1978年9.6亿）。

中国人口的第三次突破性增长--突破10亿大关，一方面原因是人口政策的彻底失败，另一方面的原因还得从土地政策上去找。新中国成立前后，刚分到土地的农民，基本上是独立单干，生产积极性高，基本生活得到保障。1958年人民公社产生，所有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归人民公社，那些群居在一起的农民被"集体"捆绑成为一个个"生产队"。农民手中只有少量的自留地，作为"副业"基地，以资补充社员生活所需。但自留地所有权仍属于"集体"。从那以后，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农民等于是被剥夺了大量原先分给他的土地使用权，只能参加集体劳动以取得主要生活来源。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政府在"承包到户"的名义下，又才将土地 "还给"农民（仍然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并给予农民一定的生产自主权。这一改革，使中国农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刺激了中国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的飞速发展。

中国人口乘改革的春风用3年时间于1981年登上了10亿关口。我不是说，农村经济承包责任制不好，不是说农民不应该获得具有自主使用权的土地。我是说，在人口政策的不稳定和不坚决的情况下，土地政策的变化将引起人口的显著变化。如果后来没有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恐怕中国人口在20世纪末早已超过中国人口发展的第4个关口--15亿。中国人口自1753年上1亿以后，1949年达到5亿花了196年；1981年超过10亿仅花了32年；看看达到15亿我们需要多少年？！

如果说，中国土地问题是东西矛盾突出，水资源问题是南北矛盾突出，那么，人口问题则是城镇和农村的矛盾突出。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一书中，把中国一分为二："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是农村中为数极多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那里每棵树林掩映的村落和农庄，始终占据原有土地，没有什么变化；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产者和有权者的家庭。"（28） 我国自1958年1月1日起实施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后，城乡之间便有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现在，我们说的中国进步了，实际主要是指城镇中的那个中国，而广大

农村的"另一中国"却长期处于积弱状态。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总数近9个亿。农村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到20世纪末，农民月人均收入还在180元左右，比不上城镇下岗职工的最低生活保障。（29）

精于计算、善于理论分析的美国经济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于1997年6月在北京大学做"美中经济发展的比较"演讲时讲过，"以农村和城镇人口的比例比较，中国还处在美国1890年的水平；以实际全民人均收入而言，中国正处在美国1897年左右的水平；若以农业劳动所占的份额而言，目前中国正处于美国1880年的水准。但如果就教育而言，中国受中等教育比例已达到美国1970年的水平。换言之，中国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并非处于同一水平，某些领域发展得很快，但有些方面则相对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沾上农村的指标，与美国的差距都在100年以上。在20世纪末中国农民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农产品价格逐年下降、收入减低、子女教育负担沉重、生活困难等等问题。对此情形，我们显然不能预言，中国将在何时取得伟大进步，两个中国（指城镇和农村）均衡发展，实现国内经济一体化，真正达到全国（特别是农村）的现代化。然而，现实的经济改革自打把眼光从农村转入城市以后，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显然被放在了次要地位。中国农村，大部分处于地理位置偏远、多山、交通不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农村绝大部分还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在城镇严格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而农村相对宽松，加上农民文化知识低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村人口仍然是中国人口的大部分。

到21世纪初，虽然，城镇化"消化"了不少农村人口，城市化率上升到36%，设市城市增加到668座以上，建制镇增加到19000座，按统计计算，我国农村人口是城镇人口的2倍多，占全国人口的65%，城市人口中小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比例在40%以上，但是，从发展角度看，1978年以来，城市数增加了近4倍，建制镇增加了近9倍，而同期城市人口增加了2.6倍。这说明，小城镇并入城市化指标速度较快，其中许多小城镇城市，城市基础设施不具备，没有工业，完全是一个农业集镇。所以，我们应当认真重视城市化指标的"内在质量"（详见表8-7）。

总之，我们的农村人口（包括农村集镇里的非农业人口）至少在全国人口的70%以上，这不但是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的一个巨大障碍，而且是21世纪中国发展的巨大包袱。如果我们不能妥善处理好这个包袱，我们必将被这个包袱所压垮。

事实上，城市化是集中了农村人口、土地和水资源矛盾的一个综合性系统工程。中国未来的城镇建设恐怕要将人口控制、土地改革和适宜生存（有持续的水资源）三个因素摆在最首要的位置。与其说，我们去改变农村的户籍性质，还不如一步步地将我们的公路网延伸到乡村、延伸到适宜耕种的土地，并随着公路的延伸将我们的统一的变乡村为城镇的城镇模式推广到全国各地--将城镇作为国家最低一级的行政单位（消灭村及村民组）--将散居于高坡山谷的村民就近请入适宜居住的现代化市镇，全面推行机耕，对不适宜耕种的山坡或者退耕还林还草或者种植果树或者改造为可机耕地，机耕土地由城镇政府按照功能区承包给镇民，富余劳动力实现多渠道就业：专业机耕、经营果林或者经济林、筑路、改土、市镇商业、服务业等等。如果这个系统工程（这将是一场彻底的农村大革命）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内能够坚持不懈地得到施行，或许农村人口控制、土地利用、环境保护、人口素质提高（教育应作为市镇建设的首位政策）以及我们的最终目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将会有彻底的改变。

表8-7 1949-2000年中国城镇发展状况[2000年为估计数]

年份 全国人口
[万人] 城镇人口
比例[%] 城市数
[座] 建制镇
[座]
1949 54877 5765 10.51
1957 64653 9949 15.39
1960 66207 13073 19.75
1966 74542 9965 13.37

1976 93719 11342 12.10

1978 96259 17245 17.92 193 2173

1982 101541 21154 20.83 245 2678

1984 104357 24017 23.01 300 6211

1988 111026 28661 25.81 434

1992 117171 32372 27.63 517 11985

1996 122389 35950 29.37 666 17770

1997 123626 36989 29.92 668 18000

2000 127400 44590 35.00 19000

---

（1）胡鞍钢，“加入WTO后应使农民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中国经济时报》，2002.1.5，第4版。

（2）《孟子.离娄上》。

（3）卡莱尔，《文明的忧思》，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1篇第8章。

（4）《诗经.小雅.北山》。

（5）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2卷[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3页。

（6）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2卷[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7页。

（7）王志振，“粮食安全，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中国经济时报》，2001.12.14，第五版。

（8）“阿拉善：你的名字叫‘沙尘暴’”，《中国经济时报》，2000.4.17，第4版。

（9）《经济日报》，2000.12.20，第9版。

（10）“石化，贵州的生存危机”，《贵阳晚报》，2000.12.28。

（11）“三岔河流域生态恶化”，《贵州都市报》，2003.5.19。

（12）“我国生态环境的十个问题”，《中国经济时报》，2000.8.1，第4版。

（13）刘守英，“中国农地集体所有制向何处去？”，《中国经济时报》，2000.2.18，第8版。

（14）杜润生，“尊重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中国经济时报》，2000.4.21，第5版。

（15）转引自林凌，“谁来代表农民的利益？”，《中国经济时报》，2003.2.18，第5版。

（16）赵越，“《县域论》——思考中国现代化的大问题”，[天府评论www.china028.com]，2001年6月9日。

（17）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10页。

（18）启良，《中国文明史》，上册，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430页。

（19）“让母亲河永葆青春”，《经济日报》，1999.4.22，第1-3版。

（20）《中国经济时报》，2000.12.5，第1版。

（21）《中国经济时报》，2000.4.12，第1版。

（22）“我们如何面对水危机”，《中国经济时报》，2000.3.22，第4版。

（23）“‘十五’及至2010年区域政策建议”，《中国经济时报》，2000.3.29，第4版。

（24）“我国生态环境十大问题”，《中国经济时报》，2000.8.1，第4版。

（25）《人民日报》，2000.9.11，第9版。

（26）萧一山，《清代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35页。

（27）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6页。

（28）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29）刘建锋，“不能坐视农村的长期积弱”，《中国经济时报》，1999.12.17，第5版。

**********

## 第六节　改革现状：结论以及一体化未来

改革开放20余年了，我们确实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就，但是与世界的差距仍然是巨大的。这里提供两个比较就清楚了。一个是中国前100名大中型工业企业与世界500强的"重量"和"质量"进行了比较（见表8-8）（1），另一个是中国电子百强与同类跨国公司的数字比较（见表8-9）（2）。另据分析，2003年公布的中国企业500强的总资产、营业收入和利润分别是《财富》世界500强的7.1%、6.12%和32%。中国企业500强的人均收入、人均利润和人均资产分别是《财富》世界500强的14%、72.5%和14.6%。其中，《财富》世界500强第一名美国沃尔玛公司，年收入2465亿美元，占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总收入的29.3%。比较结果不但不能增加我们的自豪感，而是更加清晰地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还很遥远。

表8-8 中国工业100强、500强与世界500强“素质”比较

指 标 中国工业100强指标值 占世界500强同类指标的% 中国工业500强指标值 占世界500强同类指标的%

1.总资产平均值[百万$] 1948.06 0.88% 711.56 2.44%

2.平均销售收入[百万$] 1089.14 1.74% 398.12 4.75%

3.平均资产利润率[%] 2.98% 24.62% 2.78% 26.40%

4.人均利润[美元/人] 1952.12 12.31% 1366.14 17.60%

5.人均销售收入[$/人] 36671.42 9.51% 27456.26 12.70%

20世纪末21世纪初，西方国家为了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体系中保持霸主地位，纷纷兼并、收购，实现强强联合。这场影响未来经济形势的发轫者--美国，始终站在世界的最前面，既尝到了甜头，又保持了其主要企业在世界的垄断地位。日本因着重在于扩军备战，发展势头受到影响，但其经济强国地位不可动摇。欧洲在这场变革中，克服各种干扰，稳住了经济的强势地位，后势大为可期。

这场大改革的结果，可由美国《财富》杂志每年评出的500强的构成变化窥见天机。在世界500强中，美国从1995年的153家，发展到2003年的192家，增加了39家。日本2003年比1995年减少了53家，但仍有88家，所以其经济强国地位不可动摇。欧洲1995年有172家，2003年为163家，可以说在美国强大的攻势面前，稳住了阵脚，后势可期。

表8-9 中国电子100强与同类跨国公司的数字比较

指 标 单位 IBM 索尼 三星电子 诺基亚 微软 INTEL 思科 ORACLE

营业收入亿 831.32 570 341.64 300.16 283.7 268 192 197

利润 亿 53 15.1 54.3 33.2 78.3 32.1 18.9 22.2

利润率 % 6.3 2.6 15.8 11 27.5 11.9 10 11.2

研发经费 亿 53 35 32 30 44 47 48 11.39

占营业收入 % 6.3 6.1 9.3 10 15.5 17.5 25.3 5.7

指 标 单位 海尔 普天 联想 TCL 上广电 海信 华为 熊猫

营业收入 亿 86 73 43 38.6 32.5 23.3 20.8 19.8

利润 亿 3.3 1.33 2.9 1.85 1.66 0.4 1.51 0.53

利润率 % 3.85 1.82 6.73 4.79 5.11 1.71 7.24 2.65

研发经费 亿 4.84 0.67 1.3 1.06 1.83 0.25 3.7 0.32

占营业收入 % 5.63 0.91 3.03 2.75 5.6 1.06 17.75 1.6

中国在2003年有11家进入《财富》500强（其中含台湾一家），与韩国相等，与美、欧、日自然不可比，其它的30多家，加拿大占近半数，其余分布在澳大利亚、俄罗斯、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印度、新加坡等国。

我们做这番比较，目的不是打击发展者的积极性，也不是抹杀一些人的杰出成就，我们的目的无非只有一个：带着一个美好的希望，正视现实，看到我们的真实水平和地位。这里主要转录一贯比较尊重现实的《中国经济时报》和《经济日报》三篇文章的研究成果及其主要观点，借以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对未来的一种希望。

表8-10 1995-2002年世界500强地区分布

国家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1.美国 153 162 175 185 179 179 186 199 192

2.欧洲 172 171 170 169 170 161 153 156 163

3.日本 141 126 112 100 107 107 105 87 88

4.韩国 12 13 12 9 12 12 10 13 13

5.中国 4 6 6 8 9 11 12 13 12

6.其它 18 22 25 29 23 30 34 32 32

合 计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2000年8月1日《中国经济时报》第8版有一篇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写的专论："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特征与'十五'时期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这篇研究报告比较深入、客观地总结了我国在20世纪末的社会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这里摘录其主要结论。

文章对我国在20世纪末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总结出10个结论，其要点如下：

第一，人均GDP水平在世界上排在很低的位次上，我国仍然处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1998年，按汇率法计算，人均GDP750美元，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3%，在低收入国家之列（低收入国家标准为人均GDP低于760美元），排在世界第149位；按购买力计算，人均GDP3220美元，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1.9%，在中低收入国家之列（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人均GDP4050美元），排在世界第129位。

第二，社会物质财富远不够丰富，尚需要大量创造。人均能耗当量和人均电力消耗量可以集中反映社会财富的丰裕程度，也可以反映居民的生活水平。1996年我国人均石油消耗当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人均1684千克）的53.6%，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均5346千克）的16.9%；人均电力消耗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人均2037千瓦时）的33.9%，高收入国家（人均8121千瓦时）的8.5%。

第三，产业结构层次低，结构升级任务繁重。从三次产业的构成来看，1998年第一产业的比重为18%，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比重仅为31%，低于世界平均30个百分点。

第四，一半左右的劳动者在初级产业就业，劳动力需要大规模转移。在发达经济中，初级产业就业份额一般都低于10%，1998年美国为3.1%，日本为5.4%，而1997年中国为48.7%；与印度尼西亚水平（45.7%）相当。从三次产业就业比重来看，我国也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近。1998年我国基础设施、服务业和其他部门就业份额之和为

37.5%，低于印度尼西亚（43.0%）、埃及（51.5%）、哥伦比亚（79.3%）、巴西（62.4%）等，更低于美国（81.1%）、日本（72.9%）等发达国家。

第五，居民消费结构层次低，消费结构需要升级。人们通常用恩格尔系数（居民食物消费支出占居民总消费支出的比例）来判断消费结构层次的高低，恩格尔系数越小，消费结构的层次越高；反之亦然。1998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为44%，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为53.4%，整体上我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当在44%与53.4%之间，处于很低的层次上，与人均GDP小于或等于1000美元的国家组别相当（2001年农村恩格尔系数为47.7%，城镇为37.9%--引者）。

第六，尚有3400万农村和数以百万计的城镇居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收入分配关系有待改善。在同一种社会制度下，经济越发达，人均GDP水平越高，收入越均等。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均等。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0≤基尼系数≤1,其值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由1984年的0.30上升到1989年0.35，并进而上升到1995年的0.415。另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9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24，1997年是0.425，1998年是0.456。另外，目前我国尚有3400万农村居民没有摆脱贫困，城市贫困阶层也在不断扩大。

第七，人口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化任务艰巨。1997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只有3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尚未达到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2%），低于高收入国家78%的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

第八，成人文盲率高，教育普及任务重。成人文盲率高与人均GDP水平呈负相关关系。1995年，我国男性成人文盲率为10%，女性文盲率为27%，比较接近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男性为12%，女性为27%）。

第九，劳动资本比低，生产要素质量需要提高。1995年我国劳动资本比仅为每个劳动者2200美元，不及美国人均115600美元的1/50，欧盟人均144200美元的1/60，日本人均281900美元的1/120，甚至低于印度尼西亚（人均4600美元）和菲律宾（人均7300美元）的水平。

第十，贸易结构不发达，国际竞争力需要大力提高。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的贸易结构将发生由以出口劳动密集产品为主、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向以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产品为主、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转变。目前，我国的出口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较高，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较低；在进口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较低，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较高。这说明我国的贸易结构仍处于不发达阶段。另外，从产业的贸易依存度来看，我国的贸易结构也处于不发达阶段。1995年，在我国的一般贸易进口中，依存度居前五位的是仪器仪表（18.6%）、其他交通设备（12.9%）、电子通讯设备（12.0%）、机械（10.8%）和汽车（9.6%）。在一般贸易出口中，依存度居前五位的是服装（14.2%）、纺织业（13.4%）、炼焦煤气（13.3%）、木材加工家具（11.5%）和皮革制品（11.3%）。

依此看来，到20世纪末，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形不是一个可以让人非常乐观的局面。那么，我们实现了邓小平在1979年改革初期提出的改革目标了吗？换句话说，"我们小康了吗？"这个让全中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成了《经济日报》一篇文章的题目。在2000年，《经济日报》记者，就这个问题特别采访了国家统计局官员，答案是：我国到1999年总体已走完温饱阶段94.6%的路程，到2000年全国总体水平能进入小康社会的初级阶段（95.6%），有四分之三的人能过上小康生活。（3） 就是说，到20世纪末，我国仍有四分之一的人不能过上小康生活。

那么，小康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四分之三又是指哪些人？文章做了详细介绍：所谓小康，是介于温饱和富裕之间的一个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具有历史相对性。我国计算和执行的小康标准，反映现代中国社会经济的较好的生活水平，但与国际相比，只能和中下等收入国家水平相当。更具体地说，我国总体小康生活标准包括五大类16个指标（详见表8-11）。其中，经济水平和精神生活已达到小康标准，物质生活、人口素质和生活环境实现程度分别为94.6%、88.4%和91.5%，其中，有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蛋白质摄入量、婴儿死亡率和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等四项指标未能达到我们的小康标准。

那么是哪些人实现了小康呢？表8-12比较详细地说明了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在1999年实现小康程度的地区结构情况。它表明，在内地31个省市区中，有15个实现小康程度在90%以上，有9个省市区在80-90%之间，有7个省市区实现程度不到80%。从人口分布看，截止1999年底，全国有6.156亿人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实现程度在90%以上），有4.65亿人处于温饱有余的水平（实现程度在80-90%之间），有1.52亿人处于温饱中期水平（实现程度不到80%）。也就是说，全国一半人基本过上了小康生活，东部绝大多数过上了小康生活，中部也有三分之二的人过上了小康生活，而西部过上了小康生活的人不到一半。

表8-11表明，尽管我们的小康标准是温饱型的，20世纪末我们仍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称之为"达到总体小康"，而把未来的希望称为"全面小康社会"。

同时，通过各地区小康的实现程度，我们再次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地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本质上看，这三对差距实际就是富人与穷人之间差距。有资料表明，1997年占中国家庭总数两成的最贫困的家庭只占有全部收入的4.7%，而最富有的两成家庭却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这个差距已经超过美国。根据美国《商业周刊》1994年的报道，美国最穷的两成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4%，最富有的两成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4.6%。（4） 1980年，中国大陆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基尼系数为0.3左右，1988年，这个系数上升至0.382。1994年为0.434，1998年进一步上升至0.456。（5）

表8-11 小康指标及1999年实现程度

小康指标 单位 小康值 权数 完成值 实现程度[%]

1.经济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元 2500 14 3591 100

2.物质生活：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2400 6 2749 100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1200 10 1044 82.4

城镇人均使用面积 M2 12 5 14.2 100

农村人均钢砖木结构住房面积 M2 15 7 18.7 100
人均蛋白质摄入量 克 75 6 71.5 86
城市每万人拥有铺路面积 M2 8 3 8.8 100
农村通公路行政村比重 % 85 5 85 100
恩格尔系数 % 50 6 46.49 100
3.人口素质：成人识字率 % 85 6 87.6 100
人均预期寿命 岁 70 4 70 100
婴儿死亡率* % 31 4 32.5 59.5
4.精神生活：教育娱乐指出比重 % 11 5 11.59 100
电视机普及率 % 100 5 100 100
5.生活环境：森林覆盖率 % 15 7 16.55 100
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 % 100 7 83 83
总计（共16项分指标） 100 94.6

注：* 1999年完成值为预计数。表中价值量按1990年价格计算。

有专家指出，中国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至少是4：1，即城市居民人均消费额是农村的4倍，为全世界所仅见；中国社会已经达到了过于不平等的程度。这说明，我们中国已经从改革开放前的无竞争的公平社会，迅速（仅仅用了20年时间）走向了具有局部竞争性的极不平等社会。这已经不是一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了。2003年公布的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中，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最不应该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房地产、中小学教育、殡葬和出版行业成为暴利行业的前四名。简直不可思议，简直不可言语。我国人口众多，土地很少，怎样"安得广厦千万间"，使天下寒民"尽欢颜"？怎样有一个正常的图书出版业和中小学义务教育，以尽快提高全民族的国民素质？怎样的殡葬制度使死人有一个合适的归处，而不与活人争生存空间？这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迫切的问题。

表8-12 1999年全国小康进程结构

实现程度 分布 人口[亿] 比重[%]

实现90%以上 15个：

东：京、津、冀、辽、沪、苏、浙、闽、鲁、粤、琼

中：晋、吉、黑、鄂 6.156

[4.606]

[1.55] 49.93

实现80-90% 9个：

东：桂

中：内蒙、皖、赣、豫、湘

西：渝、川、新 4.6512

[2.85]

[1.33] 37.73

实现不到80% 7个：

西：黔、云、藏、陕、甘、青、宁

1.521 12.34

合 计 31 12.328 100

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仅仅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距，更为严重的是，进一步加深了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地三者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又反过来制约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进一步制约着全国统一和平衡的国内大市场的形成。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个局面呢？

以前，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政策（1949-1989），表面上各个领域全国一盘棋，实际上受行政条块分割的权力体系、自私自利的地方主义和狭隘落后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其它方面都被分割成几大块。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的附带结果，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分割和孤立，这是很不利于实现全国一体化的。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实现全国一体化，又如何能谈得上融入全球一体化呢？所以，我们应利用发展经济的机会，搞好我们的一切"统一"工作，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军事等多层面，最终实现能适应全球一体化所需要的全国一体化。就经济方面而言，已经有很多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很有见解的实现全国经济一体化的方案。

同样是《中国经济时报》，她在2000年9月1日第5版刊登了管荣升先生"加快全国一体化"文章。该文认为，"所谓经济全球化，其实质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贸易自由化"，"在这种不可阻挡的发展大趋势面前，经济和科技发达的国家自然处于进攻的有利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处于防守的劣势。"为了在经济全球化中保持和扩大我们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必须加快国内经济一体化。文章很现实地提出了五条"加快全国一体化"的政策建议。这种建议和观点应该被重视，而且应该被大众所熟知。

一、消除工农"身份"划分，扩大就业门路，增加群众收入（黑体是原文如此，下同--引者注）。众所周知，我国长时期内是一个中央集权型的二元经济体制，整个社会形成"内核是干部、中间是职工（工）、外圈是农民（农）"的圈层结构。"农民"不仅是职业的称谓，更成为固定身份的"称号"：农民的收入是最少的，农民的地位是最低的。

所谓"内需不足"，说到底就是少数人收入高，高到只想购买"洋货"；多数人收入低，低到连"国货"也买不起；主要就是占全国7亿劳动者50%的3.5亿农民的劳动收入太低，占总人口75%的9亿农村居民购买力太差。

要大力解除对农民的身份禁锢，继续放宽对集体土地承包权的限制，对农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限制，给其提供比较容易地获得改善自身经济和社会状况的自由宽松条件，促进或至少不再阻挡农民离土、离乡的步伐。使农民充分享受一般的、真正的"国民待遇"，这是比给

外企"国民待遇"更为重要得多的大事情。解放生产力，说到底是解放生产者。3.5亿农民的劳动潜力和积极性得不到发挥，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呢?

二、拆除城乡藩篱，促进城乡交流，实现城乡一体化。我国社会经济二元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城乡隔离，就是农民进城难，农民要变成"非农民"难。

农民在城市打工的社会身份、地位、待遇并没有得到公正、切实的法律保障，受歧视、遭虐待的事常有所闻。目前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以至达到空前的3.71：1，正是这种隔离的直接后果。

如果不彻底拔掉城乡之间的藩篱，清除城乡交流道路上的关卡路障，真正实现国内城乡经济的一体化，而以目前这种城乡严重隔离的状态来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岂不是以散沙迎巨浪，如何经得起冲击呢?

三、打破所有制界限，搞活产权，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重组。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结果就是效率普遍低下。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私营、经济迅猛发展，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

在企业待遇上，必须打破传统的所有制分野，充分开展公平竞争。对于每个劳动者和每个企业，就业上岗都应该双向选择，劳动保障制度、法律要健全，政府不要过多干预。

四、冲破地区封锁，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中国行政领导体制的特色是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相结合，"条条"领导和"块块"领导相结合。

这种体制下的分工负责如果搞得不好，就容易导致互相扯皮，甚至互相掣肘，把有限的能量用在无端的"内耗"上。如果出现"条条"闹独立，"块块"搞封锁，各搞各的"山头"，就形不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就要依法治国，以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为根本目标，彻底打破地区封锁，实现"全国一盘棋"、经济一体化，做到在全国范围内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最终形成应对全球一体化的强大、统一的"拳头"产品。

五、加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和规范性，增加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和开发力度。中国的国情是：任何地方经济的发展，除了自然地理条件之外，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投资规模是重要因素。国家对西部地

区投资较少，即使是最高的1998年也只占全国的14.5%；实行国家优惠政策的沿海城市、经济特区都在东部。结果导致1990至1998年地区GDP的年均增长，我国西部仅是10%，比东部慢4个百分点；1990至1995年西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以年均0.6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任何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平等。但是，如果不公平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带来社会的、政治的危险。不应当，也不可能容忍不平等无止境地发展下去。"

———————————

（1）“中外500强差距有多大？”，《经济日报》，2000.1.24，第5版。

（2）“电子百强与跨国公司的数字‘鸿沟’”，《中国经济时报》，2003.4.28，头版。

（3）吴永亮，“我们小康了吗？”，《经济日报》，2000.12.4，第6版。

（4）冯涛等，“全国贫富差距调查报告”，《当代工人》，2000年第10期。

（5）方进玉，“如何看待中国的贫富差距”，《南方周末》，2001年6月28日。

**********

# 第九章 钺钟地理的修复与巩固

西历1796年后，也就是从19世纪初开始，西方强盗通过一系列不正义的侵略战争，采取武力胁迫等手段，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致使中国主权受损，疆土分裂，人民受辱，给现在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东、南、西、北四面留下了一长串主权恢复、国家统一和领土收回的问题。1949年共和国统一了中国大陆大部，然而天下（中国全境）仍未完全统一。中国在第66世纪里仍面临着巨大的钺钟地理的修复和巩固问题。

## 第一节　东部：东北、朝鲜、琉球及台湾

在中国东部有四个历史遗留问题：俄罗斯侵占我国东北领土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琉球群岛问题和台湾统一问题。这四个问题中，台湾统一问题属于中国内部问题。

一、俄占东北领土问题

1689年，应该是每一个中国人记住的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是中俄关于中俄东北边界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年。

中国与沙俄于１６８９年９月７日（康熙２８年）在尼布楚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这个条约，抵制了沙俄的侵略，实现了地区和平，不但在中国与俄罗斯，而且在全世界都有重要的意义。全文不长，兹录于下：

尼 布 楚 条 约

1689年9月7日

（中）索额图　　（俄）戈洛文

第一条　俄国与清国之境界，以入于黑龙江之绰尔纳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及循此河之水源，远至于东海岸所绵亘之山脉为定界。循

此山脉之南坂所流出之河川，及南方一带之地，则属于大清帝国；此山脉之北方所有地方及河川，则依然为莫斯科帝国之领土。又，眉勒以上之支流为尔客河，南方一带之地，属于大清帝国，北部为莫斯科帝国之所属。现时尔客河之南方，所有市府或住民，当移住于河之北岸。

第二条　俄国人所称雅克萨地所建造之堡砦，当悉行毁坏，其所居住之俄国人，当悉携其财产，退去至莫斯科政府之境土。两国间无论何国之猎夫，不得以何等之口实，横越境界。如有一人或二人擅自越界捕猎，或窃盗者，即行捕缚，送所在官司，准所犯之轻重惩处。如有十人乃至十五人一队，武装逾境狩猎，又掠夺者，或与外人相互杀戮者，当具其事情，报告于两国皇帝；于其罪状既明者，即当处犯者以死罪。其关于民人相互之私交，则无论为如何之事情，两国间不得开战争。

第三条　两国间于过去一切之事，当永久忘却，毋留记忆。

第四条　本条约缔结之日以后，无论何国人，不得容他国之逃亡者及脱走之兵。若于他领内脱走而来之时，随即捕缚，交付于境界所在之官衙。

第五条　在清国领土内现住之俄国人民，及在俄国领土内现住之清国人民，仍得居住原处。

第六条　两国民持有旅行免状时，无论于何地之领内，得交通以营其贸易。

本条约之正文，两国全权委员，于记名捺印后交换，以满、蒙、汉、俄、腊丁五种文字，记其条文，镂刻之于石碑，建诸境界，永为两国亲善之标准。（1）

据以上条约，划定的中国与俄罗斯的东段边界如图9-１。

本条约是在沙俄屡犯中国边境，中国政府多次派兵反击，而后签订的。中国政府签订此条约时，为和平计，实已作出了重大让步：将贝加尔湖以东至尼布楚一带广大地区，划给了俄国（见图9-1）。

《尼布楚条约》后，1727年（雍正五年）清庭与俄罗斯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划分了中俄中段边界，经勘界后，竖年签订了《恰克图条约》。

外国人是怎样评价这些条约的呢？美国世界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

一连串冒险家继波雅尔科夫之后进入阿穆尔河流域。他们攻占阿尔巴津城，修筑一系列要塞，以典型的哥萨克方式屠戮抢掠。他们在中国边缘犯下的这些暴行最终使中国皇帝极其恼怒，他于1658年派一支远征队北上。中国人夺回阿尔巴津，把俄罗斯人从整个阿穆尔河流域清除出去。但是，他们一撤离，俄罗斯冒险家就成群结队地回来。于是，又一支中国军队被派到阿穆尔河，与此同时，两国政府为解决边界问题开始谈判。经过许多争论，尼布楚条约于1689年8月27日（指俄历－－引者注）签订。

这条约除了极其重要的条款外，还对两个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是中国与欧洲一大国签订的第一份条约；由于中国代表团有耶苏会会员任译员，条约用拉丁语拟定。边界确立在沿阿穆尔河以北的外兴安岭一线上，所以，俄罗斯人不得不完全从有争议的流域地区撤走。（2）

图9-1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国失地示意图（3）

《尼布楚条约》是一个平等、公正和完整的条约，后来在西方殖民侵略中国的鸦片战火中，在沙俄野心、贪婪、趁火打劫的"熊"心驱使下，被撕毁了。俄罗斯于1858年5月28日（咸丰8年，俄历5月15日）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背着清政府与沙俄政府的全权代表拉维约夫在中国北部重镇瑷珲城（今爱辉县爱辉乡）签署了中俄《瑷珲条约》。俄罗斯凭借这个不平等的条约，侵占了中国东北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860年俄罗斯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依据这个不平等条约，俄罗斯又侵占了我乌苏里江以东以南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后来，西方8国列强侵华期间，俄罗斯遣大军深入东北，妄图建立所谓"黄俄罗斯"，其

影响极坏（抗日战争期间的日本和现代美国的极端反华分子，也效法俄罗斯，都妄想建立所谓的"满洲国"）。依据《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以及以后俄罗斯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和《中俄伊利条约》（1881年）等等，加上1944年苏俄强占的唐努乌梁海地区17万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俄罗斯先后共计侵占了中国18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详见图9-2。

外国的侵略，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是永远不会答应的。我们要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理直气壮地追溯《尼布楚条约》，索回国土，以供庞大的人口生存之需，因为那些土地本来就属于我们的。不论从哪方面讲，追溯《尼布楚条约》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

其一，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领海是中国的传统领土。我们不说从远古中国对这片土地的占有和管理，现在有很多考古工作证实，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贝加尔湖以东以南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自汉、唐以来就属于中国领土。明朝，在永乐7年（西历1409年），在东北俄罗斯占领区内设置了奴尔干都司，中国对这片土地开始进行更有效的行政管辖。当时，都司驻于黑龙江下游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边区塔赫塔，距江口只有150公里，设置约300个羁縻卫、所，管辖包括今黑龙江、精奇里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北至外兴安岭以北。永乐9年明朝开发了苦兀地区，将管辖范围延伸到了库页岛，并在岛上设置了囊哈尔卫。从此以后直至宣德10年（西历1432年），明朝内官亦失哈先后十次到该地区谕抚视察，并在都司城建永宁寺和立碑纪事。清光绪11年（西历1885年），曹廷杰奉朝廷之命对被沙俄侵占地区进行调查，并将碑文拓下携回，披露于世。原碑至今仍保存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博物馆中。历史文献和物证都铁一般地说明：这块土地是中国的。

其二，中国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一方面，已作重大让步，将原属于中国的贝加尔湖以东至尼布楚一带的广大地区，无偿地划给了俄罗斯；另一方面，《尼布楚条约》所确定的两国边界是世界公认的、平等的。《尼布楚条约》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而且是一个有效的、公正的国际边界条约。

其三，后来的《瑷珲条约》是国际上公认的不平等条约，是无效的。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清算了，16年后（1858年）发生的《瑷珲条约》、18年后（1860年）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也应当废除，并得到清算，不管其条约形式如何。

从1689年平等的《尼布楚条约》签订到1859年不平等的《瑷珲条约》破坏中俄边界，其间经历了167年；从1859年不平等的《瑷珲条约》签订到21世纪初年，时间又过去了140多年。守卫领土的责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以及中国庞大人口的压力都要求我们中国人民必须收回我们的土地。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我东北被俄罗斯占据的领土，是逐渐膨胀的军国主义日本最关心的地域。所以，我们要防止俄罗斯利用我东北仍由其占据的土地（包括面积7.04万平方公里的库页岛）与经济实力强大的日本做交易。这种交易，在历史上是有记录的：18世纪中叶，俄罗斯侵占我国库页岛北部，日本则侵占该岛南部。1875年，俄罗斯与日本签订条约，俄罗斯以千岛群岛18岛换日本所占库页岛南部，全岛归俄罗斯。1905年日俄战争，俄罗斯战败，俄罗斯割该岛北纬45o线以南归日本。1945年，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波茨坦条约》将该岛南部划归苏联。如果我们没有历史警觉性，那么我们不常关注的历史事件就极有可能再次重复发生。

日本历来对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西伯利亚的资源和战略位置抱有极强烈的兴趣，并时常流露出把它作为自己后院的想法。我们可以从日本对俄罗斯西伯利亚石油天然气输送管道项目的强烈兴趣就知道他们的战略目的。"日本通产省在谈论东亚地区秩序时，把日本的大部分潜在利益寄希望于中国和俄罗斯东部。这样做，并不是想要建立一个具有平等制造格局的共同市场，而是要一个能为日本制造业产品提供原料供应（俄罗斯）和潜在巨大市场（中国）的共同市场。"（4）

图9-2 19-20世纪俄罗斯侵占中国领土示意图（5）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收回东北（指俄罗斯至今仍占据着的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东以及乌苏里江以东以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国不仅仅失去的是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我们的东北面将永远受制于俄罗斯，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实现了俄罗斯和日本的合作，中国的东北将永无宁日。现今俄罗斯处于低落时期，俄罗斯和日本的经济合作还未大规模展开，所以，俄日联合影响中国东北不是很明显。但是，一旦俄罗斯强大起来，俄罗斯便会希望走东三省和内蒙捷径来往于蒙古和海参崴之间；一旦，日本跳上东北大陆，它就会寻找机会把中国在俄罗斯的土地据为己有，进而南下东三省，威逼北京。所以，放任俄罗斯长期占据库页岛及其以西的广大中国领土的政策是不合符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的战略利益的。

总之，中国人应该不要忘记俄罗斯侵占东北这块土地。

在说到西方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时，有一种很危险的西方观点需要注意：西方研究中国问题最具有广泛影响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说：

对于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华帝国的不平等条约，如果要了解中国其单方面的和不平等的性质，我们就必须回顾一下中国首先强加于西方来客的古老朝贡制度。这个古老的中国制度，也同取代它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一样，是不平等的。

在中国的外国人以及他们的活动只受外国法律而不受中国法律的管束。这个制度并不是近代的发明。中世纪的中国政府像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那样，曾要求寄居港口的外侨在他们自己头目的主管下，按他们自己的法律自治。在中国的早期阿拉伯商人，情形就是如此。（6）

这是极端错误的认识。当中国先进文明影响西方的时候，中国是在毫无保留的情况下，将技术广布天下的。那时的西方落后，他们不得不学习中国的先进技术文明，但中国没有采取强制办法并附带若干条件。所以中国技术文明传播西方不是中国强迫的，而是毫无保留的自由平等往来的结果。同样，当西方有能力走到中国门前的时候，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世袭制国家有一种体现等级身份的朝贡制度，

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因为西方过去的世袭制历史同样是等级森严的。虽然按照现代的观点，我并不认为这是那时最合理的对外关系制度。但问题是，这项制度的实施同样不是跨出国门强制执行的，而是要求主动来中国试图与中国建立往来关系的国家表现其诚意的仪式和程序。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制度，你完全可以掉头走人，没有人强迫您去"三跪九叩"。然而，西方国家是来者不善，他们不能容忍别国的强大和富裕。因此，他们利用武力从打破朝贡制度开始，一直到他们像惯盗那样大肆掠夺后放火烧掉北京，并加上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作为保证其侵略得以继续的罪恶工具为止。可见，西方的不平等条约是强加给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因此，在西方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与中国的古代朝贡制度之间没有丝毫关系。

同时，古代中国政府对外侨的管束，与18、19世纪西方在中国取得的治外法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意义完全相反的事件。古代中国，很注重修身养性，在道德与法律并重的思想影响下，任何家庭、团队、集团等组织的首领或者领带者对部属都具有不可推卸的管束责任。这是任何研究过中国文化的西方人都明白的事实。其管束的目的，注重人格、道德的培养，行为的规范。所以这种管束不但不具有侵略性，而且还强调尊崇别人的习俗，特别是发生对外关系的群体。而西方在中国以武力为基础所取得的治外法权，恰恰是使侵略者得以长期侵略、纵容和包庇犯罪、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人权的极端罪恶的工具。西方殖民者在中国肆意杀人放火，犯下了数不清的累累血债，您曾听说过，西方按照他们把民主和人权放在首位的法律惩罚过一个罪犯吗？没有。

费正清在为西方殖民侵略者开脱罪责。他的"护短"方式是很不高明的。他的观点给那些和当年清朝统治者同样妄自尊大的现代西方领导者传递了一个危险信号：西方过去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罪过，最多不过是用不平等去报复不平等而已。费正清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相当危险的。我们受到过西方太多的欺辱，我们仅仅是索回原本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而已，我们应当理直气壮。

二、朝鲜半岛问题

朝鲜半岛，包括其周围的 3300多个岛屿，陆地总面积 22.22万平方公里。

商朝末年，商纣王叔父箕子，不忍见殷商灭亡之状，乃率五千余人迁入今天的朝鲜半岛立国建邦。西周初年，周封箕子为朝鲜侯，是时开始，朝鲜半岛便纳入了中国宗藩政治体系。朝鲜半岛约在中国战国时期（西历前5～前3世纪）,"朝鲜侯"称王。汉初，燕人卫满自立为王，是为卫满朝鲜。其统治中心在今大同江中游一带。西历前 108年，汉武帝灭卫氏朝鲜,于其地设乐浪等四郡。此时半岛南部居有3个部落联盟集团，即马韩、辰韩、弁韩,史称三韩。西历3世纪左右，百济统一马韩地区，新罗统一辰韩地区，建立起国家。西历元年前后在中国东北兴起的高句丽,于427年迁居平壤，于是半岛上形成三雄争霸的局面，史称三国时期。7世纪中叶，新罗与唐朝结成同盟，灭亡百济(660)和高句丽(668)，735年新罗统一南部领土。900年,甄萱建后百济，901年弓裔建泰封国。国家一分为三，史称后三国。918年,王建杀弓裔自立，国号高丽，是为王氏高丽王朝。先后灭后百济和新罗，统一半岛南部。高丽仿中国在中央设三省六部，军队实行府兵制。后来，从1231年起,蒙古军多次东征高丽。1258年,高丽国王降服,元朝在高丽设"达鲁花赤"，监督国政。

1392年，李成桂篡夺高丽王位自立，改国号为朝鲜，即李氏朝鲜。16世纪末叶，壬辰卫国战争爆发。朝鲜人民组织义兵打击日寇。李舜臣等爱国将领给敌水军以沉重打击。明朝应朝鲜之请，派遣军队援朝御倭，最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19世纪60年代后，欧美列强把侵略矛头对准朝鲜。1866年，法国舰队侵入汉江，美国商船侵入大同江,但都被朝鲜人民击败。1876年,日本以"云扬号"事件为借口，派出舰队，侵入江华岛一带，强迫朝鲜政府订立不平等的《江华条约》，开始了朝鲜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

1882年 6月，对日本侵略和政府克扣军饷不满的朝鲜士兵发动"壬午兵变"。1884年朝鲜开化派发动"甲申政变",但三天后宣告失败。日本侵略者以这次事件为借口，胁迫朝鲜签订《汉城条约》，攫取到在朝鲜的驻兵权。

1894年，反对封建统治和"逐灭洋倭"的甲午农民起义爆发。李朝统治者一面与农民缔结假和约，一面请求清朝政府出兵支援。日本以势力均等为借口，大举进兵朝鲜,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并击败清军。1905年强迫朝鲜签订《乙巳保护条约》，1907年又缔结《丁未七款条

约》，把朝鲜置于日本统监府的统治之下。1910年8月,李朝总理李完用与日本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国王退位,日本最后吞并朝鲜。此后，日本设朝鲜总督府，独揽一切大权，实行"武断政治"，剥夺朝鲜人民一切自由,掠夺土地和资源,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1919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朝鲜人民掀起三一运动。1926年爆发以反对日本统治、要求独立为目的的"六·一○万岁"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朝鲜革命者与中国人民一起组成抗日联合部队（抗日联军），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金日成及崔庸健、金策等人都在抗日联军中担任领导工作。1937年，金日成率领抗日部队,突破日军封锁线,袭击边境要地普天堡并取得胜利。1945年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而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历时36年的殖民统治，朝鲜获得独立。

1948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建都平壤。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军打着"联合国军"旗号入侵朝鲜。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把美李军逐回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同意停战谈判。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朝鲜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但是，美国在半岛制造了分裂格局。

从历史意义和本质上讲，住在朝鲜半岛上的人都是中国人。今朝鲜族即我国古代东北高丽族裔，他们是我国商朝以及其后陆续移居半岛的中国人的后裔。翦伯赞说："商族南北分驰以后，渐渐哉渤海南北分化为无数氏族。这些氏族传说中总称之曰辰国。"根据《左传》、《汉书东夷传》，"自山东半岛沿渤海而北以至朝鲜半岛，都是属于古辰国的领域。"（7） 秦代以后，朝鲜半岛的"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或名之曰秦韩。"（8）

从地理位置上讲，朝鲜半岛和中国一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中国历史上，朝鲜半岛也像中原政权一样处于分分合合的状态。但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不同，半岛分裂多于一统。在中国历史上，中原政权多数情况是对朝鲜进行间接统治，即封君朝贡。但有三次对朝鲜半岛实现了直接统治。

第一次，西历前194年，汉朝册封的古朝鲜王被东北燕人卫满推翻，建立了卫满朝鲜，西历前109年，汉武帝派大军征服朝鲜北部，置

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进行统治。

第二次，西历668年，唐朝与半岛上的新罗联合，消灭了高句丽和百济政权，于西历676年统一朝鲜半岛。唐朝置安东都护府统治半岛。

第三次，西历1299年，元朝统一半岛，置征东行省，使朝鲜半岛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由于朝鲜半岛对中国地缘政治重要性的原因，不管是想侵略中国的日本人和俄罗斯人，还是想称霸世界的美国佬，都对朝鲜半岛抱有无限的兴趣。对于外国人，他们都明白，朝鲜半岛是侵略和抑制中国的至重之地。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政府也为了维护半岛的稳定和抑制外国侵略的战火，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历史上，中国有四次直接介入大规模的保卫半岛的战争，而每次介入都是为了打击外国侵略者，每次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第一次，西历3世纪，日本大和国侵入朝鲜半岛。曾一度占领半岛南部，直到西历6世纪，中国军队才将倭寇赶出半岛。

第二次，西历1592年和1596年，日本军阀丰臣秀吉两次侵入朝鲜半岛，中国明朝军队入朝，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半岛，但是付出的代价是明朝由此陷入了财政危机，国势开始衰弱。

第三次，西历1894年，朝鲜遭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大肆入侵，清政府在承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同时，仍然出兵朝鲜，与日本开战。结果甲午惨败，清政府被迫向日本赔偿巨款和割让台湾，使日本人统治台湾50年后才得以回归中国。其恶劣影响至今尤存。

第四次，西历1950-1953年，为了抗击美国霸权主义者对朝鲜的入侵，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各方面都很落后的情况下，再次出兵朝鲜。把美国佬及其愚蠢的引狼入室者遏止在半岛三八线以南。但是代价同样是巨大的，我们牺牲了30多万官兵。美国人到21世纪仍在半岛驻扎重兵，而中国无一兵一卒，其恶劣影响至尽尤在。

这些事实说明，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总结朝鲜半岛的历史，之所以分裂，是因为内部的不团结和外部的侵略；之所以统一，是因为与中国融合在一起。因此，韩国让外国长期驻军半岛，无异于助纣为虐，增加美国霸权主义者对世界的霸权野心。这既影响半岛的稳定，也不利于实现半岛统一，又影响了整个中国和东亚的安全和稳定。由此，我们希望朝鲜半岛人民，赶出侵略

者，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整个民族利益为重，以和平换取永无止期的军事对峙。

三、琉球群岛问题

琉球群岛，是中国东南、东海与太平洋之间、台湾群岛与日本列岛之间的一组呈带状的系列岛屿，包括大隅诸岛、吐噶列岛、奄美群岛、冲绳群岛和先岛群岛，总称琉球群岛，总陆地面积0.45万平方公里。

琉球群岛现在仍由日本占据着，但她在1875年以前，还属于中国的领土属地范围--琉球曾是一个奉中国为正朔的王国，自南宋起升平700余年。当时，居住在琉球群岛的是我华夏民族的后裔。琉球群岛自古以来它始终属于中国的领地，琉球先民即我中国人。

西历前219年（秦始皇28年），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神仙，名蓬莱、方丈、瀛州，仙人居之。秦始皇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9）当时，琉球称亶州。《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亶洲，在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将童男女入海求仙人，止住此洲，共数万家。至今，洲上有至会稽市易者。"（10）

西历12世纪时期，琉球处于小方国状态，14世纪，琉球分裂成为中山、山南和山北三个小王国。1372年(明洪武15年)，中国第11任册封使陈侃抵达琉球，从他开始以后的册封使均有"使琉球录"传世，故人们往往把1372年作为琉球归附中国，作为藩国之始。事实上，琉球被纳入中国宗藩政治体系比1372年更早。此后，琉球进贡和中国册封不断，历时500余年。

15世纪开始，中国先民后裔尚巴志在群岛中的最大岛屿上建立了琉球王国，并按照中国的政制建立政府机构，按照中国建筑模式建设宫殿，并对中国纳贡称臣，成为中国唯一的海域宗主属地，一直至19世纪。

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擅自废琉球国王为琉球藩。1874年4月，日本发动所谓的讨伐台湾生番的侵略琉球和台湾群岛的战争，遭到台湾军民的顽强抵抗。尽管日本军事侵略未能成功，但日本却诱使腐败的后清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北京专条》。依据这个不平等的条约，日本1875年派兵进驻琉球群岛。第二年，并在琉球设立警察和司法机构，实现其永久的殖民统治。1879年，日本废除琉球王，

改琉球为冲绳县，并吞琉球。1895年日本把永久侵占琉球作为目的之一，发动了侵华战争（即甲午战争）。日本依据强迫给中国的《马关条约》在进占台湾（包括澎湖列岛、钓鱼列岛）的同时，彻底侵占了琉球群岛。二战后，按照国际协议，台湾（包括澎湖列岛）和琉球群岛及钓鱼列岛应一起归还中国，然而，由于蒋介石的软弱，琉球群岛及钓鱼列岛被美国占领。美国占领琉球及钓鱼列岛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一方面可以借占日本之名（把琉球作为日本领土），利用此地战略地位制约中国；另一方面忽视中国领土领海主权，利用此地制造中日矛盾。这里边，还有第三层意思，美国早在1867年侵略台湾时，被高山族人民伏击溃败，便恨恨于心。后来，美国一直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以泄其恨。为着一贯敌视和制约中国的目的，美国分别于1953年和1972年分两次将琉球（包括我们的固有领土钓鱼列岛）"归还"日本。这1972年，便是中国与美国即将建交之前夜。

关于钓鱼列岛属于中国固有领土，这个不争的事实，已被日本学者井上清于1972年予以彻底证明（11），勿需多言。本来，日本占据中国属地--琉球群岛就是通过侵略取得的，现在日本不但不正视历史，正确认识琉球历史主权地位，还厚颜无耻地把其罪恶的手伸向了中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列岛。日本又在重走故路--像在19世纪时期那样，依靠美国的支持，从本土而琉球，从琉球而钓鱼列岛，从钓鱼列岛而台湾、朝鲜--日本正在走向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之老路（其具有军事侵略进攻性质的外交也是为了保住其能够长期占据琉球群岛）。如果我们不能认清日本的侵略扩张本质，"放任日本统治阶层掠夺钓鱼群岛，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大火就有可能以更快的速度蔓延开来"（井上清语）。

如果我们被表面的和平淡化了我们对日本的罪恶本质的认识，时常回忆一下历史是最好的自我警示教育。

上溯历史，历史就会告诉我们，日本在西历十六世纪前原是中国的藩属国，是中国宗藩政治体系的一部分。甚至，由于日本至今把秦朝徐福作为先圣崇拜，并尊他为"司农神"和"司药神"。日本佐贺县每隔50年要为徐福举行一次大祭活动。最近的大祭活动是在1980年4月29日。在大祭歌中，讲述徐福东渡过海登陆日本的故事。故此，有人认为徐福就是日本的天皇，是日本的神武天皇，是日本的国父。

我们且不论此说是否是实，但是在汉朝时，日本受中国的册封是为藩属国却是事实。西历57年（汉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赐以印绶。"（12）（1784年在日本福田市志贺岛发现了当时的"汉倭奴国王"金印）。然而，自隋大业三年（西历607年），日本圣德太子在派往中国的使臣所持的国书中自称"东天皇帝"，而把中国皇帝称为"西皇帝"后，便力求自立于中国统辖之外。自得"日本"国名以后，日本就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自求独立发展，但至迟在明成祖朱棣时期，日本源道义仍受封为"日本国王"封号，之后，日本逐步脱离中国宗藩政治体系完全独立。以后，由于日本长期自主发展，未得孔子"仁礼"、老子"道理"和韩非"法教"三位文化体系之精髓，崇尚武士道精神，最终发展成为中国东南乃至整个东亚、东南亚的一患，至今如此。

我们必须保留向军国主义日本追索琉球群岛的权利。为什么呢？第一，琉球群岛属于中国固有领地；第二，日本军国主义者是靠军事侵略，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实现侵占琉球群岛的，并彻底毁于二战期间的日本人手中；第三，日本军国主义很具有侵略性，并在历次侵略最终失败以后，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第四，在极右势力和军国主义者左右下的日本政府以及一些日本民众，不能正视和忏悔其罪恶累累的血腥侵略史，总是千方百计地回避、掩盖或者干脆否定其滔滔大罪。

对于近似进化未全、野性未改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中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态度：由于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中国政府在1972年考虑国际和平和发展因素，才"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款的要求"。但是，日本认真履行1978年8月签订的《中日和平条约》了吗？日本军国主义膨胀、军事威胁、领海争端、日圆贷款背后的勒索等等，无不在侵蚀"和平条约"。所以，我们要认真检讨《中日和平条约》，因为中国政府的慷慨道义和诚实信用并没有得到日本的正常反映，日本至今美化侵略战争、搞战争威胁、对全中国人民不赔罪、不归还其掠夺去的财物和我琉球群岛。如果日本政府继续走军国主义道路，中国必须以法律形式重新建立一个《对日本关系法》；如果日本一旦再次以任何借口，入侵我们任何领土和主权，中国应该给日本准备一套枷锁和一条绳索。这套枷锁就是归还我故土--琉球群岛和古代财物，这条绳索

就是追缴日本在二战中欠下的近似天文数字的战争赔款。必要时，继续追讨日本从19世纪初以来在历次侵略战争中给我国造成的巨额财产损失。

四、台湾统一问题

在中国东面所面临的问题当中，只有台湾列岛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香港和澳门涉外问题，在邓小平"一国两制"政策下，基本解决了。对台湾，邓小平早就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设想。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又提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这些政策，是够宽容和容忍的了。可台湾当局，仍不愿走上谈判桌，继续搞分裂祖国的活动，不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际上公认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个事实，以一己之私，予祖国统一大业而不顾，宁愿被美、日等国家所利用也不合作。

1999年，李登辉等人，更是不知廉耻，抛出所谓的"两国论"。也许台湾一些人认为，把自己打扮成为特别的"台湾人"，自己就和西方人接近了，就可以像西方人那样横行世界了。可是，西方人在世界上的老大行为，是以西方人母国的实力作为后盾的。所以，中国不统一不强大，黄皮肤的中国人，包括那些产自中国却自认为不是中国人的人，就不会那么理直气壮地横行世界。因为，主宰世界的西方人能够辨别出什么是黄皮肤什么是白皮肤。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过："一个民族的民族性，真实地存在于你们这些本民族人之中，存在于你们的言行之中：所有这些，难道没有成为你的皮肤或第二层表皮，就像你们的自然皮肤一样紧贴着你吗？这些你没有摆脱，也永远不可能摆脱。"（13） 所以，白种的西方人异常团结，进北京，是八国联军；打朝鲜是"联合国军"；对付苏联是"北约"组织；围剿南斯拉夫，是13国军。等等。

自然，内部的分裂给外国提供了绝好的借口。所以，台湾问题，成了集中体现美日联合欺侮中国的最典型的例子。日本过去非法占据台湾50年所造成的恶果，就不用说了。美国过去侵略中国所造成的结果，中国也没有以受害者的身份要求有个清楚的说法，可它们还厚颜无耻地把台湾视为其在东方的"不沉的航空母舰"。1971年中美建交时，一边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台湾主权属于中国"；另一边美国中央情报局却在"推行一个得到美国充分支持的逐渐的、循序

渐进的台湾化计划，即逐步通过台湾政权台湾化的途径，建立一个由台湾人控制的代议制政府，台湾的政权一旦掌握在台湾人手里，美国就可以运用它，设法就台湾的最终法律地位问题与中国对话"。"美国认为，最终应造成一种政治局势，使中国大陆同意和平的台湾独立。"（14） 30年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完全就是按照这条思路展开的。到21世纪初，美国一边喊着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边又在制订所谓"加强与台湾关系法案"；一边主张中国和平统一，一边又在公开出售先进武器给台湾。美国的狼子野心，世人皆知。作为中国人，我恨透了美国。要问世界最无耻的国家是谁？那肯定是美国。

但是，毛泽东说过，"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没有台湾分裂分子，也就没有美日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不顾历史潮流大搞分裂，台湾某些人必将落为人彘。

国家要强盛，统一是前提。我们应当以"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准则，走向统一。世界上，许多地域狭小的国家，为抗衡美国霸权的威协，纷纷建立联盟，如欧盟、东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等等。德国为了强盛，避免东西的挤压，迅速实现了统一。而我们时刻处在字母文化的包围和重压之中，不思内和，而继续对立。

1997年和1999年，香港和澳门先后回归了，高兴之余，应作静思。香港不是XiangGang，而是HongKong；澳门不是AoMen，而是Macau。两地除了国防、外交以外，其它相对独立，高度自治。这让人想起在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雅尔塔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希望--香港成为归还中国的国际自由港。如果台湾不能实现统一，港澳将有什么变化？"香港的命运取决于中国的形势。指导1997年香港向中国过渡的中英条约对某种事情给予了肯定--一个国家，两种经济制度--但它解决不了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实行两种不同的法规，让其中一个城市里的居民富有，而让另一些城市里的居民保持贫穷，应该实行统一的法规。"（15） 我们做得到吗？

由于台湾在日美势力的支持下，还存在顽固的分裂分子。所以，中国不承诺放弃武力，也是势所必然。"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必然背景是：一方面，在西方所谓民主和平旗号之下，竭力主张和平解决台湾

问题（如真能尽快和平解决，中国巴不得），而西方又在其民主和平旗号的背面支持台独势力长期不进行和平统一谈判，以造成长久分裂的事实；另一方面，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又使中国走上了历史的老路。正如历史学家葛剑雄教授所指出的：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统一都是以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而实现的，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和平统一，或者双方经过谈判实现平等的合并。历史上的南北朝，最终都是北朝吞并南朝，连宋辽对峙的结局也是北方辽的继承者金灭了南方的宋朝（16）。

目前，很显然，如果出现台湾分裂的突发事件，直接的军事手段不可避免；如果台湾长期不进行和平统一谈判而满足美国所要求的保持现状，那么借助法律手段，比如通过制订《统一法》以实现"定期收回"（如果对方不进行和平统一谈判，最后也只有一战），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如果其它国家借机侵占台湾，那么事关中国命运的战略决战就可能随即发生。

所以，台湾问题不是一个可以长期搁置的问题，它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实现统一。因为，统一台湾是国家最高利益的需要；因为，台湾对琉球群岛及南海诸岛、对东亚、东南亚乃至整个亚洲东部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都具有无可比拟的战略重要性；还因为，从整个历史看，解决台湾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国内单纯的统一问题，而是事关民族存亡和国家兴衰的绝对大事。

---

（1） 《清代通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2）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204页。

（3） 取自朱大渭主编，《图说中国通史》，第9册，九州图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4） 莱斯特.瑟罗，周晓钟等译，《二十一世纪的角逐——行将到来的日欧美经济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79页。

（5）取自朱大渭主编，《图说中国通史》，第9册，九州图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6）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154页。

（7） 翦伯赞，《先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第129页。

（8）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4卷（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第685页。

（9）《史记.秦始皇本纪》。

（10）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4卷（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第685页。

（11） 参见井上清，《中国钓鱼岛：历史与主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12） 《后汉书.东夷传》。

（13） 卡莱尔，《文明的忧思》，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3篇第16章。

（14） 转引自何新《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463页。原载香港《明报月刊》1988年1月“台湾淡入后蒋经国时代”一文。

（15） 莱斯特.瑟罗，周晓钟等译，《二十一世纪的角逐——行将到来的日欧美经济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221页。

（16） 葛剑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余论”，《学说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期。

**********

## 第二节　　南部：南海及中南半岛

孙子曰： 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1)

南海就是当今东亚乃至整个太平洋西岸的"争地"和"交地"，更是中国争取天下的"衢地"。很幸运，中国这个在历史上不善于征战海洋的国家，"先至"而有南海之"衢地"。

南海，地处中国东南部，总面积393万平方公里。它不但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而且还是中国南方的"聚宝盆"--海底油气面积72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青海省的面积，总量达600亿吨。其中，在我国南海群岛海域就有420亿吨，有"海上中东"之誉。并且，据勘察，在南海海底存在巨大的"可燃冰"带，能量总量估计相当于中国石油总量的一半（"可燃冰"是天然气被包进水分子中在海底形成的透明晶体。1立方米可燃冰释放的能量约相当于164立方米的天然气能量）。也正是因为如此，引来了周边国家的"眼红"，竟相侵占我南海岛礁海域。在中国南方形成了一个严重的地缘政治问题。

在南部侵占我南海岛礁海域的国家包括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等国。

菲律宾自1970年以来，侵占了我南沙马欢等6岛1洲1礁。

马来西亚从1977年开始，先后在南沙海域侵占我弹丸岛等10个岛礁。

文莱在南海海域侵占了大约5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其8个油田中，就有2个在中国主权海域之内。

越南是侵占我南海海域、岛礁最甚的国家，从1987年以来，侵占我岛礁数达27个之多，现仍不时挑起事端，侵占我岛礁、海域，并派军队管制、设置行政单位，企图使其侵占永久化。

这些小国竟相侵占我国南海，搞得南海像公海。海南就像是现代中国的"唐僧肉"，什么人都想啃一口。他们之所以敢于在南海为所欲为，侵占一个大国的领土和领海，一是有外国势力撑腰，二是盱我国政府目前没有精力或者没有能力整治南海。如果中国强大到具有足够

的力量，能够杀一儆百，控制国有领土、领海，小国何敢妄为！然而，现在有各种内外因素在制约着中国，使这些小国暂时得逞其阴谋之志。但是，我们相信中国不会永远贫弱，南海终究不是"唐僧肉"。

南海诸岛包括南沙群岛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这个地方既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在，更是作为一个大国的战略基地所在。任何使中国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受损害的做法，都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任何使所谓的"南沙问题"国际化、南极化、侵占合法化、主权多极化的主张，都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干涉和侵犯，中国人民坚决不答应，并将为此而斗争到底。

在中国南方，越南和老挝就像朝鲜一样，和中国是一个唇齿相依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他们大部分时间，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从秦始皇时候起，越南北部就是中国的领土。到汉朝时期，中南半岛的根部，包括现在越南大部、老挝和缅甸北部等地，均是中国的一部分。元朝时，曾统治了中南半岛包括泰国北部在内的大部地区。直到后清末年，中南半岛上的越、暹罗（即泰国）、缅等国仍是中国的属国领地。其人民属于中国先民之后裔。后来，在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辱之时，法国侵略者踏上半岛后，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给半岛诸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24年，孙中山曾说到那时他们的感受：

十余年前，我有一次在暹罗的外交部和外交次长谈话，所谈的是东亚问题。那位外交次长说："如果中国能够革命，变成国富民强，我们暹罗还是情愿归回中国，做中国的一行省。"(2)

到孙中山讲这个故事时，泰国已经取得了独立。当然，从那以后，泰国不可能再回到中国了。但是，发生在1997年，起于泰国的金融危机，再次让半岛人民认清了西方国家的阴险，再次认识到了中国和半岛国家关系的重要性。有一首名曰《越南--中国》的歌曲唱道："越南--中国，山连山，江连江"，"共泳一江水，早相见，晚相望，清晨共听雄鸡唱。"可是，中越之间的现实并非如歌中所唱的那么美妙：与中国具有相当长的共同历史的越南，其所作所为，堪为数典忘祖。她总是忘记中国的真诚帮助，胳膊总是往外拐。不说她古代属于中国的历史，就说现代，自19世纪末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后，中国倾全力支越抗法，在中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还取得了著名的"奠边

府战役"的胜利，迫使法国撤出越南；1955-1975年，新中国在自身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支越抗美付出了巨大代价；1965-1968年应越南要求，中国派出了多达30多万人的部队帮助其建设防空工程和后勤工作等，并提供了价值200多亿美元的无私援助。可是越南的回报却是：

1、1978-1979年，信别国挑拨，视中国为敌人，发生边境战争；

2、在20世纪70-80年代，大肆迫害和驱赶华侨；

3、扩大中越陆地边界和南沙海域争议地区，不断侵占我南海岛礁，2003年越南还在南沙举行所谓"解放南沙"28周年大会。

越南，古为交趾之地。 西历679年，中国唐朝曾于其地设"安南都护府"，故又称安南。还曾有大瞿越、大越等国号。1802年,阮朝的创建者嘉隆王阮福映请求改国号为"南越"，1803年中国清廷封他为"越南国王",越南之名始此。1838年起又称大南。1945年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1976年改称今名。

约在西历前 4世纪，原是中国百越人的一支雒越人占据红河中下游一带。据越南古史记载，最早出现的国家先后有文郎国和瓯雒国，但都带有神话、传说的性质。西历前207年,中国秦将赵陀建南越国，于其地设置交趾、九真二郡。越南古史把南越国列入王统，称赵陀为赵武王，推尊为开国之君。西历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以其地设9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3郡在今越南境内。自此,越南正式纳入中国中央王朝的版图，经历了长达1000多年的"郡县时代"或"北属时期"。

从905年开始,在大约半个多世纪当中，越南先后出现曲承裕、杨廷艺、矫公羡、吴权、丁部领五姓的割据政权。其间吴权曾于939年称王，但944年他死后,各地封建主连年混战，史称"十二使君之乱"。

西历 968年,丁部领削平十二使君,建大瞿越国，是为越南自主封建国家立国之始。丁部领曾于973年被宋太祖封为交趾郡王,视为"列藩"。但直到1174年南宋封李英宗为"安南国王"，这个封建国家才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越南立国后，仍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保持"藩属关系"。丁朝(968～980)和取代它的前黎朝(980～ 1009)处于越南自主封建国家的草创阶段，为时较短。

1010年，李太祖（公蕴）建立李朝，定都升龙（今河内），定国号为大越，并仿效宋朝制度制定了中央和地方的官制。1225年李朝女

主被迫让位于其夫陈日煚。陈朝(1225～1440)开始统治越南。名将陈国峻（"兴道大王"）率领陈朝军民先后 3次击败了元蒙军队的统一战争(1257、1285、1287)。1258年,陈日煚禅位与其子，自称太上皇，13世纪末，在汉字基础上创造本国文字"字喃"。尽管如此，越南仍然尊汉字为正统，直至19世纪中叶后，法国殖民政府下令用拉丁化新文字为越南"国语"，废除汉字和字喃。而实际上，汉字在越南一直使用到20世纪前期，1936年才明令废除。但是，即使是今天拉丁拼音文字化的越南国语，仍然有很多源自汉语的词汇。

14世纪中叶后,陈朝开始衰落。1400年外戚胡季犛篡位自立，建胡朝（1400～1407）。1406年，中国明朝以恢复陈朝为名,派张辅率军进入越南,灭胡氏，设交趾布政使司(1414～1427)统治之。1418年清化土豪黎利举行蓝山起义，称平定王，反抗中国明朝的郡县统治，转战10年，逐退明军，1428年，建立了黎朝。黎圣宗在位时(1460～1497)达于鼎盛，但自1510年襄翼帝即位后,国势渐衰。1527年权臣莫登庸篡位自立,黎旧臣阮淦在清化、义安地区拥立黎维宁为帝(庄宗)，与莫氏抗衡，形成黎、莫对峙的"南北朝"(1527～1592)局面。1592年，南朝郑检之子郑松收复升龙,击败莫氏,黎朝复辟（实权握于郑氏之手）。1627～1672年间，又出现北郑、南阮的混战，其后以三灵 江为界，各自称王，长期对峙。

1771年爆发阮文岳、阮文侣、阮文惠三兄弟领导的西山起义，推翻黎朝的统治。

1802年嘉隆王阮福映建立了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阮朝。阮朝最后确定了现今越南的版图。10世纪中叶越南立国时，其疆域仅限于北部红河中下游和中部北区，只有现今版图的 1/4。通过连绵不断的侵略战争，至17世纪末鲸吞了占城国的全部领土，其疆域扩展至今越南的中部。南部原是柬埔寨的领土,至18世纪后半期才为越南所兼并。阮朝建立后，通过武力使柬埔寨为其"保护国"，同时继续侵略老挝。

16世纪初，西方殖民者的势力就开始渗入越南。18世纪末，法国殖民者帮助阮福映扑灭西山起义，对越南表现出十分露骨的侵略野心。1858年，法国借口保护传教士,伙同西班牙组成联合舰队,炮击岘港，发动侵越战争。从此，越南历史进入了80年抗法斗争时期。1862年法国殖民者迫使阮朝缔结西贡条约，割让南圻东3省。1867年侵占南

圻西3省。1873年入侵北圻，攻下河内城。1882年再次攻占河内。1884年签订越法顺化条约，阮朝被迫接受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中国军民奋起抗击法国的殖民侵略，曾在谅山一役大败法军，但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却于1885年与法国签订了《天津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宗主权"，从此，越南完全脱离中国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在越南被法国侵占的同时，柬埔寨和老挝也于1863年和1893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法国把越、柬、老拼凑成法属"印度支那联邦"。

1940年9月日本入侵越南,法国殖民者同意日军驻扎。从此,越南人民遭受日、法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1945年3月9日日本在越南发动"三九政变"，建立亲日傀儡政权，把越南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印度支那共产党抓住有利时机，发动总起义。阮氏末代皇帝阮永瑞(保大)宣布逊位。9月2日,胡志明主席在河内巴亭广场发布《越南独立宣言》，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

越南民主共和国刚刚诞生，法国殖民者又卷土重来，经过 9年浴血苦战，终于在1954年5月7日赢得了著名的"奠边府大捷"，迫使法国于同年 7月20日在《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上签字。越南北方全部获得解放。但在南方，美国粗暴破坏日内瓦协议，扶植傀儡政权，排挤法国殖民者并取而代之，越南南方人民被迫起来反抗。1960年12月20日成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民进行抗美救国斗争。1961年，美国悍然发动对越南的"特种战争"，遭到失败。1964年 8月制造"北部湾事件",开始轰炸和袭击北方。1965年3月，把侵越战争升级为直接出兵的"局部战争"。越南人民坚持持久的抗美救国战争，挫败美国的"战争越南化"的政策，迫使美国和南越政权于1973年 1月27日签订了在印度支那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但是南越政权不甘心失败，肆意破坏协定，不断进犯解放区。越南人民奋起反击，1975年5月1日解放整个南方，抗美救国战争胜利。

越南人本质上也是中国先民的后裔，他们是因近代长期分隔缺少往来而变成"越南人"的。尽管如此，有些时候，越南在中国人民共和国面前的所作所为，是缺乏远见的，更是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也因为如此，由于没有正确选择其发展道路，越南的发展历程也是异常艰苦的。

在中南半岛上，始终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恐怕只有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了。

缅甸，在中国史书上，汉称掸国,唐称骠国,宋称蒲甘，元称缅国，明始称缅甸。缅甸一名，掸人称曼(Man),孟人称缅马(Mirma)，英人称"Burma"，缅人自称" Myan Ma"或"Bama"，均自梵文"Brahma"而得名。

缅甸是多民族国家,大致可分为三大语族。最早徙入缅甸的,为孟－高棉语族的孟、崩龙、佤、克伦等族；其次，是藏缅语族的帖（今钦人）、干漾（今阿拉干人）、骠（今缅人）、克钦（景颇人）等族；再次是壮侗语族（亦称侗泰语族）的掸人、克耶人等。他们大约从西历前 9世纪开始，就先后从中国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陆续迁入缅甸。

据缅甸史记载，最早出现的国家为缅甸帖人的太公王国（缅名德贡），所以缅甸谚语有："缅甸历史从德贡开始。"其后，干漾人在今阿拉干建叫不当城，骠人在下缅甸卑谬建室利差口旦罗国（即骠国），而孟人则在直通建苏勿吒蒲迷国（即直通王国）。

据中国史书记载，西历前 2世纪，从中国航行到南印度的海船，要途经位于下缅甸沿海的诸地，并从西历 1世纪起，上缅甸和中国已有往来。今天的缅甸人，尊三国时期孟获为自己的祖先。以后到805年，骠国18国中一国弥臣国受封唐朝。832年骠国都城被南诏灭亡后,其居民逃亡到缅人聚居的蒲甘，渐同缅人融合。相传蒲甘城建于 849年，蒲甘王朝是缅甸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农业、手工业发达。1112年在妙悉提佛塔上，四面镌刻着内容相同的巴利文、孟文、骠文和缅文的碑铭，可见当时同时使用这4种文字。直到缅王那罗波帝悉都(1173～1210)执政后才统一使用缅文,缅甸历史始有缅甸文字可据。

蒲甘王朝覆灭后,缅甸进入封建割据的分裂时期,西部阿拉干宣告独立。东北部的掸族在推翻蒲甘政权之后,于1364年在阿瓦建阿瓦王朝。1531年缅人领袖莽瑞体建东吁王朝后，完成了缅甸的第二次统一。1752年终于以孟族占领阿瓦而结束了东吁王朝的统治。

1688和1709年英法两国先后在沙廉建立商站。1752年缅人领袖雍籍牙以上缅甸贡榜（今瑞波）为基地，举行起义，多次击溃孟人的进攻，各地首领纷纷来归顺，遂建贡榜王朝。1756年，雍籍牙进攻沙廉时，英国以武器援助缅人，而法国则援助孟人，竭力挑起民族战争。

因此，雍籍牙攻占沙廉后，捕杀了法国代表保尔诺，俘获法国船只和武器，并把法国人逐出沙廉。英国乘机于1757年和雍籍牙订约，占有尼格莱斯岛的通商免税权利。订约后,英国出尔反尔,竟以武器供给孟族，并阻挠缅甸与别国通商。1759年，雍籍牙就下令捣毁尼格莱斯岛的英国商站，把英国殖民者全部逐出该岛。

从1824年英国蚕食缅甸起，到1948年缅甸获得独立，这100多年的历史,是英国殖民者侵略、奴役缅甸人民和缅甸人民反侵略、反奴役，为民族独立解放而斗争的历史。

1942年5月日本占领缅甸。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简称自由同盟）于1945年5月1日收复仰光，不久光复全缅。

日本投降后，英国卷土重来，组织了一个不包括自由同盟在内的殖民政府（亦称行政委员会），遭到缅甸人民的反对。1948年1月4日缅甸脱离英联邦宣告独立，成立缅甸联邦，定都仰光。

老挝，在西历1～12世纪，老挝主要居民为孟－吉蔑人,他们建立起许多奴隶制小国，其中以川圹和甘蒙一带的西科达蒙较为强盛,中国史书称之为"堂明"。 西历227年,堂明王曾遣使到中国东吴聘问。 6世纪，真腊兴起，南并扶南，北兼道明（即堂明）、僧高诸国，今万象以南尽为其所有。8世纪初,真腊分裂为二：南部为水真腊，北部以今老挝地区为中心形成了陆真腊。陆真腊又名文单国。717～798年，先后四次遣使到中国访问。在文单北面，还有一些泰人部落，隶属于中国南诏地方政权。西北部又有女王国，与南诏和安南均有贸易往来。

9世纪初,水、陆真腊重新统一，真腊成为中南半岛强国之一。10世纪以后，相继迁入老挝地区的泰佬人开始兴起，建立了许多小国，以琅勃拉邦的孟斯瓦国最为强盛。1353年，孟斯瓦王子法昂在真腊帮助下，统一老挝全境，建立了以佬族为主体的封建国家——澜沧王国（又称南掌王国）,首都为琅勃拉邦。其疆域东界安南（今越南）、东南连占婆（今越南中部），南接真腊（今柬埔寨），西邻暹罗（今泰国），西北及北部与缅甸、中国接壤，从而奠定了老挝的疆界。

15世纪，由于内部争权夺利和越南入侵，老挝一度衰落。1575年，缅甸第3次入侵老挝,将新都万象洗劫一空。苏里亚旺萨继位后(1633)，老挝国势重新振兴。1707年,因王位之争,琅勃拉邦脱离万象。

1713年下寮的占巴塞也宣告独立，老挝形成三国鼎立局面。1776年以后，暹罗控制老挝，越南则乘机控制川圹地区。

19世纪60年代法国开始向老挝渗透。1885年法国在琅勃拉邦设立领事馆。1893年以武力迫使暹罗签订《法暹曼谷条约》，把老挝并入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琅勃拉邦成为名义上的"保护国"，其他地区则由法国直接统治。

1940年9月,日军占领印度支那，法国仍保有其殖民机构和军队。1945年3月9日，日军以武力解除法军武装，夺取了殖民政权。不久,日本宣布投降,老挝抗战组织领导人民在各地夺取政权，并于10月12日宣布独立,成立以佩差拉亲王为首相,苏发努冯亲王为外交大臣兼革命军总司令的老挝临时抗战政府。1946年初,法军以武力重占老挝，恢复旧王朝。1949年 7月19日在巴黎签订的《法老协定》规定老挝为法兰西联邦内的独立国。1950年,各地爱国力量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建立新的"伊沙拉"组织（即老挝民族统一战线，简称巴特寮）。1953年1月12日，法国被迫承认老挝为独立国家。

柬埔寨，是地处陆海的重要通道，远古时代的一些部族从陆路或海上由此经过，进入印度支那腹地，或在东南亚沿海定居。西历前6～前5世纪，柬埔寨人的祖先－高棉人(又称吉蔑人)由中国云南南迁，在湄公河上游、孟河一带短暂停留后，分别向西南和东南方向移动，到达今柬埔寨和越南南部一带，建立了扶南国。

约西历 1世纪，一个叫混填的印度人来到扶南娶扶南最早的女王柳叶为妻,从而成为国王。3世纪,百姓共推大将范蔓为王。范蔓自称"扶南大王",兼并邻近各部族，并由海道向马来半岛扩张。3世纪时,扶南领有广大领土，成为统治中南半岛南部的一个强盛国家。其疆域大体约相当于今日的柬埔寨和越南的南部。

西历84年，扶南派遣使者到中国访问，两国以珍贵的礼品相互馈赠。这是史书所载两国最早的接触。中国三国时，两国交往更加频繁。

5世纪末到6世纪初，扶南开始衰落。 6世纪中叶，高棉人宣告脱离扶南王国而独立。中国史书称之为"真腊"。真腊国在 6世纪末或 7世纪初，战胜了扶南，建立起统一的高棉王国。8世纪初,由于内战,国家发生分裂。8世纪末，夏连特拉王朝趁机入侵，吞并了真腊王国。9世

纪初,门者　耶跋摩二世重新统一真腊。 802年定都于吴哥地区，史称吴哥王朝。吴哥王朝时期，真腊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成为中南半岛的一个十分强盛的国家。9～13世纪,高棉人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灿烂的吴哥文化。

1432年，暹罗人攻陷吴哥,柬埔寨国都向南迁移,两年以后,定都百囊奔(金边)。吴哥旧都从此荒芜。17世纪前期，越南人趁机而入，逐渐蚕食柬埔寨领土，力图实现对柬埔寨的控制和吞并。为此，越南同暹罗进行了激烈的争夺，终使柬埔寨处于越南和暹罗双重奴役的地位，成为它们共同的附庸。

1863年法国人强迫诺罗敦国王签署了丧失主权的法柬条约，把柬埔寨完全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1940年 9月，日本占领柬埔寨。1945年8月日本投降，10月，法军重新入侵柬埔寨，恢复殖民统治。1946年1月，柬埔寨和法国签订临时协定，法国放弃对柬埔寨的保护。1953年11月 9日，柬埔寨王国宣布独立。

我们回顾越南、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的历史，目的是想说明，这些国家与中国是有密切关联关系的，这种关系不是一种法律条文所规定的关系，而是一种长期的历史渊源关系。在现代国际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地缘（理）重要性又把这种关系推向了更为重要的层次。如果中国以及这些国家不能从这种关系中意识到其战略重要性，而反被阴谋国家所利用，那么，后果对谁都是灾难性的。邻近的越南、缅甸、老挝和柬埔寨是如此，华侨或者华人占有相当比例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也是如此。

在南海周边，我们力求谋求一种永久的和平，但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主权和国家利益。

---

(1)《孙子兵法.九地篇》。

(2)《民权与国族-—孙中山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第40-41页。

**********

## 第三节　　西部：新疆和西藏

西部问题集中在西藏和新疆的稳定和国土主权问题上。从南到北涉及到印度、锡金、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罗斯等九个国家。

在中国的西面，是又一个体现西方霸权国家那种侵略成性、损人利己、极端自私心态的地方。

◆1846年，俄罗斯侵入我西部巴尔克什湖东南的库克乌苏河地区。同年，印度殖民国英国，吞并克什米尔，将原克什米尔侵占去的我阿里地区的拉达克一同吞并。

◆1851年8月6日，俄罗斯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伊宁条约》，侵犯我们西部伊犁地区领土主权。

◆1853年，俄罗斯侵占我哈萨克草原地区。

◆1864年10月7日，沙俄动用大规模的军队，以以"打"逼"谈"的方式强迫清政府在塔尔巴哈台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借此霸占了我国领土44万平方公里。

◆1879年10月2日，沙俄强迫清政府在俄国海滨城市里瓦几亚签订专对伊犁问题的《里瓦几亚条约》，又称《伊犁条约》。中国丧失了伊犁西部霍尔果斯河以西和伊犁以南的特克斯河流域，以及北疆额尔齐斯河流域中斋桑湖以东地区和哈巴湖周围的大片土地和南疆喀什噶尔边界地区大片土地。

◆1881年2月24日，沙俄又强迫清政府签订有关伊犁的《改订条约》，中国又丧失了霍尔果斯河以西1.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斋桑

湖以东的地区。

◆ 1890年3月17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藏印条约》，掠占西藏春丕以南大片土地。

◆ 1895年3月，俄罗斯与英国狼狈为奸，背着中国瓜分中国萨阔岭以西帕米尔领土，俄罗斯侵占约2万平方公里。

英国、俄罗斯等欧洲列强趁中国衰弱之际，在中国西部侵土掠地的清单，还可以详细地写下去。对于失去的国土，我们应当保留追索的权利。1997年中亚五国元首会议期间，中哈两国议定，阿拉木山口地区154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中国。这是一个友好的开端。不过，它与我们失去的土地相比简直是象征性的。我们从中国传统历史地理角度看去，至少巴尔克什湖到斋桑湖一线以东以南地区（包括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部分土地）是一个完整的中国钺钟历史地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我们还未对过去的屈辱历史进行清算时，西方国家却早已开始了以所谓"民主自由、人权问题"为借口的图谋分裂西藏、颠覆新疆的罪恶活动了，而西藏和台湾的一些人还甘当"马前卒"。张文木博士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国西藏和新疆的真实用意进行了十分明确的分析。他说：

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能源依托在西部西藏和新疆地区，尤其是与中亚邻国接壤的西部地区。在这里有我重大战略利益，而中国特有的地缘特点，较之世界其它大国而言，最有利于我们去实现这些战略利益。

现在的问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冷战专家似乎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不惜用把中华民族再次推入波黑式分裂战火的方式来控制中国的能源供给。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则是把中国西藏和新疆地区从中国版图中分裂出去，从而造成中国与世界最大产油地中东的多重隔离－－这种情况在俄国那里刚刚变为现实，这反过来又会加剧中国与整个东亚，特别是日本对远东石油生命线的竞争，届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控制了世界石油的同时，还可以大作军火买卖－－这种情况己在中国台湾海峡两岸发生；战火过后再来一轮投资－－这种情况已在目前波黑重建工作中发生。真是既扮红脸，又扮黑脸，如此循环，何愁西方不富，如此轮回，看你东方何时复兴？这就

是当今美国部分政客们控制世界的秘不示人的厚黑真经，对此，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

对中国而言，控制了西藏和新疆的主权，就基本上贯通了通往石油天国之路；只要有源源不断的石油资源，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才有切实保证；相反，如果失去了西藏和新疆的主权，那么，中国在未来就永远是日本第二。那时的中国，就像美国人手中的气球，截断了能源线路，经济就会立即萎缩；那时的中华民族百年复兴战略就会变成一个遥远的梦，而近代经历过的屈辱历史，又会变成不远的现实。(1)

西方要影响中国西部，南亚和中亚是历史上著名的大陆跳板。过去英国人在南亚、俄罗斯人在中亚的脚印，今天的美国人早已烂熟于心。

我们先说说南亚地区问题。

就民族而言，西藏的藏族和汉、满、蒙、维、回等族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部分，藏汉同根。事实上，今天的藏族衍自古代的氐羌系统。1975年在藏东林芝地区发现的西藏第一个人类头骨，证明了藏族人为东方蒙古人种，而非印度雅利安人种。2000年，中国复旦大学、云南大学以及美国德州大学、哈佛大学、斯福坦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十多位科学家合作研究，通过对中国22个省市的汉族人群以及云南、西藏、青海等地的藏族人群的男性Y染色体类型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汉族人群和藏族人群具有共同的特异性Y染色体，而这种特异性Y染色体的类型在世界其它人群中很少见。主持该研究项目的复旦大学金力教授说："这从分子遗传角度充分说明了现代汉族人和现代藏族人的祖先属于同一起源。"因此，藏族不是来自它域文明，西藏也不是中国侵占的别国土地；藏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支，西藏是我们的祖居之地。

在西藏及其南面的边缘地区，主要包括三个问题：中印边境问题、外部势力支持西藏分裂主义分子问题以及外部势力对不丹、锡金和尼泊尔三国的干涉问题。

**近代以来，印度由于改变与中国长期的和睦相处政策，转而在干涉（或者干扰）主义政策和与中国和平共处政策之间走钢丝，使这三个问题变得异常复杂。从20世纪初开始，印度开始武力入侵中国领土，导致两国在1962年兵戈相见。对印度执行的干涉主义政策，我们留待第10章去讨论。这里，回顾一下，英国和印度对我藏南以及不丹、锡金、尼泊尔三国的侵略历史，对了解中国西藏南面--南亚地区--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是很有帮助的。**

藏南，这里指在东经92度至97度之间，喜马拉雅山脉南坡约9万平方公里的大片地区。这片地区在夏季迎印度洋吹来的西南季风，温暖而多雨，年平均降雨在9000毫米以上，可种植许多亚热带经济作物，有前藏"江南"之称。

然而，这块宝地却从英国在西历20世纪初侵略中国西藏开始，至21世纪的今天成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一块巨大争议之地。问题的原由，起自在英国支持下的英属印度殖民地政府一手炮制的所谓的"中印边界线"--即"麦克马洪线"。所谓"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西藏一个地方代表团与印度政府外交秘书亨. 麦克马洪在德里所作的一桩未经授权的秘密交易的产物，麦克马洪以威逼利诱（表示愿意支持西藏反对中国中央政府）的手段，说服西藏人同意了一种边界划法--把边界线向北推移了大约100公里。"这条所谓的"中印边界线"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其合法性，即使英国政府也没有把它作为实际的中印边界线。但是，印度独立以后，却当了真，从1950年开始，印度军队开始向北推进，到1953年，印度全部控制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并鼓励印度人入住该地区。1962年，中国政府忍无可忍，进行了军事还击，打败和击退了印度军队，收复了失地。

遗憾的是，中国却莫名其妙地在失地尽复的情况下，将军队悉数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即"麦克马洪线"）北20公里，这实际在事实上承认了"麦克马洪线"的存在或有效。后来，印度人又回到那里，耕作建设，繁衍生息。中国还击战发生在我出生的那年，现在我已年四十有余。作为世界"人口首富"的中国，我们正在日益减少的耕地上拼搏奋

斗，而我们却将9万余平方公里"美丽而又富饶"的土地拱手让给了别人，这块本是中国领土的地区却在事实上成了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想起来真不是滋味。难怪有人发出了"伤心藏南"的无限感慨。

据估计，今天在这块土地上居住了600-700万的印度人。如果真如人们所想的：1962年不撤回来，向那9.2万平方公里肥沃富庶的地区移民几百万同纬度内地汉族人口，那么我们今天至少要减少1000万的贫困人口。同时，这个结果会在前藏和印度之间建立起一条永久的中华文明的血肉长城，这不但可以防止西藏的分裂可能，更可以抑制印度在南亚的嚣张政策和抑制其对中国的干涉政策。(2)

我们中国人是怎么了？1883年开始的中法战争，1885年在清政府的姑息退让中，法国侵略军从越南一直打到镇南关（今友谊关）前，年近70的老将冯子材和"全军将士异常感奋，跟随着扑向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法军大败溃退。当地壮、瑶、白、彝、汉等各族人民和1000多名越南人民也赶来助战。冯子材率各军乘胜追击，取得了重大胜利。法国侵略者称这次战役是灾难性的失败。……但是，清廷的本意是求和，'时时为和计'，最终在胜利声中屈辱议和。"(3)

这是中国清末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然而，让我们困惑的是，我们这个把推翻"三座大山"为己任的共和国，却也在不断对中国领土进行蚕食的帝国主义（三座大山之一）面前泄气了：

我们口头上和地图上不承认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但1962年我们又为"和平计"，主动"让出"9.2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给印度。当年冯子材镇南关大捷，使当时的法国政府倒台，清政府在世界上开创了一个胜者向败者求和的战例。1962年，中国军队以近乎神奇的力量收复了自己的领土，可我们却在胜利声中迅速"凯旋"原地，更让世界目瞪口呆。

近代以来，中国的"慷慨大度"和步步退缩与帝国主义的"斤斤计较"和孜孜进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别的国家不远万里来到我们面前耀武扬威，我们似乎同意了他们在这里确实具有其所谓的国家利益，而我们的步步退缩也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似乎同样合情合理。那么，眼见周边的重重矛盾，什么时候有个完满的结局呢？

不丹，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麓，在前述"藏南"的西头。"不丹"一词源于梵文Bhotaanta,意为西藏边陲。

不丹乃隋之薄绿夷，贡隋为属。西历650年后，不丹并入吐蕃，不丹人绝大部分为藏裔。此后，吐蕃王朝统治不丹达200多年。元明清以来，不丹一直是中国属国之一。1616年,西藏佛教竺巴噶举派领袖阿旺.纳姆伽尔喇嘛到达不丹，先后战胜宁玛、拉巴、南因巴等教派,竺巴噶举派成为不丹的国教。阿旺·纳姆伽尔是第1位统一不丹的人物。他自封为沙布隆(亦称法王)，即最高宗教和政治领袖，集神权、政权于一身。1650年成立宣政院（又称伦吉措克），管理国政。其最高官员称德布（亦称天王）由贵族选举产生。不丹成为一个僧俗同掌政权的封建王国，由宗教领袖沙布隆和世俗领袖德布王执掌国政。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

18世纪后期，英国开始侵入不丹。1774年4月25日,英国殖民主义者迫使不丹签订《东印度公司和不丹和平友好条约》。1864年11月，英印政府向不丹宣战，不丹战败。双方于1865年签订《辛楚拉和约》，不丹被迫割让2000平方公里领土；英国每年付给不丹 5万卢比的津贴。1910年，又签订《英国不丹友好条约》，规定不丹在对外关系上接受英国政府的"指导"，英国每年给不丹的津贴增为10万卢比。从此，不丹受英国殖民者的控制。

1907年12月17日，乌颜·旺楚克被拥为国王，称竺加布。取消沙布隆职衔、废除德布王,宣布国王世袭,集政教大权于国王一身，结束神权、政权并存的历史，开始了旺楚克家族的统治。1949年，印度与不丹签订《印度不丹友好条约》，规定不丹对外关系接受印度的"指导"，继承英国在不丹的特权。

1952年，旺楚克家族王储吉格梅·多尔吉·旺楚克继任国王。1968年,国王在第一次赞都会议上宣布不丹为君主立宪国； 20世纪60年代初，不丹首相公开宣布，"不丹不是印度的一部分，它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锡金，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自古以来是南亚通向中国西藏地方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相当重要。锡金，古称哲孟雄，雷布查人是锡金最早的居民,属蒙古人种，自古属西藏属部。在8世纪前，他们就生活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面山坡地带。

锡金有确切记载的第一代国王是蓬楚格·纳姆伽尔，其曾祖父是西藏的贵族古鲁·塔希。蓬楚格于1642年登上锡金王位，他将首都建在甘托克。西历1720年（清康熙59年）内附中国。

18世纪期间,锡金多次受到尼泊尔和不丹的侵犯,但是第三代国王查多尔·纳姆伽尔(1700～1717在位)竭力维护着锡金的独立地位，保存王国的核心地带。1835年英国人割据大吉岭和兰吉德河以南的地区，1861年迫使锡金签订条约，将锡金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1887年，英军强占锡金。1890年，锡金正式沦为英国的"保护国"。

英帝国主义退出南亚地区后，1947年印度独立，中国本可收回锡金。因当时中国处于内战时期，1947年印度便与锡金签订《维持现状协定》，1949年 6月，印度政府派兵进驻锡金。1950年12月 5日，印度与锡金签订《印度和锡金和平条约》，规定锡金为印度的"保护国"。

1968年8月,甘托克发生反印示威后，锡金的第12代国王帕尔登.顿杜普.纳姆伽尔（1963～1982在位）提出锡金要锡金化，要求修改1950年的印锡条约。

1973年4月,印度军队开进甘托克，接管锡金政府的一切权力。

1975年4月9日，印度军队解散锡金国王的宫廷卫队，国王被软禁。4月10日,锡金议会通过决议废黜国王，把锡金变为印度的一个邦。4月14日,锡金又为此举行"公民投票"。印度议会也通过决议把锡金变为印度的一个邦。

1982年 1月29日帕尔登·顿杜普·纳姆伽尔在美国纽约去世。王储旺楚克·滕辛·纳姆伽尔继位。他表示，印度吞并锡金是非法的。

直到今天，不丹和锡金的地位仍是一个非明确的问题，它们是南亚的两个重要变数。

我们再来看看"中亚三角地带"。

如果我们手里有一本世界地图册，我们就很容易找到以阿富汗（Afghanistan）、巴尔克什湖(Balchas sea)和咸海(Aral sea,原名阿拉湖)三点连成的"三角区"，我们可以简称为"阿巴咸中心地区",即ABA地区（如图9-3），这里，实际就是整个欧亚大陆岛的中心地带。ABA地区现在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斯坦共计6个"斯坦"国家，形成一个倒三角地理结

构。它的周围同样有六个国家：俄罗斯、蒙古、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和阿塞拜疆。

以前的西方政治家和地缘政治学家，对主宰或者影响世界的中心地区，有不同的议论。例如，俄国彼德一世认为，印度是世界的仓库，"君士坦丁和印度，谁统治那里，谁就将是世界的主宰"；后来最著名的观点认为，欧洲的东欧平原是欧亚大陆这个世界岛的心脏地带；也有认为环地中海地区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地区；比较接近ABA地区的观点是由20世纪初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寇松提出来的，他说："阿富汗、里海以南的地区、波斯湾……对我说来是一局正在下的棋盘上的方格，这盘棋的赌注是世界统治"；最接近ABA地区的观点则是美国战略理论家布热津斯基在其于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一书第5章中提出的，他把中亚六国称为"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包括中亚六国和高加索三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明确地指出了中亚六国极其重要的核心战略地位。但是，他的"巴尔干"概念显然不是传统的世界地理中心的概念，他把传统的世界地理中心概念扩大为整个欧亚大陆，这自然是他自大地认为美国已经完全通过控制欧亚大陆三个周边地区从而达到了控制欧亚大陆以及全世界的观点的延伸。

图9-3 欧亚大陆阿巴咸（ABA）中心地区

事实上，人类社会文明的结合部或者世界岛的地理中心，不在别处，正是阿巴咸地区，即中亚六国地区。而恰恰是中亚地区一直是"东西方文明的桥梁"或者称为"跳板"，处于古丝绸之路的核心地段。阿巴咸地区不仅处于欧亚大陆的地理中心地带，而且这个地区演变成了一个自然的人类社会分界区域，其地理特征从南到北，是一个从高原到低地平原的倾斜结构，在世界历史和现代国际社会中，其战略地位异常突出。这个地区东可以限制中国西进，南可以通向波斯湾，西可以阻止欧洲东进，北可以遏制俄罗斯扩张。在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要地。

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国人曾两度完全统一过ABA地区，便产生了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中华大帝国。一次是唐朝，一次是元朝。

西历657年，唐朝破降了处于分裂状态的西突厥后，统一全中国，完全控制了阿巴咸地区。唐朝因此成为地域巨大的世界性大帝国，整个国家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延续了几百年。美国世界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是这样来记述唐朝的空前盛况的：

京城设有三个最高管理机构，它们是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直接在皇帝的领导下工作，制定政策；门下省审议中书省的决议，必要时，将决议驳回中书省重新考虑；尚书省负责贯彻执行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决议。尚书省设六部：吏部、户部、兵部、刑部、工部、礼部；礼部被授权掌管文职人员的考试。

京城长安是这些及其他一些管理机构的所在地，是一座约1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宽阔的大道纵横交错，大道上时常挤满了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各种中亚人。他们是作为商人、使节和雇佣军来到中国的。对外国人来说，除蒙古人的元朝这段短暂的时期外，唐朝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加开放。(4)

西历1279年，中国蒙古族政权经过73年的征战，在中国境内，终于一个个消灭了南北分裂的金、夏、西辽、宋、大理、吐蕃等政权；向西跨越中亚、西亚，深入欧洲，建立了人类旷古未有的世界性大一统帝国--蒙元帝国。中国蒙古族元朝的成功，与其迅速占据阿巴咸地区不无关系。对于元帝国的空前盛况，侍奉忽必烈17年的马可.波罗这样写道：

忽必烈是"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到现在。人世间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统治者，他拥有的臣民最多，土地最广，财富最充裕。"(5)

然而，蒙古族政权在阿巴咸地区以及以西地区没有建立统一的行政机构，而是分为四个相对独立的宗族诸侯国。更为错误的是：蒙古族政权在阿巴咸地区，没有统一于一国之内，而是由三个宗族国分别控制，钦察汗国在北，窝阔台汗国在中，伊利汗国在南。这就决定了蒙古族政权的快速分裂命运。

不过，蒙元帝国的历史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这个大帝国导致了三个重要的结果：一是人类意识到了阿巴咸中心地区的重要性，开始主动向这个地区扩展。后来沙俄的对外扩张就是从这个地区开始的。二

是中国蒙古族像汉族向东南亚迁移那样，向西大规模迁移，遍布中亚和东欧地区。三是中国各种文明，特别是技术文明通过ABA地区迅速传遍中亚、西亚和整个欧洲。中国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大量技术就是在这个时期及其以后大规模传播到西方的。

中国从汉朝时候开始至今，除唐、元两朝外，其它朝代都是部分控制这个地区，因而这些朝代的世界性影响也就远不及唐、元两朝。后来，西历19世纪60-80年代，俄罗斯和英国曾在ABA地区展开激烈的争夺，最终谁也没有取得绝对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俄罗斯苏联提供了控制ABA的机会，在大战中胜利的俄罗斯-苏联通过扩张，完全占据了该地区的三分之二。即便如此，那时的俄罗斯-苏联已成为地球上影响巨大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学说，本质上是以欧洲中心论为基础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处于西亚与欧洲中间的叙利亚地区和处于东亚大陆与西亚交汇的中亚地区是世界两个自然赋予的"交通中心广场"，他甚至认为里海、咸海和巴尔喀什湖地区是"第二地中海"的遗迹。(6) "中亚（地处当今的阿富汗和前苏联的中亚地区）正好是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心点。中亚是包括中国、印度、波斯、美索不达米亚、黎凡特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在内的世界体系的关键地带。"(7) 自古以来，ABA地区是中国、印度、古巴比伦、埃及四大古代文明的交汇点。发展到现代，这个地区又成为汉字文化、字母文化和图形文化的交汇点。汉字文化，就是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居其东面，宗教是中式佛教；字母文化，就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不同语言的文化，如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等，居其北面、西面和东南面，北面是基督东正教俄罗斯，西面是基督天主教欧洲，东南面是印式佛教；图形文化，就是既不是汉字文化又不是字母文化的阿拉伯文化，居其西南面，宗教是伊斯兰教。因此，顺着亨廷顿的观点，未来世界的主要冲突，将是以这三种文化、三种宗教为主体的冲突；并且这种冲突在三种文明交汇点上--ABA地区--将更加激烈。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这个广阔的地区经受着爆炸性仇恨的冲击，又处于相互竞争的强大邻国的包围之中。它有可能成为一个主要战场，在这里可能爆发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更可能爆发长期的种族和宗教暴力冲突。"（《大棋局.第2章》）不过，需要为布热津斯基补充一下，在这些可能的冲击、冲突以及战争中，美国一定会扮演一个最重要的角色。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在中亚的行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为了争夺阿巴咸中心地区，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在二战以后稍作休息，就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该中心区的外围地区如波斯湾、红海、黑海等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二战以后，美国通过支持欧洲、埃及、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等国，借以广泛影响阿巴咸中心地区西南面的阿拉伯世界，苏俄则通过控制东欧和中亚北部，左右世界的政治形势。为了获取一个决定性的格局，1979年12月，苏联借口阿富汗内乱干脆直接入侵阿巴咸地区的最后一角--阿富汗。结果，在美国的暗中干涉下，苏联的这一贸然行动变成了一场噩梦，陷入了中亚泥潭--阿富汗陷阱--而不能自拔。这件事件也最终成为苏联历史的转折点。

到1989年，俄罗斯-苏联不得不从阿富汗全部撤军，并从此走向衰落。甚至，1991年苏联解体后，原属苏联体系的塔吉克等国从苏联独立出来，庞大的"苏联"体系变成了真正的"俄罗斯"了。布热津斯基曾说：

苏联军队正式跨过阿富汗边境的那一天，我给卡特总统写信说：我们现在终于有机会给苏联一次越南战争。确实，在几乎长达10年的时间里，莫斯科不得不进行一场政府难以维持的战争--一场导致军队士气低落并最终造成苏联帝国解体的冲突。(8)

实用主义的美国，在阿巴咸中心地区看到的不仅仅是极度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他们当然还看到了巨大的潜在经济利益。据美国能源部估计，里海地区最终可开采的石油储藏量约2000亿桶，占世界石油总储藏量的16%。俄罗斯的退缩，正好给美国以机会，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便迫不及待地于1994年12月1日宣布向东扩张，美国借此把他们的军队推进到里海地区，并在那里耀武扬威。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美国再次找到了在ABA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借口。到2002年，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完了，可其军队在中亚的吉尔吉斯（马纳斯）和乌兹别克（汉纳巴德）建立了巨大而永久的军事基地。于是，ABA地区又成为21世纪初期公开争夺的热点地区。

现在，阿巴咸中心地区东有中国，北有俄罗斯、西有欧盟-北约，南有特殊的伊朗和巴基斯坦，未来情景变幻莫测。紧邻中亚ABA地区的中国新疆就成为中国西部的战略前沿。新疆，处于西方地缘政治"心脏地带"的"震中"位置。所以，在清末，为收回新疆立下万世功勋的湖南人左宗棠就说："保卫新疆就是保卫蒙古，保卫蒙古就是保卫北京。"真是：

要保大中华，勿亡漠北荒；

巩固大草原，生死在新疆；

识此人间计，唯我左宗棠。

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中国不寻求霸权，不搞扩张，但是维持阿巴咸中心地区的稳定，对保持我国在本地区的权益、开展广泛的经济利益往来和稳定中国西部特别是新疆都是极其重要的。有鉴于此，我们不但在西面要有积极的进取精神，去谋求潜在的经济利益，而且要在中国西部和中亚地区建立稳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关

系，阻止西方破坏性力量的继续东进，这是中国在21世纪于西面不可避免的"阻击战"。

---

(1) 张文木，“美国对华外交中的西藏新疆政策分析”，《中国国情国力》，1997年第6期。

(2) 参阅“我国为什么把九万平方公里肥沃的土地让给印度”等相关网文。

(3)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9卷，上海人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225-226页。

(4) 斯塔夫里阿诺斯，《世界通史》，吴象婴等译，上册，上海社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433-434页。

(5) 转引自斯塔夫里阿诺斯，《世界通史》，吴象婴等译，上册，上海社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385页。

(6) 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页。

(7) 安德烈.岗德.弗兰克等主编，郝名玮译，《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第99页。

(8)转引自威廉.布鲁姆，《谁是无赖国家》，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5页。

**********

## 第四节　北部：中国与外蒙古

北部问题就是"外蒙古"独立问题和苏联侵占唐努乌梁海地区问题。

原唐努乌梁海地区地处今外蒙古西部之北，1944年苏联以武力强占至今，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它实际应该是今外蒙古的一部分。

翻开中国的历史地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在的蒙古国，从西汉时候起就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在中华民族历史中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从西汉时期的匈奴部落建立"汗国"（首领和政府迁移不定，即首都（"王庭"）没有固定地点的"行国"）开始，其创始者冒顿就宣称他们是中国夏王朝的后裔，是中国的一部分。《史记.匈奴列传》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淳维，是夏后在商代的称谓，是匈奴的先祖。"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至汉初头曼子冒顿时期，方强大起来。以后，总是由偏居东北而崛起的中国小部落民族自东而西，迭代控制中国北方广大的游牧区域，由匈奴而大幕、由大幕而鲜卑、由鲜卑而柔然、由柔然而突厥、由突厥而回纥、由回纥而辽金、由辽金而蒙古、由蒙古而鞑靼，由鞑靼而满清。最后，在满清行将结束其历史命运之时，中国北方发生了另一种变化。

历史发展到了西历20世纪初，外蒙古地方，在国人忙着推翻帝制，进行革命之际，在沙俄政府的策划和支持下，于1911年12月由部分王公僧侣宣布"独立"。随后，侵蒙俄罗斯军队会同外蒙叛乱武装包围驻守库伦（乌兰巴托）的清军，并勒令缴械，清军被俄罗斯军队逐出外蒙。16日，库伦少数贵族正式宣布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并由活佛哲布尊丹巴任"皇帝"。这就是所谓的独立。实际上，这是俄罗斯侵略扶植的傀儡政权。1912年11月，俄罗斯与外蒙古傀儡政权签订所谓的《俄蒙协约》，把外蒙古变成了俄罗斯的半殖民地。1913年11月，在全国的抗议运动中，俄罗斯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议订五项《声明文件》及《声明另件》四款，中国始终没有承认外蒙古独立。1915年6月，卖国的北京军阀政府，与俄罗斯及外蒙古签订了关于"外蒙自治"的协约，俄罗斯仍然取得在外蒙古的若干特权。1917年后，苏联历届政府都支持外蒙古"独立"，1919年8月，苏维埃政府发表的《告蒙古人民书》甚至称"蒙古是个自由的国家，……任何外国人都无权干涉蒙

古内政。"1919年11月，活佛以请愿形式恳请中国取销自治，但他们在苏俄控制下已经不能自主。1921年3月，受苏俄控制的蒙古马列主义小组进行革命，并在北面成立"临时人民政府"，7月，苏联红军"应邀"占领库伦，年底占领外蒙古全境，并组织了君主立宪政府。虽然，在1924年5月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苏联仍然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但是，在苏联一直控制下的外蒙古"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是外蒙古成为除苏联以外的"非资本主义国家"。

1941年4月，斯大林与法西斯日本签订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苏日中立条约》，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我们不知道，后来中国以什么理由把斯大林作为"四大导师"之一！？但我们知道，正式这个被我们称为导师的人，于1944年强行吞并了外蒙古的唐努乌梁海地区，他把沙皇的侵略计划变成了事实；也正式这个被我们称为导师的人，1945年8月，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终于实现了沙皇时代就策动外蒙古独立的愿望，借国民政府承认外蒙边界现状而完成吞并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程序。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也默认了外蒙古独立的既成事实。从此，中国又失去了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国图就像被人重重打了一锤一样，曲线凹下，版图缩小，钺钟不存。外蒙古是我国一个从"自治"发展到独立为国的典型地区。

1950年2月，逃到台湾的国民政府，废除了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承认外蒙古独立（直至今天台湾的中华版图仍包括外蒙古）。这虽然有驾祸于人之嫌，但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不可忘却、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我们以为，面对外蒙古已经独立的既成事实，并非铁板一块。德国是在二战后分裂的，其西德和民主德国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承认的独立的主权国家。为什么他们能够统一？为什么他们能够很快统一？道理很简单，国家和民族利益第一的思想使他们再次走向了统一。蒙古族属于中华民族的重要一支。我们现在已走进现代科学和文明时代，文化继续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也应该有所增进，不能再受外国势力影响行事。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希

望不会像中国历史所一再表现的那样，分裂的政权老死不相往来，等到其中一个分裂政权强大后，再采用军事手段去实现全国统一。

我们为什么应该和外蒙古实现统一呢?

首先，蒙古族属于中华民族的重要一支，蒙古族在世界上估计约1000万人口。而内、外蒙古就有700多万人，占该族人口的70%以上。为了实现蒙古族的完整统一，中国和外蒙古应该实现统一。

第二，外蒙古地域从西汉时候起就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具有割不断的地缘关系。

第三，外蒙古独立是在原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操纵下产生的。现在苏联已经成为历史，我们寻求新的统一是情理之中的事，也是理所当然的。

第四，中国的强盛和人民的富裕是一个时间问题。外蒙古是夹在中、俄之间的内陆国家，要迈开两国搞好经济，显然是很困难的。如果中国和俄罗斯长期不睦，外蒙古就只能是长期封闭，而长期封闭的结果是，外蒙古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最后他们就会像历史上一再出现的那样，出现内乱。外蒙古一乱，必然进而影响中国内蒙古、华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稳定。因为，外蒙古的边境地区至北京的直线距离仅600多公里。所以，为了蒙古族和整个中国的稳定和繁荣，应该实现中国和外蒙古的统一。

第五，如果中国和外蒙古不实现统一，外蒙古很可能成为继台湾、西藏、新疆之后，外国势力影响和干涉中国内政的第四个地方。除此以外，如果中国和外蒙古不实现统一，问题很有可能反过来：外蒙古要求和内蒙古寻求统一。这个问题一旦提出，外国霸权主义者、军国主义者、扩张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就可能会利用这个问题大做文章，大肆干涉中国内政。在20世纪末，外蒙古所谓"泛蒙古主义"的出现就是一个预兆。我们应该有高度的警惕性。

第六，从国家策略看，把内部重点集中在改革开放上，继续做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改革；把大众关注的焦点放在边境地区，如像收回香港、澳门、统一台湾那样；把国际混乱阻止在国门之外，像阻止朝鲜战争、美越战争蔓延到中国境内那样，这将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集中我们的政治智慧解决中国与外蒙古的统一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第七，从中国历史发展角度看，当今中国北方的外蒙古，与历史上著名的北方民族一样，对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始终是一个"内耗式威胁"。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在中国北部边疆一个长期独立的地方政权一旦碰上一个有能力的统治者，给中国就会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如商和西周时期的鬼方、工口　　方；秦和西汉时期的匈奴、东胡；东汉和西晋时期的鲜卑、大幕；隋唐时期的突厥、回纥；北宋时期的辽、金、西夏和蒙古；明朝时期的瓦剌、鞑靼。当这些北方民族，在强大或者遇着天灾人祸时，就会不顾一切地南掠中原，使中原政权受到沉重打击。北蒙地区一旦出事，发展到军事行动时，即使取得军事胜利也是一种非常疲惫的胜利。自汉以来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个铁的事实。"中国对侵略者反击时，远征军必须作艰苦的深入，穿越翰海沙漠群，才能打击到侵略者的要害。远征军一旦撤退，游牧民族的力量就会立刻再度集结。这是中国所感受的最大的威胁所在，也是中国生命线所在。漠北跟中国合二为一时，中国才有安全。跟中国分离时，中国人不能安枕。"(1) 这是台湾著名史家柏杨的结论。因此，我们应该吸取历史发展的一再教训，要从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彻底解决外蒙古问题。

第八，从地缘战略重要性角度讲，外蒙古也是中国北部重要的防御阵地。如果外蒙古被它国完全占领，那么中国就会像现在失去朝鲜、越南那样永远不得安宁。解放军总后刘连昆少将曾在"艰难的抉择"一文中说："东北是中国地理的头部，但是由于外蒙古不合理地独立出去，东北就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地带，因为锦州以南辽西走廊一带，由于形状狭窄，很容易被掐断，当年与苏联交恶的时候，这里也成了中国努力加以防御的地带。"所以，外蒙古的独立，不但影响我国北方的稳定，而且还影响到我国东北的安全。故此，中国必须和外蒙古实现统一。

所幸的是，苏联时代仅仅是口头上把外蒙古称为它的第16个加盟共和国，并没有将外蒙古并入他们的版图。但是，对中国和俄罗斯而言，一个独立而不稳定的外蒙古，对谁都是一个不利因素。由于中国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东线和西线，而俄罗斯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欧洲的西线和在太平洋北岸的东线，在两国之间长长的陆地边界地区本应该建立一个长久和平的边界线（像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边界线那

样）。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条一劳永逸的边界线至今未能建立起来。所以，俄罗斯害怕外蒙古成为美、日、中等国制约它的后方基地；中国同样担心外蒙古成为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国制约它的肇事之地。1999年7月中国江泽民主席访问了外蒙古，之后，2000年11月俄罗斯总统普金也访问了外蒙古。可见中国和俄罗斯都具有这种忧患意识。

普金在访问中还和外蒙古搞了一个《乌兰巴托宣言》，俄罗斯和外蒙古在宣言中确认：两国不参加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联盟，不同第三国签署任何有损于对方独立的主权利益的条约和协定，任何一方都不能允许第三国借其领土达到实施有损于对方主权、安全和社会秩序的侵略或其他暴力行为的目的。

任何一个可以进行简单思维的人都明白，俄罗斯比外蒙古要强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与外蒙古签署具有排它性的协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俄罗斯要排斥第三方，而不可能是外蒙古为了防止第三者利用俄罗斯影响外蒙古。可见，这个协定的更远考虑是，俄罗斯要防止外蒙古和中国走向统一。

然而，作为一个独立的哪怕是夹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内陆国家，外蒙古不可能仅仅与中国和俄罗斯交往，它还可以与世界其他任何国家交往。所以，俄罗斯排斥第三者的政策显然是不可能成功的。2000年12月，在普金访问外蒙古不到1个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斯洛科姆就带着美元、武器和军事人员到了外蒙古。美国通过向外蒙古略施小恩小惠，建立军事联合以粉碎俄罗斯人的想法。事实上，美国一直在为外蒙古提供军备和培训军官，并和外蒙古搞联合军事演习。美国之所以热衷于在外蒙古大搞军事活动，主要是因为这个动作可以一箭双雕，可以同时影响中国和俄罗斯的后方，其中特别可以为制约中国从陆地找到另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由于历史方面的复杂原因，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和中国始终具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复杂观念，在偏见中杂含有大量的不信任、恐惧、甚至敌对心理。因此，这两个国家在发展上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的对立面角色，西方与这两个国家很难在协调一致中展开广泛的合作。怎么办呢？上苍保佑这两个国家，他们历史地紧紧埃在了一起。只要这两个国家能够清理历史遗留问题，消除心理障碍，在根本战略上使两个

国家连成一片，保持连绵不断的持久和平的地理边界线，那么这两个国家在世界岛上或者说在地球上将稳如磐石。

事实证明，当世界军事能力只能产生区域性影响时，苏联为了抑制中国而支持外蒙古独立，这是可以产生有利于苏联的自私选择。但是，这种有利显然是短视的。历史已经证明，苏联抛弃了中国这个最重要的伙伴国家，所以他失败了。在当今世界军事已经具备远距离立体攻防能力时，美国等国完全可以用美元开路，将军队投放到独立的外蒙古地区（如果外蒙古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内陆省份，那么这种可能性就等于零），从而达到影响俄罗斯和中国的目的。现在的事实已经证明，美国正是这样做的。外蒙古的独立，就像在中国和俄罗斯漫长的边界线上撕开一道裂口，让别国有隙可钻，有机可乘。所以，如果两个国家拥有共同的边界线，并且这条边界线对各自国家来说都是最长的，那么，这两个国家只能保持一种长期和平和稳定的真正的伙伴关系，而不应成为敌对国家，互搞攻击，互搞破坏，否则只能是两败俱伤，渔翁得利。

根据外蒙古独立的现实条件，可以预见，不管是谁在外蒙古挑起事端，最大的受害者除了外蒙古就是中国和俄罗斯。所以，为了整个民族和国家利益，中国和外蒙古应该实现统一，俄罗斯也应该明智地支持这个统一，并从中求得利益。

外蒙古虽然独立，但是外蒙古人民和内蒙古人民始终都是成吉思汗的后代，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版图虽分，但长城内外的蒙古民族拥有共同的几千年文明传统，加强民族的团结和联合，应该是我们的共同选择。

中国和外蒙古的统一，除了取决于外蒙古人民的历史性智慧外，还取决于中国和俄罗斯的长远国家战略政策。美、加两国，有没有领土争端？有。问题是，这两个国家，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并建立持久的和平国界线，使两个国家都有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治内治外都很放心。在中俄边界线上，俄罗斯先后侵占了我国18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外蒙古的独立也是苏联干涉中国内政的产物。因此，我们中国人不可能放弃索回我们固有领土的权利。我们倒是希望，俄罗斯人应该好好学习一下中国人的忍让德行和北美人建立和平边界线的明智做法，并从中求得益处。俄罗斯只有在与中国边境地区求得一个稳定的

和平局面，国家才可能稳定发展并尽快崛起。很明显，"俄国人从（二十世纪）60年代初期起，就面临一个十分可怕问题：可能与北约和中国发生大规模冲突。如果东西线战争同时发生，从一条战线向另一条战线调兵即使可能，也受到严格制约。就是战争只在一条战线爆发，克里姆林宫也不敢从潜在敌国边界部署有重兵的地区抽调兵力。"(2)但是，如果俄罗斯东南面有一个稳定、强大的中国，对其东拒日本北上、西阻北约东进、内助俄罗斯保持国内稳定则是一个坚定的力量。所以，在欧亚大陆这个世界岛上，两个地理大国--俄罗斯和中国（含外蒙古、不丹、锡金、尼泊尔、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国家）的陆地面积共计约3038万平方公里，占世界岛（欧亚大陆，不含欧亚岛国，面积约5140万平方公里）的59.1%--必须在建立具有长久和平边界线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紧密攻防联盟体系。在这个攻防联盟体系内，俄罗斯主要负责西线及中亚地区的战略安全任务（如果能这样，欧盟和北约就不可能像目前那样的肆无忌惮地东扩了），而中国则主要负责东线及南亚地区的战略安全任务（如果能这样，美国和日本在东亚就不那么像现在那样的嚣张了）。这就像我们经常在枪战电影里看到的两个协作伙伴背靠背组成的攻防体系：两个人，四支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未见有败者。所以，只有这"中俄背靠背攻防联盟体系"（中间没有不明确的第三者，互信而不设防，绝对靠近），才可以拯救俄罗斯和中国自己，才可以对美国及其仆从国试图建立一个在其控制之下的世界帝国形成一种必要的平衡和遏制，才可以确保俄罗斯和中国传统文化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各种潜在利益。从这个战略思想出发，俄罗斯西伯利亚的能源特别是石油输出，就只能有一条路线，这条唯一正确的路线就是中国路线。任何其它路线都将无情而后患无穷地损害俄罗斯和中国的国家及民族利益。希望当代俄罗斯的战略家们不要短视和忽略其盲点。

所以，俄罗斯应放弃过去那种扩张野心，归还中国领土，支持中国与外蒙古的统一，并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建立稳固的和平边界线，这对俄罗斯和中国来说都具有无法估量的积极战略利益。

总之，我们更欢迎，外蒙古和内蒙古，共同携手一道，撑起国图之"脊梁"，共同走向新的统一，为中华民族的再次复兴，为创造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而努力。

我们这个善于"铸钟"的民族，应该有光复失地的智慧，应该有修复中国传统钺钟历史地理的决心。

我们应该和蒙古实现完整的统一!

至此，我们按照东南西北顺时针方向沿中国国界审视了一圈，应该为我们的奇特旅程作一个小结了--我们自古以来有多少领土被分裂和侵占?

被分裂的领土（或战略安全地区，未含领海及缅泰部分）：

1、台湾　　3.58万平方公里;

2、蒙古　　156.65万平方公里;

3、越南　　32.96万平方公里;

4、老挝　　23.68万平方公里;

5、不丹　　4.60万平方公里;

6、锡金　　0.71万平方公里;

7、朝鲜　　22.22万平方公里（含韩国）;

合计　　244.40万平方公里领土。

被侵占的领土:

1、贝加尔湖以南及其西南　约10万平方公里（1727年《恰克图条约》俄罗斯侵占）;

2、库页岛　约31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1790年俄罗斯暗中侵占）;

3、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　约60万平方公里（1858年《瑷珲条约》俄罗斯侵占）;

4、乌苏里江以东　约40万平方公里（1860年《北京条约》俄罗斯侵占）;

5、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　约44万平方公里（1862-1864年俄罗斯逐步侵占，现分别由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实际控制）;

6、帕米尔高原之六"帕"　约2万平方公里（1884-1873年俄、英侵占，现由塔吉克斯坦实际控制）;

7、琉球群岛及钓鱼岛　约94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约0.5万平方公里，1895年以后日本侵占）；

8、中印边界中段　约0.2万平方公里（1951年后，印度侵占）；

9、前藏南方　约9.2万平方公里（1962年以后，印度侵占）；

10、唐努乌梁海　约17万平方公里（1944年苏俄侵占）；

11、南沙群岛　约80多万平方公里（群岛有岛礁50多个被侵占，其中越南侵占27个岛礁，菲律宾侵占8个，印度尼西亚侵占2个，马来西亚侵占10个，文莱侵占1个）。

共计387.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及领海被侵占，其中仅俄罗斯就侵占去18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现在实际控制约137万平方公里），占被侵占陆地面积的90%以上。到21世纪初，中国被分裂和被侵占的领土及领海，粗计至少有631.8万平方公里，占今天实际领土和领海面积1260万平方公里的50.14%。

按照历史发展特点以及地缘政治观点，一般而言，周边邻国越多，边界问题越复杂，爆发战争或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我们不能尽快收回我们的固有领土和领海，或与这些地区形成共同利益体，那么我们只有两种未来：或者在软弱中被逐步蚕食，如南沙、钓鱼岛等；或者在冲突中被鲸吞，如东北、藏南等。

---

(1)柏杨，《中国人史纲》，上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帝40-41页。

(2)保罗.肯尼迪，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618-619页。

**********

# 第十章 反霸图存的危机与策略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部，北接俄罗斯，东临太平洋，毗邻日本，南尽南海，西至帕米尔高原。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居住在这块东隔于海洋、南阻于高山，西抵于高原，北止于荒漠的相对稳定的钺钟历史地理之中。然而，从西历19世纪开始，我们长时间遭受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直到今天，霸权主义、军国主义、扩张主义以及干涉主义，仍在威胁着中国的生存和安全。推行不结盟政策的中国在第66世纪反霸图存的使命，将任重而道远。

## 第一节　世界帝国论

在世界历史上，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但丁开始，直到现在的西方战略家，都从理论上明确提出过有关世界帝国的思想，在行动上先后有许多人试图建立世界帝国，但都因种种原因而失败了。现在，美国正在为实现这个"理想"而不遗余力。

世界帝国思想的萌芽，最早可追溯到西历前三世纪古希腊斯多葛哲学学派的"世界国家"概念。它们主张以世界理性为主宰的世界一体说，认为既然人类是一个整体，就应该只有一个国家，即"世界国家"。当然，由于知识的局限，他们的世界国家不可能是全球性，而是寻求他们周围几个国家的某种联合。

第一次专门论述世界帝国，主张建立世界政府的是意大利诗人但丁，他专门写了一本系统论述其政治思想理论即建立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思想的书：《论世界帝国》。他认为，全人类文明的普遍一致的目的，是全面地、不断地发展人的智力，使人类在一切学科和艺术方面有所作为，有所创新。要实现这一目的，需要世界和平，而要实现世界和平，就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国家。只有在这样的世界帝国里，才能解决世上所有的国家之间的纷争，实现和平与正义的统治，充分发挥人的智能，使其过上幸福的生活。(1) 他在书中，从人类活动

的目的、部分与整体结构、国家与民族、争端仲裁等若干方面论证了建立世界帝国的必要性。他的世界帝国政治思想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六百多年来，影响了若干西方思想家、政治家和阴谋家。

后来的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卢梭、英国政治思想家边沁、德国古典哲学大师康德等，在但丁思想的影响下，都主张欧洲各国建立一个联邦，成立一个全欧洲的议会，消灭战祸，一展和平。康德还专门写了一本叫《永久和平论》的书，认为通过建立世界国家联盟和执行国际法，可以实现人类最渴望和追求的崇高目的：永久和平。

到了20世纪，信奉世界帝国思想或建立世界政府思想的人越来越多，许多思想家从各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建立世界帝国或世界政府的想法，有的甚至为此而著书立说。正如在20世纪30年代末《世界史纲》作者韦尔斯所说的：他自己的"政治思想是一个公开的图谋，其目的是加快这些讨厌的、浪费的、邪恶的东西--民族主义和战争--的消灭，结束这个和那个帝国，并建立起一个全人类的帝国来。"(2)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在1946年通过美国广播公司向赞成联邦世界政府的学生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在拥有的破坏性武器使地球上不存在任何一块可以免于突然性的总毁灭的地方。逃脱这一命运的惟一希望在于通过超国家的方式来确保和平。必须创建一个能够通过司法仲裁解决国家间冲突的世界政府"(3) ，并多次指出达成创建一个世界政府的方式方法。

围绕建立世界政府的种种设想和理念，许多政治思想家开始从世界政治或地理角度，探索建立世界帝国或世界政府的种种途径。最突出的就是海权论和陆心说的相互崛起。

首先，善于总结历史规律的美国海军军官阿.马汉，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以及美国渐次称霸世界的历史经验中看到，只有海洋是支撑西方霸权的基础。因此，提出了"海权中心"学说。1890年他在出版他那著名的《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时，已经不是像2000多年前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站在地中海边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那样的心胸了，他心中的海洋永远大过包括地中海在内的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他心中的目标是全世界。为了达到他的目的，甚至提出了"强权即公理"的理论。在马汉海权论基础上，1890年美国

国会通过了《海权法案》，十年后，美国海军力量从世界第12位上升到世界第3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海军达到了世界第一。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曾得意地说：马汉是"美国生活中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如今，太平洋已经成为美国的"内湖"，并在世界上拥有700多个军事基地，4个作战舰队，1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近500艘各种舰艇。正是这个强大的海军力量正在为实现其称霸世界做出贡献。这都是海权论产生的结果。

另一方面，在海权论得到重视的同时，陆心说者也随后崛起。

1904年，英国著名地理学家麦金德在其著名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首创了世界"大陆心脏"学说，认为世界历史基本上是陆上人和海上人之间的反复斗争的过程。陆上霸权最有力的中心总是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区。他从战略角度，将欧亚大陆视为"世界岛"，而处于世界岛顶端的欧亚大陆中心就是决定世界历史的"地理中枢"，也即全球的"枢纽地区"。这个"枢纽地区"就是河川流入北冰洋和内陆海（指里海和黑海）的地区，同时也是欧亚大陆上海权所不能到达的地区，是一个完全大陆性的地区。1919年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麦金德用"心脏地带"代替了"枢纽地区"，并且其核心区域也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的地峡向东延伸了2500哩到叶尼塞河；从北极海向南到土耳其与蒙古之间的山地屏障线。1943年，麦金德明确指出，当时苏联的领土就相当于心脏地区。在麦金德陆心说中，最有影响的恐怕还是下面的三句名言：

谁统治了东欧平原，谁就控制了全球的"心脏地带"；

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

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支配全世界。

我们注意到的是，麦金德理论的目的是"支配全世界"。

可见，陆心说和海权论虽然角度不同，但其寻求控制和支配世界的目的是一样的。两者争论的结果自然就是从陆心走向海洋或者从海洋踏上世界岛的"边缘地带"：即欧亚沿海地带。

1941年英国人费尔格里夫就指出，麦金德理论的边缘地带比心脏地带更为重要。1942年，美国耶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斯皮克曼在其《美国之战略》一书中就提出了完整的"边缘地带"学说，认为"心脏地带"的周围地区，有着更为实在的世界权力的特征，它拥有众多的

人口、富饶的自然资源和人类资源，在它的周围有"一条与整个所谓海权国家聚集区相联接的环绕大海的交通线"。在它的外面有英国、非洲、东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等临近大陆的陆岛。作者把这类地区扩大到了包括波罗的海－黑海地峡西侧的整个欧洲大陆、亚洲的山地中心和整个中国，并命名为"边缘地带"。认为这类"边缘地带"相当于"海权与陆权之间的一个巨大的缓冲地带，它必然有着两栖的双重作用，并从海陆两面保卫自身。"所以，他在《民主与和平的地理学》书中明确指出："在美国的安全形势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关注由谁控制欧亚边缘区的问题。必须警惕未来形成一个强大统一集权的中国，警惕它获得能力把它的势力影响扩张到西太平洋沿岸。但只要中国统一还未完成，中国就难以构成这种威胁，所以在日本战败以后，美国在远东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必须防范中国成为这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后来，美国学者梅尼克对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进行了修正，并对边缘地带具体国家的内、外具体结构进行了划分，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海权、陆心与边缘三者相结合的地缘版图（图10-1）。

鉴于边缘地带的如此重要性，斯皮克曼把麦金德的箴言改为：

谁统治边缘地带，谁就能统治欧亚大陆；

谁能统治欧亚大陆，谁就能统治世界的命运。(4)

斯皮克曼的要义，仍然是统治世界。

图10-1 海权、陆心以及边缘三者地缘版图

除了海权论和陆心说外，德国人哈斯霍夫在其《地缘政治的泛区观》中提出的"生存空间理论"也具有影响。哈斯霍夫认为，现代世界中，成功的扩张将最终导致具有地理意义的大国组织形式的出现。这些大国组织形式，就是"泛区"。泛区需要领土庞大，原材料自给自足并拥有适当的地理政治的压力计。未来世界必将走向某种形式的统一，"没有世界的统一就不可能获得经济资源真正的自给自足"。并提

出，世界的统一，将首先通过形成若干跨国界的大区域如泛美地区、泛亚地区、欧非地区、泛苏地区等组合而实现。他的"生存空间论"和其"德意志民族优秀论"相结合，直接影响了希特勒和德国军国主义，对纳粹德国挑起世界大战具有很大影响，但最终因彻底战败而没有成功。

一晃西历二十世纪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西方建立世界帝国思想并未随着历史发展和时事变迁而泯灭，相反，建立世界帝国或世界政府的思想，经一些政治阴谋家的发展，逐步变成了图谋统治世界的霸权主义思想而得到继承。西方世界体系论者，在认真分析世界霸权历史后认为，霸权国家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每个霸权国家的兴衰与其在三个经济领域的效率是相关的。每个霸权国家都是先在农业--工业取得优势，然后在商业领域占有优势，最后在金融领域占有优势，当一个国家在所有三个领域都占有优势时，它就获得短暂的霸权地位。第二，每个霸权国家在其霸权期内都奉行全球"自由主义"，反对重商主义者对贸易的限制。第三，霸权国家的全球军事力量的模型是相同的，即霸权主要是海上（现在是海上/空中）力量。这三个特征是霸权的一般特征。(5) 所以，目前，西方国家一方面在经济领域（农业、工业、商业、金融）、全球化及其世界贸易和海权力量方面继续保持绝对优势；另一方面，竭力宣传国家主权已经是一个过时的观念，主张消除民族界限，极力鼓吹建立世界政府。为达到此目的，现代帝国主义者或霸权主义者不断利用各种形式和手段来破坏其它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统一。这种霸权行径在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的《竞赛方案》中就有露骨的表示。他在书中说：

美国支配的帝国体系虽然已经通过各种条约安排而正式化－－这些安排实际上承认西欧、日本和南朝鲜是美国保护国的地位－－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共同的利益以及由非正式的民族和商业联系组成的混合体 。(6)

在20世纪下半叶，塞缪尔.亨廷顿甚至更进一步地把逐步西方化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商业"混合体"说成是世界帝国化的"黄金时代"或者"繁荣时代"：

西方正在发展一个相当于世界帝国的体系，其表现形式为邦联、联邦、政权和其他形式的合作机构的复合体系，它在文明的层面上推

行民主和多元政治。简而言之，西方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正进入这样的一个时代，当后人回顾以往时，将会按照历史上反复重现的文明演进模式称为"黄金时代"。用奎格利的话说，就是一个"由于这个文明本身的区域不存在任何竞争对手，以及远离其他外部社会的竞争，甚至不存在这样的竞争"而产生的和平时期。它也是一个"结束了内部战争破坏，减少了内部贸易壁垒，建立起共同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以及由于广泛实行了与建立世界帝国相关的政府开支制度"而产生的一个繁荣时期。(7)

多么美妙的"黄金时代"啊！

只可惜她仅仅是西方部分人眼中的一个幻觉，现代人和后来人是不可能这样总结西方世界的成就的，因为没有人相信这些"黄金时代"的谎言。当我们数着人民币生活越来越好的时候，当我们在电视里看到"9.11"画面的时候，当我们听到英美飞机在科索沃、在伊拉克、在阿富汗……投下的炸弹的爆炸声的时候，当我们从报纸上看到西方越来越富而亚非拉穷国越来越穷的时候，有谁相信这些谎言呢?

因此，西方意义的世界统一帝国或者世界政府，绝不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

在世界历史上，蒙元帝国、英殖民帝国和苏联帝国，因为版图巨大而成为世界历史上的"巨无霸"国家（见图10-1）。不过，蒙元帝国和苏联帝国，正如莫索根所说的是大陆帝国，而非世界大帝国；在殖民政策支撑下的英帝国世界体系，终因不得人心而解体。然而，随着世界帝国论的发展，在强大经济、军事实力支撑下的美国隐形帝国又成了另一个"巨无霸"国家，有此为基础，美国人或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认为他们又有了建立世界性大帝国的罕见的历史机遇，他们将为此而不遗余力，甚至铤而走险。

表10-1 具有世界帝国趋势的四大帝国比较

帝国 存续时期 面积 控制地域 结构形式

1.蒙元帝国 1229-1295 2100 欧亚大陆中腹及中国到俄罗斯大陆区 蒙元及其宗族国

2.英殖民帝国 19-20世纪中 3380 英联邦及北美、南非、澳洲、南亚等 英联邦及宗主国

3.苏联帝国 1922-1991 2240 欧亚大陆中腹及欧亚洲北部地区 俄罗斯及联盟国

4.美隐形帝国 1948-2003 3700 北美及欧、阿拉伯、东亚东南亚地区 美国及其仆从国

* 面积单位：万平方公里。

但是，我们只要简单比较一下这四个帝国的地域和结构形式（见表10-1），就可知道美国未来的命运。西历13世纪的蒙元帝国（见图10-2），中国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原名铁木真）和他的子孙创立的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大元帝国，控制了中国全境及俄罗斯、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但因其过时的政治结构而很快瓦解。西历19-20世纪的英殖民帝国（见图10-3），其帝国范围在殖民政策和强大的海洋力量支撑下遍及世界各大洲，也因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和独立而解体。西历20世纪的苏联帝国（见图10-4），其帝国范围横跨欧亚大陆，其陆地面积占到地球陆地面积的15%，终因联盟国的独立而于西历20世纪90年代初彻底瓦解。

西历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的美国隐形帝国，包括美国本土13个州和后来通过强购、占领等手段获取的另外38州，以及在美国控制下的国家和地区，业已占据了世界最重要的战略地区，其梦想中的"世界帝国"已经具有一个"隐形模型"。这个独特的"世界帝国"，在美国霸权主义者心中就是其建立真实世界帝国的雏形。

图10-2 蒙元帝国版图(8)

图10-3 英殖民帝国

图10-4 苏联帝国

目前，美国在全世界共有736个军事基地，其中陆军基地390个，海军基地53个，空军基地289个，海军陆战队基地4个；大型基地702个，中型基地15个，小型基地19个。整个地球表面基本在五角大楼军事网的控制之下。"美国海军现在的战略是'由海向陆'，认为海军作战已经超越了大洋决战的时代，主要任务是控制世界沿海岸线150公里内的地幅，因为在这块里面有70%的城市，70%的首都，70%的经济活动和产值都集中在这一条沿海带上，控制了这一带，就几乎控制了2/3的世界，而这都在航母的作战半径之内。" 与20实际世纪中期相比，21世纪初的美国隐形帝国已经覆盖了全球除俄罗斯和中国以外的其它所有地区（包括阿拉伯半岛，伊朗处于被围困之中）。美国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帝国，正在支撑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并希望有朝一日达到政治意义上全世界的完全统一。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推广资本主义，至少要将世界主要国家纳入到这个世界体系之中。那时，一旦"一个国家控制了整个体系，那么，世界市场便完全被政治所控制，这样，整个体系便成为一个世界帝国" 了。

但是，美国控制全球的野心与其力量并不配比，其麾下的仆从国也并不完全一条心。因此，可以预言，在集权暴力和美国利益支撑下的"世界帝国"，终究会成为霸权主义者的一个色彩斑斓的泡影，即使吹大，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

(1)但丁，《论世界帝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 转引自韦尔斯，《世界史纲.代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方在庆等译，《爱因斯坦晚年文集》，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133页。

(4)参见杰．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何新，《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 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一版，第167页。

(6) 布热津斯基，《竞赛方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0页。

(7)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349页。

(8) 本图及后两图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世界通史》，上册，上海社科出版社，1988年版，附图：“忽必烈去世时的蒙古帝国”。

**********

## 第二节　美国：霸权主义

美国从1776年脱离欧洲，取得独立，到现在不过220多年的历史。她取得今天独霸世界的地位，主要得益于来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来自战争掠夺的财富和来自外来人才的财富。这三者都是通过不平等的手段获取的。战争掠夺不用说，国际贸易获取的利润，也是靠不平等的贸易关系。靠不光彩的手段实现的外国人才输入，更为美国创造了无穷无尽的财富。另外，美国国土的绝大部分也是靠军事侵略获取的。

美国在其发迹史上，是不仁义和不道德的，有的是掠夺和占领，所以，她的国际政策就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政策。她早已将其开国总统华盛顿的誓言抛到了九霄云外：

真理告诉我们：法理与自然过程中存在着不朽的结合－－美德与幸福不可分；责任与利益可不可分；诚实高尚政策的真正准则与民众繁荣幸福的真实回报不可分。(1)

华盛顿的誓言已经成了陈迹，现在的美国需要的是美国人的幸福、利益和回报，她缺少的恰恰是美德、责任和诚实。现在的"美"国，是一个真正"丑陋"的国家，她现在几乎成了侵略者或者霸权主义者的代名词。

有一个著名的分析家指出：

给美国外交政策的动力提供燃料的并不是对任何道义的热心，更不是天真的高尚正派，而是另有其它重要目标需要。这种需要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的要求：

1)为全球化、特别是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考虑，要使世界变得更开放、友好。

2)增加国内防务承包商的财务报表--他们为国会议员和白宫官员作出过慷慨的贡献。

3)阻止任何可能成为替代资本主义模式的成功典范的社会崛起。

4)尽可能地在全世界扩展美国的政治、经济与军事霸权，阻止任何可能向美国霸权提出挑战的地区大国的兴起，并创建一个按照美国想象，适合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世界秩序。(2)

美国的星条旗就是其侵略、扩张政策的历史见证。星条旗上，原来只有13颗星，而现在已有51颗星。什么意思呢？美国开国时，只有13个州，后来不断通过侵略、扩张、收买和种族灭绝，州数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内达到了51个。她们的理想就是在它的星条旗上不断增加五角星，六十、七十、一百，以至两百，甚至更多。总之，是要把整个世界都置于其星条旗下，建立一个完全在美国控制下的世界政府。如果这还不足为证，那么明白印在《美国地理》扉页的那句话就明之昭昭了：

不断眺望目力所及的远方，想象着天际那边的世界，并且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远方，战胜远方，征服远方。

这就是美国的世界野心。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美国独霸世界局面的形成，这种野心正在逐步变成事实。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学教授马丁.范克雷韦尔德说，1945年前的1000年，人类历史曾经是一个政治联合的过程，到1914年，整个地球由7个集团控制着，到1945年，只剩下两个超级大国了。现在这一进程已把我们带回到中世纪，皇帝的宝座已被美国总统取代，教皇的地位则由联合国秘书长取代。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弗朗西斯.福山更露骨地说：我们可以以美国来命名这个时代--"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或"美国霸权时代"。(3)

为了弄清美国霸权的未来走向，我们还得先弄清美国霸权的形成过程。

美国是怎样取得在世界上的独霸地位的呢？答案只有四个字：垄断、暴力。美国海权论者马汉在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的开篇第一句就指出：

为了使本国民众所获取的好处超越寻常的份额，有必要竭尽全力排斥掉其它竞争者：要么通过垄断或强制性条令的和平立法手段，要么，在这些手段不能奏效时，诉诸直接的暴力方式。(4)

这是美国内外政策绝妙的注释，其崇尚暴力和实施垄断的政策一览无遗，并一贯于今。据此，美国在政治上，实行资本主义垄断社会，不择手段搞掉其他竞争对手，甚至不惜实施暴力手段。在经济上，要求美元独霸世界，通过兼并以及强购等政策，竭力组建世界性的寡头垄断企业。在军事上，保持陆、海、空三军在世界上的绝对优势，把世界主要军事力量和战略要冲都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在科技上，垄断先进技术，垄断技术产业。在文化上，竭力宣传美国的价值观、民主观、自由观、人权观，依靠其庞大的宣传机构，包括覆盖全球的无线电台和卫星电视系统，干扰和控制世界舆论。

美国在政治上是拉拢和打击异己的破坏性最强的国家。它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其死对头。

1950年6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其第七舰队武装进入台湾地区，占领我国台湾省。1979年1月中美建交后，美国侵略者才逐步撤出台湾。

1950年7月，美国操纵联合国组建非法侵略军－－"联合国军"入侵朝鲜。到1953年7月，侵略失败，被迫签订停战协定。

1961年4月，美国武装入侵古巴，遭到全歼。

1961年5月，美国对越南实行"特种战争"；1964年8月，大规模轰炸北越；1966年10月，美国用火箭轰炸了中国、波兰和罗马尼亚三国驻越南大使馆；1975年4月，越南人民军解放全越，美军败退。

1970年4月，美国侵略军和南越军入侵柬埔寨，到6月被迫撤军。

1971年初，美国侵略军和南越军入侵老挝，1975年12月以失败告终。

1991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欺骗苏联戈尔巴乔夫，拉拢叶利钦，彻底搞垮了苏联社会主义体系，导致苏联解体，四分五裂。接着把在自己严密控制之下的"北约"军事集团东扩。

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世界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美国不断把自己的信誉踩在脚下，践踏1972年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精神，支持台独分子，向台湾出售武器，援助西藏分裂主义，收留邪教头目、公开开着军舰耀武台湾海峡。

1999年5月，美国公然用导弹在历史上第二次袭击我驻外使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进行战争挑衅。使我国三名记者牺牲，20多人受伤，使馆大楼被毁。

美国在经济上是掠夺成性的国家。她利用美元是世界货币的有利条件，利用庞大的垄断金融资本干扰和控制其它国家金融体系，屡次搞乱别国和地区的金融秩序，使其货币大幅贬值，导致原材料价格下降，并从所谓的"国际自由贸易"中牟取暴利。它经常制定域外法律，打击和控制其它国家的贸易往来，保持自己的垄断和控制地位。它竭力推行"世界经济新秩序"，主张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凭借其高位的经济水平，通过国际贸易不平等规律，掠夺别国财富。

在经济方面，我们这个世界的头号经济大国，带给人类世界的不是共同繁荣，而是污染和灾害。美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4%，但它每年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却占全世界的25%。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IPCC）估计，人类世界在20世纪60年代，气象灾害保

险赔偿仅70亿美元，整体经济损失才400亿美元；到20世纪90年代，气象灾害保险赔偿到达800亿美元，整体经济损失则剧增到2900亿美元。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球温室效应加强，世界气候变暖而产生的。而本应负主要责任的美国却在2000年世界气候大会上提出以美元来换取其"污染权"。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偷盗国家。她有世界上最大的间谍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其偷盗技术世界闻名。1995年，在沙特、巴西分别窃取了法国共计约74亿美元的购货合同。公开利用金钱收买伊拉克、南联盟政府反对派企图窃国。她拥有最多的间谍卫星，监视全球。多次派间谍和飞机潜入中国窃取中国军事和技术情报。从60年开始，美国先后用U2间谍机、超音速黑鸟侦察机、间谍卫星偷窃中国的核机密。偷窃中国战机，特别是隐形战斗机的机密。1979年偷窃了中国首创的激光防护眼镜。

美国在军事上是真正的暴力国家。其拥有的核武器可将地球毁灭几十次，在有核国家中最具威胁性和破坏性。表10-2还是在1972年5月美俄签订《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后，到2003年1月的核力量。事实上，我们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美国已经展开的核战争的各种考验：心理上的核压迫、事实上的核威胁以及核武器的实战应用--贫铀弹的大规模使用。美国使我们这个世界变成了核扩张的世界。美国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向伊拉克共计发射了394.4万枚贫铀弹，总重量达到315吨，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向南斯拉夫共计发射了50多万枚贫铀弹,投下了1100枚集束炸弹，在2003年侵略伊拉克的战争中，同样使用了大量的贫铀弹。在不正义战争中大规模使用杀伤力巨大和后患无穷的武器以及非人性地虐待战争俘虏，这些就是标榜人权、自由、和平的美国的所作所为。

现在美国已经退出《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并在继续开展军备扩充。美国的国际导弹防御系统（NMD）和与日本共谋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仍然在不断增加美元投入，其霸权图谋正在不断推进。

表10-2 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核弹头数一览表（2003年1月）

国　　家 现役核弹头 战略核弹头 非战略核弹头 备用核弹头

美　国 7068个 5948个 1120个 370个
俄 罗 斯 8232个 4852个 3380个
英　国 160个 25个
法　国 348个
印　度 30-40个
巴基斯坦 30至50枚
以 色 列 近200个

美国事实上是世界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1997年，有人从美国解密的一系列文件中统计分析出，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共对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实施了637次暗杀行动。虽然其阴谋屡屡失败，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实际已经证实，美国早已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全球最大的恐怖组织。在其国内，"据2001年美国驻华使馆出版的《交流》杂志第四期报道，1998年，美国共发生犯罪案件1247.6万起，暴力犯罪153.1万起，谋杀案约1.7万起；每10万人中发生犯罪案件4616起，发生暴力犯罪566起。1977年至1996年间，有40多万美国人遭谋杀，几乎是越南战争中美国死亡人数的7倍。目前美国每10万人的谋杀比例是5.5人左右。"(5) 在其国外，美国是世界上在国外驻军最多的国家，并且是二战以来，最多使用暴力和最多入侵别国的国家，也是在侵略战争中造成生命财产损失最多的国家。2002年3月9日，美国《洛杉叽时报》披露了美国国防部拟对俄罗斯、中国、朝鲜等七国进行核打击的名为《核态势评估》的秘密计划，充分暴露了美国其为恐怖国家的实质。美国联邦调查局把国际恐怖定义为"与某一外部势力有某种联系、或者其活动跨越了国境的组织或个人，非法使用武力或暴力，威胁或强逼某一政府、平民百姓或任何团体，以达到政治或社会方面的目的。"美国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恰恰适合联邦调查局的定义。因故，美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国际恐怖国家。

美国的陆、海、空军世界最强，其军队走到哪里，哪里的不是有了和平的希望，而是安全受到威胁。二战以后，美国除了屡次侵略社会主义国家外，还对中小国家进行多次干涉和侵略：

1958年7月，美国武装入侵黎巴嫩。

1960年2月，美国干涉多米尼加内政。1965年4月，美国再此入侵多米尼加。

1960年7月，美国侵略非洲刚果（金）（即今扎伊尔）。

1971年4月，美国雇佣军入侵南也门。

1983年10月，美国入侵格林纳达。

1989年12月，美国开始入侵巴拿马。

1991年，美英霸权主义者兵入伊拉克，屠杀大量贫民，空袭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

1999年，以美国霸权主义者为首的"北约"入侵南联盟，死伤大量无辜。

2001年，美国在阿富汗又借"9.11"事件，向世界显示了其在突出的军事霸主地位，并借此达到了梦寐以求的驻军中亚的目的。

2003年3月，美国再次侵略伊拉克，顺利地控制和占领了其梦寐以求的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中东核心地区。

除此以外，美国在利比亚、伊朗、洪都拉斯、索马里、海地、波黑等地区冲突中，处处显示了其血腥的军事暴力。

马汉曾对美国所谓的国家权益和军事行动作了更直截了当的露骨的说明。他的霸权逻辑是：

当一国政府认识到特定地区的国家权益可能成为诉诸军事行动的特征时，就应组织一些有资格的人士对该地域进行详细研究，待搜集到必要的资料之后，便确定哪些据点具有战略价值，占据其中哪些据点最为有利。当这样一些位置已被占领时，现在占有者的占有权通常便应受到尊重，至于在何种条件之下可将这种占有权置之不理，这需由政治家们来决定而与军人无关。(6)

美国不是一个维持和平而是一个大搞军事霸权的国家；不是追求世界和平而是力求"超越和平"（在国内建立和平，在境外制造战争）的国家；同时，这个一贯自称文明、民主、自由的国家还是一个人权

记录很差的典型国家。在公民、政治权利方面，美国枪支泛滥，暴力横行，血案不断；监狱爆满，压榨监狱劳工。在经济、社会权利方面，美国社会贫富差距继续拉大，贫困人口继续增加，饥饿和无家可归者也越来越多。在种族歧视方面，美国的种族歧视最持久、最严重，种族歧视范围最广泛，种族歧视引起的警察暴力层出不穷，种族仇杀事件不断增加。在妇女、儿童权利方面，美国性别歧视是社会的痼疾，妇女权利多得不到保障，儿童犯罪、童工现象普遍。(7) 尼克松也不得不承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暴力犯罪的比率已经增长了560%。仅仅在1992年一年中，警察局就收到1400万严重犯罪的举报。另外还有逾百万起没有被举报。在纽约市，在工作场所中死亡的第一位原因就是凶杀，其中1992年被谋杀的人中有2/3是因为他们控告了杀人犯而遇害。华盛顿特区的凶杀案比率在世界各国首都中是最高的，这是我们在国际上的耻辱。"(8)

根据中国国务院《2002年美国的人权记录》，美国近几年的人权记录每况愈下，然而，我们这个世界奇怪的是，正是这个恬不知耻的国家，却在国际关系方面，屡屡践踏国际关系准则，无视国内人权的卑劣记录，粗暴干涉别国人权，偷盗、经济制裁、武力讹诈、政治颠覆、间谍破坏、武力侵略和掠夺、暗杀和公开屠杀，美国对其它国家的各种"干涉"手段无不用其极。

美国从西历1945年到21世纪初，干涉过7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生活，其中试图推翻40个外国政府，干涉至少40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选举，镇压30个以上与不堪忍受的政权展开斗争的人民--民族主义运动，轰炸过至少25个国家和地区，为至少11个国家和地区提供酷刑培训，在至少7个国家和地区使用生化武器，在此期间，美国造成数百万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迫使更多的人陷入痛苦和绝望的境地。(9)

然而，美国却大不以为然，干涉继续进行，军售一刻不停。至21世纪初，美国连续十多年是世界武器市场的最大销售商，其在新武器交易中居于领先地位，销售额连年世界第一。

美国在科学技术上是垄断程度最高的国家。美国公司出口技术产品，必须经过政府核批，否则就要受到极为严厉的制裁。出口任何产品，必须是受到严密保护的具有高技术优势的产品。籍此，既可以保持技术出口的高额利润和技术的高垄断地位，还可以打击别国的民族

技术产业，掠夺别国资源财富。这是美国致富的诀窍之一。美国掌握了核技术，并不断进行核试验，却要其它国家禁止核试验。为了配合其高明的"国际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政策，自己却放弃《反托拉斯法》，允许那些本身在世界上已经具有相当国际垄断地位的高技术公司合并，如微软购并"莲花"、波音兼并麦道等等，形成更具世界垄断能力的巨型托拉斯。这与其说是在国际市场中竞争，毋宁说是要征服和控制世界市场。

美国在文化上是一个文化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国际政治关系理论家莫根索认为：

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也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的目的不在于攻占他国的领土，或控制其经济生活，而在于征服和控制人的头脑，作为改变两国权力关系的工具。如果我们能够想象，A国的文化，更具体的说，A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带着所有明确的帝国主义目标，征服了B国一切决策人物的头脑，那么，A国所取得的胜利，其建立霸权的基础，比起军事征服或经济控制都要更显赫、更牢固。A国无需再威胁要使用武力或实际使用武力，或者，使用经济压力来实现其目标。因为。优越的文化和更具有魅力的政治哲学，自有其说服力，早会实现那个目标即B国对它唯命是从 。(10)

这就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

现代国际社会，在总的和平环境下，激烈的直接地理或者领土占领似乎减少了；但是，间接的依靠控制别国政治的国际集团对另一个集团或者国家的对抗仍然存在，甚至对具有地缘战略地位的地区或者国家的侵略也依然存在；更为重要的是，西方推行的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对别国的"和平侵略"比直接侵略更为突出。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政策就是"和平侵略"的典型。她以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为幌子，在世界各处搞文化征服，搞和平演变，都是出于这种不流血的帝国垄断政策。苏联解体，堪称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政策的杰作。现在，他又掉过头来全力对付中国。1989年出现在中国首都北京的事件，实际上就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政策在中国产生的社会震荡事件，这已经被不断披露出来的事实予以证明。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约翰.汤林森博士在他的《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告诫我们说，民族国家都有一个文化认同问题。一部民族文化史就是一部民族

的发展史，反之一个国家的发展史也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史。如果一味推崇文化的同质化，将首先抹杀国家的民族性，这就必然会导致国家的衰落和被殖民化。更为险恶的背景还在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竭力倡导的文化同质化，是和她们全力推行的政治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另一位英国人哈里森（记者、作家）在其《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一书中也说，文化帝国主义是阴险的控制方式，它征服人的心灵，使对手惟命是从；通过培植当地的买办，通过"比照集团行为"，将某一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作为标准而使人刻意仿效；通过教育、广告、传媒，在第三世界面前树立一个"比照集团"引诱意志薄弱者追随仿效，放弃自己的民族传统。(11) 我们不难看出，美国是这一切的主谋。阎学通博士说：

美国希望建立的霸权不是完全依靠实力，而是要依靠一种新的体系或一种新的制度，即制度化的霸权体系。因为当霸主后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被孤立，与所有的国家都发生矛盾，成为众矢之的。历史上这种例子很多，霸主往往由此走向衰微。

美国为了防止成为孤立的霸主，它想建立一种包括组织机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三个内容的体系，使其霸权政策具有一定的"合法性"，这是美国真正的战略。(12)

美国图谋统治世界的思想，在其向世界各地输出的动画片和科幻片中也有暴露。美国输向世界的动画片，有两类：一类是反传统（实是反科学）的夸张片，如米老鼠与唐老鸭、老鼠戏猫等动画片；一类是统治地球的帝国宣传片，如恐怖帝国袭击地球之类的电影片。一方面，他们利用文化形象引导和教育我们；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制造出不同的企图统治地球的恐怖帝国和一个反统治的地球卫士形象。目的只有一个，只有有能力反击恐怖帝国的"地球卫士"们，才能统治地球；只有具有先进文化思想的国家，才能领导世界。由于这种"恐怖帝国"心理相当强烈，为了充分展示他们的思想和抱负，才在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帝国"科幻片的同时，又制造出一些反常规的如无所不能的"米老鼠"、"老鼠戏猫"一类卡通形象。这也是美国企图统治地球的另一种心理反映--"他们要做别人做不到的事"。

美国通过其极端垄断和暴力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方面正逐步走向独霸世界的道路。有了垄断和暴力作为基础，美

国一些素有侵略野心的人，就可肆无忌惮地制定图霸世界的战略，美国政府也就可信心百倍地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共同利益、改善人权、追求民主自由的旗号，在世界上实施其霸权主义策略。他们的野心有多大？他们的行动是什么？著名的国际战略评论家何新在1990年是这样揭露的：

美国的国家目标，绝不是与任何国家"和平共处"，而是建立一个统一全球的大美利坚世界联邦帝国。

苏联、东欧剧烈变动后的世界大形势，与中国古代史上六强相峙、一国称霸的战国后期形势，在形态上竟出现惊人的相似——虽然在本质和规模上有极大不同。当今世界中的其他"六强国"就是：日本、中国、即将出现的新德国、作为欧洲传统大国的法国、英国，以及现已严重削弱的苏联。世界进入这种"战国"局面，从以往历史的经验看，实际很可能是通过某种形式达到世界统一（"大同"）的前奏。

问题在于，世界目前面临的统一，可以有两种前景。

一种是以美国为核心的统一。

另一种前景，是"建立在所有国家的公正、主权平等、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上"的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这种一体化的前提，是必须保证各国的独立主权，兼顾和协调各国的民族利益。但由于这种前提下的统一，是于美国不利的，因此是美国所不愿接受的。

然而历史经验表明，要防止国际间出现一国独霸的局面，不能依靠国与国之间的善意，而只能依靠大国之间保持力量均衡，互相牵制和制约。

目前美国所必须期待的最后条件，是苏联与中国这两个关键性的大国，将在何时因内乱而彻底自我破碎？一旦这种进程发生，美国建立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性联邦帝国体系的梦想，就有了非常现实的可能性。(13)

对帝国及帝国战略深有研究的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认为，世界历史上有两类国家称霸世界：一类是大陆国家，如德意志帝国、拿破仑一世时的法国、纳粹德国、苏俄；一类是海洋国家，如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以及日本。他在1986年出版的《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一书中说：

我使用"帝国"这个术语作为一个道义上的中性词，用以描述一种政治关系中的等级制度，这个制度可以从一个中心向外辐射其影响。

同苏联一样，美国也面临着地缘政治方面的紧迫任务。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支配了全球。如果苏联夺取了这块大陆的边缘地区－－西欧、远东和南亚－－它就不仅夺得了对巨大的人力资源、经济资源和军事资源的控制，而且得以进入通往西半球的具有地缘战略意义的区域－－大西样和太平洋。

美国支配的帝国体系虽然已经通过各种条约安排而正式化－－这些安排实际上承认西欧、日本和南朝鲜是美国保护国的地位－－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共同的利益以及有非正式的民族和商业联系组成的混合体。(14)

有了美国支配下的帝国体系，美国人自然就对称霸世界信心百倍。美国第37届总统尼克松对美国控制世界的能力更是自信，他宣称："1999年：不战而胜"。但历史并没有如他所愿。不过，他的自信仍然在不断地激励着他们的后继者：

我们的潜力是无限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强、最富的国家。我们能在世界各地投放我们的军事力量，能对当代一切重大政治问题施加影响。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经济、政治制度在国际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吸引力。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果准许的话，世界各地有几亿人将向美国移民。(15)

莫根索认为，帝国主义有三个目标：建立世界大帝国、大陆帝国或者局部称霸。美国早已实现局部称霸，在20世纪末，不仅是大陆帝国，而且初步建立起了其"世界帝国"的"隐形模型"。因此，我们认为，美国的野心更具有危险性。

莫根索又说：

"一个世界国家的首要目的是维持世界和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世界国家必须发挥三方面的职能作用：（一）它将赋于人类一种法人地位，人类的统一展现在其面前；（二）它将建立旨在进行世界范围的社会变革的各种机构并使之运转，这种社会变革将允许人类的所有团体在其相互冲突的要求中至少得到某种满足；（三）它将建立执法机构，这些机构将以其绝对的优势力量对付任何对和平造成的威

胁。"并且，"没有一个世界国家，就不能有永久的国家和平，而在当前世界的道德、社会和政治条件下，又不能建立一个世界国家。"

莫氏认为通过军事征服和以瑞士、美国那样的联邦制国家为榜样建立世界国家，是两个错误的解决方法。

美国人民的社会是先于美国国家而存在的，同样，一个世界社会也必然要先于一个世界国家的存在"，因此，未来的世界国家的建立有赖于今天建立一个逐步走向统一的世界社会。如联合国等。(16)

美国作家罗伯特.赖特曾说，在信息时代，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使战争成为一种"双赢"的游戏。在他的逻辑里，对落后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行战争政策就会"单赢"：即美国稳赢。所以，对第三世界国家使用战争就成为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必然政策。事实也正是如此。苏联解体以后，短短13年之内，美国就在世界上展开了四场大规模的战争。基于这种思想，随着美国一国独霸世界的局面持续发展，通过战争途径建立所谓世界帝国的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愈来愈大。谁都知道，失去对手的美国，现在无所适从，到处驻军，到处举行军事演习，肆无忌惮，唯我独尊。这种极度的炫耀，一旦有一天遇到某种因素的刺激，富有攻击性的美国人（我们不难从美国国内那举世无双的不断增长的暴力案件、不断出现的诬蔑他国领导人和无端干涉他国内政的事件、频繁在世界上举行军事演习和军事侵略行动中得到证实）就会失去理智，就会为建立其世界帝国梦想而开战：采取具有全球性质的军事行动。

美国从1991年就开始实行"同时打赢两场主要战争"的军事策略，到20世纪末，白宫制订并发表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又作了申明："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必须拥有威慑能力，如果威慑无效，便在相重叠的时间里在两个不同的战区挫败大规模的、跨越边界的入侵。保持同时打两场战区战役的能力能够使我们的朋友和盟国感到放心，而且还会使与美国结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台，就将这个政策改为在一场主要的地区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个改变没有实质意义。布什政府的改变，恰恰是希望保持其强大的"威慑能力"，以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达到其独霸世界的体系能"长治久安"。因为，更多的直接军事干涉，势必消耗本国的力量。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美国至今仍然会重点盯住世界上两块未纳入美

国体系的重要地区，即中东腹地及ABA地区和中国大陆。对于前者，那是西方地缘政治学家们的"碎片地带"，因此美国完全可以大打出手，我们可以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这四场战争的地点所围成的大三角区看到美国的真实意图（美国想通过几场战争，彻底实现对中东腹地和ABA地区的完全控制和占领）；对于后者，美国面对的是一个有6500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对前苏联的"冷战"政策已经不是那么十分管用，所以不到关键时刻，美国不会和中国兵戎相见。但是，我们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性。

那么，什么时候，美国会在中国大陆动武呢？正是西方特别是美国霸权主义思想家们所指出的，是中国对美国的霸权形成真正挑战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恐怕不会有耐心进行第二场"冷战"，她将不再满足于名义上的独霸局面，她要真正地统一世界，她在很大程度上会为了一个统一的全球政府而铤而走险：首先对无核国家实施核威胁，对中国战略要地（那时，中国一贯主张的"引进来，陷住它，再消灭它"的政策恐怕不管用了）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实行军事占领。最后向北推进，与北约军事集团合围俄罗斯。最后俄罗斯投降，美国完成世界统一"大业"。

在控制和占领中东和中亚以后，美国为什么会集中力量对付东亚大陆呢？如果我们的记忆力没有衰弱的话，就会对1948年美国杜鲁门主义的军略计划图记忆犹新（见图10-5）。从这幅图，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出，世界未处于西方即美国控制之下的地区就仅有中东要害地区和世界东方的中国了，这种状态至今未有实质性改变。同时，一则，中东是他们进行侵略战争的能源供应地（美国进口石油的20%、西欧进口石油的35%、日本进口石油的70%来自海湾），没有了中东，他们什么都没有了。二来，亚洲中心地带，即北纬３０度到４０之间，相当于上海到北京之间的整个中国腹地，在马汉时代就被视为是对未来有重大影响的战略要地。

为什么对俄罗斯要实行最后合围呢？马汉说得很清楚："只有通过主要针对俄国的侧翼，才能有效地遏制俄国。这种遏制之所以十分有力，不仅因为如前所述侧翼攻击有种种好处，也是因为它是针对着俄国的海岸，也就是朝向海洋的出口。而内陆地区需要和这些海岸保持

不受阻碍的联络以尽可能获益。"(17) 如果俄罗斯不能理解中国所处的战略地位（反之，亦然）而不和中国展开亲密合作，俄罗斯和中国将会在西方的分而治之的战略中双双灭亡。两国的前途可能就是西方主要作为资源供应地的新殖民地。

图10-5 1948年美国杜鲁门主义的军略计划(18)

所以，美国在20世纪末，在苏联不存在以后，从欧洲撤军数十万，相反在西太平洋亚洲地区的军队力量则稳中有升。到西历2003年，她在中国东线地缘战略地带，从韩国、日本、菲律宾，直至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岛，驻军保持在10万人左右，其中驻日3.5万人（仅冲绳一地2.7万人），驻韩3.7万人，控制着西太平洋的主要航道、海峡和海域。其驻军形势如图10-6(19) 。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经过近几年扩展，已经成为美国在太平洋西海岸极其重要的军事基地。这一方面是为了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是为了提升其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威慑能力，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已经利用其在东亚强大军事力量的影响，与日本、菲律宾、越南、印度等国构筑成了一条围困中国的战略抑制线。

图10-6 美国在亚洲重兵驻扎

然而，美国的企图只是一厢情愿，他们那种控制欧洲、打碎中东和中亚以及抑制中国的战略考虑，仍然是有风险的。虽然单个国家，甚至两三个国家的力量永不足以和美国在战争中对垒。但来自其它强国挑战的风险是不可忽视的。法国从西历20世纪五十年代戴高乐总统提出建立"欧洲人的欧洲"开始，反对美国凌驾欧洲之上的声音从未中

断；英国虽然现在像君主政体那样老态隆钟，但对其"哈巴狗"地位也时有不满；德国凭借其"诚实"和再度崛起的决心，在二战的废墟上已经建立起了新德国，对美国霸权的不满也常常表露于外；俄罗斯人和美国人的扩张和霸权野心不相上下，自然是美国的死对头，何况其军事力量仍然可折美军一大半的兵力；日本政治家大都是带着东方面孔的西方野心家，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极大的报复心和已慢慢膨胀起来的扩张野心永远是美国和亚洲的敌人。美国人也明白："美国和日本都是海权国，美国因扩张性的自助原则需要控制海上交通线，日本则因为对进口战略资源的依赖也需要控制海上交通线。日本的脆弱性和美国的扩张性使得双方最后的决裂不可避免。最后不可不免的摊牌是因为日本不可能永远屈从于美国的政治高压。"(20) 中国至少在50年内（如台湾尽快实现统一，也许可能缩短这个时间）在经济、军事上没法和美国匹敌，那种仅靠数字简单加和就断言，大中国将在一二十年内赶超美国的说法，纯粹是一种自我陶醉式的数字游戏。

当今世界，除美国以外，六强有其四的欧洲联盟，正在将卢梭等思想家的理想逐步变成现实：建立欧洲议会、成立欧洲联盟、发行统一货币。1999年，为不满于美国无视欧洲人权，对"北约"的野蛮操纵，立志建立独立于北约之外的欧洲军队。这一切都是为了抗衡美国。因此，美国图霸世界野心的一半系在欧洲联盟未来的命运上。我们不难想到：欧洲随着货币的统一，各国经济政策也将逐步趋于一致；欧洲经济上的统一，又将促进政治上更多的一致。然而，欧洲国家也不是那么整齐划一的。最后，欧洲会出现三种可能的未来：

第一种是：在欧洲联盟内部，各个国家权力分配不平衡、各个民族利益不平等，冲突加剧，加上美国的阻扰和干涉，欧洲仍然是美国军事管制下的各国分立、货币统一的欧洲；

第二种是：欧洲人为了摆脱美国"马歇尔计划"加在其身上的"道德"压力，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空前团结，兴起全面的反美运动。最后，美国放弃对欧洲的控制，欧洲在军事上取得独立，在政治上也逐步迎得统一。

第二种前景是美国所不希望的，第一种前景虽然有欧洲内部的问题，但是绝不会长久，欧洲人总会逐步向第二种前景迈进。如果美国

绝不放弃其世界帝国梦想中的"心脏地带"。那么，极有可能出现第三种前景：欧美军事冲突。

如果这种军事冲突变成大规模的欧洲独立战争--就像当年新混成的所谓"美利坚"民族为了独立，反对西欧国家的霸道、血腥的殖民统治而产生的独立战争那样--那么，一种期待已久的世界性的针对美国的军事配合行动就很可能变成事实：俄罗斯要夺回失去的地盘，中东要找回自尊，日本要雪"原爆之耻"，墨西哥要恢复本是自己领土的主权，英国要再做霸权国家梦，北非国家和阿拉伯国家要报美国多次军事侵略之辱，中美洲国家、菲律宾等国家要取得事实上的独立……所有这些都是针对美国的。如果真是这样，可想而知，美国人的最终结局也是相当悲惨的。

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梁襄王（魏侯，名赫）和孟子有一段著名的对话：

梁襄王：天下恶乎定？（混乱的战国局面，怎样才能安定下来？）

孟子：定于一。（只有统一才能取得安定。）

梁襄王：孰能一之？（谁能够统一这个混乱局面？）

孟子：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只有不滥杀无辜的人才能统一天下。）(21)

所以，试图通过侵略战争建立"世界国家"，世界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必然兴起广泛而激烈的反侵略斗争。世界各国虽然在对待霸权主义策略方面存在种种差异，但是霸权主义者还不是那么强大（从其屡遭失败可见一斑），加上世界各国文化背景不同，所以，我们可以继续预见，美国的霸权侵略即使取得成功也将是短命的。极有可能，在世界上先出现一个"秦"，然后紧接着出现一个"汉"。所以，如果美国敢为天下先，必将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更何况美国的军事侵略并不一定就能取得成功。

目前，为了维持西方的共同富裕，美国扶持起来的欧洲是不会轻易与美国闹翻的。所以，近期西方在对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较快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政策上是非常一致的。正因为如此，美国才能够大力推行其世界霸权政策。对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除了政治、军事上的直接打压外，还对其进行文化、经济的侵略。在文化方面所

采取的文化帝国主义政策，在经济上其花招更多，制裁、超级垄断、贸易报复、金融控制以及推行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法律全球化"等等。正如孙中山早在1924年就指出的："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22)　所谓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法律全球化"，以什么为基础？当然就是以美国经济标准、美元和美国政策为基础。

西历2001年初，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完成的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评估认为，如果美国综合国力年均增长速度为3%，中国综合国力年均增长速度为7%，中国赶上美国的综合国力需要36年；如果中国综合国力年均增长速度为5%，36年后中国的综合国力充其量只能达到世界排名第三的法国水平。因此，美国的霸权地位仍将继续。美国向世界开战，很可能就是在西方一致的基础上，在世界资源近于枯竭边缘的时候。表8-3表明，世界主要矿产资源的开采年限均在70年以内，而欧、日等国发展到能挑战美国霸权之时，也大约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因此，美国在西历2020年至2050年之间最有可能发动征服全球的侵略战争。当这场史无前例的具有彻底破坏性的战争发生以后，人类矿产资源可能只剩下铁矿了。当人类再次安定下来时--如果人类还存在的话--人类很有可能是又重新回归到了"铁器时代"。

世界历史已经表明，英帝国主义者，通过扩大其殖民地政策建立世界性帝国的梦想，被列宁和毛泽东建立的广泛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实践彻底粉碎了。列宁和毛泽东这一对世界的杰出贡献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他们使世界广大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国家纷纷取得独立。现在，世界历史再一次面临考验，美国霸权主义者，正在通过建立政治军事联盟、直接军事干涉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模式，加速其建立世界帝国的图谋，人类再次面临抉择。

已经有人指出："更为危险的是，美国不但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又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军事大国。西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爆发的重要原因是德国凭借强大的军事机器拒付美国的巨额债务，并由此使国民经济军事化，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大策源地之一。而今天，历史惊人相似的一幕又开始上演。"(23)

美国是以垄断和暴力为基础的强力军事社会，它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世界最极端的集权主义国家。只不过，她用所谓民主和自由等进行了必要的包装，使人们不易看清其集权实质而已。美国式的集权基础上的霸权，造就了一个真正无耻的无道国家。这种国家最具危险性。从人类发展的公理上讲，一个无"道"国家，如果其拥有的军事实力在世界上占绝对优势，那么这个国家就是这个世界的危机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给我们的最主要教训就在这里。

一个把核武器遍布世界各地的霸权国家，绝不是为了一个美妙的善意，她实际是这个世界的共同敌人。她在行动上极力推进NMD（国际导弹防御系统），希图拥有绝对核优势，就是在为制造全球"核恐怖"建立基础；她在思想上极欲在其"领导世界"的罕见"战略机遇期"内，"塑造"世界"新秩序"，就是在为控制世界创造条件。因此，她是我们这个世界最危险的敌人。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有一本书被誉为美国领导人的政治遗嘱，这本书就是《超越和平》。何谓"超越和平"？用尼克松的话说就是："如果我们打算在国内维护自由，往往必须在距离美国几千英里之遥的地区运用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去保卫并拓展它。要发挥这种作用，现总统及其和平时代的所有继任者都必须有全球的眼光和良好的表现。"它实际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世界在美国的领导下，美国国内实现和平和自由，而在远离美国本土的几千里之外以武力"创造"和平。所以，美国假名"和平"实际是反世界的理论及其实际行动表明，这个国家具有一种强烈的侵略性。

美国独霸世界的军事力量使世界失去了平衡点，同时由于她是一个无"道"的巨额债务国，进而使这个世界失去了稳定的和平环境。历史会告诉我们的后人，我们这个星球如果要取得和平，要么消灭美国独霸世界的军事力量，要么使美国变成一个有"道"国家，要么促使美国分裂成几个无害国家，要么消灭这个国家。

然而，要使一个把自己的富裕和幸福建立在别国痛苦之上的国家变成一个有"道"国家是谈何容易。要让全世界团结起来去消灭美国的军事力量，组织和能力都存在问题。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促使美国分裂成为九个国家：即阿墨里肯（原13州）、路易斯安那、俄勒冈、新墨西哥（或者归还墨西哥）、加利福

尼亚、得克萨斯、佛罗里达、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夏威夷或者作为联合国的"国土"，让联合国及其旗下的各种组织以及其它国际组织统统移居于此，使联合国在行使其职责时不受制于任何国家）。也许这个方案，既符合北美发展的历史事实，也符合世界反霸反垄断的集体精神。

总之，不管怎么的，我们希望美国人认真地听听那个认为"在道义上感到内心有愧而理所当然地谴责自己以往的罪过时，我们还是会护短的"美国人--费正清--对美国的警告：

多年来我们的政策思想是多么无知和愚蠢。如果要在今天和平共处并继续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设法重新理解亚洲的现实和我们自己的侵略性。

我们的美国方式并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甚至也不是大多数男男女女的未来生活方式。我们求助于立法、合同、法权和诉讼，但这种方法的效果是有限的。中国提供了别的出路。时间可能对中国有利，因为我们一向习惯的爆炸式的生产发展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可能比中国人更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未来的生活。(24)

---

(1) 《美国总统就职演说》，北方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2) 威廉.布鲁姆，《谁是无赖国家》，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3) “世界思想者为新时代命名”，《读者》，2000年第22期。

(4) 马汉，《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2页。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1年美国人权记录》，2002年3月11日。

(6) 马汉，蔡鸿干、田常吉译，《海军战略》，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一版，第190页。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9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00年2月27日。

(8) 尼克松，《超越和平》，范建民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第190页。

(9)见威廉.布鲁姆，《谁是无赖国家》，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10) 莫根索，《国家间的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11) 赵修艺，“解读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见冯建三译，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12阎学通，《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40页。

(13) 何新，《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3页。

(14) 布热津斯基，《竞赛方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3、19页。

(15） 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322页。

(16) 莫根索，《国家间的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17) 马汉，《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230-231页。

(18) 取自王春良主编，《世界现代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19) 参阅：余晓葵，“面向新世纪美国亚洲驻重兵”，《光明日报》，2000.10.20，第c1版。

(20) 卡赞斯坦，《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26-27页。

(231)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22)曹锦清编选，《民权与国族——孙中山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第29页。

(23) 房宁等著，《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319页。

(24)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439、459页。

**********

## 第三节　日本：军国主义

西方国家蓄意散布的"中国威胁论"，已经被事实证明不攻自破。而真正威胁亚洲人民安全的，恰恰是散布"中国威胁论"的美国霸权主义者和日本军国主义者。而始终盘旋在亚洲人民头上的最大威胁，则是残暴无人性的日本军国主义者。

日本是地处亚洲，而又每每背向亚洲的国家。有一幅反映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上任后，一边向亚洲人民谢罪一边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神社战犯亡灵的漫画-- "转身之间" （见图10-7）--比较恰当地反映了日本这个国家的两面派性质。由军国主义塑造的日本，既是一个没有道义的国家，也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我们去图书馆看看日本在亚洲长长的侵略史，就可知道这个国家身上所固有的血腥味。

图10-7 转身之间(1)

早在西历3世纪后期，日本大和国就入侵朝鲜半岛，并一度占领半岛南部任那，直到西历6世纪，才被赶出朝鲜半岛。

明朝初年，日本封建主令其手下的武士经常到中国东南沿海骚扰，由"倭寇"演变为"倭患"。1561年（明嘉靖40年）以后，在戚继光的领导下，历经10年，才平定"倭患"。

16世纪末，日本军阀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就梦想征服中国。1592年和1596年两次入侵朝鲜，曾一度占领汉城，在明朝政府的坚决打击下，才再次把日本赶出了朝鲜半岛。

1853年日本先后受到美、荷、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入侵以后，开始"维新"。由于其维新主要是在封建阶级和武士的控制下进行的，因而使其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具有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其"明治天皇"曾公开宣称："日本是万国之本的国家"，他决心"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建立一个"八绂一宇"的大帝国，并制定了向亚洲大陆扩张主要是侵略中国的所谓"大陆政策"。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就是按照这个血腥政策，不断侵略亚洲各国的。

在这个血腥政策下，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日本在中国犯下了数不清的罪行，残杀了无数的中国人，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二战期间，日本在南京就屠杀中国30余万人，其在中国境内进行的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细菌战，致死中国军民20多万人。1942年日本在云南投放的细菌弹，引起霍乱蔓延，总发病人数高达12万人以上，死亡人数达9万多人。从1939-1943年，日本从青岛港掠走劳工69.56万人，1944-1945年还不断有劳工输日，并施行现代奴役制度，迫害中国劳工。西历2000年4月1日，首届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究会在上海召开，这次由上海师范大学、北京《历史研究》编辑部和《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大会，集中了中国（包括香港、台湾）、朝鲜、韩国、菲律宾、新西兰、新加坡、美国、日本等国170多位学者、律师、记者，其中不乏研究世界"慰安妇"问题研究的权威人士。大会发表的《宣言》称，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慰安妇制度"，是军事性奴隶制度，是20世纪有组织有计划的、最残暴的战时性暴力犯罪。并确认中国是二战中"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曾涉及22个省市、有20万以上的受害者，时间长达14年。日本发动的罪恶的侵华战争，从1931年"9.18"事变起，累计使中国失去了3500多万人的生命。"同期中国的财产损失，除直接战争消耗1000亿美元以外，间接损失更达5000亿美元。"(2)

不仅如此，自20世纪末以来，日本政府纵容军国主义的复活、无视领海边界而制造事端、推卸其侵略战争罪责、背地支持台湾分裂和干扰中国台湾统一等等一系列行为，对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国家统一等方面造成的恶劣影响，也是无法用日圆单位来计算代价的。日本人的所作所为给全中华民族以及亚洲受其侵略过的各民族留下了无限的心理创伤。

日本既是美化其侵略战争最甚的国家，也是美化战争罪犯为"英雄"的国家。他们认为二战：

既不是惨遭屠城的中国南京，也不是蒙受偷袭的夏威夷珍珠港，而是挨了原子弹的广岛和长崎。……所谓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日本为了亚洲，为了把东南亚诸国从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战，最后惨遭原爆这样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中，日本是最大的受害者。

1952年日本主权恢复不久，要求释放战犯的呼声喧嚣不绝，各种请愿活动频频不断。在这种背景下，1956年到1958年的两年间，全体战犯获释，同时，在国会一致表决之下，通过了所谓的《受刑者名誉恢复法案》。根据这个法案，死去的战犯的灵位以"英灵"的名义被移入了靖国神社，接受国民和政府官员的参拜，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的灵位就是在这个时候被贡奉到靖国神社的，他们的遗族也像普通战争遗族一样，可以领取一批为数可观的吊慰金和遗族年金。……曾在东条英机手下当过军需次官的战犯岸信介出狱后，居然在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同样，很多战犯战后又重新回到政府部门担任要职，对日本战后的外交政策发生着重要的影响。(3)

由于日本没有承担战败国应该承担的责任，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相反，在美国利己政策的支持下，军国主义在民间和政府中，其活力得到迅速恢复。下面是美国"保护"和"扶持"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主要过程：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日本被解除武装，美国实行单独军事占领， 1947年实施的"和平宪法"明文规定日本不得拥有军人。

1948年12月24日（即对7名日本甲级战犯执行绞刑的次日），麦克阿瑟总部就宣布释放监狱中的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

1949年1月26日，麦克阿瑟指令蒋介石国民政府释放了以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冈村宁茨为首的260多名在押战犯。

1949年10月19日，麦克阿瑟又宣布对乙、丙级战犯结束审判，不再逮捕、搜查战犯嫌疑犯。

1950年3月7日，麦克阿瑟公然颁布"第五号指令"，规定所有根据判决书仍在日本服役的战犯都可以刑满前按所谓"宣誓释放制度"予以释放，这等于是完全破坏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

1950年11月21日，麦克阿瑟非法释放判刑已过轻并且刑期未满的重光葵，荒木贞夫、田俊六、贺屋兴宣等也被释放。后来重光葵居然当上了日本外务大臣和副首相，贺屋兴宣也曾重返政界。

1951年9月8日，美国与日本吉田茂政府在旧金山单方面签订了所谓的《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使日本与中国和苏联（俄罗斯）还未结束战争状态就从属于美国，使美国得以实现其对日本的长期军事占领，同时没有解决日本对侵略战争的赔偿、领土归还等问题，使日本模糊了其侵略战争的本质。

1950-1953年，美国入侵朝鲜期间，日本成了美军的"远东兵工厂"，其在美国国防部的采购额从1.91亿美元一直升到4.52亿美元。整个20世纪50年代，日本公司在美国获得了56亿美元的订单。日本也开始走向军事富裕之路。

1952-1953年，美国保留日本战前军国主义政府模式，扶植日本右倾政权，变日本为反共的东方前哨阵地，使日本军国主义得以迅速复活和成长。

1958年4月7日，在美国的操纵下，所有日本战犯未服满刑期都最后得到了赦免。

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在日本政府和社会中得到迅猛发展，日本右翼团体组织已经达到400多个。30年后，1995年这个数字巨增到900多个，其成员达到12万多人。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入侵越南期间，军火供应给日本带来了第二次经济繁荣。从1950年到1983年，日本从美国接到了总计价值100亿美元的高级军备订单。经济发展了，军事技术和力量也随之大幅度提升。随后，各种邪恶思想也在其畸形的政治背景下不断产生。

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日本向海湾地区派去了自卫队扫雷艇，日本终于结束了自战败后不能向海外派兵的历史。

1992年日本不顾多数国家的反对，突破宪法禁区，通过了向海外派兵法，使其自卫队可跨出国门，走向世界。

1997年9月，日本与美国发表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使日本可以与美国联手以军事手段干预亚太事务。

1998年4月，日本抛出"自卫队修正案"等法案，使自卫队不仅可以携带武器赴海外执行任务，还可以配合美军在海外的军事行动。

1999年3月18日，日本《每日新闻》又侵略性地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了一张新的东亚地图："日美安保条约中设定的远东范围"（见图10-8 (4)），图中虚线表示的"远东范围"自上至下的地名分别为择捉岛、韩国、小笠原群岛、冲绳、台湾、菲律宾。日本最高法院无耻地先后两次判定，日本和平人士东史郎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事实而被诬告损害他人名誉权案败诉

图10-9 “日美安保条约中设定的远东范围”

1999年8月，日美签署了两国共同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协议的换文和具体项目备忘录。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美国霸权主义者的扶持下逐渐复活，日本军队也一步步走向军事进攻的道路，日美联盟也日趋变得更具有针对性和进攻性。

自1972年日本右翼军国主义者铃木明最早跳出来否定南京大屠杀后，日本大坂国际"和平中心"两次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策源地：1999年该中心上演美化日本侵略的反动影片《自尊》，2000年1月23日又开始制造"20世纪最大谎言"的谎言--公开举行"否定南京大屠杀集会"。

2001年10月，日本借口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通过了《对付恐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改案》

等三法案，大幅度扩大其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开辟了在战争期间日本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道路。

2001年12月22日，日本海军在东海海域其领海以外（中国领海以外260公里处）击沉一艘所谓可疑的外国船只，这是日本战后向世界打响的"第一炮"。不到半年，2002年5月初，日本正式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

2003年在美国伊拉克战争以后，日本最终完全实现了其海外派兵的目的。现在，扛着太阳旗的日本兵已经在伊拉克正式出现了。这是一个军事大国的世界性展示。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名副其实的军事大国已经在东亚正式形成了，日本在东亚的军事威胁和行动，实际上已经无任何实质性障碍可言。可以预见，今后的日本必将依据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以及在美国的支持下逐步步入其霸权时代。

现在，日美联盟正在严重错误认识的基础上发展。日本借助世界霸权主义者美国的"虎威"，行日本的"狐狸之心"，更加明目张胆地干涉别国内政。这种"狼子野心"已成为威胁中国乃至整个亚洲东部地区的可怕力量。故此，战略评论家何新在1998年就明确指出："在未来30年内，中日之间，有交恶以至交战的可能。"（"警惕日本对华新战略"）。

现在，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势力已经大成气候，成为左右日本政局的巨大力量。

随着军国主义的复活、成长和壮大，日本的军事实力也强大起来。西历2000年，日本军力和装备如下：

日本自卫队陆、海、空三军总兵力27.5万人。其中，陆军约18万人，编成5个军区或者集团军，13个师及其它战斗支援旅。装备1159辆坦克、850辆装甲车、6300门各种火炮、300部反坦克导弹发射架、194部防空导弹发射架和449架直升机。海军是兵种齐全、装备先进、反潜护航作战以及远洋机动作战能力极强的部队，兵力4.7万人。装备有舰艇474艘，约31.9万吨（总吨位居世界第六）。其中，拥有水面作战舰艇62艘、潜艇16艘、各型飞机275架（含P-3C等大型岸基作战飞机100架）。空军兵力4.8万人，装备有"爱国者"防空导弹发射架40部、导弹

160枚、飞机434架（包括F-15战斗机172架、F-4GJ改歼轰炸机111架、RF-4E侦察机13架、C-1运输机28架、C-130H运输机15架）。

可以预见，日本的军事实力还将大踏步向前扩展。据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公布的数字，日本的军费从1983年起，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成为世界第二军费大国。1996年日本的军费开支高达48454万亿日圆，约合550亿美元。目前，日本的综合国力仅次于美国，居于世界的第二位，而中国则在美、日、法、英、德、俄之后，居世界第七位。并且，中国的综合国力水平，仅为德国的1/2，与日本相距更远。

战后，日本政府明地里奉行"无核三原则"，但是，正如日本前首相羽田孜所说："日本确有能力拥有核武器。"现在，日本是处在"核门槛"外的潜在核大国。它拥有49座核反应堆，发电量约为4万兆瓦，年产钚约10吨。2002年，日本已有足够制造三四千枚核弹头的钚，并能在一夜之间生产上千枚。到2010年，日本所谓"过剩的钚储备"将多达60多吨，拥有先进和快速研制能力的日本，可以籍此制造出7500枚核弹头。日本人自己都说，日本在7天之内就可制造出核武器。21世纪初，日本已经开始以各种名义建造航空母舰。同时，日本跟随西方国家把自己的军事能力扩展到太空，并随着2003年两颗间谍卫星的升空，拟在21世纪初建立太空间谍卫星网，主要以监视中国为目的，以搜集更多的军事情报。

我们注意到，日本穿着制服有军衔的自卫队人数有20多万人左右，但是他们全是"官"。什么意思呢？一旦发生战争，每个"官"按照一个营的力量扩编，日本军事力量，从人数上就可迅速成为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日本自卫队训练就是按照这个要求进行的。

日本列岛，由于长期"漂浮"在太平洋岛上，日本人始终没有稳定感，始终害怕哪一天本土四岛像四艘航空母舰被击中那样，突然沉没。同名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日本沉没》，就是这种"危机"思维的典型反映。再加上称霸世界的野心不灭，岛国又不可能有大作为。所以，日思登上大陆是他们的心头病。现在，俄罗斯日渐衰弱，其东方舰队也摇摇欲坠。他们盼望的是：在北方，什么时候借恢复"北方四岛"主权之机，炫耀武力，并为将来再次踏上大陆打下坚实基础；在西面，炒着朝鲜半岛问题；在南方，炒着钓鱼岛问题，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和牵制可能对他们不利的军事力量；在东面，思想着怎样洗雪美

国人对广岛和长崎的原爆之辱。他们至今，不对广岛和长崎原爆产生的原因作深刻反思，而总是对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国家而耿耿于怀。

日本在1945年战败，无条件投降后，由于蒋介石的"宽容"，日本人民免受分裂之苦，而今日本政府却对中国台湾和大陆的分裂不遗余力，炒出一个又一个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由于中国政府的"崇高道德"，放弃了日本的近似天文数字的战争赔款。而1874年，日本在侵占中国领地琉球群岛时，反向清政府索要60万两白银；在1895年，日本侵略者凭借一纸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勒索清政府2亿两白银、所谓威海卫驻军费150万两白银、所谓赎辽费3000万两白银，加上中国为所谓"赔款"而举债的利息2.3222亿两白银，日本共计索得白银4.6372亿两，相当于当时日本年收入的9倍；1901年，日本凭借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又在中国索得本金和利息约合1亿两白银的"赔款"。在整个近代史上，日本勒索中国白银共计近6亿两，大发横财。

日本对于中国，首先关心的是中国东北，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这块地方是踏上欧亚大陆的首选要地。1823年佐藤信渊写了《宇内混同秘策》，明确把侵略中国的东北作为第一目标。明治维新后，每发动一次侵略战争，日本军方就把佐藤信渊的书重印散发，作为军人必读教材。1927年的《田中奏折》就是《宇内混同秘策》的具体化。所以，现在在中国投资，重点在东北。日本对于俄罗斯，重点在于西伯利亚的天然气以及库页岛上的石油开采。2003年日本利用各种手段破坏中俄石油输送管道项目，诱使俄罗斯架设另一条通往日本的管道，目的就在于此。日本在东北亚的经济用意，很明显地昭示出其野心勃勃的战略意图。20世纪初，日本侵入我东北，也是通过从经济入侵开始的。先在东北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等企业，然后以保护铁路为名在东北派驻军队。有了铁路和军队，日本就可为所欲为了。日本的强盗逻辑就开始膨胀，当时的《朝日新闻》曾无耻地说："有了铁路权，即有一切之权；有一切之权，则凡其地官吏，皆吾颐使之奴，其地之民，皆我刀俎之肉。"(5)

面对日本的猖狂和无耻，中国对策如何?

罗素说过："中国在世界上的软弱，在很大程度上是归于中国人的美德。"所以，在日本军国主义这个问题上，中国是没有任何退路的。

在历史上，特别是在近代史上，中国受其侵害实在是太深了。日本要实现其称霸亚洲或称霸世界的理想，中国从南、西、北三面围着，他们不能绕过中国。因此，日本军国主义要涨，中国就必须给予有力的压。否则，中国又将面临更加残酷的灾难。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兽行、残暴以及不讲信义，是臭名昭著的。

1894年（清光绪20年）7月25日，日本突然袭击中国军队，不宣而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1904年2月8日，日本未经宣战和下最后通牒，袭击了俄罗斯驻在辽东半岛旅顺港基地；

1945年12月7日，日本同样未经宣战，袭击了美国在太平洋的珍珠港基地；

1999年，在东亚及东南亚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日本又在叫嚣，它们可以首先"先发制人地打击别国"，充分暴露了日本那种毫无道义可言的侵略实质。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曾言，20世纪是人类经历的各世纪中最悲惨的世纪，是死于非命人数最多的世纪。这话一点不假。第一次世界大战波及约30个国家，造成4000多万人伤亡；第二次世界大战约有60个国家卷入，仅死亡人数就达5000万之多。他认为，这种悲惨来自"两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等独裁者的屠杀和肃清，以及民族独立运动和世界性恐慌"。他为何特别强调民族独立运动和世界性恐慌？因为在他看来，没有民族独立运动，任由西方帝国主义者进行殖民统治，也许世界伤亡人数会少些。这是中曾根康弘潜在的逻辑思维。他对日本在两次大战中的扩张侵略和应对这种悲惨结果承担的责任一字不提，却对日本遭受原爆之灾而耿耿于怀；他对中国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而大加赞赏，却对日本不断叫嚣"可以先发制人地打击别国"的谬论充耳不闻；他认为"必须清算历史的错误，使之不能重演"，却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大踏步复活视而不见。(6) 这种包藏险恶用心的错误认识，使他没有认识到，1945年8月美国两颗原子弹炸死日本民众仅101900余人，致伤94400余人，共计死伤也才196300余人，其死者不及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南京屠杀中国人民的三分之一。我不赞同甚至痛恨美国的极端暴力，但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中国最大的敌人，过

去是，今后更是。所以，中曾根康弘的错误认识，不仅有害于日本民众，而且对中国以及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是极为不利的。

孙中山先生说过："中国强盛了几千年而高丽犹在，日本强盛了不过二十年便把高丽灭了，由此便可见日本的信义不如中国，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7) 孟德斯鸠曾说："日本人的性格是使人惊异的。日本人民是顽固、任性、刚毅、古怪的，一切危险和灾难都不放在眼里。"因此说，日本天生就具有一种侵略特性是不为过的。在她的历史上，历次侵略战争都是从突然袭击开始，并且其侵略手段极其残忍：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侵占旅顺后，屠戮4日，全城仅剩下36人，当时的美国报纸称日本人为"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的怪兽"；1937年以后日本在侵华期间，在中国大陆展开的细菌战、执行的"三光"政策等，真真惨无人道；1937年日本侵占南京后，屠城6个星期，惨杀中国民众35万余人，更是灭绝人理。

有鉴于我们历史上的悲惨一页，中国政府和中华民族必须高度警惕日本的扩张野心。如果日本一味从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中国必须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特别是经济资源控制上施加强有力的影响手段。也许这样相互制衡下的和平会长久些。否则，因日本而起的中国与日本的直接冲突终究会发生，这是日本人的本性强加给中国民众和中国政府的不可避免的危机。除非"日本沉没"，否则这个危机是不会消失的。

对于中国而言，对付日本军国主义将是长期而艰巨的国际政治和军事任务。

现在，日本是世界经济第二强国。GDP世界第二，2000年GDP为47496亿美元，比美国99631亿美元低，略为一半，但比处于第三位的德国18724亿美元高出一倍多；人均GDP世界第一，1999年人均GDP达到35567美元，比美国高出近4.5%；日本的钢产量仅次于中国、美国，居世界第三，其高级钢材产量超过中国，居世界第一；其制造技术世界一流，有的工业部门的技术装备和生产能力，超过美国，1998-1999年日本的高技术出口产值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研发投入居发达国家前列，1996年研发费用占GDP2.8%，高于美德；外汇储备世界最多，2000年末外汇储备3616亿美元，是其它6个主要发达国家外汇储备之和的一倍多；国外债权世界最大，2000年末对外纯资产（纯债

权）余额高达11579亿美元，居世界第一，日本官方的外援总数达130亿美元，也居世界第一。(8) 这样一个小地域大经济的"金元帝国"，绝不是按照常规思维办事的，它的行为也不是任何法律条文可以限制的，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正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诸领域内充分发挥其富余金钱的作用。

因此，我们必须在认清对象的同时，必须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各个方面强化自身，方能抵御日本军国主义的严重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发展和进程，对中国自身、世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发展、繁荣和强盛，对整个东方世界都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撑。我们应当联合东亚、东南亚的一切力量，特别是与中国有血缘关系的外蒙、朝鲜（包括韩国）、越南等国对付日本军国主义，维系东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为再创繁荣、富强的东方世纪，贡献中华民族的坚强力量。

还是2400多年前中国智者老子说得好：

和大怨，必有余怨。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

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9)

亦如张文木博士所说："在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批评置之不理的情况下，中国人也应尽快提出自己的'周边事态'概念及其相关法案" 。(10) 如果日本政府继续走军国主义道路，中国必须以法律形式重新建立一个《对日本关系法》；如果日本一旦再次以任何借口，入侵我们任何领土和主权，中国应该给日本准备一套枷锁和一条绳索。这套枷锁就是归还我故土--琉球群岛和古代财物，这条绳索就是追缴日本在二战中欠下的近似天文数字的战争赔款。必要时，继续追讨日本从19世纪初以来在历次侵略战争中给我国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和其勒索去的巨额财富。

按照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民族本性，我们是不愿与任何一个周边国家闹翻的。但是，一切外交必然以确保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为基础。我们应当以我们中华文明的传统美德，再次善意地告诫日本：没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而自号文明，没有真正的和平理念而自谓诚善，没有基本的民族独立而自夸发达，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而自恃强大，这是不明智的，也是很危险的。日本应当深刻领会印度社会活动家泰戈尔于1916年提出的忠告：

日本不要仅仅以它从外国学来的东西为骄傲，永远不要失去它对它自己的灵魂的信心。因为这种骄傲本身就是耻辱，最终会导致贫穷和软弱。这是花花公子的骄傲，他重视他的新头饰，而不那么重视自己的头。……必需懂得，真正的力量并不在于武器本身，而在于掌握那些武器的人；当他热衷于力量，并且以自己的灵魂为代价成倍地增加他的武器时，那么，正是他自己甚至比他的敌人处于更危险的境地。(11)

---

(1)见《人民日报》2003年1月15日，朱根华漫画“转身之间”。

(2)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12卷（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117页。

(3) 李兆忠，“人类的两面：德国和日本”，《中国经济时报》，1997.9.19。

(4) 转载自《人民日报》，1999.4.30，第7版。

(5) 转引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11卷（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276页。

(6) 《人民日报》，1999.12.24，第7版。

(7) 曹锦清编选，《民权与国族——孙中山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第59页。

(8) 参见张舒英，“全面估价日本经济”，《环球时报》，2001.12.4。

(9) 《老子.七十九章》。

(10) 张文木，《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80页。

(11) 泰戈尔，《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一版，第29、41页。

**********

## 第四节　俄国：扩张主义

俄国（俄罗斯），按照布热津斯基的说法，"从地缘政治和文化角度看，俄国既不完全是欧洲的，也不完全是亚洲的，因此，俄国具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欧亚特性。这种特性是俄国对中亚到太平洋海岸辽阔土地的独特控制所遗留下来的，是莫斯科四个多世纪向东扩张所建立的帝国的遗产。俄国通过扩张，把一大批非俄罗斯人和非欧洲人纳入俄罗斯，从而也形成了独特的欧亚政治文化特点。"（《大棋局.第4章》）因此，俄罗斯本质上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扩张主义国家。在俄罗斯的东扩过程中（19-20世纪），中国则是在俄罗斯扩张政策下遭受损失最大的国家。邓小平曾无不气愤地说：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

日本占了中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五十年。……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所以，算历史帐，日本欠中国的帐是最多的。

另一个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1)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沙皇俄罗斯侵略中国的简要过程：

1552年，沙俄侵占了中亚喀山汗国，开始向东扩张。

1581年，沙俄越过乌拉尔山，推进到西伯利亚。

1640年，俄国沙皇政府成立雅库茨克督军管辖区，进一步实行对外扩张。

1641年，雅库茨克督军戈洛派遣巴赫捷雅罗夫率70名哥萨克远征黑龙江。

1643年，雅库茨克督军戈洛派遣波雅科夫率132人哥萨克，第2次远征黑龙江。是年冬，侵略者正式侵入我东北，侵占了中国尼布楚和雅克萨等边境城镇。

1644年，波雅科夫顺黑龙江而下，沿途骚扰抢劫，当地中国居民坚决抵抗，1646年侵略者从黑龙江口渡鄂霍茨克海返回雅库茨克。

1649年，俄国派遣哈巴罗夫率70名哥萨克，再次侵略我黑龙江流域。次年，越外兴安岭南下入鄂尔河口。

1651年，哈巴罗夫在俄国政府增援后，占据我雅克萨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其在古伊古达儿村就屠杀661人，暴行惨绝。

1652年4月，中国军民在乌扎拉村击败以哈巴罗夫为首的侵略者。

1654年，中国和朝鲜军民在松花江，击退以斯捷潘诺夫为首的侵略者。同年，俄国政府派遣别克托夫从贝加尔湖侵入我国领土，强占尼布楚。在当地中国居民的反抗下，别克托夫东窜黑龙江，与斯捷潘诺夫汇合。

1655年，俄国沙皇政府任命巴什科夫为"黑龙江督军"。

1656年，俄使巴伊可夫到北京，态度傲慢，否认其在我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暴行，清顺治皇帝不予接见。

1657年，中国军队在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率领下，在尚监乌黑打败俄国军队。

1658年，巴什科夫再次强占中国领土尼布楚。沙尔虎达在松花江和牡丹江汇合处围歼俄军，斯捷潘诺夫被击毙。

1660年，俄信使佩尔菲利耶夫和阿布林到达北京，国书措辞傲慢，顺治皇帝不予接见。

1662年，俄国政府非法任命伊拉里昂.托尔布津为尼布楚总管。

1665年，以瓦西列夫和洛夫为首的俄国侵略军从外蒙古南下，向中国喀尔喀蒙古地区扩张。同年冬，俄国侵略者切尔尼戈夫斯基重占我国领土雅克萨，再次窜犯我黑龙江流域。

1674年，中国索伦族人民起义，袭击巴尔古津附近的俄国侵略军。

1675年，雅克萨俄国侵略军在切尔尼戈夫斯基率领下侵扰我东北根河流域。

1678年，俄国侵略军在黑龙江河精里奇江流域扩展势力，先后建立雅斯克等多处寨哦堡。

1680年，俄国政府成立尼布楚督军区，沃依科夫为第一任督军，增加军队。

1681年，俄国侵略军侵入我国额尔古纳河以东，建立额尔古纳堡。

1682年，俄国政府成立雅克萨督军区，命阿列克谢.托尔布津为督军，命伊尔库茨克督军伊凡.弗拉索夫为尼布楚督军。

1686年7月，中国在雅克萨向俄国侵略发起反击，托尔布津被打死，中国军队围困雅克萨。12月，因开谈判而停战。

1689年9月7日，中国和俄罗斯签订了平等的《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国和俄罗斯在东北边境的边界（中国丧失了贝加尔湖以东以南至尼布楚大片领土）。

1727年，中俄又签订《布连斯奇条约》，它和《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

19世纪前，中国清皇朝属于强盛时期，所以，俄罗斯的扩张通过签订《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得到了遏制。这两个条约规定的黑龙江以东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以南包括库页岛在内广大土地，属于中国领土，并且在中国版图内延续160多年。1796年嘉庆皇帝即位后，政治腐败，内乱不断，国力衰弱，俄罗斯和其它西方列强一样，发动了对中国的一系列罪恶侵略。

1846年，俄罗斯侵入我西部巴尔克什湖东南的库克乌苏河地区。

1850年8月，俄罗斯借中国内外混乱之机，破坏边界条约，侵占我黑龙江的庙街。

1851年8月6日，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伊宁条约》，侵犯我西部伊犁地区领土主权。

1853年，侵占我哈萨克草原地区。

1853年4月，侵占我库页岛。

1856年底，公然在黑龙江下游地区设"滨江省"，以庙街为首府，并将大片中国土地纳入俄罗斯版图。

1858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瑷珲条约》，侵占我黑龙江以东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并划乌苏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所谓的"共管区"。

1860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侵占我乌苏里江以东以南4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1864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侵占我巴尔克什湖以东以南约44万平方公里土地。

1879年10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中国丧失了伊犁西部霍尔果斯河以西和伊犁以南的特克斯河流域、额尔齐斯河流域中斋桑湖以东地区和哈巴湖周围的大片土地、以及南疆喀什噶尔边界地区的大片土地。

1881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改订条约》，侵占我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南北两岸约1.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882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伊犁界约》等一系列边界协议书，侵占我西部7万多平方公里土地。

1895年3月，俄罗斯与英国狼狈为奸，背着中国瓜分中国萨阔岭以西帕米尔领土，俄罗斯侵占约2万平方公里土地。

1898年，俄罗斯将于1897年12月强租的大连、旅顺租界，扩大到整个辽东半岛，并置"关东省"，实行殖民统治。

1900年，俄罗斯加入八国强盗侵略北京，派10万大军分五路入侵东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海兰泡血案"和"江东64屯惨案"，杀害中国居民20万人。

1911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满洲里界约》，侵占我1400平方公里土地。

1929年，苏联再次入侵我东北，侵占中国的黑瞎子岛。

1935年，苏联以满洲里"关于中东铁路转让基本协定"侵犯中国主权。

1944年，苏联用武力侵占了我唐努乌梁海地区约17万平方公里土地。

1945年2月，苏联与美、英二国秘密签订所谓的"雅尔塔协议"，其中有关外蒙古、东北和库页岛等方面的内容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直接导致了外蒙古的独立。

1969年，苏联在本来就是中国领土的珍宝岛上制造了流血事件，并试图直接袭击中国国内核基地。

1978年，苏联支持越南反华排华。

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试图控制中亚，形成"钳型"态势，包围中国。

这仅仅是从1643年起300多年来，俄罗斯侵略和侵犯中国主权的长长的清单中的一部分。直至今天，外蒙古仍然独立于中国之外，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仍然由俄罗斯占据着，西北7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现分别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境内。给中国北方边境留下了无穷无尽的隐患。仅1858-1883年间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失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地区）、《北京条约》（失去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塔城条约》（失去巴尔克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伊犁条约》（失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哈巴河条约》（失去斋桑湖地区）就损失了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它们有"三个法国、五个日本那么大，都是中国国防上绝对不可以丧失的重地，任何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笔巨债。"(2)

俄罗斯是一个野性而不守道义的扩张国家。我们千万不要被其一时的软弱所蒙骗了。1991年苏联分裂以来，俄罗斯虽然已经很少伤害中国了，但是我们从其第一任总统、"政治奸雄"叶利钦每次访问中国几乎都要成功地搞一两个维持现状的边界条约所带的笑容中就可以看到，俄罗斯人在衰弱中仍然不弃其扩张远谋。被我们奉为四大革命导师之三的列宁曾说："许多世纪以来，沙皇俄国一直想夺取……亚洲大部分地区。"(3) 他自己也继承了这个侵略扩张思想，并说：俄罗斯的目的在于，"直接占领一直到万里长城脚下的一大片领土，并获得在东亚的霸权。"(4) 列宁还是外蒙"民族独立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是他把蒙古变成了世界上第二个"非资本主义国家"。其继任者--被我们奉为四大革命导师之四--斯大林，恰如西方的一贯观点，他是一个危险的扩张主义者。1950年，"斯大林支持发动朝鲜战争的政策是服从于以苏联利益为核心的世界战略的。他在东方将中朝推入正面挑战美国的朝鲜战场，借此转移了美国在欧洲的压力。同时利用中朝消耗美国的实力，又抑制了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地缘政治新中心的兴起。"(5)

俄罗斯历次侵占中国领土，大都是不守道义的趁火打劫和主动性侵略的结果，先以军事威胁或者军事占领，然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来确认。所以，从1689年《尼布楚条约》以后，其所侵占的中

国领土和一切抢劫所得均是非法的，中国人民和政府理应追讨。不能保证钺钟历史地理结构的完整，中国就不能取得长期的稳定；不能保证钺钟历史地理结构的完整，中国人民就没有永久的安宁。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走向了衰弱，其对外的直接扩张政策，我们只能说是暂时"休息"了。西方国家趁机纷纷欺辱俄罗斯，政治打击、军事威胁、北约东进、经济封压、外交欺骗等等手段不一而绝。中国则严守道义，而不凌其弱，渔其利。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双头鹰"国家，中国绝不能掉以轻心，应该坚持中国故有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立场，追讨其在历史上侵占的中国领土。这项任务应当作为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神圣职责。

---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292-293页。

(2)柏杨，《中国人史纲》，下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927页。

(3)《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5页。

(4)《列宁全集》，第54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二版，第764-765页。

(5）何新，《孤独与挑战——生命黎明》，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19页。

**********

## 第五节　印度：干涉主义

历史上的南亚地区国家与中国一直是和平友好的，直至今天这种睦邻友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继承和发展。

秦汉时期，中国与当时南亚的身毒和天竺（今印度）就开始了频繁交往。魏晋时期，中国与这一地区的笈多王朝、犍陀罗、乌苌国和克什米尔地区古国以及尼婆尔（即今尼泊尔）有友好往来。唐朝时，以佛教为纽带，中国与印度次大陆国家的关系达到高峰。但是，印度文明由于永远落后于中国文明，所以当时的若干小国曾受世界性大帝国唐朝的册封，籍以抵抗阿拉伯国家的进攻。从此开始，双边一直和平共处，直至现代。在后清（1796-1911）时期，尼泊尔和现今阿富汗地区的政权曾和清朝军队一起，并肩抗击英国军队的入侵。现代中国与印度又在悠久和平的基础上，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可以说，在中国对外历史上，中国东南西北四面，只有南面即南亚地区是和平安定的。这主要得益于众所周知的三个原因：一是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具有和平的共性特征。中国注重"仁礼"的儒学、崇尚"自然"的道学和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学，都极力反对战争，认为战争是一种罪恶。根置于印度文明之中的佛教文化，也主张"不为暴虐，不害无辜，不可烂刑，不可不恤。"二是中国与南亚在自然地理上有天然屏障，不利于军事行动。两个地区间从西到东有喀喇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相隔，因而，任何军事行动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即使强大的并且一度占据欧亚大陆阿巴咸中心地区的唐朝和元朝都未深入印度半岛去冒险。三是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在各方面始终先进于印度文明，并且南亚半岛国家一直比较贫穷。因而，只要中华帝国不主动去侵略南亚国家，和平就将继续存在。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印度在近代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取得独立后，印度人的历史态度开始漫漫发生了变化。随着其人口增加、经济发展以及现代技术的逐步掌握，这种向外伸展的信心就显得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其不断变化的政策已漫漫演变成为一种明显的干涉（或者干扰）主义。这给中国一直和平的南部地理边界线形成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挑战。

1950年4月1日，中国和印度建交。它成为与我国建交的第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两地长期和平共处的友好表现。

1954年，印度新版地图将中国控制的大片领土纳入版图。在中印边界形成了从东到西有8处争议地区，制造了12.5万平方公里的有争议领土，使中国与其边界长期得不到解决。相反，中国与尼泊尔（1961年10月）、阿富汗（1963年11月）和巴基斯坦（1963年）都顺利解决了边界问题。

1958-1959年，印度军队在中国边界不断挑衅，并在1961年占领我国大片领土。

1959年，西藏叛乱失败后，印度政府一直支持达赖及其追随者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一些印度领导人还直接到反华集会上讲话。

1962年10-12月，中国在藏南地区被迫发起反击侵略者的战争，击退了印度军队。但随着中国军队的撤退，印度又重新占据了该地区。

1986年12月，印度议会两院宣布在中印东段边界地区，印度在占领的中国领土上成立非法的"阿卤纳恰尔邦"。

1987年，印度一些领导人在讲话中继续干涉中国内政。

1989年，印度召开所谓的"西藏与南亚和平"会议，再次直接干涉中国内政。

1991年10月，印度纵容流亡印度的西藏分裂分子冲击访问印度的四川歌舞团。

1992年3月，印度纵容9名西藏分裂主义分子袭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

1998年5月，印度进行核试验，并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对中国进行无端攻击。

这些事实证明，印度政府内部存在一种严重的、甚至是十分危险的、阻碍中国和印度和平发展的"干涉主义"思潮。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和印度两国关系逐步有所改善，国家领导人互访。但是，印度长期占据我藏南并不断扩大边界问题，印度和巴基斯坦严重的军事对峙，这些都不能使中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克什米尔地区是中国钺钟历史地理南部边界线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这个地区是不确定的，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三国各拥

有一段边界，它是当年英国殖民侵略者留下的祸根。历史遗留问题本来难于理清，再加上新的干涉主义的发展和抬头，更使这个地区增加了不稳定性。

印度干涉主义，虽在短期内不构成对中国的直接的巨大威胁，但它绝不是一个可以弃置不问的问题。20世纪末尾20年，印度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进口国之一，其不断膨胀的海军力量，明确地将其活动区域延伸到阿拉伯海和中国南海海域。可见，印度军事力量将会随着印度导弹射程的延长以及其好战一面的逐步升级而逐渐成为中国西藏边境地区、中南半岛和我国南海的不安定因素。

印度，中国绝不可等闲视之。

**********

## 第六节　中国：以实力反霸

被称为"世纪的智者"的英国大思想家罗素于1938年，在其《权力论》一书中说：

世界性的国家已成为一种技术上的可能，它也许由一次十分激烈的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建立起来，或者，而且更为可能，是由最强大的中立国建立起来。

假如各国的目的不是相互矛盾的，这种趋势迟早会导致"世界国家"的产生。假如各国的目的都是本国人民的财富、健康、智力和幸福，那就不会有矛盾；但是，由于这些无论是单一或合在一起，都被认为不如国家权力重要，各国的目的总是发生冲突，并且不能因联合

而改善。因此，如果"世界国家"真能实现，那么唯一可指望的途径就是某个民族国家征服世界，或者某种超越民族主义的信念为人们普遍接受，就像社会主义和后来共产主义在它们的初期似曾被人接受那样。(1)

后来，罗素又在1951年的《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一书中，对科学技术对未来社会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时，更进一步指：

我的结论是，一个科学性的社会只有在既定条件下才能保持稳定：第一个条件是在全世界建立唯一一个政府，拥有唯一一支军队，以此来强制性地推行和平；第二个条件是财产的普遍分散，使世界的某一地区没有理由嫉妒别的地区；第三个条件（以第二个条件的满足为前提）是在世界各地保持低生育率，使世界人口数目维持不变或基本维持不变；第四个条件是在工作和娱乐方面为个人的创造性提供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挥那些与维护必要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目标不相矛盾的力量。

在这些条件实现之前，一个靠科学性组织起来的社会将继续面临严重的危险，其中后果最可怕的危险是人类种族在一次大规模战争中灭绝，其次是世界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文明的水平普遍下降。这样一个过程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可怕的苦难，因为它意味着地球上将近半数的人口将因暴力或饥饿而死亡。所以，头脑清醒的人一定会希望看到世界向满足保持稳定的那四个条件的方向发展。我们不能说这个世界目前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运动。

因此，他又说：

如果要使任何一种国际性的政府成为可能，必须对人们的狂热加以抑制。人们必须养成科学地而不是感情用事地看待社会群体的习惯。不受欢迎的行为不能靠野蛮的仇恨来加以遏制。

要想使这个世界实现统一——正像使这个世界继续生存下去一样——只有通过科学精神的普遍传播。(2)

在罗素看来，军事征服、科学技术、文化，在建立"世界国家"过程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美国始终保持世界超级军事力量、高度垄断科学技术和大搞文化帝国主义政策，也许正是出于罗素思想的指引。然而，现实的资本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产品"--贫富两极分化，又是不符合罗素保持世界稳定的四个条件中的第二个条件的。同时，依靠军事

暴力来统一世界，又必将存在人类或者一些种族灭绝的危险。所以，美国式的以强权统治世界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恰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把全世界在经济、政治和文明三个方面都统一在一个西方结构里的总趋势，看起来既没有前进很远，也没有像初看的时候那样肯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3) 相比之下，中国人的儒道法共存的"大同"社会，以及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共产主义（有人称为"超文明社会"）远大理想具有无比的先进性。中国人需要调整的就是战略策略以及实现远大目标的方式方法。就目前而言，至少应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实力反霸，联合一切力量粉碎美国以军事暴力图霸全球的阴谋，确保我们这个星球和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全人类的生存安全。在人类共存共生条件下，人类才可能赢得和平统一。如果我们中国人能够为提升国力而孜孜不倦，那么，未来"大同"世界很可能在中国儒道法共生文明体系中诞生。

目前的国际形势，按照台湾史家柏杨的说法就是："一个新的属于世界性的更庞大的春秋时代，再度来临，而且直到二十世纪，甚至可能延伸到二十一世纪。跟纪元前古中国已逝去的春秋时代，无论在实质上和形态上，都有几乎全部相似之点。诸如：一、小国林立。二、大国争霸。三、政变不断发生，国家元首不断被逐被杀。四、不断有旧国灭亡，新国兴起。五、一次大战调整一次霸权。六、新生事物、新生思想、新生意识形态，如雨后春笋，不断向旧事物、旧思想、旧意识形态挑战，而且节节胜利--像民主终于战胜君主。七、因之卫道士之更艰苦、更痛心欲绝，用尽所有手段，企图阻挡历史前进的巨轮。"(4)

纷繁世界，天下何路？世界未来必将并国万千，统于一宇。故落伍者，必如中国夏商周时代那样，杀君亡国，其结局必然是"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至于战国，存者十余。"（如南联盟之米罗舍维奇、伊拉克之萨达姆，等等）那时，世界再经过群雄逐鹿，最后终归于一统。我们现在所要作的就是发展自己，强大自己，反对霸权，保存中国优秀的文明传统，以期造福于全人类。

眼下，中国直接的对外政策，如邓小平所说："主要是两句话：一句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后一句话，就是不当世界霸权国家，也是反霸权主义。

反霸是反谁呢？即是反对搞霸权主义的人和国家。谁在搞霸权主义？无容置疑，是美国及其仆从。因此，中国反霸就是反美国及其仆从。美国的霸权是明目张胆的，是自认不讳的。而其仆从也在不断地在美国的霸权旗帜下展开霸权行动：如欧盟东扩、北约东扩、日本与美国联建TMD等等。而霸权仆从国蛮横世界，霸权首领--美国除了直接参与外，还一直不断地为他们鼓气。比如，布热津斯基就明白地说："一个扩大和民主的欧洲必需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历史进程，不应受在政治上任意涂抹的地理的限制。"

围绕霸权与反霸权问题，那本由俩个美国人制作的充满欺骗和谎言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的主题是绝对正确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所作所为：经济制裁、人权攻击、收容叛国者和分裂分子乃至邪教分子、耀武台湾海峡、直至轰炸中国驻外大使馆等，无不说明是美国在不断欺辱中国，而不是中国在欺辱美国。不过，《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的作者在为全力对付中国寻找理由时，还是暴露了其真实的用意：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不久即将变成全球第二大强国的中国将随着世界面貌在新的千年中发生变化而成为一支支配力量，而作为这样一支力量的中国将势必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友邦，而成为它的长期敌人。

历史上有一段时期与此有着可怕的相似之处。从1941年至1945年，美国同有史以来对人民镇压最残酷的独裁统治国家之一苏联保持着战略伙伴关系，因为这样一种伙伴关系对于击败纳粹德国的侵略是必要的。随着战争的结束，这个联盟也完结了，代替它的是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比较自然的竞争。(5)

作者以为，苏联不存在了，俄罗斯连"车臣问题就解决不了"。因此，这个时候，就是以中国为敌，分裂和搞跨中国的时候了。

既然美国的以中国为敌的思想不会改变，其统治世界的野心不会变，既然冲突不可避免，那么中国就必然有针锋相对的战略策略和反对霸权的本钱。我们用什么反霸权主义呢？窃以为，光靠政治上的大国地位是吓不倒人的。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应当具有保卫自己的足够能力。同时，在心理精神上，要有毛泽东式的勇气：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6)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7)

美国今天的国家霸权地位并不完全是依靠美国人的努力。美国自1776年立国以后，欧洲的压迫和内部政治的不成熟，国家矛盾重重，始终不能步入发展正轨。立国仅仅85年，不可调和的种种矛盾最终激化成为长达4年的南北战争（1861-1865）。如果美国人在国家建设上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建树的话，那么有两点可以提到：内战过后，迅速恢复和坚持了国家政治制度和把一个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国。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它们成为美国后来发展成为世界绝对大国的坚实基础。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他们的国家在老牌欧洲霸权国家面前仍然是不足称道的，更不用说其国际地位了。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和紧接其后的"冷战"中，对手的自我毁灭，真正把美国送上了世界霸权国家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使美国成为世界最突出的国家，但不能左右世界局势；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后，使美国成为一个左右世界局势的国家，但不能取得世界霸权；"冷战"结束，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真正成为我们这个星球上的霸权国家。我们回顾美国取得国际霸权地位的历程，无非是想说，很大程度上，美国对手的退缩和失败帮助了她的发展壮大。

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气概、决心和能力不是通过喊几句口号就能产生和形成的，她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明智的国际外交斗争政策。

综观新中国半个世纪的国际斗争，由于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可谓是艰难时世。1949年"一边倒"向苏联，1959年又与苏联分道扬镳；1969年高举"反两霸"旗帜，1979年又同美国建交；1989年再次反对美霸，1999年再次实现联俄。这种不断变化的外交斗争政策，显然既有权宜之意，也有制衡之意。但国际地位没有根本改变，关键在于国家实力微弱。我们说政治上的外交是必要的，但不是主要的。很多事实说明这样一个美国原则：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只要对其国家利益和争取世界霸权有利，美国就会立即抛弃其喊得最响亮的所谓民主、自由、和平口号，抛弃其一贯倡导的国际秩序、国际法准则和国际关系原则。从这个角度说，美国就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危险的敌

人。现在，美国的国家政策很明确地把中国、俄罗斯、日本作为三大敌人，其所谓的导弹防御系统，不管是国际性质的还是地区性质的，主要目的在于对付中国。美国用台湾和达赖喇嘛制约中国，是公开和直接的。西历1997年，美国政府设立所谓的"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西历2001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兼任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职务。可见，中国所受到的美国霸权的压力最大。如果中国没有相当的实力，永远谈不上什么反对霸权主义。所以，中国自身要造就一个没有内部腐败的强壮"身体"，才能完成这个艰巨的历史任务。否则，我们会在内外压力的挤压中垮下去。

总之，政治上的开明，经济上的富有，科技上的先进，军事上的强大，文化上的发展将是我们反霸最基本的具体战略。中国目前在世界反霸斗争中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军事的现代化问题。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方面的现代化问题在以前都涉及过，因此这里仅从国家军事战略及其相关的国家安全、地缘政治等方面提供一点"纸上谈兵"的意见。

关于现代国家的安全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王逸舟先生的观点，很有见地。他认为，中国自我定位的新的安全观应包括三个层面，即器物层面、体制层面和观念层面。器物层面就是物理、物质、实物的保障。体制层面就是有一个健康、开朗、向上、符合进取精神的体制，不断自我完善。观念层面就是要有动态的、既向内又向外的、进步的、发展的、自我革新的安全观。不能是固态的、静止不变的和专守防范的。(8)

然而，"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在战略上实行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的原则。这种防御是和平时期努力遏制战争与准备打赢自卫战争的统一，是战争时期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的攻势行动的统一。"(9) 但是，不管你如何防御，总是处于被进攻状态。毛泽东在论述"防御问题"时，认为：

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10)

中国有一首古诗说："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从古知兵非好战"、"不以兵争天下"、"不战而屈人之兵"、"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等等。这是中国传统防御军事战略思维的最明确表现。甚至有的人睡在中国巨大的"同化力"上高枕无忧。有个外国人（美国作家蒙特罗）曾说："征服中国，好像将一把剑投人海中。其抵抗似乎很小，可是不久以后，钢铁就会生锈，而且被合并了。这合并的过程非常彻底，几代之后，就只有哲学家才知道，谁是征服者，谁是被征服者了。" 他说的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征服和统一。但是我们要清楚：外族征服过中国吗？没有。外族侵占港澳，香港并没有把英国人同化掉，澳门也没有把葡萄牙人同化掉。北方民族之所以被"同化"，那时因为匈奴、鲜卑、蒙古、满清等都是中华民族之一，本质上他们与汉族具有相同的根源和思想。内部的起伏波动，我们不能错误地理解为征服和同化。所以，我们不能跨大中国的同化力，麻木应世，消极防御。"不要紧，让他们进来吧，我们先当'汉奸'，曲线救国，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这千万千万要不得。想想台湾的日本化倾向就应当明白这一切。

所以，消极防御或者为防御而防御，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总是要受到攻击的。我们常说一句话："没有攻不破的堡垒。"如果你总是处于防御地位，总有一天，敌人会攻破你。所以，建立积极的政治军事斗争战略--不妨称为"进攻性的防御"政策--将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所谓"进攻性的防御"政策主要的是教育和训练国防军队尤其是其指挥系统在应对复杂的军事进攻方面的主动性和决胜能力。比如，中国在同时遭遇美国在朝鲜半岛发动的"复仇加雪耻"的侵略战争和美国在新疆进行军事入侵情况下的全面反击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能力，这类案件在未来的战略防御中将越来越重要。虽然，像美国、以色列等国那样的纯粹的进攻性政策是有悖中国传统文化的；但是，在这个由恐怖国家操纵一切的世界上，生存是第一位的。军事理论家孙膑有一个"必攻不守"的军事观念，一般人理解为大军事家孙子所提出的"攻其所不守"和"攻其无备"，事实上，这种认识只停留在战术层面，从战略层面上讲，"必攻不守"就是采取积极进取的"攻势"战略。

在古代，中国"读书人以做官为职业，俨然形成一种统治的士大夫阶级，养成重文轻武的风习，使盈鏊积功的武夫竟莫敢谁何！"(11) 不对外侵略，自然道德崇高，但是不能忽视武备，更何况我们现在的地图上还有不少的土地被其它国家侵占呢？然而，中国自古在和平时期疏于防备的陋习在现代也有表现：美国掀起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每次都给中国以强烈的震动，前者使中国军界大开眼界，尤如从梦中惊醒；后者给了刚从梦中醒来的中国军界当头一棒（美国军队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不知所措。

张文木博士明确指出："发轫于近代英国而又漫泛迄今的资本全球化，如果不考虑其间在战争间歇期出现的和平与发展的'机会'的话，那它在现实中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牧歌式的进程，相反它则是民族国家间极残酷的淘汰过程。被淘汰的不一定都是经济不发达的和'文明程度'不高的民族，它更多地是那些不思武备的民族。"(12)

与我国防御性的国防政策相配，我们在国际上采取不结盟政策。但是，我们要意识到，瑞士中立国的存在，是以"全民皆兵"为基础的。二战时期，希特勒横扫欧洲，而独留瑞士，就是瑞士的积极防御政策，使这个国家免遭战争的蹂躏。再说，随着中国军人迈出国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增多，中国军队就不能不与他国军队发生关系。特别是，中国同周边国家，不但在政治外交上建立关系，在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方面更应该有一个稳定的战略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我们建立永久的和平基础。从公元前3200年到现在共5200年中，地球上大约发生过14000多次战争，真正的和平时期累计在一起只有300年左右。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古代有文字记载的战争，从夏代到清代结束，在3966年间共发生了5500次左右的战争，占世界同期发生的战争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从人类历史上看，战争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完全的和平从来没有超过60年，和平只是两次战争中的间歇，我们努力要做的应该是使这种间歇的时间尽量延长，让战争的时间尽量短一些。"(13) 但是，怎么样才能使两次战争中的间歇尽量延长，让战争的时间尽量短一些呢？在中国，只有让那些在我们的周围在未来可能制造战争的力量远离我们的国土及其边缘地带，方能保证国家的和平和稳定。就像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说的，要使本土争取到和平，必须在远离本土的几千里之外使用我们的力量。虽然，我们不主张像

美国那样在全世界到处穷兵黩武，但我们至少应该努力在国土边界之外的一千公里以内逐步化解对中国可能形成进攻的不安定力量。这个"超越和平"的战略思想，不是尼克松的发明，而是中国本土军事谋略家的理论。早在春秋时期楚国人沈尹就明确指出：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境）。(14)

到后清光绪年间，翰林院学士周德润说得更具体、更明白：

天子守在四夷，此诚为虑远忧深之计。古来敌国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则已无及矣；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及矣。我朝幅员广辟，龙沙雁海尽列封藩。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谓山河带砺，与国同休戚者哉！(15)

所以，作为一种战略的基础，我们对与中国有"血缘"关系和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周边国家的安全，应明确地负起责任和任务，不要遮遮掩掩。在历史上，每当朝鲜、越南等中国周边国家遭到侵略的时候，中国都提供了毫不含糊的军事援助。然而，这是被动的。事先没有安全协议，当边国遭到侵略快要亡国了，进而威胁到中国安全，中国才被迫出兵援助。这种被动的安全防护观念应该有所改变。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周边某国，纠合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中国将对这种不正义的侵略，给予毁灭性的打击，把战火烧到帝国主义者的"同谋国"领土上，让他们自己吞下战争的恶果。"夫夷狄者，不战而未可与和者也，犬絷项而后驯，蛇去齿而后柔者也。"(16) 所以，我们不怕战，而要以压制侵略战争的战略赢得国内国际和平，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是矣。

如果说，18世纪以前中国的战略防御重点是在大陆三北（东北、蒙北和西北）地区，那么从18世纪开始，随着西方的侵入，随着西方两股力量（一是大陆深处的俄罗斯，二是东部沿海地区西方海上力量）对中国的压力的增加，中国实际形成了从东到西的北线大陆战略带和从北到南的东线海岸战略带。这两个战略带，在18-20世纪显示出了其突出的重要性。到21世纪，这两个战略地带，在美国霸权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以及俄罗斯扩张主义没有一点收缩迹象的情况下，仍将是中国最重要的军事战略防御线，其中特别是在东线战略带区域

内，"美国进一步强化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双边军事同盟，推动研发并计划在东亚地区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以及日本确定'周边事态法'等，违背时代潮流。联合军事演习在本地区有增无减，不利于国家间建立信任。影响朝鲜半岛安全的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南亚地区形势仍不稳定。在南海地区蚕食中国主权权益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有的域外国家也试图插手南海问题。"(17) 鉴于如此险恶的东线环境，唯有强大的海空军事力量和先进、突出的海空军事技术，才能维护我们的一切权益。

足够的核力量是中国所不能缺少的，在核子时代它是中国的护生符。新中国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家积贫积弱，混乱到了极点，国际关系陷入孤立，那时如果外国侵略中国，结果是很难想象的。侵略成性的外国霸权主义者，之所以没有侵略中国，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国科学家的杰出贡献。是他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搞出了震惊世界的"两弹一星"，才使外国人不敢越雷池一步，是这些科学家撑起了中国的脊梁。可见，如果中国具有足够使可能组成侵华集团的几个国家以彻底毁灭的能力，侵略者们特别是霸权主义者就会首先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

现在，美国称霸世界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建立军事联盟，而世界有核国家，大部分在它的联盟体系之内。到21世纪初，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和条件上，均不存在很大的障碍。未来世界将是一个核普及的世界。一个国家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奉行不结盟并坚决反霸的国家，同时遭到多个有核国家的毁灭性打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并且，塞缪尔.亨廷顿断言："中国的崛起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了更根本的挑战。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较之美日冲突范围更广泛，包括经济、人权、西藏、台湾、南中国海和武器扩散问题。美国和中国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的目标，两国分歧是全面的。" (18)正如李慎之先生所指出的："亨廷顿的观点值得重视，因为它们代表着一种深刻的恐惧。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种恐惧决不仅仅代表他一个人，而是代表着一批人。大家知道，恐惧会产生仇恨，而仇恨又能孕育战争，而亨廷顿所设计的自保方案竟还是已有半个世纪历史的人类史上最大的战争机器--拥有核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虽然亨廷顿声称冲突并不等于战争，然而他也不排除冲突可以是战争。'文明的冲突'是一种说着说着就会自动实现的带恶兆的语言。"(19) 以美国的所作所为，她要开始一场战争，她总会找到或者制造借口。同时，"西方体系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竞争上的--只要那种竞争是与寻求经济和外交利益相关联，它就不会威胁到这种基本稳定。但是，经济的扩张赋予了这些国家巨大的军事力量，从长远观点来看，就使得战争既不可避免又富有灾难性。西方文明是以军事征服作为发动机的，这是由西方的地缘政治决定的，而且这一特点伴随其文明兴衰的始终。杰费里.帕克敏锐地观察到：西方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武力……西方人在1500-1750年期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个全球帝国的要诀，恰恰在于改善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他说：西方世界赢得世界不是通过思想、价值或者宗教的优越，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20) 的确，直到2003年，美英发动的侵略伊拉克战争都证明了这一点。

为此，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钺钟历史地理边界线的稳定（毛泽东用他独有的战略家眼光，很具远见地认为，朝鲜半岛是我们的头，台湾是我们的腰，越南是我们的脚），中国必须谋求至少同钺钟历史地理区域内的国家，如蒙古、朝鲜半岛国家、中南半岛国家建立能够同时反击多国核打击的力量体系（这是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关键）。如果我们不要我们的"头"，或者不要我们的"腰"，或者不要我们的"脚"，那么我们还是"人"吗？因此，我们只有同蒙古、朝鲜半岛国家、中南半岛国家融为一体，中国方能拥有国家安全的全部含义。否则，中国在一定时候，比如内部腐败不可逆转的时候，历史就会再次重演。1900年6月（清光绪26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等八国大规模侵略中国，一度占领北京，掠夺财物、残杀人民、践踏中国主权。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中国面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1999年5月，美、英、加、法、德、意、荷、西等八国对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进行野蛮轰炸，屠杀中国记者，践踏国际法。据报道，事前八国与日本和俄罗斯就轰炸中国大使馆达成默契，所以当年侵略中国的主要国家，一个不少，还多了加拿大、荷兰和西班牙三国。如果我们不能以开明政治，建设一个富裕、文明、强大的国家，并与周边唇齿相依的国家建立联合，我们再次遭受西方军事集团的集体侵略不是没有可能的。

特别是，何新先生披露的1995年9-10月由西方世界500名最重要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科学家在费尔蒙特饭店（美国.旧金山）召开的高层秘密会议所制订的未来西方统治世界的政策：世界20%创造价值的人口就足够维持世界的繁荣，其余80%的垃圾人口要么被隔绝（不得参与20%优秀人口和优秀文明的活动），要么在"高技术"条件下被"人道"地、非血腥地、大规模地消灭。我们中华民族自西历19世纪以来，始终被西方（包括日本）视为劣等民族（包括印度），而现在中国和印度又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费尔蒙特秘密是真的话，那么中国和印度被西方集体屠杀的可能性极大。所以，我们危在旦夕。

有鉴于此，中国与周边国家（主要指朝鲜半岛、中南半岛国家、不丹、锡金、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国）的政治军事关系仅限于传统的维持边境秩序层面，显然是不够的。中国必须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一个具有紧密军事关系的联盟（这是唯一的发展道路）。原因有三：第一，因为中国与这些国家具有"血缘"关系；第二，因为这些地区的政治、军事地理对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极端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三，市场经济最主要的东西就是流通，而这些地方均是中国发展和推进市场经济的关键跳板和道路。总之，这些地区，实际是中国钺钟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是中国钺钟地理的边缘。犹如古人所说，他们和中国恰如"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他们亦如中国的肢体一样密不可分。"中国与边境，犹支体与腹心也。夫肌肤寒于外，腹心疾于内，内外之相劳非为赐也？唇亡则齿寒，支体伤而心惨怛。故无手足则支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21) 故此，我们应学古人，勇敢地对唇齿相依的周边国家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22)也许有人还顾忌民族和国家间关系，难于认同我的观点。可是，美国海权论者马汉在控制海洋并支配世界的步骤中就明确提出，美国应与有共同血缘关系的英国合作，确立同一种族对海洋的支配。看看从二战以来的美英关系，我们从他们对苏联、对马尔维纳斯、对科索沃、对伊拉克、对阿富汗的亲如兄弟的一致性就知道，他们始终坚持了马汉的观点，因此，他们所向无敌，强盛不衰。美国为什么不寻求同日本、俄罗斯、法国、德国等国的"亲密"合作，确立对海洋的支配呢？因为他们不和美国是"同一种族"。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周边国家最多的国家，与15个国家有共同的陆地边界，与7个国家有共同的海上疆界或隔海相望，22个周边国家中，与朝鲜和越南既有共同的陆地边界，又有共同的海上疆界。这种复杂的周边形势不容我们产生激烈的对抗关系，必须实施有效的战略协作。我们与周边国家只有合作才能发展，老死不相往来或者对抗就是我们的死路。我们的发展不是为了称霸世界，我们没有称霸的野心，我们增强自己的力量，除了保障我们的安全和逐步提高中华民族的生活水平外，就是渐次废除那些只有依靠实力作为后盾才能废除的不平等条约，收回那些只有依靠实力作为后盾才能收回的权益。

总之，无论如何，我们必需有坚强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力量。我们知道，光靠宣传和阿Q式的自我胜利，最终赢得独立和胜利必将如二战那样将是在付出几千万条生命甚至更多以后。张文木博士认为："现代战争是发生于私有制的资本运动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规律：有资本竞争，就会有资本全球化和资本多极化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避免要产生民族国家因市场经济发展而造成的对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源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只要这种需求持续增长而国际社会又不能保证对有限资源在民族国家间的计划和公平分配，那么，霸权与反霸权及由此产生的国家间的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引自张文木网文："世界霸权与印度洋--关于大国世界地缘政治的历史分析"）。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作为后盾，我们怎样去赢得竞争？因此，"善制夷者，力足以相及，则抚其弱、抑其强，以恩树援，以威制暴，计之上也。力不足以相及，闻其相攻也而忧之，修城堡，缮甲兵，积刍粮，任将训卒，以防其突出，策之次也。听其蹄啮以增其强，幸不我及以缓旦夕之祸，坐毙之术也。"(23)

这里，所谓"夷"已非古中国之边族，而是今日中国之侧，崇尚霸权主义、军国主义、扩张主义、干涉主义的各国势力。

当然，我们必须指出，美国的霸权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俄罗斯的扩展主义以及印度的干涉主义等等是构成中华民族生存威胁的极端的一面，如果这些威胁演变成为直接的冲突，必然是人类的一大灾难。但同时，人类如果在这种极端的反面，能够凭借多方面的智力以及美、日、俄、印之间的差异，寻找到一个和平而非战争掠夺的，并

且建立在公正、公平的国际关系基础之上的自由共生体系，这又将是人类的一大福音。

---

(1) 罗素，《权力论》，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139页。

(2) 罗素，《罗素文集》，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第585-588页。

(3) 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4) 柏杨，《中国人史纲》，上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182页。

(5) 伯恩斯坦、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9页。

(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61页。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289页。

(8) 王逸舟，“树立世纪之交的国家安全观”，《了望》，1999年，第37期。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0年中国的国防》，2000年10月。

(1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198-199页。

(11)萧一山，《清代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77页。

(12) 张文木网文：《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与印度未来安全》。

(13) 阎学通，《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天津人民出版社，1、2000年第一版，第48页。

(14) 《左传.昭公二十二年》。

(15) 转引自蒋廷黻，《中国现代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页。

(16)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0》。

(17)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0年中国的国防》，2000年10月。

(18)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230、254页。

(19)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版，附录。

(20) 朱宁等，《变乱中的文明》，中国人大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39页。

(21) 《盐铁论.诛秦》。

(22)《诗经.秦风.无衣》。

(23) 《读通鉴论.卷七》。

**********